

喚醒

中國

John Fitzgerald



**AWAKENING
CHINA**

国民革命中的
政治、文化与阶级



费约翰 著
李恭忠 李里峰等译
刘平 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 / (美)
费约翰著;李霞等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
书店, 2004. 10

ISBN 7 - 108 - 02111 - 0

I. 唤... II. ①费... ②李... III. 政治 - 概况 - 中
国 - 近代 IV. 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325 号

责任编辑 杜 非
封扉设计 张 红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隆昌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9
字 数 456 千字 图字 01 - 2003 - 4546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9.00 元

序

现在，连孩子们也已经长大，知道询问本书何时能结束了。我本以为西奥班（Siobhan）、特瑞丝（Therese）、热内维也夫（Genevieve）和伯纳德（Bernard）四个小家伙对本书的延误负有部分责任，但实际上，他们是无尽的动力之源。原因在别处。

我对民族“觉醒”这一理念的兴趣，可以从研究生阶段关于中国国民党宣传部的研究（完成于1983年），一直追溯到越南战争期间。那时，本科阶段的我对个人解放和文化解放略有所知，似乎在呼应着越南的民族解放斗争，以及“中国之音”通过短波发布的对于一个新社会的强烈呼唤。从那时起，我就对如下二者间的潜在联系感到奇怪：一是我们许多人在那些狂热的日子里似乎都经历着的个人觉醒，一是中国和越南产生的关于民族解放和社会重建的话语。本书尝试着探讨这种联系。书中的第五、六、七三章源于我的博士论文。其余部分，则是对个人和民族觉醒这一理念的历史所作的延伸性注释，这一延伸花了很长时间。

一开始，我完全不清楚有多少优秀的中国和外国学者曾在我之前探讨过这一领域，其间我从他们那里学到了许多东西，以满足自

己那时候的好奇心。我当时并没有想到要为这一学术体系添砖加瓦，而只是满足于一项翻译作业。在中国，个人觉醒和民族觉醒也是相伴而行的。本书目的是再现一群优秀中国人的语言和论辩，他们在20世纪初首先建立了个人和民族之间的联系。我这样做，部分是为了揭示一些联系显得比另一些联系更有道理的缘由，但主要还是为了展示一种“唤醒政治”是如何在一场群众革命运动中变得体制化的。概言之，本书探讨了一段隐喻的历史，从它在帝制中国和欧洲启蒙思想中的根源，一直到它在近代中国国家和民族建构中的流变。

在中国自己的历史学当中，“觉醒”一词的含义和意义似乎无需界定。妇女，青年，特定的社会阶级，以及民族，据说都会独自或者次第觉醒，并在觉醒当中发现一条摆脱封建迷信沼泽和帝国主义压迫的道路。或许这是因为，当代历史学家遇到这一理念时，总是参考中国民族主义者自己的言论和著述。在西方学术界，这个术语更多地出现在标题而非正文当中。^①在任何一个较大的图书馆，《近代中国的觉醒》、《龙的觉醒》、《中国觉醒过来》这类著作总是占满了半个书架。这些标题也是向历史先例表示敬意，尽管这是一个欧洲的先例。据说拿破仑曾经警告说：“看着中华帝国。让它沉睡，因为一旦这条龙醒过来，世界将会发抖。”^②人们用以描述自身及其在历史中的困境的词汇，正如别人看待自己的方式一样，自然值得认真对待。关于中国民族运动的词汇索引表中竟然没有“觉醒”一

① 白鲁恂 (Lucian Pye) 的著作对中国政治话语异常敏感，也许可以算做是例外。见 Pye 1968。然而，本书并不是一项关于白鲁恂所探讨的那种政治文化的研究。我的兴趣在于研究政治和阶级，也就是说，在于追溯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中政治对文化的挪用。

② 见本书“中文版序”第3页注。

词，这个疏忽有必要在此加以纠正。但我感到我们可以更进一步。对于20世纪中国的文化和政治重建而言，中国的觉醒这一理念具有如此核心的意义，以至于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入口，可以由此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并探究中国改革者和外国观察家之间在每一个阶段的对话。^①

本书的设计非常谨慎。故事和时尚、建筑和自传，与政治和历史并肩而立，读者被邀请在作家、艺术家、哲学家、民族学家、革命家和军人当中徜徉，除了都在本书出现这一点，他们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有时候，谣言也像真理一样得到了认真的对待，小说则和档案一样频繁地被征引，梦寐被赋予了突出地位——在历史著述中，这种地位通常是属于事实的。

但本书依然是一部史学著作，尽管它未能远离我一开始设想的小说。这既有利也有弊。小说的作者可以在其文本上空自由盘旋，从奥林匹亚山巅评论其角色的弱点，即使未能从其经验中获益，他们也不必担心有什么不合适。而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危险的：生活也许并不总比小说更奇异，但通常比小说更复杂一些。当然，没有哪部史学著作能够讲述整个故事，在此我也不打算这样。当历史学家是局外人的时候（如同我与那段历史的关系一样），他们承受着额外的风险，即他们站在自身立场上评论历史时所作的假设。幸运的是，当时的虚构小说作者和杂文家，比同时代的政治家们更经常、更深刻地反思自我和世界。自然，他们的反思也比一名在20世纪末写作的外国观察者可能指望的更加深刻得多。因而，我以小说作为资料，不仅是为了鉴别和证明我的论题，也是为了提供当时人关于这些论题的思考。

① 我以 Greg Denning 那种方式使用“反思”一词。见 Denning 1993: 83, 88—89。

在小说当中，作者也可以自由地塑造与其目的相适应的角色。历史学家则完全只能从生活中选择角色。那么此处的选择基础何在？我出于如下目的而选择了自己中意的声音，试图表明，国民革命当中关于民族、国家和阶级的思想演变，是与更普遍的论辩所建立的路线齐头并进的，围绕着中国的特性，这些论辩在伦理学、民族学、文学、新闻学和历史学当中进行着。这些声音标志着一个更大的、散漫的场域的边界，政治理论家和活动家们在其中表达自己的理念，其他人则明了“唤起”和拯救中国的吁求的意义。

毋庸赘言，历史学家不仅必须表明自己的故事有某种事实基础，而且要表明，该故事一点也没有脱离事实，因为事实可以通过资料来重建。幸运的历史学家可能碰到某个典型人物或者群体，他们的经历忠实地遵循了历史学家希望讲述的故事的模式，并且，他们的日记、通信和著述使历史学家可以重构他们对各种事件的反应，帮助读者明了该故事的意义。我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资料，或者究竟是否理解其意义，这有待于别人去判断。但我确实认为自己很幸运，能够从中国大陆和台湾、美国、澳大利亚、欧洲和日本的图书管理员、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学家的不懈工作中获益，他们不仅保存了有关这一时期的许多历史资料，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这些资料都得到了整理和出版。我对他们深表感激。如果相关资料已经翻译成英文，我就参考英译本，以方便英语读者。

本项研究过程中参考的两个最有价值的图书库藏，都位于堪培拉。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图书馆的 Y·S·陈 (Y. S. Chan) 和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的西德尼·王 (Sidney Wong)，为我提供了他们收藏的所有相关资料，并且帮我查找了更多他们没有收藏的资料。墨尔本大学图书馆的莉莉·胡 (Lily Hu) 和比哈尔·颜 (Bick-har Yeung)，哈

佛一燕京图书馆的欧仁·吴 (Eugene Wu)，以及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图书馆的切斯特·王 (Chester Wang)，也提供了类似的帮助。尤其是欧仁·吴，在我返回澳大利亚之后的很长时间内，还为我越洋传送有价值的资料。陈定炎爽快地提供了一份关于其父陈炯明的珍贵资料集。我对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在中国，张宪文、蔡少卿和杨振亚不辞劳苦，为我提供了不少难以查找的资料，并予以有益的指点。得知南京大学历史系现在位居全国前列，我一点也不感到吃惊。南京的第二历史档案馆慷慨地开放其馆藏档案，我对（该馆利用部）各位主任和工作人员致以诚挚的谢意。最重要的是，如果没有台北的国民党党史会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的帮助，这个项目就不可能完成。我特别想感谢吕芳上和李云汉，他们的帮助和学问，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国民革命的理解。

王赓武教授指导了我的博士论文。完成本书期间，我经常听到他从远方传来的建议，并试图更多地接受他的建议。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期间，我也从那里的老师和同学之间学到了很多，他们的帮助就如其友情一样慷慨，特别是约翰·芬彻 (John Fincher)、贝弗利·胡珀 (Beverley Hooper)、宝林·基廷 (Pauline Keating)、布赖安·马丁 (Brain Martin)、华伦·孙 (Warren Sun)、肯·威尔斯 (Ken Wells) 和蒂姆·赖特 (Tim Wright)。任教于墨尔本大学以及转至拉特罗布大学执教之后，我又开始重新接受教育，这两所学校的同事和学生们启发我把眼光越过中国，去重新发现美洲、欧洲和太平洋。限于篇幅，我难以逐一列举那些指点过我的名字，但我必须向这几个人表示谢意：朱迪思·布莱特 (Judith Brett)、伊安·布利顿 (Ian Britain)、迪佩什·查克拉巴蒂 (Dipesh Chakrabarty)、格雷·德宁 (Greg Denning)、里斯·艾萨克 (Rhys Isaacs)、杰克·格

雷高列 (Jack Gregory)、罗宾·杰弗瑞 (Robin Jeffrey)、加内·麦坎曼 (Janet McCalman)、安古思·麦金太尔 (Angus McIntyre)、斯图尔特·麦金太尔 (Stuart McIntyre)、安·麦克莱伦 (Anne MacLaren)、多娜·麦维克 (Donna Merwick)、保罗·鲁尔 (Paul Rule) 和桑加·塞思 (Sanjay Seth)。加布里埃尔·芬南 (Gabrielle Finnane) 强调了理论的重要性。

有一次，在澳大利亚的奖学金资助下，我携四个孩子出现在毛里斯·梅斯纳 (Maurice Meisner) 的门前，当时他掩盖了自己的惊愕。深切感谢他在研究生研讨班上给我无声的鼓励。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在麦迪逊期间杰基 (Jackie) 和吉姆·穆尔 (Jim Meuhl)、琳达 (Lynda) 和吉姆·莱 (Jim Lay)，以及迪克 (Dick) 和南希·舒尔茨 (Nancy Shultz) 所给予的友善。我在美国从事研究期间，也受助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拉分校、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哈佛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分校和杜克大学的热情接待。我特别珍视杜赞奇 (Prasenjit Duara)、阿瑟·沃尔德伦 (Arthur Waldron)、孔飞力 (Philip Kuhn)、韦慕庭 (Martin Wilbur) 和易劳逸 (Lloyd Eastman) 的帮助。我对德里克 (Arif Dirlik) 的感谢明显见之于本书注释当中——其著述的被引用程度堪与孙中山的著述相比。然而，注释中几乎没有表达我对近代中国研究领域其他前辈专家的敬意，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我都参考了他们的著述，但在最终成书时，他们极少被提及。未能见之于本书的最长的注释，应该留给李文森 (Joseph Levenson)、哈罗德·艾萨克斯 (Harold Isaacs) 和韦慕庭。此外，施拉姆 (Stuart Schram) 为纳入本书的博士论文关键部分提供了有益的批评意见。斯坦福大学出版社的审稿人和编辑使我避免了许多惊人的错误，为此我要感谢慕瑞·贝尔 (Muriel Bell)。本书标题的确定，我要向林恩·

亨特 (Lynn Hunt) 表示敬意, 其著作《法国大革命中的政治、文化和阶级》, 提醒我认识到了政治和文化交会的十字路口底下的丰富矿藏。

长期以来, 安东篱 (Antonia Finnane) 都是我的向导, 以至于说不清我写下的是她的文字, 还是我的文字。同样, 我也说不清是应该感谢安东篱赡养了其父母帕特里西亚·芬南 (Patricia Finnane) 和彼得·芬南 (Peter Finnane), 还是应该感谢其父母生养了她。两方面我都深怀谢意。我的父母再也不能当面接受我的爱和谢意, 但如果上天有灵, 他们必定正忙于为孙辈们充当守护神。

与本书相关的研究得到了下列机构的经费资助: 富布赖特基金会 (the Fulbright Foundation)、澳大利亚研究委员会 (the Australian Research Council)、维多利亚副州长委员会 (the Victorian Vice-Chancellor's Committee)、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历史系 (the Department of Pacific and Asian History at the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墨尔本大学人文学院 (the Faculty of Humanit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拉特罗布大学社会科学学院 (the School of Social Sciences at La Trobe University)。

书中讨论的一些想法, 最初见于我先前的如下著述:《被误解的革命: 中国国民革命中的国家和社会, 1923—1926》, 载《亚洲研究》第49卷第2期 (1990年5月) 第323—343页, 经亚洲研究协会授权转载;《近代中国“自我”的创造》, 收入《中国过去的现代化》一书, 马贝尔·李 (Mabel Lee) 和塞罗科姆拉—斯蒂芬诺夫斯卡 (A. D. Syrokomla-Stefanowska) 主编, 1993年版, 经瓦尔德·佩奥尼 (Wild Peony Press) 授权转载;《中国国旗上的星星: 让宇宙回归民族》, 见于《转型中的国家: 政治空间的再想像》一书, 约瑟芬·卡米莱里 (Joseph A. Camilleri)、安东尼·加维斯 (Antony P. Jarvis) 和阿尔伯

喚 醒 中 國

特·宝利尼 (Albert J. Paolini) 主编, 1995 年版, 经版权拥有者林恩·雷那出版有限公司 (Lynne Reinner Publishers, Inc.) 授权在本书使用。

費 約 翰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

目 录

中文版序	1
序	1
题记	1
导 言 唤醒这头巨兽	3
第一章 唤醒与被唤醒	35
唤醒与政治	37
唤醒与训政	51
唤醒与启蒙	59
唤醒与历史	71
唤醒与梦寐故事	86
拿破仑与龙的觉醒	93
第二章 一个世界，一个中国：从伦理觉醒到民族解放	100
伦理的功能	105
共同体、理性和“意识”	109
理性的民族	121

作为公民和爱国者的自我	132
第三章 一个中国，一个民族：关于人种论的不平等条件	153
被囚禁的中国	158
中国人怎么了？	174
民族主义者的探索 and 发现	188
民族主义者俘获殖民者	209
第四章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封建主义”与社会革命	220
地方自治与“封建主义”	225
政治语言与语言政治	231
“封建主义”与中央集权国家的理想	239
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250
第五章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自由主义政治与党治国家	270
党治国家的诞生	277
清除国民运动中的自由主义	284
国民宣传与自由主义反应	294
自由主义政治、群众政治和“舆论”	306
第六章 一个政党，一种声音：国民党宣传部	317
竞争的声音（一）：上海与广东	322
竞争的声音（二）：宣传部的人员	334
宣传的协调和规范	351
纪律、混乱和“阶级斗争”	363
第七章 唤醒的机构：政府、政党和军队中的宣传部门	382
国家机关	383
党务组织	401
军事部门	422
结 论 代表阶级和民族	453

民族觉醒与社会利益	459
唤醒与代表	465
代表真实	478
现实主义与实践	487
唤醒阶级和民族	500
参考文献	503
索引	557
译后记	585

题 记

在打开一桶伯明翰制造的金属物品时，有件怪事很难解释。人人都知道，因为要运到遥远的国外，在把这些抛光良好的钢铁制品装进桶里时，要尽可能地排除带咸味的空气，小心翼翼地包装。这些桶或箱子，都尽可能装得严实，还要用粗帆布盖好。这就是我们所谈论的那个“桶”的问题。但是，当揭开桶盖，拿出一些包装盒时，突然看到桶的中间有一只几乎处于蛰伏状态的大蝎子，刚一接触温暖的空气，这家伙就醒了过来。

约翰·巴罗 1793 年在北京打开从伦敦带来赠送给乾隆皇帝的礼品时的情景。(巴罗 1806: 114)



1. 广州中山纪念堂, 约 1946 年。(Tsao 1946)



2. 高其风:《吼狮》, 1927 年。
(Croizier 1988: 90)

导言 唤醒这头巨兽

1

今天所讲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有两种：头一种是要令四万万人都知道我们现在所处的地位。……我们提倡民族主义，便先要四万万人知道自己的死期将至。知道了死期将至，困兽尚且要斗。

孙中山，1924^①

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

毛泽东，1944^②

1925年3月12日，就在孙中山逝世的消息传到广州之后不久，

① 孙中山 [31]: 102, 113。孙中山1924年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引自出版于1942年的Frank W. Price的英译本。中文版见孙中山 [33]。

② 毛泽东 [11]: 318。

广州的国民党当局开始筹划为他修建一个纪念堂。年轻的吕彦直，一位从美国学成归来的优秀建筑师，在纪念堂设计方案竞标中获胜。艺术家高其风也获准为纪念堂的门厅画三幅画，即一只老鹰、一匹马和一头狮子。建筑师和艺术家都全身心地投入了这项工作。吕彦直正在忙着设计广州的纪念堂时，又被赋予设计南京中山陵的使命。他对这两个项目是如此投入，以至于彻底累垮了自己的身体。两个工程尚未完工，他便于1929年逝世，年仅35岁。艺术家高其风的传记上说，他也“毫无保留地投身于”自己的工作，“不久就成了广东家喻户晓的人物”。

吕彦直设计的纪念堂和高其风的绘画，是上个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中的活力、智慧和个人牺牲的极好例证。在当时，许多人都有这种紧迫感。国民革命中的工人、农民、革命干部、士兵、作家和艺术家们，无数次地重复着吕彦直那样的献身。广州中山纪念堂的存在，不仅仅是对孙中山个人的纪念，也是对其他许多人的纪念，² 他们与孙中山一样，看到中华民族正在从沉睡中觉醒。^① “我们自被满清征服了以后，”孙中山临死前一年这样说，“四万万人睡觉，不但是道德睡了觉，连知识也睡了觉。”^② 孙中山领导的民族革命，标志着现代中国的觉醒。

今天，与中山纪念堂有关的一些东西仍然处于沉睡状态。其中一些被精心管理的场所，吸引了许多海外华人参观者和台湾同胞的视线，但在那个阴暗潮湿、满是灰尘的大厅里，已经不再举行任何仪式以纪念现代中国的觉醒。不久以前，曾经有过一个时期，这个大厅还被频繁使用。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民族叛徒”、“走资

① Croizier 1988，李嘉纳（音）1941：12。

② 孙中山 [31]：133。

派”们常常先被红卫兵带到这个礼堂，然后在愤怒的人群中游街示众，再被拘留或者处决。用各种管子和瓶子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团伙，偶尔闯进大厅去破坏别的团伙的会议。在无序的混战中，许多东西被毁坏了。^①当然，孙中山从未想到，自己首倡的革命会导致这种后果。然而，1920年代席卷广州和广东的国民革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大规模的群众性政治活动，二者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政治和文化上的联系。这一联系的源头，可以追溯到从上个世纪之初到毛泽东时代“唤醒”大众的政治史。如果说，这个大厅今天显得庄重而静谧，这并不是因为孙中山已经逝世，而是因为毛泽东也已经随他而去。

广州的中山纪念堂显示了传统美学和现代工程的奇妙结合，这种结合方式，使它看上去既有鲜明的中国风格，又有明显的现代气息。这正是建筑师吕彦直的高明之处。高其风的三幅绘画，也是国民革命年代出现的最好的作品之一，既具有新鲜的气息，又具有自信的中国风格。中山纪念堂存放着的三幅绘画中，那头狮子最让高其风声名大震。在中国艺术家们的作品中，狮子出现得比老鹰和马都少，但在国民革命时期，狮子在革命绘画中的重要性正在上升。孙中山逝世这一年，狮子获得了自己的地位。另一位著名画家陈树人仅存的一幅狮子画，也创作于同一年，当时他与国民党人保持着密切的工作关系，并将自己的时间和天赋分别用于艺术和宣传。另一位国民党要人，积极的妇女运动家何香凝，因为孙中山的逝世，也转向狮子画。^②然而，甚至在1925和1926年流行起怒吼的狮子之后，高其风的狮子画仍然享有突出的荣耀。

① Vogel 1989: 24.

② 关于何香凝与国民党的妇女运动，见 Gilmartin 1994: 206—217。

高其风的狮子画有别于其他作品之处，不仅在于其题材，还在于狮子的表现方式。高其风的笔下是一头睁眼看世界的狮子，而不是一头被人观察的狮子。它3 注视着艺术家和中山纪念堂里那些哀悼者，异常警觉，随时准备一跃而起。它那大胆而自信的凝视，表明这是一头已经觉醒过来的狮子。广州孙中山纪念堂的设计和装饰，都象征着一个现代的、鲜明中国风格的、已经觉醒过来的孙中山和中国形象。这种形象正是孙中山期望后人记住的。

Awakening* 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介于及物和不及物之间，它所指的状态，与从熟睡到清醒的那种意识转换状态没什么特别的差异。在中文里，该词通常采用不及物的形态，如觉、觉悟、醒，或觉醒，意指“承受一种觉醒”。在大众政治学里，它也采用唤醒他者的及物形态（唤起，唤醒），或者采用祈使语气，如：“醒来！”（醒！觉悟！）在民族运动的总体语境下，这个词被认为意指通过一个复杂的过程，中国人逐渐觉悟到自己的民族地位。这个过程包括流行时尚和品位的变迁、对个人身份和生活意义的好奇心的增长、卷入对殖民主义种族偏见的令人烦扰的评判，以及日益加速的商业化和工业化所带来的累积性的后果。然而，国民党人却不愿让整个民族自愿地觉醒。改革家和革命家们具有一种强烈的目的感，一种对于理性的支配地位的热切认同，以及一种追求政治组织和纪律的可怕力量，他们呼喊着重要“唤醒”整个国家。

在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国家运动史上，这种积极和消极力量的汇合具有普遍性。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话来说，在那些地方，“通过大众传媒、教育体系和行政法规，人们既能看到一种真

* 此处未将 awakening 一词译成中文，因为作者在此试图强调该词的及物和不及物的双重性质。——译者注

实的大众民族主义热情，也能看到一种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①“唤醒”一词的及物 and 不及物两种含义，都必须保持对中国的民族觉醒语言的忠实。同时，又需要对两种含义加以区别，以区分中国民族革命进程中的革命部分和进化部分。因而，问题就在于解释从一种觉醒含义向另一种觉醒含义的转变，从不及物含义向及物含义的转变，并追溯民族觉醒观念的制度化经过，分析它怎样从一种不成熟的冲动演变成为一种鲜明的纪律化的群众政治风格，并置于高度纪律化的训导型国家的监管之下。

政治活动家们系统、公开的努力，以及普通群众更个人化、更乏思量的醒悟，由于唤醒这一主题而变得复杂化，很难将它们清楚地分割开来。这是一种普遍的状况。尽管表面上看，“唤醒”一词与中国的民族主义并不一致，但所有关于这一时期的文化史研究都将显示，这是当时最广为使用的语汇，在当时的日记和自传、艺术和文学、伦理和教育、历史和考古、科学和医学、地理学和人种学，当然也在那时的政治中，都留有它的痕迹。这个词语的无所不在，有助于解释当时两大运动的汇合，一个是民族导向的文化运动，另一个是以建立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为目标的运动。也就是说，民族觉醒观念，帮助我们各个特殊的文化领域连接起来，并将之与政治行动领域联系在一起。民族主义政治跨越种种散漫的边界，在科学、哲学和文学中寻找自己的空间，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在努力征募知识分子为革命政权服务的同时，政治活动家们很轻巧地就进入了科学、哲学和文学的世界。

汇合的时刻便是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民革命。文学和道德曾经是一场文化风暴的中心。1915 年，这场风暴爆发于北京，随后 10 年

^① B. Anderson 1991: 114, 163.

中扩散到了沿海和内地。正如一位参加者所回忆的，一开始，新文化运动只是作为青年和知识分子中的“个性觉醒”而出现的。^①到1919年，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在凡尔赛会议上被转让给日本，中国的学生、商人和工人们群起抗议。此时，新文化运动也开始呼唤民族的觉醒。但是，甚至在1919年的抗议运动之后，从本质上说，新文化运动还在躲避政治。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们设想，中国将能通过文化重建而得到复兴。这正是孙中山和他发动的国民革命的入口。

在国民革命之前，文学、伦理和大众教育从未很好地与政治汇合，是孙中山而非别人将这些东西带到了一起。1935年，历史学家傅斯年这样回忆其中的联系：

这风气当时的先锋重心固然是北京，而中山先生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实给此运动以绝大的政治动向。我们从他当时所表现的议论中清楚的看出，他是觉得单是一种文化的革新是不足的，必有政治的新生命，中国才能自立；必有政治的新方案，中国才能动转。^②

1919年，《建设》杂志创刊之后不久，作家和艺术家们就与革命者们一样投入了一个“政治方案”中。高其风的绘画表明，艺术和政治被超常地“嫁接”在一个形象之中，它使二者紧密围绕着觉醒的民族这一主题。

虽然在正统的伦理道德和大众的宗教实践里，都存在着“唤醒”和“觉醒”说法的历史先例，但现代中国的觉醒并不仅仅是历史语汇和传统实践的产物。与民族觉醒这一观念相伴的，是民族主义本身。有人说过，拿破仑把欧洲各民族从沉睡中唤醒过来了，并

① 陶希圣 1964：77；Dirlik 1978：47。

② 吕芳上 1989：69—70。

且，如果他能够顺利前进的话，他也能预见中国的同样命运：“注意观察中华帝国。让它沉睡吧，因为当这头巨龙苏醒时，全世界都将发抖。”^①事实上，中国并不是第一个让世界震惊的亚洲国家，也不是惟一声称民族觉醒的国家。在20世纪中期，日本“皇军”在亚洲做了拿破仑的军队一个世纪前在欧洲所做的事情——激起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和武装反抗君主统治、殖民统治的斗争。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国庆日就是“民族觉醒日”。

最近，在后殖民国家之中，民族觉醒观念大多已被民族“发展”观念所代替。如前所述，中国也已经抛弃了喧闹的群众政治，倾向于民族发展的渐进主义政治。但是，殖民地时期的民族觉醒，为后殖民国家的发展提供了先行条件。“尽管那时演讲中所用的词语是中国的‘觉醒’（而不是‘发展’），”白鲁恂敏锐地观察到，“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国家仍然是第一个新崛起的国家。”^②拿破仑的著名警句，预告了中国一旦“觉醒”之后世界可能面临的局面；同时，对于那些试图唤醒本民族，并使之为世界所瞩目的中国精英来说，这一警句也是一个挑战。国民革命期间，那些自觉、目的明确、有时未免狂热的年轻干部，都决心为中国做一件事，即唤醒这头沉睡的巨龙。据说拿破仑曾经告诫过欧洲人不要这样做。

“觉醒”的观念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也颇为普遍，不过，在形式上主要表现为理性的觉醒和普遍人文价值的觉醒。直到今天，觉醒这个概念仍然是法国大革命开启的解放学说的基本成分，从圣西门

① 我无法确定这条引用材料的出处，叙述中华帝国崩溃的著作，一般都会引用这则材料，很少有例外。拿破仑被放逐于圣赫勒拿岛时，读到了马戛尔尼的使华报告。1817年7月，他也在那里接待了访华归途中的阿美士德爵士。那一次，拿破仑断定英国人“不能有效地对东方人说话”。Peyrefitte 1993：512—518.

② Pye 1972：前言。

的社会科学到黑格尔的形而上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以及今天的批判理论，莫不如此。^①不仅是民族，而且包括社会阶级、妇女、青年和个人，都被允诺说，如果他们觉悟到自己所处困境的真正本质，并在觉醒中发现通向自我解放的钥匙，他们就能够获得自由。在中国也一样，关于觉醒的许诺不仅指向中华民族，而且指向组成这个民族的众多群体。

“觉醒”这个概念在中国曾经有过什么含义，它被谁以及针对谁而使用，它可能对民主政治的形式和风格产生过什么影响，以及为什么它在现代中国的民族主义语言中如此普遍地存在，欲回答这些问题，就需要进行一次“航行”，去探索语义学和民族历史之外的

6 领域，去寻找在关于民族发展的文献中通常被忽略掉的种种资料。我的研究是围绕着20世纪前30年民族觉醒的文化史（第一章）、道德规范（第二章）、人种学（第三章）、治国策（第四章），以及政治制度建构（第五章）、纪律（第六章）、组织（第七章）和语言（结论）等类别而组织起来的。为了突出中国觉醒过程中革命和渐进两方面的对称，本书阐述了上述每一个类别的发展，包括艺术和建筑、博物馆和医学、小说与散文刊物以及宣传、政治制度和群众组织等领域的当代状况。

除了唤醒这一主题本身，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将如此广阔、分散的领域连结起来。然而，唤醒这一主题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把上述领域连在一起。事实上，在我的研究所覆盖的时段内，觉醒的主体变得越来越狭窄，相应地，这个术语的使用领域也变得越来越窄。最初，现代中国的觉醒，指的是与理性的、物质的世界相关的自我和个性。令人敬畏的“我”苏醒过来了，孤零零地望着天上的

^① 见本书第一章和第八章。

星座，期待着上天的启示。这种普遍的“我”的觉醒，不久就转向特定的“我”——中国的觉醒，后者指向社区和民族的层面。对本民族特性的界定，进而引发了对理想国家形式的思考，这种国家要负起责任，唤醒民众成为“自觉的”公民。于是，这种“唤醒民众”的决心，促使那些先觉者创造出一系列组织、技术和程序，以唤起人们的公民身份和民族认同。当这些程序演化为一种制造新民的体制时，这种体制本身就开始呈现诸多集权国家的特征。^①但它又不只是集权主义的，它还是民族主义的。这些人就是中国的新民。政治权力追求一种民族主义的结局，即民族—国家的统一和主权，这一过程中的种种运作，使唤醒政治的焦点逐步变得狭窄。

本书的结构安排，意在展现从“自发的”自我觉醒，到“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唤醒过程中的一个个清晰的阶段。首先，本书描画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知识氛围的轮廓，尤其是那些滋生了进步、启蒙、“觉悟”世界新秩序等观念的氛围。随之而来的是，觉醒的观念由对“大同”这一普遍秩序的觉悟，发展为对单个民族群体这一理想的觉悟。从一个民族的理想，我们转到一个强大的统一国家的理念，再从一个国家的理念转到一个政党的理想，然后再从一个政党的理想，转到先觉的领导者单一、绝对的声音的出现。在任何一点上，我们都没有忘记观察权力的运作。因而，我们以现代自我的觉醒作为开始，而以1920年代广东省的革命运动，即国民革命的成功作为结束。 7

我试图表明，这样一次历史的跋涉，其足迹不仅局限于广东，也不仅局限于上世纪的20和30年代。我所说的先觉的领导者是孙中山，而在革命中担任唤起工作的指导者是毛泽东，他在1925年和

① Arendt 1951.

1926年这个关键时刻担任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实际上，我们正在追溯的，是本世纪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最有效的部门之一——宣传部门，及其最鲜明的两种活动形式——组织化的群众运动和自我净化——的起源。本研究的组织方式，对于一些读者而言，或许将构成一种耐心的考验，而其他读者则可能认为，这种方式根本不具有可信度。当然可能存在另一种关于现代中国的觉醒的描述。但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觉醒当做一个历史问题，而非一种历史叙述——即一系列问题导向一系列或多或少带有权威性的答案，那么，我认为，关于中国觉醒的故事，确实是非常有趣的。

中山纪念堂是本书中心话题的有效切入点。直到今天，这个纪念堂还以或固定或临时的方式，聚集着中国革命中的伦理学、人种学，以及中央集权制、经济统制、社会主义和群众宣传等方面的淡淡痕迹。例如，在大厅正上方，距离曾经放置过觉醒过来的狮子之处不远，仍然悬挂着一幅孙中山的墨迹——“天下为公”。

这一古老的格言，在孙中山使用过的为数不多的古典语汇中，其地位比较重要，它是一种伦理上的宣示。这一语汇首先出现于汉代作品《礼记》中的骈文里，然后，在后来的儒学注释和流行文献中广为传播。早期使用时，“为公”一词呼唤一种共同利益的理念，或者一种外在于政府领域的公共联系，并建立了一个调控个人和社会之间关系的伦理框架。^①当孙中山使用“为公”一词的时候，它

① 完整的句子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罗威廉（William Rowe）指出，将此处的“公”等同于政府，发生在很久以后的唐宋时期。见 Rowe 1990：316—317。即使在其初始状态，这句话也不是完全与政治脱离的。《礼记》记载说，天下归一时代（大概就是“天下归所有人”）“选贤举能”。见 Ch'ing 1972—1973：4—5。

还没有丧失这种集体所有权的意义。民国时期，“公”这个字，经常被用来指称那些居于个人领域和国家之间的组织与功能。民国时期建立了许多作为地方社区组织（公立）的历史博物馆和自然科学博物馆，以区别于受不同层次的政府资助（市立、省立、国立）而建立的其他博物馆。^① 8

然而，社区所有权并非孙中山使用“为公”时所想到的全部内容。他正在对这个术语提出一个强烈的要求，即要它吸纳“民治世界”或民主国家理念中的政府和公众概念。在孙中山的手书中，“天下为公”的题词，表述的是伦理道德和治国策略的结合，以及个人—社区关系和公民—国家关系的结合。任何从这幅字迹前走过的中国人都能意识到，它所说的不仅是伦理道德，而且也指政府和政治。

在逝世前一年所作的关于三民主义的系列演讲中，孙中山清楚地阐述了自己的意思。在关于民主的开场演讲中，他引用了“天下为公”的说法，目的在于为民主统治的原理提供一个真实的中国先例。他提醒听众，中华民族还处于沉睡之中，急需被唤醒。但他又说，对民主的向往，就如同古代中国的人民、道德和学问一样，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在内心里，孔子就是一位民主人士：

孔子说：“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他在吁求一个民治、自由、友爱的世界……因而中国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过民主观念，但在那时无法将之付诸实践。这种民主，就是外国人说的乌托邦，一种不能立即实现的理想。^②

讲到民族觉醒时，孙中山对个人和国民从皇权专制下解放出来表示

① 包遵彭 1964：42—43。本书第一章讨论了现代博物馆的出现。关于清末民初国家与“公共”组织之间的关系演变，见 Rowe 1989 和 Rankin 1986。

② 改编自孙中山 [31]：169—170。

庆祝，同时，再一次呼唤现代国家的觉醒。他把历史看做沉睡的乌托邦而置之一边，却吸取了其中与进步相关的所有东西。

上个世纪头 25 年里，被唤醒的自我逐渐被视为与被唤醒的国家相连。孙中山引用古训是一个经典的提示，但这也间接指向一种新近的考据传统，它关注旧的社会形式迅速瓦解之际出现的一个迫切问题，即自我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界定。民族正作为一种新的社会形式而被讨论，以期代替旧的社会形式。可是，被唤醒的自我有着独立的历史，而且，它争取自治的斗争，并非一开始就认同于民族的自由。被唤醒的自我的历史浸淫于伦理道德当中。只有当伦理道德与治国策略相结合的时候，个人的觉醒才会与民族的觉醒相汇合。

中山纪念堂为我们了解被觉醒的自我认同提供了线索。在大门不远处，悬挂着另一块告示牌，虽然更小一点，但与入口处的大幅字迹一样，也是对孙中山的极好的纪念。这块招牌上写着：“请勿随地吐痰。”1924 年 3 月 2 日，就在距后来的纪念堂所在地不远之处，在关于民族主义的最后一次公开讲演中，孙中山特意中断了演讲，劝告听众不要在公共场合吐痰、打嗝，要求大家实践一种新的个人文化，这种文化将在日常生活的实践中提供一种理想“国民”的形式。孙中山期望通过重新塑造“中国人”来锻造一个新的中国。围绕一种个人礼节的风尚，道德与礼仪汇合到一起，这种风尚，将使整个民族像组成该民族的个人那样具有自我约束力。^①

至少在这方面，西方人站在殖民主义立场针对“中国佬”（John Chinaman）* 的批评，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一个促成因素。从 1924

① Foucault 1984: 2—3.

* John Chinaman 是一个带有侮辱意味的词，为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西方人对中国人的蔑称，中文里尚未见到相应的词，此处以“中国佬”指代。——译者注

年1月到8月，孙中山通过每周一次的系列讲演，阐释了国民党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这时，他直接称赞了西方人的观点。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被表达为意识形态上的革命军火库，每一项主义都被设计成与革命运动的某个特定目标相对应：民族主义对应着驱逐外国帝国主义，民权主义对应着推翻军阀（后来是“封建主义”），民生主义对应着普通民众生活和工作条件的改善。这些就是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的三大目标。^①孙中山的历次演讲包含着重复、费解，甚至使人误解的观点，这些观点并没有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系统读本提供多少指导，因而促使他的支持者作出进一步的辩解，也招来了历史学家们的批评。对此，孙中山辩护说，假如他的军阀盟友陈炯明没有在两年前即1922年6月16日，发动一场“出乎意料的叛乱”，他将能作出更好的演讲：

数年心血所成之各种草稿，并备参考之西籍数百种，悉被毁去……此次演讲既无暇晷以预备，又无书籍为参考，只于登坛之后随意发言。^②

这些演讲的即兴性质，使孙中山未能系统地阐释自己心中那些关于革命的基本原理和战略。尽管如此，即兴发挥也不总是坏事。这些演讲都很生动，富有洞见力，往往从随意的主题开始，而回到革命的原理和战略上来，使人们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得到一种无系统的解读，因而很有启发性。这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针对“中国佬”的殖民性批评。在自己的演讲中，孙中山与西方种族主义者就中华民族的特性展开了对话。

在关于民族主义的六次讲演中，孙中山把焦点对准了外来帝国

① 邹鲁 1929, I: 331—341。

② 孙中山 [31]: 自序。

- 10 主义在中国的政治和经济控制，特别是中国人口的历史性“衰退”和中国国家的相对脆弱，并且指出，除非中国人民“觉悟”到帝国主义的危险，否则，中国将面临亡国灭种的迫切危机。^①但在最后一讲，他通过这样一个问题修正了自己的政治批评：是什么原因，使得自己的同胞在治理国家上无法与外国人相比？他感到，答案在于外国人对“个人品格”的期待：

现在各国的政治都进步了，只有中国是退步，何以中国要退步呢？就是因为受外国政治经济的压迫，推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中国人不修身。^②

关于个人品格，孙中山指的不仅是伦理道德，而且注意到了卫生和个人礼节。他复述了与一位美国船长的对话，船长抑制着自己的厌恶之情告诉他说，中国政府的某个部长，曾经在他的船上擤鼻涕，随意向船上昂贵的地毯吐痰。船长暗示，如此缺乏礼貌的官员，竟然连自己的身体器官都无法控制，又怎么能够期望他去管理整个国家呢？^③

实际上，吐痰的历史与近代中西交往的历史一样长。1793年，英国向北京的清王朝派出了第一个大使——马戛尔尼，他记录了对满清官员肮脏行为的厌恶：“他们很少使用口袋里的手帕，而是毫无顾忌地在房间里吐痰，用手指擤鼻涕，然后抹在袖子上，或者抹在旁边的什么东西上面。”^④马戛尔尼的审计员约翰·巴罗，是一位比较人种学者，他认为中国的官员跟法国人一样没有礼貌：“很多人不

① 孙中山 [31]：33，86，102。

② 同上：139。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③ 同上：136—137。

④ Cranmer-Byng [1902] 1962：225。

爱干净，在房间里随意吐痰，或者像法国人一样往墙上吐痰，而且，他们用自己的袖子来擦干净那肮脏的手。”^①在1793年，北京的清廷官员似乎还未注意到客人们的高度敏感。而到了西方军事优势已经在中国沿海反复展示了一个多世纪的20世纪20年代，一位外国远洋船长偶然的评论，则能激起革命的民族主义者心中深深的尴尬。对他的评论，孙中山只有表示赞同。

让中国改革者在东西方交往中感到羞愧的，还有餐桌。马戛尔尼对中国餐桌礼仪的评论，与对卫生的评论一样严厉。然而，在大约一百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革命者不时给同胞们提出个人建议，提醒他们改进自己在餐桌上的行为。1908年，一位忧郁的摩登青年发现，每当自己邀请外国妇女赴宴时，她们总是表示拒绝。于是，他向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求助。吴稚晖建议说，进一步注意卫生和礼 11貌也许能奏效。作为一名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相信，如果大家都能实现个人自制，那么就可以不需要国家了。^②但孙中山不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他更清楚地揭示了自我克制和管理国家之间的联系。在1924年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讲了两个有关外国人对中国餐桌礼仪之反应的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国外：

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济济一堂，各乐其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就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

① Barrow 1806: 77. 50年后，因为前一世纪英国上流社会的反法偏见，一位英国绅士向法国人表示道歉。此举的目的，在于将他那个时代文明的法国人与野蛮的中国人区别开来。De Quincey [1857] 1897: 351—352.

② Zarrow 1990: 170.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上海：

又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噢士巧士咪。”*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而中国之文人学子，亦常有此鄙陋行为，实在难解。

孙中山列举了中国人个人修养方面需要改革的其他许多缺点，包括指甲留得出奇的长这一旧习，以及（“也是自修上的一个大缺点”的）不刷牙。^①这些故事的用意，是重新赢得从马戛尔尼到当时的外国观察家如伍特海特（H. Woodhead）、吉尔勃（Rodney Gilbert）的尊重。他们认为中国人连自己都无法照顾好，因而不能胜任行政管理：^②

（所有这些坏习惯）都是修身上寻常的功夫，中国人都不检点。所以……外国人一遇见了便以为很野蛮……假如大家把修身的功夫做得很有条理，“诚中形外”，虽至举动之微亦能注意，遇到外国人，不以鄙陋行为而侵犯人家的自由，外国人一定是很尊重的。^③

重新赢得外国人的尊重，是收回管理中国的权利的条件：“我们为什么不能治中国呢？外国人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依我个人的眼光看，外国人从齐家一方面或者把中国家庭看不清楚，但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对于这些功夫是很缺乏的。”^④孙中山总是

* 英文 Excuse me 的译音。——译者注

① 孙中山 [31]: 137—138。

② 见本书第三章。

③ 孙中山 [31]: 138—139。蒋介石新生活运动的起源，也可以部分地归结为蒋介石的一个信念，即外国人不尊重中国人，是因为中国人不值得尊重。Thomson 1969: 156—157。

④ 同上: 135。

那么富有洞察力。从古罗马到现代，高度发达的欧洲文明，都把克制身体的自然功能和超自然欲望的能力，视为能否胜任城市管理的必要条件。^①围绕着一套共同适用于身体、家庭和国家的行为礼仪，私密性和公共性汇合到一起。到孙中山在广州发表演讲时为止，外国人早已认为，中国人的个人伦理、卫生和举止，与中国社会结构和帝国行政管理方面的效率低下之间，有着难以分割的联系。孙中山本人曾经周游海外，对于旅途中遇到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反应，已经变得非常敏感。他看待自己国民的方式，终究变得与马戛尔尼差不多。一看到那“或黄或黑的牙齿”和长长的指甲，或者听到使劲吐痰的声音，都让他感到厌恶，给他那复兴民族的雄心壮志浇上了一瓢冷水。因此，除了改组国民党、联合新的国际盟友和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之外，孙中山还抽空提醒中国人：应该注意外国人对

12

自己的看法，并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在这一点上，孙中山并不是孤立的。几年时间里，他建立了一支忠诚的队伍，他们同样坚信，一种新的个人自制风格，将能很好地反映一个国家的自治能力。1923年，广州特别市政府在全市修建了新型公共厕所，而当时根本就没有人提出这种要求。没有这种要求并不重要。公众仍有必要被告知如何保持自身的整洁——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去扮演一种能够提出有序的公共要求的“公众”。^②

① P. Brown 1988.

② Vogel 1969: 31. 国民党人对厕所的关注也成了嘲笑的对象。针对现代民族主义者们对卫生和盥洗的关注，林语堂作出了犀利而尖刻的典型回应：“自从发明了抽水马桶和真空地毯清洁器，现代人便倾向于通过一个人的清洁来判断其道德水准。”林语堂 1939: 22. 张天翼的小说《鬼土日记》(1931)，亦以厕所幽默为特色，嘲弄了1920年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这篇小说描述的世界里，“只有两个政治党派：一个倡导蹲马桶，另一个则倡导坐马桶”。“坐”派执政后，将所有的沟式公共马桶都改成了直立的坐式马桶，一场政治危机于是发生了。Dolezelova-Velingerova 1988: 218—219.

国民党人对于吐痰、打嗝和个人修养方面的观察并非琐碎之举，而是显示了自己重塑中国人、重建国家的决心。当他们谈到人们需要觉醒或变得自觉时，这就是他们所要表达的大致意思。

关于广州的中山纪念堂，最令人瞩目的，不是它的装饰画和告示牌，而是纪念堂本身的命运。北伐时期（1926—1928）国民党人离开了广州，尔后又成功地在南京建立了他们的中央政府。此后，这座纪念堂很快就被在南京修建的另一个更宏大的纪念物取代。两座纪念物都由同一个建筑师设计。但国民党人甚至在吕彦直早逝之前，就已经废弃了广州的中山纪念堂，而选择了南京的纪念建筑。坐落在南京市郊的中山陵规模宏大，朴素而不失庄严，而广州的中山纪念堂却显得谦逊，似乎被人忽视了。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相比于孙中山遗体最终安息的新的中央纪念建筑，广州中山堂丧失了本体，显得狭隘、空虚，注定只能是“地方”（本地）性的。^①

中央和地方纪念物之间的等级关系，揭示了民族觉醒的另一方面。国民革命除了别的意义之外，还意味着一场斗争，争论的焦点是如何界定“地方”在全国性政体中的意义，并建立一个政治框架，来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民族主义思想内部，关于地方社会和全国性社会、关于边缘和核心的不同观念在相互竞争，这种竞争表现在多种多样的象征舞台上，包括公共纪念物、艺术、文学和语言。

例如，语言改革并不仅仅在于制造一种大众训育的媒介，它背后还有更多的东西。通过扶助教育、提高识字率、国语改良运动帮助创造了一个民族的社区。实际上，民族的概念是在文学中被发明，并在语言改革运动中被制造出来的。然而，决定整个民族应该

^① 南京的纪念物也因其堂皇的声势而成了嘲笑的对象。见林语堂 [1931] 1969a。

采用什么政体的，是众多的写作者而非读者。如同讨论中央集权制和联邦制形式对于实现国家统一的优劣一样，围绕着标准语音和地方语音传统对于维持民族统一的不同价值，他们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新的语言和文学、艺术和建筑，并不仅仅是实现国家统一的工具，也是确定民族内部可承受的差异性程度的建构性因素。^①

用泰勒（A. Taylor）那句著名的话来说，所有的现代欧洲民族，最初都是“写作者们的创造物”，并且“只存在于想像之中；它们是写作者多于读者的民族”。^②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的民族也不例外。在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中，写作者几乎与读者一样多：1923年以前的八九年里，出版了700种新刊物，作者的总数基本能与最多时的订户数目持平。^③然而，无论是在欧洲还是中国，很少有民族主义者会期望自己民族的存在仅限于纸面上，或者期望它停留在排外的写作者的俱乐部层次上。如果没有别的东西，民族的生存将受到威胁。正如一名忧心忡忡的捷克民族主义者对一群同胞所说的：“假如屋顶现在就塌下来，那将会是民族复兴的终结。”^④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也有着同样的忧虑，因为他们都自负地认为，民族的历史和未来掌握在自己手里。章太炎带着真诚的恐惧说：“支那宏硕壮美之学，而遂斩其统序，国故民纪，绝于余手，是则余之罪也。”^⑤孙中山为他的民族运动声辩说：“如果中国亡了，罪恶是

① De Francis 1950. 关于语言文学在法国革命中的非工具性功能，见 Hunt 1984: 24.

② Taylor 1948: 32.

③ 周策纵列举分析了1915年至1923年间出版的700份新式杂志中587份的名称和出版细节。最为流行的杂志，其发行量也没有超过3万份。Chow Tse-tsung 1963: 1.

④ Taylor 1948: 33.

⑤ Shimada 1990: 19.

在我们自己，我们就是将来世界上的罪人。”^①不管他们如何自负，章太炎、孙中山等民族主义者，确实想使民族超越于自己书斋的墙壁和自己同党的范围。为了驱散自己的忧虑，章太炎满怀想像地热情工作，为中文发明了一套语音字母表，并致力于提高大众识字率。孙中山则开始从政治上唤醒整个民族。终究，中国的识字率运动发展为另一场运动，目标在于创造一个与书面想像中的民族相称的读者社会——即一个规模巨大、由书面语言所统一的民族，它能够满足文字的功能，即被唤醒。

然而，让语言改革家们发生分歧的问题，也正是那些困扰整个国家的最难解决的问题。大多数中国人都是文盲，他们讲着上百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于是，语言活动家和文字改革者们面临一个共同的两难处境：既要在各个特殊的语言群体内部提升大众识字率，同时又要保持书面语言的普遍适用性。这个矛盾，反映了民族主义思想内部一种更普遍的紧张：一边是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的理想，要求严格限制地方自治；与之对立的理念则主张，民族国家充其量只是国内各地区的总和。

在这里，传教士和中国的基督徒，通过教育、医疗实践和对市民生活的其他干预，以及他们为了让人皈依自己的信仰而树立的榜样的间接作用，在民族觉醒上起了关键作用。传教士试图赢得人们对天国的信仰，同时避免危及民族完整。^②在描述国民革命时期上海的一所教会学校时，弗雷德里克·李（Frederic Lee）注意到了神圣使命与世俗使命之间的密切联系：

这些男孩女孩们来自 15 个省，每个省都代表着不同阶层的

① 孙中山 [31]：75。

② De Francis 1950；Ch. 2.

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偏见和狭隘的嫉妒。尽管他们都是中国人，但从他们对本省孩子的宗派感情来看，你或许会以为他们来自许多不同的国家。……但教学过程还在进行着，这儿将分离的山头削平一点，那儿拓宽一下孩子们的同情心，让他们在包容自己家族的人以外，也包容他人。孩子们返回家乡时，视野拓宽了，并且更能欣赏其他地方的人。没有别的东西能像学校里的这种交流那样，将中国的各个教堂统一起来。^①

世俗的民族主义运动，不会比李牧师更乐意承认，中国是由“那么多不同的国家”组成的。但对于李牧师来说，不幸的是，“进口”的宗教是不被容忍的。国民革命一方面将火力对准了基督教，攻击它是“文化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攻击地方社区的“宗派感情”。外国的帝国主义是一个敌人，别的敌人则通过与特殊的地方场所相连而得以确认出来：土话、土豪、地方主义或地方观念，以及家族思想。^②

尽管广州中山堂是献给孙中山的，但它的存在，实际上证明了狭隘的广东地方感情的力量。1926年国民革命军离开广州以后，修建纪念堂的资金被终止了。然后，在广东军阀陈济棠的监督下，接受了粤裔海外华侨的捐款资助，纪念堂才得以完工。然而，有代表性的是，地方主义感情既不是不爱国的，甚至也不反对民族主义。地方感情把孙中山当做一个恰好是从广东省崛起的民族英雄来纪念。但就这么巧，省级军阀所理解的民族主义，与国民革命所宣布的中央集权的民族主义“品牌”并不相容。

所有那些很难纳入统一的民族国家结构中的文化与社会因素，

① F. Lee 1926, 20.

② De Francis 1950, 19.

都成了革命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说，这场革命是一场民族革命。对传统的语言和文化、温情脉脉的家族和地方纽带，以及对中央集权国家的权力延伸形成抵制作用的社会组织和权威模式，革命者都发动了进攻。实际上，革命者是那么希望以一种新的国家结构来取代旧的社会组织形态，以至于这场革命开始时是政治革命，最后却以社会革命告终。

这将我们带入了本书的另一个主题。社会革命或“阶级斗争”在20世纪20年代国民革命中的开始，标志着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路线分裂，并使二者的不同语言和实践得以区别开来，这种不同后来体现在关于统一和解放中国的竞争当中。一些国民党人追随孙中山，宣称民族革命中不包含阶级斗争。其他人则反驳说，只要能促进民族革命，阶级斗争就有作用。这场关于阶级斗争在民族革命中的重要性的争论，围绕着严格的政治规则打转，就此意义而言，它预示了人民共和国时期的语言、论争和群众政治风格。

阶级斗争成了解放后的中国政治的特征，可如果说国民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与之没有什么两样（或者更具体地说，与“文革”时期充斥于广州中山堂的斗争没有什么两样），那也未免言过其实。解放以后，国家机构有效地取代了20世纪20年代与国民党人对抗的社会网络，就这一点而言，相隔数十年后，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难以估量的变化。^①而且，在人民共和国的较早阶段，还有着足够的空间和众多的机会，让佃农与地主或工厂工人与其雇主之间的紧张，以一种冗长的（如果不是非法的话）冲突形式爆发出来。如果将“文革”视为一场奇异的皮影戏，表现的是发生在解放前的社会革命中“真实的”阶级斗争，那么，解放前和解放后中国的革

^① Schurmann 1968.

命语言风格之间的一致，就能得到很好的解释。如果说“文革”模拟了中国的民族革命这场悲剧，那它则是以闹剧形式出现的。

16

不管怎么说，中国革命的原始版本中都存在着闹剧的成分。当“阶级斗争”这个术语在国民革命中出现时，它被宽泛地用来指称革命运动内部的政治冲突，或革命者与社会抵制力量之间的对立，并且仅仅是隐喻地指称社会内部的斗争。实际上，社会内部“阶级斗争”的存在，对于政治的作用是偶然的。现实主义美学将国家层次的冲突，与社会经济这一基础领域的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人民之间的民族斗争连在一起，由此，政治的问题被含蓄地当做社会的问题。于是，宗派纷争很容易被解释为介于基本历史力量之间的更宏大的种种对立，处于竞争中的各个党派和宗派都决心去“代表”并掌握这些力量。革命者代表着阶级和民族的力量，认为自己同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反对派（主要是地方精英）之间的暴力冲突，就是社会对抗本身的标志。因此，虽然革命阶段难免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阶级、社会矛盾和社会利益，但民族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与革命领导者所演示的那场简单的戏剧并不完全一样。

阶级斗争在国民革命中的出现，与其说是源于社会内部的冲突，还不如说是源于国民革命者们所欣赏的国家形态和政治风格。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不久，孙中山就对自由主义政治中的你争我斗表示不满，并在随后10年中宣告，他只对一种国家感到满意，即建立在高度纪律性和高度集权化的革命政党模式之上的国家，简单地说，就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党治国家。在国民革命中，孙中山和共产党人共同合作，在广东省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党治政权。他们首先设计出了各种程序，以便通过大众宣传和革命纪律，来实现意识形态的统一和政治的中央集权化。在这方面，国民革命和“文化大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之间最明显的相似之处，就是毛泽东在这两件事

情上的作用。当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中鼓吹“阶级斗争”时，他正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正是因为他决定从政治对手那里夺回对宣传部门的控制，他才发动了“文化大革命”。对于毛泽东而言，在其全部政治生涯中，阶级斗争的语言都是一把标尺，从中可以估量出他对唤醒民众的现实主义代表制政治*的信念。

至于孙中山，公平地说，我们应该承认，从来就不存在一个堪与“毛泽东的中国”相媲美的“孙中山的中国”。如果说还存在过什么的话，那么，1925年孙中山的逝世，只不过突出了一种对照而已：一方面是他的民族统一理想，另一方面，却是中国在地域、社会、文化和政治上的分裂这一残酷的事实。在给他的诸多颂词中，也不乏冷嘲热讽，指责他只是“痴人说梦”。^①但是，甚至连这种嘲讽，也有利于确认这样一种认同，即把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与中国本身连在一起。孙中山以一位浪漫的梦想家的身份死去，因为他的中国仍然只是一个梦想。^②不过，他那催生一个新中国的策略，决不是一场调和的喜剧。

孙中山相信，自由主义共和政体不能适应“唤醒”民族这一任务。这就呼唤着一种新的政治。1924年11月3日，在对黄埔军校的告别讲话中，他对政治的含义作了重要的阐述。孙中山宣称：“大家结合起来，改革公共的事业，便是革命。所以说，革命就是政治事业。”然后，他将群众的观念和国家的观念糅合在一起，解释了他所说的政治的含义：

* 代表、代表制是本书的一个核心概念，与通常意义上的代议制不同，详见结论部分。——译者注

① Kuo 1956: 21.

② 一些分析家们注意到了孙中山喜欢空洞的梦想，不时否认1920年代存在着真实意义上的中国：对政治统一的期望被看成是“真实”中国的缺席。见 Iriye 1965: 160。

大家知道革命本是政治的变动，说到政治究竟是做些什么事呢？就“政治”两个字讲，“政”者众人之事也；“治”者管理众人之事也。管理众人的事，就是“政治”。换言之，管理众人的事，就是管理国家的事。

在这里，孙中山是向一群宣称“不懂政治”的军事学员训话，告诉他们，国家的统治领域并非什么外在之处，也没有远离他们日常关心的内容。政治就像吃饭和睡觉一样，是人类生存条件的一部分，每个能够吃饭睡觉的人，都与“国家事务”有牵连：

食饭、穿衣、睡觉，都是做人的常事，是人人应该有的事，试问一个人可不可以不知道做人的常事呢？无论哪一个人，都是应该要知道做人的常事的。大家都能够知道做人的常事，就是政治。大家能够共同团结起来做人，便是在政治上有本领的人民。

由于政治并不自外于日常世界，因而，世界每天都需要为政治提供空间。毋庸置疑，孙中山心里明白，这将限制各种自由在日常生活中的展开。他告诉这些军校学生，外来的“欧美”自由和平等理想，早就已经失去了作用。中国需要从一场国民革命中获得的不是个人自由，而是“团体自由和平等”。孙中山接着说：

就政治团体的范围讲，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政党……或者是本国与外国相竞争，或者是本党与他党相竞争，都应该有平等、自由。不能说在本国之内，或者是在本党之内，人人都要有平等、自由。^①

要求团体自由，必定对个体的行为自由施加了严格的限制。在4月26日所作的关于三民主义的另一次正式演讲中，孙中山预言，国民

① 孙中山 [11]：731—732。

革命将会在中国创建一个政权，它将比西方的自由民主制更有权威；同时，他也强调了自己为中国设计的新的宪政安排，试图减轻人们这种害怕，即那样将使政府凌驾于人民的控制之上。“中国有了强有力的政府之后，我们便不要欧美的人民，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①后来，他的追随者为了支持国民政府的各项限制性措施，宣称中国人被旧帝国的过分自由给惯坏了，这使他们能够“自生自灭”。^②团体主义政治是实现国家统一、主权和行动自由的一种技术。为了强化自己的观点，间或也为了让自己在传统政治思想的谱系中具有一席之地，孙中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国家是体，政治是用。”^③当超然的价值寄身于国家身上时，那么，所有其他的价值，包括个人、社会 and 社区的自由，都不再是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只是国家——它追求着自己的更高利益——所赋予的特殊待遇。

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党治国家，以使新的大众民主政治风格，亦即大众“感化”的政治走向制度化。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者都常常抱怨，中国人民对自己的社区和国家的理解被误导了，同时他们也常常安慰自己说，人民的素质能够通过群众教育得到改善。在这方面，他们从经典中得到了部分证明。人性本善，并且能通过伦理教育臻于完美，这是儒学中孟子学派的一个基本原理。这一原理的最清晰表达，也许见之于《三字经》这样的蒙学读物。在背诵“孺子可教”这一原理的过程中，学生们也在完善自己：“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④在正统的儒家经典

① 孙中山 [31]: 345。

② T'ang 1936: 168.

③ 孙中山 [31]: 345。

④ 《三字经》1964: 2—4。

《大学》里面，自我修养与教化大众的要求被连在一起：“大学者，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①然而，“新民”并不要求被教化者相信那些传授给自己的所有东西。对于儒学来说，重要的是仪式实践，而不是伪称的信仰。就“明德”这一目的而言，这已经足够了，没有必要强求每个人的信仰都一致。^② 19

当革命者考虑革命宣传的时候，他们脑子里想到的并不是“明德”。他们想让每个人都像自己一样“自觉”或清醒。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都这样设想：民族是一张干净的纸，民众的形状和大众信仰的颜色，可能有上千种不同的发展方式，这取决于谁掌握着画笔。戴季陶，国民革命期间最主要的反共产主义理论家，在1925年宣称中国是一张“白纸”；^③“中国确实是一张白纸，”戴季陶说，“把它染成绿色，它就是绿的；把它染成黄色，它就是黄的。”通过推断人民不仅“好”而且干净，将“新民”的伦理规则，转换成了一种独特的颜色来教导群众的政治格言。人民相信什么，最终将取决于革命者、反动派和反革命派为控制画笔而进行的政治斗争的结果。

当戴季陶说中国是一张白纸时，他刚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职位上离开不久，正忙着校对一份新的党刊，以便在他上海家里的办公室出版。^④1925年秋，戴季陶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一职终于由毛泽东接任。他们两人为接近画笔和纸展开了竞争，最终，围绕国民党是否应该把整个民族涂上自己主张的颜色，尤其是应该由哪

① “四书”1973：2。

② Watson 1993：80—103。

③ 戴季陶1925b：23；Sansom 1988：170。

④ 《独立周刊》。见本书第六章。

个派别来掌握画笔这个问题，他们打起了笔仗。两个人都有很好的理由相信中国是一张白纸，因为孙中山已经成功地为中国第一个党治国家清空了场地，并已开始“感化”和“党化”中国。国民革命时期毛泽东和戴季陶之间的英勇斗争，以及革命后期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更普遍的大规模斗争，正发生于孙中山的先期成就所提供的舞台上。

感化中国与“党化”中国之间的关系很难说得清。作为一种政治风格，这种新的群众教育学的成功之时，不是它已经重塑了中国人的时候，而是它已经确立起来、人们不再怀疑自己需要被重塑的时候，也就是说，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是一张白纸、有待于进行工具主义的重建的时候。孙中山经常提到需要让“整个国家”都皈依这一信念，而且，他的演讲也常常变得生动——借助于“四万万”中国人都觉悟到他的观点、并像觉醒的狮子那样向敌人咆哮这一形象。但即便对于孙中山而言，重要的也是本党能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建立自己的信用，以进行一种正确的唤醒。这是革命修辞中“唤醒”这一比喻的关键功能。^①当人们承认自己需要被唤醒时，其余的东西就会随之而来。也就是说，训导性政治的结果，并不仅仅是民众的觉醒，而是一个训导型国家结构的建立，它与国民的关系，将像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那样，或者如孙中山喜欢比拟的，像帝制时代曾经指导过皇帝的老师一样。^②教育是政治行为的一个目标，同样，它也是一种政治风格，这种风格最初形成于1920年代国民党政权的庇护之下。在建立党治国家、将国家权力的运作集中于中央、最大程度地将国家权力向社会延伸，以及在党内和社会内部严格执行纪律

① 孙中山 [17]: 593—604。

② G. Yu 1966, 126.

等方面，孙中山都是毛泽东的导师。

然而可以说，无论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都不是从外部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被俘虏的民众。艺术家、知识分子、社会组织和御用文人，都长期参与了后来的“党化”，假如没有这些人的合作，文化、社会 and 政府的“党化”将几乎不可能。为了公平地对待那些相关的人，我们可以从别的途径来进行考察。中国的民族主义，从来就不是哪个特殊的政党或哪场特殊的运动的专利，它所表现出来的，远不只是“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工具”。^①伦理、文化和社会运动的平行发展，预示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化及其在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那里的党化。当然，两党都将民族的偶像和仪式加以权威化，并进行了宣传，但尽管如此，他们的权威还是建立在一套符号、概念和理想之上，这些东西已经在民族主义思想内部酝酿了很长时间。正是无党派知识分子，首先设想纪律可能成为自由的条件，满怀热情地声辩说被唤醒的自我只是国家的一个方面，并预言说自我的解放有待于民族的解放。不久之后，政治党派就将这些伦理和文学方

21

面的洞见，转变成了党派的政治优势。

卡罗尔·格拉克 (Carol Gluck)，一位研究日本民族主义的历史学家，曾经建议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多重性的并且往往是相互冲突的渠道进行整体把握，以“避免将意识形态的任何一种特定渊源当做它的全部语言”。当然，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多重论争渠道，产生了嘈杂的环境，为政治活动家提供了种种符号和主流叙事，他们可以借此提出自己的独特主张，即他们代表着民族。这一广阔的领域，也为大众接受政党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空间。中华民国时期，正如明治时期的日本一样，无党派的思想 and 价值渊源，为政党的思想和价

① Bhaba 1990,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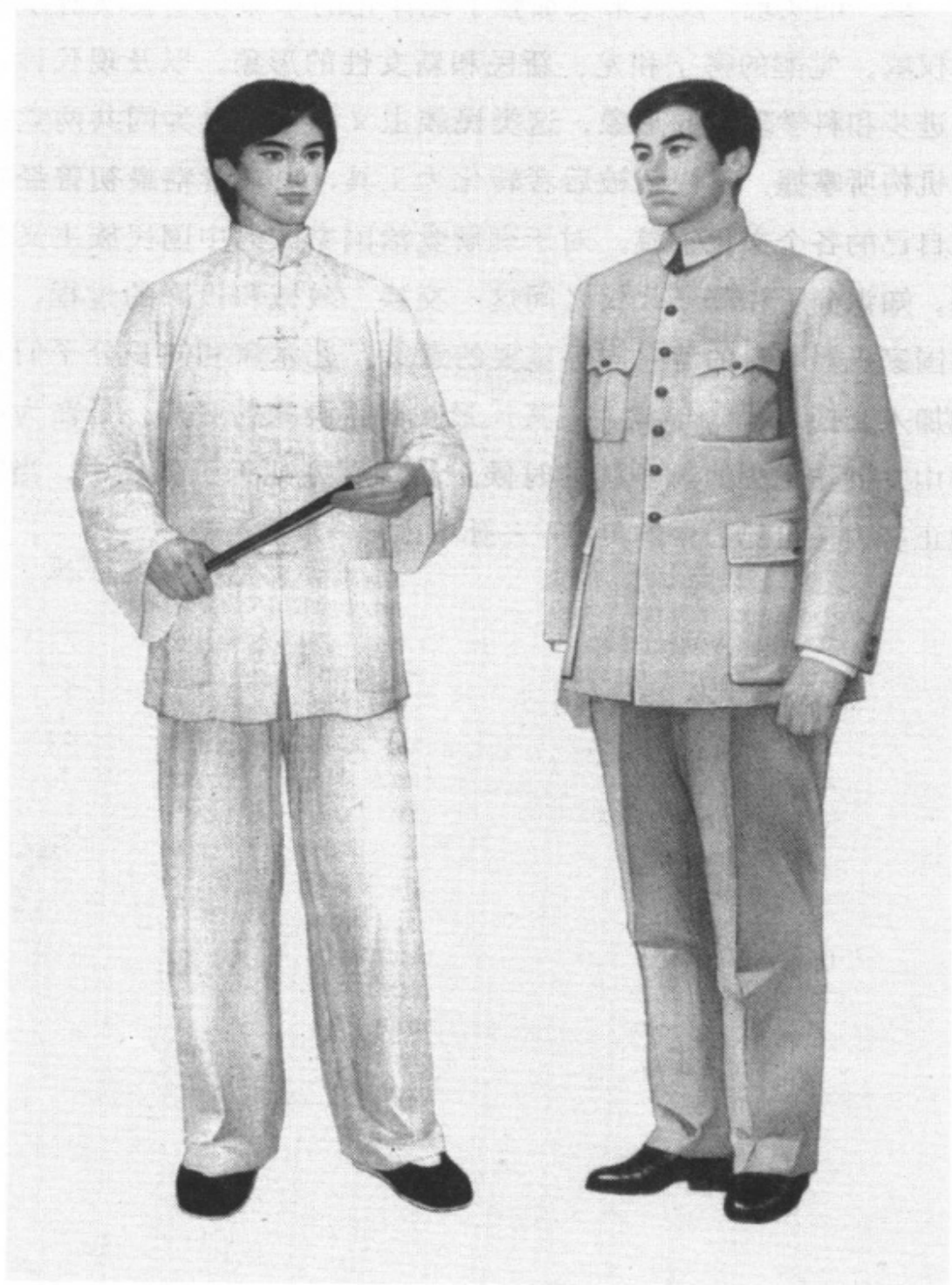
值提供了一个更加宽阔的语境，这有时加强了正统的思想和价值，有时又与之发生冲突。^①就算聚焦于某一特定意识形态的渊源，例如国民运动，格拉克的建议也很明智。国民党远非铁板一块。它在军队、政府和各级党组织中的各种宣传机构，既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组织在说话，也是在为各自说话；它们之间的种种差异，常常反映了更广阔的民族主义范围内部的各种分歧。从横切面探究中国民族主义这一更加广阔的领域，以显示置于党统内部才能被理解的种种联系，最能揭示国民党内部新正统的建立。我认为，这些联系中最为重要的主题，就是唤起民族统一。

不言而喻，民族统一的理想远远超出了国民党的政治运动。为了探究这一理想内部的不同形态，并解释为何一些形态会比其他形态显得更权威，我们需要沿着革命者自己走过的路，建立语言世界与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1919年，毛泽东这样写道：“自思想，文学，以至政治，宗教，艺术，皆有一改旧观之概。”尽管改革家们的具体努力很不一样，但写作者和行动家们都致力于创造一个统一的知识领域，它将带来共同的观念和价值。他们试图创造一种能将民族统一起来的共同的语言和文化，并将之大众化。并且，他们努力寻找一个共同的目标，围绕这一目标，他们将能够在统一的政治运动中把民众唤醒。他们感到，如果没有纪律化的目的感，自己的全部努力都必将失败。这自然是毛泽东在“文革”高潮时的感觉。“推原新学之所以没有风气，”他写道，“全在新学不曾有确立的中心思想。”^②对“中心思想”的要求，与国民革命中的政治统一非常相似。

① Gluck 1985: 11, 15.

② 毛泽东 [3]: 371—372。

统一的实现，反过来又加强了纪律化的革命政党在唤醒事业上的权威。觉醒的狮子和龙、新民和新女性的形象，以及现代性、历史进步和科学理性的形象，这类民族主义偶像一旦为国共两党的宣传机构所掌握，很快就被后者转化为工具，用来管辖最初曾经哺育过自己的各个文化领域。对于理解党治国家式的中国民族主义的根基，知识分子和革命政权之间这一交换、缴械和投降的过程，具有与国家机器本身的建立同等重要的意义。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们热情地加入交换过程。毕竟，高其风最初获得画家的名声，是在为广州中山堂创作觉醒的狮子画的时候。吕彦直则死于工作之中，当时，他正努力使自己心中的英雄——孙中山——永垂不朽。



3. 学生装和中山装,1927年。(王辅世主编,1986:第760—761款)

第一章 唤醒与被唤醒

从来的衣，一律是旧式的“大襟装”，从兴新学起，开始有破胸新装，到了民国七八年，新装渐渐多起来。但直到去年，拿全县人口说，还是旧装的多，新装的少。近两年来，尤其是土地革命胜利后，新装日渐加多，特别以青年为普遍。……赤卫队和苏维埃办事人，不但一概是新式衣和新式鞋，他们还要佩个电筒，系条围巾，有些还要穿薄毛羽的夹褂子裤。

毛泽东，1930^①

20 世纪 20 年代的国民革命带来了许多后果，其中之一，便是时尚的革命。20 年代末，遍及全国的人都穿上了“中山装”，这种服装的风格不同于后来的毛式上衣，其特征是样式严肃，两边有显眼的口袋，一排突出的纽扣对中而下。这种新式服装的传播，基本与中国的军事和政治统一悄然相伴。尽管如此，一种新的公民制服的采用，还是标志着一种不同的、但并非不那么重要的统一；围绕着自己选择的种种符号，一个新的全国性社会形成了。就此而言，中山装

^① 毛泽东 [13]: 94。

这个符号，恰好是新生国民党政权的折射。中华民族正奋步赶上其政治领袖所敦促的觉醒，并在公共性的表演中走向自我意识的觉醒。

24 围绕着民国服饰风格的文化统一，与国民党政权下的政治统一有着明确的对应关系，这种对应揭示了大众口味的要求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时尚造就了中山装这一党的徽标，并在国家没有直接干预的情况下，将之转化为民族的象征。其中也有人试图按照国民运动的意识形态和符号，将新的时尚纳入法规条文中。一个热心的公民向南京的中央政府递交了请愿书，建议“所有的男人都应该穿三个口袋、五粒纽扣的制服，三个口袋代表三民主义，五粒纽扣代表五权宪法”。^①这份请愿书被驳回。中山装的纽扣和口袋数量，根本不可能作为衡量意识形态认同的精确标准。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同样提倡中山装，不管在哪一个阵营里，选择纽扣和口袋这个问题上的限度，都是判断政治正确的清晰标准。

不管怎么说，确实无需以严格的法规条文来规范服饰，因为衣服的吸引力和权威并不基于法律，而是基于榜样和时尚市场。国家只起着一种非直接的作用。国民运动中“先觉”的干部们在日常事务中推广了中山装，并赋予它一种权威，这种权威很容易传递给随后觉醒过来的所有人。从广义上说，时尚的流行，标志着一个社会正在经历一个进步时代。一个人穿着中山装，表明他正在跟上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时代，这足以保证，在一个社会对自己的民族身份的觉醒过程中，大众时尚也有一席之地。

不过，那位过于热心的公民的请愿，也提醒我们去注意如下二者之间的区别：一是“纯真的、大众的民族主义热情”，一是“系统的、甚至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灌输”。这种区别或者

^① Ayscough 1938: 127.

是批评性的，或者是分析性的。正如安德森（B. Anderson）所说的，这种区别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普遍特征。^①中山装轻而易举地达成了从马基雅维利式的民族主义到大众民族主义的转换。作为民族觉醒的象征，它将个人的选择与社会的趋向连在一起，并将民族的命运与国民运动的命运结合在一起。但它是怎样实现这一点的？大众对民族主义和现代性的觉悟，以及一个特定党派民族主义运动对民众的系统唤醒，对这二者间的联系，我们如何去把握其特征呢？

唤醒与政治

时尚（任何时尚）的到来表明，唤醒与被唤醒之间的区别，可能并没有表面上呈现的那么清楚。区分唤醒和被唤醒需要谨慎行事，因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是时尚的主体，而且，党派的意识形态，也在更广泛的民族主义舞台上与别的意识形态发生竞争。现代中国民族主义产生后所带来的觉醒，不仅指向民族，也指向启蒙、进步和科学等普遍理想，指向个人独立和“自我实现”，还指向民众团体在政治中应该有一席之地的吁求，以及政治统一和主权独立的要求。民国时期时尚的兴起，标志着一种总体上的进步感：时尚是一种媒介，通过它，人们能跟上自己所选择的民众团体，随着 25 时间的流逝而走到一起。伴随着时尚的传播，其他进步的迹象也出现于文学和艺术、新史学，以及公共博物馆和纪念物当中。通过一个社会理想，时尚把个人和公众连在一起。并且，这个社会不仅是想像中的，事实上，人们密切地注视事情的进展，用多少有点品位的方式来说，它通过重新确定自己的偏好而不断更新自己。

① B. Anderson 1991: 114.

与此同时，政党政治也具有自觉的时尚意识。孙中山并没有自己去发明一种后来以其名字命名的服装。他采用了一种既有的服装风格，这种风格已经流行于北京和东京的学生们之间，通常被称为“学生装”，包括几种不同的男装和女装款式。孙中山用自己的名字为其中一种款式命名，于是，这种款式开始贴上国民党人的标签。后来，共产党人采用同样的方法，用一种更便宜的衣料，开始了一种新的风格，这种风格最终定型为毛式上衣，进入了世界市场。在这两个事例中，党派运动都采用了已有的款式，给它们颁发自己独有的“出生证”，并发动了一场时尚革命。而且，在这两个事例中，新的时尚所能植根于其上的基础，已经随着进步观念和大众社会的新形式而变得松动。任何欲将已被接受的风格法定化的要求，都与这一点背道而驰。政权对服饰的需要，一点也不亚于服饰对政权的需要；并且，如果某个特定的政权限制进步的步伐，只会使自己落伍。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产生形式，呈现出典型的混血儿特征，即把进步、文明等普遍要求，与对民族的独特要求混合在一起。^①几乎所有边界都被搅混：民族观念被套入一系列族群观念中，其中一些支持普遍的科学，其余则与世界主义理想重叠，它们都通过这一点或那一点进入国民党人的实践之中。非常有特色的是，中国的改革家和革命者们都是兼职的政治活动家。他们花费了许多精力，来学习和练习医疗、农业和社会科学知识，创造新的历史，创作新文学，写出一种新的哲学，以及在报章杂志这一新的领域吸引读者。其他人拆除了城市的城墙，以便为修筑环形马路腾出空间，并修建了公共厕所和污水排放系统，建立了医院和图书馆，开办了公共学校和博物馆，出版了期刊和报纸，组建了读书群体、反缠足会、妇女合

^① O'Brien 1988: 48 ff. .

作团体和其他群众组织。中国的“觉醒”促进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它标志着一种新的共同意识的出现，在这种共同意识之下，人们以相似的方式来理解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民族觉醒的前进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专职的政党革命家们不得不热情工作，以确保自己不落后于时代步伐。 26

实际上，国民革命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还进行着另一种同样重要的政治竞争，那就是制作和占有中华民族的新偶像。在这方面，孙中山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他以偶像制作者起家，逝世时成了一个偶像。当孙中山在1895年发动第一次起义的时候，人们都认为，他就算没有发疯，至少也是个无知的狂热者；但当他在30年后逝世时，他已经被视为有远见的民族主义领袖，受到了广泛的纪念。当然，这一转变来之不易。1924年，路透社新闻部发布了一则错误消息，说孙中山逝世了。那时，整个华北地区都松了一口气，感到国家最终有望实现政治统一了。^① 为了证明那则报道严重失实，孙中山面有喜色地在广州街头散步。然而即使在广州，他的地位也不怎么巩固。广东省的行政正处于地方军阀的攻击之中，而广州市政府正面临着店主和街头小贩的罢工和暴乱，他们被孙中山实施的过高税率激怒了。此外，国民党的信徒也对他的领导权心存怀疑。华北的一些国民党元老仍然对孙中山感到愤怒，因为他与中国共产党的成员达成了协定，而且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了密切联系。孙中山选择了一些干部进入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此，上海的一些国民党员提出了质疑。^② 孙中山试图避开党内的冲突和广东地

① “社评”1924。

② 1924年8月，上海的同志告诉孙中山，他们不信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李云汉1996，I：322—323。

区越积越深的问题，于是在1924年冬启程赴北京，这次致命的旅行，将死后的他转化为民族统一的象征。

孙中山临终前的几个月里发生了许多事情，这些事情提升了他在全国性形象的地位。在1924—1925年间的那个冬天，他的旅行、死亡和葬礼，构成了对共和圣殿的一次朝圣。从广东这一偏僻的南方根据地出发奔赴上海这个商业大都会时，孙中山发表了公开宣言，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外国在华特权。他这一响亮的呼声，以大字标题见之于全国各大报纸。他从上海继续前行，取道日本前往首都北京。在北京，他参加了为恢复宪政而举行的谈判，但谈判未能取得成功。最终，他被国民党政权安葬于中华民国最初的首都——南京，这个政权正将自己的权威逐步推向全国。用当时人的话来说，这一全国和国际性的朝圣，“将使他走出省级政治空间”，并将他变成“民族英雄”。^①到他逝世时为止，孙中山已经无数次提醒来自旧帝国许多不同地区的人们：他们全都被认为是爱国者，而孙中山自己尽管有不少过错，还是无私地将生命献给了唤醒他们的工作。简言之，孙中山给人们留下的惟一遗产，是一个关于民族统一、团结和独立的脆弱的梦，当人们去思考这个梦时，他们之间的众多差异就可以被搁置于一边。^②孙中山的梦也就是他们的梦。

在他逝世于北京和1929年奉安于南京这段时间里，孙中山的名声和地位进一步上升。《北京新闻》(*Peking Leader*)杂志注意到，在这个阶段，

孙中山从一个十足的、坚决的、又容易出错的革命领袖，

① Foster 1928: 68.

② Wilbur 1976: 结论。

变成了全知的革命创始人和革命的精神指南，谁都要向他鞠躬，都应该从他那里寻求指导和启示……对于中国来说，能获得这样一个符号，令所有的眼睛都能转向它，就像被改造过的孙中山那样，这一成就非同小可。几个世纪以来，君主这一显著的符号，一直是政府行为和既有的民族统一感的焦点。随着共和政体的建立，这个符号消失了，却没有别的东西来代替它……逝世后的四年间，孙中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缺。^①

在这4年间，孙中山的肖像被铸上了每一块流通于全国的银元、香烟盒以及手表壳的背面。他的画像被张贴在墙上和教室里，每个星期一的上午，学生和政府雇员都向它表达自己的敬意。画像师用所能见到的最好框架来制作他的肖像，并将它悬挂在商店的橱窗上。许多街道，以及无数公共纪念场馆，都用孙中山的话来装饰，标准的中国台历中，每一页上面都有一句他的格言。^②

显然，其中一些是由国家组织的。到1930年代中期，十几年前首先出现于党政机关的独特的纪念仪式，已经扩展到了婚礼及市民生活的其他场合。1935年4月3日，上海市长在上海市政厅主持了一次集体婚礼仪式：

新娘们从房子西边，新郎们从东边，鱼贯走过环形马路，登上白色石阶，进入大厅。厅内有一舞台，饰以红、黄诸色，并置一对大红烛，上刻“百年好合”字样。证婚人就等在那儿。每次两位新娘和新郎，同时分从东西方登上舞台，站在一座孙中山塑像前面，塑像上交叉悬挂国民党党旗和国民政府旗

① Bland 1932: 57—58.

② Foster 1928: 66—67.

帜。司仪提示他们鞠躬：向旗帜和中山像三鞠躬，新娘新郎相互二鞠躬，然后向证婚人一鞠躬。^①

这在孙中山活着时是没有先例的。实际上，对孙中山的公开崇拜，须等到国民政府建立之后。

与建筑家吕彦直和狮子画的作者高其风一样（他们设计并装饰了宏伟的广州中山堂），孙中山也是一位艺术家，只不过其方式有点独特。孙中山的艺术，在于设计了一套“唤醒”民族的技术和符号，并将之付诸实践。1925年3月，孙中山临逝世前回顾自己的革命生涯时，这样反思说：

文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②

40年来，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在职还是去职，以真名出现还是以假名出现，被捕还是在逃，资金充裕还是破产负债，孙中山都竭尽其力去“唤醒”中国。历经艰难挫折，他仍旧坚信，中国不仅可以被唤醒，而且，当它最终觉醒过来的时候，它的咆哮将让敌人从心底感到害怕。

排着长队瞻仰中山堂的游人大都没有注意到，高其风那幅醒狮画，包含着一种将政治和艺术融合起来的技术。这正符合孙中山的意图。中国的觉醒这一梦想，既需要想像，也需要技术，而最好的技术，是在不经意间便传播开来的。国民党人有必要让旁观者和听众相信，民族既不是一个梦想，也不是一个谣言，而是真实地存在于那里，存在于过去的历史和迫近的未来中，正有待于一场历史性的解放行动来释放它。在他们眼里，中国早在成为近代民族国家之

① Ayscough 1938: 65.

② Foster 1928: 217.

前，就有着潜在的“民族精神”。孙中山简洁明了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将梦想这个隐喻颠倒过来，向人们表明，是中华民族自身，而不是他自己在做梦。“从前失去民族精神，好比是睡着觉，”他喜欢这样说，“现在要恢复民族精神，就要唤醒起来。醒了之后，才可以恢复民族主义。”中华民族陷于沉睡中，使整个国家变得软弱无力；因此，民族的复兴取决于民族主义的“再生”。“到民族主义恢复了之后，我们便可以进一步去研究怎么样才可以恢复我们民族的地位。”^①孙中山和他的国民党，一面坚称自己纯粹是在唤醒中国这头巨兽，一面着手制造自己梦想中的民族。

孙中山得以成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不仅仅因为他的技术，还因为他那敏锐的眼光，以及他对自己所坚持的东西的执著。他给人一种鲜明的印象，即他能洞察中国人的心灵，能描绘出一头狮子的内部形状，并能通过自己的感化力量，引导这头狮子进入一种清醒的状态。民国前期的国民运动中，自然不乏更有天赋的作家，但几乎没有谁能在信仰方面赶得上孙中山。比如叶楚伦，1923年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时，为国民党的《民国日报》撰写了许多尖锐的社论，但他的社论常常掺杂一些反讽，减弱了文章的抨击力度，这与孙中山迥异。在刊发于1923年11月6日的社论《中国睡狮》一文中，叶楚伦回顾了这头“睡狮”如何在共和革命中苏醒过来：29

当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时，整个国家都发出了欣喜的呼叫；它的精神臻于最高状态。于是，它完全像一头觉醒了狮子。

但这头狮子并未起身多久：

后来临时政府解散，国家政权由革命党人之手传给了旧官

^① 孙中山 [31]：124。

僚。因此，仿佛睡狮只是打了一个哈欠，稍微伸伸手脚，复又归于沉睡。

这头狮子“复归沉睡”后十余年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使叶楚伧怀疑，这头沉睡中的巨兽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狮子，抑或是更加胆小的别的什么动物：

它真的在沉睡么？这只熟睡的动物真的是一头狮子么？从那时起……这头睡狮就变成了一只睡鼠。^①

叶楚伧也许是一位很好的辩论家，但他几乎不具备孙中山那种对革命的忠诚。^②实际上，作为一个宣传部长，叶楚伧却不怎么相信言辞的力量，时而表露出对领袖的不尽忠诚。1923年11月，他写了一篇社论，攻击孙中山关于解散国民运动、“化兵为农”的高调主张，说“空言无济于事”。叶楚伧继续说道：

“裁军”当然是彻底的主张。当全人类都觉醒过来后，那一天可能真的会到来，那一天确实必须到来，但现在它却是不可能的……孙逸仙建议“化兵为农”，但为何不能有“工一兵”，并将全国所有的工人都转化为士兵？^③

孙中山从来也不会承认自己的话是“空言”，也不认为自己应该等“全人类都觉醒”之后再开始行动。他很少怀疑自己。叶楚伧认为自己看到了一只老鼠，而在同一地方，孙中山却梦见自己看到了一头狮子。他免去了叶楚伧的宣传部长职务，表明他不满意于叶的鼠目寸

①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1月6日。

② 对“觉醒的龙”这一主题进行批评性反思的党员，叶楚伧并非惟一一人。1920年，国民党右翼宣传家朱执信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睡的人醒了》，文中认为：“民族和个人应该互爱互助，而不是侵略性的，导致恐惧。他们应该是人，而不是狮子。”吕芳上1992：10。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1月6日。亦见蔡和森1922 f。

光。^①

孙中山坚信中华民族是一头非常强大、非常高贵的狮子，这使他在国民运动中具有优势。实际上，他那更加忠诚的宣传者们认为，在中国狮和中国鼠之间，只有孙中山具备梦想的能力。这鲜明地表现在一幅既非狮子也非老鼠，而是一对同源的老虎和狗的漫画上。这幅漫画刊载于1912年的一份杂志上，著名的狮子画家高其风是该杂志的撰稿人之一。克劳泽（Ralph Croizier）为我们描绘了这幅漫画的内容：30

第一联（“过去”），孙中山穿着艺术家的服装，正在测度一幅气势恢宏的老虎画，它即将出现于一块空白画布上。第二联（“现在”），袁世凯穿着半现代化的服装，取代了艺术家的位置，边上是一群忧心忡忡的旁观者。第三联（“将来”），复制出来的画中不是一头老虎，而是一条难看的狗，旁观者和艺术家都惊呆了。^②

在这里，为报纸撰稿的艺术家，清楚地认识到了某种类同于孙中山的精神，并同情他为中华民族的奋斗后面蕴藏着的艺术和想像力。同时，这幅漫画对政治人物的艺术力量作出了评判：其讽刺坦率地指向袁世凯，因为他缺乏眼光，这种贫乏反过来又确认了先前的见解的价值及其创造者的伟大。在这里，孙中山被转化为中华民族的一个偶像，因为，似乎只有他一个人能画出老虎。

这位漫画家也是一个政治艺术家，至少，他能将孙中山画成民族的领袖。但是，政治艺术家们并不推介自己的技艺。他们更希望人们认出自己的作品，而非一笔一画的痕迹；更希望人们识别出自己制作的形象，而非用于制作这些形象的专业技巧。政治艺术家就

① 关于宣传部人事的任命及上海与广州党的总部之间的仇隙（孙中山与叶楚伦之间的紧张关系多由此而来），见第六章。

② Croizier 1988, 70—71.

像国家一样，应该是不为人们所见的。当人们看不见国家的存在时，它便臻于完美，正如一句古谚所说：“天下至平者无天下，国至治者无国。”^①然而，在国民政府臻于完美之前，它还需要通过一套把国民党与政权连接起来的意识形态，以及将政权与民族连接起来的肖像画法，使它自己及其公民都看不见它的存在。应该把中央政府看做是新的中国，而中国国民党就是政府。这就是艺术家们的任务：把中国描绘成仿佛是在国民党训示下而觉醒过来的样子。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孙中山有许多竞争对手，“觉醒”这个词也不是国民党的专利。各个利益集团、研习会和政治派系，信仰各异，却都在自己刊物的名字上使用“觉醒”一词。在许多敌视国民运动的场合中，他们也使用狮子和老虎的形象。中国青年党于1924年10月创办了《醒狮》杂志，国民革命期间，这份杂志成了攻击国共两党的工具。通过《中国青年》这份标题更为直观的杂志，革命派作出了回应。^②类似地，1925年，章士钊创办了《甲寅周刊》，代表着保守的北方段祺瑞政府，后者当时正与南方的国民党人处于敌对状态。^③同样，狮子也象征着国民运动内部对领导权的争夺。秋瑾，革命运动前期的一名杰出成员，将醒狮变成了妇女运动的工具。1906年，她创办了一份新女性的报纸，仿效当时的做法，痛苦地抱怨这个国家所陷入的“黑暗”岁月，以及中国人民的“麻木不仁”。她在《中国女报》上倡议，将“黎明的光亮”洒向沉睡中的女性，用“第一声晨钟”来唤醒她们。妇女一旦被唤醒，就能作为革

① 谭嗣同 1984: 217。

② 《醒狮》由曾琦及代表国家主义运动的青年党其他领导人编辑。《中国青年》发刊于1923年10月，作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先后由邓中夏、萧楚女和恽代英编辑。张静庐 1954—1956, I: 63。

③ T. Chow 1960: 283—284.

命前锋中的“领导者、醒狮”，为自己的公正地位而战斗。^①《中国女报》未出几期即告夭折，但秋瑾的个人榜样，却激发了妇女的“觉醒”。次年7月，她因革命活动而被杀害。

1920年，天津妇女爱国同志会创办了一份新的杂志，即《醒世周刊》。几年之内，各种各样的晨钟、晨警、鸣鸡、晨学会，便竞相出现于各大都市日报的文学副刊上。^②一些刊物致力于科学。1920年，上海同济医学专科学校的学生创办了《自觉月刊》，目的在于促进科学研究精神；北京农学专科学校的教职员创办了《醒农》学刊，以“唤起农民”，“改良农业”。其他刊物则致力于社会运动：1923年，广东平原县农民合作社创办了一份刊物，指导它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农民觉醒模式，但它也以“醒农”这一醒目的名字刊行于世。^③在国民党内部，“觉醒”这个术语的使用，也成了大众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争斗的突出特征。国民党激进派与上海的党刊《觉悟》关系密切，为了与之竞争，广州非常国会的立宪派律师和国会议员，创办了《民觉》杂志。^④年轻的共产党人抱着与国民党人相同的动机，在《觉悟》上大量撰文，使之成为最具影响力的五四期刊之一。年轻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周恩来，由于连续为两份不同的“觉醒”刊物撰稿而声名大噪：一份是1920年在天津创刊的《觉悟》，另一份是1923年出现的《觉邮》。^⑤只要殖民作家和艺

① Ayscough 1938: 164—165.

② 1923年，两个觉醒团体——鸡鸣社和未明社——在北京《国风日报》的同一版副刊上争夺阵地。T. Chow 1963: 125—126.

③ T. Chow 1963: 70, 81, 123.

④ 见本书第五章。

⑤ T. Chow 1963: 74—75, 127—128. 有必要把天津的《觉悟》与作为国民党机关刊物的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区别开来，后者更具影响力。

术家们仍旧将英国画成一头醒狮，向中国的“布尔什维克宣传”咆哮，国民党人想像中的许多觉醒了的动物，就仍将拥有某种共同的东西。被不列颠雄狮的利爪所钳制的民族别无选择，惟有醒悟过来并进行反击。^①

32 当孙中山谈到唤醒民族，秋瑾说到唤起女性时，别的人则建议唤起科学和民主、人道主义伦理和文学、世界主义和阶级自觉，他们欢庆青年、工人和农民的觉醒。对许多国民党人而言，中国的觉醒总的来说太过迅速、太过宽泛。为了确保自己主张的那种觉醒领先于所有其他觉醒，他们有很多事情要做。最重要的是，为了领导民族的觉醒，高其风的狮子画应该委婉而有力地表现出孙中山和国民运动的卓越主张；同时，狮子的咆哮应该盖过国民运动的对手和国民运动内部对领导集团的批评，使他们都保持缄默。孙中山及其后继者为中国的解放设定了一个最重要的条件，那就是，党和人民都应该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组织起来，并厉行纪律。醒狮在广州中山堂的升起，极好地象征着这一决心。

在全世界华人社会的印象中，孙中山是一个民族领袖，而不是一个党派政治运动的领导人。实际上，孙中山关于中国的梦想中并没有为政治分权留下位置。正如欧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观察到的，新的中国需要一个新的政权，因为在民族主义者的想像中，民族和国家总是互为指归的。^②然而，中国的政权不可能存在政党型政客。理想的政治活动家根本不是政客，而是政治家，他总是使政

① 英国人用狮子来表现自己在中国的独特作用。1925年6月27日，《字林西报》登载了一幅漫画，画中一头凶猛的英国狮子，用利爪钳制着一叠“布尔什维克主义宣传”，邪恶的东方的纤细形象，则处于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那警惕的目光的注视之中。

② Gellner 1983: 6.

治远离私利和宗派代表，把民族提升至最高的政治价值，完全为人民的福祉而工作。国民党并不认为自己是民族国家结构内部的一个党派组织，而是吸纳了“公共利益”的全民组织。^①孙中山关注惟利是图的军阀，但从不卷入他们那些臭名昭著的同盟；他与国会议员和被选出来的代表合作，但他自己从不赞成公开选举；他欢迎共产国际和莫斯科政府的代表，但从未说过自己是一名国际社会主义者。孙中山身上确有一些军阀、议员和社会主义者的成分，但是，正如中国自身一样，他身上既体现了所有这些东西，又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种东西。当他逝世的时候，一个统一的中国的梦想，以及一个卓越的政治家的理想，共同铸就了“孙中山”这个名字。在这一点上，他取得了同时代人难以比拟的成就：他的政治生涯帮助确立了政治的含义，但却从未受到与政治联系在一起的耻辱的玷污。

国民党人成功地将孙中山与中华民族的认同连在一起，为了解释这一成功，我们又面对着一个艰巨的任务，即把国民运动中“大众民族主义热情”的种种标记与国民党意识形态的系统灌输区别开来。^② 33
醒狮既是这一认同的效果，又是其中的原因。事实上，国民党在1925年试图通过一场全国范围内的群众宣传运动来充分利用孙中山的逝世，但这场运动的效果非常糟糕，除了嘲笑，国民党什么也没有得到。^③孙中山在民众中的地位，并不是大众热情的单方面成果，也不仅仅是“国民党政客和知识分子的机敏和能量”的产物，后者“把对孙中山的崇拜强加给了”民众。它是两方面相结合的产物。^④正如这

① 蒋介石 [1943] 1947: 114.

② B. Anderson 1991: 114.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8日、24日。

④ Bland 1932: 57—58.

一观点所揭示的，国民党的宣传家们确实热情、能干，但国民党只是公共舞台的一部分，如果孙中山没有在这一舞台上着力营造国民党并赋予其意义的话，这些人的努力也将无济于事。实际上，当国民党宣称孙中山这一名字为自己独占时，它正承受着一种风险，即泄露自己的党派特性。人们将荣誉倾注在孙中山身上，因为他们能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他，而他们理解孙中山的方式，作为一个政党的国民党却无法仿效。

出于同样的原因，关于梦想家孙中山的故事，以及关于中国历史的梦想，二者之间很难轻易分割开来。孙中山的生平传记，已经变成与中华民族历史类似的东西，并成为后者的一部分。1866年11月12日，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一个农民家庭，家里很穷，无力为他提供接受传统教育的机会，但他家与海外华人圈有着充分的联系，这使他能到夏威夷接受近代学校教育，后来又在香港学医。在那个世纪之交，孙中山的普通人背景、他对儒家经典和古典文学的有限接触、他的海外关系以及他对西学的熟悉，都构成了他晋身仕途、从事传统政治活动的障碍。但到他1925年逝世时，所有这些因素都变成了他的优势。基于西学这一新的基础，精英文化中的科学话语已经取代了对儒家经典文本的注释，哺育了孙中山的普通大众也认识到，作为一个民主之邦的平等国民，自己拥有国家的主权。孙中山自己并没有改变多少，但他周围的世界却改变了。新的价值观含蓄地表现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直接见之于孙中山自己的话语里。但是，小说家和讲故事的人，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建筑家和工程师，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新闻工作者，音乐家和时尚设计师，都盖过了政治活动家，他们中所有的人，都努力将中华民族置于一种新的常识的中心，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种常识逐渐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去。中国人民自己创造了民族觉醒的种种

象征，这种觉醒说服了那些爱国、有远见的普通人接受一个民族的偶像。反过来，这些象征又促使中国人民被自己的偶像所唤醒。 34

唤醒与训政

在学术意义上，“唤醒”这一概念，很难与“被别人唤醒”区别开来。徒弟总是由师父唤醒，学生总是由老师唤醒。在禅宗里，“悟”被认为是“通向众妙之门”，而“悟”的实现通常是：突然间觉悟到光明（即顿悟。——译者），或是由师傅“当头棒喝”。^①这些伦理和宗教主题重复出现于近代民族主义者的自传中，塑造出了导师和徒弟关系的特征。康有为在其自传中写道，他跟随广东学者朱次琦学习的经历有如“盲人见光”。随后，梁启超这样回忆自己跟随康有为学习的情景：老师的话非常清晰，好似“当头棒喝”。^②后来几十年里，这个主题成了新文学读者们的保留词汇，用以描述自己在激进的新闻家催促下所经历的觉醒。《新青年》的一位老订户写下了自己最初阅读这份刊物时的震惊：

今春初读贵刊，犹如迎头一棒，顿觉青年之价值……鄙人现虽非贵刊所述之新青年，然确信可将头脑中所积以往遗下之全部旧思想汰去。^③

20 世纪的作家们在引进青年、妇女、阶级、民族这些新的群体概念时，从未远离“过去遗下之全部旧思想”，尽管他们宣称自己与之没

① Peter Gregory 将“知”一词翻译为 awareness。Gregory 1985: 29—69.

② 康有为 1967: 31; 梁启超 [1902] 1967, 1977.

③ Ma 1974: 67; Dirlik 1989: 84.

有任何关系。^①他们从伦理中推导出参与社会、政治活动的冲动，并在伦理上面临着行动策略的选择，后者被有效地限制在个体和群体的种种觉醒这一范围内。20 世纪中国那些被唤醒的公民继承了一笔文学遗产，它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活力，迫使被唤醒的自我承认师傅对自己的恩惠，并承认自己承担着“唤醒”世界这一职责。

在首批儒家经典关于“君子”的理想中，就已经设定了唤醒他人这一道德冲动。君子修炼个人品德，在于为齐家、治国提供范式。^②18 世纪末的汉学、宋学之争，重新为儒家伦理注入了活力，这场争论在部分程度上由综合性的汉—宋学派解决了；今古文经学的激烈论争导致了儒家世界秩序的终结，汉宋之争也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③晚近儒学内部的分歧，表现在一种超越性的道德—政治秩序内部侧重点的不同。也就是说，这些分歧由一个共同的问题引起，即为个人品德建立一个伦理基础；这些分歧又都围绕着一个共同的信念，即诚信的自我及其道德社会；并且，这些分歧的旨趣都一样，即在道德完善、社会组织和国家治理之间寻求一种适当的关系。^④

清朝统治下的最后一个世纪，在儒家思想发展的同时，改革家和革命者们也倾向于自认为已经觉醒，并设想以唤醒群众的方式，来从事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⑤ 康有为对儒家思想作了许多革新，但仍然认可孟子的如下教条：人群中的先觉者因为其觉醒，便

① 见本书第二章。那些觉悟到阶级和民族这一新的道德社会的人，其想像中依然保留着旧的宗教术语学和鬼神学的影响。Hsia 1968: 23—24.

② Wakeman 1973: 110—112.

③ H. Chang 1987: 18—20, 1971.

④ H. Chang 1987: 10—20.

⑤ Zarrow 1990: 第一章。

担负着觉民、救民的重任。^①民国时期的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家们，将所有“旧的”、“封建的”和“儒家的”东西全都弃于一边，但此时他们仍未摆脱上述重任，并且，通过孙中山那几乎与康有为相同的话，这一任务又交给了国民党的宣传家们。^②

类似地，革命者对“践行”的强调，也能在帝国晚期的学术中找到直接的先例。^③根据历史学家张灏的判断，伦理反思当中对实践维度的不断强调，构成了“19世纪与18世纪的儒家思想之间的区别”。^④道德和政治哲学汇集于践行这一主题上。伦理哲学家们强调自知之明和自我修养，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建议人们积极参与道德社会的生活。治国之术虽然与实际事务紧密相连，但在儒家的道德秩序中，却有着基础性的地位。^⑤这种伦理和行动的联姻挽救了儒学，使它在20世纪免于崩溃。在帝制时代的学术中，道德社会被认为是修养的自我的楷模；而在民族主义思想中，民族社会被认为是觉醒了的自我的延伸。自我修养让位于自觉（或者说自我觉醒），培养君子让位于唤醒公民。觉醒了的国民党人，将自己的同胞们引入了一个修饰一新的道德政治剧院，在那里，他们指导后者占据了那些曾经为绅士们所保留的座位。

对国民党来说，践行这一观念包括了军务、宪政和群众组织。践行也意味着通过宣传来唤醒人民。孙中山举出商代幼君太甲的帝

① H. Chang 1987: 54, “四书” 1973: 2。

② 孙中山 [42]: 460—463。

③ 见本书结论。

④ H. Chang 1987: 15.

⑤ H. Chang 1987.

36 师为例，来说明国民党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①帝国和权力在于皇帝，就如共和国的主权在于国民一样。因为主权需要自己的监护者，国民也需要一个政权来保护自己。在其早期革命生涯中，孙中山就策划过武装暴动，同时始终保持着对宪政的强烈兴趣。但孙中山自己也承认，民国成立后，他已经厌倦了战斗和政治活动。到了1924年，它建议将以前对“枪炮”的强调转移到“唤起民心”上来。为此，他很欣赏大众宣传：

就用枪炮和语言文字两种奋斗来讲，从前用枪炮来奋斗的时候最多，用枪炮的力量已经把满清政府铲除了，但是满清政府虽然是已经铲除了十三年，说到革命还没有彻底成功，没有得什么结果，这是因为什么缘故呢？简单的说，就是因为缺乏宣传奋斗的功夫。

孙中山说，一部惨痛的革命历史，证实了一句老话：“攻心为上，攻城为下。”^②他对词语的选择很有启发性。新一轮政治战所要攻破的堡垒，并不是帝国主义者这面大旗。当然，西方列强的好战态度、他们对中国领土的持续侵占、对在华治外法权的坚持，对国民运动而言都是棘手的问题。但即使在1923年冬，当孙中山对帝国主义的敌意升级为公开抨击时，他也保持着克制，未向列强发动任何直接进攻。相反，他所选择的，是去征服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麻木。在国民革命中，孙中山想要进攻的是中国人民的心灵，希望“唤醒”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帝国主义的罪恶。

帝国主义者亲自给孙中山上了第一堂课。在关于“三民主义”的讲演中，他注意到中国的人口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与此同时，

① G. Yu 1966: 126.

② 孙中山 [47]: 701.

他警告人们不要简单地满足于这个数字。首先，他认为中国人种正处于衰弱之中，不久就会被敌手超过，除非国人更多地注意医学和卫生。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中国的种族规模和健康之间、民族的财富和力量之间，都不存在着直接的相互关系。尽管中国人数量庞大，但都“醉生梦死”。^① 只有将中国人民从昏睡中唤醒，中国人种的规模才能转化为优势。于是，为了掌握公共卫生和大众宣传的艺术，孙中山转而学习西方传教士的经验。

在为增进健康而发动公共运动方面，西方传教士是开路先锋。他们最初在小范围内鼓动人们反对缠足，最终发起了20世纪中国的第一次群众运动，其中心便是公共健康问题。1915年，教会的卫生工作者组织了大众教育性质的集会，目标是根除结核病，吸引了很多听众：杭州七千人，长沙一万人，上海大约两万人。^② 在争取别人皈依基督教这一事业上，传教士们也显示了专心致志的投入精神。在关于中国民主问题的一次研习班上，黎安友（Andrew Nathan）指出，传统的教导方法，“在于训练而非动员民众；在于维系而非重建社会”。^③ 这些古老的技术，主要指向作为群体的社会，而非作为个人的集合体的社会。相比之下，传教士则渴望唤醒群体尺度内的个体良知。

推进公共卫生、大众教育和妇女权利的群众运动，与争取别人皈依基督这一使命并没有直接关系。但它们并非全然无关。文明和基督教手拉手地跨越了非洲、印度、澳洲和中国。20世纪初期，对

① 孙中山 [31]: 120。健康是早期中国国民党人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参见 Dikötter 1992, Croizier 1968, 毛泽东 [18]。

② 《中华医学杂志》，1915：340—341。

③ Nathan 1985: 134.

在中国的传教士而言，基督教当然是文明人的宗教。^①但皈依基督教与文明的进步，二者之间只存在着偶然的关系，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能轻而易举地将之区分开来。“大彻大悟”的传教士们跨越大洋来到中国是一个宗教事件。^②中国人的觉醒，则主要是一种世俗的觉醒。在这方面，传教士和民族主义者都在争夺同样的会众，并试图从他们身上获得某种士大夫的工作中所未有过的东西，即个体灵魂的觉醒。

传教士也开创了新闻业。1815年，米怜（William Milne）创办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General Monthly Record*），这是在中国发行的第一份市民刊物。数百种别的刊物接踵而来，一些使用欧洲语言，其他的使用中文。尽管这些传教士的出版物很少赢得皈依基督者，但其中许多都团结了一些积极分子来致力于新闻业本身，尤其是一些刊物认识到，在促进宗教价值之外，报纸杂志在提倡世俗价值方面也很有潜力。梁启超敏锐地观察到，现存的中文报纸，其报道范围局限于政府和商业信息，因而其功效只是帮助人们“入睡”。1895年中国战败于日本之后，梁启超首次创办了一份新式政治刊物，以唤醒民众为直接目的。梁启超的《中外纪闻》似乎达到了期望中的效果——至少它已经将这一理念传播开来，即中国人需要被从沉睡中摇醒。一名订户把《中外纪闻》的出现比做“一枚巨弹炸响，将许多人从梦寐中惊醒”。^③

① 1924年春，长老会派的《海南时事通讯》发表了一则与此相应的轶闻：“据说斯图尔特先生，后来死在非洲，曾经被问过：‘您为何不先教化您的人民，然后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他回答说：‘我们从不把事情做两遍；当我们使他们皈依基督教时，就已经教化他们了。’” *Hainan Newsletter* 1924: 17.

② Heimert 1966.

③ Nathan 1985: 134—144.

假如他们的事业没有在别的方面发生竞争的话，传教士和国民运动相似的抱负原本不至于使他们相互成为对手。国民党人在许多领域目睹了传教士大范围的创新，而他们原本希望自己拥有这些领域：推进公共健康和卫生、倡导语言改革和大众教育、解放妇女、照顾社会弱势群体。传教士们需要更好的城市规划、更可靠的淡水供应、改良过的卫生设施和垃圾处理系统、更多的公共学校，以及近代医院，总之，他们需要一种新的、扩张了的国家职能，这在国民党的意识形态中得到了表达。这些期望召唤着一个民族主义者的国家，它很珍惜自己的自治，并且是如此彻底地理性，以至于很难容忍基督教传教士所擅长的那种“迷信”。因此，尽管民族革命家们所运用的一些观念、许多科学和技术，都是由传教士提供的，但后者也为前者提供了许多早期攻击目标。^①传教士的策略间接地促成了自己的成功。

孙中山自己是一名基督徒，但他的宗教信仰并不是他欣赏外国传教士的根源。他们的基督教性质只是附带性的。孙中山钦佩他们的勇气、意志以及他们在感化工作方面的成功。他大胆地说，传教士的宣传与中国圣人的实践相差不大，孔子“周游列国……宣传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就是近代传教工作或政治宣传的本土前驱。^②当阐述“得其心者得其民，得其民者得其国”这句儒家格言时，他直接向传教士的感化实践表示了敬意。^③正如这句格言所说的，国民革命的目标是“得其国”，但其策略却再也不仅仅是赢得人心的问题。革命的策略是“感化”中国人。感化包含着

① Yip 1980, Lutz 1988.

② 孙中山 [8]: 575, [17]: 594。

③ 孙中山 [46]: 559。

一种心灵的转变。1923年，孙中山说，“我们要根本上改变他（的心灵），便要想法子去感化他。感化就是宣传。”^①

孙中山建议通过宣传来感化民众，这清楚地表明，他很赞赏传教士这一榜样。1923年11月25日，在介绍政治宣传的新计划时，他反思了传教士得以成功地在信众中灌输其思想和信念的原因：

宗教之所以能够感化人的道理，便是在他们有一种主义，令人信仰。普通人如果信仰了主义，便深入刻骨，便能够为主义去死。^②

- 39 在1923年，孙中山的追随者们还不怎么愿意献身于他的主义，因而，将主义“深入刻骨”的前景，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吸引力。但孙中山心中不只装着自己的追随者。他正在考虑按照传教士的模式来感化整个国家。^③这就需要有另外的先例来证明：外来的群众感化模式不仅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容，而且适合于国民党人的革命抱负。于是，孙中山转向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的例子，并加上了儒家的先例作为补充：

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全是由于他们革命党都信道笃，拿主义来感化全国，所以没有打什么仗，便把政府根本改造。从前孔子的晚年，周游列国，他是为什么事呢？完全是宣传他的主义。^④

① 孙中山 [17]：601。

② 同上：594。这是一种普遍的情感。福斯特从一份不知名的1920年代中国基督教刊物中引用了一段话：“耶稣……将传播福音视为自己的乐事。作为他的追随者……我们应该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去推广革命运动的原理。” Foster 1928：76—77。亦见梁启超1953。

③ 当他抵达（自己计算中的）广东省界，孙中山从普遍性的感化理想转向一种自由的形式主义：当皈依者成为全国人口中的绝对多数时，“这将真正标志着吾党的伟大胜利”。孙中山 [46]：563。亦见孙中山 [6]。

④ 孙中山 [8]：575。

孙中山向其追随者建议，只有全体党员都忠实地以他为榜样，国民革命才能达到必需的“感化”率：

一个党员，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能感化一千几百人。此一千几百人，亦努力为吾党主义宣传，再能感化数十万人或数百万人。如此推去，吾党主义自能普遍于全中国人民。^①

实际上，人们已经“自动”觉醒了，尽管不是觉悟到国民党的主义。孙中山谈论党派信仰的感化时，正在计划利用一个更为宏大的感化进程，它由 19 世纪的传教士所发动，又为民族主义运动中孙中山的前辈们所追随。非党派的公民社会的创造，是党派式的民族主义的先声。因此，如果孙中山想“感化”中国，并让后者接受其主义的话，他就必须诉诸于理性、科学和启蒙的普遍原理。

唤醒与启蒙

盖尔纳曾间接提到过“唤醒”一词在现代民族主义的自我投影中的技术功能：“民族主义不是唤醒民族的自觉意识；它凭空创造了民族。”^②民族的谱系建立于一个更加宏大的启蒙事业中，它将民族描绘成一种普遍秩序中的一个隐藏或沉睡着的因素，这种秩序碰巧出现于纯粹是暂时性的民族主义运动之前。启蒙哲学家们从中国士大夫的著作和传统中寻求启示，而 20 世纪中国的政治活动家们却转向欧洲的启蒙运动，从中寻求指导，从而间接地复活了本土伦理的某些成分，他们现在也愿意在国内认真地采纳这些成分。早先一代人曾经为外国的思想寻找过本土的根源，而 20 世纪的民族主义者，

① 孙中山 [46]：559。

② Gellner 1964：169.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却更多地求助于欧美传统而非本土传统，来为自己的发明寻求先例。^①但在伦理和治国方略上，两代人并没有远离自己的历史根源。例如，从“封建”迷信到理性和现代性这一修辞学上的觉醒，是在列宁主义的语言中进行的，但却经由长期以来对封建制特殊主义（feudal particularism）与官僚制理性主义（bureaucratic rationalism）之间的纷争的熟悉，而得到了调和，这种纷争存在于早期国家传统之中。^②

然而，尽管与本土的伦理和政治方略产生了巨大的共鸣，民族觉醒这一观念仍然是舶来之物。据说，拿破仑在读了关于马戛尔尼爵士出使北京宫廷的记叙之后，发出了著名的警告：中国将觉醒过来，并震动整个世界。实际上，他可能是指任何王国或帝国。对于遭到拿破仑军队进攻的各个君主国，以及正处于法国这一新兴民族帝国的殖民统治之下的亚、非、美洲各土著社会来说，沉睡者这一参照物，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代码。一个现存的国家是被视为沉睡还是清醒，最终取决于它抵抗近代征募制军队或者大规模地动员起自己的军队的能力。根本没有希望摆脱这一隐喻的铁爪，就如同无法避免法国或俄国陆军，也无法阻止英国或日本海军的到来那样。

就算一个民族在别的任何方面都被视为“觉醒”者，如果不能保卫自己的主权，那它还是将被划入世界上的沉睡民族之列。因此，在其开创性著作《帝国主义研究》（1902）一书中，霍布森（J. A. Hobson）承认，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文字中，显示了一种“中国人的精神特质”，它使中国人有资格被划入世界上的觉醒民族之列。但他补充说，中国需要从宁静中激奋起来，以面对正迅速逼近的敌

① 关于早期对本土根源的追寻，参见 Wakeman 1973：82—86。

② Min 1989.

人。“除非能将中国从无数个世纪的和平中唤起，并使之转变为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否则，它将无法避开列强的外部压力。”^①像那些面临着民族主义帝国扩张压力的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要么唤起民众进行有效的抵抗，要么经历一种猛烈的觉醒，并导致君主制政体的失败和瓦解。中国将会觉醒，因为欧洲为它提供了觉醒的激励、技术和隐喻。

中国的觉醒并不仅仅指向军事精神。霍布森幼稚地认为中国经历了“无数个世纪的和平”，对此，很少有中国人会表示赞同；并且，一些人特别警觉，生怕唤起叛乱或帝国传统中更为好战的精神。1917年，英国领事拜访了时任南方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请他派兵参加世界大战。孙中山对此感到震惊，坚决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说，请派军队奔赴欧洲，其效果等同于要求“提起尚武精神”，后者在针对欧洲轴心国集团的同时，也可能不利于英国在香港的利益。这从来不是他唤醒这头睡狮的真正意图。^②

孙中山所信奉的更完整的民族觉醒观念，在欧洲有着不同的先例。“是外国人习惯于把中国描绘成一头睡狮。”1923年11月，在一篇典型的无节制的社论中，国民党的宣传部长叶楚伦这样回忆道。关于民族觉醒，叶楚伦的思想比孙中山的思想更加模糊难辨，这是因为叶楚伦一方面认识到了该隐喻的外来根源，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没有抓住中国自身所处形势的复杂性。然而，甚至叶楚伦的冷嘲热讽也不是自己的。他坚持认为：“这不是我的观察，这是大多数外国人的感觉。”^③叶楚伦所指的外国人，总体上没有霍布森那么仁慈，

① Hobson [1902] 1965, 310—311.

② 孙中山 [31]: 95.

③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1月6日。

他们极少承认中国人有什么精神特质，并且，他们谈论睡、梦这些主题时，一点也不谄媚中国。叶楚伦因而有很好的理由持怀疑主义立场。

事实上，睡觉和做梦并不仅仅与和平、安宁有关，它们还与非理性和原始有关。欧洲人宣称自己的思想是理性的、经验性的，有一套概念的边界将理智与梦想分割开来，这种从梦幻到清醒的阶段转化，与一种从非理性到理性的渐进（或历史性的）转变相关，它首先发生在动物和人之间，然后发生在不同人种之间。在早期的启蒙科学中，梦幻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帮助区分了动物和人。布封（Buffon）于是在1812年写道：“我们与野兽之间的惟一差异，就在于我们能够区分梦幻和思想（或真实的感觉）。 ”后来，在先前区分“我们与野兽”之处，19世纪的人种学在不同种族（或者说“人种”）之间划下了一道相似的界限。现在，做梦已不是野兽的标志，而是原始人的标志。德国人类学家阿道夫·巴斯蒂安（Adolf Bastian）这样记录他所研究的部族：“对他们而言，幻觉和幻象是一种正常状态，借此在做梦与清醒之间保持着一种半意识的平衡。”正如帕特里克·伍尔芙（Patrick Wolfe）所注意到的，19世纪中叶达尔文主义的出
42 现，是布封和巴斯蒂安之间的过渡，“弥合了布封观点中的脱漏之处，并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内部可以发展为不同的支系，它们之间可以进行比较”。达尔文的独特作用不单是启发性的。为了把握澳洲土著居民的意识，达尔文自己也使用了沉睡的、在梦寐中痉挛的狗这一隐喻。^①

早在启蒙运动之前的文学艺术大发现的年代，唤醒这一主题，就将原始人的观念与殖民征服的残酷事实连在了一起。可能是西奥

① Wolfe 1991: 204—205. 关于达尔文在中国的被接受，参见 Pusey 1983。

多·盖利 (Theodor Galle) 发行于 1580 年前后的一幅雕版画，最早将欧洲作为一个熟睡者来表现其觉醒，这幅画以施特雷特 (J. Straet) 的一幅画为基础，主题是亚美利哥·维斯普奇 (Amerigo Vespucci) “重新发现”美洲。雕版画中的维斯普奇佩剑而立，戴着象征基督信仰和科学知识的徽记，居高临下地凝视着一名吊床上的裸妇，她已经从沉睡中被唤醒了，一双胳膊作出恳求的姿态。这幅画中的说明文字如下：“亚美利哥重新发现美洲；他叫了她一声，从此她就被唤醒了。”

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用罗盘、剑和十字架所唤醒的，雕刻家盖利用自己的笔把它给征服了。在《历史的书写》一书中，米歇尔·德·塞尔多 (Michel de Certeau) 把欧洲人征服沉睡中的土著女子所显示的创造性和雄性精神，与后来对历史的表现实践联系在一起，并将二者相汇的源头追溯到了盖利的雕版画的发行。“这一色情的、尚武的场景，有一种几近于神话般的价值，”他这样写道，“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写作功能开始在西方出现，……这就是书写那种征服。它将把新世界当做一张空白的、‘野蛮’的纸来使用，在它上面写下西方人的欲望。”后来，启蒙哲学中又一次出现“白纸” (*tabula rasa*) 的喊声，它将西方人的欲望和人类的理性合并成一种自觉的普遍事业，这一事业的起源掩藏于西方人对沉睡者的唤醒当中。^①类似地，在中国大陆，将这张纸刮干净的，不仅仅是启蒙理性，还有一个愿望，即试图发现和唤醒与众不同的中国人民。

欧洲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将这一隐喻用于民族间的冲突。欧洲以外的文明的觉醒，被认为有待于欧洲人的到达。19 世纪初源于德国大学的纪念碑式文明史，就以睡眠和清醒作为不同民族的区

① De Certeau 1988: xxv-xxvii, Montrose 1991.

分。在对印度文明的沉思中，黑格尔将梦寐和理性作了明确的对比。“印度本质的一般原理”，他宣称，是“一种处于梦寐状态里的精神”。黑格尔对梦寐中的印度人的描绘，及其与觉醒了欧洲自我的对比，可归于经典修辞之列：

在一场梦里，个人便只知道自己之为自己，以别于各种客观的事务。等到梦醒，我便是我自己，而其余的宇宙只是一个外界的、固定的客观。既然宇宙是外界的，宇宙间其余的存在便扩大自己为一个理性地相连接的全体；一个多种关系的系统，我个人的存在便是这系统中的一分子——个人的存在和那个总体相联合了。这便是智识的范围。相反地，在梦寐的状态中这种分离是不存在的。精神不再为了自己存在以别于外界存在，因此，外界和个人的分离，在精神的普遍性——它的本质——之前便消失了。梦寐的印度人所以就是我们称为有限的和个别的一切东西，并且同时——因为它是无限地普遍和无拘束的东西——他本身是一种神圣的东西。……这使我们对于印度的宇宙观得了一个普通的观念。事物都被大大地剥夺了理智，被剥夺了因和果的有限的联系的稳定，就像人类被剥夺了为自己存在的稳固性、人格和自由一样。^①

黑格尔想像中的觉醒了欧洲人，是一个清醒的、个体的、私人的、自由的自我，通过智识与事物分离开来，又通过智识与事物重新联合。对黑格尔来说，智识远比理性重要。智识拥抱自我和世界的关系，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个性、自由意识与理性的物质世界之间的关系。

① 黑格尔 1944：140—141。着重号为原文所有。（此段译文参见《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6 年版，第 183—185 页。——译者）

清醒的自我诞生并成长于启蒙时代的欧洲，那个时代对生活中所有的领域都提出了理性、自主和进步的要求，由此孕育了一个关于自觉的人类主体的理想，他将掌握自然的规律，驾驭整个世界，从而发现自由。相反的一面——即对自然或者命运的屈服——则包含着一种对支配历史发展的规律的自觉的，或者是被压制的、因而也是不自觉的无知。对理智的觉悟需要一种自我认知，它将掀开层累的传统和肤浅的外表，揭示出统摄一切的历史规律。用启蒙语言来说，现代深度隐喻和现实主义美学的种子已经由此种下，它与黑格尔的沉睡的印度，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中的“伪自觉”，甚至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中的无意识，都具有同等的意义。^①

启蒙运动关注各个文明及其组成的整个世界的命运。但其判断是偏执的。实际上，沉睡的“印度”这一指控很难有别的含义，只能理解为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指控，他们正处于争夺世界控制权的角逐之中。印度之所以是沉睡的，是因为它忘记了自由，而启蒙运动却给法国、英国、普鲁士的人们提供了这种自由。由于没有欧洲人的到达来唤醒印度人，后者觉醒的前景非常渺茫。于是，觉醒了欧洲这一理念，便能用于解释和证明欧洲文明在全世界的先进，并用于化解对它的犀利的批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马克思就“英国蒸汽和自由贸易”对印度乡村的“半野蛮、半文明社会”的影响作出了著名的论断。“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思提醒读者，这些乡村“使人屈服于环境，而不是把人提升为环境的主宰；它们把自动发展的社会状况变成了一成不变的由自然预定的命运，因而造成了野蛮的崇拜自然的迷信……的确，英国在印度斯坦造成社会革命完全是被极卑鄙的利益驱使的，在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上也很愚

^① Connerton 1980, 116.

钝。但是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如果亚洲的社会状况没有一个根本的革命，人类能不能完成自己的使命”。^① 欧洲的觉醒和它对“肮脏的利润”的追求表明，去考虑“否则”是毫无意义的。印度和中国不得不被欧洲唤醒，这不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宿命，而是出于人类的宿命。

中国的国民党人赞赏这样一种观念，即亚洲各民族的觉醒将实现人类的宿命。在黑格尔的体系中，中国比印度更值得自豪的是，至少皇帝身上还有一点自由，还是一个觉醒了个体。对黑格尔来说，这最多标志着中国与印度相比，正处于市民社会发展的原始状态，并促使他进一步去思考中华帝国落后的原因。^② 黑格尔对中国知之甚少，并大大低估了“自愿性结社”在东方社会中的影响范围，就像马克思后来推导其亚细亚生产方式时一样。^③ 但与此同时，黑格尔认为中国人除了君主之外，别的人都不清醒，这是很有预见性的。中国的国民党人也倾向于这么认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历史连续性，为中国的革命者提供了一个国家统一、政治自主的理想，“人民”将在其中扮演皇帝的角色。黑格尔将智识和自由赋予中国的君主，预示着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将自由赋予觉醒过来的公民，他们不是用市民社会的术语来构想自由，而倾向于将自由与政治主权联系起来考虑。

中国国民党领袖们确实是这样的。对孙中山而言，革命将使人民成为皇帝：

① 马克思 [1853] 1969a, [1853] 1969b。

② 黑格尔 1944。

③ 马克思观察到，在为水利目的而组织的东方帝国中，国家代替了“自愿结社”，例如中国和印度，在那里“文明程度太低，疆界范围太广，自愿结社难以产生”。马克思 [1853] 1969a, 115。

从前的政权完全在皇帝掌握之中，不关人民的事。今日我们主张民权，是要把政权放在人民掌握之中。那么，人民成了一个什么东西呢？中国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权政体，凡事都是应该由人民做主的，所以现在的政治又可以叫做“民主政治”。⁴⁵

换句话说，在共和政体之下，就是用人民来做皇帝。^①

孙中山并不怎么为中国对市民社会的期望所烦恼。经常使他感到烦恼的是，一些公共结社在其他政党框架之外出现了。^②尤其令他感到沮丧的是，民众未能觉悟到自己的政治自主：“现在虽然是推翻专制，成立共和政体，表面上固然是解放，但是人民的心目中还有专制的观念。”^③他运用启蒙的隐喻，来专门指代能将民众从沉睡中唤醒的政治代理人，并建议将国家主权转让给一些拥有超常“智识”的“有能的专门家”。^④在关于民主的第五讲中，孙中山将具有超常智识的人描绘成“先觉者”，用具有普遍意义的术语来构想他们的觉醒：

这种人有绝顶的聪明，凡见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许多道理；听一句话，便做出许多事业。有了这种才力的人，才是先知先觉。由于这种先知先觉的人预先想出了许多办法，做了许多事业，世界才有进步，人类才有文明。^⑤

黑格尔想像中觉醒了的主君，被转化为觉醒了的国民党官僚。

甚至对孙中山而言，觉醒这一比喻，也将自我和民族的苏醒与追求普遍效力的知识运动连在一起。当改革家和学者们谈到中国的

① 孙中山 [31]: 301。

② 见本书第七章，Fewsmith 1985。

③ 孙中山 [31]: 306。

④ 同上: 314—315。

⑤ 同上: 297。

民族觉醒时，他们所指的大都是广义上的民族发展，涵盖了从自然科学到高雅艺术的每一个启蒙主题，并几乎包括了从现代通讯到流行时尚的每一个后启蒙现代性项目。不过，觉醒中的民族这一比喻，明显异于发展中的民族这一观念。觉醒意味着行动，而发展则意味着消极地服从于历史进程。当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最初倡议唤醒中国时，民族发展这一观念还未被创造出来。尽管如此，正在呼吁同胞觉醒的年轻的爱国者们，竟然会被民族发展这一诉求所俘获，这不能不让人感到疑惑。觉醒承诺一种瞬间的信念：“当头棒喝”。相比之下，与发展相伴的则是渐进的、累积性的变化；觉醒还意味着，在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中间，耐心是一种罕见的美德——确实，它很少被视为一种美德。觉醒这一比喻使热情和仓促成了美德。

46 发展也是一个比较性的概念。它要求民族主义者们等待时来运转。对孙中山或者他的国民党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因为其他一些不如中国的民族都已远远排在队列的前头。孙中山呼唤民族的觉醒，是想让中国以外的人看到，中国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比他们前进得更远。“我们的文明已经比你们进步了二千余年，”孙中山对英国驻广州领事说，“我们现在是想你们上前，等你们跟上来。”^①民族觉醒这一观念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呼唤一种奉承中国的历史感；它也令人满足，因为只要具有愿意自我“觉醒”的识见，每个民族都可能觉醒过来。

觉醒这一主题还有另一种作用，那就是将启蒙运动的普遍方面与民族国家的单一诉求结合起来。启蒙运动呼唤普遍的效力，但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它实际上孕育了诸个单一民族。奥布赖恩（C. C. O'Brien）写道：“法国大革命的扩散远非把自由播及世界，它引起的

^① 孙中山 [31]: 94。

抵抗强化了反动……将与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发生联系。”^①欧洲科学的普遍诉求也鼓励了抵抗。为了准备1793年出使中国之行，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征用了一只热气球带往北京，作为英国成就的显著标志。1783年，蒙哥菲尔（Montgolfier）兄弟首次在巴黎的大街上炫耀他们发明的胶和纸，此后气球就成了启蒙运动的首要象征，后来成为约翰爵士的约翰·巴罗（John Barrow）是首批乘气球升空的英国人之一，他在跟随马戛尔尼出使中国之前不久，似乎还上过天。^②乾隆帝的大学士和珅不允许那只气球在北京充气，马戛尔尼有理由感到遗憾。“假如一只热气球能在北京上空升起，”马戛尔尼的传记作者写道，“整个中国都将了解到西方的优势。”^③

马戛尔尼是一位出色而又傲慢的外交家，他渴望给北京的清廷带来猛烈一击，就如同禅宗师傅对其徒弟“棒喝”那样。自从1644年清王朝建立，曾经有十几个（外国）使团被派往北京，但从未有谁如此蓄意动摇清廷在全球地位上的“虚骄自大”。巴罗记录说，马戛尔尼拒绝在（中国）皇帝生日场合下跪，这一举动“羞辱、迷惑并警示”了北京的礼部。^④事实上，除了交换礼物时之外——甚至在这一点上也有一些差异——马戛尔尼根本就不想遵循以往的先例。他到中国来，是为了用科学和进步换取更多的贸易和更大的影响。马戛尔尼带来了欧洲科学革命的消息，并打算用科学思想中的新的

① O'Brien 1988: 48, P. Johnson 1991: 第八章。

② Fargusson 1972, Gillespie 1983: 43, 52.

③ Peyrefitte 1993: 423. 到马戛尔尼返回伦敦时为止，热气球和启蒙运动都已经丧失了自身的清白。现存的关于拿破仑时代科学奇迹的雕刻，描绘了（法国人）用飞艇运送军队入侵英国的情景，英国防守者也乘坐武装的轻型飞艇来保卫自己的祖国。气球首次使用于实战，是在1794年，当时法国军队在茅比盖（Maubeuge）使用了这种东西。Gibbs-Smith 1985: 20.

④ Barrow 1806: 13, 69, 117.

- 47 归类方法来探索中国。他的随员中有一名艺术家、一名制图员、一名冶金学家、一名自然科学家、一名植物学家、一名医生，以及约翰·巴罗自己。马戛尔尼及其队伍一路走过中国，研究各种地方风俗、语言和信仰，用其绘图技术捕获一些中国的建筑成果，用其蚀刻画法捕捉这个国度的情绪，并收集了一些活的植物样本，准备带回伦敦。^①

马戛尔尼的审计官约翰·巴罗，是一名科学家和探险家，对数学和地理学有着特殊的兴趣。他后来的生涯体现了那个时代的共同模式：这位年轻人对探险和乘气球的热情，他那丰富的想像力，以及他所接受的科学训练，都使他走向成熟，并效力于王权。巴罗最终升至更高的职位——海军部常务次长，在此任上监督进行了一次很大的海上行动，将全世界的海岸和海洋都绘进了海图。在巴罗的积极鼓励下，英国皇家海军将岩层、化石和外国动植物的样本带回英国，以满足皇家学会（以及达尔文）的好奇心。并且，凡是在有可能的地方，皇家海军都设立了新的海军基地。^②英国殖民部比巴罗稍微谨慎一些，间接地指责了约翰爵士那过于张扬的帝国主义野心。然而，巴罗却以被视为帝国主义者为荣。^③无需任何理由，他就是想将科学和文明扩展到刚刚绘入地图、处于大英帝国独家控制下的亚、非大陆。他尤其赞同马戛尔尼对中国官员的个人习惯和管理风格的鄙视——如此“与英格兰人的感觉不协调”——并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来打倒这个帝国。^④1804至1845年，大英帝国与中华帝国之间持续了几十年的紧张竞争，巴罗此时在海军部任职，一直为

① Barrow 1806.

② Desmond and Moor 1991.

③ P. Johnson 1991: 343—355.

④ Barrow 1806: 85.

自己的政府出谋划策，最终，这场竞争以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的胜利而结束。

唤醒与历史

一部从鸦片战争到 20 世纪初期的中国历史，曾经被不断地讲述为从帝国的幻觉和昏睡状态到现代中国的“觉醒”。在这种历史记忆中，旧帝国下的日常生活基本被排除在外；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框架，它的一些缺点也表现在别的方面。^① 尽管如此，中国的觉醒这一观念仍有强大的力量，因为它深深地嵌入了中国自己的历史中。中国的觉醒既代表着一个历史事件，也代表着一种历史框架，因为觉醒这一观念将过去的屈辱转移到了中国最顽强的梦想家——政治改革家和革命者们——的梦想世界中。

确实有着足够的屈辱来激发一种清醒的乐观主义。中华帝国在 48
鸦片战争中败于英国人之手，紧接着，1860 年受辱于英法联军之手，1884 年受辱于法国，1894 年受辱于日本。每一次失败，都促使中国人近距离反思旧秩序在保家卫国方面的无能，民族主义观念因而允诺了一个历史救赎日，到那一天，中国将摆脱外来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的枷锁，成为一个富足、强大、自豪的独立国家。^②

① Cohen 1984. 然而，“中国中心论”的历史学家们从西方入侵之前开始自己的叙述，或者转而着重研究那些没有受到西方入侵的明显影响的事件、问题和人物，他们更倾向于揭示一种原初的本土民族主义的兴起，而不是质疑中西交往的历史编纂学中包含的民族主义宏大叙事。见 Naquin and Rawski 1987; Johnson, Nathan, and Rawski 1985。

② 见 Fairbank 1971, 1986. 像所有的主流史学范式一样，这一历史编纂学中的“哈佛学派”也招来了批评。一些批评家认为它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缺乏同情 (Peck 1971)，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对毛泽东主义过于同情 (Mosher 1990)。

不是历史学家，而是中国的改革家和革命者们，最早将民族的失败史和进步的改革史压缩为简单的历史进步图式，它被一种又一种的觉醒划分开来。

在其生命晚期，改革家梁启超注意到了进步与历史自觉之间的辩证运动。他观察到，“近五十年来，中国人渐渐知道自己的不足了。这点子觉悟，一面算是学问进步的原因，一面也算是学问进步的结果”。^① 梁启超将进步界定为整个民族针对外国干涉的一系列觉醒，在对改良与革命的历史的反思中，他期望将来的进步采取新的、甚至更好的“觉醒”形式。1922年，梁启超回顾过去的半个世纪，提笔写道：鸦片战争中国战败之后，中国人得到的最初教训，就是意识到中国的“八股文”不足以承担驱逐外国入侵者的任务。这一觉醒与同治中兴（1861—1874）阶段对应。1894年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促使中国人第二次觉醒，就像“睡梦中着了一个霹雳”。在这个阶段，一些“有心”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不仅仅是用于战争的武器，还有中国的政治和行政制度，都不能胜任它们所面对的责任。他们建议进行广泛的政治改革。第三次，也是最近的觉醒，开始于梁启超说这番话之前不久，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双重影响，犹如向传统文化和社会点上一把烈火，要求“全人格的觉悟”。^② 这最后一个阶段，还引发了普通民众的政治觉醒，他们意识到自己在政府中的合法地位，并要求一个更能回应民众呼声的政府。最终的觉醒是实现民族的自我管理。梁启超的结论是，中国近世所有伟大成就，都是“由人民一种根本觉悟方才做成”，这种“国民对于政治上

① 梁启超 [1922] 1979。

② 同上。梁氏关于改革和革命运动的理想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在出于不同角度而撰写的同类历史著作中得到了重复。见 Fairbank 1971, 1986, Dirlik 1978: 37。

的自觉，实为政治进化的总根源”。^①

梁启超的演讲重复了一种关于大众觉醒的强调修辞，它渗透于1920年代早期的文学作品中。^②他期望未来的进步将采取另外的觉醒形式，这些觉醒将在像他那样的民族主义者的推动下得到实现。49
他的论证为这种重新觉醒提供了操作性的解释。最终，孙中山在梁启超止步之处拾起这一模式，部分是为了解释自己的革命进程及其挫折，部分是为了一种新的、甚至更进步的国民政治——“唤醒民众”的政治。

从军事科学到大众觉醒，孙中山都采纳了梁启超的进步主义目的论的流程图，尽管孙一开始只是用它来解释自己反对清廷的革命运动，而非清朝与列强之间的冲突。但到了1920年代，孙中山已经逐步认识到，中国的觉醒应该采取一种反帝国主义的形式。“列强的态度以前是这样的，”他写道，“既然中国永远不会醒来，也不能管理自己，那他们就占领一些沿海地点，如大连、威海卫和九龙，作为‘瓜分’中国的据点”。孙中山坚信，中国应该“觉醒”，不只是为了证明列强的错误，更是为了将他们驱逐出去，收回中国失去的领土。^③

连续的觉醒，每一次都是在前一次基础上的进步，这种观念当然根植于更为广阔的历史进步观念中。民族觉醒被想像为进步的，这恐怕是它最富有创意的一面。新一代历史学家们感到，中国的过去就像活人脑子里的噩梦一样沉重，他们并且着手将中国的历史重建为一系列连续的进步，相信中国需要从永恒的辉煌幻觉中觉醒过

① 梁启超 [1922] 1979。

② Dirlik 1978: 38. 亦见本书第四章、第七章。

③ 孙中山 [31]: 33。

来，然后才可能摆脱外国人（的压迫）。并且，就在这些新的历史学家动笔之前，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们已开始在地方法博物馆中重新组织自己的历史，在那里，他们按照进步的序列来放置代表着科学、人种和政治兴趣的标本。当许多中国公民现在多少都有进步的要求时，时间本身也在日常生活中发生了不同的变化。用本·安德森那意味深长的话来说，这个社会正在觉醒，正觉悟到一个具有鲜明的中国特性的“世俗的、符合历史方向的想像共同体”。^①

这种新的时间感，标志着中国的城市、园林、街道等建筑环境传达出的感觉发生了改变。过去当然在中华帝国的城市居民中留下了印象，但从建筑学上说，“现在并不意味着令人吃惊的新颖或不同”，任何一代旅居者的习惯和价值观念，在建筑物、纪念物和公共道路上留下的印记，都不足以永恒到能与前几代人的努力明显区分开来。^②除了商人别墅的高墙之外，被一种名叫命运的道德秩序所包围的私家园林，也引发着人们对时间和空间、文明和自然的沉思。^③酒和诗在这里并非不相宜，游人拜倒在一个高度文明化的社会所呈现的愉悦面前，自然拜倒在园艺家的人工设计下，二者正好相互映照。让人类社会和建筑环境显得自然，以与栽培植物和引人入胜的岩石所体现的人工修饰形成对照，这就是设计者安排每个园林的特征的方式。变换的四季为这一设计增添了周期性的维度，因为死亡和重生的模式与人类历史的兴衰共享着神圣的时间。^④另外，肖像陈列室也有着类似的魅力，它在一个共时性空间陈列着不同时代留下

① B. Anderson 1991, 37.

② Mote 1977, 116—117, Mumford 1938, 4.

③ 格拉罕·培克清晰地记录了这种区别。见 Peck 1967, 7.

④ R. Johnson 1991, 79.

的凡圣伟人及其影响：孔子、孟子及其门徒的头像，被排列于三皇五帝、后世帝王以及更次要的官员的肖像旁边，以展现一种神圣的线性联系。在圣人至上的伦理社会中，这种联系被用来证明帝国统治的合法性。这个神圣的时间和伦理世界，在中华帝国的城市、陈列室和园林中得到了广泛的宣扬。^①

欧洲人的进攻，破坏了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中所表现的神圣的线性联系。这一进程始于日常生活。舞台戏剧和说书故事的迟缓节奏，以及与宴会有关的无休止的过程和闲聊，使欧洲侨民鄙夷地记录下了“东方的时间观”。西方人的时间非常珍贵，根本不能浪费：汉学家们的不安似乎源于对完成任务的渴望，而不是因为敏锐地意识到了现代进步和前现代命运感之间的对抗。当明恩溥（Arthur Smith）写下“中国佬”“对时间的漠视”时，言下之意主要是指它对外国人的商业程序的影响——中国人在社交约会中不守时，并且，当要他做一件事时，他也不够勤奋和紧迫。但很显然，他还有意暗示更多的东西。^②

居住于通商口岸的人们喜欢表述停滞的东方和进步的西方，并将这两种时间感相互隔离，但这种方式是错误的。值得注意的是，近些年来，香港华人也已习惯于这样评论中国大陆悠闲的生活和工作节奏。^③关于民族这一想像的社会与早先的社会形式之间的比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划下了一道历史的而非文

① 包遵彭 1964：12—13。早在战国时代，周文王建造了一座方圆 70 里的花园，据说是为了“与民共治”。同上，第 6 页。（按，周文王作为周朝的创建者，非战国时人。——译者）中华帝国晚期，杭州、苏州、扬州等地的富商和士绅家里有许多著名的私家园林，相应地，这些花园是“为迎接和招待客人而建的”。R. Johnson 1991：76。

② A. Smith 1894：第五章（“时间的漠视”）。

③ Vogel 1989：74。

化的界限，它同样可以适用于君主制时代的欧洲和帝制下的中国。这条线介乎于两种意识之间：一是关于进步的时间之外的道德秩序的意识，另一种是关于历史运动的意识。在欧洲，从前一种意识到后一种意识的转换，是独特的现代意识发展史上的分水岭，“正是它，而不是别的任何东西，使得‘想像’一个民族成为可能”。^①在中国，这种从伦理的到进步的历史意识的转换，可以追溯到科学博物馆、自然博物馆逐渐取代（传统）园林这件事情上。20世纪头几十年里，博物馆开始在中国传播开来，因为园林失去了时尚魅力，与此同时，博物馆的赞助者却“觉悟”到了进步的历史。

第一个按照新式原则组织起来的博物馆，是1868年建于上海徐家汇的震旦博物馆，由一名法国天主教传教士胡德（Monsignor Pierre Huede）所建。第二个建于1872年，由皇家亚洲协会北华分会所建，也在上海。1905年，张謇在其南通模范区开设了第一家中国人办的博物馆。1912年，成立了现代中国纪念性的国家博物馆的前身，标志着满清王朝的覆灭。^②这些博物馆欢迎普通公民踏过其门槛，通常总是人头攒动，在破除旧的伦理秩序并代之以一种历史进步的秩序方面，它们起了主要作用。与园林一样，游人也被安排顺序参观博物馆，但与园林不同，博物馆将过去打入历史，并暗示着岩石和街道之外储藏着某种未来。博物馆预示着种种进步的觉醒。

传教士们希望用博物馆来标志停滞的东方与进步的西方之间那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但它们在规划之初便有另一个重要使命。它们成了民族主义竞争的场所。传教士创办早期博物馆有着明确的目的，即纠正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的错误认识。传教士想在山东青州创

① B. Anderson 1991: 28.

② 包遵彭 1964: 15—16。

办一所博物馆的冲动——正如怀特莱 (J. S. Whitewright) 牧师 1893 年 4 月向出席中华教育会上海会议的代表们所解释的——是为了表明，外国人并不像中国人认为的那样蠢。“我们一开始就应该记住，中国人非常鄙夷地将我们视为夷人，认为我们完全没有任何学问，也没有任何文化，并且，我们带着某种值得他们学习的东西来到中国，这一点在他们看来完全是荒谬的。”怀特莱创办了自己的博物馆以纠正任何关于西方弱勢的错误见解（正如马戛尔尼试图升起其热气球时那样）。青州教区博物馆被赋予的目的，是“通过展示西方文明、科学和发明的某种优势，来设法启迪该区的人民”。^①

好奇的参观者纷纷涌向该博物馆，其数量足以支持怀特莱牧师的信心。开张后的头三四年里，他接待了大约 35 万名参观者，平均每年 10 万人，这一频率使该教区期望，到 1890 年代结束时，该馆将能吸引共计 100 万参观者。在这些参观者中，来自邻近各区的儒生最让该博物馆感到骄傲，他们参加府试时通常寄宿于青州。“不能低估影响这个阶层的重要性，”怀特莱评论说，“因为正是从他们之中，将产生中国未来的统治者、领导者和教师。”为此，该馆另外配备了一个小型讲堂。历次府试期间，都有两万多名儒生走进该馆，去探究那些陈列着的电动机械、火车模型和缩微疏浚船，他们同样也对按照科学顺序布置的鸟类学、兽医学、天文学和地理学展览感到吃惊。^②

然而，相对于“感化”这一真正的工作，对他们的科学教育只被视为附属性事务。“我们谁都不要以为，”怀特莱牧师警告说，“成功地使人们知晓了外国科学的价值，就算是完成了自己的职责。”真正的工作是在礼拜堂里完成的，后者完善了博物馆的职能，即“复

① Whitewright 1893, 234—235. 非常感谢安东篱 (Antonia Finnane) 为我指出这一资料。

② 同上：235, 239—241。

明盲人的眼睛，开通聋子的耳朵……开启人们的心智，使他们能够察觉并领悟到真理”。对那些识字者而言，真理就展现在一个单独的玻璃盒子中，里面装着几本用不同语言写就的圣经。^①

青州这座小小的博物馆向众多的人们展示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这一无与伦比的成就，得到了外国人和中国人的一致肯定。帕奇（V. F. Parth）牧师花了一天时间来观察那些进出青州博物馆的中国人，然后决定在济南建立一个类似的博物馆，他那个教区也遇到了与怀特莱相似的问题，即劝说人们认真对待基督教。帕奇对自己的所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人——如果不是其中绝大部分人的话——都曾经被教导来唾弃我们。这种科学和发明展览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加强了（他们对我们的）尊重”。^②

中国人也没有在参观中迷失，他们返回家乡，建立起自己的博物馆，与上海、青州和济南那些博物馆竞争。这不仅仅是个竞争问题。地方上的博物馆长们争相控制通往同样的历史宝藏的门径，并试图为母体文明获取教会机构正为西方获取的东西。一个多世纪以来，外国人已经习惯于把中国的文物运出国外，在不列颠、法兰西或者加拿大展示东方的停滞，而不是按照国别排列、展现中国已经在多大程度上走出了停滞状态。与一种展示中国的精神和物质文明的急切心态相伴的，是一种日益增强的关切之心，即保存民族财富的宝藏，以免它被全部走私到国外，并在外国的博物馆参观者心目中留下一个难以挽回的印象：中国是封闭、停滞的。^③ 但这是一场

① Whitewright 1893: 239—241.

② 同上: 242.

③ 斯坦因（Auriel Stein）从敦煌石窟中掠走了24箱壁画，将之带回大英博物馆；他还从新德里一家博物馆中拿走了5箱刺绣和旗帜。伯希和（Paul Pelliot）则从敦煌带走了2000卷经文。包遵彭 1964: 8—9.

不对等的竞赛。博物馆不会允许中国文明以自己的术语说话，因为它据以评判参赛者的，是支撑着现代欧洲文化的科学分类和历史进化原则。

民国成立以后，国家自身肩负起建立博物馆的主要责任。如前所述，中国人办的第一家博物馆出自慈善家张謇之手，但随后开办的一个重要的博物馆，却是由刚刚成立几个月的民国政府出资的。其目的在于展示已经覆亡的清廷的珍宝。1912年6月，这些东西陈放于旧京师大学堂，随后陈列在北京的两座小型宫殿里，直至1925年清室最终被迫迁出皇宫，它们又被迁回那里。1925年10月10日，即武昌起义14周年之际，故宫博物院对公众开放，同时举行了一次庆祝仪式，正合乎于将旧帝国正式贬入历史之意。^①

值得注意的是，创办博物馆的第二次高潮，出现于国民革命期间。民国的第一个10年，全国注册了大约13个博物馆——包括张謇在南通的私家博物馆、教会建立的两个博物馆、4个地方或省属图书馆，以及3个国立博物馆（两个在北京，一个在南京）。1920年代，到1929年为止，数量已增至34个。国民党执政后，增长的速度又加快了。到1933年，已有64个博物馆，次年增至72个。博物馆的增加似乎并未降低公众兴趣的传布。1926年，四周之内就有18.5万人参观在北京展出的来自大同的艺术品和手稿。^②

当然，国家在博物馆的发展上拥有对私人的优势，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省级和中央政府的组织阻碍了个人和公共团体获取那些必需的技能 and 资源。另一个原因是，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博物馆被寄予了凝聚全国性公民社会感的希望。正如1933年4月国立中央

① 包遵彭 1964：24。

② 包遵彭 1964：24—26，31，37。

博物院成立章程所说，现代博物馆的目的，是“促进科学研究，扶助大众教育”。与此相应的是，国立博物院位于教育部内。其职能被确定为“研究、收集、保存、展示和解释自然、人文和实业科学中的所有物质和产品”。^①该博物院的技术宣言中表达了一种进化主义的解释方法——“方法应该是系统地展示历史演化过程”——并在其分类体系中重申了这一方法，即“运用科学方法……以横向展现体系内部之类属，并纵向展现其历史演化”。^②

54 各个新式国家博物馆的分类，也反映了省、民族和世界之间的关系。省级博物馆的世界就是民族。1930年，河南省政府这样描述省教育厅新建立的省级博物馆的功能：“其一，表彰民族文化，其二，促进学术研究，其三，扩充民众智识，其四，提升公共意识。”民族之外的世界根本没有提及。国立博物院的中心更加模糊。它包括了人种学（尤其强调对边缘人群的研究）和生物进化，意在证明人类起源于中国。但最能阐明历史进化机制的还是国立博物院的成立本身，它标志着东西方之间的竞赛达到了高潮，这场竞赛由19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首先发动，随后又为20世纪初期那些具有公共意识的公民们所推进，而结束于中华民族发现了自己的意志和资源来建立一座博物馆之时，后者将确认中华民族在世纪历史中的适当位置。于是，新式政体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在国家博物馆的功能和分类中得到了反映。顾名思义，国立中央博物院是一个全国性的中央机构。它的建立，在全国博物馆面前重复了国民党政权对各级省政

① 1933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提出了这座博物院的方案，几年之后开放。傅斯年被任命为最初的筹备委员会主任，但中央研究院的繁重工作，使他于次年7月辞去该职，并推荐李济继任。筹备委员会成员还包括胡适、朱家骅、蔡元培和王世杰。唐丹彤（音）1960：1—7。

② 同上：9。

府上过的一堂课：没有相对应的中央部门，地方和省级机构就是不完整的。^①

用历史学家傅斯年的话来说，历史研究本就是一个“全国性研究”的“领域”。^②当各个地方社会正在自己的博物馆里重新排列古老的和常见的人造物品时，更年轻的一代历史学家们也开始按照另一种顺序来重新排列文本中的中国历史，以证明过去是一场噩梦，由此标志着未来的辉煌觉醒。新一代历史学家们意在表明，神圣的传统是建立在谎言的基础上的。为此，顾颉刚向传统史学的三个基础发动了进攻：神圣的起源、通过正统儒家经典而实现的连续传承，以及从上古的黄金时代走向历史退化的概念。顾颉刚的方法是科学的，但他的历史进步信念背后潜藏的核心要义，是建立“与现代民族之需要相关的”东西。1936年，顾颉刚这样写道：“至于我们的过去，我们仿佛曾经在梦里。”是到了觉醒的时候了。^③

在针对旧秩序的攻势中，博物馆长与历史学家们结成了统一战线。这两个群体都极力证明历史的进步秩序，并急于辨别出过时的、看起来是顽固抗拒进步法则的习俗和信仰。在这方面，博物馆为历史学家们提供了宝贵的帮助。通过归类并保存自己属下的物品，博物馆象征性地将它们打入了过去这一冷宫。因此，当顾颉刚决定动摇“上古的人”这一形象时，他为博物馆分派了一项关键作用，1930年他这样宣告：

对于历史，我们打算做的是一次伟大的解构行动，但倘若

① 包遵彭 1964：31，Levenson 1971b：57。

② Schneider 1971：27。傅斯年是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委员会的首任主任。包遵彭 1964：52。

③ Schneider 1971：8—11。顾颉刚的新史学，并不总是受到国民党领导人的欢迎，他们不喜欢他对（中国上古的）黄金时代的真实性的“辨伪”。Schneider 1971：189—191。

55 没有这一行动，我们的民族将无法找到生存之道。我们的解构行动并非残忍的行为：我们只是将各种东西存放于它们的历史位置中……总而言之，我们正在将它们送往博物馆。

顾颉刚的结论是，对过去的解构，“局限于在博物馆内部的归类 and 整理”。^①

在顾颉刚所理解的术语中，从理论上说，任何在历史上拥有一席之地东西都不需要被破坏。历史上的东西都已死亡并被埋葬。但在实践中，中国的“博物馆化”却是一种新的历史程式。顾颉刚试图通过这一程式来重构历史，同时消灭一种在许多方面仍然充满活力的文化。^②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需要意志和精力去消除社会、文化和政体中所有可被令人信服地视为陈旧的、现在又是骗人的传统的残余。当然，这项任务不能仅仅交给历史学家和档案学家。事实上，顾颉刚说出的正是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人之间的共同信念，他们的努力方向非常广泛，包括出版、教育、文学和表演艺术等领域，并渗透到了以新中国为目标的一系列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当他们忙于破坏旧中国那些顽固的遗产时，新中国的支持者们正急于表明，自己属于一个更有生机、更有活力的社会，后者能很容易地与自己碰巧置身其中的“死”文化区别开来。尽管旧的文化依然活着，仍然有活力，但它无法在新中国公民所认可的意义上更新自己。也就是说，它无法成为时尚。醒来的公民们通过赶上新的观念趋势，并在发型、服饰及礼仪等方面跟上时尚的步伐，而将自己与沉睡中的同胞区别开来。他们脱下长袍，解下辫子，喜欢上了西服和短发，作为主顾而非陈列品进入博物馆。

① Schneider 1971: 60—61.

② Levenson 1971a.

这使我们回到了时尚。我们注意到，时尚立即成了一种跟上时代的个人宣示，一种传达着如下观念的大众媒介：这是一个任何人都应该跟上的时代。发型和服饰在帝制时代尚未一致，但它们的差异在于空间而非时间。“千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①，这句民谚道出了帝制时代地方风俗的多样性。当风俗习惯从一个地方向另一个地方传布时，它们似乎以大陆漂移的速度移动，然后带着整个帝国的重量安顿在某个地方。传说始于11世纪的妇女缠足，到19世纪时已经成为一条准则，遍及华北和华中地区，但即使在那个时候，缠足也未在华南地区普及。在现时的语义中，缠足已经不是一种时尚。与习俗的进步相伴随的，是汉族精英文化从北方传到南方，以及它历经许多个世纪的持久性，这意味着它帮助区分了文明与野蛮，而不是区分风俗的进步与过时。 56

进入民国，时尚的变化更加迅速、更加急促，因为它们标志着时间本身的流转。旧帝制之下，由于法律的强化，束发留辫之风遍及全国，因此，对中国人而言，从帝制到共和的转变，其最显著的标记便是剪辫。^②但假如剪辫之后，取代它的发型没有发生更大规模、更频繁的变化，并且没有持续而急促的服饰变迁来与每一种新发型相伴的话，那它就没有别的意义，而只是标志着一种朝代的更迭。每一种新时尚取代旧时尚的速度，显示了民国政治秩序的变迁如何伴随着国民日常生活秩序的变迁，这两种秩序原本有着很大的区别。现代时尚向世界宣告，过去——甚至是非常近的去——已经丧失了生命力。并且，时尚具有令人奇怪的短命特征，使精英分子

① 引自 March 1974: 16。

② 鲁迅写道：“北京的辫子被袁世凯下令剪掉了。但这不是简单的命令，而需要以刀剑作后盾。否则，北京城可能至今还充满着辫子。”鲁迅 [1927] 1980, 353—355。

中最进步的成员能通过衣着和发型辨认出全国的其余同类，因为它诱使接近自己的所有阶级和地区的人们都渴望赶上自己。

通过正在发展中的全国性市场网络，时尚一路向前，每一次新潮流都传达着追赶它的热情。^①晚清最后几十年间，市场网络经历了一次重组，其源头从首都和各省省会转向了新兴沿海城市。上海和汕头、香港和厦门开始领导潮流；北京、南京、长沙，以及无数内陆集镇，都次第跟随于其后。相应地，首都本身也开始发生变化。1905年科举制废除以后，赴京赶考的举子们所钟爱的丝绸长袍，也失去了吸引力。随着以西学课程为基础的新式教育的引入，丝绸长袍很快就被新式学生装所取代，后者是一种更短的上衣，其特征是仿效西方风尚对中而开。这是一种严肃的服饰风格的早期原型，它也是北京对现代学生装的发展做出的最后一大贡献，后来逐渐演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族服装。民国时期，这种新时尚迅速从北京传到全国各地，直到被从新兴沿海城市引进的各种时尚所取代为止。

1929年，在地处赣南偏远地区的寻乌县，毛泽东注意到了时尚的引入及其在当地人之间的影响。在帝制时代，寻乌城的市场曾经为粤东地区提供过来自内陆省份的土货和丝。^②民国初期，当寻乌居民开始购买来自沿海地区的纺织品和衣服时，贸易的方向就转变了。寻乌人很容易适应新式中分上衣，并且，每当三两年内，寻乌以外的世界产生了新的时尚并开始提倡新的上衣样式时，寻乌人也能继续适应它。1920年，在寻乌最受欢迎的上衣款式是“上海

① 1989年出版了三部关于清末民初市场持续整合的研究著作：Brandt 1989，Faure 1989，T. Rawski 1989。亦见 Myers 1991：604—628，姜士彬（Johnson）、黎安友（Nathan）和罗斯基（Rawski）1985年的合著，以及韩书瑞（Naquin）和罗斯基（Rawski）1987年的合著，亦讨论了市场网络扩张的社会与文化意义。见 E. Rawski 1991：84—111。

② 毛泽东 [13]：65。

装”，以布做的纽扣和刺绣装饰为特征。1923年，它让位于一种平底的款式，后者在1929年又让位于“广东装”。^①男人的发型也遵循着类似的模式。一开始，男人的发型套用沿海流行的样式。1911年寻乌男人剪下辫子，次年就流行起光头，1913年又流行日本发式，1917年和1918年流行平头和军人发式，1921年又流行“博士”发式，1920年代后期又流行一种新的日本发式和许多种从广东梅县引进的东南亚发式。^②

通过时尚这一媒介，市场也有助于打破那些将各个地方社会分割开来的壁垒，并为之带来了民族革命的观念。如同鲁迅的《阿Q正传》中领导革命的“假洋鬼子”一样，在寻乌倡导地方潮流的人，也是地方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位于革命前沿的是学生，他们引进了平头和军人发式，这种发型最终覆盖了寻乌每一个成年男子的头皮。^③学生们采用短式上衣之后，不过几年，大多数青年农民和工人也穿上了这种衣服。但农民和工人们总是难以紧跟潮流。等到他们采纳了短式上衣之时，寻乌的革命学生们已经迈进了一步，穿上了新式鞋子，并且“还要佩个电筒”。^④通过介绍沿海的最新趋势，并让自己所处的社会警觉到国内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情，受过教育的寻乌男女青年把民族观念引入他们所生活的乡土社会。然而，由于掌握着时尚和策略，他们继续把自己与更下层的亲戚和落后的邻居们区别开来。也就是说，具有最广泛吸引力的时尚，巩固了他们在自己社会中的权威位置。他们的短发使自己显得很精明，

① 毛泽东 [13]: 93—94。

② 同上: 103—104。

③ 小说《阿Q正传》完成于1921年，收录于鲁迅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呐喊》(1923)。见鲁迅 [1923] 1980a: 102—154。

④ 毛泽东 [13]: 94, 103。

他们那简单的服装显示了一种严肃而又稳重的风度；而他们使用的手电筒，则起到了言语从来不能起到的作用，即告诉别人，自己随时作好了处理紧急事件的准备。1920年代前期，广东农民运动家彭湃在制服上添加了最后一件饰物：一支进口钢笔，不久，它就像燎原之火，在革命干部中普及开来。^①

唤醒与梦寐故事

在“觉醒”行为中，寻乌青年们钟爱的新文学，在帮助塑造一种进步的民族社会感方面，起到了与时尚相同的作用。早期历史变得时髦之后，传统的通俗故事通过一系列道德剧中情景对话的展开来表现时间。相反，清末民初的新文学，其情节是累进式展开的。58 在这一点上，它标志着一种类似于欧洲文学的转变，即从古老的史诗形式转向古典的现代小说，正如加布利埃尔·乔丝波威西（Gabriel Josipovici）所说的：

时间存在于古典小说中的方式，即便是最长的（传统）史诗也难以做到。也就是说，它既让人们花时间去阅读，又关注时间的流逝……也许我们应该说，在古典小说里，时间就像仁慈的女神那样存在，她愿意献出自己子宫中的一切。她的另一个名字就是情节。^②

叙述在革命策划中的意义，将是本书下一章的主题。在此我们只需要注意，文学如何与科学在梦寐故事中形成合力，从而将这一观念普及开来：时间是一位响应人类创新的仁慈女神。

① V. S. Naipaul 将钢笔描述为“乡村文化人的标志”。Theroux 1972: 12.

② Josipovici 1982: 22.

西方的科学给中国带来了一种深厚的信念，即进步将把自己的礼物赠与任何人，只要他准备去“觉悟”未来的承诺。“总而言之，”在《科学的生活方法》（1923）这份宣言中，吴稚晖断言：“古人劣于近人，近人劣于将来之人。”^①新一轮乌托邦故事为这一观念提供了表现形式。伦敦、巴黎和纽约的中国学生们，在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爱德华·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查理·弗雷尔（Charles Fourier）、安托里·弗朗斯（Antole France）、朱尔斯·凡尔纳（Jules Verne）等人的小说中，遇到了一个成长中的乌托邦作品群。^②乌托邦被从“无地址”转移到未来故事（euchronian fiction）*里的“未来”，此时它便传递了这样一种观念——未来将比现在更好，无论现在如何不尽人意，相比于过去，它还是有了明显的改善。未来故事和科学一道，促成了这一观念的出现。

未来故事中常用的一个叙述技巧是，主人公一开始陷入沉睡，隔了一段时间之后觉醒过来，发现世界已经变了。^③乌托邦故事中率先出现觉醒，是路易-塞巴斯蒂安·莫赛尔（Louis-Sebastien Mercier）出版于1771年的《2440年》，故事中的叙述者（一位老人）在2440年觉醒过来，发现他身边的世界已经改变了。^④莫赛尔对理想社会的想像，在他那个时代是正统的，但他把沉睡的形象投射到未来

① Kwok 1965: 56.

② Zarrow 1990: 78.

* euchronian fiction 与 utopian fiction 都描绘某种理想社会状态，不同之处在于，utopian 一词强调地点上的不存在，euchronian 一词则强调时间上的未来性，以及相比于当前的更优越性。此点承费约翰教授指出。——译者注

③ 除了此处讨论的莫赛尔和贝拉米的作品之外，威廉·莫里斯和威尔斯的作品，也使用了觉醒过来的沉睡者这一技巧，将他们的理想世界投射到未来。Kumar 1987: 39.

④ 在一则对其乌托邦理性主义的无意模仿中，“为了用整数来表达”，该作品译成英文时标题换成了《2500年的回忆》。见 Mercier 1975: “广告”。

当中，这开创了新的领地；也就是说，他把进步的时间这一观念，从启蒙哲学中转移到了另外的永恒经典——传统的乌托邦文学中来。^①《2440年》激发了许多模仿者，其中包括华盛顿·欧文（Washington Irving）在《札记》（*The Sketch Book*, 1819）中塑造的瑞普·凡·温克尔（Rip Van Winkle）这一形象。但19世纪最有影响的觉醒文学，同时也是最先在中国读者中留下深刻印象的文学类型，当属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的《回头看》（*Looking Backward*, 1888）。^②

59 《回头看》中的叙述者既不是一名外国人，也不是一位胡须半白的老人，而是一位名叫朱利安·威斯特（Julian West）的年轻人，他偶然服用了安眠药水，于是睡了113年，在2000年醒过来。年轻的威斯特醒来之后发现，世界成了19世纪末那些关于社会、政治和技术进步的新兴观念的模仿画：一个由理智主宰、因为工业而变得繁荣、建立在集体主义原则之上、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世界。这一景象吸引了创作过它的世界，不出10年，《回头看》就被译成了所有主要语种，并激发了一个有组织的大众运动，来支持进步的国家社会主义。^③这篇小说激起了其他作家同样强烈的反乌托邦反应，他们赞同贝拉米那种前瞻性看法的许多方面，但不赞同他那种简单

① 莫赛尔在该书封面放置了一条莱布尼兹（Leibnitz）的铭文：“现在是未来之母。”克拉克（I. F. Clarke）称该书是“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未来故事”。Kumar 1987: 38.

② Bellamy 1888. 贝拉米1898年去世时，有人说就其生前的社会影响而言，他的作品超过了卡尔·马克思。几十年之后的1935年，杜威（John Dewey）将《回头看》列为19世纪继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最有国际影响的著作。Kumar 1987: 136.

③ 到1891年，贝拉米作品激发的运动，仅在美国一地就已建立了165个“民族主义俱乐部”，创办了两份专门刊物。Kumar 1987: 133—134. 1889年，一名贝拉米的崇拜者声称，有50家报纸和杂志可以被视为该运动的支持者。1891至1896年间，该运动通过人民党（the People's Party）直接参与了美国的政党政治。Bowman 1962: 第五章。

的乐观主义。在写于 1889 年的《乌有乡的消息》（*News from Nowhere*）里，威廉·莫里斯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在《当沉睡者醒来》（*When the Sleeper Wakes*, 1898—1899, 1910 年再版时改名为《沉睡者醒来》）一书中，威尔斯（H. G. Wells）对贝拉米的觉醒作了悲观的解读。^①

最初的英文版推出 3 年之后，《回头看》就有了连载形式的中文版。从 1891 年 12 月到次年 4 月，美国传教士林乐知（Allen J. Young）和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在其《万国公报》上刊载了该书的节译本。它给人们留下了广泛而深刻的印象。《万国公报》的订户数量很可观，据说在最多的时候，每期发行三万九千多份，并且有很多次，听众的人数也同样多（杂志通常在茶馆里被大声朗读，人们也在乡村的公告牌上阅读它们）。^②碰巧的是，这份刊物的到达刚好与人们对青州小型教会博物馆的光顾相匹配，后者正好在连载版的《回头看》出版前后对参观者开放。与青州博物馆一样，这份刊物深入到了“将从中产生中国未来的统治者、领导者和教师”的儒生阶层。^③贝拉米的书付印后，掏钱购买的人当中有一些富有影响力的清廷官员，还有一批在命运不济的戊戌维新运动中崛起的改革者，包括谭嗣同、梁启超和康有为（康有为曾经订阅了 8 年《万国公报》）。^④ 1903 年和 1904 年，《回头看》被翻译成日文，吸

① Wagar 1988, 106—125.

② 《万国公报》最早出版于 1875 年，其前身是教会刊物《教会新报》。它最初的英文名字是 *The Globe Magazine*。经过 6 年的休刊之后，1889 年，它以 *Review of the Times* 这一英文名字再次出版。Cohen 1974, 293; Bernal 1976, 第二章。中译本以《回头看》这一标题刊出。Ma Ruiran 1991, 13—14.

③ Whitewright 1893, 240.

④ 马芮兰 1991, 13—14; Bernal 1976。康有为自传中，首次提到征订 *Review of the Times*，是在 1883 年。见康有为 1967, 38。

引了新一代留日学生的注意，通过勤工俭学项目居留法国的中国学生，也能够读到法文译本。^①

60 这本书的吸引力部分在于它与古典传统中的理性乌托邦的共鸣，部分在于它将这个理想世界投射到了不远的将来。这一结合本身并不新奇。就在不久之前，太平天国运动已经作出宣示，欢迎儒家“太平”时代的到来，即使是正统派学者，也开始为儒学原理中的循环或退化的“时代”注入向前的动力。不过，《回头看》还是将这一趋势推进为一种单线的历史进步观。^②在《仁学》（1896）一书中，谭嗣同转向儒学和佛学经典，努力在学者们之间确立一些关于中国伦理传统的主张，解决将民族—国家纳入普遍的世界秩序这一问题。“地球之治也，以有天下而无国也。”谭嗣同这样宣称。然后，他将《礼记》和《回头看》中的内容糅合成一个形象，即一个“无国则畛域化，战争息，猜忌绝，权谋弃，彼我亡，平等出”的世界。谭嗣同完全清楚，自己的想法源于两方面的启发。“若西书中百年一觉者，殆仿佛《礼运》大同之象焉。”^③毫无疑问，贝拉米从未提到过《礼记》。正是中国的改革者们醒了过来，并用新的眼光来看待自己本土的文献传统。

文献传统中曾经长期包含着它自己的梦寐和觉醒。它们担负着一种教育功能：在中华帝国的故事和戏剧中，爱情和发财梦警示着人类欲望的虚无，噩梦预示着惩罚，如果不道德的家伙不改正自己

① Hirai 1903, Sakai 1904. 关于与法国的联系，见 Zarrow 1990: 78.

② 围绕着中文版《回头看》的时间观念，康有为开始将传统三世说（据乱—升平—太平）的退化顺序改造为进步顺序。H. Chang 1987: 50—55.

③ 谭嗣同 1984: 215—216. 译者认为谭嗣同此处指华盛顿·欧文的《札记》中的瑞普·凡·温克尔，但阿里夫·德里克正确地指出，应该是贝拉米的《回头看》。Dirlik 1991: 56.

的行事方式，惩罚就将落到他们的头上。在故事中，梦中冒险通常将主人公从低级层次的乌托邦世界带到浪漫和成功的高级生活中，在那里，他娶了一位美丽的少女，生了许多孩子，拥有巨大的财富和社会地位，也许还在朝廷发挥着影响。然而，醒后的情节往往是做梦者回归其寒碜境地；梦的无益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教训。^①在史诗故事中，梦也成了一种媒介，以传达来自冥界的信息，宣布不可违背的天意。不朽史诗《水浒传》的所有标准版本，都以关于天意的梦为特征。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结尾是一批造反英雄被号召起来违抗天意。^②不管主人公是从个人飞升的无益梦寐中醒来，还是从传达上天信息的梦中醒来，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觉醒都为主人公启蒙，使他看到事物之间的一种预先注定的秩序。在传统的故事里，醒悟到白昼世界的现实，就是对普遍的道德秩序的醒悟，实际上，从中找不到任何“出路”。

这在20世纪发生了变化。世纪之交过后出版的故事当中，有许多关于觉醒的叙事，它们为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预告了必将面对的未来。它们拟想的未来不同于爱德华·贝拉米为波士顿所作的美好预言，但也只能引起读者对传统梦寐叙事的模糊回忆。世纪之交最61
受欢迎的两部小说，都是关于梦寐的叙事，非常鲜明地传达了发现“出路”这一意思。刘鹗的通俗小说《老残游记》在1903年—1907年间以连载形式出版，其楔子是一个梦，主人公在梦中看见了即将来临的劫数。老残梦见一艘轮船连同其乘客和船员正处于沉没的危险之中，他于是觉悟到一种使命感去校正这艘船。老残的觉醒，促

① Knechtges 1973: 101—119; R. Hegel 1988: 1—10.

② 金圣叹的70回本由赛珍珠(Pearl Buck)译为英文，并取名为《人人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见Buck 1958; J. Wong 1972; R. Hegel 1988: 4。

使他去谋划一项民族再生的计划。曾朴那部同样流行的小说《孽海花》(1905),呈现给读者的是一群骄奢淫逸的人,他们醒来后发现,自己寄身的小岛正在沉没。岛民的觉醒就是中国即将面临的命运的瞬间透露,假如故事中所揭示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不能得到注意和改善的话。^①

这一主题也进入了短篇小说中。1904年,在一篇广为人知的短篇小说《新年梦》中,著名教育家蔡元培采用了觉醒这一工具。这篇小说使用的讽刺技巧,只有非常熟悉觉醒故事的叙事习惯的读者才能理解。故事将正在作时间旅行的叙述者放置于过去,以便使他梦见的未来正好与故事本身的真实时间一致。按计划,新世界的开端将始于1904年新年(小说出版的那一年)。在梦中体验了恢复青春的愿望之后,叙述者觉醒过来——此处熟练地使用了倒叙,这是觉醒叙事的新惯例——发现一切都没有改变。^②到20世纪初,关于不可摆脱的、预先注定的命运这一旧式觉醒主题,已经呈现出了最令人恐惧的面相。

在这里起作用的显然不只是梦寐叙事文学传统的唤起,也不只是欢庆进步的文学传统的唤起。在晚清时期的哲学中,进步主义演变观已经发展为进化主义宇宙论,但却没有产生同样的恐慌感。贝拉米《回头看》一书中预想的转变,也不仅是进步的,而且是有益

① 在关于梦寐和觉醒的流行故事中,即使是欺骗性的女妖精、鬼怪和狐狸,也促进了民族的形成。徐讦《鬼恋》中的主人公最终有了一个可怕的发现:由于国民革命的失败,原本俘虏其心灵的魅影美人,已经变成了一个鬼怪。在《鬼土日记》(1931)中,张天翼以一种更缺少浪漫的笔调,采用鬼怪题材这一陈旧手法,暴露了民国议会政治的伪善和变味。通过寓言式的倒置,读者在这里看到了一个非驴非马的世界。Dolezelova-Velingerova 1988: 122—123, 188—189, 211—214, 218—220.

② 引自 Dirlik 1991: 66—69。8年之后,蔡元培被任命为民国政府教育部长,获得了一次实现其梦想的机会。

的。^①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故事的觉醒，也是种种关于向下沉沦的故事：它们为读者预告的不是即将到来的辉煌，而是即将面临的耻辱，如果他们不在当前立即觉醒，而要延迟到未来的某个时候的话。刘鹗、曾朴、蔡元培勾勒的觉醒都是一种启示，人物的真实形态、他们当前处境的本质，以及作用于他们身上的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特征，都展现得一览无余，所有人都可以从看到这一切。其中的觉醒高潮起到了双重作用，一是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熟悉的世界，二是使主人公在阅读行为本身中觉醒，赋予他们一种能力，使 62 他们从束缚自己的镣铐中自我解放出来。

尽管如此，一场文学的觉醒还是不够的。中华民族觉醒的故事，既不是关于梦寐的虚无的道德剧，也不是光靠情节要素取胜的叙事。过去和未来都没有提供任何与其本身相应的安慰。新式觉醒故事中预想的解放，只是人类力量的产物。故事中的觉醒号召人们将书本扔到一边，去抓住时间，去参与整个世界。它们是稍后关于个人、阶级、性别和民族觉醒的叙事的原型。这些叙事预测，人们将觉悟到自己的处境中内在的可能性，并在这种觉醒中发现一种意志，去创造一种自己选择的未来。就像《孽海花》中的骄奢淫逸者和《老残游记》中的愚人船一样，国民革命的策略也鼓励沉睡中的民族觉醒起来，去省悟自己被束缚的本质和原因，并在革命中发现一条“出路”。

拿破仑与龙的觉醒

“沉睡的巨龙”这句与中国有关的名言，现在传说出自拿破仑之口，但十有八九，他从未说过这句话。在他有记载的演说和文字作

^① H. Chang 1987.

品中，没有任何地方提到了沉睡的龙，也没有提到假如中国突然“醒来”之后世界将面临的可怕命运。这句话是19世纪初围绕拿破仑形象出现的一则口头传说的一部分，这则传说叙述了他一生成就的力量和局限。这则传说暗示，欧洲在拿破仑的统治下已经觉醒了，但遥远的中国却还没有觉醒过来。目前，中国是欧洲人在想像中投射自我觉醒的希望和恐惧的东方荧屏。尽管如此，这则传说预示，就是中国也终将觉醒，因为拿破仑勾勒的景象，以及在他的帮助下释放出来的力量，并不是狭隘的欧洲性的。现代欧洲的觉醒预告了世界的觉醒。如果拿破仑自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那就需要别的人代他说出来。

对中国而言，这则传说同样意味着，民族的命运取决于被一个具有拿破仑那种眼光和境界的英雄——或者是中国式的拿破仑来唤醒。当历史在面对自己那伟岸的领袖而惊得发呆的一瞬间，进步民族主义的群众政治便获得了最佳的写照。1803年，黑格尔在写给出版商的一封信中记录了自己对拿破仑的印象，试图捕捉那一时刻，当时拿破仑正骑马经过詹纳（Jenna）镇：

63 我看见皇上——世界的灵魂——骑马通过这座城市，检阅他的军队；见到这样一个人，确实是一种奇妙的感觉，这里集中谈一点，他骑在一匹马上，驰骋于整个世界并统治着它。^①

正是集中于单一支点的历史给了世界进步的动力。但真正的英雄是人民。在承担英雄的角色时，拿破仑的有利之处在于，他的出生、体形和教育都很平常，因为他是一个支点，普通人借此来影响自己的命运。换句话说，拿破仑是一个英雄式的代表性形象。^②拿破仑

① Kauffman 1965: 315; 引自 Fogel 1989: 183.

② Guerard [1924] 1968: 146.

这一形象化解了唤醒者与被唤醒者之间的紧张关系：伟大领袖一度是人民的代表，一个遥远的形象，其英雄地位促使他去唤醒自己所代表的人。在被拿破仑唤醒的过程中，人民唤醒了自己。

至少，这就是拿破仑形象在中国的民族革命中的意义。在1918年的某个重要时刻，孙中山在一篇文章中试图证明自己对革命党的领导权，他说：

一国之趋势，为万众之心理所造成，若其势已成，则断非一二因利乘便之人之智力所可转移也。夫华、拿二人之于美、法之革命，皆非原动者。^①

次年7月，年轻的毛泽东对德国皇帝的地位作出了极为类似的观察：“我们莫将德国的穷兵黩武，看做是德皇一个人的发动。德皇乃德国民族的结晶。有德国民族，乃有德皇。”^②与康有为、梁启超和蒋介石一样，毛泽东也将拿破仑视为伟大的有着众多支持者和批评者的大众领袖的最高象征。^③与对拿破仑的评判一样，他们不是把自己看做革命的发动力量，而是将自己视为“民众心理”的历史受益人，后者使他们闻名全国。在孙、蒋、毛的自我评价中，他们都与拿破仑、华盛顿或者德国皇帝一样不重要。他们只是一个觉醒过来的民族的代表符号。

他们也受益于关于一个英雄式的领袖的理想，后者是从晚清思

① 孙中山 [36]。英译内容基于孙中山 [27]：262。关于孙中山在确保其领导权方面的困难，本书第五章将会讨论。

② 毛泽东 [2]：365。

③ 关于康有为，见 Croizier 1968：62，康有为 1935：428，1958：256。关于梁启超，见 H. Chang 1971：243—245。关于孙中山，见 Schiffrin 1970：15。关于蒋介石，见 Vishnyakova-Akimova 1971：166，Widmer 1977：118，Lary 1975：79，Vorontsov 1989。关于毛泽东，见 Schram 1967：25。关于拿破仑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最令人奇怪的方面，是他在自省性的毛泽东传记中所扮演的当前角色。见 Leys 1991。

想中独立发展起来的。19 世纪的今文经学，将孔子描绘成通过道德说教来灌输理想的政治制度的圣王形象——与此前强调榜样性的内在自省的新儒学倾向相反。古文经学则将君王式的孔圣人投射为一个更接近于拿破仑式的英雄。这是一个呼应时代的英雄，有清晰的眼光，能够看清需要做些什么，并且有勇气去做，毫不顾及传统的限制。^①民国初期，对这种英雄的吁求超越了立宪派和革命党的界限，在庆祝英雄形象的业绩的杂文、故事和歌曲中得到了表达，这些形象摹自于欧洲历史的市民万神殿中。拿破仑和华盛顿的名字被嵌入了民国国歌（the Song of the Republic）之中，歌中恳求这“两位自由之子”“化身”于中国人民之中。^②

20 世纪的中国，尽管胸怀抱负的拿破仑和克伦威尔出现于许多种书中，但在有记载的中国历史中，早期的改革家们却难以找到多少有关拿破仑式的形象的证据。古文经学的门徒梁启超* 草拟了一份欧洲历史上“冒险者和英雄人物”的目录，以证明英雄是民族文化中固有的英雄精神的化身。当他遍览中国历史，以寻找一个拿破仑、威灵顿（Wellington）或华盛顿式人物的痕迹时，他却失望地空手而归。他得出结论，中国古老的文化不能滋育英雄，在一个拥抱众多英雄式人物的世界，这是一种令人担忧的无能。当各个种族正在为生存而竞争时，一个缺乏拿破仑精神的民族必定要消失：“有了它，人们便活着；没有它，便是死。有了它，国家便繁荣；没有它，国家便腐朽。”^③梁启超没能在中国发现任何具有拿破仑那种地

① H. Chang 1987: 20.

② Cantlie and Jones n. d. , 167.

* 就师承关系而言，梁启超属今文经学。——译者注

③ 梁启超 1953: 226—238, 1978: 22—29。

位的历史形象，主要是因为他翻检的精英历史几乎不为他们提供任何准备。在一个不准备任何进步，一个将历史进程归结为命运而非具有意志力的人类的世界中，是没有拿破仑的适当位置的。为了觉醒，就像拿破仑传说中预示的那样，中国人民需要将自己重新组织为一个民族，并为自己的拿破仑留出位置。

文学和时尚、历史和流行故事中自称的觉醒，都期望着孙中山或毛泽东那样的政治领袖的马基雅维利式干预，他们关于民族的呼声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们寄身于隐喻和题材中，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独立传播的。孙中山或许后来披上了一件时髦的外衣，呼唤自己的同胞们觉悟到一种光荣的未来，但国民党人对时尚的控制还比不上他们对传言的控制，国民革命之前一连串的鼓动性作品，已经为梦寐和梦想家开辟了一块空间。

“现在所怀之理想，又为将来所行实迹之券符”，世纪之交的梁启超如是说。在走向国民革命的几十年间，梁启超写下了许多格言和箴语，在自己的同胞当中助长一种更富有雄心的梦。“未来者现在之父母也”，他建议说，“现在所行之实迹，即为前此所怀理想之发表”，并且“一个人做梦越多，其希望就越大”。正是梁启超作出论断说，只有拿破仑那样的梦想家才可能征服世界。^①梁启超、曾朴、刘鹗，以及他们那一代醒过来的作者们，设想了一个梦想家并做了一个梦；与此同时，孙中山带着一批梦想者到来了，他们将要引导并指点（中国的）道路。

列宁终将取代拿破仑，成为时代的代表性英雄。1923年，孙中山开始谈到列宁，他对列宁的尊敬甚至超过了对拿破仑的尊敬。在反思自己对国民运动的领导时，孙中山提到了列宁。“他们取得如此

^① 梁启超 1953：226—238。

彻底的成功的原因，”1924年孙中山这样评论布尔什维克，“在于俄国产生了革命圣人，那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列宁；他们组织了革命党，并提倡应该由革命党而非党员个人享有自由。”1924年，孙中山采纳了列宁的模式，正如6年前他对拿破仑那样，支持一种绝对忠于他个人、完全服从其政党的请求。^①列宁那种鲜明的党组织风格，为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提供了模式，他的领导风格，也使他成为中国国民党人心目中继拿破仑之后的合适的继任者。如果这条巨龙如预言般觉醒过来，那现在，中国就需要寻找自己的列宁。

在现代中国的觉醒过程中，关于拿破仑式英雄的地位的最后一句话，应该留给国民革命的最机敏的观察者——杂文家鲁迅。与孙中山一样，鲁迅曾经一度立志学医，但他后来转向文学，试图医治民族的文化幻觉。其中一个幻觉便是顽固的拿破仑传说。1934年，在关于拿破仑和隋那（Edward Jenner，今译詹纳）的一篇杂文中，鲁迅抱怨说：

我认识一个医生，忙的，但也常受病家的攻击，有一回，自解自叹道：要得称赞，最好是杀人，你把拿破仑和隋那去比比看……我想，这是真的。拿破仑的战绩，和我们什么相干呢，我们却总敬服他的英雄。……自从有这种牛痘法以来，在世界上真不知救活了多少孩子，——虽然有些人大起来也还是去给英雄们做炮灰，但我们有谁记得这发明者隋那的名字呢？杀人者在毁坏世界，救人者在修补它，而炮灰资格的诸公，却总在恭维杀人者。^②

鲁迅谴责中国那些像拿破仑一样的“杀人者”，其实是用典型的隐蔽

① 孙中山 [11]：733。

② 鲁迅 [1934] 1980：138。

手法来指称蒋介石和国民党人。但至少在这篇文章中，他并不想批判某个政治焦点。鲁迅对坚持赞美杀人者的人，比对杀人者本身倾注了更深切的关注。最让他感到担忧的是，拿破仑的权威不是源自于他的个人意志，也不是源自于他的军事威力，而是源自于公众的同意，也就是说，源自于他作为代表性形象的地位。鲁迅质疑拿破仑的军事成就与“我们”——中国的市民社会有何相干，既不是质问拿破仑，也不是质问蒋介石，而是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传问社会，质问那条联结民众与其统治者的纽带。要回答这个问题，仅仅参考一下军队和政治家们是不够的。它是一个伦理问题。 66

第二章 一个世界，一个中国： 从伦理觉醒到民族解放

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当今之世，宜有大气量人，从哲学、伦理学入手，改造哲学，改造伦理学，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毛泽东，1917 年^①

星光灿烂，路路通畅，那样的年纪是幸福的——星光照亮了他们的道路。在这样的年纪，任何事物都是新鲜而熟悉的，充满冒险，但自己又能驾驭。世界如此广阔，但又像一个家，因为在心中燃烧的火焰在本质上与星星一样。

卢卡奇，1920 年^②

一位隐居学者的精神崩溃，永远不可能在中国的国歌或国庆典

① 毛泽东 [9]：132。

② Lukács 1971：29.

礼中得到纪念。1877年，康有为一得知祖父去世的消息就病倒了，随之导致他个人的突然觉醒，这一情形足以与近代中国的觉醒相类比。康有为并不是中国第一个关注国家困境的近代哲学家；在许多情况下，他想出的解决办法都不是根本性的。当然，一个民族也不单是由哲学家空想出来的。不过，康有为是第一个这样的儒家，他亲口讲述了自己的故事，可以说，他经历的精神崩溃比得上整个文明的崩溃。在觉醒时刻，康有为对自我的过分理性的重构，为中国作为一个“觉醒”民族的理性重建提供了典范。^①从逻辑和历史的角度看，自我觉醒先于国家的觉醒。

托马斯·尼普迪(Thomas Nipperday)曾经指出，现代的自我发源于欧洲，发源于一个崩溃文明的碎石堆中，这个文明曾经将它从一种“具体而生动的传统”中解放出来，但仍让它感到漂泊不定。有关自我发现的欧洲文学揭示了这一环节的两个方面：个人解放的快慰体验为可怕的人的异化所抵消。^②帝制时期既存秩序的崩溃，推动中国士人走上了自我发现的同样旅程。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探索都是独自的行程，既提高了启示的强度，也加剧了疏离的痛苦。文学传统的情感因素，鼓励中国的文学旅行者将自身的异化解释为“个人灵魂的觉醒”。^③同时，自我的觉醒培育了人们对各种新形式的共同体（它们当时还未觉醒）的渴望，鼓励人们重新思考经典伦理作品中自我与共同体的关系。

在这里，伦理应该被理解成一种将自我与“星星”联系起来的

① Frederic Wakeman 写道：“康有为的觉悟宣告了现代中国意识形态的诞生。”Wakeman 1973: 122.

② Nipperday 1983: 4, 9—10.

③ Hsia 1968: 26.

普遍秩序中的导向行为，被理解成为人类共同体建立根基，并为其建立道德原则。自传式的伦理勾画出了一个关于自我觉醒的故事，以及新的伦理共同体的理性重建——这个故事预期的理念，概括地说，就是中华民族同样期待着自己的觉醒和解放。理性民族主义(rational nationalism，因缺乏一个更好的术语，我们不得不使用这个词)的基础是乌托邦式的想像。^①

1877年祖父去世时，康有为刚好20岁。在随后的两年中，他或者将自己锁在家中，不见任何朋友，或者躲到广东的西樵山中沉思。对康有为来说，这是一段启示的日子：“（静坐时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则欣喜而笑，忽思苍生困苦，则闷然而哭。”对其他人来说，这是一段疯狂的咒语。其同窗见其“歌哭无常，以为狂而有心疾矣”。康有为最终学会了控制自己的疯狂，慨然下山，决心要消灭人间的苦难。他的主要著作《大同书》的思想，也起源于这一时期。^②

对康有为来说，《大同书》在1902年的完成，标志着20年反思、研究和写作的高峰，尽管此前的7年里，政治事件的疯狂冲击一次又一次中断了他的反思和写作。1895年，《马关条约》将台湾、辽东半岛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进京参加会试的举人们对该条款提出抗议，北京发生了第一次学生示威运动，这时他站在了运动的

① 在描述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工具主义环节时，别的术语也被用来指代“理性的”，并且，有些形式的民族主义根本谈不上理性。见 Brass 1976。此处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民族主义思想中的工具主义环节。

② 康有为 1967：32—42。在其父亲死后，康有为其祖父抚养大。《大同书》始写于1884年，基本完成于1902年，但在1912年民国成立以前，只出版了部分内容。（经过修订的）完整版本出版于1935年。

前列。^① 当时已经 37 岁的康有为，也利用这个机会上书朝廷。尽管这份上书未能到达皇帝手中，但关于康有为的改革建议和他在年轻士人中间的声望日增的种种消息，却不可能长期被隔离于宫廷之外。不出 3 年，康有为就得到了邀请，去帮助光绪皇帝从宫廷开始发动一场广泛的改革运动。改革受到了阻挠，结局很悲惨，康有为被迫于 1898 年 9 月逃离祖国，以躲避掌握宫廷权力的保守派的狂暴行为。这是一个痛苦的时刻：康有为失去了弟弟康广仁，后者被斩首处死；清廷则丧失了根据自己的主张从内部革新自身的希望。到 1890 年代，革命者完全不再以儒生自居。从此以后，他们的目标就指向了儒家的帝国体系，以及满洲人的清王朝。^② 69

康有为曾经被邀请去帮助皇帝，因为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个激进的儒生，其作品反映了当时许多儒家学者所关心的问题。康有为从自己的老师朱次琦那里获得了粤学的融会贯通方法；在使自己熟知汉学（经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的同时，他也在宋学和汉学的相互对立的传统中吸取营养。他借鉴了大乘佛教，以及正在复兴之中的不那么正统的古典哲学（先秦诸子）学派。在支撑着儒学和佛教的普遍关怀和对自己祖国的不协调的“特殊”关注之间，其研究始终成功地保持了一种平衡。^③ 从其最初的反思开始，大同世界的思想对于康有为来说，就至少与中国的观念具有同等意义。他用

① 《马关条约》签订于 1895 年 4 月 17 日。除了割让辽东半岛与台湾，后辽东半岛因三国还辽被退回之外，该条约还承认了朝鲜独立，2 亿两白银的赔款，重庆、苏州、杭州、沙市 4 个港口对日开放，以及日本人在中国普遍开设工商企业的权利。徐中约 1990：341—343，Jansen 1975。译者按，《马关条约》中，中国割让给日本的是辽东半岛和台湾，后由俄国等干涉，中国只割让了台湾。

② Spence 1982.

③ H. Chang 1987：21—26.

了20年的时间，才找到一种方式，将中国这一特殊的关注点安插进一个普遍的大同哲学中。

历史学家张灏注意到，康有为早期论文中最激进的主张，起于对儒家关于同情即“仁”的概念的始终如一的评价，起于他试图将其与同源的“义”、“礼”概念区别开来的习惯。康有为颇为服膺的著名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在其哲学中将“仁”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但并未想到将它从更大范围的儒家语境中拔出来——儒家通过承认社会等级的存在来调和人们的同情之心，通过运用社会约束来限制它的应用。无论如何提升，董仲舒的“仁”的概念，仍然适应了家庭等级秩序和类似的帝国等级：心灵将仁爱一点点施予别人，给每一个人他应得的东西。

然而，康有为的同情没有任何界限。他用儒学语言将三纲五常压缩为“仁”、“诚”理想，并把孟子的四德简化为单一的“仁”。^①在这种重塑中，家庭和君主制国家都受到了挑战。康有为在一种古老的伦理传统中写作，但他也自觉地将一种极为不同的想像世界的方式引入传统中，世界在这种方式中发现了自己。佛教不加区别的同情理想，墨家的兼爱、博爱观念，普通公民的启蒙观念，都汇集于儒家的语言中。

康有为不加区别的自我最初并不等同于民族。自我和民族达到一致是在20世纪的头25年间逐渐实现的，这一时期，自我觉醒过来，认识到自己不仅是人，而且具有近代中国的公民身份，滋生了自我的文学传统，它所唤醒的世界，以及文本和世界强加在醒来的自我身上的身份认同，都努力强迫自我去为公众服务，并利用伦理

① H. Chang 1987: 29—30, 46—48. 五“常”关系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妻、朋友关系；三纲，董仲舒解释为君臣、父子和夫妻关系；四德则是仁、义、礼、智。

来进行民族建构和国家建设。到1920年代，经历了“自我觉醒”的年轻人遇到了一个清晰可辨的中国式“自我”，围绕着一个民族国家的理想，它与自己的共同体连在一起。

这一局面既非偶然，也不是不可避免。觉醒的自我有一部伦理的历史，新中国同样如此。此处我们将探索一部松散的历史，从康有为对自己裸露在星空下的“身体”的发现，到国民革命中公民和爱国者的觉醒，并从自我的历史中勾勒出作为一个伦理共同体的近代中国历史的轮廓。在这个时代，艺术家将狮子画成觉醒的样子，作家们承担起了宣传的责任，哲学家们在街头分发传单。伦理和小说中的自我觉醒文学，为自我披上了公民的外衣，并用爱国主义的旗帜来装饰它。到1920年代，自我仍然可以抖去身上的衣服而“觉醒”过来，但当它发现自己原来是赤裸着的时候，其震惊程度，再也无法与置身于西樵山迷雾中的康有为相比了。

伦理的功能

伦理在中国民族主义中的突出地位，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者的作品中很容易得到阐明，但这种突出地位的解释，却无法在伦理自身中找到。部分的解释是历史性的。神圣的儒学于1905年被从教育体系中驱逐出去，1912年又被驱逐出民国的世俗典礼，这都预示着民国初期是一个“乱”世。无论如何，儒家伦理都被认为与此有关：有人认为它未能尽到责任，因为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削弱了它；也有人认为它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仍然像一个古代家庭的诅咒一样，继续给新中国投下阴影。不管怎样，在民国初年，伦理问题始终是争论的中心。新文化运动的觉醒是一次摆脱过时的伦理体系的觉醒，就此意义而言，它意味着一种对新的觉醒的觉醒。按照新文

- 71 化运动的一名旗手在 1916 年的说法，伦理的觉醒是“最后觉醒的最后觉醒”。^①

伦理在中国民族主义中占据主导地位，其中的进一步原因，可以在伦理和民族主义共通之处，亦即它们对统一的类似要求中寻找。历史学家钱穆曾经满怀渴望地回顾中华帝国的历史，他注意到，惟有伦理才使中国能够团结在一起。中国的“文化”与其他任何文化都不同，因为从西方的意义来看，它根本就不是一种文化，而是一种伦理体系。正如钱穆在与邓尔麟（Gerry Dennerline）的讨论中所解释的：“在西方人看来，文化与地域相连，各地的风俗和语言就标志着各种文化。但对中国人来说，文化是普遍性的，语言和地方风俗只代表某一地方。”中国人所特有的文化背离了习俗、语言和地点方面的排他主义；相反，它与“礼”这一普遍的伦理原则连在一起。

钱穆认为，西方语言中没有与“礼”一词相当的词汇。它是一个普遍的概念，应用于全中国的日常行为标准，并将中国文化与所有其他文化区别开来。钱穆解释道：

正因为西方文化中没有“礼”这个概念，你们只是用风俗的差异来区分文化，似乎文化只是其影响所及地区各种风俗习惯的总和。如果你要了解中国各地方的风俗，你就会发现各地的差异很大。即使在无锡县，我成长的荡口的风俗，也与我在战后任教的荣乡不同。国家的这一端与那一端的差别就更大了。然而，“礼”是一样的。“礼”是家庭的准则，管理着生死婚嫁等家庭内外一切事务，同样，“礼”也是政府运行和国家仪式的准则，统辖着一切内外关系，比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征

^① Dirlik 1978: 38.

兵、缔约、继承等等。这是理解中国文化的惟一途径。^①

“礼”是康有为清理伦理传统时的最初对象，并在新文化运动中再次受到攻击。但是，上述任何一种情形都没有触及伦理的统一规则。地方的氛围和体验帮助区分了中国内部的不同人群，但它们几乎无法区别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人。这就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关注的身份认同的层次。无锡县的本地人可能以“荡口”或“荣乡”为家，但作为中国人，他们需要一种新的、独特的伦理体系，以使中国成为一个家。

在伦理、地理和人口等民族主义者的想像范围内，中国的地形和社会共同体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它们有太多的分界。甚至是地形，也借由巨大连绵的山脉和宽阔、湍急且无法通行的河流，似乎注定要抵抗其民族的（统一）命运。像人民一样，土地也要求实现自身的统一。人民通过教育被唤醒，而借助锯子和挖土机，铁锄和锤子，道路滚筒和蒸汽火车，地形也随着“建设”的节奏而被“唤醒”。孙中山制定了精致的计划，设想通过修建隧道、公路、巨大的运河和深海港口，将国家统一起来。1912年，他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自己就任铁道部长，但他并不认为这是降职。孙中山在民国时期发表的最长、最精详、在许多方面都很连贯一致的作品，就是有关河港和海港、运河和道路、铁路和桥梁的基础设施发展规划。^②

72

文化的风景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障碍和统一的象征。民族主义的

① Dennerline 1988, 9.

② 1918年和1919年，孙中山退出政治期间，在上海用英文准备了这个主题的大部分内容。他设想中国将有100万英里公路，10万英里铁路，和3个新式港口。他的计划包括开发浦东。1990年代，中国政府决定开发浦东，孙的计划得以再现并实施。见作者对浦东新区有关设计者的访谈，上海，1992年7月。孙的设想，见孙中山[20]：127—360。

文学追求普遍和典型的东西。甚至当它赞美语言、服饰风格、行为准则以及故事的舞台背景的差异时，它也渴望标准化。诗歌和新小说在描绘地形的自然特征时刻意避开其地方特征，或者最好让个性转变为一种地形的隐喻：除了作为空间观念的一个普遍特征之外，其中根本没有个性的容身之地。这样做也有其根源。在绘画和诗歌中，帝国的精英文化将帝国权威表现为一系列关键的地理特征，一代又一代人沿着帝国的官僚体系遭遇到它们：神圣的群山，湖泊，陡峭的岩石，独特的树种和林林总总的奇花异草，其个性通过语言和风格的标准化得到了调和。帝国官僚从一个任职地前往另一个任职地，途中确定了许多宗教性和文化性的纪念碑，围绕着它们的线路勾勒了民族的地形。现代公民使同样的场所民主化了。从1920年代起，普通公民开始到九大圣山朝拜，到桂林和西湖旅行度假。1930年代，他们开始在唐宋年间的雕刻碑铭前摆姿势照相。

在文学作品中，地形和地方文化的独特性，都被从空间抽象出来，并被表现为民族的标志性特征。1920年代，在大都市报纸上发表的每一首诗歌都不断地提到天空、云彩、群山、鲜花——主要是菊花——提到四季及其影响。不过，这些自然的特征几乎很少被命名，也很少能够找到它们的确切所在。小说中的这种抽象倾向，给下一代读者留下了一个“抽象的形式主义”印象，并且催生了一种强调“地方色彩”的现实主义回应。^①甚至在那时，地方个性主要还是突出了一个新的虚构主体——民众——的普遍特征。依附于地方被认为是中国农民的典型特征。以在小说中塑造典型农民为目标的作家们，不得不“辛勤地关注其性格中独特的文化和语言特征”，以

① 揭示这种地方主义回应的著名人士，有沙丁、艾芜、吴祖缙、萧红、端木蕻良和沈从文。M. Anderson 1990: 190—191; Kinkley 1987.

使他们具有普遍性而非独特性。^①独特性最终在中国人民的普遍性中找到了一个位置。

差异将人民分离开来，但伦理将种种差异连接起来。考虑到地方语言和习俗的多样性，而且它们可能培育一种“排他主义”的忠诚感，人们通常不愿完全放弃普遍伦理原则的理念。因此，古老的伦理是各个追寻新伦理的搜索队会聚的终点。直接的灵感经常来自文本外的事件：来自战争和疾病，来自肉体那模糊的、不可抗拒的欲望，来自与自我的自发碰撞，来自为觉醒的自我在尘世定位的强烈愿望。普遍的原则得自于这些事件，后者则在前者当中发现了目的。康有为回忆自己1884年的自我觉醒时说：“日有新思，……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②康有为将新发现的自我安插进一个伦理体系中，后者不仅赋予其意义，而且为他有意的发现行动提供了一个框架。在进步的、程式化的推理中，康有为从乌托邦思想中发现了大同世界的理想，并重新赋予了它一个新的角色。

共同体、理性和“意识”

《大同书》以一种自传性的序言作为开头；文人学者通常将这种序言加在对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书籍之前。^③正是在这本书里，康有为解释了其大同世界的起源：他悲伤地目睹了自己所承受的苦难。他自我描述道：“康子凄楚伤怀，日月噫叹，不绝于心。”^④肉体

① M. Anderson 1990: 190.

② 康有为 1967: 41。

③ 顾颉刚 1931: 导言。

④ 康有为 1958: 63。

的本能反应，促使康有为去探索因孤独而凸现出来的问题，特别是将康先生的孤单身影与尘世结合起来的同情的本质。“吾自为身，彼身自困苦，与我无关，而惻惻沈详，行忧坐念。”康有为从反思自己的肉体及其对苦难的本能反应，导出了对共同体的需要；他把这一共同体视为自己能够为之感到痛苦共同体。^①

74 虽然康有为怀着强烈的感情，但他还是理性而有序地界定了这一共同体的各个阶段。他首先追溯了从个体的康先生到其家庭，然后到国家、地球和太阳系以及太阳系之外的宇宙——到“恒星、星云、星团、星气，以及诸天之表”——的层次上升过程，然后按照相反的顺序返回，并使自我回到极熟悉、极可爱的环境中。毕竟，在一个“积五千年之文明”的国度里，他是一位“十三世文学传家之士人”。在遨游宇宙并返回之后，康有为替理性的中国思想家共同体建立了一个伦理基础。但是，康有为渴望的共同体并不只是一个中国人的组合，而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理性思想者的群体。中国自身属于没有效率的范畴，是关于历史的正确进程及全球国家治理的清晰思路中的一个障碍。然而，甚至对康有为来说，程式化的推理也指出，中国国家权威的中央集权化，是通向大同世界之路的中间阶段。民族国家终将归入大同世界，但在目前，大同世界将存在于民族国家之中。

康有为热切地想表明，他那源于乌托邦想像的理念并非不现实。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实用主义者。康有为尽了最大可能，试图为觉醒的自我确定一个最后的共同体，然后又试图设想这一理想的共同体如何能在一个新的伦理和政治秩序中实现。^② 虽然大同世界的

① 康有为 1958：63。康有为此处参考了董仲舒的哲学著作。见 H. Chang 1987：32—37。叶绍钧在其小说中涉及了情感共鸣和界限划分的比较问题。见 M. Anderson 1990：93—118。

② 关于这种理性主义程序的风险，见 Heller 1988：导言；Benhabib 1986：8。

观念是自由流动的，但大同世界的实际身份系于实际获得的目标之上：它是可实现的共同体的最大化。^① 在这里，历史进步的理念给了他一点安慰。在传统用法中，大同世界是指过去的某个时代，现在则在年年退化。但在康有为的用法中，大同世界位于未来的某个时代，现在人们不幸背离了它，但尚有挽回的余地。康有为引入了有益的历史进步观念来支持自己的断言，即乌托邦思想与实践并非不协调。^② 想像、理性、进步和程式化的设计一道，能将一个乌托邦式的大同世界转变成一个历史的或者虚构的存在。

在为后继者所共享的另一种意义上，康有为的思想具有历史性。认同历史上偶然发生的伦理共同体，意味着认同历史超验主体的存在。当康有为觉醒的自我第一次融入宇宙时，他想像自己代表着一个集体性的主体在说话，后者迫使他责备那些使其遭受分裂的种种界限。历史是这一集体性主体的“作品”。但是这个主体是什么？康有为之后的实践哲学家们倾向于缩小其伦理共同体，首先将其范围从地球缩小到民族，或者缩小到中国的劳动群众。^③ 因而，康有为的学生和后继者的观点与他的差异，不在于乌托邦与事实、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差异，而在于他们那些相互竞争的评价，即何种理想共同体最有可能通过历史行动而实现；也就是说，其差异主要在于对历史行动主体的不同认识。不可避免的是，识别历史主体必将质疑假定的身份和最初的归附。如果历史是一个集体性主体

75

① 康有为 1958：80。

② 正如魏斐德 (Frederic Wakeman) 所说的，康有为的思想和行为之间的明显矛盾，“让很多历史学家感到奇怪”。康有为发现并运用了相对性和进化理论，它们在乌托邦和现实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联系。Wakeman 由此找到了解释这一矛盾的满意答案。Wakeman 1973：115—136。

③ 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个例外。见 Dirlik 1991。

的实现，那么，个体自我的身份就与更伟大主体的历史设计连在一起。在康有为之后，自我觉醒的恰当形式，只能是历史主体身份的觉醒，因此也是历史设计轮廓的觉醒。^①

康有为的大同世界坚决认同于理性，因而始终是一个乌托邦。在康有为的世界中，几乎没有历史事件的位置，也不能容忍任何特殊性，后者好像是被赋予尘世，而不是出于自身的安排。他的种种理想是“事先安排好的和谐体系”，在此意义上是乌托邦式的；但某人必须预先安排和协调好所有事情，在此意义上又是实际的。^②他的实践是一种实用的形式。实践不必产生被认为是“实际的”预期效果，因为当世界在本质上是非理性的时候，以失败告终的行动并非不足以信赖。乌托邦和实用是一对双生子。

我们注意到，关注实践是晚期儒学的一个突出特征。^③康有为成功地重新发现和改写了文献传统中的关键概念，使它们作为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一个明显中国式的实践理性乌托邦形象（在传统本身当中仅仅有微弱的回响），和世纪之交前后源自于欧美的理性乌托邦。虽然在细节上有些差别，但美国的爱德华·贝拉米和不列颠的威尔斯独自得出了关于理性乌托邦的相似图景。在他们的设想中，社会为对进步的信仰所推动，为团结的民族或人类“意识”所联合，为理性所统治，为技术精英所治理，从而永远消除了派系政治和分裂性的资本主义。^④更为独特的是，在中国，康有为促成了最后障碍的打破，使各种理性乌托邦在中国的接受成为可能，包括应用

① Seyla Benhabib 讨论了这个问题与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Benhabib 1986：第二章。

② Wagar 1988：107，1979.

③ H. Chang 1987：18—20.

④ Wagar 1988：116—117.

科学、圣西门和孔德、应用历史学、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无政府主义和列宁主义的应用政治学。

将康有为、无政府主义者和中国国民革命中的列宁主义者集合到一起的，是他们身上的强制性理性精神。大同世界的理想并不具有自然的和谐，其和谐是预先安排好的。那种通常与家庭、家乡和民族相连的情感纽带，对于正在思索美好生活的觉醒过来的自我而言，几乎没有什么价值。例如，康有为将家庭视为实现大同世界的阻碍因素之一。无政府主义者刘师培与何震呼吁进行一场“家庭革命”，使孩子离开父母的照顾，将妇女从家庭中解放出来。^①其他人则关注（如何）抹杀所有的特殊性。在蔡元培的短篇小说《新年梦》（1904）中，尘世充满了没有特质的人。那儿不仅没有君主和大臣、丈夫和妻子、父母和孩子，而且根本就不存在任何可能暗示某种不平等关系的安排。相反，每个人都“凭数字来识别”。^②无政府主义者在上海创办的劳动大学，显示了革命对社会和文化差异的宽容。这是中国为数很少的几所提供世界语课程的大学之一，并且是惟一一所使世界语成为学位必修课的大学。对于政治世界而言，无政府主义的意义，正如世界语对于文化和语言一样：这是一种没有非理性“界限”的理性政治，与之相应的是一种普遍的语言，它指向一个更理性的世界，而不是碰巧发现自己置身于其中的世界。^③

76

与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一样，康有为也主张一种奇怪的统治论社会观。在关于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中，彼得·查罗（Peter Zar-

① H. Chang 1987: 61, 178—179.

② 引自 Dirlik 1991: 68。亦见本书第一章。蔡元培的故事比 Zamyatin 的著名小说《我们》早了 20 年，后者中的所有角色都用数字来标记。Zamyatin 1972.

③ Chan and Dirlik 1992: 83.

row) 敏锐地观察到, 无政府主义者用来讨论社会的术语, 与传统学问中用于讨论国家的术语惊人地相似——特别是他们那种非常礼貌的语调, 他们对统治代理人(皇帝或人民)的善行的肯定, 他们对个人或局部利益的轻视。^①无政府主义者与中国的列宁主义者持有同样的信念: 他们不只反对国家, 而且对当前的社会构成表示自我忏悔。所有社会和文化的标志都将消失, 包括中华民族本身, 因为(正如康有为已经注意到的) 它们在人民之间建立了非理性的感情界限, 而感情束缚则是困扰中国和世界的问题的源泉。^②中国的无政府主义用理性统制论的社会观, 促成了康有为过于理性的伦理与以列宁式党治国家为模型的统制论革命运动的连接, 后者设想国家组织最终将有效地取代社会。^③

列宁惟一一部关于国家的重要理论著作, 是《国家与革命》(1917), 对此, 无论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指责它为“乌托邦”, “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简单表白”, “乌托邦的无政府主义”。^④列宁坚持要在革命之后保留一种新型国家, 并为“无产阶级专政”进行坚定的辩护。无政府主义者或许希望就此观点展开辩论, 因为他们总是在与列宁主义者的对抗中显出劣势。尽管如此, 列宁关于国家的理论作品中对无政府主义的印象, 主要还是源于他自己的意图, 即消灭所有那些将经济、社会和政治领域分割开来的界限, 从而使国家显得不可见。列宁关于国家的论文提出了一个自治社会的意象, 在那里, 无产阶级议会和官僚机构, 都简化为一个自治社会的各种技术

① Zarrow 1990: 17.

② Chan and Dirlik 1992: 41, 51.

③ Schurmann 1968.

④ Polan 1984: 21—23.

功能。从事劳动的普通工人，与“自治”他们的官员和代表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就此而论，一篇进行政治批判的论文，几乎无需花多大力气去论述政权作为国家的意义。^①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和列宁主义者支持的自治理想，源于一种理性官僚政治的世界观，后者声称在废除国家官僚机构的同时，仍可以保持其全部的理性冲动。然而，在一个情绪性的人类世界，没有官僚就不可能存在理性，至少必须存在着教师这样的准官僚。早期乌托邦理论家将统制论社会观提升为觉醒过来的自我的理性集合，在此过程中，他们帮助建立了中国革命政治的一条基本原则：未能符合新民理想的情绪性的普通人、市民、爱国者、无产阶级或人民，都必须通过一群先进导师的教导，来学会弥补其差距。 77

在一种非常普遍的意义上，对于群众政治行为的必要性及其应当采取的形式，中国的激进哲学家们有着相当一致的观点。一边是理想的历史主体（公民、民族和阶级），另一边是无法反驳的事实，即在真实世界中，普通民众并不非常符合这一理想，二者之间存在着鸿沟，在大众政治学中通常被当做一个问题。民众教育（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民众“指导”（对国民党人而言）、“群众路线”（对共产党人而言），以及其他教育策略的意图，都是使沉睡的大众与觉醒过来的自我及其相应的伦理共同体的普遍规范更加一致，这些策略提供了解决上述悖论的方案，每一种方案都要求唤醒中国人民。

① Althusser 在证明列宁的国家概念时走得更远，他试图在理论上成功地建立一个资产阶级国家，就像列宁成功地建立了一个革命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将市民社会吸收进国家当中。Althusser 的“国家的意识形态机器”这一定义具有足够的包容性，可将与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相关的所有主要制度容纳进来，包括家庭、教会、教育体系、媒体、法律、各种形式的制度化政治行为，以及文化。Althusser 1971；Polan 1984，33—35。

伦理反思和革命宣传之间的历史过渡，实际上并不很难。现代宣传形式一般与政党政治制度及其独特的斗争相连。但在中国革命当中，将伦理和宣传聚合到一起的不是政治，也不是国家建设。宣传是理性主义伦理的一种需要。伦理哲学家区分了伦理的三个方面，它们在社会和文化运动中经常重合：解释性伦理（为某个伦理体系确立基础，或者说明人们为何应当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情），规范性伦理（说明某个伦理体系的价值，或者人们应当做什么），教育性伦理（促进某个伦理体系的价值，或者促使人们去做他们应当做的事情）。^①在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这三者很少被区分开来。

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清晰地展示了伦理反思和大众宣传之间的联系。在中国的现代革命者之间，无政府主义者最不愿意谈论国家建设，并且极力回避政党政治。然而，他们给予了“唤醒”民众的宣传以最高的价值。无政府主义者强调在共同体内部起凝聚个体作用的伦理关系，因为他们根本不赞成由国家来协调社会内部的关系。在没有国家的地方，或者不存在其他使人勉强接受的强迫性代理者，社会行为只受伦理规范的制约和调节。这样，无政府主义者就成为中国“教育伦理”的先驱之一。

“无政府主义的精髓，”吴稚晖在1908年写道，“就是唤起人们的公民美德，注意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②唤起公民美德是教育的任务。“革命，”吴稚晖继续写道，“不是别的，就是教育得到普及，每个人都放弃旧习俗，并创造一种新生活。”吴稚晖心目中的教育，是一种科学和伦理教育，一种与科学的怀疑主义一致并鼓励放弃“旧习俗”的伦理。在提到习俗时，吴稚晖指的是儒家实践，它

① Heller 1988.

② Zarrow 1990: 122.

们维持着他所反对的古老的道德和社会等级。无政府主义者的伦理是一种社会平等主义的伦理，表达了私利（私）和公利（公）之间的矛盾。革命需要一个从旧伦理体系到新伦理体系的大众感化过程，就如儒家伦理所做的那样，将私利意识包含于更高的公利意识之下，但要重新界定公共利益，以便包含革命的平等主义理想。在一个（令人遗憾的）儒家社会中，这就需要“宣传”。彼得·查罗在关于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研究中总结说，无政府主义者的革命概念，就是“一句话：书面和口头的宣传，向承载着真理的人民进行细致的解释”。^①

毋庸赘言，宣传对于民族和国家建设同样重要。民族觉醒需要民族主义的教导者。在晚清的“立宪运动”中，改革者指望“民意”承担一种新的作用，并为如何才能将其引入正确路线展开了讨论。梁启超将民众立宪政府界定为“由民意监督的政府”，接着又对此作出限定，警告说民意应当由报纸和代表公众的其他机构来决定。^②在这一实践中，国家官员也有其应该承担的角色。梁启超建议通过一项伦理自修计划将人们转变为公民，此时他已偏离了自己的道路，转而将华人国家作为正确的发展方向。^③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文化的活动家试图通过大众启蒙来改变民族，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紧随其后。这些群体偏爱群众政治，而不是自由民主，他们放弃了梁启超的公民观念，希望唤醒青年、妇女、工人或整个民族。但是，关于代议制结构和竞争性的共同体理想的争论，至少为如下情况所抵消：在两者当中，共同体的理想和实际状况之间似乎

① Zarrow 1990: 120.

② Nathan 1985: 133.

③ H. Chang 1971: 279—282.

- 79 都有一道裂缝，醒来的个人和开化了的制度将介入此缝隙，并将人民唤醒过来。

在国民革命当中，民族、青年、阶级和性别这些大众觉醒理念，为一种更加细致的大众教育风格提供了基本原理。无政府主义模式的善意而做作的民众导师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民族主义革命者建立的教育体制，在后者那里，界定伦理共同体的不是它的觉醒，而是将它唤醒的行动：政治指导者被赋予统治国家和规训人民的权力，直到共同体达到一个被认可的自我意识水平。（国共）两党都将有意识的国家和无意识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纳入了自己关于国民革命的意识形态和计划中。在训政国家的体制之下，国民党的领导决定着民族意识，教导人民如何成为中国公民，这种作用确立了该体制的合法性。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则发展了自己的教育策略。^① 在国共两党人士那里，民族的自觉并不在于所有的国民都为其训导所唤醒，而在于政治训导的所有障碍都得到清除——也就是说，教导型国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在什么地方说就在什么地方说，丝毫不必担心矛盾和冲突。在这一点上，民族或阶级意识的神话不再是虚构，因为共同体意识扩展到了国家所能达到的范围，深入了社会的中心，到达了国土的最远边界。

给予醒来者的特权，既给民族运动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会。共同体不是被赐予的，而是被创造的，这种观念便于在伦理思想中引进社会阶级，以及民族这一新式大众共同体。然而，如果共同体理想只是产生于伦理反思，而不是产生于社会自身的有机发展，那么，到底是什么使得民族或某个特定的社会阶级优于其他共同体形式？特定的共同体如何与普遍的共同体发生联系？与此前的

^① 见本书第七章。

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中国的国民党人对这些问题给予了应有的关注。

黑格尔和马克思都假定，理想的共同体在逻辑上先于其成员的自我意识的获得。在黑格尔那里，这就是普鲁士国家，或者更一般地说，就是民族国家。在马克思那里，它就是生产关系中的阶级位置。自然而然，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一个社会阶级存在的客观条件似乎得到了满足，但其成员还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共同身份，那么，这个阶级是否可以被认为已经存在。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作出了回答：

80

既然数百万家庭的经济条件使他们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与其他阶级的生活方式、利益和教育程度各不相同并互相敌对，所以他们就形成一个阶级。由于各个小农彼此间只存在地域的联系，由于他们利益的同一性并不使他们彼此间形成任何的共同关系，形成任何的全国性的联系，形成任何一种政治组织，所以他们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

人与人在缺乏适宜的纽带和组织时，就“没有形成一个阶级”。然而，甚至当“他们的利益没有形成任何共同关系”的时候，阶级仍是伦理反思的一个范畴。在这种抽象形式中，阶级是一个高于阶级意识的存在范畴，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农民阶级可能拥有他们未能自觉认识到的利益。在追求这些利益的过程中，用马克思著名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一定要别人来代表”。^①马克思关于阶级意识的本质的反思，似乎为后来的社会理论家提供了足够的根据，使他们可以不再考虑阶级观念，或者转而将此区别发展为一条标准，用以区分“真正的”和“虚假的”意识。真正的意识是明白地认同于某

① Marx [1852] 1968: 172.

个社会阶级，认识到其被认可的阶级利益。其他形式的共同体意识，如宗教社团、伦理群体和民族国家，则削弱了阶级意识，被认为是“虚假的”。^①

黑格尔赋予虚假的意识（他称之为“欺骗的”）以不同的内容。一个超越了民族的共同体意识，如果威胁到人们对民族国家的忠诚，那它就是错误的。在民族之前，主张忠诚于“人”或人类的更高意识将是“虚假的”，是一种“与具体的国家生活相对立的世界大同主义”形式。^②在马克思那里，世界大同主义当然是一种积极力量，它使社会阶级与民族国家的具体生活相互对立。不过，对于这位马克思主义者和国民党人共同的革命导师而言，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问题。在如下问题上，黑格尔和马克思的一致胜过于分歧：两人都赞同理想共同体及相应的意识状态的绝对存在，前者与既存的意识形式没有必然联系。至少在策略上，两人都向政治行动家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在理想的和实际的社会意识的鸿沟之间架起一道桥梁，从而使理想的共同体变成“具体的”存在。^③中国的政治行动家在民族革命中学会了（如何）制造一个民族（之后），几乎不需要任何再培训，便可以去制造一个社会阶级。这些都是相互平行的教育计划，朝向不同的理想共同体定义，对应着不同的意识状

① 关于阶级概念，见 Thompson 1963：10 和该书第十六章。“假自觉”概念从未得到自由派社会主义者多少信任，现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名声仍然不佳。见 Polsby 1959，Bottomore 1983：220。

② G. Hegel 1953：134.

③ 这种流行的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简化，被批评为未能认识到马克思本人著述中的微言大义，并且无视市民社会阶级觉悟的出现，而这种觉悟与外来鼓动者的努力完全不是一回事。我并不怀疑这一点。我更关注的是行动者对下列问题的理解，即民族和阶级觉悟的建构究竟要求哪些东西。见 Thompson 1963：导言。

态。在中国革命当中，两者都被认为需要觉醒者的服务。^①

理性的民族

81

尽管伦理的反思很容易就过渡到大众宣传，可一旦发现中国是一个独特的伦理共同体之后，一条曲折艰难的道路便随之而来。我们已经看到，这条路上的一个路标，就是在康有为和中国无政府主义者的伦理推理发现的统制论社会观。在民族国家作为一种恰当的组织形式方面，康有为的重要性并不很大；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显而易见，则被视为国家的敌人。另一方面，在那些尊重民族国家的人中间，国家也很少被颂扬为国。中国民族主义的浪漫故事、辩论、赞美诗和宪法总是颂扬历史的主体，但这个主体不是国自身，而是被认为由国所代表并赋予这一代表者（民族）以国家的独特性质。

在从普遍的到更独特的共同体模式的进程中，第二个标志是位于理性主义伦理中心的一个悖论。在康有为的世界性乌托邦中，民族的种种界限受到了诅咒；家庭和社会阶级困扰着无政府主义者；列宁主义者和国民党革命者避开了宗派的、地方的和其他各种“排他主义”的界限。监控着这些界限（家族，市民团体，民族国家）的制度被认为妨碍了思想的清晰，阻止了理性的社会和政治重建。然而，为了将理想共同体变成现实而设计的种种策略，却要求为其自身创造独特的制度，包括政治党派、军队以及不同社会群体的“代表”实体，作为催生共同体的媒介。在这一工具理性的下层王国

^① 黑格尔提出了教育背景下的正确和“错误”认同这一问题：“作为普遍形式的个体自觉的教育和思想，正是自我逐渐理解为普遍的我，全体都一样。” G. Hegel 1953: 134.

中，正好在星辰之下，种种界限及其制度从大同世界的障碍，变成了实现大同世界的代理者。毕竟，只要党派和军队独立于国家，它们就仅仅是辅助的制度。在国家导向的政治运动中，在民族国家内把握国家权力的需要化解了这一悖论。一旦民族被冠以民族名义的制度所同化，一个独特的制度看上去也就不再独特了。

普遍共同体在伦理上降为民族国家的主要理由是历史性的。在国民革命时期，一个实际的大同世界看上去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确，甚至在康有为写作的时候，它就不可能实现。正是他的学生梁启超选择民族作为适合于醒来的自我的共同体。梁启超继承了其老师对自我和共同体关系的兴趣，并与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关注“群”
82 在其伦理体系中的位置。维持“群”的特征和一致，是其伦理体系中的核心论题。梁启超深切期望一个普遍大众的出现，但当他1902年坐下来写作《新民说》的时候，其界限已经很清楚地与民族国家的边界相平行了。^①

与其老师的风格一样，梁启超的推理论证非常理性。康有为已经设计好了革命的第一个最低纲领。康有为醒来的自我的理想共同体，包括“火星、土星、木星、天王、海王诸星之生物”，以及地球上的生灵。在更乐观的时刻，康有为甚至希望结束星球间的战争：“吾冥思尽去诸星诸天之争而未能也。”但考虑到其大同世界的现实性，他将这一共同体局限在地球和居住在地球上的生灵：“惟就吾所生之大地而思少弭其争战之祸而已。”康有为以对实践具有重要意义的姿态，为革命确立了第一个最低纲领：在地球上拥抱和平。

① H. Chang 1987: 6, 109—111 注意到了“群众”术语在晚清思想中的意义。亦见 H. Chang 1971: 155—156。在1898年与光绪皇帝的谈话中，康有为曾经说，政治的任务是保护领土和人民，它们组成了“民族”。Dirlik 1991: 53.

梁启超将康有为的思路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得出了如下结论：目前的历史形势使一个世界共同体的理想暂时不可能实现。^①对康有为来说，其思想的逻辑结果是一个大同世界的国家；对梁启超来说，它是一个中国人的民族国家。国家地点的这一差别，标志着对伦理共同体的界限的争论，或者说对工具理性的实际局限的争论，而不是在公共事务思考中对理性的卓越性的争论。例如，当梁启超主张消除民族疆域内部的区域主义和排他主义时，他仅仅回应了康有为的呼唤，即从整体上消除民族的、种族的和性别的界限。而当梁启超试图在《新民说》中使中国人的身份标准化时，他所追寻的仅仅是康有为希望世界将变成的民族国家：消除所有关于自我身份的预先断言。

早期国民党革命者作出了相似的选择。实际上，远在民族成为一个情感共同体之前，它已经被选择为一个理性共同体。民族这一理念似乎将强加给人们一种非理性的、偶然的東西，对于后者，一些民族主义者讨厌对之妥协。章炳麟被中国民族主义者视为“种族意识之父”。与康有为一样，章炳麟大声反对将世界分裂开来的种种“界限”，并且像最糟糕的冒犯者一样将愤怒的矛头指向种族和民族。它们太武断、太偶然了：“如今，在此浩瀚之宇宙，地球实为沧海一粟，然而今日，吾等居于其上者，已将之划分畛域，保护己域，称之为‘民族’。然后建立制度，自分阶级，称之为‘政府’。”^②作为组织人类事务的范畴，民族的历史出现正是它存在的基本原理。实际上，选择“种族”作为他的伦理共同体，章炳麟几乎别无选择。考虑到中国当前的困境，民族在成为一个情感共同体之前就是一个理性共同体

① 康有为 1958: 66, 80, 157.

② Zarrow 1990: 51—52.

了。理所当然，章炳麟成了中国现代种族主义的奠基之父。^①

对于国民革命内部统制论民族主义与反统制论革命哲学的合流，康有为和章炳麟很早以前就预见到了。章炳麟在世纪之交写道，民族国家“没有真正的存在”，因为它源于历史的偶然而非理性的深思。其对公民和主体生活的要求也因此贬值。^②不过，对民族国家地位和功能的思考，如果与觉醒的自我及其重建的共同体理性概念联合起来，就会导向统制论。康有为笔下的国家，仿佛只是既存共同体的迫切需要，然而正由于此，他对国家职责和功能的思考并不令人沮丧。在康有为看来，国家本身不是一种界限，而是一种保持界限的制度。因此，在山顶上使他感到震惊的痛苦的根源，不是国家，而是国家所应管辖的界限；真正的罪人是每一个共同体强加给自身的特殊界限。按照这种逻辑，界限越少，国家也就越少；当较小的共同体并入较大的共同体，较小的国家落入较强大的国家手中时，人类承受的痛苦总量也就会减少。为了减少共同体内的苦难，康有为在国家的起源和组织方面提出了许多合理的改良办法。他还提出了与其理想共同体相应的终极国家理想：一个大同世界国家，管辖着星球自身因为资源条件而造成的此疆彼界。他以令人沮丧的推理——尽管有点遗憾——得出结论：一个世界国家的实现证明了“碾碎个体”的合法性，因为它消除了标志共同体差异的中间界限，而那些差异是痛苦的真正根源。^③

康有为质疑在其有生之年结束星际战争的希望是否现实，此时

① 1920年代，新一代无政府主义者与一种不同的民族主义达成了类似的妥协。Dirlik 1991: 259.

② Zarrow 1990: 51—52.

③ 康有为 1958: 69—74, 84.

它在实践中也起了领先作用。他的后继者更加具有怀疑精神，转而探询他们是否能结束国际间的或国内的战争，或者消灭阶级、性别之间的差异；如果不可能，那他们在过渡期间将满足于什么状态。国际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是理想主义者，但他们都深切关注实际。伦理共同体的组成部分，是包括地球上的所有生灵还是只包括人类，是包括所有人类还是只包括中国人，是包括所有中国人还是只包括由阶级、种族和性别所界定的一些中国人，对这些问题的最好回答，需要参考另一个问题，即这样一个共同体准备得如何，能否通过有步骤的计划和政治干预而得到实现。自我和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种“同情”性质，但共同体一度得到了更精确的界定，直至达到与作为历史主体所具有的自治性断言相一致的水平。康有为注意到，对于疏离的个体而言，理想的共同体正是宇宙自身。其他一切事物都是实际的，最终都是通过政治行为达到一个可实现的历史主体的政治妥协。

84

对于醒来的自我而言，独特的和历史偶然的共同体将取决于政治领域。“事实”与“实力”是政治和武装斗争的编码词汇，它们孕育于国际性国家体系框架，承认该体系对中国这类旧帝制国家内的自我及其共同体的有效自治含义。在新的伦理中，国家从一开始就起着重要的作用。康有为认为，历史正在向数量更少、更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运动，“有必迄于大同而后已者”。^① 如果其苦难的根源不是国家，而是国家负有管辖责任的疆界，那么，真正的罪人是由排他主义情感强加给伦理共同体的人为限制——实际上就是国家的有限权威。^② 将民族带给中国的，最终是在国际性国家体系中确保

① 康有为 1958：84。

② 同上：69—74。

中国的领土和人民的历史进程。中华民族是一个想像的妥协，民族主义则是实现它的一种理性策略。^①

理想的民族国家与独特的和普遍的民族国家有着共同特征，因为它仿佛处于村庄和宇宙之间。清代有一个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来管辖多大稳定的领土，这为民族国家在20世纪中国的建立提供了鲜明的先例。但新的国家将如何走向权威位置，它如何在村庄面前代表世界，甚至谁将组成民族，都是理性思考和政治斗争所面临的问题。在斗争和争论中所持的立场，通常反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改革者面对这两项任务时选择的不同路径。一方面，他们需要唤起民族意识的神化和象征，以沟通“宗派”和“本地”的排他主义划分，另一方面，他们需要被迫切断新的桥梁，后者将解放的自我与尚待到来的普遍的或宇宙的共同体连在一起。

孙中山并不认为家庭和本地这类原始共同体是国家建构的不可跨越的障碍，也不认为它们必然会限制更广泛的人类价值观的培养。与康有为和无政府主义者相反，孙中山指出，民族情感先于所有其他情感；但与梁启超相反，他相信家族和地方的联系能够转而服务于民族。同样，孙中山、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关注着（如何）克服那些相互划分了血缘和地域的界限。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如何去实现这一点。

“政权外观似统一，”梁启超抱怨道，“而国中实分无量数之小团体，或以地分，或以血统分，或以职业分。”梁启超提出了一种新民模式，旨在解放为地域、家庭和职业所束缚的群体，使他们成为个体的、醒来的国民，与民族国家直接相连，无需求助于社会的中

^① Dirlik 很好地分析了“全球意识”如何催生了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Dirlik 1991：第二章。

间代理者。^①民族主义思潮中有两个对立的学派持不同观点。早期的何启和胡礼垣试图协调对家庭、地域和民族国家的忠诚，他们认为，几乎没有必要为了民族而压制对家庭和地域的依附：“如果某个家族的成员被鼓励去依附于自己的家族，如果一个地方的人民对自己的家乡有着独特的关注，那么，这个民族对自己国家的重视，会强于对其他国家的重视。”^②另一方面，孙中山决心“唤醒”民众，使之觉悟到他们的共同体之间的有机联系，确保家庭、宗派和地方情感自觉地提升到民族的水平。排他主义的情感似乎减少了“民族的情感”，从而限制了民族保护自身的能力，像梁启超一样，孙中山对此也很关注：

外国旁观的人说中国人是一片散沙，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因为一般人民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没有国族主义。中国人对于家族和宗族的团结力非常强大，往往因为保护宗族起见，宁肯牺牲身家性命。……至于说到对于国家，从没有一次具有极大精神去牺牲的。所以中国人的团结力，只能及于宗族而止，还没有扩张到国族。^③

在后来的演讲中，孙中山补充道：“中国人的家乡观念也是很深的，如果是同省同县同村的人，总是特别容易联络。”孙中山建议提升乡土和家族情感，使其适应于民族国家。1924年，孙中山声称：“中国国民和国家结构的关系，先有家族，再到宗族，再然后才是国族。”^④

① H. Chang 1971: 155.

② Min 1989: 121.

③ 孙中山 [31]: 5.

④ 同上: 113—115.

86 到那儿，它就戛然而止了。孙中山的民族下与家庭和村庄相对立，上与较高形式的宣称人人皆公民的共同体相对立。“英国和俄国现在生出了一个新思想，这个思想是有知识的学者提倡的……是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想……说民族主义是狭隘的，不是宽大的。”1924年孙中山这样说。它一方面无法区别于中华帝国所宣称的天下主义，另一方面也无法区别于英帝国主义的虚假学说。^①在原则上，孙中山并不反对世界主义。种族排他主义基于普遍的科学原理，他的民族主义也渴望普遍的人类价值。不过，在“世界主义”时代到来之前，孙中山并不愿意欢迎它。他总结说，世界主义实“藏在民族主义之内”，但在民族主义盛行于中国之前，它没有必要显现出来。^②

近来讲新文化的学生，也提倡世界主义，以为民族主义不合世界潮流。这个论调，如果是发自英国、美国，或发自我们的祖宗，那是很适当的；但是发自现在的中国人，这就不适当了。^③

当中国赢得了合法的地位，成为国际性的民族共同体中完整而平等的成员，世界主义实现的那一天就来临了。孙中山总结道：“我们以后要讲世界主义，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重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④

然而，早期民族主义者的区别不仅在于方法上的不同。在反思

① 孙中山 [31]: 67—68。

② 同上: 89。

③ 同上: 74—75。

④ 同上: 99—100。

如何将被血缘和乡土纽带分开的人们汇聚为民族时，孙中山和梁启超表露了对民族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梁启超一旦选定民族作为伦理共同体，就利用了最新的史学和科学工具来探索其属性。他打算承认“种族”是自然选择的一个基本单位，并进而在种族帝国的兴衰中探寻世界的“自然”史。他回应了黑格尔的观点，宣称胜利者是“有历史的人种”，而失败者是“非历史的人种”。^①这样，英帝国就为“自然进化法则的必然作用”提供了一个科学例证。如果中国人在帝国主义面前仍然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他们就必须利用同样的自然法则，根据英国模式精心创造自己的社会和国家，使之变得团结、民主、强大。简言之，中国需要发展一种“民族主义”的伦理。^②

不过，应该强调的是，梁启超不是一个种族的民族主义者。从历史的观点看，他注意到，单个国家可以包含许多民族，单个种族也有充分的理由分布在许多国家，因此，并不存在着支配种族和国家关系的普遍规律。在中国，民族主义必须在种族认同和爱国主义之间建立起所有的联系，以便保持帝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的中央集权，在这样的多种族共同体之中，民族国家的种族定义，甚至会成为国家建构的一个障碍。梁启超发明了“大民族主义”一词，以区别自己那聚焦于民族国家的合作性民族认同理想和聚焦于种族或人种的伦理认同。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伦理基本是公民的伦理，将自我和共同体与一种围绕民族国家的关系联系起来。^③因此，他采用了地域、祖先、语言、宗教、习俗等通常的区分标准

① 孙中山 [31]：159。

② 同上：164—166。

③ 同上：260—261。

来界定伦理身份，同时主观认为公民是一个群体，合群意识造成了他们作为公民的个人身份。族性是人们与生俱来的属性；公民身份则是国家为那些已经“觉醒”为公民的人颁发的毕业证书。梁启超开始及时地交替使用公民和国家两个词，迫切希望他们同时觉醒。^①民族的觉醒与制造一个觉醒过来的公民相连，民族则与国家相连。

另一方面，孙中山坚决将民族和国家与一个鲜明的中国种族的理念视为一体。他在夏威夷和香港的自我觉醒，似乎敏锐地意识到了自己的肤色和容貌特征，而且在成年生活中，他对礼节的敏感甚于伦理。^②有意义的是，他承认种族是民族的基础，这似乎意味着对其他形式的原始共同体——包括直系家庭和地方宗族——更加宽容，并缓和了理性主义者从头开始重建既存共同体的冲动。当然，他很鄙视家庭和宗族忠诚的束缚，但他答应挽救后者，其方法是将其重新导向民族国家的方向。在这方面，他特别批判了他称之为“西方的”模式（梁启超喜欢这个词），在那种模式中，孤立的公民直接与民族国家相连。^③

孙中山关于民族在世界中的位置的看法，也使他与下一代的民族主义者区别开来。除了民族之外，新文化运动还欢迎大量的共同体，而且并不总是将民族放在第一位。它支持个人的内在价值，科学和民主的普遍原则，以及青年、性别和阶级这些普遍共同体。孙中山指责这些趋势是“世界主义”，他相信，觉醒过来的青年将西方价值观念误以为是普遍的价值观，或者以外国的价值观取代了更熟

① H. Chang 1971: 260.

② 见本书第三章。

③ 孙中山 [31]: 115。见本书第七章。

悉的中国价值观念。^①当五四运动最终将青年世界主义者的精力导向一场拯救民族的运动之时，孙中山忠告年轻人要警惕世界主义的危险，并鼓励他的同志胡汉民、廖仲恺和汪精卫去指导青年运动，使之与国民党的方向一致。^②

88

至少，梁启超是相信这一点的。尽管孙中山和梁启超对民族的特性有着不同的认识，但他们都认为民族应当优先于其他形式的伦理共同体。1922年，梁启超回顾过去数十年，他能够看到的是一个“黯然无色的时期”。不过，由于“从前的指导人物，像是已经喘过一口气，重新觉悟，重新奋斗”，因而在最近几年中，事情有了好转。在其事业的黄昏，梁启超能够镇定地反思一场并不总是令他喜欢的革命的成就，看到另一种觉醒正在出现，他能够与国民党成员一样感到满意。他以一句直指自我觉醒的意义的典型妙语，表达了自己的赞同之意。他问道：“自觉些什么呢？第一，觉得凡不是中国人都没有权来管中国的事。第二，觉得凡是中国人都有权来管中国的事。”^③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在1920年代的觉醒，自我立即觉悟到了公民权和爱国主义。梁启超和孙中山都决定，在他们身后的世代当中，爱国主义都不应当向世界主义让步。

① 在新文化作家们看来，西方文学主要不是一种“民族性的”传统，而是一种世界性的或者说“人类的”传统。他们在西方学术当中遇到了这种观念。波尼·麦杜高指出，那种观念与其说是世界性的，还不如说是国际性的。McDougall 1977: 44—45, 60. “民族”还必须与中国的普遍价值相互竞争：许多著名革命者都转向儒家经典或佛教，试图重新找到一个比任何民族都更大的“大我”。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两位领袖李大钊和后来的瞿秋白，前者曾于1913年短期涉身佛教“净土”宗。见 Meisner 1974: 14, Hsia 1968: 14—15, 23. 失意的政府官员也转向传统的退隐生活。Hutchinson 1924.

② 见本书第五章：孙中山 [31]: 67—68, 74—75.

③ 梁启超 [1922] 1979: 272.

作为公民和爱国者的自我

一旦自我觉醒被界定为对民族国家成员资格的觉悟，在关于公民和国家关系的讨论中，自我和共同体的关系就更容易得到探索。关于公民权的讨论，从来不会偏离于国家对公民的要求太远。20年前，当梁启超第一次断定觉醒过来的自我应当是一个自觉的公民之时，他就选择了依据国家理性的原则来评判公民。他的意思是，在不惜任何代价确保国家复兴的关系中，公民要服从于国家。的确，康有为喜欢谈到“天民”，而不是民族的公民。但他的天民几乎没有从名义的提升中获得什么利益。如果阻碍了国家的完善，任何维度的公民都可能被牺牲掉。梁启超认为，当国家利益需要的时候，公民应当为民族国家作出牺牲；而为了实现大同世界的国家，康有为对于“碾碎肉体”几乎没有什么顾虑。^①一旦自我觉醒被视为自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意识，国家的管理者感到自己有义务去监管和指导更普遍的自我觉醒。

89 虽然如此，民初共和制的破灭激起了另一个不曾困扰过孙中山和梁启超的问题。如果公民不赞成一个民主制民族国家，那么他们是否有义务尊重和服从它？或者在一个理想的国家到来之前，他们能否暂不承担自己的义务？共和政府成立3年之后，在有关自我和国家之间关系的著名争论中——中国共产党的两位创始人陈独秀和李大钊也卷入了其中——一个理想国家的主题于1915年出现了。^②

① 康有为 1958：84。张灏精妙地分析了梁启超对国家理性原则的理解。H. Chang 1971：255—259。亦见 Friedrich 1957。

② 不出7年，陈独秀和李大钊将超越相互间的差异，达到充分的一致，以共同创立中国共产党。陈独秀 [1914] 1969；李大钊 [1915] 1969。

在陈独秀的《爱国心与自觉心》一文中，自我是当前熟悉的“觉醒过来的”自我，它作为一个全面建构的公民而觉醒过来。不多也不少，自我觉醒恰好意味着明了自我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自觉者何？觉其国家之目的与情势也。”陈独秀还提到了连接自我及其共同体的同情心，并且与先前的康有为一样，探究了这种感情的基础和特征。不过，康有为的同情扩展到了宇宙，而陈独秀的感情则毫不含糊地指向民族国家。它的志向并没有高于“爱国主义”。

然而在民国初年，爱国主义并非显而易见。陈独秀自然而然地（假如他理解了“自觉”的话）将爱国主义的省略追溯到“无自觉心”：

今之中国，人心散乱，感情智识，两无可言。惟其无情，故视公共之安危，不关己身之喜戚，是谓之无爱国心。惟其无智，既不知彼，复不知此，是谓之无自觉心。国人无爱国心者，其国恒亡。国人无自觉心者，其国亦殆。二者俱无，国必不国。

虽然陈独秀在自己的同胞中间几乎不能发现爱国主义或自我意识的证据，但他无法因为这个原因而指责他们。他认为，过错在于国家，它因为自己的无能而承受着危险。国家及其官员有责任在民族共同体中创造情感和自我意识。民国初期，自我作为失望的公民而觉醒，渴望一个值得其自我觉醒的国家。

换句话说，觉醒过来的自我，并不只是一个正在寻找国家的公民，而是一个潜在的爱国者，他渴望一个能够激起其情感的理想国家。一个不能激起爱国主义的国家，比一个没有任何感觉的公民更应当受到批判，因为只有在一个值得去热爱、去牺牲，能够激起对民族之爱的国家里，自我意识才能觉醒。陈独秀认为，欧洲和美国就是这种情形，在那里，国家是“为国人共谋安宁幸福之团体”，相应地，所有国民都热爱和尊重国家。中国从来不知有这样一种国家，因而少有值得夸耀的爱国者。或者按照陈独秀的说法，由于没

90

有爱国者，也就没有国家：

国家之义既明，则谓吾华人无爱国心也可，谓吾华人未尝有爱国者亦可，即谓吾华人未尝建设国家亦无不可。

一个国家如果不能激发起人们的爱国主义，就根本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国家，因为一个真正的国家必定会通过自身的完善来创造出觉醒的公民。从这些反思中，陈独秀得出了激进的结论，即目前这样组织起来的民国的失败，对于觉醒的自我而言只是暂时之事。如果一个国家既不能“保障人民之权利”，也不能“谋益人民之幸福……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措”。^①

陈独秀断言当前的国家不值得拯救，这使李大钊很反感。他承认，民国给人们带来了相当大的痛苦，在各个方面都远远谈不上完善。但是，李大钊辩解道，它至少是一个中国人的共和国：“恶政苦民，……不过一时之象，非如亡国惨劫，永世不复也。”^②“亡国”一词表达了对国家消失的担心，在民国初期，该词频繁出现于文字和噩梦中。在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当孙中山将国家的丧失等同于民族的消失时，他涉及到了这个主题。他警告说，朝鲜人和越南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国家，成为亡国奴，但中国人面临的命运比他们还要糟糕。^③中华民族甚至连奴隶都做不成，因为在中国，亡国危及到“灭种”。^④孙中山援引进化论中的天然公例，在亡国和灭种之间建立了联系。“外国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有可能导致“民族的灭亡”，这种“自然选择力量”的作用，对民族形成了威胁。^⑤

① 陈独秀 [1914] 1969: 204—206。

② 李大钊 [1915] 1969: 208。

③ 孙中山 [31]: 38。

④ 同上: 12。

⑤ 同上: 75。

陈独秀的文章发表时，李大钊刚刚表达了对亡国的担忧。他几近失望地发现，陈独秀不经意地忽略了一个可被识别的华人国家的生存，其中已经预示和排除了这种担忧。按照李大钊的考虑，即使亡国的可能性尚未危及种族灭绝，中国还是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即丧失其领土和政治身份。无论是否意味着失去种族、领土或政治身份，亡国都被视为最大的损失。早先，亡国一词被用来指一个王朝的覆灭，在王朝的周期中，由于一个王朝通常被另一个王朝所取代，这个词汇大致意味着统治家族之间的历史变迁。然而，一旦历史从一种循环路径转向世俗路径，亡国的观念便导致了更严重的威胁。在民族国家无情的前进过程中，其进步的历史几乎无法让人确信，一个可被识别的华人国家的崩溃，将产生另一个国家来取代自己。^①在李大钊那里，一种具有历史连续性的国家的理念，等同于中国的持续存在，这样，“亡国”一词便意味着中国的灭亡。

接着，李大钊将自觉的定义界定为自我和国家之间的一种静态关系，他增加了意志一词，或者作为改善国家的承诺，试图以此解决陈独秀所认同的矛盾。创造一个理想的国家，是自觉所感悟到的宇宙赋予他的责任：

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更不宜以吾民从未享有可爱之国家，遂乃自暴自弃，以侔于无国之民，自居为无建可爱之国之能力者也。夫国家之成，由人创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间，而容有我，同类之人，而克造国。……惟有本其自觉力，黽勉奋进，以向所志。^②

陈独秀当然承认了公民和爱国者的价值，详细谈到了理性和情感，

① Meisner 1974, 19.

② 李大钊 [1915] 1969, 207.

但他忘了提到意志，特别是“建造国家”的意志，这是宇宙赐予觉醒过来的自我的礼物。在上天的保佑下，通过创造一个有价值的国家，无国的公民和没有祖国的爱国者都能够完善自身。当公民与国家成为一体的时候，自我最终与“广大的宇宙”成为一体。^①

不仅仅是亡国之忧激起了1915年陈独秀和李大钊之间的争论。他们两人都渴望解释中国人之间的爱国感情（为何如此）的微弱。对陈独秀来说，这表明中国没有国家；在李大钊看来，它是一个有力证据，证明中国必须是一个更好的国家。其他人同样感到困惑。孙中山相信，爱国者及其祖国之间的爱，是由星辰所注定的，因而经常抱怨自己的同胞中间几乎没有爱国主义迹象。在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中，他注意到，“天既托付重任于中国人，如果中国人不自爱，是谓逆天”。^②

92 孙中山吁求星辰的做法可以理解，但这或许指错了方向。热爱祖国正确模式，不是觉醒的自我与天国之间的关系，也不是公民和国家之间的契约。虽然确实需要这些东西来取代家庭和乡土等感情纽带，但它们都无法激起人们发自内心的热情。爱国主义的灵感将在其他地方得到发现：在对于个人自由和浪漫之爱的探求中。有必要认为个人自由取决于集体自由，在上天能真正期待中国人像同胞一样相互热爱之前，月亮不得不低头凝视上海和北京、长沙和广州的不幸的爱人。

爱国主义诞生于浪漫小说所描述的自我觉醒。在广为人知的现

① Meisner 指出，强调“依靠自觉力来塑造事件”，是李大钊的出发点，标志着一个原创性的、本土的马克思主义环节，后者将在他的教导下发展起来。非常不同的是，陈独秀强调“客观”条件带来的限制，这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当中也有支持者。Meisner 1974: 21—26.

② 孙中山 [31]: 75—76。

代中国之“文学革命”这一独特现象中，现代小说相继发现了个体自我和英雄民族。两千年的文学史在一代人之内断裂了。^①新文学的探索之旅始于与康有为同样的出发点；也就是说，从欣喜若狂的自我觉醒与极度痛苦的失落感的交织时刻开始。

1915年以后的10年中，每一个能够执笔的青年，似乎都经历了一次觉醒。“我常说自己是五四运动的产儿，”作家巴金在其散文《觉醒和行动》中回忆道：“五四运动像一阵春雷，将我从睡梦中唤醒。我睁开眼，看到了一个新世界。”^②觉醒的到来既令人震惊，也像文学想像中与悲伤的忧郁症一致的自我发现一样，是一次启示。在郁达夫和冰心的故事中，觉醒过来的自我徘徊在黑暗而清冷的街道上，企图自杀，或者忧郁地追寻着沙地上的足迹。^③但是，由于小说还将觉醒过来的自我置于社会背景中——尚未觉醒的其他人——一方面通过唤醒小说社会，另一方面通过唤醒读者共同体，它为探索疏离问题的叙述方案提供了机会。^④

这并不是说，小说中的自我觉醒被纳入了民族觉醒。它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事务。在热情支持自我发现的郁达夫看来，“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就，首在个性的发现”。^⑤诗人用赞歌来庆祝第一人称代词的发现。小说家经常极为详细地探讨，一旦自我从千百年来为古老的家族、伦理和政治共同体所导致的沉睡中觉醒，它将能够达到什么面貌。小说和自传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郁达夫创作的小说是自传性的，词义最简单、最直接。正如郁达夫所解释的：“一切文学作

① Dolezelova-Velingerova 1977, L. Lee 1973, M. Anderson 1990.

② 巴金 [1935] 1970: 71.

③ 例如，见郁达夫 1921，冰心 1982：第1卷。

④ M. Anderson 1990: 38—44.

⑤ L. Lee 1973: 263.

- 93 品只是作者的自传。”认为作品还有其他的意义，这似乎是一个很糟糕的想法。^①全神贯注于自我，也在文学产品中留下了印记：在日记和自传的创作中，个人信件的交换中，它们逐渐汇入文学保留形式之列，成为探索疏远和爱情、囚禁和解放等主题的虚构工具。^②与此个体发现相应的集体不是民族，而是普遍的宇宙或世界。波尼·麦杜高（Bonnie McDougall）注意到：“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新理论的发展，都旨在鼓励 20 年代西方知识分子中间普遍持有的、为中国所反思的信念：即对人类整体的认同，是比认同于任何特定种族或民族更进步、更开明的思维方式。”^③

在提出有关自我和共同体问题的同时，新小说仍然不可避免地探索了民族共同体。虽然觉醒过来的青年可能设想自己正在为世界而写作，但在中国以外，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努力，更少有人去关心他们的努力。小说、历史、报刊杂志的视野在形式和语言上都得到了清楚的界定，以划分出（文字中的）角色的民族共同体和读者的民族共同体。^④的确，今天纪念新文化和五四运动，不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而是因为在凡尔赛那种期望的落空，以及本土民族的觉醒。我们看到，对梁启超来说，这两个运动象征着公民资格和爱国主义的觉醒。尽管孙中山对“世界主义”持暧昧态度，但他欣赏五四运动的全国性政治态势。^⑤而毛泽东则承认，在 1919

① C. Cheng 1977: 81.

② L. Lee 1973: 262—263; Dolezelova-Velingerova 1988. 郭沫若在 1926 年以情书集的形式发表的一部小说，名为《落叶》；蒋光慈在 1926 年以一封长信的形式发表的一部小说，名为《少年漂泊者》；茅盾在 1958 年以日记形式发表的一部小说，名为《腐蚀》。

③ McDougall 1977: 44—45.

④ B. Anderson 1991: 35.

⑤ 梁启超 [1902] 1979. 孙中山将这场运动描述为“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他将这场运动的成就归结为“不过由于出版界之一二觉悟者提倡”。孙中山 [39]: 670—672。

年的五四运动中，“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源于觉醒过来的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的行动”。^①

毛泽东欣赏这一运动的民族革命意义，这体现了该运动的双重特征。五四运动前几年，觉醒过来的青年主要关注个性和自我实现。毛泽东自己也不例外。在毛泽东本人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从历史和逻辑上说，个人的觉醒都显然发生在民族的觉醒之前。“个人之价值大于宇宙之价值，”他在1918年写道，“故凡有压抑个人、违背个性者，罪莫大焉。……团体无意思，其有意思乃系集合个人之意思也。”^②1919年5月开始的学生示威迅速扩展为学生、工人和商人的集体运动，意图使北京政府感到难堪，并打击日本在华贸易。^③凡尔赛的经验表明，他们的个人纽带——个人从“封建主义”中的解放，与一场集体的斗争——民族从“帝国主义”中的解放——94联系在一起，因而，个人自由的获得是一项集体的事业。自我和民族一度被认为都受制于同样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联盟。因此，从1919年5月4日起，一种独特的民族身份，也即一个囚禁中的个人和民族的身份，在觉醒过来的自我身上打下了烙印。个人对自己在宇宙中的位置的觉悟，期待着民族对自己在国际性国家体中的位置的觉醒，但现在，个人的解放必须等待民族的觉醒。

在这一运动中，与这些政治谈判相伴随的，是从文学上重写自我和民族。首先，觉醒过来的个人的自由和自主，足以成为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榜样。个人自由被视为一种消极的自由，一种摆脱某种

① 这一论断后来在毛泽东公开出版的作品中被删掉了，显然因为它过高地评价了知识分子的作用。Schram 1989: 4.

② Schram 1992: xxxi-xxxiii. 毛泽东 [9]: 208.

③ T. Chow 1960.

事物的自由，而非追求某种事物的自由。得到解放的个人，经常被想像为从睡梦中觉醒的沉睡者，他在觉醒行动中逃离了家庭和传统的枷锁。同样，民族解放被视为从外国帝国主义中的解放行动，而不是与公民自由相关的一套实践。^①

其次，甚至在最活跃的时候，五四新文学也通过直面自我意识和疏离问题，通过探索束缚、解放和浪漫之爱等主题，帮助塑造了觉醒的民族。它向读者宣扬那些首先表达于新伦理中的主题，他们或许已经转向了更加重要的哲学书籍。1920年代初的小说谈到了浪漫和兴奋，承诺自由和冒险，在爱的艺术中教育其读者。截止1920年代后期，文学中的自我放纵、爱情和自由等早期试验，已经进入了国民革命的宣传之中。

新文化运动中一些艺术家对于“自由恋爱”主张的理解，与该词的当代含义一致，即自由的性行为；但至少对大部分的年轻人来说，自由恋爱意味着摆脱家庭压力去选择婚姻伴侣，意味着自由组成伙伴式的婚姻。在这方面，它标志着对父权的父亲形象的抨击，但没有削弱婚姻自身的父权制度。无论如何，在家庭的男性首领之间，性自由是常见的事，对父权制家庭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威胁。伙伴式的婚姻更具有颠覆性。它限制了家族的自我繁殖能力，并要求年轻的恋人相互进入一个自由选择的契约，然后不管怎样都要忠于契约。这一承诺与民族主义者对其同胞的要求没有什么两样。

95 浪漫之爱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又一个相似点，是浪漫文学中传达出的情感共同体景象，它不同于早先的血缘和地域共同体。浪漫小说的吸引力部分在于一种期望，即任何人都有可能被挑选为爱人。全部的要求就是心脏的一跳。新小说中的爱人原型斩断了与家庭、

^① Patterson 1991.

习俗和地域的所有情感联系，去欢迎一个潜在的爱人共同体，后者与年轻的民族本身相重合。这样，民族既被作为忠诚的对象，又被作为感情的对象而提出来。小说对浪漫之爱的处理广泛而多样，并且有着非常细微的差别，从而有助于雕琢和推广一种自我和共同体的关系模式，从而为民族之爱或爱国主义提供一个典型。

10年来有关自我觉醒和浪漫爱情之发现的写作，发展了一套广泛的技巧和主题，在1920年代，作家们对此已经非常熟悉，并将其应用于民族之爱当中。列奥·李(Leo Lee)在其《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中注意到，浪漫故事的作者很容易、也很频繁地转而服务于革命。浪漫之爱和革命的爱国主义成为一对孪生子。一位广为人知的浪漫文学作者蒋光慈非常明确地注意到了这一联系：

浪漫？我自己就很浪漫，所有的革命者都很浪漫。没有浪漫，谁会参加革命呢？……理想主义、激情、不满现状、追求美好生活——如此，你就拥有了浪漫主义的精神。浪漫就是一个人拥有了这种精神。^①

1930年，蒋光慈出版了一本关于国民革命的“浪漫”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这本书再版了许多次。书中的女主角王曼英与男朋友私奔，参加了革命，但当革命形势变得严峻之时，却被迫逃离革命。为了补偿，她成了妓女，专门选择那些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为服务对象，使他们感染上性病，作为革命的报复。当曼英遇到一个坚持信仰的年轻革命者李尚志的时候，爱情和革命最终汇聚到一起。她的性病消失得无影无踪。^②

革命的浪漫嘲笑了蒋光慈做作的情感，但分享了他在小说中探

① L. Lee 1973; 273.

② 蒋光慈 1930; Dolezelova-Velingerova 1988; 98—99.

索爱情和爱国主义的决心。1926年3月，郭沫若和郁达夫一起前往广州，加入了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这年年初，小说家沈雁冰（茅盾）已经接受了在毛泽东领导下的同一机构的代理部长之职。郭沫若、郁达夫和沈雁冰三人是1920年代最多产的浪漫文学作家。他们也是1920年代末新出现的历史现实主义风格的先驱。

- 96 茅盾的三部曲巨著《蚀》，被认为是“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第一部重要文学作品，它提供了整个历史时期的一幅连贯画面”。^①在1927年出版的第一卷中，通过一个年轻女子的不成熟的性行为，茅盾反思了国民革命。它是一个自我觉醒和令人失望的期待的故事。小说的题目《幻灭》，特指女主角对自己第一次性经验的反应。在故事的开头，静女士从一位老朋友慧女士那里知道了性，后者已经“悟得处事的方法”。静女士的性遭遇被偶然耽搁了，直到五卅事件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即1926年5月30日。这样，她那没有吸引力的年轻恋人抱素，自吹与静的调情正是自己的五卅事件。但是，那个事件令静很失望，正如作者茅盾本人对五卅事件的反应一样。

第二天，即6月1日早上，静一醒来就意识到，自己的经历使过去的梦想和未来的希望都破灭了。静反思道：“平日怕想起的事，昨天晚上是身不由己地做了。”她很高兴那个事件过去了，但又禁不住为失去贞洁而悲伤。“正像小孩子在既得了所要的物件以后，便发见了‘原来不过如此’。”^②这番话也许回应了许多年轻女子的想法，但它们还唤起了作者在国民革命中的个人经历。在1928年发表的一篇论革命的文章中，茅盾使用了几乎相同的语言，描述了自己作为一个

① Dolezelova-Velingerova 1988: 132—133; 茅盾 1958c。1927至1928年间，三部曲《蚀》连载于《小说月报》18卷9—10期，19卷1—3期、6—9期。

② 茅盾 1958b: 43。见 Berninghausen 1977; Rickards 1990。

国民党宣传干部，对自己在路障中经历的失望的反应：“它原来不过如此。”^①茅盾和静小姐都醒悟了，发现除了自己之外，一切都没有改变。

徘徊的郁达夫服务革命的时间不是很长，但已经足以使他发现情欲和爱国主义之间的联系。此外，郁达夫还发现，革命仇恨的根源同样可以在性激情中发现：

一种革命职业的出现，可能只是因为微不足道的情欲，它的培育与一位温柔纯洁女子的爱无法分开。那种情欲如果扩展开来，其热情足以烧毁暴君的宫殿，其强烈足以摧毁巴士底狱。^②

1926年3月，郁达夫离开上海，“怀着全副热情和真诚，悲痛和愤慨，投身于革命大潮之中”。他在广州经历了俗气的派系政治，没有实现他那高涨的期待。^③郁达夫于是返回上海，将热情和痛苦投入到小说创作中。

他创作的有关国民革命的故事《逃亡》(1935)，将浪漫的爱情和革命的仇恨交织在一起，令人恐怖但富有启迪。小说讲述了国民运动中一位宣传部长钱士英，在1926年到1927年北伐时期的堕落和忏悔经历。钱士英受到一位“健康的异性”宣传官员的引诱，令他为一种更低级的爱而牺牲革命原则。他与下属董婉珍结了婚，搬到浙江兰溪，目的是利用妻子家庭在地方上的财富和特权。最终，为了补偿自己的原则，钱士英怀着自我厌恶的心情克服了诱惑，回到上海。故事的结尾是钱士英在上海一家阴暗的旅馆房间里，拿起一

① 茅盾 1928。Rickards 1990: 37.

② L. Lee 1973: 274.

③ 郁达夫 1984b: 10.

张报纸，从中得知他在离开兰溪之前点燃的一把火烧毁了整座房子：“当 he 从一排来自该省的新闻中看到兰溪的大火把这家人都烧死了的时候，他的脸上漾起了笑意。”^①钱士英渴望和自我厌恶的热情，仍然非常强烈地转变为对自己的情欲对象——不幸的“典型”董婉珍——的革命仇恨，是她的魔力诱惑他背叛了革命。

强烈的愤怒推动了中国民族革命。根据白鲁恂的判断，愤怒比爱情更先出现于中国的革命政治中：

所有相对普及的运动的情感基础，是对愤怒和民族卑微的清晰吁求……那些能够展示出情欲、愤怒和民族自卑感的人，很快被认为在政治上觉醒了，而那些理性地考虑如何解决中国问题的人，则被视为缺乏民族主义精神。^②

然而，很难挑剔强烈的爱国情感的理性基础，或者因其非理性而指责革命的仇恨。革命的仇恨因其不妥协的理性而更加有力。^③在浪漫小说的个人觉醒中，伦理的理性自我觉醒强化了爱情和仇恨的聚合，而爱情和仇恨都加强了这样的观念，即只有“政治上觉醒过来的人”才有资格指挥革命。当爱的对象从恋人转向民族，虚构的浪漫帮助发动了一场仇恨、羞耻和难忘的冤屈的战争。

在当时，国民革命的小说并不被认为是浪漫的，而被认为是“现实的”。新小说的中心从个人觉醒转移到了民族觉醒。马斯顿·安德森（Marston Anderson）将这一过渡的特征概括为“一场代词的战斗，在浪漫主义者的我/我们和现实主义者的他/他们之间展开的一

① 郁达夫 1984a: 124。该版本封底评论引用了这一可怕的故事，以证明郁达夫对革命的忠诚。

② Pye 1968: 70.

③ 在对比理性与激情——而不是非理性——时，Pye 将理性视为一个渐进的、技术统治论的民族发展路径（实际上它可能是异常冷靜的），而将非理性比作革命。

场较量”。^①然而，避开第一人称代词并不是完全避开自我，因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引入了更广泛的自我定义，包括了主格和宾格的“他们”。它根据个人自我觉醒的模式，视群众的觉醒和解放为主体。

98

历史研究的对象沿着相似的轨迹演进，从单个的人变成集体的人，从第一人称变成第三人称。在1920年代成年的一代历史学家，接受了西方批评方法的训练，并服膺于历史进步的目的论。^②一开始，新的历史学家像当时的小说作者一样，对个人的历史作用表现了浓厚兴趣。1920年代初，受浪漫主义风尚影响，历史传记的主角被刻画成“斗争中的独特个人——一个不道德社会中的有道德的人”。^③然而数年之内，个人性的主体在历史研究中开始呈现为一个更大的共同体——通常是士大夫共同体——的代表，后者依次呈现为一个更大的民族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其《自传》(1926)中，以觉醒过来的自我的典型浪漫主义，公开表白了自己的精神忧郁症。但几年以后，再也不能认为他的传记仅仅描述了一个独特的、斗争中的个人。一位读者评论道，顾颉刚的痛苦和忧伤代表了“整个阶级的痛苦”。^④在国民革命时期，顾颉刚及其民族主义历史学家的圈子，推动了历史研究范围的进一步开放，以塑造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之间的一种新关系。顾颉刚以中国人民的形式，将大众引入了精英学术之中。“这种新史学中的‘民众’，”劳伦斯·施奈德 (Laurence Schneider) 解释道，“被这一群体认为是新民族中非常无知、非常粗野（但很重要，具有自发创造性）的人。”^⑤

① M. Anderson 1990, 26.

② 见本书第一章。

③ Schneider 1971, 86.

④ 同上：108。

⑤ 同上：7。

对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小说家来说，对群众的发现，其意义不在于它符合自己的技艺实践，而在于它的内涵。它呼唤他们用自己的技艺来服务于民族。对于历史学家顾颉刚来说，发现群众意味着必须调整（自己的）研究和调查，以“适应现代民族的需要”。在新小说的作者看来，它意味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在每一种情形当中，知识分子和普通百姓之间形成的关系，都是一种知识分子教导群众的关系。对那些没有教养的民众，当然几乎没有同情可言。顾颉刚坦率地注意到，只有“研究民众，从而改造民众”，民众文化才能派上好的用场。^①作家们尽管努力使自己的实践民主化，但由于他们站在民族解放故事的作者这一位置上，他们还是远离了自己的阶层主体（大众）。

99 当时最普遍的故事线索之一，是详细描述男主角从被捕、突然的觉醒到随后逃跑的解放过程。这种解放叙事有一些限定的情节，其策略和结果受到了情节初始条件的有效制约。其中包括了一个被囚禁的（或沉睡的）自我，一个囚禁人的（或者引人入睡的）他者，以及揭示了一种逃跑方法的自我觉醒。^②在情节本身或多或少可以预测的同时，被捕者和抓捕者的特征，觉醒的形式，以及逃跑的方法，所有这些方面都可以有不同的创造性解释。

有关自我觉醒和解放的欧洲古典作品《玩偶之家》（*The Doll's House*）被中国人的接受，这体现了（小说的）可能变化范围。1918

① Schneider 1971: 8, 67—68, 183.

② “出路”一词在中文中的使用频率，远比英文中相应的词更高。它与“觉醒”一词的使用频率相似，后者期待着某种逃脱：没有预示一条“出路”的觉醒因而就是一场噩梦。正如鲁迅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鲁迅 [1923] 1980b: 87。

年，易卜生（Ibsen）的剧作首次被译成中文，随后10年继续在中国发挥着不可抗拒的影响力。在当时的论争中，易卜生的地位与马克思并驾齐驱。梁启超说道：“马克思差不多要和孔子争席，易卜生差不多要推倒屈原。”^①《玩偶之家》的情节，说明了马克思和易卜生为何会被同等对待。用当时的话来说，剧作的女主角娜拉（Nora），原先天真地相信丈夫的忠诚和社会的仁慈，后来从中觉醒，开始正确地评价这些对个人自主性的侵犯方式。她的觉醒是该剧情节得以接受的关键。如果娜拉没有觉悟到自己的处境，她也许会非常幸福地度过自己的一生。然而一旦觉醒，她就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有意屈服于束缚自己的那些力量，或者逃跑。她选择了后者。为了一种更不确定、更加冒险的个人自由的未来，娜拉关上了丈夫和孩子的房门，永远放弃了舒适的社会位置中的安全感。^②

对社会束缚的觉醒和从中解放出来，这二者的汇合似乎是《玩偶之家》在中国受到欢迎的根源，但它也是围绕该剧产生的争论的根源。很少有人怀疑娜拉应当觉醒，并且在觉醒中发现“出路”。争论的焦点在于她的觉醒的本质，即娜拉在被囚禁期间代表了谁，束缚她的是什么。^③1918年6月，胡适在新文化杂志《新青年》的一期特刊上介绍该剧，当时他对易卜生的大胆笔调留下了特别深刻

① 梁启超 [1922] 1979: 270。屈原是他那个时代杰出的道德家和文学家，写下了长篇散文诗《离骚》，并因拒绝服务于腐败的宫廷而选择了自杀，由此流芳百世。

② 用鲁迅的简短概括来说：“娜拉最初满意地生活在一个‘幸福之家’，但后来觉悟到自己只是丈夫的傀儡，孩子则是自己的傀儡。于是，随着大门的关闭和帷幕的降落，她离开了家庭。”鲁迅 [1923] 1980b: 85。

③ 我获益于许多关于该剧意义和被接受的出色研究。见 Schwarcz 1975: 3—6, Eide 1985: 193—222, Eide 1987, Brown 1993: 74—75。Brown 指出，该剧题目译成《一个玩偶的屋子》（*A Doll House*）更为合适。（《玩偶之家》的英文为 *The Doll's House*。——译者按）

的印象，后者暴露了包围和窒息娜拉的“社会和家庭实况”。^①很少有人看重这一点。评论者之间似乎有一种不言自明的共识，即各人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自我和共同体的定义尽管互不相同，但两者都处于囚禁之中，都在争取自由。相反，在一场关于囚禁的自我的定义、娜拉受压迫的原因，以及编排一个解放故事的合适文学模式的冗长争论中，遭到驳斥的，正是胡适对娜拉的个人性的强调。

在胡适的分析中，娜拉虽然是一个女子，但她被视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个人。他对娜拉的定义有效地界定了束缚她的各种势力。
100 在娜拉身上，个人对抗着并超越了家庭、法律、已被接受的道德规范，以及支持压迫和专制的所有社会、文化力量。但随着讨论的展开，别的作者不是将娜拉视为个人，而是将她视为一个女子，或者一个女性共同体的代表，后者在其家庭中对抗着更大的父权社会力量。一开始，批评家和文学家丁玲本着“一个完全个人主义”（随着胡适的立场渐渐为人所知）的立场来评价娜拉的困境，后来逐渐发展出一种女性主义批评，不仅将娜拉视为争取自由的个人，而且还肯定了她的性别。娜拉的解放似乎以妇女阶级的解放为前提。^②茅盾走得更远，将妇女的命运与所有被压迫的社会阶级联系起来，并宣称个人的解放和妇女的解放必须以无产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前提。在这种宽泛的解读中，劳苦大众受到中国有产者的剥削，中国自身的自治则受到国际资本主义体系的制约。如果中国的娜拉们希望获得自由，她们应当觉悟自己受压迫的阶级本质，一走出家门就参加社会革命。^③

① 胡适 1918, M. Anderson 1990: 32。

② Eide 1985: 216。

③ 同上: 203。

随着对囚禁主体的每一次重新界定，以及对束缚娜拉的势力的每一次重新思考，解放的叙事开始失去其纯洁性。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知识分子期望在民族建设的更广泛需要和他们自己争取个人自由的需要之间几乎不存在矛盾。他们期待，民族国家会将个人从所有的社会和政治压迫形式中解放出来。^①但是，被囚禁的自我的观念从个人扩展到民众共同体，引发了一个关于个人和民族解放关系的深层问题：个人的自由要求集体的团结吗？胡适将娜拉视为个人来描写其解放时，已经承认其困境有着更广泛的社会背景。他的视角是自由主义的：“一旦有了独立的男女，自然将创造一个好社会。”^②在胡适的评判中，社会和民族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一个集体性自我，因此，两者都不是觉醒或解放的合适主体。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胡适相信，将觉醒的自我等同于更大的社会自我（或者民族），这是自由的敌人，因为它将个人解放的叙事变成了集体枷锁的叙事。^③但娜拉解放的故事也能被解读为表现了集体纪律是个人解放的条件。从个人到妇女、无产阶级和民族，自我的定义决非无从比较，但在不同的规训体制下，它们都服从于更加次要的自我，每种体制都假定，个人解放优先于伦理共同体的解放。

丁玲的个人命运揭示了其中的运作程序。^④在放弃了追求性别团结的个人主义之后，1920年代中期，丁玲转而支持民族和阶级解

101

① 《新潮》杂志周围的知识分子，包括罗家伦、傅斯年和顾颉刚在内，与这个问题紧密相关。Schneider 1971: 28.

② Eide 1985: 199.

③ Grieder 1970.

④ Spence 1982: 288—335 敏锐地追述了丁玲的命运，其中的讽刺也恰到好处。

在保安的总指挥部，随后前往延安，受命为共产党管理政治教育。在那儿，她满怀热情地转而创作适合于“天堂”（她对延安的称呼）的诗歌、散文、剧本和文学评论，由此最终找到了自己的自由。但丁玲从未放弃对自身性别的认识。1940年，她开始在作品中暗示，妇女解放与共产党的纪律之间存在着矛盾。

在1942年3月的文章中，丁玲大胆地反思了国际妇女节的意义。她痛苦地谴责了革命根据地妇女所忍受的贫困、劳苦和社会束缚，颠覆了共产党关于这一节日的重要意义的虔诚声明。她注意到，当妇女进行抵抗时，她们被认为缺乏纪律性。而当妇女服从时，她们受到轻视，被认为是“回家的娜拉”。虽然丁玲忠实地守护着妇女运动的界限，警惕着错误的个人主义迹象，但她没有注意到，其他人正在守护着阶级团结界限，并警惕着种种漠视无产阶级纪律的迹象。1942年，她的批判姿态使自己再一次承受了党的纪律的全部重压，虽然这一次是来自共产党方面。她失去了主编《解放日报》的职位，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内部流放里，与群众“结合在一起”。然而，丁玲似乎顺从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在共产党对于解放叙事的解读中，囚禁任性的个人，就象征着集体的自由。^①

史景迁（Jonathan Spense）注意到，丁玲被逐出延安，为《玩偶之家》中娜拉的胜利离家出走提供了一个讽刺性的印记。该剧是一出古典的浪漫故事，剧中的男主角被假定击败了她的对手。即使一

① Spence 1982: 327—335. 大约在这一时候——1942年5月，毛泽东论述了作家和艺术家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来，越来越多的革命作家和艺术家来到延安，来到我们的抗日根据地，这是好事。但来到根据地，并不必然意味着完全与群众打成一片。如果要推进我们的革命工作，两者就必须打成一片。”毛泽东 [19]: 70. McDougall 1980.

位非常熟悉浪漫故事传统的观众，在该剧闭幕之前都可能预料不到娜拉的命运。作为个人和女性，她的解放得到了支持力量，但最终囚禁她的同样是这些力量，这一点人们尤其没有预料到。“娜拉走后怎样？”《玩偶之家》的中国信徒为此问题所困扰，这毫不令人惊讶。

在反思《玩偶之家》时，鲁迅对整个觉醒和解放事业，包括男人和女人、个人和民族的觉醒和解放，都持一定的保留意见。他的怀疑部分基于如下信念：年轻人很单纯，总是容易为浪漫的伪装所伤害。鲁迅的《伤逝》，意在为《玩偶之家》提供一个悲剧性注脚。文中一个年轻人长时间在会馆房间里与年轻的恋人厮守，上演着娜拉如何逃离父权压迫的故事。她适时地逃离了家庭，并与他结合在一起。大约一年后，当他们的浪漫情调消磨殆尽，已经无法掩饰共同生活的贫困和艰苦时，年轻人敦促恋人再一次模仿娜拉，虽然这一次是关上他的大门，让他一个人继续过无牵无挂的生活。觉醒过来的青年再也无法天真地说出这个想法：102

也还是去年在会馆的破屋里讲过的那些话。但现在已经变成空虚，从我的嘴传入自己的耳中，时时疑心有一个隐形的坏孩子，在背后恶意地刻毒地学舌。^①

年轻的女子子君带着耻辱返回家中，并在忧郁中死去。鲁迅对《玩偶之家》的浪漫结局所作的注释，暗示了一次根本没有提供解放的觉醒——或者最多是一次没有提供救赎的解放。对高尚情操的崇高吁求，太容易转变为“隐形的坏孩子”的体验，他们鹦鹉学舌地搬用真理和自由，却付出了真正的单纯这一可怕的代价。

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鲁迅的讽刺使这一悲剧景象有所

^① 鲁迅 [1925] 1980: 263。

缓和。实际上，他并不愿简单地询问娜拉的命运，而是提出了一个任何革命议程都未涉及到的深层问题。毕竟，如果觉醒不能提供任何“出路”，那它还有何作用？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鲁迅的修辞性问题引出的回答是，一次觉醒不会带来自由，它将挑战原来的觉醒希求。“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①但对于年轻的中国来说，这句话不起作用。娜拉可以返回家中而不走向困境，但觉醒过来的民族主义者却无法回头。

中国国民革命中设计的自我和民族的觉醒，是一部关于囚禁、自我觉醒和解放的浪漫故事，它将随着帷幕的落下而结束。少有革命者准备穿过帷幕，去观察其背后有什么东西。也许，一个革命派系如果不放弃领导革命的诉求，就必须去发现一条“出路”。无论如何，似乎总有另一种更伟大的觉醒在附近等待着人们。^②

① 鲁迅 [1923] 1980b: 87。鲁迅将中国比作患了幽闭恐惧症的“铁屋”，其中的居民最好在沉睡中窒息而死，而不要醒来之后却发现没有任何出路。这里面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这提醒我，鲁迅对娜拉的觉醒的评论，并不限于妇女，同样适用于觉醒这一比喻。见鲁迅 [1922] 1980: 37; L. Lee 1987。

② 梁启超 [1922] 1979。

第三章 一个中国，一个民族： 关于人种论的不平等条件^{*}

温都太太用“眉毛”看了看他们父子。看着这俩中国人倒不像电影上的那么难看，心中未免有点疑惑：他们也许不是真正中国人。

老舍：《二马》，1929^①

中国的民族主义伦理和小说偏爱一种特殊的叙述形式，即在人们觉悟到自己的被囚禁本质，并找到一条“出路”的时刻，整个叙述便达到了高潮。鲁迅告诫过，他们一旦觉醒过来，就永远不可能与从前一样了。对于那些更缺乏反思性的民族主义者来说，被解放的民族无论如何不可能与被囚禁的民族一样。因为首先，一个能够

* 此处副标题英文原为 The Unequal Treatise of Ethnography。unequal treatise 一词系作者自造的术语，形式上借鉴了 unequal treaties（不平等条约）一词，意思为某种不平等、不对等的状态。经与费约翰教授商讨，此处译为“不平等条件”。——译者注

① 老舍 [1929] 1980: 35—36。

自我解放的民族永远不会被囚禁。新的中国需要新的人民。因此，“旧中国”的残余必须被切割、挤压、推搡，直到它变得足够倾斜，以适应被认可的“出路”。在国民革命当中，这条出路就是“打倒军阀”和“打倒帝国主义”。民族主义者和军阀之间的斗争决定性地塑造了国家形态。^①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则塑造了新中国的人民。

人们逐渐知道，新民的生活方式和习惯与外国人有着惊人的相似，而后者正是反帝国主义运动的目标。同样，革命民族主义者要求新民所抛弃的那些恶习，主要是那些在通商口岸文学中与“中国佬”联系在一起的恶习。在这里，新中国并不是孤立的。后殖民民族主义，用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那煽动性的语句来说，是殖民的东方主义的一个“派生话语”。它接受了东方主义的本质论前提，以使它们重新回到殖民主义自身：

民族主义思想中的问题，正是东方主义思想的反面。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思想的“客体”仍是东方人，他们保留了东方主义话语中所描述的本质主义特征。惟有他者不是被动的、不参与的。他者被视为拥有能够自己“制造”的“主体性”。^②

104 当“中国佬”成为欧洲文学中的典型之前，中国并没有这样的人。然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只有通过“中国佬”这一欧洲形象交锋，才能开始收复自己的民族，并找到自己的“出路”。

毋庸赘言，国民革命中涌现的反帝情感浪潮，很难简单地归因于列强在华殖民存在的哪个方面。国民的反帝强度，似乎与中国经济中的外国成分非常不成比例。反对“文化帝国主义”运动所攻击的基督教共同体根本无关紧要，殖民警察的存在所激起的民众仇

① 见本书第四章。

② Chatterjee 1986: 38. 亦见 Said 1978。

恨，也与他们的数量和影响无关。^① 无论用何种方法来估量外国的影响，或者列举出多少压迫的事例，绘出一张关于经济、政治和大众文化中的对立力量的一览表，我们都很难解释国民革命中的国民抵抗强度。但是，简单的计算程序从来不适合于中国民族主义的经济本身。为了解释或证明反帝情感的力量而设计一种工具，以精确地度量外国经济或政治对中国的影响，任何这类企图都可能是错误的。

1920年代通商口岸殖民社会所偏爱的一种解释是，反帝情感是被“赤色分子”激起的，其目的是代表马克思和莫斯科来攫取中国的控制权。支持这一论点的证据相当薄弱。该论点赋予“赤色分子”的能力，远远超过了他们的（实际）数量和说服力量——当然在中国，“赤色分子”的数量并不比外国殖民者多——无论多少“赤色分子”都难以激起一种仇外情感，如果它不是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存在的话。另一种解释见之于殖民种族主义论及其在人们之间激发的反应，后者已经非常熟悉自己的种族主义。围绕着中国人的本质，殖民主义人种学和民族主义反思之间进行了一个世纪的对话，欧洲种族主义的影响在对话中逐渐增强，这要归功于一种新的种族敏感，后者急于为自身的“困境”找到一条出路。外国殖民者指出了“中国佬”的错误，解释了他可以如何改正错误，然后承诺，如果有了必要的改进，他就能收复自己的祖国。在国民革命当中，推翻帝国主义与良好的礼仪有着同样的重要性。

在关于三民主义的后期演讲中，孙中山指责了聚集在国立广东大学讲堂的听众们的礼仪和习惯，建议他们不要在公众场合随地吐

^① 关于民国时期的外国经济利益，见 Feuerwerker 1968 和 Hou 1965；关于外国人群体，见 Feuerwerker 1976；关于基督教和民族主义，见 Lutz 1988 和 Yip 1980。

痰和打嗝，要刷牙和剪指甲。在这里，他回应了外国游客的陈词滥调。但矛盾的是，他的嘲笑和建议都源于这样一种急迫的要求，即唤醒国人将外国人（或者如他所说的“帝国主义者”）从中国土地上驱逐出去。他说，只要帝国主义者仍然认为“中国永远不能振作，自己不能管理自己”，他们就会继续“覬覦”中国。“我们为什么不能治中国呢？”他问道。“外国人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孙中山代表听众回答说：“他们看得很清楚，……大家对于修身的功夫太缺乏。”^①

10年后，也即1934年，蒋介石发起了“新生活”运动，同样旨在提高公众的举止礼节。蒋介石再次重复了孙中山的建议，但他不愧为总指挥，以军事上的精确将新生活运动的纲领编制成96条法规，用来规范个人卫生、守时和纠正恶习。蒋介石偶然碰见一位衣衫不整的学生在南昌街头四处闲荡，然后决定发起新生活运动。用《字林西报》的话来说：“他认为自己洞悉了一些外国人看上去很轻视中华民族的一个主要原因。”^②和孙中山一样，蒋介石因为外国人轻视中国人而轻视中国人，并且和孙中山一样，他决心改造自己的民众，以证明外国人是错误的。自觉一词的含义在20世纪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迟到的国民事业的成功。到20世纪中叶，它不再指向伦理的自我觉醒，而是指向别人如何看待自己的行为——在穿着、个人卫生、餐桌礼仪等方面——的意识。梁启超的伦理变成了孙中山的礼节：在国民革命中，当中国人像重视伦理一样对待礼节时，中国似乎就将觉醒过来。

现代中国的礼节起源于更广泛的国民运动，就此而言，它是一

① 孙中山 [31]：33，135—139。

② Thomson 1969：156—157，Dirlik 1975。

次政治抵抗的行动。对于孙中山和蒋介石来说，人们必须“自觉”到的他者，就是外国人。^①但值得冷静反思的是，孙中山和蒋介石建议国人培育个人美德，目的在于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展开竞争，而他们的建议中又隐含了对殖民的种族主义表示的敬意。的确，在他们眼中，中国人应当有赎罪感，成为新民，这一点与欧洲种族主义者对中国人的缺陷的表述不无关系，这揭示了现代中国民族主义核心之处的一个悖论。新民是“中国佬”的镜像。

民族主义很少承认自己的起源。与一些鼓吹中国人“西方化”的同胞不同，孙中山厌恶把中国人变成外国人。^②他想创造一种更好的中国人，民族主义则是制造后者的工具。他反问道：“中国或者被英国征服，中国的民族变成英国民族，我们是好是坏呢？”显然不好。“笔是读书人谋生的工具，民族主义便是人类生存的工具。”^③中国人必须改进他们的手段，但不是为了成为英国人，而是为了能够成为更真正的中国人。

106

但是，何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为了界定和区分中国人民——或者用当时的话来说，为了探索中华“民族”的“性格”和“特点”，殖民评论家与民族主义改革者、革命家之间进行了对话，从中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衍生特征。这是一次真诚的对话。双方没有相互轻视，都积极回应对方提出的新证词，努力界定出“真正的”“中国佬”，从而将中国定位于各个族群的竞争性秩序中。然而，这又是一次不平等的对话。在关于“中国佬”的殖民批评当

① 对于礼节的兴趣，亦可在资产阶级市民社会兴起时找到根源。见 Rowe 1993: 139—157。

② Zhang Jingsheng, 引自 L. Lee 1973: 270。其他人主张中国文学彻底“西方化”。见罗家伦 1919, Schneider 1971: 154—160。

③ 孙中山 [31]: 70。

中，中国民族主义者面对着一一种关于自己的知识，如果他们对其进行批判，就势必使自己的觉醒成为问题。但这毕竟是一次重要的对话。针对不平等条约的地位，北京政府与列强在凡尔赛、华盛顿的代表之间进行了正式谈判，关于“中国佬”的特征的讨论，刚好与这一步调呼应。从人种论方面成功地恢复“中国人”，是中国民族主义者成功地收复权利、与列强在平等基础上谈判签约的一个前提条件。

被囚禁的中国

那些谋划中国的觉醒和解放的人，自然认为这个国家及其人民都为外国人所囚禁。但是，被囚禁的到底是什么？在民国初年，19世纪的不平等条约仍然限制着中国对外国公民的权威，制约着中国在海关、关税和国家垄断事业等方面的自主权，并继续将一系列惩罚性赔偿强加给中国，如果不废除所有的既存条约，拒绝前清遗留下来的总债务，中国就无法摆脱这种赔偿。^①然而，与帝制时期相比，中国人有了更多的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到国外旅行，自由地随行就市，在任何地方进行贸易，并且在外国的让步下，被赋予了有条件的但却是史无前例的写作和言论权利，以及相对自由的集会结社权利。

107 在某种意义上，民族的被囚禁迥异于国家的被囚禁。18和19世纪，当中国遭到西方列强的敲诈勒索时，中国人的自我形象也被囚

① 不平等条约，是指随着19世纪一系列战争的失败，外国强加给中国的条约。见 Morse 1910—1918, Willoughby 1920, Fairbank 1953, 徐中约 1990。关于中国人对这些条约的权威性看法，见 Chien, Shao, and Hu 1964。

禁了。欧洲游客用文字、绘画和相片记录了中国的人情风貌，捕捉到无数典型的“中国佬”标本，将它们钉在自己的人种志标本簿上，带着它们周游欧洲各地。^①有进取心的中国艺术家和企业家准备了独特的卷轴和柳树图案的陶器，想在欧美的繁荣中赚一笔钱。但是，当19世纪末的中国民族主义者在阅读和旅行中碰到这些关于“中国佬”的讽刺漫画时，虽然其特征依稀可辨，但他们强烈憎恨这种讽刺漫画目前在欧洲社会中所导致的嘲笑。他们立下誓言，不仅要解放自己的国家，而且要解放欧洲人想像中的“中国佬”。

殖民者和民族主义者界定中国人并刻画其特征的尝试，基于一种基本的人种学训练，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它被理解为“关于人类民族或种族及其风俗习惯和差别的科学描述”。^②甚至当其科学性还不明显的时候，人种学实践就在其研究对象的制造，也即在构造和传播“人类民族或种族”理念，以及提炼其“风俗习惯和不同点”方面，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世纪之交，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开始探索中华民族的特征，这时他们已充分意识到了欧洲人的竞争声音，后者也要来界定中华民族的特征。大体上，民族主义者的人种论与欧洲本质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的作品之间逐渐显示了奇怪的相似，后者也描绘了欧洲人想像中的“中国佬”的奇特风俗礼仪，这是因为，惟有通过与“中国佬”的欧洲形象进行交锋，民族主义者才能为自身收复中华民族。民族主义者维护着用自己的大众人种学来界定和描述中国人的权威，视之为通向民族解放的第一步。毕

① Spence 1988.

② 《牛津英语词典》（牛津，1893）。西方对中国人种学的研究，主要局限于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民间传说运动。见 Hung 1985 和 Schneider 1971。然而，对于中国人和其他人的“性格”的非正式评论，广泛见于文学和政治话语之外。

竟，他们将决定真正的中国人究竟是什么模样，并且同样重要的是，决定谁将有资格被纳入到他们当中去。

108 这一确定民族特征的竞争，绝没有脱离欧洲和中国间的竞争背景。它是斗争的一部分。外国游客坚持将中国确定为“文明民族范围内的……等级之一”，其等级与其保卫自身领土、保护国家主权的能力相一致。^①在中国内部，国家之间的竞争逐渐被理解为种族、民族和文化之间争取历史地位的自由竞争，而不仅是军队或国家之间的竞争。梁启超明确地指出了这种联系：“彼官吏者，亦不过自民间来，而非别有一种族……犹果实从根干而出。”^②从这一点来看，民族国家无论如何无意，都代表了拥有独特民族文化的民族实体，它们都能被归纳为一套确定的、可以量化的特征。梁启超在另一个场合注意到：“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因而，每一种民族文化都可以通过民族国家在贸易、外交和战争中的相对成功而得到评价，因为每一种文化都被认为给予了其国家在国际竞争中或胜或败的能力。因此，一个民族的“特质”——按照梁启超的思维方式，“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都被认为有助于增强国家的能力，使其在国际性国家体系中保卫领土、坚持主权和建立自主。^③

旧的学术精英集团几乎不赞同革命理论，也不那么相信进步，但甚至在其成员中间，中华帝国败在欧洲人和日本人手下，这同样被视为文明的耻辱。战争的失败提出了关于中国文明和文化的一个重大问题：“中国怎么了？”直到今天，这一问题仍然浓缩于精英们

① Barrow 1806: 4.

② 梁启超 1900: 18。

③ 梁启超 1902。此处的英文翻译采自 Teng and Fairbank 1979: 222。

对自身历史的体验中。其他殖民地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提出了相似的问题，但在中国，这远非一个问题。^①这是一个中心问题，由此产生了上百个不同的问题，从儒家伦理到大众卫生习惯，（中国人）生活的每个方面都涵盖在内。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来说，中国出了问题，是因为中国人自己出了某些差错。中国的皇帝不是英国国王的手下，因为“中国佬”不是约翰牛（即“英国佬”）的对手。

国民革命到来之时，惟有行为古怪的人才敢声称，民族的自我反责，或者说对中国人的过错进行科学探索，也可能会被误导。辜鸿铭公开声称，中国和中国人几乎没有什么差错。他直到去世都梳着长辫。不过，辜鸿铭的反思，确实对其同胞之间的流行情绪提供了具有教育意义的印记。他热爱“真正的中国人”，看到那些年轻的学生攻击中国传统文化和社会，希望改造它们、恢复民族的骄傲，他感到非常厌恶。在他看来，中国没有任何应当感到羞愧的地方。他问索默塞·毛罕（W. Somerset Maugham）：“要我告诉你吗？因为他发明了机关枪。你也就有了自以为优越的资本。”如果中国没有任何毛病，那么洋人眼里的“中国佬”也就不存在多少问题：“世界文明最真实而宝贵的财富就是毫发未损的中国佬；毫发未损的中国佬是文明之宝，因为他用不着这个世界烦心去指手画脚，为他的‘秩

① 在这一点上，对比中国人对其民族运动的自我鞭挞和日本人对其民族运动的自夸，是毫无意义的。总体而言，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倾向于将其传统文化中不那么进步的方面，归结为外来的、很久以前从中国引进的东西而加以抛弃，并以时尚、热情和适应能力来拥抱现代性。这种适应能力，他们认为是日本文化独有的东西。到1920年代，关于日本民族主义的问题，已经不是“日本有何不对”，而变成了“日本人缘何诸事皆宜”。对此问题的回答，就是（现在仍然是）庆祝日本人民的独特“性格”。反对这样评价日本的成就的民族主义者，通常也对现代性本身表示异议。见 Najita and Harootunian 1988: 712。

109 序’问题说三道四。”^①辜鸿铭提到的秩序，暴露了他对现代民族国家权力的恐惧。他不希望中国成为那种能够让其民众保持秩序的国家。对辜鸿铭来说，中国没有任何错误，有问题的只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坚持认为中国有毛病。问题在于民族主义自身：辜鸿铭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拍着胸脯、喋喋不休地批评中国人的过失很不耐烦，但他的不耐烦与他的长辫子一样古怪。那些外国评论家毫不犹豫地评判中国人的过失，或者为中国人的普遍进步提出补救建议，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却呼应了他们的指责，这令辜鸿铭感到失望。

鉴于中国民族主义者与关于中国人过失的欧洲殖民思想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有必要记住，欧洲文学中的华人形象，对于中国人的“特征”也有赞同的时候，有必要思考它们是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变得如此糟糕。17和18世纪，更多的是通过自己与特权和暴君的斗争，而不是通过对中国的深入了解，欧洲从中国发现了一个理性王国。中华帝国的士大夫似乎促进了欧洲法律的发展，这就足够了。不过，当启蒙运动思想家有选择地利用中华帝国制度的某些特征来为国内政治改革提供依据时，他们还得出了关于中国人的其他特征的结论，而且这种结论往往非常慷慨。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Leibniz, 1646—1716)得出了如下著名判断：“如果指定一个智者去评判……各民族的美德，他会将金苹果奖励给中国人。”^②当实践证明中国政府不屑于欧洲政治改革的模式时，嘴里的金苹果就变酸了。于是，欧洲人对中国的国家特征、中华民族的道德和个人习惯

① Maugham 1955: 94. De Francis 1950: 245. 将中国人称做“黄族”或“黄民”，在中国民族主义著述中非常普遍。“种族意识之父”章炳麟也使用这一语汇，尽管他很不愿意像同时代人那样嘲笑中国人的性格。见 Shimada 1990: 37。

② Edwardes 1971: 104.

进行了仓促的观察。惊鸿一瞥，东方圣贤脸上的面具倏然滑落，露出了“中国佬”的真面目。

18 世纪后半叶欧洲人对真正的中国人的了解，来自于与中国更密切的接触，但这是一种特殊的接触。它来自于中国的被囚禁。中国官员并不热心接受外国访客，先是将对外贸易限制于广州一口，同时试图将传统的朝贡体制强加给来自欧洲的正式使节。两种计策都没能持续下去。皇家海军的舰船击沉了中国海军的帆船，外国舰队展示了自己的优越性，能够轻易地在中国领土上击溃八旗军队，一旦如此，来访者就能更加自由地进入这个国家。然后，他们开始了解这个国家及其人民，其方式与一个猎人逐渐理解其猎物，或抓捕者欣赏其俘虏的方式没有什么两样。这一不平等关系的更明显标志，包括强迫中国接受“不平等条约”和巨额的财政赔偿，以及在中国土地上驻扎外国军队、创建外国居留地。但外国来访者的兴趣并不只在于获取权力和财富；他们还想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而且希望能比从前更精确、更详细地了解他们。在囚禁中，中华民族成为另一个民族审视的对象，并且逐渐失去了大胆评判自己的信心。

110

现代欧洲帝国的扩张，既源于财富和影响力方面的竞争，也源于对知识的渴望。拿破仑冒险进入埃及，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军事远征，但它取得了一项史无前例的成就，即记录下了东方的历史、风俗和语言。^①在英国方面，精明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拨了一笔资金，用于开展印度人种和文化方面的研究，在西泊尔（Sibpur）、萨马科特（Samalkot）和萨兰普尔（Sharanpur）建立示范性植物园，成立研究异域动物的动物园，并为伦敦的皇家植物园提供样品和标本。在约翰·巴罗的指导下，皇家海军不得不免费运送科学标本，并且保

① Said 1978: 80—92.

证它们完好地抵达国内港口。英帝国的个别叛徒和行为古怪者也同样沉溺于知识的游戏。从1891年开始，托马斯·拉弗耳斯(Thomas Raffles)不顾东印度公司的漠视，冒险将新加坡旧城改造成一座现代港口。从一开始他就预见到，这座城市不仅是商业贸易的自由港，而且将是科学知识和标本从亚洲出口到欧洲，以及欧洲科学、伦理和法律进口到东亚和东南亚的一条通道。拉弗耳斯花费了大量时间沿着海岸线航行，研究当地民族的风俗习惯，收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制作分类目录，并派人将它们送回英国。东印度公司以罚款回报了他的热情，因为他的支出超出了预算。^①

在帝国扩张被纳入考虑之前，也就是后来所说的“资本时代的帝国主义”之前，殖民主义的文明使命得到了非常严肃的对待。^②旧式帝国主义者担心，粗鲁的财富追求将削弱帝国在被殖民者眼中的光环。无论如何，知识探求与更粗野的帝国事务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正如拉弗耳斯付出代价才观察到的，这两种事业之间经常发生矛盾。伟大的商人是最早一批的经济还原论者，并且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

- 111 1834年，泰勒(W. C. Taylor)抱怨道：“世界上有太多的人……非常渴望看到(帝国的)权力增长和延续下去，但却忽视了其首要因素——知识。”^③在皇家亚洲协会所作的演讲中，泰勒广泛地反思了过去两千年间帝国延续不绝的命运，详细论述了商业和学问之间的关系。他指出，帝国可以奠基于“通商这一黄金纽带”之上，但如

① P. Johnson 1991, 350—351.

② 只是在20世纪初期，也即经典的“帝国主义”阶段快要结束时，J. A. Hobson这样的社会理论家才想到将帝国主义视为经济基础。Hobson [1902] 1965, Lenin 1916.

③ W. Taylor 1835, 9.

果不通过研究“社会条件”来加强这些纽带，它们就注定要断裂。希腊人、罗马人、帕提亚人和波斯人都未能认识到商业和学术之间的联系，他们的帝国因此遭受了灾难。在中世纪，当基督教最终“唤醒了对亚洲民族的宗教和哲学的关注”时，这一疏漏部分地得到了修正。但在宗教改革时期，它仍然没有得到完全采纳。它也不可能得到采纳，因为预示着东方研究真正出现的先驱不是宗教往来，而是一个“比罗马帝国更加辉煌的”新帝国的兴起。知识最终在大英帝国找到了自己的家：最后的、最伟大的帝国是一个理性的帝国。其惟一基础是其臣民的良知，“因此，它的维系必须依赖于与臣民观点的不断协调”。^①

得到印度之后，（英国人）需要在前所未有的广泛的学科领域内，对殖民对象的本质进行探究，以领会构成了印度“民族特征”的所有因素，迫切要求在较过去从事的更加广泛的学科范围中了解。同样，与中国的关系“要求异常广泛而确切地了解中国人的独特风俗和制度”。泰勒向那些恶意批评他的人保证，如果（大英）帝国将东方研究恢复到合适的程度，那么从地中海到中国，研究东方的学生将很好地服务于帝国：

皇家亚洲协会原本就打算成为一个智囊库，为所有需求者提供有关在东地中海和中国海之间的全部国家的当前贸易和国力状况……正是在贸易中，也正是在英国和东方国家之间的贸易领域，“知识就是权力”这句格言的真理性得到了证明。^②

① W. Taylor 1835: 7.

② W. Taylor 1835: 9. Taylor 引用了这句众所周知的格言，他相信，知识的获得，不仅是在亚洲的殖民事业，也是所有权力关系中的主要部分。可比较 Foucault 1972, Said 1978。

这样获得的知识将在帝国管理中发挥工具性的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足以使当地人对英国在知识本身方面的优势基础留下深刻印象。“帝国在东方的基础，”泰勒总结道，“是关于我们的知识优势的观点。”^①

112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并非不熟悉知识和权力之间的关系。到 1920 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已经开始怀疑外国人是否比他们更了解自己和自己的国家——或者至少怀疑他们对中国的了解是否比自己更权威。因此，（中国人）在为收复中国领土、主权和政治统一而斗争的同时，也在力争为中国收复关于中国的知识。至少，帝国主义为此提供了许多教训。“帝国主义不是瞎吹的！”1920 年代的某个时候，小说家老舍在偶然误入伦敦皇家植物园东方园的某个角落后注意到：

不专是夺了人家的地方，灭了人家的国家，也真的把人家的东西都拿来，加一番研究。动物，植物，地理，言语，风俗，他们全研究，这是帝国主义厉害的地方！他们不专在军事上霸道，他们的知识也真高！知识和武力！^②

与 18 世纪中期的动植物标本和裹脚的遗骸一道，关于“中国佬”的“真正特征”的权威知识慢慢传回欧洲。1740 年和 1744 年间，乔治·安森船长（George Anson，后来的海军上将乔治爵士）进行了英国人的第二次环球航行。他从国王陛下那里得到了明确的授权，如果有机会就“取道中国回来”。^③ 安森的目的地是南海。他出航的

① W. Taylor 1835: 8.

② 老舍 [1929] 1980: 204。《二马》写于老舍在伦敦期间，开始创作于 1924 年，大约在他 1929 年 6 月离开时完成。

③ Barrow 1839: 35. 安森对广州的访问，并不像人们普遍认为的那样是偶然的。当他驶向中国沿海时，他的船只确实严重受损，但他也确实是在英王的明确命令下行事的。

路线，早已因为英国海盗的种种“恐怖而残暴”行径而变得臭名昭著，当时帝国建构与海盗行径没有多少区别。^①3 年时间里，安森及其船员（其中三分之二因败血症而丧命）袭击商船，绑架贵族，勒索妇女和儿童，劫掠港口，在定居点放火，最终于 1743 年驾驶“森图里昂”号（H. M. S. Centurion）帆船进入了广州港，进行修理和补充给养。在其要求遭到抵制后，他决定揭穿地方官员的虚张声势，要求进入广州港，并威胁要击毁驻扎在该港的中国舰队。此前不久，他在太平洋上的一个西班牙人居留地尝试了同样的举动，并在目的落空后立刻将其夷为平地。广州的官员屈服了。^②

地方官员的行动或许拯救了这座城市，但他们的屈从玷污了中华民族的声誉。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帝国当局的行为，已经陷入了一种当地人在欧洲人的威吓面前屈服的模式，它始于 16 世纪初西班牙对墨西哥的征服，而安森船长正是急于仿效这一模式，才在前往中国的途中进攻西班牙人的居留地。因戈·克兰丁（Inga Clendinnen）注意到，荷尔南多·科特斯（Hernando Cortes）遭遇蒙特祖玛（Montezuma）的传说，提供了“欧洲与一个有组织的当地国家交锋的第一个重要范式，一个很快具有神话般的潜能和包容范围的范式”。虽然这个神话开始于 1540 年代，但直到 19 世纪，它仍然广泛出现于普莱斯科特（W. H. Prescott）的《墨西哥征服史》，以及其他专家关于欧洲人遭遇亚、非、美、大洋洲本土国家的研究当中。这则神话的核心是一种信念，即欧洲人之所以能战胜敌人，是因为他们在“文化上的优越性，它不仅表现在物质装备上，更体现为心灵和道德

113

① Barrow 1839, 58.

② 安森曾将西班牙人的居留地 Paita 夷为平地。Barrow 1839, 55—61.

品质的无比威力”。^①其影响是将衰亡的民族与衰落的国家连在一起。

安森一旦依靠武力威胁成功地进入广州，西方人早先关于中国形象的独特大厦就崩溃了。^②安森的传记作者约翰·巴罗爵士（Sir John Barrow）在1838年写道，安森的大胆行动暴露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特性”：

由于英国战船的新奇，由于其船长的坚定，由于明智地展示了自己的力量，偶尔夹杂着一些可能有必要使用的威胁，此外还由于早就洞察了这个民族的真正特性，安森成功了。

巴罗继续描写了安森的先驱性功绩，即揭露了“中国人的虚伪、愚蠢和无赖行径，不仅遍及政府的每一个部门，而且相当自然地，普遍影响了这个民族”。^③安森的回忆录，精确地传达了中国人的投降对于华人原型之命运的意义。由于中国人未能进行有效的抵抗，他们掩盖在礼节和智慧的文明表象下的“胆小、虚伪和欺诈”被暴露出来。^④中国的官员，“尽管受到了天主教传教士及其欧洲书记员的过分赞颂……但与其他人类一样，都由同样的材料组成”。^⑤

更独特的是，在巴罗看来，当“坚定”逐渐被英国人视为一种美德的时候，广州官员的屈服表明中国人显然缺乏性格。因此，安森是值得相信的，因为他“早就洞察了（中华）民族的真正特性”；

① Clendinnen 1991, 65.

② Edwardes 1971, 107.

③ Barrow 1839, 72.

④ 安森的回忆录是由另一个人撰写的。最初面世时，其署名为“Mr. Walter”，即船上的牧师，但它更有可能是船上的轮机员 Robins 所撰。见约翰·巴罗的“序言”，Barrow 1839.

⑤ Rule 1988, 5.

用巴罗的话来说，这一点“在当时并不像在今天一样普遍为人所知”。^①

安森胜利返回朴次茅斯和巴罗的写作之间相差了一个世纪，在此期间，英国海盗关于中国人的“真正特性”的发现，实际上已发展成为常识。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记录了鲁滨逊·克鲁索（Robinson Crusoe）单人驾船返回英格兰家乡途中，经过广州时对中国短暂印象，似乎这是任何一个步安森后尘的忠实观察者都会得到的印象：

他们的港口只有一些舢板和树皮，与我们的航行、商船队和强大的海军相比，算得了什么？我们伦敦城的贸易比他们整个辽阔的帝国还要多。只要一艘装备着八十支枪的英国、荷兰或法国军舰，就可以打败和摧毁中国的所有舰船。

114

安森的来访具有重大意义，此后，不仅（中国的）城市和港口遭到了嘲笑，中华民族也遭到了嘲笑。一艘军舰就将一种文明完全暴露在严厉的批判光束之下，对于这种威力，鲁滨逊·克鲁索表现出孩童般的兴奋。认为中国很强大、富裕、辉煌，这是对常识的公开侮辱，因为整个帝国竟然无法抵抗一艘装备着80支枪的舰船。很明显，中华民族是“一个野蛮的异端民族，几乎比野人好不了多少”。^②随后的一个世纪中，在1842年鸦片战争爆发之前，*英国公共教育体系的更多毕业生将到中国，包括安森的传记作者约翰·巴罗，1793年至1794年间担任马戛尔尼使团随员，以及1816年至1817年间由阿美士德爵士（Amherst）率领的另一个使团。马戛尔尼和阿美士德立场

① Barrow 1839: 72.

② 这一情节见于《鲁滨逊漂流记》（*The Life and Strange Adventures of Robinson Crusoe*）——书的第2卷。张隆溪 1988: 122。

* 鸦片战争于1840年爆发。——译者按

“坚定”，拒绝在中国皇帝面前磕头，他们将同样的信息带回了英国，即中国官员和民众腐败、懦弱并且虚伪。^①

更多的人是坐在家中的炉火旁作出判断，随着英国人勇气的每一次新展示和英国海军的每一次胜利，他们对中华民族的评价一点点降低。^②“中国佬”在广州对安森船长的屈服，最先暴露了自己的缺点，但这仅仅是最初的、部分的暴露。用一个躺在安乐椅上的观察家的话来说，从安森袭击广州到鸦片战争的一个世纪，需要“通过战争或谈判所做到的一切，来打垮这个极度自大而又极其懦弱的民族，并使之跪倒在地”。在“战争和谈判”、商业和贸易，以及由于英国的胜利而导致的日常接触中，一串令人痛苦的缺点暴露了出来。这些接触逐渐传递出英国人与中国人的关系状况，根据托马斯·德·昆塞（Thomas de Quincey）的判断，它们来自于“我们对这一情形的更多了解，以及自从与他们奸诈的行政当局签订上一个条约以来，我们获得了关于中国人特性的更多经验”。安森的使命意在给中国人一个有关约翰牛（John Bull，指英国佬或英国人。——译者）的教训。“正是安森爵士第一次给了中国人一个教训，让他们惊讶地认识到，民族与民族之间可能潜藏着什么样的差异”，德·昆塞评论道。一个教训显然不够。“中国人种学”（德·昆塞的用语）中的英国人形象，并没有充分考虑到大不列颠“民族的伟大”。中国的人种观念未能承认英国人应有的价值，这一不可思议的失误最终证明了中国人的愚蠢。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决心纠正中国人种学的短处。^③

① Cranmer-Byng [1902] 1962, Barrow 1806. 关于阿美士德使团，见 Ellis 1817。

② 例见 De Quincey [1857] 1897: 345—367，一般性的介绍，见 Dawson 1967。

③ De Quincey [1857] 1897: 350—353.

世纪之交，启蒙时代中国的辉煌形象只有颠倒过来才能看见。甚至连哲学老大的“辉煌之恶”，在“中国佬”身上现在也表现为“衰朽之德”。^①熟悉往往会产生轻视，特别是在安森的同胞中间。“人与人之间真正的相互理解，”1926年，英国侨民吉尔勃在上海写道，“……往往导致相互间的厌恶、怀疑、轻视、对抗或真正的仇恨，正如它也会带来温柔的同情和爱一样。”英国的博学者们相互攀比自己与中国及其人民的接触长短和亲密程度，以使自己有资格评判其种族特征。无论如何，并非所有人都宣称中国人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种。英语世界流行的人种论作品所确立的传统，刻画了一幅肯定性的中国人及其“特点”的肖像。然而，从19世纪中期开始，即使是富有同情心的作家，也被迫采用了防御性语调。他们有属于自己的评论家。吉尔勃嘲笑道：“人们写出了大量有关东方国家的英语书籍，……虔诚地希望它们将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相互间的理解，从而产生相互间的同情。”但他们的努力弄错了方向，因为真正的理解只能培育出轻视。在英国的愤世嫉俗者看来，那些倾向于中国人的作品，只是源于作者对“真正的”中国的有限了解，或者某种与贸易或基督教有关的自私的或隐蔽的动机。^②但在传教士群体看来，仁慈使一些人的评估更慷慨。“评论者的个人品质越高贵，”埃德温·乔苏亚·杜克斯（Edwin Joshua Dukes）评价道，“他对中国人的评估就越善意。”因为约翰牛正在攻击中国，杜克斯及其传教士同伴一起向“中国佬”的防御发起了进攻。杜克斯断言：“约翰牛最近借用了布莱·哈特（Bret Harte）关于旧金山的阿新（Ah Sin）的歌谣。”“其方

① Rule 1988, 6.

② Gilbert 1926: 13. 吉尔勃的传教士偏见，呼应了先前的 Barrow 1806: 28—31 中表达的情绪。

式是那么阴险，其诡计是那么愚蠢，异教的中国人真奇特”，对于这类叫喊，杜克斯的回答是，中华民族的特性中几乎没有阴险和背叛。^①

随着 20 世纪的降临，甚至善意的英语作家，都能绘出一套关于中国人的罪恶的既定形式。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详细记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但她最终得出结论：“不能忽略有关其罪恶的既定公式。”1899 年她写下这番话的时候，中国人的罪恶形象已经充分确立起来，几乎不需要进一步的详尽细节。实际上，英语作家倾向于赞同中国人的罪恶本质，其分歧主要在于中国人在何种程度上可以挽救，或者至少，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为补偿性的美德所抵消。吉尔勃和伯德都可以列举中国人罪恶的“既定公式”，但吉尔勃认为这些缺点决定了中华民族将永远处于受奴役地位，伯德则承认其美德，并设想“一个真正基督教化的帝国……仍有可能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基督教为堕落者提供的希望，不亚于进步这一意识形态为落后者提供的承诺。一个像中国那样落后的国家，一个陷入无法形容的罪恶的民族，仍然存在着希望。^②

116

这样的观察并不限于英语世界。安森船长的成功鼓舞着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去模仿其方式；他的观察迫使启蒙思想家承认，如果中国人的著名智慧不能为保卫其王国服务，那它就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在安森出访后不久，卢梭（Rousseau）回应了这位海军指挥官的感情。他写道：

如果大臣的能力，法律的所谓智慧，以及众多的居民，都无法保护王国免受无知而粗鲁的野蛮人的征服，那么所有这些智者都为国家做了些什么呢？^③

① Dukes 1885: 77—78 及第八章（“中国佬的习惯和礼节”）。

② Bird 1899: 12—13.

③ Edwardes 1971: 108.

卢梭以高卢人的精明，将“野蛮人”一词用于英国人身上。虽然如此，他的观点暗示，如果一种文明不能阻止野蛮的行为，那它自身实际上也是野蛮的。无论哪一种方式，中国都被囚禁了，与之相伴的是“中国佬”的（屈辱）名声。如果中国人不能勇敢地抵抗外国人的进攻，他就既不值得仿效，也不值得奉承，他只是被诊断和治疗的对象。

当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失败暴露了其国民的弱点时，它鼓动了一个文明使者的幽灵来救治他们。不经意间瞥过一扇敞开的门，从一条小溪中飘出的一阵香气，喧闹的沙哑声音，回荡在中国大街小巷的咔嗒咔嗒的麻将声，这一切都证实了欧洲来访者的印象：混乱、污秽、顺从和宿命，华人种族必须根除这些陋习。于是，与干涉（中国）国家事务这一决心相伴的，是提高中华民族的道德水平这一强烈兴趣。只有最粗鲁的殖民者才认为应当通过直接干涉实现这一点。^①在传教士和更抱有希望的其他观察者之间，救治之道似乎在于使中国人相信，他们无法继续保持自身并希望在新的世界秩序中找到一个位置——如果他们愿意自己承担起这个负担，那才是皆大欢喜的事。“没有人想征服中国，”一个同情中国的外国人在1923年回忆道：“但谁都希望中国人征服自己。”^②在这一点上，从北京到德里（Delhi）以及别的任何地方，欧洲帝国主义的文明使者都发现了一个共同原因，可以解释当地人为何能被说服去接受“一个新式的文明和理性秩序”：这是现代自治民族国家的秩序。^③

① 吉尔勃不仅敦促列强干预中国的政治生活，还要求他们采取一项生物学计划，以纠正中国人天生的缺陷。Gilbert 1926: 18—19.

② *North China Herald*, 26 May 1923.

③ Chatterjee 1990: 623.

中国人怎么了？

孙中山和蒋介石并不是最先探讨中国人缺点的民族主义者。梁启超同样十分了解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看法，并在孙、蒋发动道德改革运动之前数十年，就已开始编辑一个地方恶习的清单。他还开出了一套用以纠正它们的治疗方案。

梁启超相信，如果事实上不存在真正的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中国人，因而他非常典型地开始着重探究中华民族的缺陷。存在着一个“真正的”中国吗？梁启超在其同胞中发现了许多缺点，其中让他最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竟然无法为自己的国家起一个名字。他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注意到：“数百兆人立国于世界者数千年，而至今无一国名。”梁启超在几篇论文中重复了这一断言，并且总是表达了同样惊讶的语调。^①不错，中国最近被赋予了一个名称，但不是来自中国人自己。甚至“中国”一词，都“是他族之人所以称我者，而非吾国民自命之名也”。（中国人）习惯于用朝代而非国家来指代历史共同体，这暗示着中华民族实际上根本不存在。^②在梁启超看来，作为中华民族文化和精神上不成熟的证据，缺少一个名称并不比缺少一个国家重要。它确实是民族性格中的首要缺陷。他断言，（中华）民族是存在的，它缺少一个名称，这只是“每

① 梁启超 1900：5.15，1903：14.1—27，1901：6.3。

② 梁启超 1900：5.15。近代以前，“中国”一词既不指（中华）民族，也不指领土意义上的国家，而是指皇帝在世界中心的位置。作为一个国家的正式指代，它在1912年首次以“中华民国”这一词汇缩略而成，尽管民国时期它既指国家也指民族。然而即使在那时，这一用法也不普遍。1930年代，在首都不远之处，地方上仍然称自己的国家为“大国”。见 Johnstone 1934：115。

个人头脑中”的一个“理想”错误。梁启超计划唤起民族的觉醒，其方法是警告中华民族留意自身的惊人错误。^①

民族的衰弱是中华民族的第二个重要缺陷。在《论冒险进取》和《中国积弱溯源论》这两篇重要的文章中，梁启超一开始就表达了对中国当前的“积弱”的羞耻和遗憾。^② 他的羞耻感足以成为他探究中国人特性的标准。在《论冒险进取》一文中，梁启超比较了中国人的罪恶与“欧洲民族”的美德，提出了“中国人怎么了？”这一问题。民族衰落的假设也包含在第二篇文章《中国积弱溯源论》中，但埋藏得那么深，以至于几乎不需要与欧洲进行明确的比较。中国衰落的证据存在于文本之外，在战争和外交当中。将视线转向杀戮或羞耻，足以证明梁启超对中华民族的缺陷是了然于胸的。

在《中国积弱溯源论》一文中，梁启超分四个标题为中国的“疾病”症状作了分类：理想、风俗、政术和最近的事件。在“理想”的标题下，他写道，关于天下、国家、乡土和国民（以及关于中国自身缺少一个名称），传统思维在概念上缺少清晰性。梁启超非常聪明地确定和澄清了这些概念的区别。但正是在“风俗”这一标题下，他直接谈到了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的特性，阐明了这些特性如何导致民族的倦怠。第一个特性是渗入到私人关系、教育和政府中的“奴性”。奴性使中华民族不适合自治，无力有效抵御“外族”的压迫。第二个民族特性是“愚昧”，梁启超认为，这一特性遍及文盲和缺乏常识的普通民众中间。民族的愚昧对国家的兴旺产生了重

① 梁启超 1900：5.14。

② 梁启超 1900，1953：226—238。《论中国之积弱》一文的节译本，以《中国人犯了什么错？》（“What is Wrong with the Chinese?”）这一恰当的标题，出现于 Dun J. Li, ed., *Modern China: From Mandarin to Commissar*, New York。

大影响。就如个人一样，国家也拥有头脑，因此，如果“国脑”就是国民头脑的汇集，那么，愚昧的国民几乎不可能创造一个聪明的国家。梁启超判断，在一个4亿人口的国度里，只有几百万人可以算得上是有见识的国民，而能够全面促进国家兴旺的真正文明人，则还不到200人。

“为我”是中国人的第三个特征，它阻碍了民族获得力量 and 实现统一。“四万万万人，遂成为四万万万国”，梁启超抱怨道。因而，治愈此毛病将能使国家统一。第四个特征是“好伪”，或习惯于欺骗。在这里，梁启超直接采纳了外国观察家的看法：“好伪至极，至于如今日之中国人，真天下所稀闻，古今所未有也。”^①“中国佬”的欺骗和腐败名声，在熟悉殖民批判的中国其他改革者之间激起了同样评论。大多数人都愿意接受这一污点，而不是拒绝它。“国人的腐败与生俱来，”吴稚晖在1908年写道，“整个世界都知道。”与梁启超一样，他的观察转变为告诫中国人改进民族特性。^②梁启超指出的第五个缺点是“怯懦”，或者说胆小，对于一个生活在猛虎和恶魔之间的民族而言，这是很不合适的。最后，梁启超谴责了中华民族的被动和怠惰（“无动”），“外力”每对他们采取一次新的行动，他们似乎就变得越发被动。随后，梁启超进一步揭示，民族构成中的每种缺陷如何根植于广泛的谚语和态度中，后者总是使他感到恼怒。^③

在另一篇文章中，梁启超对下列现象感到痛惜：流行民谚并不

① 梁启超 1900：5.18—23。

② 吴稚晖 1908：312。

③ 梁启超 1900：5.24—27。梁启超 1953 将此处开列的每一项中国人的恶习，都与欧洲人的德行相对比，但他对“欧洲种族”的性格的描绘太过琐细。

建议人们回避羞耻，并且很少鼓励人们的勇气和冒险精神。上层文化也好不到哪去。在孔子及其门徒的作品中，谨慎胜于勇敢，命运胜于人为，被动胜于主动，沉默胜于直言。随着这些（教条）成为民族文化的伦理基础，中华民族只能变得卑屈、胆小、被动、缺乏抱负、怯懦，这并不令梁启超感到惊讶。在中国的漫长历史中，何时能够列举出一位可与路德、林肯或哥伦布相媲美的英雄？梁启超三次回答说：“无有。”中国“几千年来”都缺少这种英雄，并为此深受痛苦，结果今日的中华民族“鬼脉阴阴，病质奄奄，女性纤纤，暮色沉沉”。这一普遍的倦怠威胁到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存在。梁启超以绝望的呐喊结束了自己的分析：“吾不知国之何以立也！”^①当然，梁启超的失望程度或者绝望深度都太夸张了。^②在梁启超看来，希望的能力弥补了中华民族特性中的缺陷，并为他们的进步提供了承诺。

梁启超无力将自己的观察转变为通向民众运动的东西。在呼吁将新儒家的自修方式用于自己的新式伦理体系时，他当然考虑到了某种东西，类似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或者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广播体操运动，但他的想法背后没有国家权威的支持。无论如何，无线电广播离人们的生活还很遥远。虽然如此，梁启超的新伦理中大胆阐释的直白理想，在通商口岸和国外得到了广泛传播。梁启超呼吁帝国的臣民系统地转化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公民，这一点，在殖民者之间关于“中国佬”的缺陷的日常闲聊中得到了回应，并在中国人一看见欧洲人就对他们很反感的反应中得到了

① 梁启超 1953：234—235。

② 梁启超以一首用英语创作的歌曲结束其文章，这表明，尽管中国人有各种缺陷，他还是希望中国能够存活下去。梁启超 1953：237—238。

加强。

事情甚至在梁启超写作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变化。直到世纪之交，上海的中国居民似乎还很少注意到，公共租界的一个公园门口挂着一块“禁止狗和华人进入”的标牌，更不用说为此感到生气，而现在那块标牌已变得声名狼藉。中国人与狗的联系根本不清楚，部分因为这个标牌没有作出清楚的比较，但也因为这种比较对于路过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它在殖民者那边更容易得到理解，因为英国人和法国人的社区培育了一个关于礼貌的联合阵线，以反对那些想像中的敌人，如寄生者、随地吐痰者和公共卫生肮脏者。正如林语堂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所观察到的：

（他时而）喝喝李普顿茶，读读《字林西报》，亦颇闲逸，不期此时却激动了他的肝火，他对于土匪，绑票，内战，那些清晨不快意的报道，不免惹气，这一气把他刚下肚的早餐消耗个干净。他的胡子经常刮得煞光，服装整洁，远胜他的中国伴侣，皮鞋又擦得分外闪亮，远胜他在英国之时。^①

120 在这片道德严重败坏的土地上，面对着潜藏在混沌之外的恐怖，欧洲移居者模仿着康拉德（Conrad）《黑暗的心灵》中那位总会计师的行为举止，来保持自己的外表，他那“浆洗过的衣领和修饰过的衬衫前襟，显示着他的成就”。^② 动物、中国人，离得远远的。

在1923年5月的“临城劫车案”后，上海的殖民者团体有充分的理由担心发生盗匪和绑架事件。^③ 但直到那时，它仍然过分地关

① 林语堂 1939：8。关于对中国“土匪”的更多评论，见林语堂 [1931] 1969b。

② Conrad 1980：46。亦见 C. P. FitzGerald 对上海外侨社会古怪的恐惧症的尖锐评论。FitzGerald 1985：第三章。

③ 见本章后面的内容。

心自己的下颚是否干净，衣领是否浆洗过，以及皮鞋是否擦得锃亮。当地人通常并不都是充满敌意的。在五十多年里，上海的中国居民已经（习惯于）在周末短途旅行，观赏和乘坐在上海和吴淞之间运行的新式蒸汽火车，聚集在赛马场周围观看正在表演的欧洲人，以及排队等候乘坐游乐园里的过山车。^①只要上海的华人团体认为自己是这个景象的一部分，而不是游离其外，那么，这座城市里就只有狗在用四条腿到处走动。

围绕着公园里禁止华人与狗入内的标牌，逐渐形成了非同寻常的传奇，它揭示了进入20世纪之后这些观念变化得多么迅速。实际上，可能根本不存在一块“禁止华人与狗入内”的标牌。根据典型的英国行政管理风格，这块标牌似乎列出了许多规章制度，用于管理公园的使用情况，其中包括了一则关于狗的条文，以及另一则关于本地华人能否进入的条文（欧洲人的中国仆人经过允许可以进入公园）。^②这些干预性的规章制度，需要经过民族主义者的想像，大笔一挥删减掉某些不必要的文字，才能简化为“禁止华人与狗入内”的声明。

上海人不得不认识到，在“禁止华人与狗入内”的标牌能够如此简洁地表达出来之前，他们的日常工作和个人习惯就已经与民族的福祉联系在一起。我们看到，对于民众缺乏抵制力，听任习俗、文化、领土、财富和主权方面的屈服，世纪之交的梁启超已经几乎绝望了。对孙中山来说，自己的同胞无力认识到自己是一个种族，作为一个种族而言，这是他们最软弱的特征。几百年来，他们对种族的“无知”蒙蔽了中华民族的眼睛，使自己蒙羞受辱，屈从于满

① Ye Xiaqing 1992: 33—52.

② Bickers and Wasserstrom 1995; Ye Xiaqing 1992.

洲异族人的统治。在（辛亥）革命初期，“大多数之中国人，犹不知彼为满洲之所征服，故醉生梦死”。^① 在国民革命时期，孙中山断言，除非唤起民众中间的种族情感，否则他们会毫无怨言地再一次放弃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② 民众不得不认识到，在种族之间展开的大规模生存竞争中，他们与欧洲人的日常冲突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

121 通过外在的肤色、体味、头发、步态和礼仪，汉人长期将“野蛮人”（夷）与自身区别开来。通过增加动物性的偏旁部首来指代那些来自偏僻的边疆地区的人，书面文字也体现了这样的种族区别。犬字旁被加入北方的狄族中，羊字旁加入了羌族中，虫字旁加入南方的蛮和闽人中，以表明其种族源于动物。^③ 在晚近时代，这样的侮辱被有效地指向满族，视其为劣等种族的成员，占领了这个国家，篡夺了王位。这时，义和团起义也采用相似的形象来反对传教士，而共和革命者的种族主义宣传则借此反对满清王朝。满族被讥讽为走狗。1908年，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得知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驾崩的消息时，几乎没有一丝同情。他写道：“满族走狗，一只雄的，一只雌的……只不过是一群拼凑谎言的狗奴才。”在同一篇文章里，吴稚晖把同治皇帝称做一头“小猪”。^④

然而，无故的侮辱并没有催生孙中山所设想的那种种族情感。

① Teng and Fairbank 1979: 263. 孙中山 [36]: 419—506。1924年讲演三民主义时，孙中山重复了这一论断：“向来所以要受外国压迫的原因，毛病是由于大家不知，醉生梦死。”孙中山 [31]: 120。

② 孙中山 [31]: 113—114。余下的就是民族灭绝：“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孙中山 [31]: 12。

③ Dikötter 1992: 4, 122.

④ Zarrow 1990: 297.

早期提到野蛮人为退化的野兽，是在种族的等级而不是“科学的”种族内的构想，并且通常忠告，如果他们丧失警惕，汉人就很有可能退化到野兽和野蛮人的水平。明朝的学者王阳明认为，汉族的历史是一个道德的神话，在早期阶段，因为未能培养起美德，“人就不免沦为鸟兽或是蛮夷之人”。^① 道德秩序也挽救了野蛮行为：帝国一直期望着将边境民族并入大汉族文明，如果他们采纳了合适的信仰和行为标准的话。当然，这未能阻止汉人在19世纪发现满族人或欧洲人的有趣和讨厌。但是，将民族之间的关系设想为各个种族和民族之间争夺历史地位的斗争，那就另当别论了。为此，中华民族需要从“昏睡”中被唤醒，并觉悟到某种现代种族主义意识。^②

最早一批养成种族主义的民族革命者从来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伦理根源。甚至作为中国民族主义之父而广受称誉的章炳麟，依然抱有旧式的忧虑，即中华民族虽然有了新的转机，但如果不能养成合适的美德，就很有可能退化到“野蛮人”的水平。对章炳麟来说，首要的美德不是儒家的“孝”和“忠”，而是关于种族历史的知识。他说，在汉族不能欣赏自己民族历史的情况下，“民质日坏，根基全无，沦亡在即，不免变为蛮夷之种”。^③ 章炳麟关于种族的新式历史观，与早期关于文明和野蛮的道德历史有很大区别。在他看来，一个民族的历史就是一部兴盛和衰亡的历史，其节奏与支配动

122

① Ch'ing 1972—1973: 23.

② 种族民族主义者经常感叹种族意识的缺乏。邹容、章炳麟、孙中山，以及许多现已被遗忘的年轻的民族主义者，有意识地致力于通过宣传来创造一种新式种族意识。Gaster 1980: 497 对此作了有力的说明。尽管 Dikötter 注意到了著名的邹容（他“痛感于中国缺乏一种强大的‘种姓意识’，无法将中国人统一起来与压迫者作斗争”），但对于民族主义者在种族意识方面的自觉建构，他的评价并不高。Dikötter 1992: 114—115, 117.

③ Shimada 1990: 62.

物王国的自然法则一致。

只要革命运动将种族的敌意集中于满清王朝，“汉族”这一术语就足以确定华人的种族属性。但在国民革命当中，“汉族”一词并没有包容现在认为构成了“种族”共同体的多样性。孙中山坚持认为，中华民族与世界上的所有其他民族都有着显著区别，但他不允许在中国内部作出任何区分。他沿着旧帝国的边界画出了中国人的边界。^① 在《中国之命运》（1943）一书中，蒋介石提出了相似的观点，最好将他的观点阐明为，中华民族“组成的不仅仅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种族”。少数民族如果打算被计入中华民族之内，就要相应地调整自己的信仰和行为。孙中山和蒋介石偏好种族“融合”的政策，对于中国内部持久的种族多样性特征，他们解释为这意味着同化过程尚未完成。蒋介石注意到，中国是一个“熔炉”，其历史功能是将所有的差异同化为一种民族文化。组成种族的五个“部族”，不会与种族或民族的群体相混淆，因为他们的认同是由环境条件和信仰所铸就的：

实际上，中国之五族并不是以种族和血缘来划分的，而是以宗教信仰和地理分布来划分的。概言之，五族之别，在于宗教和地土，而不是种族。这一点，全国人民都必须懂得。^②

在《中国的国际发展》一文中，孙中山企盼汉族进一步殖民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国民政府在一个精细的文化制度下贯彻其纲要，意在帮助这些地区的土著人民彻底理解自己共同的种族身份——并且不是偶然的，恢复他们对国民政府的“向心”情感。^③

① 孙中山 [31]：第一讲。

② 蒋介石 [1943] 1947：1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③ 孙中山 [20]：131；蒋介石 [1943] 1947：10。蒋介石的两位密友陈氏兄弟，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一项语言改革计划中贯彻了这一观点。De Francis 1950：83。

“汉族”一词及时地让位于一个新词“中华民族”，并且过去用于指代边境民族的动物性词汇也被抛弃了。值得注意的是，用附着动物性偏旁的汉字来指代中国的边疆民族，这一传统在1930年代遭到了一致批判，当时国家正在为新融合的“种族”的历史统一而庆祝。^①

汉族对野兽形象越来越敏感，这要归功于国内的种族调适进程。尽管汉人预感自己可能退化到野兽和野蛮人的层次，但他们通常并不习惯于认为自己是狗和猪。一旦发现外国人用自己对待少数民族的方式来嘲笑他们，这令汉人感到异常震惊。在先前的数十年里，正如孙中山所说的，民族的“昏睡”使他们没有仔细阅读上海公园里的标牌。但从汉族对野兽形象的敏感这一点来看，一旦汉人阅读和理解了这块“禁止华人与狗入内”的标牌，它就迅速转变为汉族之屈辱的潜在象征。汉人以自我厌恶的形式，领会了欧洲、美国和日本种族主义者的侮辱和嘲笑，而那种嘲笑曾经是针对野蛮人的。郁达夫几乎毫不掩饰自己对本民族的轻视，他注意到，“日本人鄙视中国人，就像我们鄙视猪狗一样”。^② 但是，自我厌恶也提供了鼓舞：在一场重塑评判中华民族、以便使其不再像狗一样的有组织运动中，为了撤销原先的形象，种族主义者的表述程序得到了接受。

当本地居民开始像梁启超一样感到迫切时，公共租界公园内的标牌也开始变得臭名昭著了。1907年李维清提到了这座公园：

在黄浦江的堤岸上，洋人建了一座花园，青草像地毯一般平整，花儿像丝绸一般光亮。来自各国之人都能进入其中，包括亡国的印度人，甚至是洋人养的狗也能进去。惟独中国人不

① Dikötter 1992: 4.

② 郁达夫 1921; R. Chow 1991: 144.

得入内。洋人欺人太甚，视我等如奴隶、牛马、刍狗……可见现在这个世界是凭实力说话的。国人当发奋，一洗此奇耻大辱。^①规章的细节并不重要。在这一情形中，看上去狗可以进入，而华人则不行。实际上，民族主义文学中早就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故事，最后形成了一个排他性的确定版本，说有一块明确禁止“华人与狗”入内的标牌。重要的不是标牌自身，而是上海的中国居民之间逐渐在民族和狗之间建立的联系，以及与此相关的“洗此奇耻大辱”的冲动。到1920年，中国人走过（租界的）公园时，再也不可能不去反思“华人与狗”意味着什么了。

到1920年代末，这一情感普遍深入人心。在新文学运动中，有许多作品讲述了“自我觉醒”的故事，巴金的短篇小说《狗》就是其中之一，并且以狗为主角。^②但在这一情形中，不安的叙述者觉醒了，发现自己正是一条狗。这一新发现令人吃惊。但这种吃惊也让饱受折磨的叙述者的灵魂如释重负——不管怎样，其人性从来没有多大意义。

在这篇小说中，巴金以病态的魅力语调，详细叙述了这一物种的变形。在谈到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权力关系之前，他首先确定了区别两者的肉体特征，中国人的肉体特征是其种族低劣的标志：

我有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小鼻子和矮小的身材。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其他人有白皮肤、黄头发、蓝眼睛、长鼻子和高大的身材。他们跨步走在大街小巷中，其中一些人昂首

① Ye Xiaoling 1992: 51; 李维清 [1907] 1989: 72。

② 巴金 [1931] 1980: 114—116。在《狗的反驳》(1927)一文中，鲁迅讲述了一个关于一名乞丐和一条狗的类似寓言。见鲁迅 [1927] 1974。实际上，经常可以看到小说中提及狗。见傅斯年 [1919] 1967: 355—358; 郁达夫 1921。

挺胸，满脸傲慢地环顾着四周，随意哼唱，胡乱喊叫，肆无忌惮地大笑，仿佛街道上只有他们几个人。其他人紧张地走过他们，或者提心吊胆地与他们保持着一段距离。

在写作这篇小说之际，巴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相信个人平等和人类之爱的人文主义理想。然而，我们的叙述者首先渐渐理解到，共同人性的理想是一个骗局。不存在人这样的东西，只有两类与人相似、界线分明的生命：“我有一个新发现。所谓的‘人民’实际上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在我通常混淆的这一人种之上，有另一个更伟大的人的序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将“我通常混淆的这一人种”和“更伟大的人的序列”区分开来的界线，却是依照通商口岸殖民者的习惯和行为而划分的。作者提醒人们反思，是什么使“更伟大的”人民那么伟大。当然不是由于他们的道德：

我经常在街上碰见这些更伟大的人群。他们一直在大笑，唱歌和喊叫，或者用酒瓶子打人，或者抓女人的脸。有时我甚至看到他们坐在黄包车上，一对粉红色的可爱美腿坐在他们的大腿上。

叙述者对观察到的粗野行为的轻视，几乎无法掩饰自己的同样渴望，即“一对粉红色的可爱美腿”从自己的大腿上垂下来。周瑞(Rey Chow)注意到，中国民族主义文本中的狗的形象，既是屈从民族的比喻，也是在此以手淫式白日梦表达出来的男性性无能的标志。^①叙述者自己的人民警惕地保持着一段距离，但却从所见所闻中获得了共鸣的快乐。在这个意义上，被观察的殖民者是一个性别典型，无法不为男性的民族主义者所渴望：

出于尊敬，人民躲避他们，并且因为他们太伟大了，我甚至不太愿意接近他们。我只是从一个安全的地方，远远地观察

① R. Chow 1991: 143—144.

他们，默默地欣赏和祝贺他们。我甚至忘记了自己的痛苦。我认为，如果世界上有这样的人民，就有理由感到欣悦。我默默地欣赏和祝贺他们。

最后的分析指出，惟有害怕才能博得尊敬：

125 我经常提醒自己，不应当因为害怕不敬与他们关系太密切。但我实际上的确曾经与他们很密切。一天晚上，我又冷又累，几乎无法再挪动一步。于是，我靠着路边的墙坐下，揉搓着充血而泥污的双脚。我饿得前胸贴后背。我的双眼模糊，根本看不清周围的东西，甚至没有看见一个高大的人向我走来。当我最终发现了他，想躲开时，已经太迟了。一只脚狠狠地踢到了我的左肩膀上，胳膊和手仿佛被一把利刃砍了下来。我跌倒在地上，疼得直打滚。

仅仅需要指出叙述者的弱点，那位“高大的人”的道歉就是称他为一
条狗。叙述者在这一刻受到了启示。他琢磨着这个词，把它当做自己的用语来领会：

“狗！”我清楚地听见那个高大的男人从嘴里吐出这个词。我揉搓着伤口，嘴里不断重复着：“狗。”最终我回到了破庙里。我顾不得疼痛，在地上向前爬行，摇头晃脑，吠叫着，我感到自己就是一条狗。我一身轻松。我笑着叫着，流出了快乐的泪水。我明白，最终我真的是一条狗了。^①

巴金的语气是调侃的，带有相当严肃的讽刺性，表明他决心鼓励读者摆脱欧洲种族主义者的侮辱。可是，他热切地关注自己的皮肤和头发，自己的眼睛、鼻子，身材和相貌，承认与外国“民族更伟大的秩序”相比的性无能，暴露了他内心深处对一个屈从民族的羞耻

① 巴金 [1931] 1980: 114—116。

感，这个民族被置于种族主义统治之下，并被教导将其屈从与其身体特征联系起来。在揭露和抵制种族主义者对中华民族的批判的过程中，作者的讽刺反而强化了这种批判。

其他作家更喜欢劝勉，而不是讽刺。在比巴金上述小说早两年发表的一篇小说《二马》（1929）中，老舍利用自己在英国的观察，叙述了一个在伦敦经营古物店的中国家庭的有趣的跨文化碰撞。老舍还在一段文字中思考了中国人与狗的联系，与李维清对上海公园标牌的强烈反应惊人地相似：

二十世纪的“人”与“国家”是相对应的；强国的人是“人”，弱国的呢？狗！中国是个弱国，中国“人”呢？是——！中国人！你们该睁开眼看一看了，到了该睁眼的时候了！你们该挺挺腰板了，到了挺直腰板的时候了！——除非你们愿意永远当狗！^①

然而，老舍“挺直腰板”的要求，和20年前李维清发出的“洗此奇耻大辱”的号召有着重要的差异。李维清不准备接受中国是狗的说法。到1929年，老舍承认了这种比较的适当性，转而劝勉自己的同胞自我提高，以便他们不会“永远当狗”。126

老舍间接地触及了巴金的两难困境。两位作者都试图在作品中代表自己的同胞，但都不得不接受外国人将中国人贬为狗的诅咒，以激励中国人成为“人”。老舍痛苦地意识到了流行的英语电影中的普通华人形象，他回忆道，他们“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后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中国人已经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②直到中国人有权

① 老舍 [1929] 1980, 15。

② 同上。

再度声称自己是谁，并且具有坚强的意志，能双腿直立、大声有力地说话的时候，他们才不再是狗。同时，那些阻止中国人站起来的民族特征将得到界定并被根除。老舍和巴金希望将狗唤醒。这是一种不同顺序的讽刺，很难见之于公开宣称的民族主义文学当中。正如鲁迅在另一篇小说中指出的，甚至一匹觉醒的狼，终究仍是一条狗。^①

国民革命期间对新伦理和新公民的呼唤，与一种同样强烈的呼唤相呼应，即新的中国人将不可能与狗相混同。民族主义者首先公开谴责那些与外国人相连的华人“走狗”——一个出现在国民革命初期的革命口号中的词汇——从而使自己与狗脱离关系。1923年8月，农民运动的宣言以如下口号结束：“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和外国人的奴仆！”^②中国人不再因自身的言行而成为卑屈的狗，而是因为与外国人的联系才成为“走狗”。只有在未开放的、外国人及其走狗很少进入的广大中国内陆地区，才能发现真正的中国人。

民族主义者的探索 and 发现

探索中国内陆、发现一个真正的中华民族的责任，落在了中国民族主义者肩上。^③ 年轻学生徒步动身前往内地。学者们满怀在与那些动身发现新世界的欧洲探索者相似的希望和激情，在书房里发

① 向培良呼吁新青年“露出狼牙来”，鲁迅则在1931年警告说，一条醒来的狗渴望着主人，并且总是听从主人的命令，向别人露出自己锋利的牙齿：“但也应该小心，因为狼是狗的祖宗，一到被人驯服的时候，是就要变而为狗的。”鲁迅 [1931] 1980：135。

② 邓中夏 [1924] 1980：93—96。

③ 见顾颉刚对自己在民俗研究中发现的村民的“自然天才”、自发性、自主性、鲜活和想像力的评论。Schneider 1971：164—167。1919年，李大钊呼吁青年回到自己的村庄中去，其中也表达了类似的激动。李大钊 [1919] 1959：146—150。

起了探索中国历史的运动。并不令人惊讶，哥伦布成了一名时代英雄，而拥有自己的另类文化和历史的“平民”的发现，则促成了各种想像的焕发，它们回应了欧洲人对亚美利哥·维斯普奇的“美洲再发现”的欢呼。^①

当然，与维斯普奇和哥伦布的成就不同——即使承认美洲人已经很熟悉其本地居民——中国的再发现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发现。仅仅在哥伦布和维斯普奇修正了欧洲人关于美洲的知识这一意义上，他们的探索才是发现之旅。^②可是，对探索者自身来说，这是一种全新的经历。但中国的探索者甚至在出发之前就清楚地知道他们将会发现什么。^③现代社会科学的训练，已经告诉了他们应当期待着什么。

在20世纪，关于社会的各门科学为全世界的民族主义运动提供了导向性的帮助。1945年，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选择了“印度的发现”，来为关于自己在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经历的个人回忆录命名。当他开始探索印度的遗产和“精华”时，尼赫鲁很清楚自己将发现什么东西。不过，他以一种印度人民从来不知道的方式，也就是说，通过理性科学思维的观察发现了它们。他回忆道，自己对印度的接近，“几乎是作为一个外来的评论者……在某种程度上，我是通过西方才了解她的，并且像一个友好的西方人那样观察她”。^④与年轻的中国民族主义者一样，尼赫鲁希望以新的、不那么为人所知的方式，去了解

① 见梁启超 1953。孙中山将其找到一条民族发展道路的企图，相比于哥伦布找到一条通往新大陆的路径的企图，他认为，中国将从早先的西方先驱的错误中获益。孙中山 [20]: 334; Schiffrin 1980: 198—199。在亚美利哥·维斯普奇“对美洲的重新发现”中有关发现和觉醒的关系，见本书第一章的讨论。

② Todorov 1984.

③ Seth 1992.

④ Nehru [1945] 1956: 51.

一个古老而熟悉的国家。他的生活就是一次探索 and 发现之旅。

然而，中国的发现并不完全是隐喻性的，因为改革者和革命家们仍然不很熟悉国家的地理状况。直到清末的最后 10 年，官方的地图依然只能提供给那些有必要了解这方面情况的高级官员，这让那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感到非常苦恼。孙中山向其英国老师康德黎抱怨道：“在满洲人统治下，任何七品以下的官吏都不允许阅读中国地图。”^①实际上，问题并不局限于中国地图。任何种类的地图都很少能在商店里买到。^②1895 年，为了寻找一幅合适的世界地图，康有为跑遍了北京的书店，也没有发现一幅。他请一个朋友从上海寄了一幅地图，才解决了问题。^③孙中山努力掌握外国人绘制的地图，以弥补自己教育上的这一缺憾。但对于他的爱好来说，这实在是太零散了。因此，他在中国地图上画出一条深红色的线，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穿过整个国土，象征着铁路和公路，相信交通网络将使分裂的国家统一起来。孙中山将自己统一中国的抱负提升为一道新的经济学法则：“经济学家通常谈到生活的三个必需：食、衣、住。经过研究，我要增加第四个必需：行的方式。”^④

① Cantlie and Jones n. d. ; 19.

② 中国第一次基于现代制图原理的地理学调查，是在 1707 年之后的 10 年间，由耶稣会士及其中国学生们进行的。那次行动中绘成的一些地图并未印制出来，印制出来的那些地图，发行范围也很有限。制图艺术不久就失传了，一个世纪之内都未能重新发展起来。Teng and Fairbank 1979; 16—17, 41—46.

③ Spence 1982; 43.

④ 孙中山 [31]: 480。孙中山的“中国铁道计划”(1921)，用一个红色线条的蜘蛛网，将整个中国大陆包括进来。从交通经济学的角度来看，这些线条毫无意义，但它们着重考虑了旧帝国的地理完整性。见孙中山 [20]: 127—360 插图 16 中的说明。关于辛亥革命前夜铁路发展的实际状况，见 G. Anderson 1911。关于中国铁路的经济史，见 Hunemann 1984。

1920年代，对于发现的主要工作——探讨国家的人民、习俗和文化——而言，绘制国家地图不再是一项附带的帮助。这项工作的进行，既出于哥伦布式的热情，也出于尼赫鲁式的功利感。科学的人种学家着手考察偏远的城镇和乡村，记录下真正的中国人的风俗、歌谣和历史。来自城市的文学代表团在乡村旅行，“到民众中去”，在小说和旅行日记中写下自己的印象，并迅速将之送回大都市。像哥伦布一样，中国的年轻探索者来到许多地方，那儿已经有人居住，但当地居民从来不曾以合适的方式很好地了解自己。像尼赫鲁对待印度人民一样，这些探索者决心教导中华民族，让他们知道成为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他们的教化使命带有某种殖民事业的味道。实际上，孙中山自己就列举了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行政管理，认为那是训导中国平民的极好实例。^①

128

中国的民族主义发现模仿了欧洲冒险者的探索，因为它是与欧洲帝国主义的教化使命对话的一部分。赛珍珠关注着自己认识的年轻知识分子之间的这种对话。“近来中国一个重要的运动，”她注意到，“就是青年学者的对于本国问题的热心探讨。”赛珍珠对中国之发现的评论，出现在为林语堂的《吾国吾民》所写的序言中，作为一本英文著作，该书最雄辩、最有力地挑战了“中国佬”这一殖民标本，书中也曾经表达了赛珍珠这一意思。赛珍珠正确地注意到，林语堂首先需要发现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然后才能以理性、民主和进步的语言来保护他们。林语堂及其志同道合者像来自异域的到访者一样开展工作，脑子里被灌输了一些科学知识、基督教义、无神

① Teng and Fairbank 1979: 263. 研究民风民俗的学者们显示了相似的决心，即采用地方歌曲和传说，来教导人们明了自己作为中国公民的义务。Schneider 1971: 143—148. 亦见 Holm 1990。

论、自由恋爱、共产主义、西方哲学和现代军国主义，“实实在在什么都灌输一些”，惟独没有任何东西有机地属于他们所发现的共同体。^① 虽然如此，他们仍然决心保卫自己的国家。林语堂很清楚吉尔勃和伍特海特的涂鸦之作中的每一次转变，他们对“中国人性格”的直言不讳的评论，似乎歪曲了他自己所发现的东西。“中国佬”成了对普通中国人的奇异的讽刺漫画——林语堂称其为一部“舞台小说”——具有许多或被认为是美德，或被认为是罪恶的特征，但无论哪种情形，惟有消灭它们，从头开始，才能使它们得到挽救。像尼赫鲁在印度做的一样，林语堂在大量“平民”之间寻找真正的中国人。在正确地指向新科学的精神罗盘的帮助下，他知道到哪儿去发现真正的中国，如何解释他所发现的东西，以及（当他发现了它们时）如何保护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使之免受通商口岸殖民者的种族主义的、诽谤性的描述。^②

129 到 1920 年代，对流行的西方人种论的本土回应发展成一门职业。19 世纪人种研究的知识，如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和杜利特（Doolittle）牧师的《中国人的社会生活》，鼓舞了记者们去捕捉地方习俗和民族特征，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好奇心，以及发现其

① 见赛珍珠（Pearl Buck）为林语堂 1939：vii 所写的“序论”。

② 林语堂特意写出《吾国吾民》（*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一书，以抵消吉尔勃的《中国怎么了？》（*What's Wrong with China?*）一书所产生的“误解”。他写道，一些外国人，比如赫德（Robert Hart）和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中国人显示了应有的同情，但是，“有了一个赫德，却有一万个吉尔勃，有了一个罗素，却有一万个伍特海特，结果不断产生轻蔑华人的戏剧式故事，它的内容幼稚而歪曲，却为西方人所乐道”。林语堂 1939：11。林语堂似乎考虑过 1925 和 1926 年连续出版的两本著作，即伍特海特（H. G. W. Woodhead）的《民国真相》（*The Truth About the Chinese Republic*）和吉尔勃（Rodney Gilbert）的《中国怎么了？》（*What's Wrong with China?*）。见 Woodhead 1925，Gilbert 1926，亦见 Mackerras 1989，72。

作为一个社会的独特性的渴望。^① 国民党党报、上海《民国日报》的一位编辑胡朴安，在1922年出版了一部名为《中华全国风俗志》的书。^② 胡的这本志书由明清时期地方志中的民俗风物部分编纂而成，并从公开出版的旅行日记和报纸文章中补充了一些条目。胡的著作包括的内容，比报纸上的流行人种论更为广泛，其目的也与古代的地方志大为不同。帝国图书馆和地方志收藏库中积存着关于地方社会的信仰、习惯和风俗的详细调查资料，同时还有关于制度史、烈女、慈善事业，以及帝国每个角落的公共工程的概述。如果人种学家们愿意，他们本来可以从帝国图书馆中获得大量信息。但对于人种学而言，将地方风俗与其直接的帝国行政背景整体隔离开来，这不仅仅是一种辅助性的帮助，还有一种新式的人种学文本，标志着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过渡。

张炽章的序，指出了胡朴安的创新之目的和意义：

外人之讥我曰，中国并非一国家，中国人并非一国民。吾诚耻之，而不能辩。何则？普及国家主义之前提，在于知彼知己。易言之，必知世界，知本国，而后可以涵养爱国爱群之心。而我则两失之也。

张炽章悲叹道，中国学生似乎很熟悉伦敦和巴黎的风尚，能够背诵古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段落，却不了解本国历史和习俗。胡朴安找到了答案。张炽章以轻松的风格详细解释道，胡朴安在穿越中国的旅

① Smith 1894, Doolittle [1865] 1966. 本研究进行期间，就我所知，这两本书的译本都无从找到，尽管研究者都知道有这么两本书。见鲁迅 [1936] 1980: 302。中文报纸当中，《北洋画报》在1926年出版过一卷《北京风俗》，文字和图片都以书的形式分别出版。见《北京风俗图》1986。

② 胡朴安 [1922] 1990。黄季陆 1969—，7: 101—102 中，将胡朴安列入上海《民国日报》的编辑之列。

行中捕捉到了“漫游伦敦巴黎之兴味”，结果使读者“能自然理解我祖先之思想感情”。^① 在该书的“跋”中，胡朴安忽略了旅行者的隐喻，但不同意中国是一个异国的看法。他选择的地方风俗案例来自全国各地，这可能暗示着中国的各个地方“几若异国”，对此，他感到特别担忧。该书意在反驳这一印象。在梳理了证明地方习俗的地方志之后，胡朴安再次将其汇集于一本书中。帝国在一个藏书库中得到了很好的代表，但民族只在一本书中才得到最佳凝聚。^②

人种论也在中国的小说中表现出了新的形式。正如张炽章序中所认可的，欲了解自己则必须了解别人，这是民族自画像的通常运作原则。民族主义小说从西方人对“中国佬”的批判中得到了启示，因为它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如何）确定那些用来区分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基本特征。在这一点上，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小说中的中国人自画像，与发现年代的欧洲小说有很多相同之处。在 17 和 18 世纪，当关于异域的知识第一次将伟大的文明转变成民族文化时，欧洲艺术家们发展了东方旅行家——他们游历西方，对欧洲文化和传统的评价不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的文学传统。^③ 当东方的旅行家从欧洲带回各种消息，为审视中国传统提供了新视角的时候，当西方的旅行家在中国四处炫耀，认为自己是解释东方风俗习惯的权威的时候，相似的传统在中国的自我发现年代逐渐形成。

中国作家偏爱的技巧之一，是通过对一个遥远地方的发现之旅，来确定东方与方外之地的距离。在小说《镜花缘》（1828）中，李汝珍让男主人公踏上了前往 33 个国家的发现之旅，并使之对中国

① 张炽章 [1922] 1990: 1—2。

② 胡朴安 [1922] 1990: 跋。

③ Edwardes 1971: 110, H. Ch'ien 1944: 第五章。

的习俗和信仰进行了一系列反思，其表现方式与斯威夫特（Swift）的《格列佛游记》很相似。李汝珍显然不知道斯威夫特的作品，尽管如此，但他比同时代的大部分人更敏锐地意识到了晚近中国与欧洲接触的意义。^① 李汝珍的成就在于，他使中国文学中的旅行者故事这一古老主题产生了新的效果：旅行者带回了中国自身之外可能看待中国的消息。一个相关的技巧是将中国描述为一片异域的国土，叙述者无意中发现了它。曾朴在《孽海花》（1905）中使用了上述两种技巧：在小说主角金文清前往欧洲和俄国探险——这一使命结果成为自我反思和发现之旅——之前，中国首先与一块异域——被奴役的幸福岛联系在一起。^②

在20世纪的方言小说中，老舍的小说《猫城记》（1933）是使用异域技巧的经典篇章。它将发现之旅的写作类型与种族主义者自我贬抑的动物性隐喻结合起来。老舍非常了解英语小说和电影，但他的作品与其说是受到了欧洲先例的启发，还不如说是出于一种解释其文学之旅和海外旅行的跨文化方面的个人使命感。当然，老舍

131

的作品显示了一种批判维度，它不仅很少见之于关于“中国佬”的英语文学，在关于约翰牛的英语文学当中也被普遍忽略了。到老舍走向文学前台的时候，英语文学已经很好地真正捕捉到了东方人的精髓。在为中国改造自己之前，老舍不得不对英语文学中的“中国佬”作出解释。为了使事情进一步复杂化，现代小说中理性叙述者的批判性距离，使欧洲语境中的作家置身于东方，并远离自己的同胞。当老舍在《二马》中提出“中国人对英国人的中国观的看法”

① 李汝珍的主要文学影响是在中国人范围之内。见胡适 1934：121—127，Ropp 1981：150，Eberhard 1964：118—119。

② 曾朴 1905。

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了第一个问题。^①当他在《猫城记》中让第一人称的叙述者飞速前往猫的国土，他已经意识到了第二个问题。老舍是理性的观察者，而中国则是一块群兽之地。

《猫城记》中似乎将真正的人界定为西方人，除了叙述者之外，中国人在全书中被描述为另一个物种的生灵。他们作为特殊的文明延续了下来，这似乎使中国人永远可耻地背离现实，后者存在于大洋彼岸的欧洲。^②但是，解决这种疏离的方法也在欧洲发现了，或者至少在一个中国叙述者的声音里得到了发现。他从一个批判性的距离，可以说是跨越大洋的距离，发出了自己的声音。随后，老舍探讨了中国人的缺陷，并努力去纠正和弥补它们。他的意图极清楚地展现在他对猫的缺点的详细描述之中：与英语电影中的华人形象一样，它们被刻画为抽鸦片、残暴、迷信、腐败、自私、不负责任。叙述者是一个中国人，这并非巧合。为了替中国找出自己同胞的缺陷，老舍体现了一个理性的中国叙述者的视角和特征。《猫城记》的讽刺色彩体现了中国民族主义自身的讽刺性：在其倒置意义上，它是一个关于民族主义者拯救民族的比喻。

当小说中的人种论直接诉诸欧洲传统时，其讽刺性变得非常明显。1928年，沈从文读了路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原作的译本之后，很快就写出了一部自己的短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③然而，欧洲人关于中国的既定人种论传统，再一次使阿丽思作为一

① 老舍 [1929] 1980：前言。

② Shirley Hazzard 提供了一个比较视点，对比了其女主人公在澳大利亚和欧洲风景面前的反应。Hazzard 1980。

③ 沈从文 [1928] 1982。亦见 H. Ch'ien 1944：xv，Kinkley 1987。沈从文的“阿丽思”一文，随后激发了中国的模仿者，包括张天翼 1931 年的《鬼土日记》。见 Dolezelova - Velingetova 1988：218—220。

个纯真的外国旅行者在融入中国习语时变得复杂化。在这里，她似乎不只是一个促使中国读者反思自我的西方旅行者。阿丽思发现了这样一片土地，其文化表述的权力已被外国人夺走。她第一次了解中国人的特征，是通过一本英国人写的中国指南，其中详细讲述了中国人的肮脏习惯和贪婪行为，使她对与中国人的遭遇有所准备。在大白兔的陪伴下，阿丽思通过个人经历检验了这些偏见。在沈从文的笔下，阿丽思变成了一件工具，被用来探讨中国人如何逐渐为西方人所表述，来衡量这些表述是否精确，并且最终用来讽刺性地反思如下事实：沈从文自己在探讨中国人的特征时，将不得不严肃地考虑一个年轻的英国女孩和一只外国兔子的发现。

132

对于中国人的缺陷和过于谦虚的德性，政治民族主义的人种学就不那么具有讽刺性了。探讨妇女在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人民”在民族复兴中的作用的各作品，都很明显地表现出一种更加严肃的目的感。革命的政治学里不存在开玩笑的空间。“新民”或“新时代的人”一词包括了新妇女和新男人。然而，甚至在这里，欧洲观察者中最极端的种族主义者，也期待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将妇女地位视为中国的耻辱根源，期待普通民众仍可能被证明是国家的救星。惟有小说家能够欣赏这一讽刺性。

妇女的状况，无可争议地体现了亚洲人民不可饶恕的野蛮粗暴。托马斯·德·昆塞在1857年宣称：“从这一时刻全亚洲的妇女状况来看，没有哪个亚洲国家已经摆脱了野蛮。”^①德·昆塞是当时最激烈地批评中国文化的人之一，但其观点却得到了更严肃的批评者的广泛赞同，并经常为他们重述。这部分是欧洲自身近期发展的

① De Quincey [1857] 1897: 357.

结果，在那里，妇女开始进入先前由男性垄断的文学、科学和公共生活领域。对于妇女最近涌现于文学创作和科学研究领域，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在1753年进行了反思。他评论道：“岁月的革命已经产生了一代亚马逊式（Amazons）女斗士，她们以亚马逊前辈的精神，向男性的暴政提出了挑战，要求进入科学领域，并似乎决心与男性争夺阳刚之气。”^①当挑战失败时，男性的暴政故作姿态，将自己对女性的态度的解放，视为文明进步的最新标准。

男人在妇女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很快成为性格的一个标志。当妇女在物理学中开始发挥卓越的作用时，汉弗雷·戴维（Humphrey Davey）评论道：“女性在社会中的重要性，以及她们被体谅被尊重的标准，我相信同样也是文明的标准。”^②戴维的标准很快应用于亚洲文明，随后又开始受到种族性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在美国的妇女选举权运动起了很大作用。1869年，伊丽莎白·斯坦顿（Elizabeth Stanton）号召“优雅的”美国妇女支持自己，拒绝将选举权扩大到“对女性抱有粗俗想法的低等级的中国人、非洲人、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盎格鲁—撒克逊男人非常难以相处。很难期望他们会不使用“Patrick and Sambo and Hans and Yung Tung” * 这些词。^③

① Samuel Johnson 这样开头：“以前，笔就像剑一样，被认为是由自然赋予男人之手的，妇女则满足于私德和家内的优秀表现。一名女性作家，就像一位女战士一样古怪（原文如此）。” S. Johnson 1969: 283—284. 亦见 Turner 1992。（在希腊神话中，Amazons 指女战士。——译者按）

② P. Johnson 1991: 538.

* Patrick、Sambo、Hans 和 Yung Tung，分别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对爱尔兰人、非洲人、德国人和中国人的蔑称。此点承费约翰教授指出。——译者注

③ Andolsen 1988: 31. Lucy Vaughan 让我注意到了这则材料。

戴维的标准应用于中国人时，产生了特别明显的效果。约翰·巴罗在随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的回忆录中评论道：“也许在任何一个国家，女性在社会中的状况，都是一条合适的公正标准，反映了那个国家所达到的文明程度，这可以被视为一条不变的公理。”接着，他将这个标准应用于中国。“较之古希腊人和黑暗时代的欧洲人，中国人……将更大程度的谦卑和约束强加给了妇女。”^①德·昆塞在评论亚洲的野蛮时重新拾起了巴罗的观点，接着，它又被并入了关于中国的人种学档案中。1906年，美国前驻华代表查尔斯·登拜(Charles Denby)评论道：“如前所述，如果通过妇女的状况来检验一个国家的文明，中国就必须被列为低等级的国家。”^②民国时期武断的排外民族主义的出现，要求修正某种普遍的情感，尽管如此，这一标准再次得到应用。1926年，国民党人发布了驱逐殖民势力的通告，这时，狂躁的吉尔勃正在上海写作。他观察到一个男人如果不能保护自己的女人，就不用指望他去保卫自己的国家。他从这一观察中得到了安慰。“中国佬”对女性同胞的态度，使整个民族的人性及其文明遭到了（别人的）轻蔑：“中国人比我们更贬低妇女，但更低等级的妇女也意味着更低等的人性标准。”与中国相比，西方骑士对待妇女的古老实践，足以“证明种族勇气和战斗能力的存在”。在吉尔勃对人性——主要是进行一场出色的战斗的能力——的相当粗糙的评价中，西方人显然将在中国取得胜利。^③它给民族主义者提出的挑战，是承认如下一点：中国既无法拯救这个文明，也无法拯救这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国家，除非它已经触及到了“妇女问题”。

① Barrow 1806; 138.

② Denby 1906, 1; 163.

③ Gilbert 1926; 179.

正如帕沙·查特吉注意到的，提及亚洲妇女所受的虐待，是“从根本上建构殖民主义话语的整座大厦”的基础之一。^①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不能无视这一抱怨。在中华帝国晚期，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谴责了对于妇女的残忍行为，但这种谴责很少出自他们的人性，也没有外部的激励。^②然而，直到种族的战斗能力和国家的生存似乎都成了问题，他们的抱怨才呈现为大众运动的形式。因此，20世纪有关妇女解放的争论，与其说是基于正义和公正的前提，不如说是基于这种断言：只有解放了妇女，国家才能得到解放。

这是梁启超在《论女学》(1897)一文中探讨妇女问题的切入点。梁启超观察到，裹脚习俗残害了妇女，使她们屈从于男人。但是，他关注妇女的动因与她们的福利无关。他注意到，裹脚受到“外国人的嘲笑”，给国家声誉带来无法挽回的伤害。裹脚还阻碍妇女成为劳动力，给国家的生产力带来了不必要的负担：“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而无一生利者，惟其不能自养，而待养于他人也。”一连串“陈腐的旧观念”剥夺了妇女接受教育的同等机会，也制约了国家的自强能力。“吾推天下积弱之本，则必自妇人不学始。”只有当妇女获得自由、接受教育、有了工作，与男人受到同等对待，中国才能与外国人相匹配。梁启超得出结论说，其他改革者忽视了妇女问题，只是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妇女解放和国家解放之间的联系。

今日之攘臂奋舌，以谭强国，震惊于西人，而思效其长者，则惟是船舰之雄也，枪炮之利也，铁路之速也，矿务之盛

① Chatterjee 1990: 623. 亦见 Chatterjee 1993: 116—134。

② 在李汝珍的《镜花缘》一书中，性别角色被倒置了。对于“文明”社会中的妇女所承受的不公正，该书给予了高度的同情。

也。若此者皆非妇人所能有事也，故谋国者曰，教妇人非所急也，而不知西人之强在此。^①

就在梁启超这篇论文写成后不久，“妇女问题”进入了民族主义论争的主流。^②

与妇女问题相伴随的是平民问题。种族主义和民族主义天生是民主的。梁启超感到，统治精英的失败必然是普通民众的失败，因为他们全都属于一种民族文化：官员的卑屈心理、愚蠢、自私、虚伪、胆小和被动消极，全都根植于民众文化当中。^③在一定程度上，这回应了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的观点。但是，吉尔勃在民族性格的缺陷和民众之间看到了不同的联系。吉尔勃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有文化的精英，从而原谅“中国佬”身上的缺点。“中国的知识分子，”他解释道，“是一个一直谨慎、胆小、掩盖自己身体虚弱的人群，其心智是消极而不是积极的，守成的而不是进取的。”知识分子将自己的态度“传递”给了民众，通过与他们的历史联系，平民也遭受着痛苦的折磨。^④如果只有民众自己，他们似乎早已可能发展出吉尔勃和梁启超如此欣赏的欧洲人的全部品质。但是，中国的民众并不是孤立的。他们受到了知识分子那么彻底的污染，以至于只有在这个国家腐朽的上层文化难以到达的偏远地区，民众才保留了自己质朴的刚毅气概。因此，中国的拯救，就在于开发出未被污染的普通民众身上的丰富资源。吉尔勃代表在华的白人共

① 梁启超 1897：37—44。

② 即使在无政府主义者当中，女权主义观点的最终落脚点，也“不是公平或不言而喻的权利，而是中国需要解放其妇女，以便拯救整个民族”。Zarrow 1990：151。亦见 Ono 1989，Witke 1967：128—147。

③ 梁启超 1900：18。

④ Gilbert 1926：117。

同体宣布：

在中国人之间，我们更喜欢粗野的山民和边境的居民，而不是那些被认为更文明化的纯种本土居民；我们更喜欢原始而粗俗的乡下人，而不是那些腐朽的城里人，并且我们更喜欢文盲，而不是那些有教养的人。在中国，来自“街头巷尾”（“back blocks”）的无赖更缺少中国人的本性，因此，我们这些来自西方的野蛮人，我们这些世界的征服者和探索者，我们喜欢男子汉气概和公正的游戏，我们在他们身上发现了最多的共同点。^①

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与吉尔勃一样偏好普通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人种学先驱自信地宣称，他们要在高原和森林中寻找真正的中国文化和传统，他们期望在那里发现未受污染、逃脱了城市生活和儒学之恶劣影响的完整的民众共同体。历史学家和人种学家顾颉刚在偏远山村发现了一个“自然的特征”。让他和他的同事感到非常高兴的是，顾颉刚还发现，偏远地区的村民拥有殖民种族主义者归于“原始而粗俗的乡下人”的品质，以及民族主义为新民开出的处方：自发、无名、新鲜、富有想像力，甚至具有接受和吸纳“新事物和外国影响”的能力。^②不过，顾颉刚从来不曾设想，自己能将所发现的人民改造成更接近自己理想状态的人，至少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是——一个革命者。他是一位学者，与同时代的许多人相比，是一个甘坐冷板凳的民族主义者。顾颉刚认为村民具有适应“外国影响”的天生能力，这一乐观的期待，足以区别他的民族主义和吉尔勃的种族

① Gilbert 1926: 170.

② Schneider 1971: 165—168. 顾颉刚还试图恢复历来被抑制的墨子和邹衍的哲学传统，他将这两人奉为适合于现时代的平等主义政治哲学的典范，与正统儒学的等级伦理形成了对照。同上：15.

主义。^①

然而，白人种族至上主义者和中国民族主义者对平民的共同兴趣，被他们在下列问题上的分歧抵消了，即谁是中国民众中的“真正的”中国人。民族主义和殖民种族主义都想认出真正的“中国佬”，但通常在随后的问题上分道扬镳，即到底是腐朽的城市居民，还是粗俗的乡下人，才是真正的“中国佬”。他们一般偏爱粗鲁的农民，而不是有教养的市民。但在国民革命之前，很少有外国访问者承认农民是真正的中国人。在农民运动高涨的1925年，凯特（J. C. Keyte）观察到，“轻率的西方人”通常把中国大城市“海岸泛起的泡沫”，误认为“真实类型的中国人”。吉尔勃也不例外。^②

136

吉尔勃对中国农民的赞许，基本无意为国民党人提供安慰，因为农民根本不是“本质上的中国人”。虽然如此，他还是打算承认，中华民族复兴的最大希望，在于用“令人兴奋的小说”、地方戏院“聪明的饶舌”、民间故事、戏曲和民谣，来敲击这一“次本质的中国人”那被排斥的文化传统。在这里，他回应了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语调。但是，吉尔勃对民族复兴的前景根本不抱什么希望，如果这一复兴任务由衰朽的、充斥于国民运动各个等级的“本质上的中国人”来承担的话。^③

中国的农民运动基于民族主义思想内部的沿海和内陆、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类似对比。这并不只是对殖民种族主义的反动。它诞生

① Schneider 1971: 143—148。区别民族主义和殖民种族主义的，仅仅是一道微弱的乐观主义界线。当顾颉刚支吾着表达出自己的乐观主义时，他对野蛮人的活力的羡慕，以及他对外国人的历史作用的肯定性判断（视之为垂死的中国文化的复活因素），都使他承认，中国应当在20世纪再次欢迎野蛮人的拯救——这正是吉尔勃的观点。同上：14。

② Keyte 1925: 282.

③ Gilbert 1926: 170, 105.

于资产阶级生活的伦理批判，后者将城市等同于错误的价值观念，将乡村等同于原初的、本土的纯洁，因而喜欢重提中国早期文学传统中的田园形象。虽然如此，民族主义者对普通民众的赞美，推翻了殖民种族主义关于从哪里发现“真正的”中国人这一本质性的解读：与城市“海岸泛起的泡沫”相比，来自“街头巷尾”的流氓在本质上更像中国人。在1919年发表的一篇有影响的文章中，毛泽东的老师李大钊将城市生活比作“鬼”的生活，把乡村生活等同于“人”的生活：

在都市里漂泊的青年朋友呵！你们要晓得：都市上有许多罪恶，乡村里有许多幸福；都市的生活黑暗一面多，乡村的生活光明一面多；都市上的生活几乎是鬼的生活，乡村中的活动全是人的活动；都市的空气污浊，乡村的空气清洁。你们为何不赶紧收拾行装，清结旅债，还归你们的乡土？

乡村是一个田园牧歌式的地方，和谐而快乐，在完成一天的劳作之后，还有足够的时间来开玩笑、思考伦理问题：

劳心也好，劳力也好，种菜也好，耕田也好，当小学教师也好，一日把八小时作些与人有益、与自己有益的工活，那其余的工夫，都去作开发农村、改善农民生活的事业，一面劳作，一面和劳作的伴侣在笑语间商量人生向上的道理。^①

137 在后来的几年里，李大钊对青年人的号召，得到了新文化运动活动家的宣言和出版物，以及人种运动的支持者的回应，他们激励年轻人“到民众中去！”“到内地去！”这种呼声也为国民革命中的农民运动干部所接受。^②

① 李大钊 [1919] 1959: 149—150。

② 田农 1923，青松，1923。见 Hung 1985: 12, 187。

然而，国民革命不只是一次文化革命运动，也不只是一次内地人种考察。它将“改善人类生存的原则”与民族主义人种论联系起来，并通过一场政治和社会革命的群众运动，将浪漫的期待和列宁主义政党策略嫁接在一起。然而，甚至在其高潮时期，农民运动也接近于一次乡村的露天表演。1927年，在一次模仿新年仪式的革命表演中，“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毛泽东报道说：“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所以叫做反常。”正如毛泽东在同一篇报道中观察到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它仍然是一场聚会。农民喜欢给被抓的地主戴上尖顶高帽，列队四处游街，甚至懒洋洋地躺在地主小姐的“牙床上滚一滚”。在暴动的狂热中，群众冲进地主家中，杀死他们的猪，吃光他们的粮食。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乡村的一个节日。^①

从1920年代中期起，农民运动也得到了富有同情心的外国人的认可，他们在中国乡村发现了乐趣和幽默、灵感和“现实”。那时，区别富有同情心的外国人与带有敌意的外国人的根据，是他们在多大程度上最终承认粗俗的农民是真正的中国人。在吉尔勃之后10年，赛珍珠反思了这场革命运动的成就，她感动地对中国农民作出了相似的判断，但其判断带有完全不同的情绪：

智识青年……开始明了小市镇中的生活，农村里的生活，才是中国真实而原来的生活。这种生活，欣幸地尚未沾染驳杂的摩登习气而能保持她纯洁健全的天真。他们乃开始感到欣慰，知道自己的民族尚有此伟大而结实的基础，因而热情地转

^① 毛泽东 [14]：28—37。

向这一条路线以求新的灵感。这对于他们是新颖的。它是怡情的、幽默的、值得保有的，要之，是纯粹中国的。^①

138 赛珍珠对乡村乐趣和幽默的发现，以及对城市生活中“驳杂的摩登习气”明显的不适，得到了中国国民党人的赞同，即使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有责任调和传统和现代——两者都是那么令人不安——的混合物。新文化运动和国民革命促进了“进步”文化对“封建”旧文化的取代，但两者都未能成功地使新民成为可靠的“中国人”，以取代那些所去除的东西。20 世纪头 20 年归咎于旧文化的过错，充其量不过是梁启超关于中华民族的消极和惰性、保守主义和不平等、坏脾气和悲观主义的早期文章的补遗。最终，这些过错将给青春和活力、科学和功用让路。但是，新文化运动的成就显然是“驳杂的”。

善于反思的中国作家们从未忽视中国民族主义核心之处的这一悖论。他们所谴责的旧文明为他们提供了武装，使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有了充分的意义。辜鸿铭匆忙赶回自己的队列并一直嘲笑它。巴金、沈从文和老舍采用严厉的讽刺来解释民族的尴尬困境。他们在激励同胞改变其方式的同时，从来不可能不露出一丝遗憾。然而，甚至他们的遗憾也带有讽刺意味。沈从文悲痛地暗示了这样的民族命运：为了将自己的文化、领土和国家从欧洲人的侵略和压迫中拯救出来，一个民族不得不变成欧洲人。《阿丽思中国游记》的开头场景安排在 1920 年代中期，有人建议阿丽思，在新文化的攻击尚未使旧文化的神秘奇境完全消失之前赶紧前往中国：

我们是知道在中国这个时候，国境南部正在革命，凡是一个革命政府成立时节，总是先就要极力来铲除一切习惯的。

^① Pearl Buck: 序，见林语堂 1939: x。

一切的不好制度在一种新局面下都不能存在了，一些很怪的风俗也因此要消灭了，还有一切人全是成了新时代的人。

沈从文的作品写于1928年，当时新时代的人逐渐变得太像外国人，很难被认为是真实可信的。“新时代的人，”阿丽思的中国顾问告诉她，“则大概同欧洲人一个模样，穿的衣服是毛呢制的，硬领子雪白，走路腰肩不勾，说话干脆。”如果中国被迫显出外来的魅力，与冒昧而至的欧洲人竞争，那这种玩笑将以失去拜访者为代价。但中国没有任何损失，它可以愉快地省却那病态的舶来品——这些玩意儿在欧洲人的想像中被用来替代中国：

再没有戴小瓜皮帽子的绅士了，再没有害癆病的美人了，再没有一切东方色彩了，那纵到中国去玩一年两年，也很少趣味。^①

然而，当新民无法再与欧洲人区别开来时，民族主义者对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了。一方面是旧式精英的消耗性文化，另一方面是衰微的、西化的城市精英，在民族主义者的想像中，理想化的乡村民众文化填补了两者之间的鸿沟。无可否认，乡村的普通民众尚非新民。但是，对革命的改造能力的相信，使人们有理由希望，中国农民一旦觉悟到其紧迫性，就能够被说服去作出必要的转变。 139

在这一点上，讽刺停止了。革命者不仅希望发现乡村中的真正中国人——人种学家早已这样做了——而且还打算重塑他们。国民革命期间，他们转向乡村，以发现用来塑造真正中国人——他们能够在革命行动中焕然一新——的原始材料。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共产党员罗绮园认为，未受教育状态的农民文化和意识几乎没有什么价值，因而鼓励手下的干部们去教导农民，使他们明白自己的苦难

① 沈从文 [1928] 1982: 208。

的阶级本质。正如我们将看到的，罗绮园唤醒农民的策略，随后发展成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①再后来，当毛泽东反思自己相信中国将取得抗战胜利的乐观情绪的根源时，他不情愿地认为农民是自发、鲁莽和爱幻想的。农民的虚张声势无法对抗入侵的外国军队。毛泽东重新提起了孙中山的可怕忧虑：如果人民面对危险而不觉醒，中国就会亡国，落入外国势力手里，甚或陷入可与印度相比的衰落。但是，中国数十年间的政治、军事和社会发展，燃起了新的希望。共产党人将农民变成了新民：

如果放在几十年前，中国被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武力征服，就像英国征服印度那样，那么，我们就很难避免亡国一途。但今天的情况已经全然不同了。今天，特别要看到，中国已经进步了：我们有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和新型的人民，这是我们打败敌人的基本力量。^②

在毛泽东之前许多年，赛珍珠就在一篇作品中注意到，西方人对中国的批评和中国民族主义者萦绕于怀的亡国思考，二者之间进行了广泛的历史性对话，而“纯粹中国的”农民这一发现，则是这一对话的恰当结论。她写道，无产阶级革命的现代理论，鼓舞了少年中国去“探讨本国人民的非常的美质，这些人民的生活，尚保持着他们固有的纯洁生活而不受世界骚攘之牵动”。^③当这一发现转变为一项改造国民的革命纲领时，西方种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之间的对话，便发生了激烈的转向。

① 罗绮园 1926b：21—28。见本书第七章、第八章。

② 毛泽东 [12]：289。

③ Pearl Buck：序，见林语堂 1939：x。

民族主义者俘获殖民者

1920年代中期，新的更好战的民族主义向殖民主义的辩护者提出了挑战，这部分是作为我们在杂志和文学作品、伦理学和人种学中已经看到的一个普遍趋势的结果，部分是这10年间兴起了一个有组织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结果。随着一种更可怕的新土匪的出现，这两个趋势在1923年很偶然地汇集到一起。正如林语堂尖锐地观察到的，流窜的土匪是最早骚扰英国殖民者，妨碍他们吃果酱、喝早茶的中国人。^①这一发展趋势的影响，迫使中国国民党人重新评价农民土匪的革命潜力，而在殖民者那边，则迫使他们重新评价汉语的特征，绝望地企图恢复英语文学的创造性。外国人的努力最终失败了。国民运动不仅成功地动员了乡村和城市中的民众，而且扭转了整座殖民人种学大厦赖以建立的基础。^②

吉尔勃大胆的种族主义作品《中国怎么了?》出版于国民革命高涨的1926年。它并不比梁启超的文章更具批判性；的确，如果这本书是用中文写成的话，许多章节都可能被误解为旧中国的民族主义批判家的作品。^③然而，吉尔勃的书并不想向民族主义运动致敬。它与那些民族主义者的观点有着重要差异，拒绝认为中国人民有望获得欧洲人宣布自己所拥有的美德。《中国怎么了?》意在揭示，梁启超和孙中山就是问题的一部分。

① 林语堂 1939: 8。

② 关于20世纪中国土匪的全面研究，见 Billingsley 1988。

③ 吉尔勃不同意梁启超在许多方面对中国人的缺陷的判断，包括温顺、盲从、无耻、怯懦，无法产生英雄。Gilbert 1926: 27, 63, 155, 158—159。梁启超对这些影响的评论，前面已经提及。

吉尔勃随意引用了当时关于族性遗传的伪科学理论、进化理论，以及“尼采式的军事主义”，以向英语读者揭露“中国的真正问题”。“中国真正的问题，以及将继续困扰她的问题，”吉尔勃宣称，“就在于中国人是孩子，他们的世界是孩子的虚构世界。”^①然而，民族主义运动在梦想中发现了力量。根据吉尔勃经过思考的观点，只有在“一个由生物学家和人种学家组成的委员会”的帮助下，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②实际上，中国自己的人种学家已经着手诊治病人一个多世纪了，并在民族主义中发现了一个治疗方案。吉尔勃所不同意的，简单地说，就是中国有望恢复主权，因为他几乎看不到中华民族的革新前景。不过，中国民族主义者极为珍视希望这一美德。^③欧洲种族主义者和中国民族主义者都指出了中华民族在心灵和肉体方面的疾病，希望则给予了治疗这些疾病的承诺。

在写到土匪时，甚至吉尔勃也准备为自己对中国人性格的总体指责留下一个显著的例外。土匪的想像力，阳刚之气，勇敢和骑士精神，使他们与城市渣滓区别了开来。^④在《吾国吾民》——另一部致力于纠正吉尔勃的恶意诽谤的作品——一书中，林语堂承认吉尔勃的这一观点有某种依据。“中国之盗贼及土匪，”林语堂写道，“他们不需依赖法律的保障，故不遂具此种冷淡消极之品性而成为中国人心目中最侠义、最关心社会公众的人。”^⑤当然，在1920年代之

① Gilbert 1926, 45.

② 同上：18—19。

③ 梁启超 1953。

④ Gilbert 1926, 169.

⑤ 林语堂将土匪纳入了《吾国吾民》的范围，并将吉尔勃对土匪的正面评价扩大到全体中国人。他写道，对公共事务的明显冷漠，只不过是自我保护的面具，它掩盖了中国人当中普遍具有的骑士品质和公共精神。林语堂 1939：47。

前，在华殖民者几乎没有理由害怕土匪，因为众所周知，他们选择打劫对象时具有明智的辨别力；也就是说，他们曾经允许外国人平安地通过自己的领地。自1923年以来，情况再也不是这样了。

1923年5月，法国驻上海总领事维尔登（M. Wilden）在当地扶轮社的一次集会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匪徒道德衰落的演讲。维尔登曾在四川、云南、甘肃和西藏旅行过，但从未遭遇类似沿途土匪打劫的问题，“因为在那时……强盗属于旧式类型，习惯于将外国人当做客入”。新一代土匪对待外国人，却并不比对本地人更客气。结果，维尔登总结道，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来，中国目前到了最关键的时刻。^①1922年10月，也就在维尔登演讲前不久，10名来自传教士驻地的外国人（与几百名中国人一道）在河南省被囚禁，这使外国人社会极为震惊。^②但是，在聚集在华外国人社会的注意力方面，没有哪次先前的绑架活动能够比得上“临城劫车案”——同属维尔登演讲的主题。在中国人和西方人眼中，它是约翰牛和“中国佬”的一个重要转变时刻。

1923年5月发生在山东临城的拦劫和绑架国际列车乘客一案，实施得如此大胆而巧妙，以至于它似乎标志着华人匪徒时代的到来。临城土匪使运行在中国的最现代的火车出轨，这是一列全钢制成的快车，被认为是“西方铁路的效率和豪华的最新用语”。^③被俘获的这群人非常习惯于奢华享受：其中包括露西·阿德里希小姐（Lucy Aldrich，约翰·D·洛克菲勒的妻妹），两位美国军官，几名法国、意大利和美国商人，一对来自墨西哥的新婚夫妇，以及一位来

① *North China Herald*, 26 May 1923.

② *Weekly Review*, 6 January 1923.

③ Gilbert 1926: 281.

自上海国际租界的更令人讨厌的、人称“墨索总司令”（“Comendatore” G. D. Musso）的百万富翁。^①临城劫车案被认为是自世纪之交以来一次史无前例的反抗外国特权和财产的暴行。

荒谬的是，这一事件激起了外国作家的灵感，与那些习惯于俘获传教士的流窜团伙相比，他们更尊重临城的土匪。临城匪徒的能力和大胆使西方人敬重他们。吉尔勃宣称：“正如臭名昭著的临城匪徒劫持人质的证据将证实的，正是在东方的土匪而非沉稳可敬的市民身上，我们西方人发现了更多与自己相同的东西。”^②《字林西报》对土匪首领孙美瑶进行了一次访谈，忠实地报道了他的供词：
142 这群可敬的人的动机，仅仅是渴望在中国实现政治改革。英语报纸对土匪的同情几乎淹没了外国被劫持者的叫喊，后者发现，围绕着孙美瑶及其同伙的故事充满了田园诗或“绿林”情调，与自己在绑架过程中经历的恐惧、痛苦和不适相比，那些故事很难令人置信。一位被劫持者设法给《字林西报》传递了一条信息，敦促其停止来自临城的“神话故事”。“请删除报纸上那些想像出来的材料，让公众知道我们正在经历的真相。”“鉴于有关临城被劫持者的所有报道，都描绘他们在土匪那里做客的情形”，另一位专栏作家试图恢复这场争论的理智。他很恰当地提及罗宾汉传奇作为结论：“人们开始同情肥胖的小修道院院长约沃勒斯（Jorvaulx）对罗宾汉的处置方式。”^③在肥胖的小修道院长这一案例中，那些应该承担责任的人不得不受到诱捕和处置。

但是，谁应承担责任？孙美瑶和同伙显然犯了错误，但在外国

① Powell 1945: 92—93.

② Gilbert 1926: 170.

③ *North China Herald*, 26 May 1923. *Daily News* 的回应引自于这一资料。

人当中，这次暴行被更广泛地理解为中国共和政府瓦解的迹象。临城匪徒用自己的行动支持了外国人的抱怨，即（中国）政府无力维持法律和秩序，从而进一步证实了他们的观点：中国人没有能力治理自己。的确，土匪们受到外国媒体栏目的偏爱，原因之一是他们成功地羞辱了民国政府。5月12日，上海的《每周评论》指出了这一事件对于中国政府的可耻意义：

政府无法阻止盗匪活动的发生，使这种事成为可能，它必然导致民众对一个拥有自尊幻影的政府产生深深的羞耻感。在中国被称为政府的东西，不幸地证明了自身的缺乏；它一直没有以这种方式发挥功能，以至于难以配得上自己的名称。^①

责任随后从土匪转到了以曹锟为总统的政府身上。外国在华组织向自己的政府和外交代表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向曹锟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进行政治和军事干预，从而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天津总商会呼吁外交团体立即采取行动。中国协会（the China Association）打电报给伦敦总部，逼迫西方政府解除中国的武装，监管其全国铁路系统。^②其他人则强烈要求以牙还牙。按照在华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的观点，对蓝色快车抢劫案的恰当补救，是抓获暴行的主要责任人，即总统本人。《字林西报》的社论大胆表示：

我们再一次告诫，惟一使官员内心感到害怕的有效方式，就是打击看得见的最重要的人，像在其他无数暴行中那样真正该为事情负罪的人。请逮捕（总统）曹锟，* 以及两三个别的主要

① *Weekly Review*, 12 May 1923.

② 同上，19 May 1923.

* 此处“曹锟总统”有误，1923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时，总统是黎元洪。“临案”最后解决时，黎元洪已被曹锟赶下台（6月13日离京赴津），总统之位暂缺。直到当年10月，曹锟才登上总统之位。下同。——译者按

领导人。让他们从自己的口袋里掏钱进行赔偿，然后永远禁止他们担任公职。^①

《字林西报》回应了这些观点：

如果现在不采取某种具体的惩罚性行动，最好将矛头对准几个著名的中国官员个人，那么，临城事件就会以有史以来外国在华威望的最糟糕灾难而收场。^②

鉴于维护西人在华声誉的关注高于一切，逮捕曹锟并让他受到惩戒性处罚，就将是合适的行动方案。当一个文明的声誉停留在囚禁这一简单的姿态，它就必须找到一条“出路”，或者永远保持被囚禁的状态。

实际上，这一事件使外国人而非中国政府成员受到了更深的羞辱。陆军准将布鲁斯（C. D. Bruce）在致伦敦《时代周刊》（*The Times*）杂志的一封信中指出，临城事件的最糟糕方面，就是挑战了欧洲人在中国的威望。布鲁斯从1907年到1914年担任上海国际警察的代表，能够知道事件的详情。他认为，这不只是一件土匪劫持一车无辜受害者的案件，而是“东方对西方”的直接挑战。如果政府或土匪都能够毫发无损地摆脱这个案件，那么，天知道随后将发生什么。西方，以及它逐渐展现于中国面前的一切，都会受到东方的轻视。令布鲁斯和吉尔勃感到沮丧的是，列强不仅拒绝“逮捕”曹锟总统，而且承认他在1923年的贿选行为，条件是要他解决临城事件。^③

① 引自 *Weekly Review*, 19 May 1923.

② *North China Herald*, 19 May 1923.

③ 引自 *North China Herald*, 26 May 1923。在由来已久的土匪传说中，曹锟原谅并特赦了土匪，要求他们释放人质，但在人质们安全返回以后，却处决了匪首。

正如外国人所担心的，“临城劫车案”发生后，紧接着就是中文报纸的读者渴望了解这一骇人事件尚未呈现于自己眼前的每个细节。这是一个有关囚禁的不同故事：遭到反对的不是中国，而是不请自来的西方人。当一系列相似的事件在随后几个月里发生时，华人角落里传出了清晰的欢呼声。接近该年年底时，在外国人控制的靠近北京城墙的使馆区内，一名英国人坎贝尔（A. J. Campbell）先生遭到了袭击，袭击他的士兵李某，则被中国新闻界称赞为民族英雄。次年2月，一位名叫贝塞尔（Bessell）的澳大利亚铁路工程师在担任监 144
理京津铁路线的外方管理时，遭到一名中国军官殴打。当中国军官陈上尉化装出现在审判席上时，贝塞尔没有认出他就是攻击者，他的幼稚受到了中国报纸的嘲笑。^①西方人正在成为公开嘲笑的对象。有必要用贝塞尔辩护时的话来说，“中国佬”正变得更难辨认。

吉尔勃能够明白这一情形将向何处发展，并警告说，随着一个个新的事件（逐渐）暴露出在华外国人的弱点，必须警惕“全体中国公众的表达勇气中逐渐增长的普遍敌意”。^②更糟糕的事情正在酝酿。1925年5月30日，吉尔勃最担心的情况出现了：上海的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发生了严重冲突，五卅运动，远远超过了临城暴行，以至于那些铁路劫匪几乎被立刻遗忘了。^③吉尔勃注意到了这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并看出了它们对白种人在亚洲的威望的累积性影响：

问题正在为占人类三分之二的人所阐明，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者更严格地说，盎格鲁—日耳曼民族，将受到召唤去解决它们。如果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可能意味着西方文化的覆

① Gilbert 1926: 284—287.

② 同上: 289.

③ Rigby 1980, Clifford 1979. 亦见本书第六章、第八章。

没和白人种族身份的丧失。它至少会招致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惟有少数毫无准备、缺乏严格组织的上等盎格鲁—日耳曼人，将受到召唤，彻底回复到尼采式的军事主义，征服、消除或奴役地球上的所有劣等民族，后者或者组成一次不合时宜的大叛乱，或者失败。^①

在种族主义几乎不需要任何理由的时代，吉尔勃显然是种族主义者，他的警告预示着通商口岸社会内部更广泛的关注。1920年代中期，“中国怎么了？”这一问题，再也无法像前几年那样只用简单的罪恶目录就可以回答。不平等的对话已经发生了转变。临城土匪破坏了一段铁路线，将一小群有影响力的外国囚徒带到一个偏远的、易守难攻的山窝里；在此过程中，他们已经开始扭转中国和中国人长久以来被囚禁的格局，这种格局始于1743年安森船长对广州的首次重大来访。安森的进入广州港，与其在削弱旧帝国威望方面的影响同样不般配。全部要求就是一次简单的、无可置疑的俘获行动。^②

然而，到1920年代中期，不仅外国人正在落人民族主义复兴运
145 动的囚禁之中，中国人民也是如此。为了精确地确定谁是他们注定

① Gilbert 1926: 18. 吉尔勃的启发性观点，呼应了昆塞1857年的预言：“非常需要冲突，过去的和未来的，在其中，我们不列颠人巍然独立——但从今以后，我们可能希望得到美国的积极支持，如果不是法国的支持的话——代表全体西方民族，胜利地抵制了东方人的狂妄自负。” De Quincey [1857] 1897: 359.

② 日本“皇军”并未放弃这一经验，1940年代初期，他们占领中国期间，经常让西方囚徒在中国人的嘲笑声中游街，试图将自己展示为民族解放的力量。那些被游街者承认，自己所承受的耻辱标志着“西方人统治亚洲时代”的终结。Langdon Gilkey回忆了1943年2月他被迫向北京火车站进发的情形：“我们知道，日本人意在把此次（途经中国各个城市和港口的）征途，作为西方人在东方的威望最终消解的象征。因此，我们尽可能走得笔直，尽量展示一种不屈的风度。但对于一名夹带着四五个沉重的包裹的年轻人来说，这确实太难了。年老者就更加困难……显然，日本人猜对了：在爬向车站的沉重之旅中，西方人在亚洲的统治时代结束了。” Gilkey 1966: 4.

要去解放的人，民族主义者希望发现谁是真正的中国人。他们寻找真正的中国人的热情，基于某些关于民族本质特征的假设之上，这些假设，与吉尔勃对腐朽市民的种族主义评论，以及赛珍珠对中国农民的更慷慨的判断，几乎没有区别。在中国内部，他们的结论与反对者的观点多有共同之处。当老古董辜鸿铭大胆为旧式“真正的中国人”辩护时，他的创造力并不亚于富有同情心的外国观察家，也不亚于那些为新中国和新民辩护的改革家和革命者。在每一种情形中，保存或改变中国的呼声的可靠性，都基于一个静态的理想假设，即中国人到底是什么样子。而这些本质主义的前提，则基于文学形式中内在的新式现实主义美学之上，历史学、人种学、文学和政治的争论，都在这些文学形式中进行。^① 不管是要保存还是要改变中国，它首先必须在文学中被囚禁起来；中国民众的习俗在被诊断或治疗之前，首先需要被冻成肉冻加以科学观察。

如果“真正的”中国人是活生生的进化中的生灵，而不是科学研究的俘获对象，那将会怎样呢？1936年，处于生命最后几个月里的鲁迅，似乎正在关心这个问题，他带着如此微弱、以至几乎无法觉察到的讽刺评论说：

我至今还在希望有人译出史密斯的《支那人气质》来。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那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功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②

鲁迅对什么是“真正的”中国人的评论，源于好莱坞导演约瑟夫·冯·施坦伯格（Josef Von Sternberg）抵达上海不久。几年前，也就是1932年，施坦伯格根据1923年的临城劫车案拍摄了一部影片，

① 见本书第八章。

② 鲁迅 [1936] 1980：302。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但影片对原事件作了许多重大修改。在电影版中，劫持火车的不是土匪，而是革命者，被俘获者包括手无寸铁的外国人和倒霉的中国人，他们最后合谋杀死了革命者的首领，获得了自由。施坦伯格成功地将一次历史事件——它暴露了殖民者的弱点和中国人的韧性，转变为一个更老套的故事——正义的外国人报复了本土中国人的狡猾，尽管这次是革命的狡猾。这是吉尔勃未能做到的。从此以后，在西方对中国的表述中，土匪和革命者合并到了一起。^①

146 这部电影在上海首映时激起了如此强烈的抗议，以至于发行人被迫取消了放映计划。施坦伯格无法理解所有这些抗议，1936 年访问上海期间，他坚持公开表达自己对所看到的中国及其民众的轻视。鲁迅理解这种抗议，因而以他特有的讽刺方式，假称自己欣赏施坦伯格的直率。^② 在从北京到厦门、广州和上海的辗转迁徙中，鲁迅经历了临城暴行的故事和国民革命的进程，并痛感于此前 10 年里土匪和革命者首先掌握了机会，展示了中国人“究竟怎样”。似乎在革命性的转变实践中，真正的中国将显出自己的形状。鲁迅于是放下笔，将剩下的任务留给了革命者。“在一场伟大的革命中，”他在 1927 年解释道，“文学消失了，留下一片寂静。”^③ 惟有枪声沉寂下来之后，他才会重新写作，并期待着阅读史密斯的《中国人的性格》，希望能洞悉好莱坞为何会轻视中国。

① 极为重要的电影《上海快车》(Shanghai Express)，加速了“土匪”与“革命者”在西方人关于当代中国的叙述中的合并，这一合并过程始于国民革命，结束于 20 年之后共产主义的胜利。席卷中国的另一场伟大的革命运动，(在麦卡锡时代的顶峰)激发了 一部续集，后者发行于 1952 年。Peking Express 由 William Dieterle 执导，William Cotton 和 Corinne Calvert 主演。在这一版本中，“土匪”变成了共产主义暴徒。Leyda 1972: 82; Sadoul 1972: 337—338. 我应该感谢 Antonia Finnane 为我指出了这一资料。

② 鲁迅 [1936] 1980: 297—302。

③ M. Anderson 1990: 53, 59—60.



4. 孙中山和陈炯明。(选自
蔡东藩, 1956, 33: 内封)

第四章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 “封建主义”与社会革命

辛亥革命以后，他（陈炯明）常向人说，他少年时常常做梦，一手抱日，一手抱月；他有一首诗，内有一句云，“日月抱持负少年”。

孙中山，1924^①

1921年1月，马格鲁德（John Magruder）少校离开广东省长陈炯明的司令部时，相信自己刚刚见到了一个极不寻常的人物：“他看上去非常聪明，有一双我在中国人中见过的最和蔼、最友好的眼睛。他的气色特别好，沉着而冷静，却又不失警觉。”^②马格鲁德是美国驻北京使馆的助理军事参赞，尽管才34岁，但通过在中国的职业性出游，他已经见识了许多被他称之为“幻想者和梦想家”的人。总体而言，这些人并没有给他留下多少印象。^③若干年以后，他已经对

① 孙中山 [31]: 186。

② Magruder 1921; L. Chen 1988: 8. J3A. 感谢陈定炎先生提供这则资料。

③ Magruder 1921.

这个民族的做梦天赋了然于胸，并给作战部递交了一份正式文书，对那种流行的将“表面文章”与“冷酷的事实”混为一体的偏见表示不满。^①省长陈炯明当然是一个梦想家，他的表情也有点过于和蔼，难以表达性格的力量。“我不应该把他看做一个外表倔强的人——也许因为他的表情本来就很和善。”^②但抛开他所有的幻想不计，陈炯明的眼睛和表情中还是有一些东西，它们激发了一个坚毅的现实主义者的信心。

早些年，孙中山曾经给一位英国人——康德黎（James Cantlie）博士——留下了同样深刻的印象。1887年，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注册，此时康德黎与他相遇，1896年，康又在伦敦向孙中山伸出援手，帮助他从中国驻英使馆中释放出来。^③这两个人结下了密切而持久的友谊，一直持续到民国时期。在此期间，康德黎回忆道，他逐渐认识到了孙中山那种“性格的力量，他对既定目标的热情，他那谦逊的心灵，并逐渐理解了他的权力背后的秘密”。^④性格的力量并不是以失去“礼貌和友善”为代价的。马格鲁德发现陈炯明省长是“中国人”的榜样，康德黎却认为孙中山是值得全世界仿效的模

148

① Tuchman 1970: 251.

② Magruder 1921.

③ Cantlie and Jones n. d.: 第二章。

④ 同上：前言。

客的匕首和叛徒的野心。”^①康德黎是对的，但有一个例外。陈炯明省长背叛了孙中山。

孙中山的“礼貌和友善”及陈炯明的“和蔼与友好”背后，藏着两种不可调和的关于中国的梦想。1922年6月，这两种梦想以陈炯明个人臭名昭著的对国民革命的背叛而发生了碰撞。这实在出人意料，因而让人难以释怀。陈省长是一位聪明的律师，也是一名忠实的军事官僚，在其老家——广东东江地区有一批忠诚的追随者。陈炯明出生于一个客家士绅家庭，29岁时领导了一场弹劾惠州知府的公众运动，开始引起公众的注意。两年以后的1909年，他参加了同盟会，进入了同盟会内部的孙中山派系。1911年，他在控制广东并使其成为革命力量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并在年底被推举为广东省代理都督。当1913年袁世凯总统镇压革命力量时，陈炯明仍然忠于孙中山——尽管加入袁世凯一边能够得到慷慨的回报——并在民国头10年中不懈地支持孙中山的宪政和军事策略，在自己控制的地区推进教育和社会改革。实际上，正是陈炯明为孙中山提供了根据地，使他1920年代初在广东进行的国民运动得以扩展开来。然而，在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忠诚背后，也有着与之不相和谐的另一面。陈炯明是坚决拥护地方自治的人。当他拒绝从地方财政中补贴孙中山为统一全国而发动的最后一次军事举动时，这两个人最终走向了对立。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下令攻击孙中山在广州市的司令部。孙中山逃往永丰舰，该舰就停泊在广州城外的珠江，孙中山在那里度过沉闷的7个星期，等待着援军的到来。但援军一直没有来。8月9日，孙中山在屈辱的形势下被劝离广州，乘坐一艘英国炮舰前

^① Cantlie and Jones n. d. : 69, 64.

往香港。孙中山后来将陈炯明的叛变，视为生命中难以忘怀的众多失望中最大的失望。不管是孙中山还是他的后继者，都从未忘记它。

正如康德黎所观察到的，孙中山在本质上是一个温和的人，倾向于宽恕那些反对自己的人。章炳麟是孙中山早期革命同志中最有才气的人，他在1909年指控孙中山侵吞革命经费，使孙蒙受了羞辱，但1917年，孙中山仍然邀请章参加自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另一位同志黄兴，曾在革命的某个关键时刻反对过孙中山，但孙中山却在黄兴的葬礼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赞美之词。^①但孙中山没法原谅陈炯明。只要听到陈炯明这个名字，孙中山的表情就会由和善变成愤怒，如果有谁为陈炯明辩护的话，孙中山就恨不得掐住他的喉咙。孙中山在广西梧州前线听到消息说，陈炯明将不会支持自己的北伐。他的顾问赖世璜请求他对陈的“背叛”示以宽大。孙中山愤怒地质问他：“你是不是他那一派的人？是不是？”并对卫士挥手，下令：“杀了他！杀了他！杀了他！”据传赖世璜由于孙的另一位顾问蒋百里的干预而得到了保护。^②国民党人从未能够抓住陈炯明，但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他们将陈炯明赶出了广东，不久陈在追捕中死于香港。直到今天，国民党的史学家们仍然在谴责他。^③共产党人紧随其后，在陈炯明的名字之前加上了“叛徒”这一名号。1922年，共产党人站到孙中山一边不久，共产党的宣传干部蔡和森写

① Chang and Gordon 1991, 148.

② 李敖 1987, 185.

③ 近年来，持不同政见的台湾作家开始重新评价陈炯明在革命中的作用。见李敖1987。陈炯明的儿子陈定炎不辞劳苦地翻遍了报纸和档案，寻找有关其父亲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的被遗忘的资料，并进行了私人性的研究，试图重新评价其父亲。见 L. Chen 1991。

道，陈炯明是一个“民主革命的叛徒”。“他叛变的足迹昭然若揭，每个人都已将他唾弃于一边。”^①

尽管如此，马格鲁德少校和康德黎对陈炯明和孙中山的个性的评价都非常恰当。孙中山以一个正派的人的形象而逝去。他毕生服务于中国，而不计较个人和家庭的财富。尽管他代表革命利益掌握着巨额金钱，他为自己的妻子宋庆龄留下的东西，却只有一幢房子、一些书籍和衣物。^② 陈炯明也一样，尽管很容易控制广东省财政，但他却死于贫寒之中——与他在广东的继任者、更世故的陈济棠全然不同。^③ 但孙中山和陈炯明的个人品质并非这场争端的核心之所在。孙中山心里积蓄了对陈炯明的强烈愤恨，不是因为他与自己明显不同，而是因为陈炯明以同样无私的精力，去追求一个关于民族统一的不同的梦。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对陈炯明的“叛变”的记载，已经将孙中山的卓越追求保存了下来，并将他确认为现代中国正统的梦想家。然而，孙中山那个建立统一、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并在其之下实现民族自主的梦想，并不是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当中滋生的惟一梦想。陈炯明有一个不同类型的梦。尽管陈炯明只是一个地方军阀，
150 但他的抱负却超越了省界。在关于民权的第一次讲演中，孙中山正告那些仅仅将陈炯明视为一个省长的人说，陈炯明远比表面上看去更加危险。孙中山说，陈炯明从不满足于仅仅控制两广而忽略中国其他地区。孙中山列举了陈炯明做过的一个梦，以表明陈“想做皇

① 蔡和森 1922e: 78。

② 孙中山个人的正直，经常被用来证明其政治权威。例如，见 Chang and Gordon 1991: 148。

③ 见 Abend 1944。

帝”。^① 实际上，陈炯明所做的关于中国的梦，并非梦想自己成为加冕的国王，但不管如何它都是危险的。陈炯明主张各省自治基础上的联合，欣赏高度的区域自治，以及相应的中央政权地位的降低——简言之，一个联邦制政府。显然，当1922年6月孙、陈同盟破裂的时候，中国既没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也没有一套可行的联邦体制。但在陈炯明叛变之前，孙、陈之间的政治斗争已经显示了两个梦想之间的冲突，只要其中一个梦想者能够将太阳或月亮掌握在自己手里，整个民族不知将是什么模样。

地方自治与“封建主义”

在陈炯明所期望的“中国”理想中，地方自治具有很高的地位。孙中山对“党人治粤”的偏爱众所周知，但陈炯明则被广泛地与“粤人治粤”这句格言连在一起。就孙中山所关注的内容而言，其中的区别在于，是由一个拥有独特的党派追随者的政治派系来治理，还是由一些拥有独特的地方追随者的士绅来治理。陈炯明“叛变”前几个月，这两条原则中的哪一条在广东地方士绅中更有影响，已经变得很清楚了。陈炯明建议将此问题付诸公决。1921和1922年，机会来了，陈炯明建议，县长和县议员应该通过公共选举来选择和任命。孙中山很不满意。他认为广东民众尚未达到与党治相适应的政治自觉程度，无论如何，极有可能将自己钟爱的干部选下去。^② 陈炯明不管这么多，坚持将选举进行下去。到年底，92个县完成了县议员和县长选举，市议会的选举正在进行当中。

^① 孙中山 [31]：185—186。

^② 孙中山 [35]：411。

在准备选举的讨论中，陈炯明在关于县长选举这个重要问题上作出了让步。他感到，在缺乏候选人与省内现任政治领导人竞争的情况下，地方选举很可能将在职者选上台。因而对于初次选举，他掌握的省政府，保留在每个县得票最多的前3名候选人中任命县长的权力。^①这也许正好合适，因为选举中的首要问题不在于选民的意识，而在于选举的管理。选举中出现技术违规是常见的事，在一位
151 外国观察家看来，广东的选举已经接近于“闹剧”。依据每个村庄的规模，选票被分发给村中长者和民兵首领，在有的地方，长者和民兵干脆自己代替选区的选民填写选票。一点也不奇怪，在许多县，在任的地方官员获得了最高票数。通过保留从选出的候选人中任命县长的权力，省政府对选举程序的弊端作了补救。^②但即使这种程序，也未能阻止老谋深算的候选人采取联盟行动，他们试图通过此种方式，确保自己阵营中至少有3人在地方上得票最多，从而必有一人被任命为县长。在这种诡计中，3人之间将达成一致意见，共同瓜分这一职位带来的收益。尽管陈炯明允许对涉嫌腐败的行为进行合法的挑战，但他几乎无法对付这个问题。

大体而言，陈炯明对候选人的挑选是谨慎的。在汕头一带，他任命的县长当中，有4人在地方选举中获得了最高票数，5人获得了次高票数，还有2人在地方选举中获得的票数位居第三。^③省政府并于12月决定，在新的一年里向各县派出督察队，评估各个县长的表现，以为进一步的矫正之策。^④陈炯明承诺，自己将严密关注他们

① L. Chen 1991: 21—37.

② 《华字日报》1921年8月2日。Myers 1921; L. Chen 1988: 8. J201。

③ Swatow 1921; L. Chen 1988: 8. J9.

④ 《华字日报》1921年12月24日; L. Chen 1988: 8. J202。

(的表现)。“县长应与人民建立最密切的联系，”他提醒这些新的被任命者说，“兄弟在漳州时，习惯于保持县长们的行政记录。对于本省的县长，我仍然希望这样做。”^①在汕头市，选举进行得更加平稳，当地大约二万名在册选民参加选举，他们将选出6名市议员。另外6名市议员将由公共团体选出，其中商会选出2名，劳工联合会、地方教育、医学和法律团体各选出1名。还有6名市议员由陈省长直接任命，这样，总共有18名市议员。^②

陈省长不得不在广州兑现其对自治的承诺，在那里，他提出了一套更加和缓的程序，将直接选举引入这座省会城市。他建议在第一年里由自己任命全体市议员的三分之一，并在5年内逐渐减少自己任命的数量，在此之后，他将放弃进一步任命的权力。^③他还建议，在此过渡期内任命一个临时市长。这个地方自治的计划草案在广州一公布，便引起了省议会的双向批评。省议员们质问道，县被授权直接选举其地方议会（尽管不是县长），而省长却保留着任命广
州市议员和市长的权力，这是怎么回事？陈炯明不愿在这几点上作出更大的让步，被视为对“广州人民”的“政治觉悟”的轻视。^④上海的国民党本部则更有雅量。上海《民国日报》承认，这些选举尽管存在种种不足，但它们“不仅是广东的突破，而且在中国的民主历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⑤实际上，正如历史学家温斯顿·谢(Winston Hsieh)所观察到的，它们在“中国历史上是史无前例

152

① *Hong Kong Times*, 1921年11月17日, L. Chen 1988: 8. J9.

② Swatow 1921.

③ Hsieh 1962: 209.

④ 《华字日报》1921年7月28日、30日、31日, L. Chen 1988: 8. J5B.

⑤ 上海《民国日报》1922年1月22日. Tochigi 1974: 68.

的”。^①

陈炯明在广州选民中遇到的问题，（其严重性）没法跟他与孙中山的摩擦相比，后者源于陈对选举制的坚持。1921年广东地区关于地方自治抑或党治的优劣之争，是促成陈、孙分裂的因素之一。孙中山决定发动北伐。对他来说，推翻北京的政府，比处理广东复杂的地方政治和选举事务来得更加直接，也与他那重新统一国家的使命更相符。就陈炯明方面而言，他担心这位国民党领袖会从国都的强势地位出发，将党治强加给广东省，以弥补他在广东省内时未能实现这一目标的缺憾。^② 陈炯明的担心不无依据，但却弄错了方向。孙中山未能取得对北京的控制权，却在广东省进行地方选举之后的一年之内，率领从外省征集的军队突袭广东。然后，他将陈炯明逐出了广州，在广东省建立了一个新的党治政权。孙氏新体制的建立得到了苏俄顾问的帮助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在这一体制下，地方官员不再经由选举而产生，而是从（革命）干部中任命，后者对那些曾在竞选中获胜的“封建势力”充满敌意。

最早将陈炯明的地方自治模式等同于“封建主义”的，不是孙中山本人，而是中国共产党人。到1922年6月为止，联省自治运动已经得到了著名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包括胡适——的相当支持，并从湖南、云南和广东的省级军政首脑那里获得了支持。^③ 当对联邦主义的支持开始呈现为一场全国性运动的态势之时，共产党的领导人便登上公共论坛，就联邦制和中央集权制国家组织模式的优劣展

① Hsieh 1962: 217. Winston Hsieh 此处指的是区级行政长官选举。

② 孙中山自称曾对陈炯明说，如果北伐成功，自己将不会干预广东省的事务。从孙中山自己的记叙来看，陈炯明未能被说服。孙中山 [31]: 185—186。

③ Luk 1990: 82—83.

开辩论。共产党人对联邦主义的敌意，最初不是基于原则，而是基于偶然因素。“我对于联省自治即联邦这个制度的本身，本来不反对。”中国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在1922年9月这样解释说。陈独秀认为，自己对于联邦主义的反对，原因在于论争之外的一些“事实”。一是他认为，中国当前的政治问题，全都可以归因为敌对的军阀派系之间的竞争，因而，任何鼓励其分裂主义倾向的举措，都只能使事情变得更糟。陈独秀指责说：“武人割据是中国政象纷乱的源泉。”^①一周之后，蔡和森追随陈独秀的观点，用几乎同样的话抨击联省自治运动：“中国政治的乱源当然在军阀。”^② 153

作为陈炯明“叛变”的后果之一，军阀的背弃信义成了国共两党圈子中关于忠诚的一个论题，当时联省自治运动据说源自于地方军阀之间的协商，他们希望通过这一途径，使事实上的自治获得形式上的认可。诽谤联邦主义运动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向人们表明，陈炯明这样的军阀热心于这种运动。“近来的联省自治论，非发生于人民的要求，乃发起于湖南、广东、云南等省的军阀首领。”^③但对于共产党人来说，就这样也还不够。当“封建主义”一词被用来解释军阀和联邦主义运动的奸诈关系时，原则与偶然因素便融合到一起。现在，联邦主义被说成与“封建的旧势力之继续”^④有关联，因而是有污点的。如果封建主义是基本的问题，那么随之而来的是，军阀赞助之下的联邦主义，与“封建旧势力”的所有其他残留一道，恰恰是国民革命所要征服的又一个敌人。

① 陈独秀 1922：2。

② 蔡和森 1922d：15。

③ 陈独秀 1922：2。

④ 蔡和森 1922d：14。

为什么军阀应该归于民族革命的直接攻击目标之列，这一点并不难理解。他们在分裂国家、与帝国主义“合作”方面的明显作用，清楚地对应着国民革命的双重目标，即国家统一和独立。但为什么军阀方面的这种倾向应该如此爽快地被视为封建的，这一点解释起来更加困难。一些军阀当然拥有地产，但他们中无一拥有被束缚的农奴，并且，他们都尽心将自己展现为悠久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思想最前卫的省级统治者。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进步的联邦力量，而不是代表古老的封建力量。然而，对于共产党人来说，联邦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相对优点，完全是被放在死而不僵的“封建势力”这一框架之内来评估的。

对于这个世纪中国的更伟大的革命而言，国民革命最重要的贡献，恐怕在于它对待语词的方式。就在陈炯明和孙中山因为采用中央集权制还是联邦制国家结构问题而破裂的同时，革命者们正忙于创制一种新的语言，以描述摆在本民族面前的困境和前景。儒学语言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受到了批判，当时激进主义者用进步的自由主义语汇来取代前者。包括美国和日本在内的许多国家，都曾经是早期民族抵制运动的目标，1919年凡尔赛会议令人失望的结果，使爱国主义愤慨的对象扩展到“一战”的所有战胜国。五四运动中，自由主义思想的种种范畴，依然强调将这些国家区分为“列强”，它们都有自己民族的历史、个性，以及针对中国的独特利益和政策的混合。尽管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一致批判军阀，但所有的批评家都倾向于将军阀们区别对待，承认其中存在着更加进步的分子。军阀和列强并没有一律被视为民族革命的盟友，也没有被全部当做革命的敌人。实际上，在1922年6月以前，陈炯明被认为是所有军阀中最进步的人。然而，当他与孙中山决裂之后，他就不再被视为军阀，甚至也不仅仅是为英国在香港的利益服

务的卖国者。几年之内，用于理解他的罪名的语言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陈炯明成了一个“封建军阀”，据称他曾经为之服务的香港利益，也不再是大不列颠的利益，甚至也不是一个列强的利益，而是“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到了1922年，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儒学，都不足以像列宁主义那样，能够精致地解释新中国的困境。

政治语言与语言政治

对于20年代初期革命历史的重新叙述的显著之处，理查德·罗狄 (Richard Rorty) 的观点最有见地，他在《偶然、讽刺与团结》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一书中评论道：“当某个人认识到我们（常用的）两个或者更多词汇表正在相互干扰，进而创制一个新的词汇表来代替前两者时，艺术、科学、道德和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典型的革命成就便发生了。”革命语言的武器库中出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这两个术语，为理解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也为政治行为提供了新的基础，在20年代的国民革命结束很久之后，这种行为仍然保持着适用性和生命力。更重要的是，新的词汇表改变了它所追求的目标本身。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手里拯救出来的中国，将不同于从军阀和列强的魔爪中抢救过来的中国，也不同于从西学和蛮夷那里挽救回来的中国。革命的思想家“在他借以成就某件事情的语言发展起来之前，通常无法弄清什么是他所希望做的。他那新的词汇表，第一次使他有可能弄清自己的目的”。^①对于“中国到底怎么了”这个问题，自由主义和儒学语言都没能给出一个简明的答案，因而，选择一种新概念的語言自然变得更加迫

155

① Rorty 1989: 12—13.

切。国民革命的语言让革命者们能够想像到自己的救国目的，即以正在转变的方式或者说是激进的方式去拯救这个民族。

革命期间，语言本身也是一个问题。与此同时，一场语言改革运动正在进行，作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中国的形成，也在这场运动中处于漂浮不定的状态。一方面是中央集权者和联邦主义者之间围绕着中国国家形态问题的政治竞争，另一方面是语言改革运动中文字统一化和多样化的拥护者之间的论争，二者之间确实有着清晰的可比关系。语言与政治的领地是截然分开的，但政治上的民族主义者在语言文字方面，往往倾向于要求一定程度的多样性或者统一性，以与他们头脑中设计的民族统一类型相适应。国民党实力派官员陈果夫，在国民革命完成之际的一句充满战斗气息的评论，反映了国民党的立场：“中国实现统一的能力，完全取决于拥有一种统一的书面语言。”^①语言联邦主义者也在民族统一的修辞框架下展开自己的观点，但他们眼里的统一，只是各个分裂的地方社会的集合，这种统一的基础是既存的社会条件，而不是一个抽象地重新组织起来的民族：“我们需要的统一既不抽象、虚幻，也不是人造的虚假，而是一个源于现实生活的统一。”联邦主义者也提倡普遍的学问，但他们相信，学问进步的最佳媒介，乃是一个能够包含地方多样性、足以“使某一地区内的民众能在内部相互交流”的书写系统。^②另一方面，语言上的中央集权主义者希望人们在地方上用国

① De Francis 1950: 83. 陈立夫受到其兄陈果夫这一意见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教育部长，下令推行强制性中文教育，从汉族社会到边疆地区的少数民族，概莫能外。

② 在这种模式中，知识分子们将在地方社会和民族之间寻求平衡：“知识分子可以解说民族利益的内容，并使之广泛传播……这将促使中国的统一。”《上海汉字拉丁化研习社宣言》（1935），引自 De Francis 1950: 118—119。

语交流。在语言改革运动中，至少当它针对政治的时候，问题不在于民族统一，而在于统一的民族国家里地方与中央的关系。正如弗朗西斯（John de Francis）在其关于中国语言改革运动的精彩调查的结论中所说的：“中国文字的问题，在每一点上，几乎都还原为中国民族主义本身的这个或者那个方面。”^①

中央集权化的语言改革运动中体现的民族，与康有为驰骋宇宙之后返回书斋发现的理性官僚政治的自我之间，有着隐约的相似。康有为在其大同哲学中直接提出了语言与民族主义的问题。他当然不是一个理性语言的沙文主义者。康有为充满信心地预言，所有民族语言的衰亡——如果我们愿意相信他的话——也在帮助他自己心爱的汉语走向衰亡，如果这样会加速一种共同文字被普遍接受的话。¹⁵⁶就所有外在表现而言，没有什么比民族主义的主张更加具有敌意了。然而，康有为的大同观点，反射了后来洋洋得意的民族主义修辞中出现的对文化差异的不容。他以牺牲特定的汉语为代价，鼓吹一种普遍的语言，这预料了一种呼声，即以牺牲地方语系和方言为代价，在中国内部促成民族语言的标准化。当康有为宣称“民族语言应当废弃，因为它是一个主要的障碍，使世界的不统一得以长期维持”时，他预示了陈果夫代表国民党人发出的主张，即方言使民族内部的不统一得以长期持续。^②两人都追求最大的理性，一个是为世界，另一个是为民族。

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与他一样关注效率和秩序，尽管针对的是民族国家，而不是这个世界。康有为试验了一套国际语音系统，梁启超则发展了另一方面的强烈兴趣，即为汉语使用者专用的语音

① De Francis 1950: 251.

② 康有为 1958: 97—99.

系统。^①支持民族语言统一的人也援引康有为关于统一和中央化的历史规律，后者正将事件推向一个大同王国的方向。但是，希望从帝国走向普遍世界秩序的民族主义者们，感到自己不得不在民族国家的层次停留下来，因为历史尚未作好准备以进入大同这一更高阶段。

在1920年代，使用“封建主义”有助于解释他们的困境。例如，马克思主义者张廷飞建议从旧帝国的“封建的”或者高度多样化的文化，向普遍的世界秩序迈进，并且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样，他也准备逗留在“民族—国家”这一走向统一的过渡层次：

现代中国的历史，是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迈进的过程。

它仍然处于民族主义阶段。因此，汉语文字仍然适合这一阶段。此阶段的独特特征是经济、文化和政治统一。只有统一才是进步的；分裂意味着反动。

张廷飞将封建主义与分裂，并进而将分裂与反动等同起来，显示了针对披着各种外衣的封建主义——议员、文化、社会组织和政治管理——的革命的力量。在语言这一个案中，汉语文字此时非常适合中国——摇摆于一个被想像为封建性的不统一和一个被想像为国际性的联邦之间——因为它们具有足够的包容性，能超越中国内部的种种差异，但又具有足够的排他性，能在现存的民族国家本位的世界秩序内赋予其使用者一种公共的认同。与康有为、梁启超一样，
157 张廷飞也希望有更多的东西。他希望先用一种标准的国语来取代地方语言，然后为此标准语言制定一套统一的拼音字母，以加速“汉语书写的国际化，使之在将来发展为世界语言”。^②

① 梁启超无出版日期：46—48。

② De Francis 1950：238—239。

当然，这些观点是马列主义世界历史模式在语言领域的复述。但它们也与中央集权式的民族主义相容。甚至孙中山自己也将民族主义视为通向普遍秩序之路的过渡阶段；实际上，正是这种普遍秩序使民族主义显得迫切。“我们要知道世界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孙中山忠告说，“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①革命者们相信，世界必定（实现）最终统一，憎恨将之分割开来的种种疆界，在他们眼里，如果缺乏大同，任何东西都是无理性、无效率的。与军阀一样，地方语言也是反动的，因为它们使分裂得以长期维持，阻碍了“世界主义”的实现。语言标准化和政治中央集权化的程度，大致固定在当前历史时期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上。对于语言方面的中央集权主义者而言，这意味着一种统一的民族语言。对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主义者来说，它意味着一套统一的中央集权行政体系。

中央集权主义者憎恶的目标，是地方社会中的“封建”方言，后者抵制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就（一般）历史而言，民族语言改良运动倾向于朝民族边界的两方面敌人发动进攻：既针对地方土语，也针对外来（语言）的影响。^②在中国，（这一运动）几乎完全针对内部的敌人。在这种背景下，文字拉丁化和新式标点都被贴上了外来的标签而遭到批判。但真正重要的，还是外向借鉴在实现民族统一问题上所能起到的作用，即：是加速还是阻碍标准化的民族文字的发展。甚至是外国标点，也因为有助于标准化而得到了容许。着重从内部而非外部纯净和保护民族语言，致使国民党的宣传出现了许多混乱。孙中山反对在中文文献中使用西式标点，但在

① 孙中山 [31]: 89.

② Fishman 1972: 66—72.

1919年，国民党的刊物与其他一些出版物一道，率先采用了新式标点系统。1924年，正当其党内权威达到顶峰之时，孙中山却无法说服党员们接受国民党宣传部长递交的一份备忘录，后者旨在禁止国民党的出版物使用问号及其他从外国引进的标点符号。^①这是一个无效的姿态。国民党宣传家们基本以消除地方痕迹，而非去除外来影响作为语言改革的目标。总体而言，民族革命者们更加关注（如何）去征服“封建的”特殊主义的顽固抵抗，而不是民族语言方面所受到的帝国主义影响。

158 传统文字告诉主张中央集权的国民党人，一套标准化的书写系统有利于维持国家团结，他们于是不打算放弃其中任何一端。他们强调基于一致化的统一，这凸显了一条路线，即他们打算引导尚未觉醒的主体，使之成为觉醒过来的公民。这条路线，旧帝国的表意的书面语言已经指示出来了。传统文字以歌谣地图（songlines）* 模式遍及整个帝国，其影响与帝国的领土范围同在，并在广大帝国官僚之间产生一种共同感。^②民国时期，帝国官僚被公民们取代，旧的宫廷语言让位于一种新的民族语言，后者更适合于一个民主政治结构。也就是说，它更加紧密地顺应了日常说讲。但这种契合并不精

① 1918年，西式标点首次出现于《新青年》第4卷，次年为国民党人的刊物《新建设》（*Reconstruction*）和《星期评论》（*Weekly Commentary*）所采用。吕芳上1989：63。戴季陶声称，自己推行标点运动，是出于孙中山的建议，它当然得到了孙中山生前的认可。《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年5月11日：5。1929年戴季陶被任命为考试院长，终于使其标点系统得到实施。陈天锡1971：100—101。

* songlines 意为不同地方的人们唱着各自的歌谣，其中包含着地理方位和路线的信息，这些歌谣汇集起来，便构成了一幅整体的全国地图。此点承费约翰教授指出。——译者注

② Benedict Anderson 提出，只有通过一种共同的语言（国语），官员才知道有国家。B. Anderson 1991：105。

确：尽管白话以北京方言为基础，但与它最接近的口语并不是北方方言，而是满族宫廷的“官话”。它最初使用于政府机关时，被合适地命名为“官话”，只是为了纠正一种错觉，即这种语言只为官方交流专用，它才被改名为“国语”或者“白话”。尽管如此，坚持使用“官话”这一名称的人认为，在民主制之下，“官”和“公”这两个术语是相通的，因而“官话”便等于民国的“公话”。^①通过坚持使用各种地方方言，人们仍然可以作为各个社会共同体的成员而说讲或书写，一旦获得了用中央当局的代码熟练说讲和阅读的能力，他们就具有了成为公民的基本资格。

在广东，省级军阀们试图建立一种独特的省级认同，以与他们的联邦主义抱负一致，由此，民族政治改革与民族语言改革的同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然而，从自己语言的差异性观点来看，很少有广东本地人赞成将某种地方方言提升为国语，或者至少提升到能与基于北京官话的国语相竞争的程度。讲广州方言的人看不起那些操四邑乡村方言的同省人，但在汕头，讲潮梅方言的人则奋起保卫自己的语言，阻止广州方言的入侵。而作为广东省最有声望的两名地方军阀，陈炯明和陈济棠都出身于省会之外，他们试图塑造一种独特的省级认同，但除了发展基本市政设施，他们基本不倾向于将广州提升为更突出的区域。^②无论如何，有关省内的族群冲突的记录表明，“广东主义”事实上难以成为一种族群认同的形式。^③广东人首

159

① De Francis 1950: 225, 231. 在一种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官”一词，使它包括了国家和公共领域，这反映了关于清末民初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讨论中的一种共同倾向。见 Rowe 1990: 316—317; Rowe 1993: 139—157。

② Fitzgerald 1990a.

③ Kuhn 1970; Lamley 1977: 1—39. 《清史问题》推出了一期关于近代中国早期种族问题的专辑: *Late Imperial China II*, I (June 1990)。

先是中国人。因此，1920年12月，广东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向其教师请愿，要求在课堂上使用新的标准国语，并援引陈炯明的开明教育政策来支持自己的主张。^①甚至在联邦制之下，地方方言的保存，也不需要以拒绝国语为代价。

相反，建立一种独特的省级认同的主张，是以如下历史观点的形式出现的：广东方言根本不是地方方言，因为其中保存的发音，更接近于帝国强盛顶峰时中原地区的口语。广东人“来自于中原地区”，一位地方情感很深的人士1933年这样宣称，作为南宋王朝的军士和官僚的直系后裔，他们的语言“基于正确的中原发音之上。不能将其与方言相提并论”。^②正是生于广东之外的人，才讲地方语言。代表某种特定的广东方言而针对本省其他方言的声称，同样回避了“地方”一词，因为后者具有“封建”一词所附带的贬义。即使是广东地方方言的鼓吹者，也倾向于去争取一种全国性的优势。“上古时代，不存在‘方言’之类的说法。”董子光在其潮梅方言一书的导论中这样说。他坚持认为，广东语言不应该被视为地方语言，潮梅方言尤其不具有地方性：“中原古音主要保存在潮州，保存在广东。”^③这种关于广东语言产生的历史时代的辩称，与该省政治自治的主张并不相称。省自治的要求基于如下一种中华民族观念之上：它鼓励地方社会和各省去角逐“全国性”的优势，而不是像其批评者宣称的那样，转而去争取一种全国性认同。

① 《华字日报》1920年2月2日；L. Chen 1988：8. J6。

② 孔仲南 1933：1。

③ 董子光此处是在追随一位前辈学者杨紫云的观点。董子光 1943：1。

“封建主义”与中央集权国家的理想

革命对民族语言形成的最终贡献，在于它对“封建”一词本身的再发现和再利用。长久以来，“封建”一词一直被视为关于帝国治理策略的辩论中反对中央集权思想的产物。1920年代，它被重新使用，获得了倒退、家长制、迷信等现在的含义。^①在其再发现和再利用之间，尤其是被用来指责那些支持联邦主义体制下省自治和地方政府自治的人的时候，该词部分保留了非中央集权式行政体系（与中央集权行政体系相对立）的早期意思。就像军阀和联邦主义一样，在这种遗传性的意思上，地方语言是封建的，因为它们对一个新的理想形成了威胁，即在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主导）之下实现民族的重新统一。地方语言和风俗习惯、省级军阀，以及政治上的联邦主义，相对于中央集权主义者来说，都显得不可救药地落后，因为它们都是不可救药的地方的。 160

在五四运动中，封建的“不统一”首次被与落后联系在一起，当时“封建”一词被用来谴责包办婚姻、寡妇自杀，以及进步主义思想家们所反对的其他行为，而关于封建政体的讨论，则被包容于种种政治论辩当中，后者的主题是现代国家所面对的责任，即纠正这些行为。^②陈独秀和瞿秋白自由地使用“封建主义”一词来谴责封建家长制，在追溯这些“封建的”社会行为的历史根源时，他们触及了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基本结构。^③随后，在国民革命的修辞中，

① 见 Min 1989。

② Foster 1928: 80.

③ 陈独秀，1923f: 162；瞿秋白，1923: 170—171。亦见 Luk 1990: 148。

“封建”的两层初始含义被合并到一起，当时该词被纳入了历史决定论者的观点，即封建体系是历史进程中通向现代性的一个早期阶段。陈独秀并没有暗示说，早期的封建模式提倡者们曾经是富于想像力的学者和勇于打破偶像的革新者，他们发现了帝国体制运行中的弊端。^①实际上，在国民革命中，封建主义这一敌人比联邦主义者更忠诚于伟大的传统，后者却被视为帝国统治的残余而遭到谴责。这种不无讽刺意味的事在革命中消失了。从此以后，没有任何诉求民族主义理想的运动，能够一边期望一种非中央集权式的政治组织模式，一边不无自相矛盾地声称是现代的。

类似的主张和反对联邦主义的观点，其基础都是对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历史的独特解读，以及对作用于民族内部的更大的历史力量的不同理解。共产党内部，尤其是其创始人李大钊和陈独秀在1923年之间的争论，显示了这些不同视角的分量。1923年1月，李大钊为联邦主义作了进攻性的历史辩护。他反驳说，那些认为联邦主义将会“分裂国家”的人，“都是只见半面，未见全体”。相反，联邦主义将把国家团结起来。李大钊敏锐地意识到，社会和族群差异不只存在于普遍的世界层次，而且也存在于中国内部。他也是一名进步的人道主义者。他认为，进步正将不同的人们和各个国家推向世界大同的方向——“就是人类共同精神联贯的脉络”——而联邦主义则是将不同社会聚合起来的理想制度，因为它特别适合于解决

161 “个性”和“共性”这一转向世界大同过程中的矛盾：

一方面是个性解放，一方面是大同团结。……地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单位，都和个人一样，有他们的个性，联邦主义能够保持他们的个性自由，不受他方的侵犯。各个地

① Min 1989.

方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单位间，又和各个个人间一样，有他们的共性；联邦主义又能够完成他们的共性，结成平等的组织，确合职分的原则，达他们互助的目的。这个性的自由与共性的互助中间的界限，都以适应他们生活的必要为标准。^①

就中国来说，李大钊断言，北京和广州的两个相互竞争的全国性政府，以及各省与中央之间的政治分裂，可以通过采用一套联邦主义的政府模式来获得最好的解决。

另一方面，陈独秀对民族统一的历史基础作出了另一种解读，他否认存在着种种分裂国家的明显差异。他大致确认了一些不同的危及民族的历史力量。陈独秀批判性地区分了所有可能分裂国家的文化、社会和经济个性，并且认为，就算根本不存在军阀，联邦主义在中国也没有多少生存空间。他断言，联邦主义最适合那些在经济、语言、宗教和文化方面有着地区差异的国家。中国却不是这样。中国是一个单一的中华民族国家，生存于统一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下。因为中国的经济服从于普遍的历史规律，中华民族上百万的工业无产阶级将提供历史动力，把四万万同胞团结为一体。他在1922年9月宣称：“中国本部人民的经济状况，都在由农业及手工业渐进到工厂工业时代，南北大致不甚相远。”^②

陈独秀关于新兴社会阶级为民族统一提供了新力量的观点，在其上海党总部的宣传助手蔡和森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蔡和森认为，南北政府的政治分裂，基本上是阶级斗争的政治表现。因而“阶级战争”最终将提供一种统一的力量，它足以征服种种地区差异：

① 李大钊 [1923] 1978：416—417。

② 陈独秀 1922：2。

十年以来的内乱与战争，既不是“南”“北”地域之争，又不是“护法”与“非法”之争，更不是“统一”与“分离”之争，乃是封建的旧支配阶级与新兴的革命阶级之争。^①

尽管陈独秀和蔡和森都难以否认，中国人民之间在风俗习惯、语言和宗教信仰方面存在着显著差异，但他们都强调全国性社会阶级的出现，而不太重视这些差异的意义。陈独秀认为，种种其他差异并未使联省自治的提倡者们感到多少不安：

本部语言发音虽微有不同，而文字及语言构造则完全相同，宗教虽有佛、道、耶、回之分，而无分部聚居之事。^②

最好将这些论点当做“伪装”或者蓄意的宣言，而不是“冷冰冰的事实”来看待。陈独秀自信地声称，宗教信仰和地理之间没有多少对应关系，因为在其党内读者之间，西藏、新疆和蒙古根本不在讨论之列。但它们却在联邦主义梦想家们的考虑之中。陈独秀和蔡和森在描绘中华民族的特征时想要推翻的那些观点，联邦体制的支持者们并不想援引之为自己的省自治方案的基础。即使是独特的地方语言和风俗习惯，在联邦主义者的论点中也不占重要地位，他们并不把自己的方案视为对统一的中华民族这一理想的替代，而是视之为对民族统一的另一种解读。联省自治本身并不被视为终极目的，而仅仅是“全中国独立”^③的前奏。尽管如此，对于联邦体制下民族（可能）瓦解的担忧，在国民革命中催生了阶级斗争这一新的基本原理：阶级斗争将统一国家，否则，分裂的危险也许将更加严重。阶

① 蔡和森 1922d: 14。

② 陈独秀 1922: 2。

③ 欧蕤甲在清末提出了最激进的省自治主张，但他不愿为广东式民族主义提供例证。他提出了资源自治、自理和广东“独立”的理想，主张“广东人真正成为广东的主人”，并认为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将从相对独立的各省的更大竞争中获益。Duara 1990: 4。

级斗争被视为一项中央集权国家模式基础上的民族建构事业。

广东和湖南的自治运动的目标，最初既不在于统一的民族，也不是一个干涉主义的中央政府。在广东，联邦主义者的“粤人治粤”口号，指向的是官僚、军官和士兵，他们来自广西邻省的陆荣廷将军的占领势力；而在湖南，赵恒惕发动的省自治运动，却以与自己竞争的军阀作为主要敌人。^①各省的地方爱国主义者在其偶尔的表述中，也会采取倾向于本地军阀而反对外来军阀的形式。^②与在乡的军阀合作有时会遭受一些惩罚，这在别的时空环境下，也可能被处以通敌罪名。1920年10月重新控制广东之后，陈炯明没收了一些地方人士的财产，他们在前5年曾帮助过陆荣廷和桂系军阀统治广东省。^③但即使在这里，在最赤裸裸的形式下，省级忠诚的主张仍然被视为与其他地方，而不是与中国本身相连。^④赵恒惕和陈炯明的愤怒主要不是针对本省人，而是针对那些胆敢控制某省的外省人（及其本地合作者）。

163

然而从长远来看，与来自邻近省份的军阀相比，赞成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人，对省自治构成了更有竞争力的对手。国民运动根据中央政府的扩张及其（向）地方社会的渗透来构想民族统一。孙中山经常引用一句（来自于殖民地移居者的）俗语，说中国人像“一片散沙”。他这样说的意思是，自己的同胞们缺乏超越于家族层次之上的社会凝聚力，并且缺乏一种借以开展中央集权化的民族运动的政治组织能力。孙中山提出对国家行为进行前所未有的重新定

① 同242页注③，7—9。

② 一平1924：7；刘仁静1924：3—5。

③ Liu Zhih-po 1921；L. Chen 1988：8. J203.

④ L. Chen 1991：21—37.

位，使之针对每一粒沙子，向它们灌输一种他认为旧的帝制国家和当前社会都缺乏的水泥。

国家的扩张，将以地方自治、风俗多样性和新式政治自由（的丧失）为代价。孙中山声称，欧洲人为自由而斗争是对的，因为他们从前“受专制的痛苦太深”。但中国人“向从来没有受过这种痛苦”，因而缺乏动力去从国家那里争取自由。事实上，中国人受了自由太多的苦：“中国人既是一片散沙，本是很有充分自由的。”人们需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纪律：“如果成一片散沙，是不好的事，我们趁早就要搀加水和土敏土，要那些散沙和土敏土彼此结合来成石头，变成很坚固的团体。”国民革命将以统一而非自由为奋斗目标：“要用革命的方法，把国家铸成一个大坚固团体。”^①孙中山将地方自治的联邦主义理想置于一边，代之以统一的中央集权行政模式。结果，陈炯明的敌人不是他那来自广西的对手——陆荣廷，而是自己在国民运动中的老战友——孙中山。

孙中山就民族（问题而设想的）沙岩模式，显然意在取代联省自治运动的集合模式，在后者那里，每个实体的省级单元都实行地方“自治”，并集合成一个联邦。^②这种1920年代提出的联省自治模式，一方面与此前的同盟性“国家联合”有所区别，另一方面，
164 也不同于国民运动内部流传的另一种联盟和自治理念。^③孙中山及其党派偶尔使用“联盟主义”和“自治”来描绘自己的（话语）平

① 孙中山 [31]：202—204，214。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所表现出的虚弱，不应被误解为其抱负上的微弱。见 Eastman 1974：43；Amsden 1985：85—86。

② 陈定炎，1990。

③ 这种自治基础上的联合模式，被称之为“联省自治”，“统一国家”联合体被称之为“联邦”。Duara 1990：5—8。Duara 指出，章炳麟在1920年8月首先发明了“联省自治”这个术语。

台，但在这种情况下，其意图在于回避作为重要的政治单元的省，并将自治限定于地方的党组织。曾经有一个阶段，孙中山亲自提出了他称之为“联邦”的模式：将各个县的联盟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连为一体，由此几乎把省排除于国家的政治地理之外。^①另一方面，陈炯明则设想一个省自治基础上的全国性联邦。

国民党人用“自治”这个术语来指地方的党治。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宣布承认地方自治，进而号召用隶属于国民党的更加顺从的农会 and 自卫军，来取代地方公共团体和保安团。甚至担负着实施“地方自治”职责的县长，也由国民党政府从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忠于国民党、熟悉三民主义的候选人中直接任命，也就是说，他们可能已具备某种适当形式的“自觉”。^②

陈炯明和国民党人对待联邦和自治截然相反的态度，显示了国民革命当中两个最具有争议性的问题：省在政体中的位置和士绅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1920年代围绕省的政治地位的分歧，部分源于旧的帝国行政系统中遗留下来的紧张，部分源于晚清的新政运动。在早期的新政运动中，自治的政治单元既不是民族，也不是某个特定的社会单位，而是一个与县、州、府、省相对应的地理单元。这些单元标志着帝国行政系统的内部边界，并曾经受到过帝国官僚们的密切监督，他们坚决阻止地方行政与地方利益“联姻”。“封建”自治的支持者沿袭了同样的单元，他们把地方行政单元视为抵制绝对君主的专断权威的壁垒。在关于治国策略的各派论争之中，地方自主的理念被提了出来，作为帝国体制而非自治的替代方案。“封建主义”的支持者们尤其为自主辩护，说它是一种新颖的行政方案，

① 李达嘉 1986: 145, Duara 1990: 11.

② Tochigi 1978: 95—116.

在帝国网络内上传下达信息和指令方面，能够比中央集权行政体系更有效率，更有效果。^① 结果，在封建体制内部打转转的政治理论家当中，看来几乎无人考虑过这一问题，即无论地方精英是经由征用、委派、强迫，还是经由选举途径进入帝国体系，只要他们是地方的，并且工作起来有成效即可。

然而，地方层次的行政改革，一度发展为地方精英自身内部的一场更广泛的运动，后者的目标是更基础性的民主改革。正如研究封建制度的学者闵斗基（Min Tu-ki）所观察到的：“让本地人处理本省事务的初始建议，逐渐发展为地方自治、以地方议会为中心、以绅士阶层为核心的主张。”^② 长期以来，绅士一直处理着地方事务，但他们在（维护）社会保障和帝国稳定方面的贡献，既未在法律上得到形式化（的确认），也未得到制度性的承认。晚清时期，地方自治的前景为绅士们提供了国家机器中的正式位置，以及褒扬和回报他们的标准，其中一些成员感到应该如此，到了 19 世纪末，他们开始越来越大胆地要求这种褒扬和回报。

清王朝的最后 10 年，省成为绅士的重要活动舞台。省级绅士是两个互相区别，但又相关的过程的受益者，一个是政治下移，另一个是政治进化。清末新政将权力从中央转移到各省，同时帮助（各省）将权力从地方向省里集中。辛亥革命爆发，省级枢纽得到强化，当时新成立的省级机构越来越热心于从中央获得自治，却拒绝向地方权力结构让步。地方公共团体也经历了类似的发展。尽管省级政治机构和公共团体都在培育一种将省当做社会的忠诚感——在

① 因此，比如康有为 1884 年的上清帝书，就以“地方行政改革”为题进呈朝廷，这份上书期望呼吁进行地方议会选举。

② Min 1989, 126.

一个高于村庄和宗族的抽象层次上——它们仍然维系着对整个国家的高度忠诚。会馆、同乡会、工匠、学生等方面的地方团体，也与鲜明的省级组织一样，可能有助于提升全国性社会的意识。利用在京官员的地方性网络，1890年代，第一个省级学生团体在帝国的首都成立，随后10年出现了许多省级团体，一般而言，它们都倾向于维护各自的领域。^① 在约翰·芬克（John Fincher）看来，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省域化与民族主义并不对立，而是民族主义发展的过渡。^②

国民革命当中，联邦主义者和中央集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代表着几种相互竞争的努力，它们都想促进从地区性制度到全国性制度的转变。在过渡时期，环境发生了变化。军阀与民族革命者一样真诚地追求民族统一，但这一时期县、省和国家政治制度整合的缓慢步伐，形成了对许多国民党人的耐心的考验。军阀政治加重了如下观点的分量，即对于发展统一的全国性政体而言，省已经更多地成为障碍而非帮助因素。联邦主义者认为省级自治是迈向国家独立的第一步，对此，国民党人回答说，民族统一是省级自治的先决条件。这就是它们在国民革命开始时的立场：“自由之中国以内，”1924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这样宣告，“始能有自由之省。”^③

166

1920年代，作为民主旋涡的一个中心，省获得了额外的权威，因为只有省级政府才能养得起军队，来抵制（就像国民党人曾经设

① 康有为 1967：79—80，85。

② Fincher 1968：201—202，220，224。其他人反对向民族主义“过渡”这一线性概念，赞同省级和全国性忠诚的柔性（和固定性）。我并不认为 Fincher 使用“过渡”一词意味着或暗示着一套忠诚对另一套忠诚的取代。各种忠诚之间存在着等级关系，就此而言，它也许可以恰当地描述为一种等级关系，后者存在于城市空间之中，或者说尤其存在于20世纪初的中国精英分子当中，他们分别处于辽阔国土的不同位置。见 Schoppa 1982，Rankin 1986。

③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 1930；李剑农 1956：452。

想过的那种)一个中央政府的侵蚀。军阀部队为联邦主义者的省级自治观点提供了最有力的支持,也为国民革命降低省在等级体系中的政治地位提供了最恰当的理由。在这里,除了省级沙文主义和国家的自我扩张之外,还有更多危险的东西。陈炯明的军队在广东周围形成了一道强大的防线,对将更小的地方单元合并成一个中央集权式的行政体系,形成了一道障碍。陈炯明希望通过保卫自己的省份、反对集权式中央政权的侵蚀,来捍卫地方自治原则,同时,通过进行当时在全国最为成功的地方选举,来证明自己对地方自治的承诺。

作为地方精英对自治的兴趣的后果,国民党人和陈炯明之间的冲突,迅速发展为扩张中的中央集权国家与地方精英之间相互抵制的冲突。国民革命制造了强大的社会敌人。实际上,“阶级斗争”的根源之一,在于中央集权化的国家与地方的抵制之间的这种冲突。在国民党这边,党内正式文件中对敌人的定义,显示了革命话语的微妙转变,这反映了针对顽固的社会精英的政治斗争的激烈化。例如,1924、1926年的国民党一大、二大闭幕之际发布的宣言,都使用了“阶级”一词来识别敌人,但其含义明显不同。第一份宣言将敌人界定为军阀和帝国主义者,冠之以“危害农、工的特殊阶级”。第二份宣言将“阶级”从军阀和帝国主义分子扩大到“官僚”、“土豪”和“买办阶级”。^①这种对于敌人的社会特征的阐述,并非来自共产主义对运动的渗透(当然发生了这种渗透),而主要来自政治斗争的激烈化,后者是国民党政权扩张的结果。城市买办尽管在国民

167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986, 1: 88, 443。此处我引用了原始中文档案,因为李剑农书中的翻译未对此作出足够鲜明的区分。见李剑农 1956: 450—458。实际上,存在着好几种不同的一大宣言文本。见 Hazama 1992。

运动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被界定为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因为他们领导城市公共团体来抵制国民党政权的要求。乡村士绅尽管在推进民主“自治”方面发挥了先锋作用，但也被视为封建的，因为在国民党政权那里，封建主义与地方自治的要求是相等的。^①

国民党的出版物一度放弃了“自治”一词，而代之以“地方行政”。到1920年代初，联邦主义者正在以大众主权的修辞来构筑自己的观点，中央集权主义者则诉诸统一的国家管理的语言。^②但这两个术语并不相互排斥。国民革命中，国民党继续使用“自治”术语，来指称地方党的委任者和隶属于党的群众团体。然而在1926年，当广东省政府公布计划，准备开办广东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时，国民党政府最终废弃了“自治”术语，取代它的是“地方行政”。自治人员养成所随之解散，理由是这两所学校“在实质上一样”。^③然而，这所学校校名的选择并非小事一桩。地方行政与自治“在实质上一样”，只有在二者间的紧张——从晚清开始，它就是这场民主运动的特征——得到克服之后才能实现。也就是说，当地方精英的功能被简化为管理民族国家，而不是参与政府的时候，地方自治便最终让位于地方行政。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以政治革命开始，针对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却以社会革命而告终，其矛头对准的是地方自治运动的社会基础。

① 相应地，“自发的”农民躁动，也被导向反对革命根据地外面的政权机构和官僚。Bianco 1986。亦见 McDonald 1978。关于广东农民运动的国家导向，见 Fitzgerald 1990b。

② Duara 1990: 7.

③ 这两个组织是广东地方行政人员讲习所和自治人员养成所。《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1987，1：77，135，139—140。自治会可能是政治会议在1924年9月9日成立的自治筹备会的产物。罗家伦、黄季陆 1969，2：1131—1132。

从政治革命到社会革命

对于许多革命者来说，这一发展模式似乎令人惊异，至少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是如此，他们为规划一场有限的政治革命付出了大量努力。“国民革命”这一术语是由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Henk Sneevliet）发明的，中国共产党为了表示与国民党合作的姿态，1922年9月采用了这一术语，比国民党人自己使用该术语要早得多。^① 共产党人也最早界定了革命的目标：首先，“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其次，“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② 然而，尽管如此机敏和主动，共产党人还无法制造一套革命话语。敌人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出乎共产党和国民党人的预料之外。革命在其自身的政治动力推动下而展开，以遭遇革命者的敌人而非民族的敌人而结束。

第一个偶然的敌人是在革命自身的序列内发现的，这为在更大的民族范围内辨别盟友和敌人提供了先例。大体而言，识别敌人的标准随着党内斗争的发展而改变。1924年4月，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通过一条简单的方法，即鉴定党员对于军阀和帝国主义的态度，对国民党内的激进和保守派作了区分。他们的阶级根源，或者至少是他们对于不同社会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这一问题的态度，被说成是无关紧要的。^③ 尽管如此，陈独秀关于激进和保守的有限定义还

① Luk 1990: 71. 革命结束之际，共产党人放弃使用“国民革命”一词，转而使用“大革命”，切断了前者所暗示的国民革命与国民党的关系。首次使用该词撰写这段历史的，是华岗[1931] 1982。只是在近些年，大陆的历史学家们才重新使用“国民革命”一词。见李新 1991。感谢徐有威教授让我了解了这一历史编撰学的最新发展。

②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 41。

③ 陈独秀 1924b: 3—4。

是让人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在“全民的”民族革命边界之内，仍然有大量国民党人拒绝不加区别地声讨军阀（担心这样会疏远本党的军阀盟友），还有很多人担心，反帝言论的火药味，将使本党难以在外国在华租界和主要列强的海外殖民地开展党务工作。^①一些国民党人对于允许共产党人加入本党感到不安；还有人因为本党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感到困惑；在共产党内部，围绕着与国民党人的合作细节，以及共产国际及其在华顾问的高压态度，也爆发了一些争论。在莫斯科的苏俄领导层内部，以及那些声称对此事务有合法兴趣的主要机构，包括共产国际、（苏联）人民外交委员会（Narkimondel）和国际红色劳工联盟（Profintern）之间，联盟的原理和实践也是产生论争的根源之一。^②这种疑虑和分歧，通过一个关于国民革命目标的共识得到了初步调解：“消除内乱”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或者简单地说，“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只有当这些目标变得模糊之时，运动内部的冲突，才会被说成是根植于更大的社会内部的社会冲突——或者说根植于“阶级斗争”。

选择帝国主义和军阀作为革命的一般对象，就是这一点也来之不易。最初，两党都专注于国内政治的重新统一，同时反省自己对地方权威中的自治力量的同情。迟至1922年1月，共产党还将国内敌人限定于军阀这样的“封建统治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几乎未加留意。事实上，共产党的内部文件几乎忽视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存在，直至受到共产国际的催促，才举起了针对国际资本的利剑。紧跟着，来自莫

169

① 《广东支部弹劾共产党文》1923：917；黄季陆1964a：16，1964b。

② Leong 1976.

国主义与军阀相提并论，将其视为中国民族革命的两个独立的、等量的对象。^①在国民党人看来，从1913年袁世凯的任期开始到1922年陈炯明的叛变，合法组成的政党的权威都被颠覆，军阀们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因此，国民党的战略中纳入共产党人的口号“打倒军阀”，这并不存在多少困难。但在1923年，国民党领袖还不愿意承认共产党人的主张，即军阀维持着一套统治体系，帮助帝国主义者向中国渗透。

反帝目标征服了国民党内部的一致反对，进入了国民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人有着严重的分歧。一些著名成员，包括理论家戴季陶在内，充满激情地论述了帝国主义的险恶，鼓动公众起来抗议外国对中国的干涉。^②然而，海外党员却对这一政策的含意非常敏感，因为他们置身于反帝运动所针对的殖民地和大都市中心，害怕自己会成为帝国主义者反击的对象，甚至成为印度支那和东南亚本地人的反华大屠杀的受害者。在那些地方，共产国际的代表们正在鼓动当地人以同样的热情来反对外来帝国主义。^③修订国民党党章时，海外各党部反对加入关于反帝的那一条款；广东支部认为，如果加入这一条，“我党永无获得国际上同情之一日，使我华侨党人在海外无复立足之余地”。^④在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的讨论中，胡汉民提出一项修正决议，即国民党将宣布自己的反帝目标，但不会提出具体的要求和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措施。^⑤尽管海外华侨发出了呼吁，但孙中山不愿让步。孙中山不

① Luk 1990: 71—72.

② Mast 1970, Mast and Saywell 1974, Sansom 1988.

③ Ungar 1989: 94—106.

④ 《广东支部弹劾共产党文》1923: 916—919。这次弹劾，导致了一次有53个海外支部代表出席的会议。

⑤ 黄季陆 1964a: 10—14, 1964b.

仅将各个殖民国家当做中华民族的敌人加以攻击，而且开始怀疑海外党员自身的爱国主义，这时，海外党员的忠诚发生了动摇。^①他们不愿重新登记为改组后的国民党成员，并拒绝为国民党提供财政支持，以此回应孙中山对自己的蔑视。^②

指望孙中山会迫于压力而改变立场，这是毫无根据的。他从未像他的一些同志那样，以满腔热情公开抨击帝国主义。事实上，孙中山偏爱为中国民族的发展争取国际援助的政策，近几年花了许多时间与外国友人和权贵通信，希望他们为自己那雄心勃勃的计划提供支持和援助。^③他的语言也不那么具有煽动性。孙中山更喜欢“列强”而非“帝国主义”这一术语，因为前者使人可以去区分友好的和不友好的国家。总体而言，孙中山拒绝那种粗鲁的反帝情绪，而把自己最强烈的谴责留给了国内的敌人，他认为这些人应该为外国对中国事务的干涉负责。^④1923年8月，一个激进的学生联合会提出了“外抗列强，内倒军阀”的口号，他对此提出异议说：“我看

① 孙中山 [5]: 539, [16]: 624。

② 从1920年到1923年初，国民党成员从10万人左右增长到23.8万人。大部分新党员来自海外。1924年，国民党在海外吸收了不到5000名新党员，北美原有的15000名党员当中，6000人未在旧金山的总部履行重新登记手续。海外华人社会向国民党的汇款亦在同一时期下降：美国各支部在1922年下半年汇回80万美元，但1924和1925年仅仅汇回数百美元。见《中国国民党周刊》第9期（1924年2月24日）：6，第12期（1924年3月16日）：7，第23期（1924年6月1日）：7。《政治周报》第6—7期（1926年4月10日）：81。

③ 就此主题，孙中山用英文撰写了一部重要作品——《中国的国际发展》（*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他在该书中向全世界表达了自己获得国际支持的愿望。孙中山 [20]: 127—360, [21]: 419—666。Schiffirin 1980: 199—201 提到了该书遭受的冷遇。

④ 1924年，共产党人的修正主义史学对义和团运动表示赞赏，这重新激发了孙中山长久以来对“反帝”的反对意见。《中国国民党周刊》32（1924年8月3日）：7，蔡和森1924c。亦见 Mast 1970: 235—242。

这两种问题，不可相提并论。……内政要是好，外交简直不成问题。”^①根据孙中山的意见，军阀和列强仅仅在如下意义上相关，即军阀不能胜任处理复杂的对外关系这一艰难任务。良好的政府意味着良性的国际关系。

使海外华侨激进分子感到懊恼的是，孙中山突然在1923年秋天改变了自己的主意。其实这个问题已在考虑之中了，他一面继续寻求英国、德国和美国的帮助，一面开始与苏俄对话。当英国、德国、美国都拒绝他的请求时，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转向俄国人。^②但最终使他相信有必要“打倒帝国主义”的，还是海关关税事件。事件始于1923年9月5日孙中山致北京外交团的一份正式照会，他要求分享外国人控制下的中国海关征集的税收。孙中山的意图是取消北京政府在关税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并将之解交他在广州的政府。列强声称关税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而征收的，据此看来，孙中山的要求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外交部远东处第三任书记官卡尔（E. H. Carr）就承认：“外国人控制下征收的所有关税都要交给毫无代表性、毫无价值的北京政府，这真令人难以忍受。”卡尔记录说：“广州的要求有一定的正当依据。”^③但英国政府没有被说服，他们拒绝答应孙中山的要求。孙中山于是发出一份通牒，宣布“如果必要的话”，自己将以武力夺取广州海关。作为回应，外交团在广州港搞了一次令人难忘的海军力量示威，成功地防止了眼前的

① 孙中山 [44]：526。

② Wilbur 1976：133—148，F. Chan 1979。

③ Stremski 1979：17。1921年，在关于召集华盛顿会议的谈判中，《纽约时报》站在孙中山的立场上发布了类似的主张，宣称孙中山的政府比北京政府更具有合法性。Schiffman 1980：217。

危险，但其代价则是激起更为严重的危机。^①斗争失败了，孙中山退而准备一场针对“帝国主义”的持久战，并转向苏俄顾问，寻求道义上的支持。苏俄驻广州代表团的首领鲍罗廷，起草了一份将国民党与“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连在一起的政治方案，在孙中山的赞同下，这一目标随后进入了1924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一大的宣言当中。^②

一端是以军阀为基础的地方分权主义，另一端是作为社会形态的封建主义；在建立二者之间的联系方面，莫斯科的共产党人也起了作用。我们注意到，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封建主义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军阀统治的地域性政治方面。^③封建主义也是一种广泛的社会形态这一理念，是从列宁和共产国际那里借鉴过来的——最初的借鉴形式，是列宁论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文章，后来则是共产国际总部在1922—1927年间发布的一系列宣言和战略计划。这种封建社会秩序的具体构成如何，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长期以来，有关中国革命的研究承认，那些将在民族解放同盟中走到一起的社会力量的特征和关系，是这场争论的一个方面。对于许多当时的人而言，与寻找革命的朋友相比，确保一个人不被贴上革命的敌人或者革命对象的标签，却是一个更重大的问题。如果考虑到列宁的见解的灵活性，这项任务便不那么简单。

在共产国际的考虑中，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在本土的社会对象，是“封建势力”的社会秩序。列宁不愿具体指出民族革命的每

① Sremski 1979, 15—16.

② 邹鲁 1929, I, 331—341。关于鲍罗廷的作用，见《广东支部弹劾共产党文》1923, 916—919。

③ 迟至1923年，共产党人“继续将政治权力与区域统治的分割，视为一个封建体系的主要特征”。Luk 1990, 144—149.

一个封建敌人，但他却阐明了一些普遍原则。在1920年那几篇论述殖民地和土地问题的文章中，他从地主，特别是大土地所有者（或称容克）中寻找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①针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被理解为一种针对封建地产所有者的有限斗争，它不应该与从地主压迫下解放农民这一更大的斗争混在一起。列宁指出，只有一小部分大地主是“封建残余”，应该被挑选为打击对象，并没收其财产。在1922年年中的一系列重大伤害之后，他的健康情况变得很糟糕，于是他的文章留给别人去阐释。

共产国际试图把封建主义的社会经济特征与每个民族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在中国，很少有封建地主仍然世代占有自己的领地，农奴和奴隶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异常现象，并且存在着一种土地私有和买卖的良性传统。列宁的封建主义概念用来指称领主、地主和农奴时，已经丧失了它的许多描述能力，并且，在共产国际的辩论及在中国的修订版中，不可剥夺的财产权利被淡化了。为了保持其分析效用，封建社会秩序这一模型被进行了修改，其内容实际上包含了中国这样的国家中的所有前资本主义（和前现代）的地主—农民社会形态和经济体系，以适应民族革命的需要。识别封建势力的标准，于是被简化为对那些反对民族革命本身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简单评判。

172 共产国际非常灵活地承认，单纯的阶级地位，并不足以用来作为区分民族革命中的朋友和敌人的标准。在1922年11月召开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共产国际试图将列宁的一般声明运用于民族解放斗争的社会敌人上去。《关于实施1920年土地论的指示》记载，在

① “Theses on the Colonial Question” 1971: 138—144, “Theses on the Agrarian Question” 1971: 155—161.

民族革命阶段，地主阶级是否应该被当做斗争对象，取决于地主对帝国主义的立场，这为灵活阐释土地封建主义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先例。^①共产国际在此确立了一条最重要的原则：在民族革命当中，人们对民族敌人的政治态度比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更加重要。识别朋友和敌人的另一条标准，是列宁关于大土地所有制的评论。在1922年的“论东方问题”中，共产国际将封建大土地所有者看做民族革命的国内敌人，并确认了列宁关于没收其财产的号召。这一对标准——政治态度和“地产”所有制——被认为在实践中密切相关，因为“外来的帝国主义”把“封建”精英当做“其统治的工具”。^②共产国际明确地将“督军”（或者军阀）看做中国社会本土的封建阶级，并将之等同于德国的容克，由此来评判其社会阶级地位。如此草率地将政治、军事目标归结于阶级地位——中国的军阀——最初是为了适应和穷尽关于中国民族革命的社会敌人的类型。即使这样，军阀之所以被当做敌人，也只是出于他们在生产关系中的位置，并且，主要因为他们镇压过一次共产国际为中国设计的那种民族革命运动。

在中国内部，要等到一段时间之后，那些控制军阀部队的显赫的军官们，才被似是而非地当做更宏观的社会秩序的代表。国民革命展开之前，这样的联系几乎还未建立起来。尽管如此，军阀们从一开始就遭到了攻击，不是因为他们镇压农民，而是因为他们瓜分了国家，成了叛国者。如果说（除了自身利益之外）他们还代表着什么东西的话，那只好说，他们代表着处于外国资本的最高阶段的帝国主义这一外来势力。^③军阀的罪行清单中，充斥着他们作为地主

① “Directiv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1920 Agrarian Theses” [1920] 1971: 394—398.

② “Thes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971: 382—393.

③ Luk 1990: 147.

阶级的“代表”这一角色，对资产阶级的成长的阻碍，以及对自由民主制度的运行的妨碍。这些足以表明，他们看来正在瓜分中华民族这块蛋糕，并且轻易将之拱手让给外国人。

173 因而在1922年6月，也就是在共产国际四大提出东方问题的几个月之前，中国共产党在其“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将民族革命的社会特征界定为“资产阶级向封建地主和封建经济体系的战争”。他们断然放弃了论述封建经济的特征的机会，而是接着限定了革命“资产阶级”的任务，那就是“向封建式的军阀继续战争”。^①实际上，共产党领袖选择了将社会斗争等同于武装斗争，并且明确将军阀当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对军阀的进攻就是对中国封建主义的社会基础的进攻，这预示了共产国际将把军阀提升到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位。随后一年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示》，被中共阐释为应该抓紧进行“针对封建主义残余的农民土地革命”，并继续实行“土地没收”政策，作为剥夺军阀财产的措施。^②中国共产党人与共产国际一样着急，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继续给予亚洲的“军阀和帝国主义”致命的最后一击，以适应自己关于政治革命的社会特征的基本原则。

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民族的敌人这一格言具有足够的弹性，可以随着革命的发展而将更广泛的社会敌人包容进来。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向封建主义进攻，意味着根除一切带有地方、传统和迷信色彩的东西，而反帝的立场则威胁着商业、宗教、教育、公共卫生、新闻、通讯等方面的涉外联系，到1920年代，它们已经（被视为）构成了中国社会众多方面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国民党人在第一次

① Brandt, Schwartz and Fairbank 1952: 54—63.

② D. Li 1978: 198—200, Degras 1971: 2, 25—26.

全国代表大会上宣告，对于那些骑墙于革命者及其敌人——军阀、帝国主义者之间的人，自己将不会给予任何同情。“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①实际上，任何组织和个人，如果不愿响应向“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发动进攻的号召，或者胆敢挑战革命者代表整个民族决定民族的敌友的权利，那他就可能被当做封建势力的附庸或者帝国主义势力的奴仆。在社会群体围绕社会利益而组织的情况下，这些利益也可以用政治标准来衡量。商会、手工业联合会、地方慈善团体、教区和社区群体，如果没有支持革命的话，不仅将丧失其“自由和权利”，而且将败坏它们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的声誉。

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产生了分歧。共产党人准备以阶级斗争的名义，把社会利益作为革命的对象，而国民党人则更愿意通过党内结构来“代表”和规训社会利益。我们已经注意到，孙中山经常感叹中国社会未能围绕民族目标而自我组织起来，从 174 1920 年代开始，他的宣传顾问们开始推进“民众的国民党化”这一理念，将它作为独立的社会组织的替代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党组织自身有着独特的利益。1920 年 2 月，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伦预言，一场革命运动，如果徘徊于一个又一个问题之间，没有严密的组织和明确的目标，它就不能赢得一场政治革命所需要的民众和运动。叶楚伦认为，“群众政治”的主要错误，在于缺乏一种三民主义那样“明确而普遍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需要固定在纪律化的组织部门中，才有可能发挥作用。^② 1922 年 1 月，国民党机关刊物《觉悟》的新年专号中刊登了李汉胄的文章，标题为《中国人为什么

① 李剑农 1956：454。

② 叶楚伦 1920。

缺乏组织能力?》，文中继续了叶楚伦的论题。李汉胄重复了孙中山的口头禅，即中国人是“一片散沙”。^①到1923年，叶楚伦已经（能够）满怀信心地宣称，国民党人终于开始为民族提供其需要的那种民众组织。为了纪念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1920年）3周年，叶楚伦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国民党的民众化与民众的国民党化》，吹嘘国民党在“民众的国民党化”方面取得的成就。他认为，光有教育还不能为新中国的建立提供足够的基础。另一方面，国民党在民众组织方面的创新正在产生结果，因为他们使政治教育适应于民众组织。国民党正在通过“党化”而非教育来建立一个新中国，也就是通过定向参与大规模的党组织来教导人民。^②

在国民党宣传圈内，叶楚伦对民众组织的同情获得了广泛的支持。1923年1月，在分析知识分子未能“唤起”民众的原因时，宣传干部邵元冲感到不应责备学生及其党内支持者，在他看来，他们的筹划和论证都不应当受到指责。未能唤起民众的原因，被归结为人民自身的不足，他们保守、懒惰、目光短浅、优柔寡断、不可靠、不能区分对错。邵元冲的结论是，国民党在“筹划大多数民众的幸福”时，应该将人们聚合成民众组织，由此弥补“民众心理”的明显缺陷。国民革命开始之际，国民党的设计师们便已经考虑了集体主义战略，即以国民党监督下更加顺从的民众组织，来取代市民社会中的社会组织，以便更好地唤起民众。^③

175 国民党人虽然承认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差别，但与共产党人不

① 李汉胄1922。类似的抱怨针对着学生运动。见“通信”1922。

② 叶楚伦专注于“群众化”和“党化”两点，视之为国民党最近历史上最重大的进展。叶楚伦1923。

③ 《民心日刊》1923年1月23日。党刊《人民真理》在1920年2月至1923年1月期间每日出版。对国民革命中的“集体主义”战略的讨论，见Fewsmith 1985。

同，他们不愿承认社会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可能存在敌对的矛盾。^①孙中山宣称，民族革命是一种爱国主义的事业，因为全体中国人都是爱国者（至少，当他们在国民党人训导下最终觉醒过来时，他们将变成爱国者）。所以，革命在国内的惟一敌人，很可能存在于残留的满清失意军人和官僚当中。^②汉人社会中还找不到哪个阶层与他们密切相关。理想情况下，局部利益将与人们作为公民的利益，或者说民族利益一致，如果它们发生冲突，局部利益将自动让步于民族利益。孙中山及其追随者们主张，中国人民在像自我本位的政党那样行动之前，首先应该学会像“国民”那样行动——“国民”一词被尊奉为该党的名字（国民党）。^③

党的纪律和民众组织（的作用）是化解各种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同时防止局部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紧张以公开对抗的形式爆发出来。也就是说，民众组织和民众动员（的作用）在于消解而非催生社会冲突。拥有特定社会利益的各个群体，将在“群力”的形式下表现出对革命的一致支持。^④孙中山认真地说，自己从俄国十月革命中获得了这一教训。他从俄国革命中发现的，不是关于阶级斗争的革命潜力，而是纪律化的“群力”所潜伏着的凝聚力。他认为，只有民族的敌人才会对民众感到害怕，并且，因为民族是中华民族集合，所以社会任何部分都不必害怕国民革命。孙中山完全

① 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公民权，即信奉一种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相互和谐的理想，与那些并不认同于国家利益的个体利益或集团利益的政治动员概念很难相容。Nathan 1985.

② 孙中山 [23]: 638—639.

③ 国民党首席理论家戴季陶相信，对革命的部分抵制出现，对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形成了挑战，并且他敦促各个社会阶级“脱下阶级特征，穿上民族特征”。戴季陶 1925b: 37.

④ 孙中山 [5]: 537—543, [17]: 598, [44]: 524—531, [46]: 558—567.

希望整个国家能够像一个人那样奋起，并给予国民党人以力量。^①人们将被分开并组合为工人、农民、商人、妇女、青年等不同的社会类别，并且学会协调相互之间的差异，使自己的局部利益服从于革命政府的利益，后者宣称自己高于“特殊”的利益。^②国民党组织的社会运动，其原则是在运作中不要追求局部利益。^③

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之间的差异仍然容易被夸大。针对一个可能导致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的问题，孙中山求助于列宁、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提出了自己的意识形态和战术方案。中国的激进分子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即在估量中国的民族革命时，对社会冲突的潜在可能性不予重视。1920年，李大钊提出一种理论，称中国是资本帝国主义支配的世界中的一个“无产阶级民族”。李氏观点的推论是，中国人民——除了一些军阀及其官僚，以及帝国主义的代理人买办——都支持民族革命。1922年8月，共产国际代表史涅夫连特向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共产国际的立场，即中国革命仍属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李大钊因其关于革命的全民本质的思考，立即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当中最支持共产国际路线的人之一。^④看来在一开始，关于自己发动的革命可能获得的民众支持程度，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之间并没有多少分歧。

当然，共产党人将民族革命视为一场局部的革命，在其结束之际，他们将发动一场新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他们坚持认为，所有的革命都有阶级性，用这一普遍原理来阐释中国的民族革命，

① 孙中山 [8]: 575, [17]: 598, [31]: 3—27。

② 孙中山 [15]: 719—723, [17]: 602, [26]: 713—718, [48]: 679—685。李剑农 1956: 453, 蒋介石 [1943] 1947: 114。

③ Fewsmith 1985: 183—195, T. Wright 1989: 135。孙中山 [15]: 719—723, [17]: 602。

④ Meisner 1974: 第十章。

便意味着后者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众针对封建社会秩序的斗争。但我们已经知道，他们对封建社会秩序的实际定义一开始是那么狭隘，以至于中国社会的所有部分，都被排除在革命对象之外。革命在国内的惟一敌人，看来只有军阀，他们被适时地给予了一个封建阶级的地位。

共产党人认为这只是一场局部革命，但这种信念并没有动摇他们促其成功的决心。针对是否与国民党人建立统一战线这一问题，共产党人内部展开了争论，争论的焦点不在于一场具有社会凝聚力的民族革命是否可能，而在于共产党人的加入是否合适，以及应该采取何种形式去加入。总书记陈独秀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提出如下意见：当前中国惟一可能的革命，就是一场全民革命。^① 陈独秀没有质疑资产阶级甚至是地主参与一场针对军阀和帝国主义者的斗争的可能性。事实上，让统一战线的前景在其同志们面前不那么具有吸引力，是陈独秀的一个考虑，因为对于一个宣称支持被压迫者的事业的政党而言，公然与富有的银行家和乡村地主们合作，毕竟不是合适的事情。

关于国民党人，共产党人及其共产国际顾问们之间也存在着一
种坚定的信念，即如果在革命自身的进程中社会利益与民族利益发
生冲突，则社会利益必须服从于民族利益。这是一条革命的公理，
一个界定了共产党及其顾问们内部的讨论底线的参数。如何阐释这
一原则，存在着一些分歧意见，但关于原则本身则几乎没有什么争
议。即使关于共产党不怎么感兴趣的社会阶级，也存在着这样一种
期望，即阶级成员将作为民族的国民，而不是作为社会行为者、代
表局部利益来行动。从未歌颂过中国资产阶级的德行的共产党人恽代
英，也学会了将自己对该阶级的批判，限定在作为一个国民群体的行

177

① 陈独秀 1923d。

为方面。商人们不是通过镇压工人阶级，而是通过忽视其国民伙伴的利益，也就是说国家所界定的民族利益，而宣称自己是反革命的。

商人……的福利便在帮助外国资本家剥夺别的国民。国民革命自然亦要希望他们由良心的自觉，把自己私人的小的近的利益牺牲了，以为全体国民谋福利，然而这终只是很少希望的事。^①

恽代英期望资产阶级将放弃其“小的近的利益”，并为了国民革命而作为民族的国民来行动，坦白地说，这种可能性并不让人乐观。但一场革命的发动被寄予了高度期望，正是因为倡导者坚持认为它能够实现民族统一，而不会导致资产阶级利益和民族福祉之间的严重紧张关系。这样就不用付出任何代价。不过，革命者与各种社会成分之间的关系，仍然取决于他们的意图，即扩展国家能力、致力于特定政治目标，以及运用民众动员来实现这些目标。在革命者（代表着民族）、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对国家权力的竞争当中，革命的朋友和敌人，都会宣称支持自己所选择的一方。^②由此，那些碰巧与国家目标观点不一致的社会成分，似乎能被民族利益的定义排除在国民资格和民族成员资格之外。

共产党人对乡村社会的判断沿袭了类似的轨道。1923年，共产党没有注意到土地革命在一场推翻封建社会秩序的运动中的意义，反而提出了组织和动员农民以巩固革命的群众基础这一想法。^③他们在此重复了孙中山关于农民在民众革命中的作用的见解。首先，两

① 恽代英 1924。

② 李剑农 1956：454。

③ Luk 1990：149。

党都未能将农民阶级的“利益”糅入把地主阶级当做民族敌人的政治策略中。在早期共产党人的战略思考中，地主阶级的超额地租、对习惯权力的滥用，以及不受约束的地方权威，远不如他们在另一个方面的潜在价值重要，即联合其佃农一起反对军阀。

首次号召农民通过土地改革参加反封建斗争，出自于1923年底苏俄使节鲍罗廷抵达广州之后。即使在那时，土地改革也是为了凝聚群众，以抵御“封建”阶级敌人——联邦主义梦想家陈炯明——对广州城门的围攻。^① 8个月之后，上海的共产党评论家仍然渴望讨论这一意见，即军阀可能赢得其地方社会的一定支持。1924年6月，一些报道称，某个地方军阀最近经过其在安徽的地盘时受到了群众的广泛欢迎，对此，一名为《向导》周刊撰稿的宣传员对其真实性提出了质疑。其他报道则宣扬地主民团在保护其社区免遭军阀侵犯方面的潜力。^② 湖南境内针对来自陕西军阀的入侵（进行了）地方性抵抗，在此案例中，地主民团被说成在领导对陕军的抵抗方面起了突出作用。在革命的这一阶段，似乎毫不犹豫就得出了结论：“我们应当承认（地主）民团在打倒军阀的运动中的重要性。”^③

民团和地主的总体作用，不久就得到了大幅度的修正。1924年6月，一位活动在广东东江地区的农民运动家，给《向导》写了一封短信，指出了一个简单的然而却是重要的问题。彭湃引用了陈炯明一句坦率的话：“我现在还是与绅士相依为命。”^④看来，某些社会成分确实曾经在大街上欢迎过军阀，地方民团也经常伙同军阀镇压民

① Wilbur 1976：第七章。

② 谭平山、冯菊坡 1923；陈独秀 1923c。

③ 一平 1924；刘仁静 1924。

④ 彭湃 1924。

众运动。因此，如果要将陈炯明驱逐出广东，看来势必触动顽固的地方利益。1925年，国民党人对陈炯明发动了两次征讨，最终于当年11月将其驱逐出广东。观察家们警觉地注意到，在这两次征讨当中，士绅团练与陈炯明一致行动，夺回了国民革命军移交给农会和地方自治团体的许多权力，而地主则将自己的团练交给陈炯明使用，以确保他们在陈炯明领导下所享有的权力。^① 这种行为似乎确认了一种正在形成的左翼舆论，即士绅构成了军阀权力的社会基础。现在，军阀被认为“代表”着顽固的社会利益。

事情（的发展）将表明，这种对军阀和地方精英的关系的概括过于简单化。当革命军向（广东）南部挺进时，他们遇到了大不相同的局面，在一些县里，陈炯明的军阀盟友邓本殷，遭到了地方精英、商人和农民的一致畏惧和鄙夷。南部的公共团体曾经在1923年向陈炯明请愿，要求驱逐邓本殷，但陈炯明无视他们的要求，反而请求北京政府确认对邓本殷的任命，这使他们感到非常恼怒。^② 因而在1925和1926年，南部各县的知名地主、农民和商人，全都起而帮助国民党人将邓本殷逐出粤南。商人拒绝向他纳税，农民将其队伍赶到沼泽地，地主则在海南岛成立了反对他的民团。^③ 与东征不同，在这场战役中，“地方精英”们的行为似乎证实了孙中山的预言，即可以依靠国民的一致行动将军阀推翻，而不必顾及社会问题，否则，后者将使国民发生分裂。但这一课来得太晚了。

地方精英的行为表明，他们并未构成军阀权力的社会基础，即使在这种地方，国家权力的扩张现在也需要对他们采取一致行动。

① 阮啸仙 1926。

② 侨港琼崖农民维持会 1924。

③ 黄熬 1926；缪象初 1926；罗扬清 1926。

正如孙中山经常提及的，在战场上打败军阀，仅仅是革命的一半。直至从军阀控制下解放出来的人们欢迎国民党人干预其社区，这时才可以说革命已经成功。^①在这一点上，粤南的精英并不比粤东的精英更合作：军事斗争之后，他们（同样）抵制国民党人将外来的行政强加给该地区。^②精英们对粤东和粤南的反军阀斗争的（不同）态度，其间的差异基本上是策略性的，因为在这两个事例当中，他们的态度都来自于一种（同样的）考虑，即保护地方自治免受外部干预，不管其表现形式是军阀权力还是国民党人的权威。他们对国民党政权扩张的抵制表明，至少从革命动员的目的来看，他们跟军阀一样反革命，应该将其与后者放在一起加以对付。面对一个社会精英，以及一个梦想中的军阀，革命者遇到了孙中山那建构民族之梦的局限。

1923 和 1924 年，当革命者前往粤南建立一种新型革命政权的时候，城乡社会利益和民族利益可以调和的假设受到了严重挑战。东征和南征结束之后，作为在广东进行国家建构和党的建设之急务，针对封建主义的社会革命，开始成为针对军阀权力的政治革命的支流。在新式党治国家体制下重建地方行政，而非在联邦式自由民主体制下改良地方行政，阶级斗争为此提供了有效的基本原理。换句话说，在中央集权式党治国家的邀请下，社会革命进入了中国的民族革命当中。这并不是孙中山的期望。但当他打破陈炯明的联省自治之梦的时候，他便为别人提供了方便，使他们能戳穿自己的梦想，即一个统一的、独立自主的、社会团结的民族国家。

① 孙中山 [46]：5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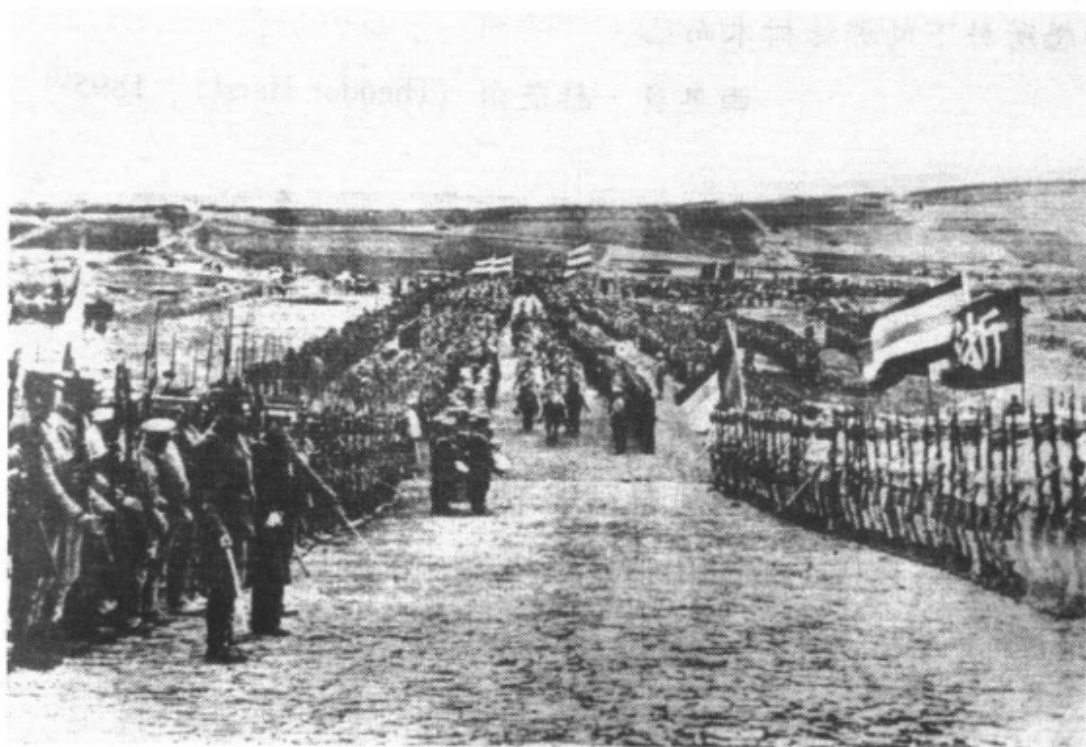
② 林翼中 1926。



5. 1913 年黄兴发给江苏讨袁军稽查员的委任状,上面印着交叉的国旗与九星旗。(秦孝仪,1978,I:288)



6. 孙中山的党旗和他设计的国旗替代品，1914年，见于一份中华革命党的党员证。（秦孝仪，1978，I：301）



7. 通往南京明孝陵的道路上国旗林立，1912年，当时孙中山在一次正式集会上宣告中华民国成立。（秦孝仪，1978，I：259）

第五章 一个国家，一个政党： 自由主义政治与党治国家

你知道德意志帝国是从何处崛起的吗？（它）来自于梦幻、歌谣、幻想和黑色—红色—金黄色 [的旗帜]。……俾斯麦只不过撼动了幻想所种下的那株树木而已。

——西奥多·赫茨尔 (Theodor Herzl), 1895^①

大家都知道，现在的代议士都变成了“猪仔议员”。

——孙中山, 1924^②

1924年8月的一天，在任何日历上都不被纪念的一天，孙中山下令将中华民国的五色旗从自己辖下的华南地区所有机构的旗杆和桅顶上降下。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之内，民国国旗从广州各党政公署纷纷降下。从1925年元旦开始，当地公安局长对继续悬挂民国国

① 引自 Schorske 1980: 165。Herzl 喜欢为不存在的民族设计旗帜，“因为有了旗帜，一个人就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带领人民进入希望之乡。”引自 Mosse 1973: 49。

② 孙中山 [31]: 277。

旗的市民处以罚款。^①孙中山升起了鲜艳的红色旗帜以代替民国国旗，前者顶端的内角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主义主题，由蓝天之上的白色太阳组成，这就是人们通常所称的“青天白日”。旗帜的改变既不标志政府换届，也不表明国民运动领导层的变化，但它显示了民国历史中的深刻变迁。它预示着自由主义共和国的五色国旗在中国的公众仪式中的消失，以及另外两种全国性旗帜的取而代之，其中每一种都只认同于一个独特的政治党派。

最初的民国国旗，由同样宽度的5种颜色的水平条纹层叠起来，代表着其设计者所想像的组成民国国民的5个主要民族：红色代表汉族，黄色代表满族，蓝色代表蒙古族，白色代表藏族，黑色代表回族。^②毫无疑问，民初10年里，它并不是覆盖在旗杆和讲台上的惟一的旗帜或三角旗。在国民革命开始之前很久，孙中山的党派便在党的会议上让党旗与民国国旗并肩飘扬，以此实现自我认同。兴中会的成员之一陆皓东，在献身于流产的1895年广州起义之前不久，便提出了青天白日的设计方案（尽管其中没有作为国民党国旗特色的红色背景）。孙中山用它来作为本党的象征，以示对陆皓东的敬意。但五色旗仍然被尊奉为惟一的国旗。在1924年以前，所有的政党和派别，都让自己党派的旗帜作为五色旗旁的三角旗悬挂，以示对自由主义共和国的忠诚。

181

孙中山的旗帜也不是悬挂在民国国旗旁的惟一一种。许多曾经参加（和一些并未参加）辛亥革命的团体，将其自己的旗帜与国旗并排放置，试图以此表明自己的功勋。另一种常与五色旗相伴的旗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925年10月3日、10日。

② Cantlie and Jones n. d. ; 170.

帜绘着九颗星，它们环绕在一个圆圈周围，并有传统的阴阳符号。^①辛亥年参加武昌首义的军队打出了这种九星徽标。随后，当华中革命团体扬起这面旗帜与孙中山的青天白日旗抗衡时，它又在该团体的徽章中重新露面。黄兴最初偏爱的旗帜，是带有古代乡村社会“井田制”意义的“井”字旗。这一设计未能得到支持，在1913年的二次革命中，他便将民国的五色旗与武昌的九星旗（而不是青天白日旗）结合起来，动员人们反抗袁世凯。^②民国初期军队常用的另一种旗帜，绘有以两个同心圆为中心的18颗星，象征着18个省份。在广州举行的民国10周年庆典上，它就飘扬在青天白日旗的旁边，二者都被安置在一对壮丽的民国国旗旁边。^③在从广州国民政府分裂出去之前，陈炯明所喜好的旗帜，画着与黄兴所用的旗帜相似的“井”字格。^④当时存在着众多的党派旗帜，它们总是与众不同，对聚集在其下的党徒来说又总是极其重要，即便在其象征意义并不十分清楚的时候也是如此。^⑤

从各种旗帜的命运，可以看出各政党在民初政治动荡中的命运。孙中山将其党徒的吸引力归因于青天白日旗。当首届民国政府为武装部队指定徽章，以承认政治团体和武装部队对革命的贡献时，孙中山要求对本党的旗帜给予适当的认可。这种旗帜被参议院分配给了民国海军。孙中山感到，这一姿态说明了海军在随后内战中对他显示的异常忠诚。1917年7月，当孙中山试图在广州成立一个国民政府以抗衡段祺瑞的北京政府时，他得到了程璧光指挥的海

① 《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976：193。

② 秦孝仪1978，I：288。Hsueh 1961。

③ 《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976：193；秦孝仪1978，I：364。

④ Galbiati 1985：41。

⑤ 例如，见1921年上海一次国民党集会上两种国旗的奇怪结合。秦孝仪1978，I：363。

军的支持。这支海军将孙中山的随从人员护送到广州。^①但是，除了孙中山一派的青天白日旗之外，其他任何党派的徽章都未被认真地提出来作为国旗的替代品。

孙中山的许多同伴仍然忠于民国国旗。1912年2月，民国国旗在南京的临时参议院大厦中飘扬，参议院在此起草了宪法。1913至1916年间，当袁世凯宣布国会中的国民党（不同于孙中山创建于1919年的中国国民党）为非法时，民国国旗既是袁世凯政府的标记，也为黄兴的反袁军队所高举。1916年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恢复了民国宪法之下的自由主义代议制政府，但他随后就令站在巨幅国旗之下的武装士兵，封锁了北京国会的入口。国会中对立党派的领导人被段祺瑞的专横之举激怒了，他们撤到广州，加入孙中山的行列，就在曾经阻止了他们在北京相聚的同一面旗帜下，建立了另一个全国性政府。1919年，五色旗被装饰在上海的厅堂里，敌对南北双方政府之间的和谈就在那里举行。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们则在共和国的五色旗下，在上海的大街上游行，声明自己对“科学”和“民主”的忠诚。^②

孙中山自己更加模棱两可。他在上海度过了1918和1919年，在法租界自己的家中读书、与同志商谈。1920年11月，当他凯旋回到广州时，被带到由民国五色旗装饰起来的街道上。次年，他又在民国国旗之下，骑马走在全副武装的纵队前面，从广东奔向广西。^③意味深长的是，1922年夏天，当孙中山正在召集军队、准备在另一

① 孙中山 [32]：155—156。

② 秦孝仪 1978，I：232—233，259，288，311—315，346，351，355，《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1976：237，240。

③ 秦孝仪 1978，I：362。

面国旗之下向首都北京进攻之时，他受到陈炯明的驱逐，并被迫逃离广州。^①随后，他从广西和云南招募雇佣军，打败了陈炯明，并于1923年1月重新体验了上一次在广州所取得的伟大胜利。这是他最后一次行进在民国旗帜之下。尽管国民党员已在民国五色旗下争论和战斗了十多年，但在陈炯明的叛变之后，孙中山还是决定用自己的旗帜来对付敌人。

事实上，在多民族的民国旗帜之下，孙中山从未有过舒适的感觉。在革命之前，他并没有参与旗帜的设计，当时他一直主张单一民族的统一，因而在革命后坦言对它（民国国旗）的不满。^②他相信自己的青天白日旗——如他所说的，“革命党二十年来以先烈之血所沃成”——毫无疑问这是国旗的最佳选择。他在1919年推论道，如果说海军在他的旗帜之下航行，沿着忠诚的方向前进的话，那么国家的其他部分，也正因为选择了错误的旗帜而偏离了这一方向。^③孙中山认为，民国国旗背离了革命的最基本原则：民族统一。他从不怀疑这样一种信念，即在辛亥革命中“全国觉悟了”“异族的专制”。他在1921年12月的一次公共集会上说：辛亥革命“把中国的统治权收回到汉人手里，中国领土完全为汉族所有”。^④他在1918年思考着，既然革命是一个种族对另一个种族的胜利，那么，被征服种族成为其胜利旗帜上众多条纹中的一条，胜利者为什么要对此表示庆贺呢？民国国旗模糊了汉族推翻满洲“异族”这一首要功绩：

① 《革命文献》1973，51：327—329。

② Kataoka 1984.

③ 孙中山 [1]：165—166。

④ 孙中山 [34]：461。

我国人自汉族推覆满清政权、脱离异族羁厄之后，则以民族主义已达目的矣，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皓东先生所定之中华民国之青天白日国旗。^①

1924年秋天，当他在广州降下“不吉”的民国五色旗，而代之以国民运动的党旗之时，孙中山确信，他正在让革命驶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碰巧的是，1925年1月1日青天白日旗在广州的升起，正是对纯种满族旗人后裔进行共同迫害的信号，这些旗人在17世纪中叶被派往南方，去平定广东。广州的旗人随着清帝国的崩溃而失去了官职，在国民党掌握该市权力之前很久，由民国政府发给的退休津贴也早已终止。到1920年代，当地的满族民众已严重依赖于前辈遗留下来的微薄地产。1925年1月，为了一项针对当地满族民众的财产重新登记、惩罚性征税和充公的计划，广州的统治者将这些地产分离出来。广州的满族人必须缴纳特别税，每100平方英尺地产25元；2月12日，197个满族家庭因为欠交税款收到驱逐通知。^②到3月份，已有3000满族人的地产被充公。^③

孙中山也不喜欢民国国歌。^④“你们说它是国歌，”他在1923

① 孙中山 [32]: 155。参见李大钊于1923年对共和旗帜的赞许——它恰好建立在使孙中山恼火的同样基础之上：主张统一中国人民之间的差异。

② *North China Herald*, 1925年2月28日。

③ 同上，1925年3月21日。

④ 《共和国之歌》的英译见 Cantlie and Jones, 167。

年8月对一群学生听众说道，“我想一定是官僚颁布的，有何意义？”^①事实上，“官僚”几乎没有任何先例可以援引。战国时代的一些诗句显示了爱国主义迹象——它们与楚国（湖南）相关——几首唐诗也从外围触及了民族的特质。但没有任何东西可与欧美国歌中的“民族生活”这一怀旧说法相对应。^②应该由1920年代的国民革命，而不是1911年的共和革命，来决定国旗形式和国歌歌词。“其实这些形式，顶好现在不讲，等我们革命成功后，广延硕彦，大集群贤，再制礼作乐未迟”。^③最终并不是由中国人民来决定这个问题。1924年1月24日，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们通过了一项决议，支持以党旗为范本的新党歌，“将来定为国歌”。^④民国国歌被适时地以另一首歌曲所取代，后者表达了对一个特殊的政治党派的忠诚：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
以建民国，以进大同。
咨尔多士，为民前锋，
夙夜匪懈，主义是从。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贯彻始终。^⑤

虽然围绕国旗和国歌的争论为主义问题所引导，但它还是与孙中山

① 孙中山 [44]：527。

② 诗界第一个注意到这种疏忽的是黄公度，他创作了24首军事歌曲以“团结军心”，又为学校儿童创作了19首歌曲——“都充满了民族精神，但不适合广泛传播”。陈敬文1961：18—19。

③ 孙中山 [44]：533。

④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986，1：42。

⑤ 译文基于Tu Ting-hsiu的标准英译本。值得注意的是，“党”这个词在标准译文中被省略了，写成“San Min Zhu Yi, Our Aim Shall Be”。秦孝仪1978：1。

在政党和政权问题上的个人立场密切相关。在1914年更早的一个场合，他就试图在中华革命党的徽章中把五色旗换成国民党党旗。^①它所显示出的，远不只是其政党的外在装饰的变化。1914年，与新旗帜相伴随的是一种新的入党仪式，要求所有新成员对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他以前的许多同伴拒绝这样做。^②他们讨厌对个人宣誓效忠，同时普遍不愿悬挂孙中山选择的另一种国旗——无论是在它被宣布为非法的国内，还是在未被认为非法的国外。

孙中山不愿承认，五色旗对民国不同党派和政府的吸引力，表明了它作为国家象征的弹性。这毋宁说是其虚弱的明证。因为与袁世凯的专制作风，以及一系列声名狼藉的政治交易——在1923年公开贿选中达到顶点——相联系，这面旗帜被玷污了。在1924年，民国国旗仍然代表着1912年临时约法中所表达的自由主义价值。但孙中山对自由主义政治的权力补偿已经不再感兴趣。在他看来，无论是那些在它指引下为反袁战斗而死的人们，还是任何一场保卫自由主义约法和促进它所宣称的科学、民主、个人自由等价值的运动，都未能拯救这面旗帜。对孙中山而言，他们对五色旗的效忠已经宣告了所有这些运动的失败。通过将国民运动的旗帜和歌词上升到国家象征的地位，孙中山表明了自己的忠诚——首先是对他自己，其次是对一种新型的革命政治。

党治国家的诞生

对民国国旗的不满，孙中山最初表现得相当谨慎，只是当自己

① 中华国民党的党徽，一边是青天白日党旗，交叉处是含有青天白日图案的国旗。秦孝仪1978，I：301。

② 邵元冲1973—：99。

的政党在自由主义宪政中的资本跌落到最低潮时，才将其公开表达出来。早在1923年，孙中山便开始在自由主义的意义上明确区分“政治进行”和他所说的“党务进行”，他认为后者是远离政治的。“政治进行是靠不住的，”他宣称，“只有党务进行，是确有把握的，有胜无败的。”^①不可否认，1923年是民国自由主义政治的最低点。^②当孙中山在该年年底再次说到“党务进行”时，他甚至不愿简单地提及一下自由主义选择——当时他提到了“党务进行”和“军事进行”，却根本没有提到“政治进行”。^③几个月后，当他升起自己的青天白日旗来取代民国国旗时，孙中山发出了信号，即终止与所有政治团体的妥协——只要它们乐于继续在自由主义民主政体框架下行事的话。通过使国民党与民族国家相同一，党旗将转变为国旗。妥协或合作的惟一余地在于别人加入他的党派，帮助其扩展到足以与国家同一、其成员足以与民族共存的地步。

孙中山向来建议“以党治国”，但现在他的要求更多了。^④在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开幕词中，孙中山解释说，他不再提“以党治国”，而改提“以党建国”：

186 此刻的国家还是大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现在革命党的责任还是要先建国，尚未到治国。……今日民国的国基还没有巩固，我们必要另做一番功夫，把国家再造一次，然后民国的

① 孙中山 [4]：509—511。

② Nathan 1976.

③ 孙中山 [17]：593—604。

④ 治这个词既可以表示“统治”，也可以表示“准备或制造”，但过去所说的“治国佑昌”指的是国家统治的稳定性。孙中山使用建（建造/构造）这一术语，使自己的意思不会被误解。

国基才能巩固。^①

在随后的一次会议上，孙中山支持建立一个国民政府以取代共和政府，并再次使用“以党建国”的新提法来阐明他的立场。党将复制政府的组织并监督其各级运作。^②

孙中山对新的国民国家的号召，暗含着对共和政体的攻击，与会的一大代表们对此有所警觉。并非所有代表都被他的理由说服了。孙中山刚刚解释完为什么中国需要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一位名叫李子荣的代表就站起身来，质问是否应该允许成立这样一个政府：

主张应先以国民政府应否组织为先决条件……盖本问题关系很大。本席意见，如组织政府，应组织中华民国正式政府。^③

孙中山的忠实伙伴廖仲恺插话了，他指出此问题不在大会议程之内。但质疑者仍然坚持其看法。代表们一个接一个站起来，建议将“国民”这个词从任何新政府的名称中删去，直到毛泽东——他显然已对那些牢骚满腹的国民党新同伴不耐烦了——提议控制讨论秩序，并将此问题付诸投票。主席让大家举手表决，代表们同意了将“国民”和“政府”两个词连在一起，在当天的晚宴上，大多数代表举杯庆贺党和国家的结合。^④

在许多密切相关的问题上，情绪正在高涨。一些代表感到，极具争议的大会决议不能反映普通党员的观点。在大会的倒数第二天，一位来自北美的代表黄季陆提议采用比例选举制，以使反对意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986，1：5。

② Tochigi 1974：67—68。

③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986，1：15。

④ 同上：15—18。

见得以在党的最高层表达出来。党的政策在这次大会上出现了许多新方向，黄季陆对此并不高兴，但在这一问题上，他的提议超出了具体的政策问题。他所关心的，是普通党员的观点应该在党组织中有正式发表的机会。这一推理，挑战了隐藏在列宁主义路线指导下的政党改组背后的基本原理，也质疑了孙中山在开幕词中的呼吁——所有党员将个人自由交给党——的合法性。^① 孙中山解释说，党过去的错误，就在于允许党员自由行动，并使自己的力量和才能发展到了超出党本身的程度。黄季陆提出比例选举的建议，已经接近孙中山立场的反面：

比例选举制，可以打破现在选举的流弊，因为现代选举制总是以多数压服少数，而比例选举制，则各能如其势力以发展。和孙中山一样，黄季陆也担心党内的不统一前景，及其对党的力量的可能侵蚀。（国民党）章程中明确允许分歧观点的存在，但在这样一个党派里，他却看不到任何“选择之机会”。相反，他辩驳说，自由主义将被证明是一种新的力量源泉。黄季陆注意到，围绕着是否允许共产党人入党这一问题，已经形成了一条重要的分界线，他断定保证党的统一的最好方式，是从章程上对不同观点的表达作出规定。他说，“欧洲均保护少数的民族，凡民治国家”就应该是这样的。

与欧洲国家的比较，展示了黄季陆的看法的另一方面。与孙中山一样，黄季陆也把政党说成是与民族国家相似之物。但他们似乎各持一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理念。黄季陆视政党为民族国家的预备学校，相信党所采用的程序将在总体上为国家政策确立一个范例。比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986，1：6—7。亦见黄季陆1964a，1964b。

例选举制很适合于国民党，因为它很适合于一个自由主义国家：“可以先试用此制，以为训练，以备将来执政时施用通行，普遍于全国。”在大会最后几天的简短插话中，黄季陆提出的是一种自由主义模式的政党组织和国家建设，以代替孙中山提出的高度纪律化的党治国家。孙中山想要的则是一种“革命的专制”。^①

在黄季陆的最后提议中，其他代表看到了某些前景，即将共和制从孙中山在大会第一天将其抛入的垃圾箱里找回来。如果一个更自由的选举制度可以“将历届国内省会、国会选举之流弊一扫而空”，那就无需以国民政府来取代共和制度。即使孙中山的亲密伙伴戴季陶也建议，考虑到这项提议“非常重大”，应该把它推迟到下一次全国大会上讨论，但另一位来自北美的代表刘庐隐表示反对。现在必须作出决定了。这时毛泽东又一次插话：

188

现时比例选举制，系少数党所运动出来的结果，本党为革命党，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应摒弃。比例制有害于革命党，因少数人当选，即有力量，可以破坏革命事业，是予少数派以机会也。

当另一位共产党员宣中华将比例选举制说成是“资产阶级骗人之物”时，黄季陆再次站起身来表明：比例选举制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欺骗，也没有损害革命，而是保证“全民政治”的一种民主政治程序。

在这些言论中，黄季陆又一次将注意力从党内程序转向国家组织本身这一更大的问题。毛泽东和宣中华也对此发表了看法。与孙中山建立一个党治国家的提议相比，宣中华未能想出对当前动议的更多的谴责性控诉。他引用孙中山的言论来指责黄季陆，说国民党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986，1：6—7。Tochigi 1974；67，Nozawa 1971.

“主张‘以党造国’，以党秉政，比例选举制根本与之不合”。毛泽东走得更远，他阐述了国民党一旦掌握国家权力之后一党专政国家的巨大意义。“此制很有害于革命之本身。盖以自由给与反对党，革命事业便十分危险。”^①

毛泽东对国民党内部程序的担忧，反映了他对清除一党专政国家中反对革命运动的政治对手的更大关注。事实上，双方都明确承认党章对于最终的国家形态有着深远意义，也都在讨论党章时分别表达了对最终政体形态的关注。对于孙中山、毛泽东和宣中华的对手们——主要是北美代表黄季陆和刘庐隐——而言，理想的政体是一种自由—民主政体，将为少数派的声音留下空间。党同样应该如此。

189 黄季陆和刘庐隐显然处于不利位置。他们在争论中所反对的不仅是共产党人，而且是孙中山的党规教义。宣中华引用孙中山的话来攻击黄季陆和自由—民主制度，是非常合理的。党就是民族国家的范例，孙中山已经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自己设想中的国家类型。在党代会结束后的两个月内，中央执行委员会解除了大理院院长的职务，因为他坚持认为党规不能凌驾于法治准则之上。赵士北，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法学家，仅仅在一年以前被孙中山任命为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曾为1912年临时参议院议员，后来担任过民国政府法律和行政方面的许多重要职务。^②但在1924年3月31日，他因为散布“司法无党”的观点而被撤职。“在党规准则和党治体系之外”，将不会有任何法律。^③宣中华和毛泽东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986，1：58—60。

② 《民国人物大辞典》1991：1308。

③ 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记录（1924年3月31日）。《中国国民党周刊》，18（1924年4月27日）：4。

首先成功地开始捍卫党规，但孙中山是第一个将其付诸实施者。

孙中山的“党务进行”这一新概念，也使他与共产党人有了普遍的、更为紧密的联系。一年前关于国共合作形式的谈判，首次表明了他不再与其他政团合作的决心。孙中山拒不同意与共产党达成任何形式的合作计划。相反，他坚持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他们应该为扩大国民党的规模和影响而努力，并且仍应受制于党的规章。孙中山的条件为马林接受，在1922年8月具有争议的杭州全会上，也为陈独秀和共产党所接受。这不单是对共产党员保持控制的一种聪明计谋，也是其信念的明确表现，即革命范围应限制在国民党的“党务进行”之中。

许多共产党员不同意最初的决定，因为它限制了他们独立活动的的能力。但到1924年1月，没有人对孙中山拒绝采用自由—民主程序提出质疑。为了在北京政府中获得影响，共产党曾在1922年与国会议员共事过一小段时间，但到了次年底，他们开始同意孙中山对国会的不满，当新的国民旗帜在广州飘扬时，他们聚集到了它的周围。这时，共产党员开始将自己的旗帜附着在国民党旗帜上，就像共和派曾将自己的徽章附着在民国五色旗上一样。其中一种为党的农民运动而设计，在青天白日旗下画着一把犁；另一种旗帜则为劳工运动而设计。^①共产党员将这些旗帜推广到全中国，让它们在那些仍然忠于自由主义宪法的政派和集团面前招展。他们的统一战线群众运动是党治国家的一个方面，这个国家不再忠于共和制度。

毛泽东以其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的资格，表达了对改变革命徽章的支持。1925年11月29日，《时事新报》发表了一篇关于北京示

190

① 国民党农民协会的旗帜在1925年末或1926年初被采用。见《中国农民》2（1926年2月1日）图示封面。

威运动的报道，在这场运动中“学生执广州旗帜，工人执红旗，未见国旗”。这则报道以“可骇的示威！”作为大字标题。毛泽东高兴地注意到了北京的狼狈不堪迹象：

假如将来真会组织什么“国民政府”，在那政府的屋顶上高挂起“广州旗”，岂不又闹成了广州一样的“乱局”？不但如此，这“乱局”也许蔓延全国，到处仿照办理，多数人起来“自由”，硬把少数人“不自由”。^①

孙中山从未明确提倡剥夺少数人的自由，也慎用“乱局”等词语。他意识到了自己早年的“破坏”名声。从五四运动以后，孙中山就改提“建设”了。当孙中山从广州政府大楼屋顶上升起他那与众不同的国民旗帜时，他仍在发出可能被毛泽东和共产党所采纳的信息。在以某个特定政党的方式重建一个国家时，在宣称政党具有代表国家发言的绝对权威时，国民党不会允许任何妥协。

清除国民运动中的自由主义

孙中山虽然有共产党人站在自己一边，但他仍然必须面对本党成员，然后才能毫无畏惧地让青天白日旗飘扬在政府大楼上空。实际上，他不得不否认国民党的一个长期传统，即与民国自由主义政治的联系。他的国民党同伴在1912年帮助建立了民国，展开竞争，并在1913年的首次全国选举中获胜。后来的10年里，他的许多忠实同志勇敢地捍卫共和宪法，与那些试图破坏它的人斗争。孙中山要抹去这段难忘的历史记录，就必须击退来自党内元老抵制。在通向国民革命的过程中，围绕着党员应该效忠哪面旗帜、国家应该

^① 毛泽东 [20]：13。

具有何种特质的问题，终于爆发了冲突。

冲突也发生在党自身的特性和形式问题上。1916年，孙中山从被迫流亡的日本返回上海，发现党组织一片混乱。他很快认识到，党的计划和政策与中国沿海城市呈现的新的文化和社会运动毫无关系。一开始，他试图复兴垂死的中华革命党，对这些现象并不关191心，也很少留意新文化运动。在此阶段，他仍然乐于同那些聚集在广州的国民党籍“护法”议员合作。1914年，许多议员离开了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继续反对他在过渡时期提出的关于新式政党结构的建议。到1917年，“党务基本中断”。^①孙中山重组政党的努力没有什么进展，直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转向暴力，在五四运动中发展为一场直接的政治行动。

1919年5月，北京的学生、教师和工人避开议会程序，转而采用群众鼓动和直接行动，并成功地聚集了大量群众，在大街上反对将前德国殖民地转让给日本。尽管孙中山对五四运动之前更广泛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兴趣，他还是被这些激进分子的爱国主义及其巨大的政治成就所打动。1920年1月，在一封致海外支部的信中，他将新文化运动描述为“诚思想界空前之大变动”。^② 这年年底，他决心利用这场运动中的爱国主义情绪，并通过又一次政党改组，把新一代激进分子吸收进来。

五四激进分子鼓吹一种启蒙式民主，这与孙中山的“训政”想法产生了共鸣。对于自由民主在中国的前景，他们甚至比孙中山更表怀疑。当他们对民主的敌人进行分类时，五四激进分子未能区分旧社会的迷信、专制与新式自由主义共和国的更脆弱的象征。著名

① 戴季陶 [1925] 1959a: 980。陈天锡 1958: 28; 《本党部党务报告》1924: 6—7。

② 孙中山 [39]: 669—673。

活动家瞿秋白回忆说：

从入北京到五四运动之前，共三年，是我最孤寂的生涯。友朋的交际可以说绝对的断绝。北京城里新官僚的“民国”的生活使我受一重大的痛苦激刺。……中国民族几十年受剥削，到今日才感受殖民地化的况味。帝国主义压迫的切骨的痛苦，触醒了空泛的民主主义的噩梦。^①

192 民初10年的大部分时候，民国政治家和官员们都表现为怯懦和自私，但在1919年，他们未能抵制日本对中国山东的领土要求时，针对他们的不满又增加了叛国这一内容。就在这时，瞿秋白从自由民主的噩梦中被“触醒”了。随后，他那年轻人特有的焦虑和同伴们的愤怒，都不仅针对旧社会的“封建”习俗，而且指向自由主义共和国的新象征。^②瞿秋白于次年前往俄国，1923年回国后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8月他晋升为总书记。^③

但在整个国民党内，自由民主显然正在复兴。国民党议员们感到瞿秋白的噩梦仍很遥远，只是不真实的梦——尽管以一种类似于当时的政治修辞的话来说，他们认为正在做梦的是中国人民。伍廷芳，一位在历届民国政府中受人尊敬的外交总长，于1920年2月代表其议员同伴写道：

随着民主理论的兴起，世界大势已经转向民族自决。受人尊敬的国会议员为国人感到悲痛，他们迷失在洞穴般的迷梦之中，似乎是在催眠状态下活动，不能适应我们时代的需要。^④

① 引自 Hsia 1968：15—16。

② Schneider 1971：26；T. Chow 1960：49. Hung 1985.

③ Boorman and Howard 1967—1971，1：477—478.

④ 伍廷芳 1920。

五四运动似乎激发了国民党议员的热情，他们努力将国民从“自我启迪”、“自决”、“自治”的自由主义梦想中唤醒。

五四时期，与广州护法运动相连的一群国会议员和民国官员，出版了一种新的刊物，伍廷芳在此表达了自己对国人“洞穴般的迷梦”的悲叹。根据创刊号上提供的解释，这份同人杂志名为《民觉》，利用了五四运动的大众语言，但对它们进行了特别的强调。在此情形下，刊名中的“民”既不是指民众，也不是指五四文学中的平民，而是指国民。“觉”的含义也不是民众觉悟，而是作为国民的个人自觉。这里暗示的自觉是一种特殊的类型：该刊宣称，其目的是促进“国民的自觉”。自觉意味着唤起作为自由主义民国国民的认同。^①

《民觉》的撰稿者强烈偏爱有指导的启蒙，要将其导向“自觉”的理想。国民党元老林森用一个符合格律的对仗宣告了自己的立场：“启迪世界，唤醒人民，……寻求自治。”^②似乎是为了强调实践的自我指导性质，其他撰稿者把玩着“自觉”和“自决”这一对同音异义词：193

自决只是结果，自觉才是原因。要完成自决，必先实现自觉，因为倘无真正之自觉，即无从谈论自决。^③

对个体自我、自觉和自决的一致强调，显然是要反驳1920年关于自由民主的两个已知敌人的说法。一个是袁世凯及其后继者在北京的腐败和专制行为——对此国民党议员有着清醒的认识。另一个是最近出现于五四文学中的社会革命幽灵。张秋白，另一位著名的国民党议员，

① 《本志启事一》，1920。

② 林森 1920。

③ 吴景濂、褚辅成 1920。

宣称国民只有完成“自我的革命”，才能确保以往的专制行为不再复活。但张秋白似乎更关注社会革命在可预见的未来的前景：

在试图完成社会革命之前，革命者必须首先完成对自己的革命。如果所有人都能真正完成对自己的革命，那么组成“社会革命”这一可怕词汇的四个特征都会瓦解，被一个接一个地抛到太平洋、大西洋、北极洋、南极洋的深处。……我们将再也不需要让“社会革命”这个幽灵出现。^①

张秋白所说的社会革命，其意思并不十分清晰，尽管“幽灵”一词似乎预示着他和他的议员同伴为之奋斗十余年的一切都会终结。当然，有些自由民主主义者赞成五四激进分子对儒家传统社会和政治秩序的鄙弃。“几千年来，”一篇序言说道，“我们的头脑被国家的专制思想所浸染。”^②但自由主义者以为，民国的象征和制度，并不比五四激进分子的可怕言论更可能复活专制思想的传统。

对自由主义者来说，辛亥革命的成就和许诺已经足够革命了。辫子作为汉人从属地位的象征消失了。民国的到来推动了女子缠足的减少，引入了简化的国语、政治权威的新式象征和大众主权的合法性修辞，改革了的学校 and 高等教育机构，货币改革，新的公众礼仪，改良过的日历，适宜的国民歌曲和文学清单，以及——主要是在广州的议员们看来——一套他们可以由此代表新中国发言和行动的政治机构。也许民国的象征已被袁世凯及其后继者亵渎了，但只有五四运动中的偶像破坏者和社会革命者才能真正摧毁它们。看来这正是自由主义者最担心的事情。国民运动中议员们的目标，不是摧毁民国的这些象征，而是让它们重新焕发光彩。

① 张秋白 1920：78—98。

② 吴景濂、褚辅成 1920。

新文化运动在舒适而安全的上海建立文学社，开设阅览室，创办杂志，这种热情似乎没有对孙中山产生多大吸引力。他追求的是更宏伟、同时也更实在的东西。1920年4月，当许多国民党机关刊物——包括《星期评论》——的发行受阻于一系列禁令时，他回到了一种更熟悉的特殊政治当中。^①孙中山事先已经有所了解，并抢先作出反应，关闭了《星期评论》，并要求自己的旗帜性刊物《建设》停刊。党的第三份主要机关报《觉悟》，因为其运作属于上海《民国日报》的普通商业性运作的一部分而得以幸免。

孙中山最亲密的同伴掩盖了自己的情绪，但其他人则严厉批评终刊之举。6月7日，《觉悟》的一名编辑对（孙中山）所说的终刊理由表示怀疑，并明确暗示，真正的原因在于（孙中山）决心回到“真正的政治”。^②这种说法与实情相去不远。就在《建设》停刊前几天，孙中山、伍廷芳、唐绍仪和唐继尧联合宣布广州军政府正式解体。这一宣言标志着一场解除广东现政府的新运动的开始，也标志着孙中山与上海启蒙运动的短期合作的结束。

关于孙中山在广东从事“真正的政治”的说法，并没有使他本人感到不快。对孙和国民党员来说，劝告大家取得群众宣传效果的最好方式是实践而非鼓吹主义，这是很自然的事情。^③将主义付诸实践，正是孙中山在阻止资金流向党内刊物时的想法。现在，他提出应该用“实际建设”的宣传，来取代最近的“空言”宣传：

用文治感化来统一中国，就是要靠宣传，若是空言的宣传，是没有真实的力量的。我们现在是要把广东一省，切切实

① 《星期评论刊行终止的宣言》，1920；吕芳上 1989：59。

② 曙声 1920。

③ 仲九 1920：1。

实的建设起来，拿来做一个模范，使各省有志改革的人，有一个见习的地方。守旧固执的人，也因此生出改革的兴味，这个实际建设，就是极大的文化宣传。^①

195 思想上要做的都已经做过了，1920年夏天是行动的时候了。孙中山以个人及其政党来代替上海报章杂志的“空言”，开始通过他自己的榜样力量来唤醒人民。作为脱离五四运动的一种表示，他试图遵循新文化运动中的“启蒙式”出版模式，也在上海成立一流的出版社，来开展国民党的宣传工作。

“民智书局”的历史，并不意味着孙中山的真正兴趣超出了上海的文化政治。这家出版社仅仅是把五四运动的教育方式，吸收到南方实力政治的要求中来。孙中山写信给所有的海外支部，为出版社索要资金，然后美国党员给上海的国民党本部汇来约10万美元。在当时来自海外的所有收入中，美国支部大约占60%，因而可以设想，从其他支部也收到了6万美元。但这笔财产的实际去向是个秘密：据我估计，最多只有32000美元真正拨给了民智书局。剩下的钱看来用于收买1922和1923年把陈炯明赶出广州的军阀盟友了；无论如何，直到20年代末，这家出版社始终是个无关紧要的出版社。^②

① 孙中山 [37]：401—402。

② 孙中山 [39]：669—673。该出版社在当时的英语文献中被称为“Intelligence Press”，汉语称为民智书局。我对美国汇款所占比例的估计，基于1922年7月之后6个月的数字，这期间所有资金都须流经上海党部。在这前后，孙中山住在广州，该项经费为两市党部分割（所列数字单位为元，换算比率为100美元=180元）：美国——405000元；加拿大——78000元；澳大利亚和新西兰——40000元；菲律宾——38000元；夏威夷——17000元；南非——11000元；其他地区——81000元。“中国国民党本部财政部通报”，1923。只有在1928年以后，国民政府的资源被添加到国民党的资源之上时，该出版社才获得应有的资金。

另一种脱离（五四运动）的表示是，孙中山1920年12月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之前，决定修改党的章程。修改后的党章几乎遇到了与民智书局一样多的问题。一方面，11月9日提出的草案，还应归功于五四运动开创的政治风格：孙中山首次决定，在上海的国民党本部建立一个宣传部。但是，新党章初稿最关注的，是创建一个忠于孙中山个人的革命党。在随后的争论中，国民党元老、国会议员和孙中山一道，复活了对宪政自由主义之优点和孙中山之党内作用的诸多抱怨。

尽管孙中山在1920年冬脱离了五四激进分子的“空言”，他还是不想用议会政治来取代它。他想要的是“政府”：

此次军府回粤，其责任固在继续护法；但余观察现在大势，护法断断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吾人从今日起，不可不拿定方针，开一新纪元，巩固中华民国基础，削平叛乱。方针为何？即建设正式政府是也。^①

只有建立一个正式的政府，他才有望进行“实际建设”的宣传。他仍然和国会同伴一道对“护法”有兴趣，因为在民主政体之下，国会是统治工具的一部分。他们也赋予他这种优势。维持北京或广州议会的现状，其代价要比战场上小得多，当孙中山被迫用战争来拯救政府时，他和国会的联系，使他与声名狼藉的军阀的联盟有一种合法氛围。 196

这些联盟的代价是高昂的。此前一年，在五四激情依然高涨的时候，孙中山公布了第一份修订后的党章，以借助五四运动的势头，为武力收复广东筹集经费。他希望通过复兴已经衰落的中华革命党海外支部，来建立一条党与商人盟友的信用阵线。^② 但是，

① 孙中山 [3]：399—400。

② 除了在必程度上调整海外党务工作，1919年国民党的改组，普遍忽略了国内的组织和宣传。邹鲁 1929，1：287—298。

1919年党章很少或几乎不允许国民党议员参加更高层的党内委员会。事实上，大陆党组织的重组又耽误了13个月，一直拖到孙中山准备离开上海前往广州。他的即将离开，使议员们在国民运动中的地位成为头等问题。

在其同伴迫使下，孙中山的党章草案在1920年11月就早早结束了详细研究过程。10天后，即11月19日，党章的修订文本发表，此前的争论中心，在于党的性质和孙中山的领导地位问题。^①这两份文献的措辞反映出，议员们的兴趣发生了细微但值得注意的变化。^②首先，在11月9日公布的党章草案第六条中，孙中山纳入了对个人宣誓效忠的规定。经过几次讨论，前往上海参与国民党改组的代表们迫使草案作了改动：11月19日发布的修订文本的第三条，将原先的“必须宣誓”一词改为更具体的“必须对党宣誓”。^③争论的第二点是训政统治。在孙中山最早的战略术语中，训政是三阶段革命进程中的第二阶段，始于军事胜利，终于代议制政府宣告成立。在此期间，中国人民将受到国民党党治国家关于实施共和政治的训练。^④三阶段方案中的训政，尽管曾以略微不同的形式出现于1905年发布的同盟会宣言中，但它从未得到自由民主主义者的支持。^⑤孙中山的中华革命党的危机，暗示着训政只是一种借口，即由

① G. Yu 1966: 56; Hsueh 1961: 52—54; Friedman 1974: 第四章。

② 两文献均见邹鲁 1929, 1: 298—302。记录中列名提出动议的6名党员，有4人是国会议员：田桐、吕志伊、覃振、居正。“十一月九日午后三时本部开会纪事” 1921: 22—23。

③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邹鲁 1929, 1: 299—300。1918年孙中山明确允许，新党员不必宣誓效忠于他个人即可入党：孙中山 [40]: 557—558。

④ 《中华革命党章程》第四至十四条，见邹鲁 1929, 1: 161—162。

⑤ 同盟会提出了军政、训政（限6年）、宪政的三阶段革命方案。邹鲁 1929, 1: 53—55; G. Yu 1966: 116。

孙中山而不是选举出来的代表来统治，并且无需经过适当的程序。^①训政在1920年11月党章讨论中的命运，表明这一张力来源并未在10年里有所减弱。在公布第一份草案时，孙中山向其同志力陈，需要把党的训政列为革命三阶段之一。^②甚至在11月9日草案发表之前，党内元老胡汉民就预料到了自由主义者的异议，他提出了一个既能为孙中山接受，又可以有效地将训政排除在实际考虑之外的折中方案。胡汉民的建议被吸收进了第一份草案的第三条，即训政应该在军事进攻期间而不是在此之后实施。战场上的胜利，应该立即迎来一个宪政共和政府时期。^③然而，即使这种对训政概念的淡化提法，也在10天后发表的最终文本中被删除。根本没有提及训政。^④在11月9日的演讲中，孙中山大力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但它几乎没有什么分量，敌不过自由主义议员的一致反对，他们构成了党的新核心。

197

争论的最后一点是孙中山作为领导人的地位。原草案第九条、第十条关于孙中山领导地位的提法，在最终文本的第十二条中被淡化了。在为自己的草案辩护时，孙中山向其同志论述了党内强有力的个人领导的必要性，他认为，尽管国家应该以法律为基础，政党却必须建立在个人基础之上。^⑤在党内政治家们看来，1920年这些观点并不比1914年更吸引人。原草案随之被修改。原先的表述“设

① 居正 1973—h, 84—86。

② 孙中山 [45]: 398—399。

③ “十一月九日午后三时本部开会纪事” 1921: 22。George Yu 暗示，孙中山将其三阶段方案隐藏在两阶段的形式中。G. Yu 1966: 156。亦见 Tochigi 1974, Nozawa 1971, 1974。

④ 邹鲁 1929, 1: 300—302。

⑤ 孙中山 [43]: 394—398。此时孙中山尚未发展出国家本身必须建立在党的——对他而言，因此也是个人的——基础之上的观点。

总理一名……拥有绝对权力，领导全部党务”，后来的文献则改为“设总理一名，代表本党，领导党务”。^①孙中山被迫再次向其自由主义同伴让步。尽管孙中山失去了这场斗争，但他从不承认失败。他在几个月后说：“中国国民党，实在就是中华革命党。”^②直到1924年党的伟大重组，他才能宣告最后的胜利。

国民宣传与自由主义反应

国民党议员不会束手就擒。为自己在新的国民党里重新找到一个位置以后，国会中的自由主义者展开了努力，以确保国民党依然代表自己发言。上海、广州和北京的宣传机构，保存和维护着国民党的符号与喉舌；为了取得对它们的控制，1920到1924年间，许多国会议员显示了不同的花招，其中折射出关于党的形态的意见分歧。¹⁹⁸在上海本部成立新的宣传部一事被推迟了，因为党内干部和议员们离开了上海，前往广州，以完成1920年的重组工作。上海的机构一如既往，主要面向海外进行宣传，以便为国内的党务活动筹集经费。

国内宣传的责任，则随孙中山和议员们一道南迁广州了。1920年11月和12月，这里迎来了新的党组织的一批先驱者。没过多久，本部驻粤特设办事处就于次年1月3日成立，它成为事实上的宣传机构。^③用孙中山的话说，特设办事处要起到“操练宣传的总机关”的作用。^④因而，本部特设办事处总共84名成员中，有38人

①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邹鲁1929，1：299—300。

② 孙中山 [35]：403。

③ 罗家伦、黄季陆1969，2：817—818。

④ 孙中山 [35]：411。

服务于宣传部门，其中9人被派往广西，3人派往湖北，1人派往湖南。由于广州办事处的权威一直延伸到上海，上海本部新的宣传机构的成立，被无限期地推迟了。^①

特设办事处宣传部门高级干部的任命，证实了议员们对国民党在华南的新宣传机构的控制。代表孙中山与北京政府谈判刚回广州的邓家彦，被任命为宣传部门的负责人。^②邓家彦和他在宣传部门中的代理人王宏图，以及特设办事处的主要干部张继，都曾当选为1917年非常国会议员，因而声名卓著。^③办事处开展的宣传事务中，宪法问题占据了显著地位。议员们利用广州的新的宣传机构，出版了孙中山论述议会民主的许多名著，包括《五权宪法》和他的《三民主义》的早期版本。^④

广东的一些事件，共同促成了孙中山本人对议会政治兴趣的复活。早在1921年回到广州不久，孙中山的批评者之一，就对他那贯彻“党人治粤”方针的新行政机关提出指责。孙中山确实有些偏好这一指责。不过，他仍受托在广州重组非常国会，并感到不得不与军阀陈炯明紧密合作，他正是应后者之邀才回到该省的。对孙中山来说，问题是陈炯明曾经鼓吹一种对立的口号——“粤人治粤”——并开始发展出与其本省相关的明显的自由主义倾向。陈炯明坚持要进行地方民主实验。

我们知道，陈炯明在1921年支持了没有国民党指导的县长民选。孙中山认为，陈炯明的地方民治建议对国民党在广东的统治构

199

① 其他部门的员额为：总务，17；党务，26；财务，3。“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职员表”，1922。

② 黄季陆 1969—，12：492—496。

③ 《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等囑非常国会延期改组电》[1918] 1973—：91。

④ 张继 1951b：243。

成了威胁。但他不得不承认，一场支持三民主义中的民主原则的运动，是不能反对民选的统治路径的，即使人民尚未达到必需的政治自觉“程度”。“诸君试想”，他对广州特设办事处人员说：

广东人民有没有这种程度？在兄弟看来，恐怕他们没有这个程度；既没有这个程度而又要实行，是不是要闹乱子？但是民治主义是我们党里本来的主张，当然不容怀疑的。

孙中山被卷入了一种两难境地。他的疑虑很快因为一种补救性宣传计划的前景而得到缓解，该计划旨在提升选民的意识，使其达到必需的水准。他让特设办事处考虑，何种宣传将使选民以有利于国民党的方式行使其民主权利：

如何能够县长民选？我们要想将来不要债事，惟有积极操练三民主义，就以“党人治粤”。^①

孙中山设想国民党对省内每一个县、乡、村发起“操练”的能力，尚未在国民党的主义中提出来。这是他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之后的事情。此刻，孙中山认为，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使自己尽可能远离地方政治。他开始与其他军阀进行一系列交易，这在试图推翻北京政府的军事征讨中达到了顶点。

孙中山的宣传人员也与其军事政治战略方向一道，脱离了广州一地，转移到他在两广的军事基地上来。整个1921年，广州特设办事处在变更领导人之后继续运转。其主要负责人张继，在10月份被另一位著名国民党议员田桐取代，但在孙中山转而从事战争的时候，特设办事处的寿命被缩短了。陈炯明刚把陆荣廷从邻省广西赶走，孙中山就立刻前往桂林，在那里设立大本营，以便进军湘南。^②

① 孙中山 [35]：411。

② 罗家伦、黄季陆 1969，2：838，849，Clubb 1978：104。

党的宣传工作也跟着他来到桂林，1922年1月16日，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宣传办事处。^①田桐立刻从广州特设办事处调过来，协助管理桂林的宣传机构。^②孙中山强调，广西要有“一二百”党员广泛从事三民主义宣传，以与他曾敦促广东同志进行的“操练”相匹配。^③ 200
由于当地党组织的弱小，在广西成功的希望甚至比在广东还要小。孙中山最新的关注点，体现在他“向军民宣传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的命令中。^④与确保军队的忠诚相比，改变人民的信仰是次要的。的确，这一时期孙中山最引人注目的演讲，就是1921年12月所作的《军人精神教育》。^⑤

他的注意力也转向美国和日本的更远的听众，那里的记者们想知道他对正在华盛顿召开的国际会议的反应。华盛顿会议于1922年2月结束，同意限制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实力，并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孙中山并没有为此所动。他分辩道，北京政府——华盛顿会议的焦点——不是中国的合法政府，而是日本人的工具，所以，美国人不能期望这次会议将对其自身的行为产生任何值得重视的影响。孙中山对《华盛顿邮报》的一位来访记者说，他的远征目的，是为中国人重新取得中国，并实现其南方政府得到国际承认的合理要求。“广东合法政府北伐之目的，不在中国北方人民，”他宣称，“而在日本及为日本外府之北廷。”^⑥民众政治和议会政治都得到了运用，以维持即将到来的远征成果。

但在张继将广州特设办事处领导人一职让给田桐之后，国民党

① 罗家伦、黄季陆 1969，2：858；孙中山 [25] 961—964。

② 黄季陆 1969—，1：264。

③ 孙中山 [7]：451—455。

④ 孙中山 [25]：963—964。

⑤ 孙中山 [24]：477—506。

⑥ 孙中山 [38]：850。

201 议员们为自己找到了新的公开出路。张继来到上海，最终在那里设立了国民党第一个中央宣传机构。^① 10月4日，他又同时被任命为国民党北京执行部部长。张继让自己的两种身份发挥了良好效果，跨越了两个城市，使上海的新宣传机构与北京正在进行的宪法讨论协调起来。^② 随着他的返回，上海本部也开始宣称对两广的党组织拥有更大权威。到1922年2月，国民党本部已经任命了3名新的宣传干部，并公布了扩充宣传委员会的计划。^③ 4月11日，宣传委员会的管理章程得到了国民党本部部长联席会议的批准，两天之后，27名预期中的委员会成员接到了当选的邮寄通知。委员会的人事选择，体现了议会说客的强大力量，也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它在国家政治中的预期作用。宣传委员会中至少有15名成员，曾一次或多次当选为1913年以来召集的各省议员和国会议员。另外2人担任过南方行政机构的正式职务。^④ 许多人还可以说具有一定的宣传经验。8人曾做过报纸记者或在广州特设办事处从事过宣传活动，还有3名成员来自上海《民国日报》。^⑤

① 早在9月28日，张继就以上海本部宣传部长的身份签署了一份文件：《任陈东屏为阳关支部长状》，1921。但广东的记录则显示，他是在10月离开广东的。“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职员表”，1922。

② 罗家伦、黄季陆1969，2：839。

③ “中国国民党各省职员表修正稿”，1922，“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职员表”，1922。

④ 该委员会中的国会议员，包括陈白虚、丁惟汾、方谦、管鹏、杭辛斋、何乐山、李燮阳、凌毅、刘豁堂、茅祖权、彭介石、覃振、王宏图、王乐平和张继：宣传部公文底稿，1922—1923。徐瑞霖和黄展云是管理者：“民国六至七年大元帅府兼任人员职务姓名录”，[1918] 1973：286。

⑤ 陈白虚、管鹏、杭辛斋、茅祖权、覃振、王乐平和张继可以声明其记者经历，王宏图在特设办事处宣传部门工作过，叶楚伦、邵力子和孙镜亚来自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宣传部公文底稿，1922—1923。

该委员会和报界的联系并不局限于上海和广州。其成员之一杭辛斋，加入该委员会之前曾在北京和浙江原籍办过报纸。得到任命以后，他开始为北京的《国风日报》工作。覃振在湖南长沙经营一家日报。王乐平在山东做记者，管鹏当选后在安徽创办了《民治报》。^① 委员会成员的职业背景也显示了宣传活动的模式：它与全国各地已有的报纸重新建立了联系，并在任何需要的地方创办了新的报纸，主要向“违宪”的北京政府发动攻击，宣传国民党及其当选代表的对立主张。管鹏的兄弟管曙东，因为在《民治报》上无情攻击北京的曹锟政府而被捕入狱，在此事件中，这种模式得到了深刻的揭示。^②

5年来，孙中山及其议员同伴一直以“护法”来解释他们与北京政府的对抗，同时努力证明，为征服、巩固和扩展其南方根据地所付出的费用和痛苦是正当的。到1922年中，这一主题已经与国民党联系得如此紧密，以至于可被有效地转而针对孙中山自己。^③ 1921年冬天，当孙中山在护法名义下开始其最后一次北伐时，在华北发生了一些事件，试图夺走该术语的说服力和声望。10月和11月，北京政府总理靳云鹏，以及华北最有实力的军事首领吴佩孚，都找到了理由，宣称自己具备宪法正统性。其对手奉系首领张作霖，在1922年1月和吴佩孚相争，与孙中山结成军事联盟，随后又宣布支持孙中山所声称的对法统的维护，这使护法运动的政治变得更加复杂。护法再也不能将南方与北方政府区别开来，而变成了夺取华北控制权的派系之争。

5月15日，直系军队一部的总指挥孙传芳发布通电，自信地以孙中 202

① T. Chow 1963: 125—126; 黄季陆 1969—, 4: 14, 7: 250—253, 9: 278—281; 孙中山 [30]: 827。

② 黄季陆 1969—, 7: 250—253。

③ 李剑农 1956: 409—421。孙中山于1916年公开支持护法运动：孙中山 [19]: 359—360。

山的术语来论述后者。这位直系将军提议，沿着与南方政府所拥护的宪法原则相似的路线恢复原始宪法。吴佩孚向国民党议员表现出一种调和姿态，宣称恢复原始宪法不会损害直系利益，即使直系因此与南方政府开战。吴佩孚希望人们明白，直系正为国家的重新统一表现出宽宏大量的姿态。然而，孙传芳电报的结论，仍然清楚地显示了直系政策转变的优势，它宣称现在“南方政府已没有继续存在的理由”了。^①

这是一个漂亮的策略。支持直系建议的报纸占有压倒优势，在公众的喝彩消退之前，孙传芳紧接着又发出另一封电报，将直系的论辩逻辑继续延伸。中国北方和南方的总统都被要求辞职。徐世昌总统没有任何余地来抵制其反对者，于5月31日离开了北京总统府。^②但孙中山不愿让步。6月8日，他在广州召开记者招待会，艰难地试图赢回他再不能以武力强加于人的忠诚。无论如何，这种呼吁减弱了，并且就像对牛弹琴。陈炯明的下属叶举，将孙中山及其随员包围起来，然后于6月15日要求他和北京的徐世昌总统同时下野。最后通牒的措辞，是人民渴望通过恢复宪法的正统性，来实现国家的重新统一。这里利用了公众的同情，而它正是孙中山自己在过去5年护法运动的宣传中培育出来的，在1922年第二季度的公开电报和宣言中达到高潮。^③ 由于被认为是南方政府有名无实的领导人，孙中山可以不理睬敌手对法统的要求，但是，当他在盟友中缺乏威信这一事实暴露于所有人面前时，他也处于某种不利位置了。当他试图在广州抢在陈炯明之前时，他在北京的敌人，却使国民党自己关于宪法的宣传这一聚光灯对准了孙中山本人。

① 李剑农 1956：421。

② Nathan 1976：178—181。

③ 罗家伦、黄季陆 1969，2：877。

孙中山拒不同意下野要求，这为陈炯明提供了借口，6月16日，他下令进攻孙中山在广州的总统府。孙中山于8月仓促逃亡，留下的不仅有自己的武装部队，还有准备用于修订三民主义的珍贵书籍和手稿。广州总统府被洗劫时，这些东西都丢失了。但无论如何，孙中山都必须修订这些手稿。当他孤零零地步入上海码头时，他已经开始重新思考自己对自由主义宪政的承诺，重新考虑自己对民国旗帜的忠诚。从此以后，他将更密切地与苏维埃俄国、与中国共产党、与组织起来的“大众”一道工作，领导一场他以前从未设法发动过的新型革命运动。三民主义，以及孙中山在此基础上与自由主义议会派达成的契约，都必须彻底重写。 203

1922年8月孙中山到达上海时，广州非常国会的成员也来了，就像1918和1920年一样。不过现在，他们分担了孙中山所蒙受的羞辱，也迁就了他与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谈判的尝试。1922年9月4日，在张继的非正式领导下，一些担负领导工作的党员在上海主持召开党内高级会议，讨论并确认了党务的新转向。到目前为止，出席这次重组会议的最大群体是议员和前政府官员，他们有着代议政治和政府管理的广泛经验。会议代表中，至少25人拥有北京、广州或两地兼有的国会议席。另外3人与过去5年间的宪政有着密切关联。少数共产党员也参加了这次会议。^①他们商讨的结果之一，正如孙中山所提议的那样，就是经过投票，一致同意重组国

① 居正 1973-a: 32—35。国会议员包括陈白虚、丁惟汾、方谦、管鹏、杭辛斋、黄复生、焦易堂、李希莲、刘镡堂、刘积学、吕志伊、马君武、茅祖权、宋渊源、孙洪伊、覃振、田桐、王法勤、王乐平、王用宾、谢持、杨庶堪、张风九、张继、张秋白和周震麟。黄展云 1922 年曾在张继的宪法宣传委员会工作。王伯群曾于 1917 年在护法议会成立之前的约法会议工作，因而随孙中山来到广东；管鹏是安徽省议会议员。宣传部公文底稿，1922—1923；黄季陆 1969，3：11—13，7：250—253。

民党，允许共产党员作为国民党的成员加入。这一群体对于群众政治行为的支持，将在1922年底重组会议之后的数十年间，使国民党的团结和政策形成许多分歧。在随后的岁月里，国民党内部对共产党活动的一些最大胆的批评，即根源于此。^①

国民党议员也受到了北京一些事件的部分干扰。在1922年重组会议进行之前，由9名党员组成的起草委员会，就对重组的基础提出指责，因为半数党员去了北京，那里正在举行重开国会的谈判。^②其他人则似乎期望，（国共）两党间形成更密切的关系，将能加快他们返回北京的步伐。8月和9月，苏俄代表和当地的劳工运动积极分子，都在设法促成孙中山与吴佩孚控制下的北京政府达成谅解，由于新的国会将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召集，参与重组的议员从共产党人的议案中看到了一点机会，即提出自己的代议制主张。^③

204 国民党议员和共产党人的意见，都集中在议会代表制本身的问题上。此前直到重组会议的几个月里，共产党对议会政治采取一种调和态度，以符合第三国际的号召，即努力通过既有的议会来实现革命目标。在1922年7月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共产党决定将议会中的同情者组成“民主联盟”，帮助他们坚持其主张，扩大其宣传。^④国民党议员似乎已经相信，他们是最有可能与共产党结成“民主联盟”的候选者。^⑤所以，当孙中山（由于他自己的原因）提

① 来自1922年改组会议，又在1925和1926年加入西山派的国会议员，包括管鹏、黄复生、刘积学、茅祖权、覃振、田桐、谢持和张继。李云汉1966，1：448—449。

② 邹鲁1976：121—127；居正1973-a：32，Nathan 1976：182—186。

③ 蔡和森1922c：4—6；张继1951a：49。

④ 王健民1965，1：60—61。

⑤ 张国焘1971：234—235；Nathan 1976：178—195；邹鲁1976，1：129，194；蔡和森1922b：4—5。

议允许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议员们欣然同意了。张继更进一步，愿意介绍李大钊成为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①

这是重大的一步。当然，议员们在重组后的上海本部中保持着相当的权威，也继续控制着党的宣传机构。^② 国民党本部新任命的21名参议，有14人曾多次拥有过国会议席。^③ 他们并未在（上海本部的）执行机构中得到适当的席位，尽管其中一人受命担任宣传部副部长这一重要职务。^④ 参议和高级行政干部被授权参加中央干部会议，根据修订后的党章，它是制定党内政策的最高机构，而且议员们似乎构成了中央干部会议中的绝对多数。^⑤ 中央宣传部并未消除宪法论争。11月，副部长茅祖权议员召集暂居上海的大约150名议员，成立了一个新协会：重组讨论会。协会内部设立宣传小组，茅祖权将议员张继和陈白虚都吸收进来。^⑥ 重组讨论会事实上是国会通讯处的翻版，这个通讯处是1922年最后几个月间由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建立的，当时指定张继负责北京通讯处的宣传活动。北京会谈破裂后，他在上海获得了新的任命，确保了自己在更名后的机构中的职位。^⑦

① Meisner 1974: 220, 张国焘 1971: 250, 283, 汪精卫 1926b: 12。

② 任命干部由孙中山负责。邹鲁 1929, 1: 309—311。

③ 国会议员包括杭辛斋、黄复生、居正、刘积学、吕志伊、孙洪伊、覃振、田桐、王用宾、谢持、杨庶堪、詹大悲、张继和周震麟。“中国国民党本部现任职员一览表”，1923: 8—9。

④ 1923年1月26日，来自江苏省的国会议员茅祖权，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3（1923年1月30日）：51。

⑤ 从理论上讲，中央干部会议有31名成员（21名参议，5名部长，5名委员会主任）。事实上，提议的委员会很少建立起来。如果5名“委员会主任”也不能从现任议员中获取席位或得到任命，那么国会议员就构成了多数。邹鲁 1929, 1: 310—311。

⑥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1月11、18、20日。

⑦ 罗家伦、黄季陆 1969, 2: 931。北京联络处出版了一本关于三民主义的书，题为《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演说》。

议员们坚决留在国民党本部，反映了发展中的国共关系存在着严重问题。党内议员派在上海本部的政策和宣传机构中占有优势地位，这限制了国民党的能力，使它难以对关于新式民众运动的事件作出有效反应。例如，长沙流血事件激起了民众的义愤，起来反对日本在该城的利益，但国民党对此却保持沉默。6月1日，一艘日本军舰碇泊在长沙码头，下来一群水手，开枪射杀一名工人和一名教师。湖南督军赵恒惕试图安抚日本人在该城的利益。他逮捕了当地的游行示威者，宣布长沙的群众运动为非法。^①北京和长沙的其他一些组织承认了这一事件的意义，并进行了适当的宣传，但不包括上海国民党本部的宣传干部。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北京。^②上海本部对广州的发展也未给予足够重视，孙中山正在那里考虑另一次党的改组，这次改组势必夺走上海作为党中央所在地的历史地位，及其作为自由民主天堂的角色。上海本部的成员们对将来的事情一无所知。^③

然而，正是共产党人首先对其在国会中的“民主盟友”的行为表示忧虑。其想法的转变，主要出于共产党政策的转变。在改组大会同意共产党员参加国民党之后不久，共产党人就开始怀疑自己与北方的吴佩孚政府的交往。更值得注意的是，1923年2月，吴佩孚的军队以非常血腥的方式，镇压了唐山的一次煤矿工人罢工。在李大钊成为国民党员的决议墨迹未干之前，他就被迫撤回了对“能人”内阁的支持，而这正是他加入国民党的基础。^④共产党人的仇

① Li Jui (李锐) [1957] 1977: 270。

② 春木 1923a: 2—3。

③ 见本书第六章。

④ 张国焘 1971: 235—236。

恨原本可能针对吴佩孚，但它现在转向了国民党议员。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用其中文名字宣称，中国的议会对于民族革命而言，是一种过于鲁钝的工具。1922年11月，他单独把议员挑出来，对之进行严厉的公开批评。^①此时，在争夺北京国会的控制权当中，1917年在“非法”体制下当选的议员已经淘汰了国民党议员。共产党员张国焘又在其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主张承认“非法”的1917年原则。张国焘声称，国会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反革命机构，因此，否认1917年的派别，就是夺走了革命的明确敌人。他们如果不掌握武力的话，也许可以被忽略，“但是革命未成功以前，我们便须承认军阀官僚的存在”。^②6个星期之后，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将国民党议员与其他议员相提并论。在中国的议会体制中，他宣称，“所有的政团，无非是一般非阶级化的无业游民，单纯为自己的利害关系凑拢起来的”。陈独秀的补救办法，是设想一份全新的代表名单，他们通过选举程序而任命，代表有组织的团体意见和利益。^③ 206

1923年7月，马林再次斥责孙中山对党内“一成不变的政客和议员”的依赖，很得体地结束了这次攻击。^④

孙中山也很快加入了批评的行列。他那以宪法解决问题的希望，已经变成了绝望。^⑤最终，他于1923年1月发出宣告，强调将从有“许多人在北京”的宪政问题转向广州的“党治”。他把党治解

① 马林写作时用的是中文笔名孙铎。Bing 1973: 22—30, 孙铎 1922: 4—6。

② 张国焘 1922: 1。

③ 陈独秀 1923e: 1—2。

④ 孙铎 1923b: 7。

⑤ 包括国民党同情者在内的“能人”内阁，在11月稍后被孙中山的对手吴景濂推翻。见李剑农 1956: 430, 孙中山 [10]: 813, [28]: 863。孙中山对强权“政治”路线的主要批评是它不可靠：孙中山 [4]: 509。

释为民众宣传，或是“攻心……使中国四万万人民的心，都倾向我党”。^① 共产党人批评国民党卷入宪政政治，这也提出了一种新式的民众教育法，以作为议会自由主义的适当替代品。^② 马林在5月宣称，只有通过民众宣传，国民党才有望领导一场民族革命。国民党的注意力曾经过于狭隘地集中在“政客议员秘密的计划”上，今后应重新回到“有力量的、有系统的宣传事业”上来。^③ 民众教育法不再被假定为其他宣传形式的替代品。现在，它是自由主义宪政本身的替代品：一个纪律性的群众政党，将取代不受约束的自由主义国家。

自由主义政治、群众政治和“舆论”

国民党政策从自由主义到群众政治的重新定向，意味着系统地降低社会组织和国家机构中的“舆论”的重要性。当公民认同在不断发展的城市文化——这种文化位于家庭和宗族的私人世界与帝制国家的公共世界之间——中形成之时，自由主义代议制政体的早期试验，已经与城市社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了。正是在这里，在地方和省级的公共领域中，帝制国家建立了现存的舆论机构，以指导中国代议制政体的最早试验。^④

① 孙中山 [4]: 509—510。在其生命的最后几个月，孙中山重新燃起了对宪法解决的希望；孙中山 [2]: 735—738, [41]: 907。但共产党员仍然坚决反对；彭述之 1924a。

② 陈独秀 1923a: 1—2, 和 1923b: 2—3, 春木 1923b: 1—2, 蔡和森 1923: 8—9。

③ 孙铎 1923a: 5—6。注意孙铎 1923b 中的相似论述。

④ Habermas 1989. William Rowe 认为，帝制晚期的中国确实存在“公共领域”，尽管也许不是一个“市民社会”——中国还没有为它准备一个广为接受的术语。Rowe 1993: 139—157。

舆论机构在帝国行政中有着更长的历史。罗威廉（William Rowe）指出，在地方官员与地方名人协商执行帝国政策的行政惯例中，可以找到舆论的起源。^①这一说法为当时的观察者内藤湖南（Naito Konan）所证实，他这样评论清末议会的发展：“与人们可能想像的相反，中国首先并且主要是一个舆论的国家。”^②内藤湖南将舆论机构的力量追溯到帝国统治者作出和确认地方官员任命时的共同习惯：

“舆论”是起源于中国的一种表述，在中国强调的是个人在群众中的声望。当皇帝对地方官称职与否表示怀疑时，他会首先打听他们的声望是好是坏。他不在乎官员是否完成了任何事情。没有任何事情是中国地方官员可以在一届任期的三四年内完成的，无论如何，重点都放在个人的声望上。如果某人被称为“声名好”，这就意味着他是一个好的官员。

在强有力的本土先例的基础上，内藤湖南得出结论：中国已经为代议制宪政政体准备就绪了。^③

到1924年，国民党开始寻求变化。清末民初的国家，试图通过一个从县到省并最终到全国的链状议会体系，来吸收地方上的舆论。现在，国民党员则提出用政党机构来代替这些议会，从头再造地方社会，以确保庞大的舆论机构不再成为国家公共生活的显著特征。

国民党的新决议，反映了城市中更近期的发展，特别是1919年和1920年的城市青年运动，在这场运动中青年积极分子被劝告“到

① Rowe 1993.

② 引自 Fogel 1983: 69—70。

③ 同上: 68—70。

民众中去”，改变旧中国家长制的“封建”文化。该运动所指向的封建靶子，也包括古老的舆论机构。五四期刊对“平民”和“群众”给予了高度尊重，却把舆论视为新文化的敌人、偏见和迷信的领地，以及试图控制和主导公众生活的团体利益的庇护所。^① 他们的轻蔑态度，与这一时期议会派和大幅报纸更审慎的判断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很少赞扬群众，对待舆论却十分认真。

“宪政政府，”梁启超在1910年写道，“本质上是舆论导向的政府。”^② 清末民初时期，中央和各省政府承认报纸、商会、慈善团体在公众生活中的合法地位，这时舆论的地位更加明显，报纸则成为其代理人和受益者。报人们自信，报纸是“民主政体运行的核心组织”，自己的报纸反映了他们声称要代表的“舆论”多样性。^③

208 报纸的编排呈现出另一种多样性。除了社论之外，报纸还设有本地、地区和全国的新闻栏目、轮船航行时刻表、商业新闻栏目、时尚专版、天气报道、传统和现代产品的广告，以及种种每周一次的艺术、文学和社会问题增刊。它们在公开的商业环境中运作，这为顾客提供了广泛的选择，任何一种报纸都无法成为惟一的声音。与此相反，五四运动爆发后涌现出来的小期刊，则倾向于刊载论文而不是新闻，以及生动的编者评论，后者反映着不同杂志社的关注点，它们出于各种特定目的而成立。毕竟，它们在为意见统一而努力。而报纸则内容各异，形式开放，版面很大，拿在手中往往感到非常笨重；而小期刊，从任何意义上讲都更易于掌握，他们对信念的宣告更加宏亮，他们对原则、策略和政策的陈述也更为规范。

① 见化周1920。

② 引自Nathan 1976: 133。

③ Nathan 1976: 140。

随着时间的推移，报纸和期刊在国民党宣传部门中难以相安。国民党不仅资助遍及全国的小期刊，而且资助上海和广州的主要报纸。其上海《民国日报》是这一时期的大报之一。国民党还出版了五四时期最有影响的三种期刊：《建设》、《星期评论》和《觉悟》。

自1915年创办之日起，上海《民国日报》就是国民运动中议会派的机关报。这常常涉及到联合创办。其主编叶楚伦，与服务于政学系《中华新报》的记者们建立了密切的私人关系，并在1917年创办了上海记者俱乐部，使自己与其他派别的联系得以正式化。^①上海俱乐部为国民党服务，很好地促进了结盟派别的共同利益，并数次抵制了敌对政治群体利用俱乐部之内各派分歧的企图。^②实际上，俱乐部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在两年之内，叶楚伦就提议把它扩展为一个全国性的报纸协会。来自广州、长沙、汉口、昆明和天津报人的赞同，促使他召集五十多家省级报纸的代表，组成了全国报界联合会，于1919年4月15日举行成立庆典。全国报界联合会还适时将上海《民国日报》和其他报纸的联系网，扩展到共约80家报纸。^③

报纸与党派之间的模糊联系通常容易受到嘲讽，而且往往出于很好的理由。到1920年代，只有完全避开了政治的报纸，才有望保持其声誉。林语堂挖苦地评论道，备受关注的报纸《申报》，将其报

① 这份报纸是由陈其美资助，在叶楚伦建立的基础之上编辑的。黄季陆1969，7：101—102。Nathan 1976：131。陈白虚是增刊《中国新闻》的编辑，也是孙中山政党的成员。王新命1957：131。

② Nathan 1976：132，253—257；王新命1957：140—145。

③ 王新命1957：163—166。全国报界联合会成员协作的一个例子，是他们在1920年4月对阿拉罕宣言这一消息的联合反应。见《觉悟》，1920年4月14日。

209 道限制在外国问题、远程新闻，以及诸如“勤奋的重要性”或“真理的价值”等一般话题上，由此确保了自己的声誉。^① 国民党报人则没有这种谨慎。他们承认并欢迎报纸与政治利益之间的对话，至于说他们代表狭隘的“党派”而非“公论”，他们对此不屑一顾。叶楚伦说，一家报纸拒绝代表一个“党派”，这并不能代表什么，只意味着“几个编辑围坐在屋里用笔名写作”。他相信，衡量舆论健康与否的最好标准，不是报纸独立这一空洞的主张，而是在公共领域里争夺空间的党派的数目。叶楚伦感到遗憾的是，没有更多的政党和派别，以使每种报纸都可选择一个党派，公平地宣称要去代表该党派。从叶头脑中的自由主义趋向来说，问题不在于派系化的报人，而在于缺乏足够数量的需要被代表的派系。叶楚伦断定，“党派”报纸通过公开代表“党派”，将有助于刺激后者的形成。^②

国民党的《建设》当然是党派性的，但确实很少对党派的发展负责。《建设》与独立期刊《新青年》和《新潮》排在一起，是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五四期刊之一，每期发行量达到了大约 13000 份。与其他两份期刊相比，《建设》自其创刊号起，就大胆地坚持党派性的政治路线。与国民党的上海《民国日报》相比，《建设》更不愿向其对手作出丝毫让步。

选择“建设”作为刊名，反映了一种真诚的决心，即按照孙中山的革命哲学模式，来开展中国的心理、社会和物质建设。^③ 孙中山坚持“建设”这一名称，反对其同伴胡汉民所中意的“改造”，因

① 林语堂 1939：47。

② 叶楚伦 1922。

③ 孙中山将他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题名为《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孙中山 [21]：419—750。

为他把建设与革命连在一起，并且，他对革命的偏爱胜过改造。^①更确切地说，孙中山对破坏的偏爱胜过改造。他辩论说，如果没有建设这一补偿性的内容，那么，革命更具破坏性的方面也就没有任何意义。“建设是革命的惟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有破坏，更不必言革命。”这两个术语被不恰当地用于“社会建设”一章中，其目标在于“国家和社会的建设与改造”。^②

第二种党刊《星期评论》的使命，是唤醒“众我”意识，使之符合国民党大众民主派的政治。编辑沈定一发表了关于国内外政治、劳工、妇女和青年问题的新闻和评论，大量诗歌、小故事、文学批评片段，以及参与“新思想”讨论的文章。^③沈定一代表《星期评论》所写的创刊宣言，发表于1919年6月，它将更广泛的期刊政治建立在自我与社会之间的道德关系之上，这种社会被想像为单一的集体主体。他提出要唤醒并统一“众心”：

我说，我是我的我。一切世界都从心理的思想创造出来。这个心原是我一个人的心，却凡事人都有心，就都有我。合众我众心的思想意识，就是创造或改造世界的根本。天下无难事，全仗有心人，我问读报诸君那个人没有心？那个心里没有意识？

但是，并非所有的头脑都像沈定一自己那样，对痛苦的根源有所意识。他赞同康有为对其痛苦的同情，也和康有为一样，在这种痛苦中找到了道德反思的基础：

我要吃，非我不能替我饱；我要著，非我不能替我暖；我

① 吕芳上 1989：61。

② 孙中山 [22]。

③ 吕芳上 1989：56—57。

要住，非我不能替我安。衣食住三者，凡是我都少不来的，但是种田的挨饿，织布的受冻，造房子的没有好房子住，这种情况，究竟是我自己造成的么？或者是我心愿的？我若是不想，我的心哪里去了？

沈定一也意识到了流行人种志的残忍肖像，要求其读者不要像狗一样行事。“我若是要想，”他接着说，“我就不当存‘命该如此’、‘前世没修’这一种甘为犬马奴隶的心。如果存了这种心，那是连我都没了啊！”其个体的自我实现，为群体行为提供了基础：“一切众我的生趣，都是我心应该想着的，”他写道，“什么内政哩，外交哩，实足以减削一切众我的生趣。”沈定一敦促其编辑和作者，在以后各刊物中关注与这“众我”有关的那些事情。^①

在对唤醒意识和集体团结的强调之下，《星期评论》与五四精神的联系，比其母报更加紧密。上海《民国日报》免费将《星期评论》派送给其订户。在沈定一母亲的额外帮助之下——她帮助把它们邮寄出去——刊物取得了大约每期30000份的发行量。这被认为是所有五四期刊中最大的发行量。^②

211 第三种党刊《觉悟》，是上海《民国日报》众多增刊中最有声望的一种，也是惟一随母报每天出版的增刊。^③如刊名所示，这份刊物是唤醒事业——国民运动将这一事业投入了五四运动的旋涡中——的主要支柱。它的任务是唤醒刊物读者，使他们去关注新的群众政治的问题和风格，并代表国民党来主张这一运动。1919年6月16

① 沈定一1919；吕芳上1989：53。

② 据其编辑估计，《星期评论》的读者群，超过了五四时期其他一切出版物。“星期评论半年来的努力”，1919：4。吕芳上估计每期发行30000份。吕芳上1989：59。

③ 上海《民国日报》每周出版各种主题的增刊，代表着许多不同的组织。吕芳上1989：85—86。

日，《觉悟》以最时髦的方式首次亮相，当时是单独一版的小报。随后几年，它得到了迅速发展，1920年初增至两页，年中变成对开4页，到1925年逐渐发展为16页。从1920年7月起，它还按月发行汇刊单行本。与报纸增刊的通常运作方式不同，《觉悟》用方言写作，定期发表社论、演讲报道、特约论文，以及译文、诗歌和小说作品，还不定期开设社会问题和社会探索栏目。^①

从政治上讲，这份刊物与其编辑者的倾向相同。从一开始，它就欢迎“新思想”那彩虹般的联盟。但是，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25年的五卅运动，其编辑者的关注点，一直系统地限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特定目标上，其范围从全力支持苏俄政府，到无情批评基督教在华的“文化帝国主义”。随后，它又突然调转话头。1925年5月，主编邵力子与《民国日报》主编叶楚伦发生争吵，然后离开该刊物，并带走其激进的撰稿队伍。国民党前中央宣传部长戴季陶撰写了系列论文，论述中国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不可调和性；6月间，《觉悟》发表了其中的首篇文章，这宣告了该刊的新方向。随后几年，该刊始终为那些对广东党中央的激进政策感到幻灭，以及公开反对共产党员留在党内的国民党人保留着发言空间。^②

《觉悟》与上海《民国日报》编辑之间的糟糕关系，表明了我在此试图说明的报纸和期刊之间的区别。报纸与期刊之间的紧张，是表达于出版物中的竞争性概念的产物，更是期刊得以组织和产生的职能方式，这种方式与都市日报相反。都市日报和五四运动中的小期刊，都传递着一种标准化的、普遍的、由简至繁的交流观念，欧

① 上海《民国日报》每周出版各种主题的增刊，代表着许多不同的组织。吕芳上1989：84—85。

② 《觉悟》发表了戴季陶（1925b）和周佛海（1925a）的两篇文章。

内斯特·盖尔纳 (Ernest Gellner) 将之概括为民族主义的“核心概念”。^①但他们以不同的形式，表达了这一核心概念内部的细微区别，并暗示着政治组织的不同风格。

212 当国民党中央放弃自由主义议会政治，转而支持群众政治时，它避开了报刊杂志的派系政治。政党内部不再为竞争性派别留下位置，国家内部也不再需要相互竞争的政党。孙中山在世时，政党、国家和民族的统一，曾经物化为他自己。而 1925 年他去世以后，国民党便转向小期刊，以便提供党治国家的权威声音。

孙中山去世时，国民党的报纸在一片沉默背后退却了。很少有党员能宣称自己有权代表国民党，而那些能有一些权威的人，却又拒绝去代表它。这是一种令人敬畏的责任：现在，代表国民党就意味着代表民族和国家。广州《民国日报》（当时中央宣传部惟一的连续出版物）的编辑宣称，自己的报纸“不敢宣称代表国民党”。^② 在上海《民国日报》的办公室里，叶楚傖对报纸的派性基础的热衷，（现在）不再受到欢迎了。他那众所周知的自由主义观点，现在很容易使他受到指责，即他的报纸代表了国民运动内部的反革命派。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身份，指斥叶楚傖是阻碍前进道路的中国资产阶级反革命派的代表。叶楚傖拒绝听从广州中央党部的指示，这就足以招来谴责。^③ 随着孙中山的去世，毛泽东决心让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用单一的权威声音说话，清除所有的派别，使国家成为一个整体。

① Gellner 1983: 127, Deutsch 1966.

② 广州《民国日报》编辑曙风的评论，由对国民党宣传问题的两部分评估组成，刊于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4 月 18 日、24 日。事实上，当时涌现了大量刊物，声称自己拥有权威，但在《政治周刊》出现之前，没有一种刊物得到过宣传部的出版许可。见本书第六章。

③ 毛泽东 [17]: 4—5。

现在，正是小期刊的纪律给国民党中央留下了印象。取得了极大成功的党办《民国日报》，并不容易转变为鼓吹国民革命的群众政治工具。1924年，叶楚傖拒绝服从中央党部将其报纸变成宣传单的命令，因为这将使他失去赞助人、读者和信誉。^①广州也面临相似的情形，广州《民国日报》的编辑曙风表示，他乐意让报纸更加顺从，但又不得不承认，报纸是不易服从于革命国家所要求的那种纪律的。以其目前的处境，是绝对无法通过与市场上的其他报纸竞争来代表国民党的。

曙风试图解释他作为一个报纸编辑的尴尬处境，他将1920年代大规模的国民革命，比作过去10年里所出现的混乱不堪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他承认，国民革命和更早的那些运动一样，极度需要纪律和团结，但不能指望报纸来提供所需的指导。他建议国民党到别处去寻找典范，并极力称赞《新青年》所取得的成就，后者推

213

动了五四运动转向共产党的更狭窄的目标。

《新青年》是众多五四小期刊的先驱和典范。它始终有着自己的使命。1915年创办之时，它的使命是改善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在五六年里，该刊的焦点不断缩小，以至其内容几乎无法与中国共产党的计划区别开来。这种发展标志着该刊第二阶段历史的开始，它将广泛的文化和政治改革运动，分裂成了自由主义和大众民主两个阵营。^②当然，广州《民国日报》的编辑所欣赏的，并不是《新青年》的内容，而是《新青年》那种权威和一致，后者以此表明了对所属党派的原则和政策的赤胆忠心。这使《新青年》不仅与《民国日报》，而且与全国任何一种报纸区别开来。^③

① 见本书第六章。

② T. Chow 1960.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8日、24日。

这位编辑的观点，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中广为接受。在一年之内，他们设法创办了一份中央刊物，它承诺按照《新青年》的模式，来实现高水平的党纪。这一新刊物，即《政治周报》，由毛泽东代表国民党创办和编辑。此前不久，他已经掌握了革命纪律的原理，受到了国民党的催促，学会了对党和国家进行规范，以使二者的团结变得更加完美。

第六章 一个政党，一种声音： 国民党宣传部

我总是不大相信“解放”这一宏大命题。……当一个殖民地的民族试图从其殖民者那里获得自由，从严格的字面意义上说，这确实是一种解放行为。但我们也知道，在这个极为精确的例子中，这种解放行动不足以建构起自由的实践，对这个民族、社会和个人而言，这种实践将来都是必需的，他们将由此决定可行的、可接受的自我存在形式或政治社会形式。因此，我坚持自由的实践，而不是那些实际取代了它们的程序，在我看来，这些程序似乎不能自己决定自由的一切实践形式。

米歇尔·福柯，1984^①

“为什么要革命？”毛泽东在1926年间，“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②他是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身份写下这句话的。整个秋冬季

① Foucault 1984, 2—3.

② 毛泽东 [22]: 1.

节，他每天都花费很大一部分时间，去翻看各种报纸，审查来自出版社的最新期刊，聆听忠实的职员们所提交的关于公众演说的报告，同时注意肃清国民运动中任何抵制国民党政策的发言者。国民党以前从未有过如此规模的控制。“以前”，毛泽东在5月份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说：“检查只是从报纸上剪下一些东西。但从今年初以来一直在进步。”事实上，对错误声音的搜寻，因为他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长而得到促进，又因为该部门之下设立了一个特殊的宣传检查委员会，而得到了进一步推动。^①作为获得民族解放的条件之一，革命纪律被提了出来，而此时，毛泽东已成为国民党宣传工作的首席监督者。

215 孙中山经常说到革命纪律和民族解放之间的关系。1924年11月，他解释说，外来的欧美自由平等观念，最初曾经激励了中国革命，但早已失去了效用。中国在国民革命中所需要的，不是个人的自由，而是“团体自由和平等”。他进一步解释说：

或者是国家，或者是政党，就平等自由的界限说，或者是本国与外国相竞争，或者是本党与他党相竞争，都应该有平等自由。不能说在本国之内，或者是本党之内，人人都要有平等自由。

相反，“要革命成功，只有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自由”。^②但其如下想法仍未完全明确，即个人自由对纪律性政党的服从，应该成为公民服从于民族解放的范例。这是毛泽东对国民革命的特殊贡献。他决心整肃革命运动，以便整肃革命中的国家。

在国民运动历史上，宣传部是最近的一项创设。通过宣传部来

① 毛泽东 [21]。

② 孙中山 [11]：731—732。

实施日常纪律的想法，则是一项更伟大的创举。国民党以往的组织体系，更像是朋友的聚会，而不是同志的委员会，没有人想过要建立一个宣传部，直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孙中山意识到了组织化的群众宣传的潜力。^①即使这个时候，利用这种新式工具的，也主要是国民党内的议员。当孙中山惩戒了党内议员之后，党内几乎没有其他积极分子匆匆出来代替他们。结果，新的宣传部又复归于沉默，直至国民革命的到来。

孙中山在世时，这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他是全国性的重要人物。他想说的东西之所以重要，仅仅因为是出自他的嘴里。报纸通常很慷慨地登载他的言论，报道他的活动；国民党各级支部印行他的著作和小册子；负责海外华侨、农民、工人、青年、妇女和商人事务的党内各部门的职员，更乐于在没有任何人——除了孙中山本人之外——监督之下管理其宣传工作。孙中山在世时，宣传部的创建不怎么需要革命纪律，因而它也就很少关注纪律。在孙中山有效地控制着党务之时，宣传部是党内最不积极、最缺乏创造性的一个部门。

首席监督者的角色落在了孙中山自己身上。1924年，国民党按照列宁主义原则进行了改组，宣传部被授予检查和纠正党内出版物的专门职责；即使在此之后，孙中山仍然承担着责任，以使党内出版物保持正确的路线。^②1924年8月和9月，他在三个不同场合申斥了广州《民国日报》。8月1日，他强烈反对把一篇题为《少谈主义》的文章，直接排在其“民权主义”演讲之一的文稿之上。这篇对立文章的作者是孙镜亚，他为国民党的宣传而承担写作和编辑任务已逾10载。他很清楚，孙中山早年推崇的林肯、杰斐逊的自由主

216

① 孙中山 [39]：669—673。

② 《中国国民党周刊》11（1924年3月9日）：5—7。

义原则，和他那缺少自由主义含义的革命新观点，二者之间存在着冲突。但他的文章见报时，孙中山正在广州一座拥挤的大厅里发表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孙中山要求将其免职。一个星期之后，孙中山又责令同一家报纸停止发表题为《自杀公会》的系列文章，次月又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再次批评这家报纸，因为它错误地将其行政机构称为“军政府”。^①

此时孙中山有效地控制着国民党的宣传器官。从1923年冬和1924年的国民党改组，直到次年3月逝世，他不仅绕过了宣传部，而且将管理党务的整个委员制体系，变成实施其个人权威的“次等行政工具”。^②在准备离开广东进行第二次北伐时，他绕开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支持自己的政治会议，由此开始了许多影响深远的变化。宣传部主要的内部出版物《国民党周报》被取消了。它的几个常设栏目，转给了广州《民国日报》，汪精卫受命编辑这份报纸，以确保它不再轻慢国民党的领袖。^③

但孙中山的整肃并非血腥的清洗。他在世时，尽管他的家长制风格被写进新党章中的日常纪律制度，但党和国家内部的分歧还是表现了一些友爱色彩。从原则上讲，一旦国民党采用列宁主义的命令式结构，即使微不足道的轻率言行，也可以被视为对党纪的违犯。出席国民党一大的代表们要求宣传部“实现宣传和意见统一”，并责成它确保这一点：一切公开言论，不管其内容是什么，都必须以权威和一致的方式表达出来。^④但在这一早期阶段，承认宣传管

① 罗家伦、黄季陆 1969, 2: 1108。

② Shirley 1965: 71—74。

③ 《中央致广州〈民国日报〉禁刊自杀公会小说函》1924，《中国国民党周刊》24（1924年6月8日）：4；罗家伦、黄季陆 1969, 2: 1133。

④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办事章程》1924：4。

制的必要性，与意识形态倾向甚至党内干部的宗派联系都没有什么关系。革命纪律的诉求，只是为了确保孙中山个人不受轻慢。

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去世后，“克里斯玛”（魅力）型领导逐渐让位于官僚制纪律。5月间，国民党要人们在北京参加完孙中山的葬礼后回到广州，这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召集全体会议，以制定前述试验期的计划和程序。纪律被排上了首要议程。人们感到，总理（孙中山）去世以后，只有纪律才能保证国民党的继续生存：“总理在时，总理之人格为一切主义、政纲、策略之保障；总理既没，则保障总理之一切遗教者，惟有本党之纪律。”^①孙中山的指导作用消失后，中央宣传部人员开始更明确地感到了自己所负责任之重大，他们需要管制与国民革命相关的每个人的言论。实现“宣传和意见的统一”，适时成为宣传部的首要职能。

4月间，宣传部的广州《民国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它警觉地指出，过去几年里国民党出版物和宣传机构有了迅速增加。国民党已经习惯于按照如下假设行事，即党员的叫声越响亮，他们在社会上发行的出版物越多，自己在自由主义共和政体中产生某种影响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可是，一旦国民党从自由主义舞台撤出，向公众表达自己的主张就不再重要了。重要的是，国民党应该用一致的、权威的声音来说话。^②

汪精卫通过号召统一，宣称他个人拥有对国民党的领导权。他反省了国民党对1925年6月23日沙面惨案的反应，然后宣称，国民党的宣传缺乏领导和纪律。护卫沙面租界的英法海军军官开枪射杀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接受孙中山遗嘱之训令决议案》[1925] 1986：116—117。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8日、24日。

了五十多名示威者，将帝国主义的暴虐本性暴露在众人眼前，但国民党人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去极力表明自己对反帝运动的专有领导权。非常遗憾，国民党的宣传表明，它缺乏统一。汪精卫于是号召，国民党所有部门都应遵循中央发布的宣传方针。其他人认为，围绕孙中山去世举行的纪念活动，是一次宣传上的灾难。广州《民国日报》也承认，国民党人发表的大量宣言和讣闻，既未能维护领袖的尊严，也未能表明国民党的统一。^①到1925年夏，宣传部已经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党治国家需要一个单一的权威声音，以使其他声音黯然失色，甚至沉默下来。但将由谁来说话呢？

竞争的声音(一)：上海与广东

随着“国父”的去世和安葬，国民党内部的争论失去了友爱色彩，开始手足相残。在充满嫉恨的派系宿怨中爆发了意识形态分歧。但是，如果不同时考虑国民运动内部冲突的非意识形态因素，就很难理解孙中山去世后爆发的这场手足相残的斗争。持续很久的个人矛盾和组织对立，与意识形态分歧同样重要，后者分裂了上海和广州两地的党务机构。例如上海的党务机构，在1925年充当了国民党保守派的司令部，当时戴季陶在上海设立了自己的个人机构；第二年，分裂出来的西山会议派在此建立了自己的中央。在这两件事当中，使上海老党员感到愤怒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孙中山的专横态度，它表现在1923年冬国民党中央从上海向广州的迁移。^②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8日、24日，7月21日。

② 共产党领导人和顾问也对迁往广州表示关注。见李大钊1923：154—155；陈独秀1924a：687—688；孙铎[Sneevliet]1923b：2—9；Isaacs 1971：102—109。

由于种种原因，上海（党务）机构的高级干部们关注着他们的自主权。其一是上海本部在国民党等级体系中的地位。整个国民革命时期，上海的高级干部们一直认为，他们所在的城市才是党中央的真正所在地，并对孙中山的做法感到愤慨，后者通过大量未经商议的关键性决定，有效地侵蚀了他们的权力。1923年冬和1924年，孙中山并未得到他们的事先同意，就将国民党本部从上海迁往广州。这不仅是个人嫉妒的问题，也是组织程序的问题：根据党章，上海是国民党本部所在地。事实上，新的一年中被派往广州的首批国民党宣传家，即共产党员谭平山和国民党元老林云陔，都是由上海任命的。^①但从1923年3月起，广州开始更多地任命孙中山自己提名的人员，7月，孙中山又将共产党员陈独秀、冯菊坡和资深的国民党劳工运动活动家马超俊一道，增补进其军政府中的宣传委员会。他将该委员会的权力交给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②同时，孙中山也开始在上海任命干部。

从技术上讲，广州的宣传委员会是一个政府机构，而不是党务机构，所以超出了上海国民党本部的管辖范围。它还能够得到拒绝拨给国民党本部的资金。1923年1月到3月，上海的中央宣传部的总收入为1630元，该年份其余9个月的总收入不超过300元。7月间，上海的党务机构绝望地申请额外经费，这时，孙中山为其广州的宣传委员会提供了1000元资助，却拒绝了上海方面的同样要求。

219

① 《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8（1923年3月20日）：6。1923年1月，谭平山被上海党中央宣传部任命为广东劳工宣传员。《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4（1923年2月10日）：3，7（1923年3月10日）：6。

② 《国父全集》4：577，644和969。马超俊与广东机器工会联合，帮助建立了广东劳工联合会。李云汉1966，1：312。孙中山也提名自己的私人秘书黄昌谷参加该委员会。《国父全集》4：474。其宣传的实例包括谭平山、冯菊坡1923，冯菊坡1923。

8月间，上海的党务机构再也无力资助一份党刊，广州的宣传委员会则出版了16篇系列专刊中的第四篇，其中每一篇都印行1万份以上，并且免费派送。^①孙中山对其政府官员们的慷慨，惹恼了上海党务机构的成员，但鉴于党和政府之间已经分离开来，他们又没有正式理由去抱怨。

最使上海本部的成员们感到愤怒的是，孙中山决定在广州另行建立党务机构。8月10日，他在军政府内部设立了党务处。上海本部在一个星期之后才接到通知。它的反应很温和，要求“为了互利”与广州的新机构紧密“合作”。^②事实并非如此。当年年底开始的国民党改组，系统地降低了上海本部在新的党组织中的地位。1923年10月1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党务讨论会，电令上海本部为国民党的重要改组作好准备。他几乎没有提到细节问题。尽管章程规定，上海本部负有“全面管理党务”的职责，上海干部会议应该“安排党务，决定政策”，孙中山仍然授权广州的党务讨论会“讨论指导党务的适当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上海的党务机构收到一封信，被要求进一步合作，并贯彻以自己的名义作出的许多决定，此时，他们才正式知晓这次会议。^③

广州的国民党人绝不会不知道，他们正在侵犯上海本部的特权。当党的宣传被提交讨论时，广州小组提出一项动议，建议由广东省党部负责管理国民党与海外各党部的通讯。一个审查委员会认为，这项动议存在问题，因为如果它付诸实施，就会给予广东党部

① 《国父全集》4：742，《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21（1923年7月30日）：10—11，23（1923年8月20日）：7，“中国国民党宣传部收支簿”1923。

② 《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23（1923年8月20日）：7—9。

③ 《国父全集》2：534—536，《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纪实录》，无出版日期：“公文”2—3。

超出其党章所规定的权力。审查委员会提醒会议说：“上海本部是党内的最高监督机构。”但是，该动议的支持者并未为程序问题所阻碍。他们争论说，广东籍党员在海外党员中所占比例最大，所以应该期望他们与本省的支部联系。会议代理主席谢英伯指出，该议案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分裂。但无论如何，会议接受了广东支部负责人邓泽如的提议，即在广东支部的宣传部门内，设立一个华侨通讯处。审查委员会的疑虑实际上被忽略了。后来，上海本部放弃了“与海外华侨的一切联络”权力，邓泽如随即宣布，其广东支部已开始着手建立华侨通讯处。孙中山和广州那些雄心勃勃的非共产派党内干部发动了突然一击，作为这一行动的余波，上海办事处面临着种种这样或那样的决定。^①

220

随后在10月份，苏俄顾问鲍罗廷（Mikhail Borodin）到达广州，孙中山随即任命了一个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加紧国民党改组工作。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进一步侵袭了上海本部的领地。首先，它创办了新的中央党刊《国民党周刊》，其主编和编辑部人员，全都来自孙中山在广州的军政府。其次，它把广东现有的全部宣传机构，都纳入自己的羽翼之下，从而将政府机关转变为党务机关，使自己得以支配国民党在华南的所有宣传工作。孙中山的意思很明显，即让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一切党务负起全部责任。^②

① 《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纪实录》，无出版日期：“议事录”5—6，“议决原案”3—4，“审查员报告书”3。《中国国民党周刊》9（1924年2月24日）：12。

② 《国民党周刊》第一期刊于1923年11月25日。从第九期开始，刊名改为《中国国民党周刊》。徐苏中和谭平山一道，被从军政府宣传委员会挑选来编辑这份刊物，它和宣传委员会在同一幢房子里——孙中山在永山北路上的政府总部。见罗家伦、黄季陆1969，2：1018—1022；《新民国》1，第2期（1923年12月12日）：17；冯菊坡1923。《中国国民党周刊》4（1924年12月16日）。

得知广州正在进行的变革，上海本部时而感到忧虑，时而感到放松，最后彻底走向愤慨。国民党的高级干部们没有及时得到通知。孙中山电令各部部长，将他们的职务改称为主任，并将其员额减少了大约一半，每个部最多只设4名干部，通过此举，孙中山指示了一些未来的方向。当上海方面对其命令表示怀疑时，孙中山在10月17日回答说，这些“临时”举措将在不久之后导致“改组和扩展”。他忘了指出，扩展注定将发生在广州。他在前一封电报中告知上海本部，自己正在建立一个改组特别委员会，以监督上海自身进行的改组。这些消息的效果，迷惑了上海的党务干部，使他们无法作出有效反应。^①

221 关于国民党的改组，1923年11月，上海《民国日报》发表了一种奇怪的、很容易误导人的说法。该报道大致揭示了上海党务干部们当中的混乱观点。该报宣称，国民党的全国会议将在广州召开，但执行委员会仍将设在上海的传统党务中心。为了贯彻临时全国委员会的决定，这一新的最高委员会将立即成立。读者们被告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成员将由上海本部自己决定。文章结尾明确同意国民党改组，并认为党的中央机构“应该设在上海”。此文发表后的同一个月底，召开了上海的中央干部会议。在此期间，上海的党务干部被告知，上海显然不会在改组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著名议员和国民党宣传家张继表达了对这次干部会议的失望。“本部自应仍设上海，”他说道，“不宜移粤。”此次会议是在尖酸刻薄的争论中结束的。^②

① 孙中山为改组后的委员会任命了5位成员：汪精卫、戴季陶、廖仲恺、张继和李大钊。《国父全集》3：931—932。以前的职员层级从财政部的5名官员到总务部的10名不等。《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4（1923年2月10日）：9。

② 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1月9日；李云汉1966，1：227。

上海本部无法为它被降低的角色提前作点准备——“因为缺乏具体信息”——直到11月，孙中山才派廖仲恺作为其私人特使前往上海。廖仲恺试图让事情平静下来，但似乎因为误传了孙中山的意思，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据报道，他说将有两个中央机关，一个在广州，掌握南方三省党务，另一个在上海，负责全国其他各地。党务干部们一直保留着这种错误印象，直至次年1月国民党一大开始时聚到一起。^①此时他们才知道，上海执行部只是5个地区性执行部之一，每个执行部负责邻近数省，都受更高层的权力机关——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领导。11月交给上海本部审查、通过的党章草案，并未清楚地阐明这种安排。^②

次年年初，孙中山更进一步，削减了原上海本部所有成员的薪水。从年中开始，他们就没有领到任何薪水。1924年12月，沮丧的上海执行部成员致信广州中央党部，以全体辞职相威胁。“中央似刻意以偏执不公之心，对待本执行部成员，”他们抱怨说，“我们不明白，中央怎会如此捉弄本部。”这封信详细比较了广州的党务干部们所享受的可观待遇，后者依然有规律地按月得到薪酬，这封信最后要求停止减薪，并补偿到目前为止欠发的薪水。（广州方面）在回信的同时寄去了一小笔钱，这使上海执行部坚持到了下一年。但在没有盼到更多支持的情况下，从1925年1月19日开始，上海执行部

① 《上海执行部的成立及其工作报告》1924，罗家伦和黄季陆1969，2：1020，1042—1043。1月8日上海执行部交给广州的一份报告，展示了针对除南方三省之外——它们被认为是在广州的权限范围之内——所有省份的宣传方案计划。《上海执行部对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1924。

② 5个地区性执行部成立于北京、上海、汉口、哈尔滨和四川一个不确定的地点。罗家伦、黄季陆1969，2：1070，《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31（1923年11月20日）：7—14。

发动了一次党内干部的集体罢工。这看来是上海执行部国共两派行政干部的共同罢工。^①

222 即将离职的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伦，在向国民党一大提交的报告中，表达了上海党务干部的某种被出卖的感觉。由于国民党改组对其职责带来了破坏性影响，叶楚伦对广州的党务干部进行了激烈的指责。他报告说，1923年的宣传工作“完全没有成功”。惟一可以稍事弥补的，就是为将来提供了一个引以为戒的例子。他并未指责党务权力的新的集中。相反，他抱怨目前的局势削弱了他在过去的一年里担任宣传部长时的集权企图。叶楚伦承认，党权集中可能有助于广泛扩展宣传工作，并使其遍布全国，但他同时指出，如果没有明确界定权力的范围，任何边缘利益都有可能丧失。有必要在履行职责时尊重正式的权力和纪律。他提出，将来的宣传工作，应该按照“中央邮局及其地区支局”的模式集中起来。否则，“我们就无法评价宣传的结果，甚至也找不到宣传的内容”。叶楚伦建议，国民党的“中央邮局”应该设在上海这个中国的“舆论中心”。但是，舆论对广州中央党部而言并不重要。现在重要的是民意，它体现在孙中山及其新的党治国家身上。^②

叶楚伦号召更强的纪律，并不是要支持广州的新式党治国家的主张，随后几年里，他拒绝遵循自己的这一意见。这并非微不足道的轻率之举。他主持的上海《民国日报》，是真正发行全国的惟一党报，也是国民党在党外有相当影响的惟一出版物。1923年11月，北

① 这些因薪水而罢工的人，其中至少有7名共产党员：张廷灏、沈泽民、邵力子、施存统、杨之华、恽代英和韩觉民。《上海执行部索薪会议记录》1924—1925。从广州发往上海的一份无日期电文暗示，资金被切断是因为上海政治争斗的“乌烟瘴气”和广州的省财政状况。《廖仲恺致楚伦电》，无出版日期。

②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9：24，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1月9日。

京大学进行了一项学生民意测试，在这次测试中，《民国日报》在整体上的受欢迎程度，仅次于北京的《晨报》而名列第二，在女性投票者的评价中则位居第一。^①叶楚伧当然很在意该报的声望。他拒绝服从新的广州中央为该报任命的编辑委员会，在编辑方针上依靠自己的直觉，相信自己对中原地区党务和公众事务的判断，会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广州中央的决定更灵通、更明智。而且，该报基本实现了财政自给，对市场要求也很敏感。叶楚伧知道，其读者比广州方面所愿承认的更老练些，并且，作为该报的创始经理，他敏锐地意识到，上海不仅是一个政治中心，也是一个市场。所以他的编辑风格很少显得尖锐，其党派言论往往夹杂在一般的新闻内容中。该报对国民党改组作出的主要让步，是在每版报纸的周围留出空白，223用以发布国民党的政策和原理。^②

这类组织上的嫉妒具有意识形态含义。虽然叶楚伧同意国民党的反帝国主义、反军阀主义和群众导向政策这一总体势头，但他所担任的上海《民国日报》主编一职，却迫使他向它们妥协。叶楚伧一边注视着他那已有的读者群，一边关注着位于上海法租界内的党务机构，将看起来批评帝国主义“过火”的稿件和国民党文件退回，或者对之进行重大删改。他对“军阀”也很温和。与生活在一个地方军政府之下的其他许多上海居民一样，叶楚伧很难调和自己的矛盾，即在抽象意义上反对军阀主义，实际上却带有某种派别偏向。浙江督军卢永祥赢得了他的尊敬。1924年9月，卢永祥和江苏

① 朱务善 1924：8。

② 《中国国民党周刊》9（1924年2月24日）：5—6，13（1924年3月23日）：4，《上海执行部对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1924，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2月4日；李云汉 1966，1：334—336。

军阀——后者刚好与国民党在华北的宿敌曹锟结盟——发生冲突，在这时的争论中，叶楚伦站在了卢永祥一边。（支持卢永祥的）并不是叶楚伦一人。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和议会派都在《民国日报》上发表宣言，公开支持浙江的领导人，却无视国民党的纪律——所有军阀都是国民革命的敌人。叶楚伦的冒昧之举，激起了共产党人相当大的敌意。然而，他对国民党的传统和利益的感受，却与孙中山的情绪一致，就在叶楚伦的文章见报第二天，孙中山发布了支持卢永祥的宣言。^①

当工人骚动指向其主要广告客户，或者威胁到赞助国民党的团体时，叶楚伦也不能原谅这种骚动。南洋烟草公司是国民党的长期赞助者——就在最近的1922年，它提供了一笔为数5万元的捐赠——国民党则按照惯例，对其忠实赞助者给予坚实的政治支持。1924年9月，该公司在上海的工厂发生罢工，这时，它就像过去多次做过的那样，要求国民党提供帮助。叶楚伦还觉察到这样一种前景：如果报纸不能在争论中宣扬经营者的观点，或者为工人的主张提供了太多的空间，公司股东就会撤回其广告账户。1924年夏，该报面临财政困难，原因不仅仅是广州中央党部不愿资助上海的党务活动。无论如何，《民国日报》毫无保留地结束了对南洋烟草公司的支持。几个月后，叶楚伦对当地商业公司的同情得到了回报，永安公司提供了赞助，使上海的党务干部们得以领到薪水，当时广州中央则迟迟没有支付上海支部的开销。^②

① 于树德 1924：4；毛泽东 [17]：4—5；彭述之 1924b：680—682；孙中山 [41]：907。

我认为这篇以及其他署名“子任”的文章为毛泽东所作，见 Fitzgerald 1983：1—16。

② 《上海执行部索薪会议记录》1924—1925。1922年9月和12月，南洋向上海本部赠送了2万元，11月又借给它1万元。《中国国民党本部财政部报告》1923：25，34，36；孙中山 [19]：359—360；王新命 1957：164；彭述之 1924c：685；毛泽东 [17]：4—5。

国民革命开始之后一年内，叶楚伦及其报纸已破坏了国民革命的三条最重要原则：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促进群众运动。上海的政治环境相对开放而有保障，他在这种环境下出版其报纸，进行严格的商业预算，但在激进的广州党务官员看来，这些理由都不能令人信服，他们因其“反革命”立场而对他进行羞辱。尽管如此，他得到了戴季陶的暗中认可，后者名义上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他和叶楚伦一样，相信上海才是合适的全国宣传工作中心，并憎恶共产党对当地劳工运动的逐步控制。^①

一旦意识形态分歧——尤其是国民党在上海和广州机构之间的分歧——围绕这些组织上的摩擦渊源明确起来，它们就导致如下后果，即增强了上海执行部的自治情绪。上海的评论家们指责广州的“赤化”运动，反过来，他们自己又被指控为代表着国民运动中的反革命潮流。但是，仍然有必要区分“左”、“右”两派意识形态裂痕突显后的演变情况，以及导致上海、广州两地党务机构分裂的早期情况，并且，有必要承认孙中山在促成这两种张力发生发展中的作用。1923年初，孙中山几乎破坏了党内的自由主义议会运动，当年稍后，他又越过了正式的章程，未与上海本部协商，就开始了国民党改组的主要工作。^②虽然孙中山对党内的某些不良情绪负有个人责任，他从未对此作出解释，至少没有公开这样做。在国民运动中，每个党员和每个派别的命运，都与维持他的声誉紧密相连。孙中山叙述的某种挫折感，发泄在国民运动中的共产党员身上，从某种意

① 于树德 1924：4；毛泽东 [17]：4—5；李云汉 1966，1：334—335；戴季陶 [1925] 1959a：980—981。

② 早在 1912 年，同盟会已经形成了上海和广东两个派别，分别主张通过宪法或者军事路线来夺回权力。G. Yu 1966：67—70，79—80。

义上说，后者是他发动的国民党改组的主要受益者。

毋庸赘言，共产党人在国民党改组中并非冷眼旁观者。鲍罗廷和陈独秀起草了国民党改组后的一些最重要的文件，并一直操纵着国民运动中的派别矛盾，以使自己获益。^①共产党为自己的问题而苦恼，而且，意味深长的是，共产党内最主要的路线分歧之一，就呈现在上海和广州之间。1924年广州商团叛乱期间，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反对鲍罗廷和广东省委的建议，提议从广州撤回，甚至家庭纽带也无法压倒他们之间的矛盾。陈独秀在上海号召其同志放弃广州，
225 而他的儿子则代表广东省委，极力主张固守广州。1926年初，矛盾再次爆发，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及其（苏联）顾问决定，向叶楚伦、邵元冲和以上海为基础的国民党“中间”派其他成员发动攻击，而上海的共产党中央则建议，在将国民党人列为革命的敌人时，应更加注意区别对待。至少，对上海的共产党人而言，国民党保守派之间也有严重的分歧，而自己在上海与叶楚伦和邵元冲之间的关系，则依然是有益的。他们坚持这一点，从而导致自己与广州共产党机构间的疏离。双方在为1926年的北伐作准备时，在同一路线上产生了更深的矛盾。^②国共两党在上海和广州的机构之间发生的类似争论，确实表明两党内部在战略上出现了一种新的特殊情况。系统分歧的出现也引发了党纪的新问题。宣传机构需要应付意识形态和战略上的分歧，需要处理广布全国的党务机构之间产生的不一致。

当地区分歧与意识形态裂痕重叠起来时，这种问题就属于国民党的新式纪律机器的处理范围了。1925年6月，国民党从上海、北

① Wilbur 1976.

② 陈独秀 1924a, Luk 1990: 85—86, 107, 123, Brandt 1966: 91—113, Jordan 1976: 190—193。

京和广州的执行委员中挑选人员，去担任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委员，意在使跨省宣传网络更容易对广州中央宣传部的命令作出反应。但事实上，它却加剧了已有的紧张，甚至到了破裂的地步。在广州，共产党员谭平山借助自己新近获得的权力，出版了一份非正式的党刊《革命》，它得到了广州激进派的支持。该刊发表的文章称，国民党内某些分子是“反革命”，由此激怒了设在上海的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其他成员，尤其是戴季陶。盛怒之下，戴季陶邀请上海的另外两位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委员，即沈定一和邵元冲，与自己一道编辑了另一份非正式党刊，取名为《独立》。一个委员会都无力控制自己的成员，更不用说国民党对各地机构的约束了。^①

《独立》通过戴季陶在上海的私人住址发行，宣称其目标是“阐释和研究三民主义”。其编者希望保持党派、阶级和特定利益的独立，他们认为，这些因素玷污了孙文主义的纯洁性。但他们绝未远离已开始分裂国民运动自身的那些争论。该刊刊名就明确表述了他们在斗争中的前沿位置，即他们自称的独立、对派系代表的政治的高度超越。大约与此同时，戴季陶也撰写、发表了两篇著名的短文，即《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在这两篇文章中，他着力重申了独立于阶级和派系利益之上的大众唤醒这一呼吁。戴季陶强烈的独立立场，很快就与上海国民党人的派系同盟联系起来，并最终激起了国民党的全国性反共情绪。因此，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在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之间的席位分配，只是

226

① 《革命》第一期出版于1925年5月1日。戴季陶对该刊的反应，体现在戴季陶1925a的前言中。《独立》第一期出版于1925年11月1日。同年发表了戴季陶1925a和1925b。委员会另一位成员邵元冲，对戴季陶这两部有争议的著作公开表示支持。见邵元冲1954，2：919—930。

确认了派系差别和地理距离之间的均衡——保守派在上海发力，激进派则在广州施压，并进一步削弱了广州中央对广东以外的宣传活动进行纪律管制的希望。

竞争的声音(二)：宣传部的人员

戴季陶是国民党改组后被任命的第一位中央宣传部长。1924年受任该职务时，他担任孙中山的私人秘书已十余年，并因其有关马克思主义的雄辩作品，和许多关于民族状况的热情洋溢的论文，而在激进圈子里赢得了令人嫉妒的声誉。但他得以领导宣传部的日常工作，则是出于其乖僻的性格。

戴季陶是浙江人，却选择在上海居住。他从未对广东这一革命基地感到满意，也不喜欢让士兵到广西的山区作战，或是用喇叭在惠州和汕头这样的城市高声叫喊，以及被迫去辨别那些难懂的南方方言。就在被任命为宣传部长的16个月之前，在31岁的时候，出于一系列个人和事业上的失望情绪，他曾经试图自杀。路过的渔夫把他从水中拖了出来。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经常回到田园式的独居生活或者宗教胜地，直至1949年2月11日，就在共产党人率领军队发动对华南的最后一击前，他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曾一度与中国共产党创建者们关系密切。但是，当孙中山不听他的劝告，开始寻求俄国人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时，他就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焦虑之中。戴季陶为孙中山的固执而感到身心疲惫甚至幻灭。他的一些反对容共的朋友密谋挫败共产党人，另一些人则请求孙中山允许自己离去。戴季陶则将其注意力转向对（孙文）主义的阐释，以及那些打断了革命宣传的学究式问题。他在宣传部的岁月，主要因

为那些失去了的机会而为人们所记住。^①

尽管曾经有过机会，他却没能作出多少努力，将共产党人拒之门外。除了中央宣传部长一职，戴季陶还获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这一重要职务。他回绝了后一职务，并拒绝全权负责前一职务。7月，他又得到了政治会议的一个席位，这一会议不久将成为广东的最高党政机关。这一任命是孙中山本人作出的，除了戴季陶之外，还没有哪位以敌视共产党而出名的国民党人曾经当选过。但戴季陶同样拒绝了这一职务。^② 周恩来取代他接受了黄埔军校的职务，并在两年之内，在广东地方一级的党、政、军权力扩张中，产生了难以匹敌的影响。1925年，毛泽东又从戴季陶手中接管了宣传部，其间曾由汪精卫短期担任部长。当戴季陶最终开始抱怨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过度影响时，他对事情的这种变化应负的责任，并不比他的朋友们少。^③ 1924年，戴季陶一直往返于广州和上海之间，给朋友们发出杂乱无章的信件，尽量避开广州中央党部要他阐明自己意图的电报，最终把自己关进他自封的上海“戴季陶办事处”。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他回答说想继续留在上海“负责一家出版社或者报纸”。^④ 在戴

① 《中国国民党周刊》20（1924年5月11日）：5。1922年8月，陈炯明广州“叛变”之后不久，孙中山派给戴季陶一项没什么指望的使命，接着戴季陶作出了第一次自杀的尝试。Boorman and Howard 1967—1971，3：201，Mast 1970。

② 周佛海 1925a，罗家伦、黄季陆 1969，2：1103。政治委员会的全称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在孙中山领导期间，党员对政治委员会的违宪状态无能为力，但在他去世之后，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5年7月命令政治委员会，除非在紧急情形下，后者不得以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发布指示。但它仍然是事实上的决策者。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29日，Mast 1970：256，280—281，Shirley 1965：69—84，李云汉 1966，1：324。

③ 周佛海 1925a。

④ 戴季陶 [1925] 1959a：981。

季陶不定期前往广州的期间，宣传部的日常管理似乎已落到彭素民和宣传部秘书刘庐隐手中。

228 彭素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国民党组织者和宣传家，当时刚从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一职卸任。也许是他在1923年1月提交给孙中山的“党务条陈”使他得到了这一职位。孙中山在其条陈的页边空白加上点评，大意是说该条陈“十分准确，应向全体党员公布”。^①其原因不难理解。彭素民将国民党过去的幸，归咎于党员们未能坚持领袖的主义并将其付诸实施，并特别提到了与广州非常国会相连的党内议员和政府官员的表现，他们在其职位上并未为推进党治作出什么贡献。与许多同事一样，彭素民没有抱怨党的领导和组织的新方向，而是将党内问题的根源，归结为党员对领袖缺乏忠诚和奉献。他说，党的首要工作是向党员提供有关党的信条方面的指导，以确保他们服从孙中山的意愿。他建议，这可以通过“党校”中的三民主义强化训练来实现。彭素民还觉察到了学生、工人和党外其他社会派别对孙中山及其主义的怀疑，他断定，全国很少有人不会从关于孙中山教义的训练中获益。在党的领导、自由主义议员的失败、对群众进行三民主义训练的必要性等关键问题上，彭素民和孙中山的观点明显一致，原本可以使他得到机会，在党治时代领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但他的候选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最终确认。戴季陶于4月回到广州，在6月以前一直占据着他在宣传部的位。彭素民被调任中央农民部长，但仅仅5个月之后就去世了。^②

① 方刚1924；罗家伦、黄季陆1969，2：1101，1115；李云汉1966，1：270；《彭素民关于党务条陈》1923：5—7。彭素民于1921年编辑《中国国民党本部通信》，1922年又定期向党的《民心日刊》投稿。

② 《彭素民关于党务条陈》1923；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6月24日，Mast 1970：228；罗家伦、黄季陆1969，1：1085，1113。

一个次要的干部刘庐隐，使中央宣传部的管理有了连续性。他从1924年2月到6月担任宣传部秘书，6月至8月担任部长。刘庐隐生于江西永丰县，33岁进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时，他已经是一名合格的律师、社会学家和宣传家，在上海、美国和加拿大有着丰富的工作经历。他在复旦大学拿到了第一个社会学学位，在那里他积极参加学生政治，并开始与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上海的圈子保持联系。他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法学院接受了研究生教育。刘庐隐成为国民党美国总支部机关报《少年中国晨报》的主要撰稿人，1920年开始负责国民党在美国的整个网络。1923年夏，他来到温哥华，在那里担任类似的职务，负责管理加拿大总支部的工作。当年年底，他被选为美国方面的代表，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他就留在广州，在中央宣传部担任戴季陶的秘书。^①

刘庐隐在上海和海外的教育与经历，影响着他对国民党历史使命及其宣传功能的理解。尤其是早年对北美党务系统的管理，使他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热心宣传者。在美国时，他认为三民主义是惟一的、系统的“改革方案”，它吸收了东西方（文化）的精华，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独特优点，而又没有求助于暴力性的社会革命。刘庐隐把三民主义背后的启示，归结为博爱、互助的中国传统道德与美国宪法所尊奉的自由、平等原则的结合。他对传统道德的强调先于他的导师戴季陶，1925年，戴季陶才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重新

229

① Woodhead 1912—1939 (1929—1930), 2: 964; 戴季陶 [1925] 1959b: 971, 陈天放 1962: 25; 黄季陆 1969—, 10: 263; 罗家伦、黄季陆 1969, 1: 1092, 1101, 2: 813, 《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3 (1923年1月30日): 4, 和 19 (1923年7月10日): 7; 邹鲁 1929, 1: 318。

解释为传统主义民族主义的基础。^①

一开始，刘庐隐与戴季陶有许多共同之处。他曾经是戴季陶最热情的崇拜者之一，和他一样讨厌马克思主义，不信任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1925年离开中央宣传部以后，刘庐隐接受了在上海担任戴季陶私人助手的邀请，随后又在分裂出去的西山会议派占据了一个关键职位。和戴季陶一样，刘庐隐十分相信启蒙知识分子将中国人民从沉睡中唤醒的能力。在其职业生涯初期，他试图把加拿大总支部的注意力，从温哥华华人社区的商业中枢转移到当地知识分子的小圈子中来，但没有成功。^②他对知识分子在海外华人中的地位的认识，显然高于手工工人、菜农、店主——这些人的微薄的定期汇款，为国民运动提供了基本的经费支持。但刘庐隐的观点与戴季陶的信念是一致的，戴季陶认为，学者们将承担唤醒国人、让他们回到祖国家乡的责任。他们两人都坚信，个人道德修养和群众政治教育，为国家的新生提供了钥匙。

然而，刘庐隐本质上是一个自由民主主义者，一旦戴季陶开始接受更加独裁的民族主义时，他就注定会放弃对戴季陶的支持。两人对民初议会中诸派系的狡辩都缺乏耐心，但刘庐隐至少从未动摇过这种信念，即中国的政体，应以他所见的运行于北美的自由民主制度为榜样。1921年在美国演讲时，刘庐隐把国民党定义为一所“训练共和国公民的政治学校”。^③3年后接受中央宣传部的任职

① 《中国国民党全美洲同志第二次恳亲大会始末记》1921：90—100，Mast and Saywell 1974：73—98。

② 戴季陶 [1925] 1959a：984。1926年1月，刘庐隐被任命为脱离派（“西山”派）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织部长。李云汉 1966，1：449，《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25（1923年9月10日）：5。

③ 《中国国民党全美洲同志第二次恳亲大会始末记》1921：前言，Mast and Saywell 1974。

时，刘庐隐仍然承诺，要确保国民党始终是一所训练民主制公民资格的学院。他在国民党一大上挺身而出，为一项动议辩护，主张在国民党内部采用美国式选举制度，以确保最高层的比例选举制。当时毛泽东回应说，采用更具代表性的党内选举制度，将会危害革命党；宣中华则指责比例选举制是“资产阶级骗人之物”。刘庐隐对这两种说法很不满，但他仍在争论中失败了。毛泽东接替戴季陶成为中央宣传部长之后，他在国民党一大会场上的成功预示着进一步的挑战。但此时刘庐隐已经发现，对自由民主制度和实践的尊重，已使自己陷入了少数派的境地，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同样如此。^①

戴季陶离开党务中心转而支持军事领袖蒋介石的时候，刘庐隐最终与国民运动中的右翼煽动家们发生了冲突。刘庐隐与之分道扬镳，加入了胡汉民派。在1930年代初期，当胡汉民在南京政府中短暂得势时，他重新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直至1931年3月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起来。此后，刘庐隐开始厌恶蒋介石周围官僚圈子里的许多权势人物，包括蒋介石的首席顾问杨永泰。1936年10月，刘庐隐密谋刺杀杨永泰。他因杨永泰的被杀而遭到逮捕和起诉，在监狱里度过了抑郁的10年。^②

1924年，郎醒石和周佛海在刘庐隐手下工作。郎醒石是刘庐隐的老朋友、老同事，他们曾在旧金山和温哥华共同管理过美国和加拿大的党务。周佛海是通过戴季陶的介绍进入中央宣传部的，从日本学习回来后不久，戴季陶在4月份为他提供了这一职位。周佛海和戴季陶有许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没有醉心过自由民主政治，都曾

①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58—60。第五章讨论了这一情节。

② Boorman and Howard 1967—1971，1：290，2：165，4：19。

对马克思主义有过短暂的遐想，在回到“孙文主义”阵营之前，他们都曾参加过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讨论。周佛海对马克思主义的过早了解，曾经使他对历史唯物主义产生过兴趣。但这并未使他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只是强化了他的决心，即通过孙文主义的群众灌输来制止中国的阶级斗争。^①

对自由主义政治，戴季陶和周佛海远没有刘庐隐和郎醒石那么宽容；刘庐隐和郎醒石对马克思主义非常天真；彭素民则似乎停留于在办公室里讨论尊重和服从领袖的需要。尽管他们之间有着这些差别，但在保护国民革命免受“阶级斗争”政治的侵袭这一要求下，1924年宣传部的人事安排仍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他们明白，这意味着要限制中国共产党对革命运动方向的影响。他们对阶级斗争的共同不满，也使他们具有一种共同的信念，即对群众进行孙文主义的政治灌输，是中国社会进化的惟一真正的解毒素。次年离开中央宣传部以后，他们共同参加了分裂出来的西山会议派，相互之间仍继续保持联系。^②

- 231 1924年8月14日，汪精卫被任命为宣传部长，这预示着宣传部第二个运作阶段的到来。这涵盖了国民党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即从孙中山的二次北伐，到他的上海和日本之行以及他在北京去世。在广东省内，这一时期发生了蒋介石制止广州商团叛乱、对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以及省港大罢工等事件。在发生于这一时期的

① 罗家伦、黄季陆 1969, 2: 1092。《晴士敦中国国民党九年经过党务》1925；周佛海 1967a: 132—133；1967b: 138, 152—153；和 1925b: 1—9；《民国人物小传》1979: 144。

② 李云汉 1966, 1: 438—439。

纪念和运动、罢工和叛乱中，中央宣传部似乎只扮演了一个次要的角色。其他党务机构正在把革命从城市引向农村，同时也在制定和控制国民运动的宣传。周恩来正在指导武装部队的宣传工作，彭湃则在领导农民协会。冯菊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其他中共组织者，正在作出对劳工运动影响巨大的主要决定。中央、省和地方各级许多党、政、军机构，正在毫不犹豫地进行宣传。从这场风暴的涉及面来看，中央宣传部保持着沉默。

孙中山的去世给国民党人带来了直接打击，但其全部意义直到8月20日才充分暴露出来——当时他所信任的密友和为他排忧解难的主要助手廖仲恺，倒在雇佣刺客射出的枪弹之中。孙中山去世后，廖仲恺是国民党内的关键人物。孙中山在国民运动中对他非常信任，把最繁重的职务交给了他，包括广东省长、省财政厅长、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中央农民部长。他的遇刺，使国民党人少了一位领袖地位的主要竞争者，并使国民党分裂成许多相互竞争的派别。与此相一致，他的遇刺也标志着中央宣传部第二个运作阶段的结束。刺客开枪时，中央宣传部高级干部陈秋霖碰巧与廖仲恺在一起。陈秋霖身受重伤，3天后的8月23日，在医院里去世。^①

汪精卫从1924年8月到11月担任中央宣传部长，直到和孙中山的随员们一同前往北京。这几个月里他在等待时机。他既没有公开谴责共产党人在国民运动中的影响力的增长，也没有摒弃他们的对手。然而，在从孙中山去世之地回到广州以后，汪精卫开始寻求俄国和中共的支持，希望提高自己控制国民党的可能性。戴季陶此时已经离开中央宣传部，并将刘庐隐和周佛海一起带走。他们的继任者陈孚木、陈扬煊和陈秋霖，都几乎没有改变中央宣传部的早期方

232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925年9月5日。

向。但他们比其前任显得更愿向国民运动中的“革命派”妥协。这意味着与获得新生的汪精卫密切联合。^①

陈孚木进入宣传部几乎纯属偶然。他从1924年中期开始自己在国民党内的职业生涯，担任香港《新闻报》雇员，当时这家报纸在获得了国民党的巨额赞助后从陈炯明阵营中皈依过来。离开陈炯明以后，该报合伙人之一黄居素，便与国民党内的反共分子祸福与共。1924年10月，他迅速升任中央农民部长，他在这里面临着艰巨的任务，即清除共产党人在部内的影响。他勇敢尝试，却未能成功。他的主要努力，是试图用自己在《新闻报》中的雇员陈孚木来取代精力充沛的农民部秘书——共产党员彭湃，但这种努力失败了。结果，黄居素丢掉了在农民部的职位，彭湃则加强了对整个农民运动的控制。陈孚木未能通过这一流产的行动进入农民部，后来得到了一份容易得多的工作，即编辑国民党的机关报——广州《民国日报》，并阻止它转向赤化。在随后一年里，陈孚木开始同样关注共产党人在当地劳工运动中的影响，建立了革命工人协会，以将各个独立的劳工团体集成另一个社会主义组织。在国民运动的内讧政治中，他的政治忠诚难以说清。劳工史专家陈明铨在其著名评论中，抓住了陈孚木立场上的某种细微差异，将他视为“国民党右派中的左倾分子”。^②

① 罗家伦、黄季陆 1969, 2: 1154。关于汪精卫的疑虑，见汪精卫 1965, 1: 108。戴季陶和刘庐隐前往上海，而周佛海则留在广州，直至1925年成为广州大学教员。

② Chan 1975: 257; 《中国国民党周刊》31 (1924年7月24日): 4, 33 (1924年8月10日): 7, 34 (1924年8月17日): 6。又见《新闻报》，1925年4月1日，4月3日，4月14日，5月16日；张静庐 1957: 179；罗家伦、黄季陆 1969, 2: 1149—1150；李云汉 1966, 1: 275。陈孚木的社论在1925年2月之前出现于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3日的广州《民国日报》将他称为“主编”。

宣传部的另两位新人物陈秋霖和陈扬煊有着相似的背景。1919年和1920年，陈秋霖在闽南服务于陈炯明的宣传班子，在《新闻报》被国民党收买之前，继续为陈炯明在香港的报纸写稿。1925年春回到广州以后，他被任命为中央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受命为《新闻报》、广州《民国日报》和广州另一家报纸《国民新闻》撰写社论。他的社论很少对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表现出同情。4月间，陈秋霖在为《新闻报》写稿时承认，如果共产党人谨守国民革命的界限，就应该允许他们在国民党内工作。几周以后，他在《国民新闻》里又前进了一步。他说，一些共产党人为了“反革命”目的已经渗入了国民党，应该立刻把他们驱逐出去。陈秋霖也和国民党革命派的成员一起，被当时的一位观察者（他显然没有意识到国民运动中的拜占庭式派系政治）描述为“最激进的共产主义者之一”。^①遗憾的是，陈秋霖十分偶然地离开了宣传部，就像他偶然进入该部门一样。他就是1925年8月与廖仲恺一同遇刺的那名宣传部职员。

233

宣传部另一位新成员陈扬煊取代刘庐隐成为该部秘书，是在汪精卫于1924年8月擢升宣传部长之后不久。从1924年11月到次年5月，陈扬煊代替了汪，代表中央宣传部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会议。^②陈扬煊不是共产党员。在他的领导下，中央宣传部与革命纪念会共同开展宣传运动，该组织以其尖锐的反共立场而出名，其领导者就是广州最厉害的反共人物之一邓泽如。无论他们的个人政治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925年8月29日，9月5日；李云汉1966，1：376，《新闻报》，1925年3月1日，4月3日；《国民新闻》，1925年5月14日，引自“党部社论贴存簿”，无出版日期。

② 《中国国民党周刊》42（1924年10月26日）：1。1925年4月6日的一份文件将陈称为“代理部长”。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2月1日，1925年4月9日，5月16日。

倾向如何，三陈（陈孚木、陈秋霖和陈扬煊）只是次要的党内干部，他们在国民运动中的卑微地位，可以从中央宣传部在这一时期的低调形象中得到反映。在1925年5月第三次全会之前，宣传部也是国民党内惟一没有共产党人的中央机构。^①这或许可以说明它的了无生气。

1925年10月，毛泽东受命代表汪精卫管理中央宣传部，由此开始了国民党宣传工作的第三阶段，也是最积极的阶段。这一阶段，该部终于取得了应有的成就，尽管不仅仅是由于毛泽东的原因。毛泽东就任后立即进行了许多创新，规范宣传程序，邀请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共同监督宣传的运行，以便为国民党的宣传工作注入命令和纪律。几个月前，共产党人已经首次进入了最高宣传机构，于树德、张国焘和谭平山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下的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委员。他们3人在该委员会里的影响，由于戴季陶、邵元冲和沈定一的存在而得到了平衡，后3人对国民运动中的共产主义活动持敌对态度。作为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则骑墙于这种分裂之上，相信自己可以挑拨两派，使自己保留代表全党说话的权力。^②尽管如此，7名委员中事实上只有两人留在广东。共产党员张国焘和于树德，234 分别在上海和北京担任他们以往的职务，而3名非共产派戴季陶、邵元冲和沈定一，则全部去了上海，在那里建立了另一个国民党宣传机构。

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成立于广州全会之后不久，孙中山去世以

① 邹鲁1929，1：358；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1日；《国父全集》4：865；李云汉1966，1：383；Mast 1970：228。

② 7月末，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按照汪精卫的要求，正式改名为宣传委员会，并由其中央宣传部直接领导。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21日，7月2日、18日。

后，这次全会被要求去规范国民党，并“保障总理之遗教”。四五月间，孙中山的随从人员悲痛地从他去世之地返回广州。离开北京之前，他们召集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但北京政府的反对愈益强烈（它迫使国民党的北京《民国日报》关门），广州留守人员也关注着在北京召开全会的是非曲直，于是，代表们在5月中旬回到广州重新召开全会。连戴季陶也回到了南方。他被赋予重任，起草将由全会发表的正式宣言和训令。他极力把国民党最近的成功创新，归结为对民众进行的三民主义和国民党教育，并力劝其同志在宣传工作中付出更大努力，以将民众“唤醒”。^①

戴季陶起草的《关于接受总理遗教的训令》草案，把孙中山的意识形态遗产界定为一个整体，包括孙中山创作或批准的7部经典作品。它们永远不应受到抵牾或挑战。第三次全会还重新确认了如下政策，即共产党人只有“信仰总理之人格，接受总理之遗教”，才被允许加入国民党。这些将构成国民党的“纪律基础”。这次全会的文件强调了纪律，对于国民运动中正在浮现的内耗性冲突来说，其重大意义是毋庸置疑的。那些敌视共产党人存在的派别，立刻将这些文件付诸实施。^②

广东以外的省级党部感到，自己可以从一个安全的距离去攻击激进分子。沈定一一直在等待，直到他回到上海，得到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委员的头衔，并动员浙江省党部发表了《关于宣传工作中应反对阶级斗争之训令》。反过来，他关于阶级斗争的指示，又变成

① 李云汉 1966, 1: 364; 罗敦伟 1963: 19; 戴季陶 [1925] 1959a: 983, 《第三次全体会议重要决议案》[1925] 1973— ; 130—134。

② 这些著作是 (1) 《建国方略》，(2) 《建国大纲》，(3) 《三民主义》，(4)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和纲领，(5) 1924年9月13日宣言，(6) 1924年11月10日宣言，(7) 孙中山的遗愿和遗嘱。《第三次全体会议重要决议案》[1925] 1973— ; 23。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 117。

235 了与戴季陶相关的国民党人的结合点。浙江省的训令源于戴季陶的全会文件，它坦率地指出，宣传的恰当功能是改善而不是恶化社会阶级之间的分歧。这一原则被扩展到国民运动自身的内部冲突，后者被定义为不是社会阶级之间的斗争，而是觉悟程度高低不一的党内干部之间的斗争：“革命与反革命之分，不在于阶级之属性，而在于认识与觉悟。”^①觉醒这一观念获得了新生，成为解社会革命之毒的药剂，和防止党内政治分裂的工具。

一旦党内分裂被解释为社会分裂的反映，这两个问题就开始重叠起来。这种联系与其说真实存在，不如说更具象征意义：阶级出身很少与革命阵营内部的政治分歧直接相关。在国民党一方，孙中山认为，工人、农民和其他下层社会群体，可以通过比自己优越的人的帮助和指导而获益。“（工人）团体中的领袖，也有很多不是工人的。”他在关于民权主义的第三次演讲中说道。在这些人中，“真为大义去替工人出力的也是不少”。^②共产党的劳工组织者也有孙中山这种成见。事实上，广东工人组织的领导人确实有着明显的工人阶级成分，但并未因此而显得更加激进。当然，当地工人代表的无产阶级出身，并不能抵御中共组织者的侵袭，后者具有无产阶级利益的自觉意识，认为自己有资格控制省内的工人运动。共产党的工人组织者指责说，共产党的工人阶级竞争对手是资本主义的无知受骗者。^③

在这两个例子中，革命与反革命的区分，都在于他们的意识水平——不是富有或贫穷，权力或无能。在共产党人心目中，自己与国民党干部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每个人都觉悟到了一种历史必要

① 李云汉 1966, 1: 411—412。

② 改编自孙中山 [31] 241。

③ M. Chan 1975。

性，即围绕“阶级”或“民族”利益动员人民，以获得中国的统一和独立。所以，浙江国民党人的目标不是某个特定的社会阶层，甚至也不是共产党内自封的阶级代表，而是共产派知识分子兜售的一种新型政治战略，用以替代孙中山心目中的那种唤醒。孙中山希望唤醒国家，其意思是在他身后结成一个尽可能广泛的社会力量联盟。共产党人对盟友的挑选正变得更有选择性，也更倾向于把特权阶级的政治“代表”树为革命的敌人。

早在1925年1月，共产党就决定利用国民运动内部的派系矛盾，以便孤立反革命阶级的代表。国民运动中的阶级斗争及其所谓的代表，很快就被视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它需要仔细培育，以确保它按照历史的期望来发展。所以，中共四大闭幕宣言号召，一切“工人、农民、手工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反对资本主义。这个社会联盟需要共产党指导下的觉醒：“中国共产党将使中国解放运动由自然的历程生长进于觉悟的状况。”^① 236

为了遏制正在膨胀的阶级“觉醒”潮流，沈定一和戴季陶开始遍查孙中山的教义，用文章和诗歌来说明孙中山设想过另一种不同的觉醒。他们所参阅的那些作品——第三次全会将之确定为国民党的核心教条——并没有提到阶级斗争，只表达了对它的谴责。因此，他们坚持认为，国民党全会的训令禁止任何一种觉醒，但“民族”觉醒除外。^② 随后，群众觉醒在策略上的差异，就成了国民运动中区分敌友的基本标准。

尽管戴季陶在5月全会上言论方面的竞争中获胜，他在宣传上的成功仍然是短暂的。各省的朋友联合起来支持他，但如果论及中

①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67，Luk 1990：96。

② 孙中山 [31]：408—444。

央宣传部的人员配备，以及对广东呈现出的事态模式的反应，获胜的则是阶级觉醒。我们注意到，除了汪精卫以外，谭平山是惟一留在广州的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成员。谭平山也是国民党广东省党部的设计师，他对省内事务的兴趣列入了宣传委员会的议程。该委员会的第一个宣传计划是一项预防伤害的训练，以恢复国民党行政的信誉。他试图抑制最近的滇军和桂军叛乱带来的政治影响，缓和来自云南邻省的强势军阀唐继尧的威胁态势。他还设法将对地主民团的攻击纳入其宣传计划，它们已开始构成可怕的威胁，妨碍了国民党在广东本省的权力扩张。^①

1925年10月对毛泽东的任命，确认了这种新的趋势，即共产党人对国民宣传方向的影响正在增长。毛泽东曾试图在湖南省建立农民运动基地，这一努力失败后，他跑到了广州。事实上，在从受湖南省主席赵恒惕之命捉拿他的武装巡逻队中逃脱以后，他很少需要再次逃命。9月29日到达广州后不久，他接受了与汪精卫和广州《民国日报》编辑陈孚木合作的邀请，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宣传工作报告，这次大会计划于次年1月在广州召开。10月份第一个星期，在汪精卫的要求下，毛泽东受命实际掌管国民党中央宣传部。²³⁷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他一直是该部的实际负责人，2月5日又得到汪精卫同意，让他继续管理宣传部直至下一年度。^②

① 李云汉 1966, 1: 270—271; 罗家伦、黄季陆 1969, 2: 149; 邹鲁 1929, 1: 355—356; 《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第一期宣传计划稿》1925。

② 1925年10月2日或前后，按照汪精卫的要求，毛泽东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1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9日、14日。1926年，毛泽东在宣传部的代理人是另一名共产党员、著名小说家沈雁冰（茅盾）。沈雁冰在2月份短期代替毛的职务。《政治工作日报》，1926年2月22日。又见 Schram 1967: 81—97; 李云汉 1966, 2: 474。

中国的史学家通常忽略了毛泽东个人发展中的这一阶段，将其视为农民动员的短暂转向。关于他在该部的额定工作的记录，现在仍然难以找到。^①但是，毛泽东对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领导，似乎是他走向革命导师过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毛泽东在该部的任期，是该部有史以来最长、最稳定的一段领导期。他领导该部长达8个月，直至1926年5月，为了服从二届二中全会关于将共产党员逐出中央机关高级职位的决议，他才辞去在该部的职务。该部分别经历了几个领导人，即戴季陶和可能的彭素民（断断续续的5个月）、刘庐隐（6个星期）、陈扬煊（代表汪精卫6个月）和汪精卫本人（分成几个时期的8个月）。毛泽东的任期与该部管理的显著改善是一致的。戴季陶当然未能履行其职责，但汪精卫1924年8月继任后，也未能改善该部的表现。汪精卫于11月和孙中山的随员一同前往北京，把缺乏有效领导的中央宣传部留在了广州。在毛泽东被任命之前，该部一直自视为一个不愿代表革命运动大声发言的中央党务机构。^②

共产党领导人有权对毛泽东的管理风格表达意见。在他获任前几个月，共产党决定超出国民党的监督和纪律范围，通过自己的机构从事宣传，从而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从1925年6月起，共产党人发表了一大批“对目前形势的评论、对特定社会部门或普通群众的呼吁、贺电、（致国民党的）公开信以及一般宣言”。^③就共产党的

① 1992年4月7日与李锐的会谈。Stuart Schram始终注意到了这一时期毛泽东对纪律的关注。Schram 1967. 奇怪的是，甚至由毛泽东起草并于1926年1月列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议程的关于国民党宣传部活动的公开报告，都无法在大学或公共图书馆中找到。我要感谢哈佛燕京图书馆的Eugene Wu帮我寻找这份文件。

② 《第二次全体会议重要决议案》[1926] 1973—：46—53，尤其是49。毛泽东被顾孟余替代。李云汉1966，2：507，512—513。

③ Luk 1990：98.

考虑而言，毛泽东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提升，不是要扩展共产党的宣传范围和栏目，而是要使国民宣传与自己的宣传相协调，并约束那些看来偏离方向的国民党员。

238 两党都一致认为需要团结和规范——实际上，甚至赞同其实施方式。使他们产生分裂的问题，是即将由宣传部发动的唤醒的性质；确切地说，就是谁将代表国民党说话，谁将受到约束。围绕着创办一个新的权威性党刊的讨论，这些问题首先被表面化了。在毛泽东接任之前，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宣布，谭平山、甘乃光、陈延年（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之子）将以国民党的名义创办一家“中央言论刊物”。他们的动议未得到该部赞同，5月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被迫收回成命。虽然该部发现了这一问题，但它却尚未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意志。^①

毛泽东提供了这种意志。10月份一接管该部，他就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计划，打算创办一份新的中央刊物，名为《广东杂志》。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有立即作出决定，而将此事提交政治委员会处理，依照孙中山本人开创的先例，后者仍然对敏感的政治决定负责。政治委员会同意创办一份新的国民党中央刊物，尽管不是完全沿着毛泽东所设想的路线。毛泽东提议的刊名《广东杂志》被放弃，改为《政治周报》，杂志的负责权被赋予政治委员会本身，而不是给予中央执行委员会。但是，中央宣传部仍然控制着该杂志的编辑和出版。毛泽东被任命为主编。^②《政治周报》最终于1926年出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8日、24日和5月9日。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3日；王忠1957：50—51。关于毛泽东在国民党宣传中扮演的角色问题，王忠的文章容易令人误解。但由于《政治周报》与政治委员会之间有记录的联系既没有提高也没有损害毛泽东的地位，我认为他这一看法是准确的。

现，它标志着国民宣传的协调和纪律的转折点，以及国民党内政治权力平衡的进一步转变。政治会议变成了中央宣传部的正式支持者，共产党人被获准去决定将要呈现的纪律方向。

宣传的协调和规范

1925年，国民党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协调和规范其宣传。首先是更换中央宣传部的职员，以便为毛泽东、茅盾和其他人腾出位置，他们更加同情政治会议的激进政策。结构性的调整也被引入，以整合各级党、政、军机构的宣传。这些举措的最大共同点，就是创建联合委员会，让几个部门的干部为了特定计划而在一起工作。这个主意并不新颖。一年以前就成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使农民运动与国民党中央农民、工人、组织和宣传部的宣传工作相协调。^①但直到1925年，联合委员会才成为党务管理的普遍形式。

孙中山的去世，催生了新一年里的第一个联合委员会，当时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吸收新党员，以把民众对已故总理的同情引向一场发展党员的运动。宣传部和所有其他中央机构的代表，组成了一个附属宣传委员会，宣传工作由此得到了协调。当年6月，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成立了，以便出现问题时对宣传工作进行协调。当年10月成立了党史编纂委员会，集中了中央宣传部和广东省宣传部的才智之士。另外两个专门的宣传委员会成立于1926年2月和3月，其特定目的，分别是协调国民大会和孙中山逝世一周周年纪念的宣传运动。^②

239

① 《中国国民党周刊》22（1924年5月25日）：5。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15—18日，4月22日，10月30日，“国民会议事件资料剪报贴存簿”1926，《宣传部工作报告》1926：11。

这些联合委员会当中，作为其先驱的农民运动委员会最为重要，它重建于1926年3月，目的是在中央农民部的干部、中央宣传部的毛泽东和广东省宣传部的甘乃光之间建立正式的联系。农民运动委员会的重建，立刻导致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两个关键决议。根据大会的特别规定，农民运动被赋予革命事业之先锋的职责，党的宣传要服从于农民运动的需要。一项关于宣传的关键性大会决议，要求宣传部努力使农民阶级成为国民党的重中之重。第二项决议是关于农民运动的，它号召省、地区、市级宣传机构和中央农民部之间进行更密切的协商。两个议案的目标，都是通过中央农民部来协调国民党的宣传工作。^①重建后的农民运动委员会试图确保中央农民部遵循宣传部的指导方针，而各级宣传部又要跟上农民部自身的发展。这种发展具有更广泛的含义。首先，农民部按照群众组织的要求来指导其宣传工作。农民运动委员会则努力使党内宣传机构熟悉农民部群众动员试验的成果。通过这种新的延伸网络，成功的试验被转化为标准的运作程序，遍及国民党的全部活动地区。

党内交流在1925年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国民党中央曾经习惯于通过发表公开宣言，使其附属各机构和各支部随时了解（自己）针对当前出现的各种问题的政策和思想。当这些宣言得到孙中山赞同的时候，它们通常可以获得预期效果。但孙中山去世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公开宣言那种概括性说明的口吻，助长了对中央政策的相互冲突的解释。^②国民党人没有采取什么举措来解决这一问题，

① “中央党部重要文件”1926：7；Olenik 1973：91—92；《关于宣传决议案》1926：77，《农民运动决议案》1926：60—61。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4日。

直到毛泽东接过舵轮，一种更具体的内部交流形式才开始运行。一种名为宣传大纲的东西，提供了现成的分析和既定的口号，供其发布机关管辖之下的所有党、政、军机构采用。

我看到的最早的宣传大纲，是1925年秋周恩来领导的总政治部为第二次东征而设计的。毛泽东从周恩来那里学会了这一招。11月，当获胜的部队列队回营时，宣传部改编出了新的宣传方式以供民用。11月27日，毛泽东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一系列宣传大纲中的第一份，请求后者予以批准。其主题是华北的反奉战争。该大纲分析了这次战争背后的原因，指出了国民党所有机构将要进行的适当的准备工作，最后提出了9条口号，供所有相关的宣传工作采用。随后，在1925年和1926年间，为协调宣传运动而建立的各种联合委员会发布了各种宣传大纲。^①

国民党军事当局发布的宣传大纲的详细和精确程度，民事宣传机构很难与之匹敌。革命军队中管理宣传工作的最高政治当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设计了一套定期发布宣传大纲的制度。1926年3月，出现了一个按月定期发布的系列宣传大纲的原型，它不仅规定了哪天该说些什么，而且规定了在什么时候说，从而在整整一个月之前，就预先安排好了武装部队中的宣传事务。无论恰好置身何处，途经军队政治部听力所及范围内的每一位士兵和平民，都将在相同的时间被告知相同的事情。多年以后，国民党或共产党内相应的民事机构才取得了一些可以与之媲美的成绩。^②

① 《中国国民党致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925：8—11。例子之一是刊于《政治工作日报》1926年2月1日的二七纪念协调处的宣传大纲。这一运动的协调见“二七纪念运动”1926：63—65。

② 《政治训练部实施宣传大纲汇编》1926：38—52。

国民党所采用的纪律制度似乎也来源于武装部队。要巩固国民党部队中的军事交流和宣传的合理效率，就在于（建立）一套令人难忘的制度，来管理、调查和规范言论与行为。党政机构需要建立类似的纪律系统，以看到相似的结果。在国民革命的早期阶段，国民党的权威基本局限于广州市和几个模范县以内，那时几乎看不到这种希望，即在整個社会普遍实现严格的纪律。但是，在国民党内部厉行纪律的余地却相当可观。事实上，宣言、宣传大纲、中央出版物和联合委员会这些创举，只有得到党内规章、监督和纪律的强制推行，才能发挥预期效果。于是，国民党成了一个测试纪律程序的实验室，这些程序后来被实施于广东人民身上，并最终实施于中国人民身上。

1925年3月孙中山去世以后，（国民党）逐渐引入了日常纪律程序。当月，中央执行委员会撤回了对其在香港的日报——《香江晨报》的财政支持，以示对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的抨击。主编被撤职。该报在云南军阀唐继尧帮助下继续出版了几个月，但到了年底终于破产倒闭。中央宣传部也坚持弹劾国民党人马素和江伟藩，他们发布了反共的小册子，随即被开除出党。^①毛泽东到职时，该部开始有系统地清查党内出版物，以找出那些独立的、反对国民党二大所定政策的刊物。毛泽东不定期地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检举。1926年2月，该部对北京孙文主义学会、（广东的）深圳县党部第四支部、上海的党刊《革命导报》，以及美国总支部在旧金山的资深日报《少年中国晨报》——中央宣传部前秘书刘庐隐曾在此处成为国民党的宣传家——提出控告。毛泽东还向国民党各部门发出

① 报纸得到了为数每月2000元的津贴。邹鲁1929，1：399；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7日、9日、11日，11月26日；《中国新闻报》，1925年5月27日。

指令，个人和组织在公众场合发布的一切宣传材料，都要送交中央宣传部检查。^①最后，他还利用其新的“中央言论刊物”《政治周报》主编一职，对那些被视为与国民党当前思想步调不一致的其他报刊杂志的作者和编辑加以申斥。

所以，纪律已经成为国民党许多不同机构的职责，各机构直接向孙中山及其故后的中央报告。值得注意的是，共产党人没有加入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创建的各种纪律机构，包括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一连串奇怪的机遇，国民党内的无政府主义者受命去管制、强迫（全党）服从党规。^②在各级党部，宣传部都与监察委员会建立了密切联系。1924年1月，中央宣传部秘书刘庐隐，被任命为刚成立的党务监察委员会委员，4月间，他又得到了广州市政调查委员会的一项兼职。中央宣传部干部陈秋霖去世时，仍拥有国民政府监察委员会中的兼职。中央宣传部与中央法制委员会之间，也建立了类似的联系。中央宣传部首任部长戴季陶主持中央法制委员会，在他回到上海时，其秘书刘庐隐接替了这一职务。^③共产党人被排除于这些早期的纪律机构之外，这时他们很容易成为受攻击的目标。他们选择的抵抗方式，是由自己来指挥这些机构。

242

1924年6月18日，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了涉及违纪的第一项弹

① 毛泽东 [21]: 10—11。

② 1924年1月委员会建立之时，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和张继构成了总共5名委员中的大多数，另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蔡元培被列为临时委员。其中没有共产党员。委员会于1926年1月扩充为12名委员，其中包括两名共产党员（邵力子和高一涵），两名共产党同情者（柳亚子和陈璧君），和4名无政府主义者（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和张静江）。李云汉 1966, 1: 270, 472—473; 邹鲁 1929, 1: 382—387; Zarrow 1990, 202—204。

③ 罗家伦、黄季陆 1969, 2: 1056, 1082—1083, 1089; 李云汉 1966, 1: 376; 《中国国民党周刊》23 (1924年6月1日): 5。

劾案。被控对象是国民运动中的共产主义宣传。三名持反共立场的中央监察委员，即张继、谢持和邓泽如，从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的决议和出版物中汇集了一串言论，指控它们违犯了党纪。弹劾书中引用的大多数内容，触及宣传时达到了如此程度，足以证实共产党意在发动一场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宣传战争，并支持国民党同样行事的决心。在某些方面，监察委员们似乎误解了孙中山邀请共产党人加入自己阵营的意图。开列出来加以指责的意见，包括共产党决心“膨胀国民革命之政党中国国民党”，“确保全国革命分子都聚集在中国国民党周围”，在国民革命中从事“底层实际工作”。孙中山几乎无法反对共产党在这些方面的参与。实际上，他发现自己的追随者通常喜欢舒适而有利的桌面工作，而共产党人对底层组织和宣传的革命决心和热情，则是一种令人振奋的变化。他驳回了这些弹劾。^①

更严重的控告指责说，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计划在其成员加入国民党后继续保持对他们的控制权，并试图把“真有阶级觉悟的国民党左派”争取到自己一边（就像一份共产党文件中提出的那样）。“阶级觉悟”被认为是共产党人最有力的武器。弹劾书中引用的另一份共产党文件预言，“更进而有阶级的觉悟的革命分子，当尽量加入我们的组织”。考虑到国民党一大承认的共产党人加入条件，这些指控是很有意义的。首先，共产党人不允许组建“党中党”，其次，尽管两党都承认民众觉醒的政治，但孙中山设想的显然是国家的觉醒，而不是阶级的觉醒。监察委员们还引用了崔文成写的一篇文章，它发表在国民党上海《民国日报》资助的该报副刊《觉悟》上，鼓吹为完成国家的革命而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孙中山将它和

^① 邹鲁 1929, 1: 361—367; 李云汉 1966, 1: 291—305; 孙中山 [5]: 537—543, [6]: 870, [13]: 640—653, [29]: 916。

别的指控置之一边，没有采取进一步行动。相反，他决定强化国民党的纪律，重申国民党对党内共产党人的管辖权，再次肯定自己的国民革命的基本目标和原则。^①

这些指控的严重性，没有因为孙中山的随意驳回而降低，他没有采取行动，并未减轻党内元老们对共产党人的愤恨，因为后者在改组过的国民党内具有重要地位。武汉、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大约2000名党员提出16条附加请求，要求纠正党内的共产主义活动，但这一行动受到了阻挠。8月间，京汉铁路总工会总干事、代理委员长张德惠来到广州，抗议共产党向该会的渗透。“吾侪工人未尝闻一共产党员能宣传本党之主义者，”他提醒中央监察委员会，“其所叫嚣者不外马克思马克思而已。”国民党北京、上海执行部最近进行了干部选举，其舞弊性结果促动了弹劾共产党人的更多请求。当时，北京和莫斯科之间正在进行谈判，目标是使苏俄和北京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正常化；共产党在华北的宣传支持了这些谈判，由此激发了其他的请愿。来自“北京知情圈子”的邹德高和100位签名者抱怨说，他们为共产党的宣传所误导，相信孙中山曾劝告国民党人去推动这些谈判。他们一直这样去做了，最后却得知孙中山（他反对这些谈判）从未说过这种话。^②

对于这些请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迟迟没有采取措施。部分请求被提交给中央监察委员会，但没有孙中山的批准，后者无权采取行动。大部分请求则被搁置，留待预定于8月中旬召开

① 邹鲁1929，1：362—368；李云汉1966，1：311。这篇令人不快的文章事实上用“所谓的”社会主义偏袒了民族主义：“为所谓的社会主义进行公开宣传和运动，以便让社会上多数人民获得对社会主义的彻底理解，只是一种梦想。”崔文成1924。

② 李云汉1966，1：317—322。

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去解决，直至孙中山插手。孙中山将其政治会议的召开日期，安排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准备讨论这件事的前两天。他偏向于政治会议而不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因为前者更尊重他个人的指示。^①8月13日，政治会议既没有将这些弹劾视为共产党的背叛迹象，也没有把它看做国民党人变节的后果，而是将其视为不幸的误解的结果。孙中山没有按照是非曲直来处理每一条请求，而是提议建立一个“联络部”，来防止类似问题的再度发生。

244 这一提议未能让与会者满意，他们在两天后又聚集在一起，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覃振同意附和这种设想，即所有抱怨都是误解的结果，但认为责任在共产党人身上。他提出反建议，即设立一个国际宣传委员会，以促进国民党、共产党和第三国际之间的交流。对覃振来说，交流问题不在于国民运动内部，而在那些盟友身上，他们拒绝咨询或留意国民党。实际上，他正在提出一种新的机制，把三民主义从中国推向世界，并在更平等的基础上建立国民党、共产党和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8月20日，政治会议用自己的反建议满足了覃振的提议，提出设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代替上次会议提出的联络部。该委员会与覃振（设想）的委员会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被赋予的职能当中，忽略了向海外更广泛地宣传三民主义这一建议。结果，覃振的动议未得到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相反，它采纳了政治会议的建议，即通过创建国际联络委员会，来解决6—8月间那些请愿所显示的纪律问题。^②实际上，很少有共产党人受到约束，国际联络委员会未能实现，双方都对弹劾程序的结果感到不满。

① Mast 1970: 256, 280—281; Shirley 1965: 69—84.

② 李云汉 1966, 1: 324—330.

1925 和 1926 年，纪律监察的政治转入了另一个方向，那些曾经敌视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员，自己却变成了靶子。没有了孙中山的控制之手，结果变得越来越残酷和分裂。1925 年三四月，当中央监察委员会弹劾《香江晨报》发表反共文章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未作任何解释和道歉，就决定解雇其编辑。该报 3 名编辑，赵石龙、黎工敛和徐天放要求知道弹劾的细节，并对自己的活动进行艰难的辩护，努力否认自己违犯了国民党的任何主义、政策或规章。当他们的抗议被置之一边时，新闻工作者迅速改变了对国民党的忠诚。纪律也开始实施于在公共舞台运作的无党派报纸、通讯社和新闻工作者身上。6 月间，中央宣传部收到该部干部陈孚木的一份报告，其大意是，“太平洋通讯社”正向其在香港的委托报纸传播错误的谣言。该部按照这份报告展开行动，要求（广东）省政府起诉为私人通讯社服务的记者，并禁止冒犯性的报纸进入该省。^①

孙中山去世不久，国民党继续依赖更陈旧的控制方式，倾向于警戒性惩罚的示范效应，而不是常规的监察和纪律。中央党部在 1925 年初以《香江晨报》来杀一儆百，因为它无力通过常规的官僚制程序来控制宣传。从其成立章程来看，中央宣传部被授权“指导各地区执行部和各省党部的宣传部，以实现宣传和舆论的统一”。^②孙中山在世时，中央宣传部从未做过这种事。但到了 1925 年中期，它承担起了职责，指导和规范着全国范围内由国民党或任何党员创办的报纸、期刊、传单和海报、学校、制片公司和艺术表演团体。通过发展常规程序来汇报和监控党务活动，该部迅速发展为国民运

① 《香江晨报》，1925 年 4 月 11 日，引自“党部社论贴存簿”，无出版日期；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4 月 11 日，“请政府严禁华字、志寰等报入口案”，无出版日期。

②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办事章程》，1924：4，第一、三条。

动中最有力量的机构之一。

从地区到中央的系统汇报，是省和地方服从中央党权的一个标志，并帮助广州中央党部跟上了遥远的市级和省级党组织的发展。于是，缺乏汇报就构成了对党纪的违犯。1926年1月，共产党人谭平山抱怨说，中央忽视了对此规定的推行。尽管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谭平山却不愿为这种监督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他相信，各省的错误比他更大。问题在于地方党部没有汇报其活动：“上海的执行部竟始终未有党务报告给过中央。北京虽有报告，亦是不多。”^①在毛泽东接管国民党宣传之后，中央宣传部开始把缺乏汇报视为对党纪的严重违犯。毛泽东为上海《民国日报》的“反革命”宣传所激怒，他的一系列埋怨中最靠前的，就是该报没有向广州提交定期报告。汇报未能奏效时，便采取其他监控形式。在围绕着戴季陶私人著述的公开辩论达到高潮时，毛泽东说服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命令戴季陶从上海回到广州，在那里，他可以受到更严密的监督。^②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汇报、监控和监督，成了在国民运动中实施日常纪律的标准程序。

246 提高沟通、监察和纪律方面的官僚制效率的措施，必然伴随着对党内的抵抗干部的清除。比如，当中央党部最终成功地协调了广东省内的宣传时，这不仅是技术上的成功，也是政治上的成功。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建立，曾被一种激烈的矛盾耽搁了很长时间，一方是国民党改组之前在该支部任职的反共分子，另一方则是共产党人

① 谭平山 [1926] 1986: 205—215。1925年11月20日的广州《民国日报》肯定了谭平山的关键作用。

② 毛泽东 [17]。《各省区党部报告决议案》1926: 50—51，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5日。

和“革命派”国民党人，他们在1924年以后开始支配政治工作。在今人的记忆中，最初的省党部领导人邓泽如，是首批弹劾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活动的国民党人之一。广东支部改组前的其他许多成员，同时也是革命纪念会的成员，该会宗旨就是遏制共产党在国民运动中的渗透。直到邓泽如及其派系调离该省机构为止，中央执行委员会一直没有批准新的省党部网络。1925年10月，省党部最终改组，原省级执行委员无一获得再次任命。省宣传部长甘乃光来自自封的国民党“革命派”。^①作为拖延的结果之一，直到毛泽东从汪精卫手中接管中央宣传部的同一个月，广东省宣传部才正式建立。此时，舆论的统一从政治问题简化为广东省宣传部门之内的一个技术问题。毫不奇怪，改进的程序与政治清洗之间的结合，意味着新的监督和汇报体系在最不需要之处发挥了最佳效果。

尽管如此，对于检查省级以下——在那里，国民党老党员还保留着一些影响——的活动而言，常规汇报也是有用的。省党部干部在中央宣传部的阴影之下工作，对毛泽东或他在政治会议里的上级也无法隐瞒什么。地方党部则较少暴露在中央的警觉目光之下。检查和批准下属市、县党部准备的宣传材料，是甘乃光的省宣传部的职责。^②

实际上，省宣传部就像中央宣传部的代理人一样工作，向下属

① 1923年属于革命纪念会的党部成员，包括黄隆生、邓慕韩、赵士觐和邓泽如。罗家伦、黄季陆1969，2：964。李云汉1966，1：383，《国父全集》4：865，《广东支部弹劾共产党文》1923：916—919。1925年改组后的党部，各部部长为甘乃光（宣传）、范其务（商务）、陈孚木（青年）、何香凝（妇女）和共产党员杨匏安（组织）、彭湃（农民）、刘尔崧（劳工）。“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会议录”1926：1—2。关于甘，见Sansom 1988：第五章。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5日。有时中央和省党部的成员可以同时或者连续任职：杨匏安在两个组织部，彭湃在两个农民部，甘乃光在省宣传部和中央商务部，何香凝在两个妇女部。

市、县党部传达指示和宣传大纲，并遵照中央指示按月印行党务报告，内容包括省级执行委员会和所有其他部门的活动，以及地方党部活动的概要。在发布主要宣传方针之前，它要寻求中央宣传部的建议和批准。如果遇到纪律监察的困难情形，则上报中央机构处理。^①组织特殊的宣传运动时，省宣传部将利用中央宣传部的资源，有时还会邀请其他部门合作。无论如何合理的评估，在汇报、协调和规范宣传方面所遵循的程序，广东都值得高度称赞。^②

247 省宣传部还协助中央党部去规范市、县级宣传工作。省级干部有权检查和纠正省、市、县级发行的党内出版物，以在党的宣传方面“确保一致”。^③尽管省宣传部的5个兄弟部门对其监督和规范能力提出指责，它们实际上还是尽力去遵循省党部的章程。1925年末引入的常规程序，在省商民部的事例中得到了很好的说明。12月16日，商民部请求省党部批准自己创办一份月刊，专门用于国民党在广东开展的商民运动。省执行委员会批准了这一计划，并把筹备该刊的职责交给商民部，条件是每期出版之前，其清样都要得到执行委员会（也就是宣传部）批准。一周以后，商民部提交了一份关于刊物内容的大纲，它被适时送往宣传部检查。接着，商民部又请甘乃光及其秘书陈克文担任一个内部编辑委员会的职务，以便宣传部对将来的

① 例如，广东省党部的17号令、23号令，即传达和执行了中央党部的263号令、273号令。《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4；2（1926年3月）：7；3（1926年4/5月）：7；4（1926年6月）：30—32。同样的月刊也定期发表省内党组织的报告：1（1926年2月）：19；和3（1926年4/5月）：77。

② 《在本党指导下之各种民众运动报告》1926：34—66。劳工、青年、商民、妇女运动宣传活动中中央—省级合作的详细情况，列于《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15—16；2（1926年3月）：63—65；3（1926年4/5月）：25—27。又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1：21，24，39。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5日。

商民运动宣传进行检查和纠正。所有这些都被适时地汇报给了更高层的党组织，并从1926年初起，通过省内时事通讯得到发表。^①

纪律、混乱和“阶级斗争”

政治清洗和常规纪律仅仅将国民党引向了自己的目标。毛泽东在其宣传部办公室写道，国民革命如果不同时伴随着“乱局”，就不会有一场革命。^②事实上，混乱是在纪律变得更严格时爆发的。

与省港大罢工和联合抵制运动——从1925年6月起，它们持续了一年时间——相关的传单、游行、纠察和暴力，是整个革命运动中最繁重的操练。6月19日，香港的工人们放下其麻袋和工具，支持一系列旨在改善（香港）殖民地华工生活和工作条件的要求，抗议5月30日对上海示威者的大屠杀。几天之内他们开始列队离开（香港）殖民地，大约20万工人及其家属，与商人、工场主和失业军人——商业陷于停顿使他们无法继续呆下去——一道成批离去。

在广州城内，对上海大屠杀的反应起初更加温和。沙面租界的2000名中国雇员发动了同情罢工，广州和香港之间的轮船航运中断了。广州市民和政府领导人最初反对更激烈的行动。^③6月23日，英法两国的枪手在革命首都的心脏——沙面岛上重演了上海大屠

248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27，30，41。

② 毛泽东 [20]：13。

③ 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市长伍朝枢以及孙科，加入了商民领导者和一些劳工组织者的行列，反对更激烈的行动。他们专注于镇压广州附近的雇佣军叛乱。见 M. Chan 1975：311。我对难民成分的理解，利用了1990年与曾参与此次迁移的一位香港居民的访谈。

学生、商人和军校学员组成了喧闹的游行队伍，他们行经从广州通往沙面岛的小石桥时，岛上的海军枪手向他们开火。52名游行者的被杀害，还有100多人受伤。^①即使最保守的广州政府领导人，也为沙面大屠杀所刺激，宣布完全封锁与香港的商业贸易关系，最后并抵制英国在华南的公司、货物和服务。

广州混乱局势的出现，掩盖了罢工者之间的严密组织和坚实的结构支持。这是具有组织性后果的组织化混乱。联合抵制运动向全省的扩展，逐渐加强了国民政府在许多地方的权威，而此前，它在这些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当它扩展到国民党控制的整个国家范围时，联合抵制为国民党和政府里的各个派别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机会，去争取自己对正在迅速扩大的运动的影响。^②当各个派别竞相利用这场运动所提供的机会时，混乱就在国民党内部发生了。

一些人确实输得很惨。与孙科、邹鲁和胡汉民相联系的温和分子充分意识到，罢工的目标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关于罢工目标所达成的一般共识，远不是减少派系分歧，而似乎更加强化了这些争吵的紧迫性。廖仲恺、汪精卫、陈公博和甘乃光领导的激进分子，则以牺牲保守派为代价，加强了自己对党政事务的控制。当廖仲恺被刺杀，国民运动中最高层的反共分子胡汉民，也因为据说卷入暗杀而被迫辞职时，派系紧张最终以暴力形式爆发了。^③

① *North China Herald*, 1925年6月27日; Fung 1991: 39.

② 宣传包括1份周刊《广东工人之路》，1所针对劳工组织者的“工人大学”，8所成年工人学校和8所工人子弟学校。M. Chan 1975: 309—345; Chesneaux 1968: 292; 李云汉 1966, 1: 63。

③ 路透社报道说，在遇刺之前10天，曾有一次劳工集会上的谋杀企图，廖仲恺幸免于难。它还注意到，是流传于广州和香港关于激烈的广东劳工争执的谣言，导致了廖仲恺的死亡。*North China Herald*, 1925年8月29日。胡汉民也被牵连进了廖仲恺遇刺事件，因为他的堂兄弟胡毅生——廖仲恺的公开敌人——在廖遇刺后担心受到指控而逃离了该市。

省港大罢工和联合抵制，暴露了国民运动中某种程度的不和，它超出了国民党纪律机器的技术调节范围。协调和规范只在这种情况下才有效，即在革命的目标、正在进行中的唤醒的性质，以及党政机构中的权力分配等问题上达成一般性共识。因而，“统一言论”的要求提出了一些重要问题，即关于国民革命的指导思想与目标。特别是，运动内部出现的恶意的、有时是暴力的分歧，究竟应该被视为朋友之间的争论，还是革命与反革命势力之间、人民与敌人之间的冲突？在革命阵营内部，敌人究竟是真实地还是象征性地潜藏着？

249

在省港大罢工和联合抵制的一年间，为了孤立和疏远国民党阵营中更温和的分子，国民党政治会议和中央宣传部开始就革命的朋友和敌人作出新的定义。共产党人已对国民运动中的政治派别发展出了一套详细的社会批评，用以解释1924年10月商人危机的起因和后果。他们对国民党内的个人和派别发动了一系列攻击，包括孙科在内的太子派，以及一批与冯自由——他因公开反对共产党而被驱逐出去——相连的不幸的党内元老。^①共产党的举动，是由对两个问题的反应促成的：第一，革命运动内部是否存在反革命因素，第二，这一因素是否以及如何与整个社会中的反革命势力相关。在使共产党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引起国民党注意方面，毛泽东起到了主要作用。

1924年，在上海举行的民国成立13周年庆典上发生了一次悲剧事件，事后，共产党人最明确地表达了对国民运动中的反革命分子的愤怒。上海大学青年学生黄仁，在河南路议会大厦所在地，被反共的国民党员殴打致死。陈独秀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

^① 李云汉1966，1：355；Luk 1990：94—97。

抗议书，公开发表在共产党的《向导》周报和国民党的日报《觉悟》上，标题为《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①陈独秀的问题突出了共产党人新的思考方向，提出了一种可能性，即国民运动的某些派别也许是革命的敌人。当然，感到愤怒的并不只是共产党人。黄仁在革命圣地牺牲，对此国民党元老们无法辩解，否则，他们的同情也许已经给予了谋杀者一方。但陈独秀提出的煽动性问题，仍未能从国民党纪律机构那里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更早的那些抱怨遇到了相似的命运。黄仁事件之前不久，共产党人于树德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起诉那些拒绝服从中央方针的党报。此时，于树德尚未被提拔到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中，他的提议也被悄悄地忽略了。^②即使他升职以后，也没有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事实上，直到毛泽东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共产党人才成功地置换其批评，用革命还是反革命代替了左派还是右派的话语，并肯定它为一道基本标准，用来辨别国民党内和社会上的国民革命之敌友。

毛泽东置身广州期间，最为人牢记的是他在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演讲，以及论述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角色的开拓性著作。甚至在来到该市之前，他就已经显露了对农民福祉的兴趣，并获得了农村政治动员的初步技巧。但在广州，他有别的事情要考虑。正如其传记作者施拉姆所说的，毛泽东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任务，“毕竟反映了对组织和纪律问题的强烈关注，这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将成为发展的根本”。^③

① 陈独秀 1924c；李云汉 1966，1：243，331，336—337。

② 于树德的提议得到了通过，但我没有发现在此之后付诸实施的证据。

③ Schram 1967：86。

毛泽东对组织和纪律的兴趣先于出席代表大会，而在其中央宣传部长任内，他似乎对农民运动倾注了自己的兴趣。在他看来，自己所任宣传部长一职的义务，就是分清革命的朋友和敌人，对前者加以称赞，将后者揭露出来并加以嘲讽和约束。与其前任和下属所表现的关注相比，毛泽东在这一使命上投入了高得多的热情，这对他关于农民和其他社会力量的作品产生了影响。如果有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是1925年10月以后他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经历，将使他以一种更强的紧迫感，来欣赏中国民族革命中农民可能会被号召去承担的作用。

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赞成同志般的团结，而不赞成一些共产党同仁所鼓吹的更苛刻的选择。但他的行动与其言语相违。作为中央宣传部长，毛泽东更关注的是团结，而不是同志关系。与国民运动中的其他共产党人一样，他也得到了第三国际的指示，奉命去孤立那些敌视共产党和苏俄在华南活动的国民党人，必要时可将他们驱逐出国民运动。^①他在这个方向上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试图把国民党一分为二。作为国民运动的“中央言论刊物”——《政治周报》的主编，毛泽东有责任确保共产国际的指示按其本意得到贯彻。他领导的中央宣传部，成功地疏远了国民党内一些更温和的人物，使他们退出了国民党中央的权力圈子，并不再对党纪作出反应。这是意料之中的。为统一党的宣传而采取的技术措施，只能达到统一的外表。真正的统一需要系统的清洗。

毛泽东的清洗被痛苦地拖延了，主要因为它需要得到国民党高层人物的同意，而他们起初不愿提供这种支持。国民党一大召开时，任何关于党内存在“反革命”派的意见，都会遭到不加区别的

^① 张国焘 1971：329，Wilbur and How 1956。

否定。1924年1月，共产国际顾问鲍罗廷在与胡汉民谈话时推测，国民党内可能包含有左派和右派。鲍罗廷突然停下来，没有称它们为革命派和反革命派，但胡汉民马上意识到了这种含义，并立即予以否认。胡汉民的否认并没有阻止共产党人，5月间，共产党决定宣传、加剧和利用国民党内的派系主义。次年1月，这一决议正式写进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策，它决定在国民运动中加强左派，争取中间派的支持，反对右派。^①与此同时，国民党人仍然一再否认存在派系分歧的任何余地。

1924年10月，当邹鲁向孙中山递交了共产党刊物《向导》刊登的一篇文章时，这个问题首次引起了国民党纪律机关的关注。孙中山命令中央执行委员会斥责该刊，因为其中提到了国民党内的左派、右派和中间派，特别是将其中一派描述为比其他派别更不“革命”。^②孙中山去世之后，共产党人就国民党内的宗派主义进行了另一轮宣传，结果很快再次确认了他的判断。争论聚焦于陈东发表在一份新刊物《革命》上的一篇文章。该文含有如下冒犯性文字：

此刻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党内右翼分子代表买办阶级的利益，与军阀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相勾结，阴谋破坏我们的党，只有左翼分子领导下的工农群众，才愿意天天保护我们的党。^③中央宣传部很快致信《革命》的编辑，支持孙中山在世时所持的立场，即国民党内没有重大的派系分歧，因而也没有哪位党员可以被

① 胡汉民 1973—：59—60，张国焘 1971：329，Luk 1990：96。

② 这篇文章看来就是蔡和森 1924a。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 1924 年 10 月 23 日作出反应。罗家伦、黄季陆 1969，2：1143。共产党又于 11 月作出回应。Jizhe 1924：5—8。根据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于 1925 年 5 月的一封信，这场较量的争执焦点，在于国民党内究竟是否存在左、右、中的派别。广州《民国日报》，1925 年 5 月 13 日。

③ 同上。

似是而非地加上反革命的标签。^①

就在斥责《革命》的4个月后，中央宣传部改变了自己的立场。1925年8月20日，在为吊唁廖仲恺遇刺而召开的会议上，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发表演讲，他催促说：

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同志，向左边去；希望在不平等条约下生活，使中国永远作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帮助世界帝国主义势力永远持续下去的，向右边去。^② 252

选择在廖仲恺的纪念仪式上来打破先例，并承认左派和右派的存在，这是非常合适的。在最近一篇论述党内的革命和反革命派的文章中，廖仲恺自己已经提出了这一问题。遗憾的是，他的遇刺似乎验证了自己的洞察力。他所谈到的分歧，现在成了无情的手足相残。汪精卫关于派系的评论比廖仲恺更权威，因为这是以宣传部长的身份说出来的。他受到了批评，被指责为试图破坏孙中山对一个团结的国民党的承诺。蒋介石站出来为他辩护。在1925年11月致国民党人的一封公开信中，蒋介石称，汪精卫对党内派系的评论“最深刻、最透彻”。^③ 看来鲍罗廷一直是对的。胡汉民立刻遭到政治流放。

一旦这个问题在国民党的序列内部解决，毛泽东就可以自由使用宣传部的资源，揭露右派是国民党内部的“反革命”敌人。但在继续之前，他谨慎地引用了廖仲恺和汪精卫的先例：

“革命派团结起来”是廖仲恺同志倡导的口号，“要革命的向左边去”是汪精卫同志倡导的口号。在今日这两个口号必然

① 陈东 1925，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3日。

② 汪精卫，无出版日期。

③ 李云汉 1966，1：381，毛思诚 1965：569。

要普及于全国各地革命同志及革命民众之间。^①

毛泽东把廖仲恺关于革命团结的主题，与汪精卫关于区分左、右翼的号召融合起来，从而使团结和分裂走到一起。孙中山一直不愿承认党内存在派系，因为他相信，承认这一点会危及国民党的团结。对毛泽东来说，这不再成为一个问题。不团结可以通过助长进一步的不团结来克服：不同意中央政策的党员，将不再成为革命阵营中的问题（成员），因为他们根本不再被列入革命阵营之内。

毛泽东采取了另外一个步骤，代表中央宣传部宣称，左与右的分歧等同于革命与反革命势力之间的冲突。从1926年1月起，他就对“反革命派”进行无情攻击。例如，在宣布对上海《民国日报》实施新的纪律措施时，毛泽东忠告国民党人，他们的选择是，“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② 那些向右转的人便加入了敌人的阵营。通过剥夺那些党员的权利——他们的言行危及了国民党的团结形象——毛泽东履行了宣传部的职责，即实现“意见统一”。

他实现意见统一的主要工具，是新的中央喉舌《政治周报》。“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派宣传”，他在该刊发刊词中宣布，这“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实际上，《政治周报》还有更广泛的（宣传）大纲。第一期出版时，毛泽东预言“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③。他的预言得到了普遍的证实。该刊登载国民党对其遇到的当前事务的主要宣言，以及关于革命进展的官方报告。毛泽东任主编期间，所

① 毛泽东 [4]: 5。

② 毛泽东 [17]: 4。

③ 毛泽东 [22]: 1—2。

刊文章只有相对很少部分聚焦于“通过宣传向反革命派反攻”。事实上，毛泽东将这一特殊职责留给了自己，并为此目的重新使用了过去的笔名子任。他用子任之名发表的文章，有五分之四是专门攻击在“西山”派名义下聚集于上海和北京的大批国民党人。他又用另一个笔名“润”，嘲笑那些特别反动的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行为，包括国民党元老邹鲁和冯自由。^①

毛泽东把汪精卫和廖仲恺的简单训词，发展成了对国民党内错误派别的异常行为的详细剖析。基于早期共产党人对国民运动的评价，他为革命中的全部主角加上了某种特殊的、不可剥夺的阶级特征，并且断定，国民运动内部的斗争反映了社会各阶级在革命目标上的政治分歧。^② 在革命中的政治角色与社会力量之间建立起对应关系，毛泽东虽然不是第一人，却是第一个作为国民党员、代表国民革命提出这一主张的人。尽管意识到“阶级斗争”一词通常与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相连，毛泽东还是尽力指出，即将到来的革命完全

① 毛泽东 [15]: 11; [23]: 12。在一篇早期论著中，我认为“子任”之名是“责任”的同音异义词。Fitzgerald 1983. 从如下事实来看，这似乎不大可能：早在1911年，毛泽东还是小学生时，便首次采用了“子任”这个笔名。他使用这个名字是为了纪念梁启超，梁启超字“任公”（子任暗指“任之子”）。见 Schram 1989: 38（在中文名字习惯中，“子”含有对某人某事的尊重倾向，而非“某某之子”之意。——译者）。在1993年4月7日的访谈中，毛泽东的秘书和传记作者李锐肯定了 Schram 对我的批评。署名“子任”的三篇文章的简短摘要和第四篇的英译，见 Fitzgerald 1983。第五篇涉及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的调遣。

② 1921年，共产党的创建者之一陈潭秋，对国民党人的派别及其对国民革命的态度、他们所代表的社会经济基础作了系统分析。这比毛泽东的分析早了一年。陈潭秋将国民党员分为三个派别，每一派在社会中都有其独特的阶级基础。左派代表工业工人、手工工人、农民和小商人；中间派代表知识分子、工商业主和部分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不确定，所以其阶级特征也不确定，最易于妥协”）；右派则是与帝国主义、地主、士兵、政客和买办保持联系的大商人。最后这一派是反革命分子。陈潭秋 1924。

不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

一般反革命党以国民革命指为共产革命，以国民党指为共产党，以国民政府指为共产政府，以国民革命军指为共产军，无非承了帝国主义意旨，制造几个简单名词散布出来，企图打破国民革命中各阶级合作的联合战线。^①

- 254 毛泽东提出的根本不是共产主义革命，而是“各阶级合作”参与的民族革命。阶级斗争与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没有任何关系。他指出，所有阶级都被邀请参与国民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以使国家从国际资本主义和国内封建主义之下解放出来，如果哪个阶级拒绝邀请，这不是共产党人的错。并不是中国的所有阶级都承认有必要进行民族革命。所以，民族需要与他们斗争。他写道：“大资产阶级是附属于帝国主义成了反革命势力，中产阶级是介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动摇不定。”于是，毛泽东为识别国民运动中的“反革命”而提出的理性标准，同样被运用于各个社会阶级身上——尽管在最后一问题中，争论的已经不是党员资格，而是民族本身的成员资格。因为国民运动是民族的拥护者，那些没有响应其号召的人，也就完全失去了被视为民族一分子的权利。^②

毛泽东把国民运动内部的不同意见，与社会上对国民革命的抵制联系起来，从而完成了自己的事情。针对一种批评——它认为国民运动中的不团结，只是“左派”操纵的结果——毛泽东在1925年冬答复说：

半殖民地中国的国民革命政党，在今日应有这个分裂。这是一种必然的现象。我们虽不必以此为喜，却断不是什么不幸

① 毛泽东 [5]：12。

② 毛泽东 [6]：10。英译附于 Fitzgerald 1983。

的事。要知道这个理由，只要一看近代的时局，只要一看从兴中会到现在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就可以完全明白。^①

然而，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并不是孙中山所叙述过的国民党历史。相反，它是一种道德叙述，讲述了国民党与反革命的社会阶级之间的历史联系。

从兴中会时期一直到逝世，孙中山始终把国民运动的缺陷，归结为部分党员未能“觉醒”到正确地理解他的主义。在孙中山的历史上，这种解释通常伴随着训令，要求党员在将来更加彻底地阅读和学习三民主义。^②毛泽东心中没有任何更多的考虑。在诊断国民党的历史问题时，他强调了在革命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力量：“我们要完全明白这分裂的原因，还要看从兴中会以来本党党员的社会阶级的属性。”毛泽东在《政治周报》中对国民党的历史作了总体评述，以说明过去的失败和现在的派系斗争之所以不可避免，是因为相互竞争的阶级利益作祟。兴中会是一个无产阶级和“游民”的松散联合。其后继者同盟会是一个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政党。辛亥革命之后，小地主阶级的代表从同盟会中分离出去，组成了议会的国民党，它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程序，迫使他在1914年建立了中华革命党。即便此时，孙中山的努力也遭到了挫折，当时中等资产阶级和买办阶级渗入了新的政党。毛泽东解释说，孙中山被其老同志们们的顽固激怒了，因而在1924年重组了中国国民党，以动员工人、农民和共产派分子作为支持资源。现在，革命运动终于在进行之中，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和反动军阀则“进行抵抗”，集中其支持者形成了“国民党右派”。革

① 毛泽东 [6]：10。英译附于 Fitzgerald 1983。

② 例如，见孙中山 [36]。

命中的斗争阵线是清晰的：

一面是帝国主义为领袖，统率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等大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战线，站在一边；一面是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统率小资产阶级（自耕农、小商、手工业主），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佃农、手工业工人、店员、小贩），无产阶级（产业工人、苦力、雇农、游民无产阶级）组织革命联合战线，站在一边。

国民党内形成的派系阵线，是整个社会中形成的斗争阵线的直接反映。国民党总是遭到失败，因为它忘了去矫正内部的矛盾，这种矛盾源于它对反革命社会力量的代表的宽容。这导致了确保民族革命取得胜利之前，必须对党内的反革命分子进行清洗。^①

毛泽东设计了自己的政治算法，以测定国民运动中的斗争，哪些是兄弟般的分歧，哪些是手足相残——更宽泛地说，哪些阶级及其代表将被视为民族的成员——此时，他已经优先考虑了革命本身的国家目标。当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确立了中国民族革命的目标，但他们从未把特定社会阶级的成员资格，视为区分革命的朋友和敌人的充分标准。相反，敌人与朋友的区别，在于他们对消灭军阀和帝国主义所持的“态度”。在实践中，这通常意味着敌人的辨别，是根据其对党治国家本身所表现的态度。通过显示对国民革命的领导权的看法，党内各派系和社会各阶级可以自由地宣称自己站在革命斗争中的哪一边。他们的选择自由是以“阶级斗争”为代价的。

从党内清洗到群众运动，毛泽东这一思想发展历程，在他担任宣传部长期间完成的3篇文章中得到了体现。第一篇尝试着解释当

^① 毛泽东 [6]：11—12。

前国民运动中出现的派系分歧。《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完成于1925年底，这是他的首次系统尝试，即把国民党“右派”的态度和行为，与特定社会阶级对国民革命之国家目标的态度联系起来。^①值得注意的是，他对社会各阶级进行的首次重要分析，应当源于对国民党内的政治紧张的分析。他的第二篇文章《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完成于次年年初。在这里，他承认中国农民可能将扮演革命的阶级盟友的角色，从而限定了自己关于敌人的阶级分析。写于2月份的第三篇文章，进一步发展为《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②

毛泽东的思想从清洗发展为组织性的群众运动，这一历程由于其方法的连贯性而得到了强调。在两种情况之下，他都以社会各阶级的利益为一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利益为另一方，对二者间的关系进行了粗糙但却有效的分析，并试图将处于两端的利益，统统与国民运动内部正在出现的政治分裂联系起来。令他满意的是，这一程序足以沿着鉴别革命敌友的政治忠诚梯度，对每一个社会阶级和党派进行定位。

尽管毛泽东的著作聚焦于国民党人，但社会阶级在其分析中的突出地位，仍然不容易与孙中山的主义相协调。在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讲中，孙中山极力排除了沿着阶级路线区分敌友的前景。如果毛泽东不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或者孙中山对该问题的看法在1925年和他一道入土，这一冲突也许不会成为问题。但在1925年5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会上，孙中山的看法被写入《接受总理遗嘱宣言》并得到批准，被当做识别敌友的正式标准固定下来。这份文件明确宣

① 毛泽东 [6]。文中提到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于“去年1月”，表明该文写于1925年。

② Schram 1969: 241—246, 210—214.

布，忠于孙中山的主义和纲领，是区分同志与敌人的标准：

257 我中华民国及国民，凡能接受我总理之主义政纲，以从事于国民革命之工作，而为国家及民族谋福利者，皆为吾人所敬爱之同志，吾人誓以至诚与之结合，以共同致力于革命建设事业之实现。反之，凡持续反革命的行动，受帝国主义的列强之唆使及掩护，以阻碍国民革命之进行者，皆为吾人之敌。

国民党员被告诫要“牺牲一切”去辱骂和破坏革命的敌人。由于这个原因，毛泽东几乎无可指责。然而，考虑到国民党声称党内不存在敌人，5月全会的训令，显然是为了集合全党以对付党外的共同敌人。确实，（此次会议制定的）文献为国民党确立了一道完全不同于毛泽东为自己所选择的“责任”。5月全会宣称：“吾人今日惟一之责任，则在完全接受总理之遗嘱。”^①毛泽东自命的“攻击党内的反革命派别”的职责，与孙中山在世时的实践相矛盾，在其遗嘱中根本没有提及，也完全不符合他去世后全会文件所提出的精神。对毛泽东而言，问题是他无法继续接受孙中山的遗教或者意识形态，因为它排除了对党内和外部斗争进行阶级分析的可能。也就是说，孙中山的主义毫无根据地限制了对敌友的区分，因而抑制了对国民党的彻底清洗，束缚了群众动员的规模。于是，毛泽东开始从宣传部之内破坏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基础。

5月全会提供了进一步的座右铭，悬挂在宣传部领导人办公桌旁的墙上：“信仰总理之人格，接受总理之遗教，即为纪律之基础。”^②正当革命领导层中的“兄”（正如国民党人曾经相互称呼的）让位于

① 《中国国民党接受总理遗嘱宣言》[1925] 1973—：130—134。

②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接受孙中山遗嘱之训令决议案》[1925] 1986：117。

“同志”时，毛泽东接管了中央宣传部，并立即提议废弃旧式的兄弟纽带。毛泽东是真正中文意义上的同志：“因志而同。”在他关于纪律和统一的思想、关于革命敌友的判断，以及对孙中山及其遗产的评价中，最具重要性的不是孙中山的教义，而是革命的目标和意图。毛泽东说道，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建立国民党的党治国家。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因而，毛泽东作为中央宣传部长，对这两种人几乎没有表现出同情：一是那些凭着是孙中山的直接传人，而自称为革命弟兄之一的人，另一种是那些宣称尊重孙中山的主义，却不愿将革命推进到其预期结局的人。在毛泽东看来，这种结局要求承认不同阶级利益作用于政治运动以打倒军阀和帝国主义的那些方法；要求不计代价地按照这种认识行事，以实现党或国家的统一或凝聚。

258

毛泽东强调孙中山的革命目的，这频繁地出现于他对国民党内“反革命分子”的攻击中。他很少提到孙中山的著作、讲演或者随意写下的作品，只是赞同性地援引关于总理允许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关于与苏俄密切结盟，以及关于增进工农福利的记载。在阶级斗争这一敏感问题上，毛泽东声称自己知道孙中山“真正想要”什么，并对一些人加以斥责，毛泽东引用戴季陶和《独立》杂志其他编辑的话说：

这般中产阶级“独立”革命派（小地主出身的最多），现在还在冒了孙先生的牌，说孙先生的“主义”、“遗教”是代表了他们。其实孙先生绝非如此。孙先生的主义、遗教，绝对是为了“救苦”，绝对不是为了“发财”；绝对是使人类从压迫阶级解放出来，绝对不是为了准备做新的压迫阶级。无论将孙先生的主义、遗教如何曲解，这个意义绝对不能变动。^①

① 毛泽东 [6]：14。

尽管毛泽东这样声称，孙中山关于阶级斗争的政治的记载，仍然难以把握。戴季陶及其朋友引用毛泽东所提到的那些“被曲解”的章节和诗文，就说明了这一点。为了巩固自己的论断，毛泽东需要表明孙中山的革命比他个人及其主义都更伟大。孙中山思想，应该与他本人碰巧想过或者说过的东西清楚地区别开来。

毛泽东的下一步还更大胆。他试图在国民革命的肖像画中降低孙中山的重要性。在这里，他再次受到了“接受总理遗教宣言”的阻碍，后者将对孙中山个人及其主义的尊重，放在了对国民党的忠诚的核心位置。这里没有任何怀疑余地：“即或有对于总理之主张发生怀疑者，迟早必发现总理主张之正确与自己怀疑之错误。”^①为了确保党员对其已故领袖表现出应有的尊敬，（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议决，所有党政机关、支部和下属机构，都应于每周一上午举行简短的总理纪念周仪式。^②仪式开始，一群人在孙中山遗像前聚集，对之三鞠躬，接着颂读他的遗嘱，随后默哀三分钟。然后，主持仪式的官长报告本单位近期的政治工作。这种仪式有效地建立了国民党领导层与孙中山之间的仪式谱系，但其代价则是确保继任的国民党领袖尊重孙中山个人及其主义。

中央宣传部被期望去监控人们是否服从。在毛泽东来到广州以前，该部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纪念周条例”，任何人无故缺席纪念周仪式，或者在仪式过程中未能表现出恰当的尊重，都将受到纪律措施的惩处。^③到毛泽东接任时，服从的比率已经降低了。1926年1月，毛泽东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交的备忘录提到了这一问

① 《中国国民党接受总理遗嘱宣言》[1925] 1973—：130—134。

② 《第三次全体会议重要决议案》[1925] 1973—：23。

③ “中央执行委员会为颁发纪念周条例通告第二百十六” 1925。

题。他注意到，许多党政机构都未能以应有的尊敬态度来对待这一纪念仪式。他说，这一仪式貌似得到了忠实执行，但实际上被“秘密”地忽略了。作为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领导，毛泽东有责任约束冒犯者，并且在自己密切关心的问题上，他可以无情地履行其职责。但在这一问题上，他建议中央执行委员会放宽关于该仪式的规定，以免不得不过于严格地对它加以管制。中央执行委员会同意了。^①

当中央宣传部试图削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中的地位时，遭到了来自中央执行委员会更加顽强的抵抗。毛泽东自己的工作中很少提到三民主义，但当他提议省级和县级宣传机构以他为例时，这一计谋的效果却适得其反。他参与了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活动的筹备工作，这一活动定于1926年3月12日举行，这时他被要求严格保持一致。遵循最近的惯例，中央宣传部受命准备一份宣传大纲，以为党政军其他所有部门的指导。2月16日，该部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提交了大纲。常务委员们被惊呆了，他们注意到，《总理逝世一周年纪念宣传大纲》，全然没有提及孙中山的生平和三民主义。大纲提到的，是孙中山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支持，它们取代了孙中山的主义。^②这一次，中央宣传部走得太远了。 260

在一次少见但却重大的违犯党规之举中，甘乃光和广东省宣传部为中央的宣传大纲派发了两份附件，分别题为《总理生平概要》和《总理主义概要》。甘乃光自视为革命左派，通常情况下，原本可被视为毛泽东的同志。然而，他不能违反第三次全体会议的决议。左派攻击“右派”，说它的许多言论违反了全会决议，所以从自己方

① “中央党部重要文件”1926：4，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26日。

② 《政治工作日报》，1926年2月18日和19日。

面而言，左派的成员很难同意将全会弃之一边。广东省党部的附件，意在成为中央宣传大纲的勘误表，和对中央宣传部的指摘。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激进派国民党人，也陷入了同样的尴尬境地。常务委员会指责汪精卫通过撰写另一份三民主义大纲来弥补中央大纲的缺陷。与此同时，毛泽东以生病为由，请求休假两周。^①

这些非难并未阻止毛泽东履行他自任的职责，即清洗来自党内的政治敌人，或者通过在政治和群众斗争的任何地方发现敌人，来帮助消灭民族的敌人。但对于国民党内部的政治而言，毛泽东的思想已经不再重要了。随着1926年3月蒋介石的政变，他失去了在中央宣传部的职位，回到共产党内的职务上来。在那里，他广泛地利用自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经验，来设计自己的主义和战略，并在自己领导之下及时地发动了一场纪律性的革命运动。毛泽东的民族革命（或者民族“解放”，如同它为人所知的那样）所追求的目标，本质上与孙中山所设想过的目标相同，但却没有了孙中山主义的障碍。毛泽东所设计的是一套民族革命的战略，它将在策略允许的范围内加剧社会阶级的对立，以使用他自己的专政模式取代国民党的党治国家。

^① 《宣传部工作概要》1926，2：9—10；“广东省党部继起”1925：6，《政治工作日报》，1926年2月22日和2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1（1926年5月）：51—55。毛泽东也许是生病了，但在其生涯的这一阶段，尚未发现他以生病为由推卸令他厌烦的那些责任。在1927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以此为由中途退场。Schram 1967：110.



8. 北伐紀念海报, 上海 1927 年。四角都有旗帜。上边是已故总理孙中山的遗像, 两旁是国民党党旗和国民政府旗帜, 以及孙中山的遗训: “革命尚未成功, 同志仍须努力。”下边为北伐韶关出师时, 总司令蒋介石向部队发表演说, 他们列队于国民军军旗之下。左边为长沙之役, “党军”正向打着中华民国五色旗的部队发起冲锋。右边, “国民军”逼近岳州城墙, 反革命士兵则在民国旗帜下进行抵抗。(Wood, 1985: 59)

第七章 唤醒的机构：政府、政党和军队中的宣传部门

在试图让自己走向人民并且和人民在一起之后，这个土生土长的人反而会震撼人民。他没有把人民的懵懂昏沉当成荣耀，而是让自己变成唤醒人民的人。

弗兰兹·法农 (Frantz Fanon) ^①

今天到广州旅游的人，如果对毛泽东在国民革命中扮演的角色感兴趣，人们可能会告诉他越秀路附近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积极分子曾在这里上过课，学习关于农民动员的策略和技巧。另一些游客也许会乘渡船沿珠江而下，在黄埔军校所在地靠岸，这是蒋介石为革命训练军官的地方。^②这些地点在旅游图上有一席之地，并不仅仅由于它们与毛泽东和蒋介石之间的联系。中华民族从民国初年的分裂，走向民族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的统一、中央集权的政

^① Fanon 1967, 179.

^② Galbiati 1985, Gillespie 1971, Hofheinz 1977, Landis 1964, 1969, Price 1976.

治，这是一个漫长的行程；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则作为其中的阶段性标志而被人们记住。国民革命的风暴给了军官们和穿草鞋的农民干部们猛然一击，促使他们走向那些专门训练他们的机构。

在广州及其周边地区，还建立了数百个干部训练和宣传机构，目的是为革命培养黑市商人、下级官员、街头演说家、抄写员和资料员。当国民革命的叙事向前推进时，这些干部中的一部分随着辘重货车一道前进，另一部分则留了下来。时至今日，只有少数资历非常老的人还能记起这些机构的所在地。培养职员の党校没有产生什么英雄，地方军队的附属军校根本无法与黄埔军校的能量相比，似乎也没有人预见到商人运动讲习所会激起一阵“暴风骤雨”。^① 这些军校和宣传机构，在旅游路线上都被省略了。处于国民党人教诲 262 之下的院校，以及被从民间组织转变为党立机构的报纸和杂志，也都同样如此。在 1920 年代，广东省是一个训练和宣传方面的重要实验场所，这一实验的目的，是将国民党控制下的国家范围内的每一个人，都变成国民党中国的觉醒的公民。

国家机关

1925 年 8 月 5 日，国民党当局赋予广州的光孝寺一项新的使命。^② 13 个世纪以前，禅宗第六代祖师从印度带来了一系列神圣的佛教经卷，经过几个世纪，它发展成为佛教禅宗的一个重镇。禅宗的特点是顿悟而不是渐悟。近年来，这座寺庙进行了整修，一些古

① 参见毛泽东 [14]：23。

② 《广东省政府公报》8（1925 年 8 月 29 日）：35。

老的经卷和铭文被放回原处。如今，在最东边的厅堂上悬挂着一幅禅卷：“诵经五千可究禅根，铃动八百能醒愚梦。”1925年8月的一个早上，寺僧们被从梦中唤醒，然后被集中到寺庙建筑的后部，以让位给一个为唤醒政府官员而设立的机构。

新成立的课吏馆的职责，是确保革命军控制地区的市县政府官员知晓国民党的主义和学问。发表于7月份政府公报上的条例草案，宣告了这一机构的目标：

该馆旨在通过中国国民党的主义和政纲教育，以及实际行政知识的教育，培养出熟悉主义和知识的行政人员，通过选举担任县长。^①

国民党党治国家遇到的最严峻的挑战之一，是确保党务机构中的会计人员、广州的警务人员，以及乡村地区县政府的行政人员，都能在行使职责时体现这些“主义和知识”。这一挑战的应对之计，是政治教育。

极少数占据政府职位的人员，在任命之前经过了甄选。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之前，甄选党政（机关）行政人员的职责，落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手中。5月15日，中央党部对200名候选人进行测试，测试内容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革命目标，并就他们对国民党方针和当前政治形势的熟悉程度进行了考核。大约与此同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国民党秘书处提出的一项动议，即建立考试委员会以选拔地方行政人员。国民党领袖汪精卫被任命为考试委员会负责人，与行政专家谭平山、甘乃光和两位优秀的宣传家戴季陶、沈定一一道，负责主持这个机构的工作。国民党主持的考试结果，暴露了一种迫切的需要，即对党政干部候选人进行党的

^① 《广东省政府公报》3（1925年7月25日）：15。

教育和训练。^①

省民政厅开始甄选和训练行政人员。1926年2月，它开办了一个会计讲习所，向公共会计人员传授职业技能，以及有关国民党的主义和目标的知识。^②5月6日，它又开办了一所高等警官学校，“提升警务人员对党义的熟悉，以适应新时代之需要”。在此之前，广州市公安局已经为警察成立了一个政治训练部，所以，高等警官学校关注的是为职业警官开设警务和党义课程。其政治教育计划与警方的行政紧密交织在一起，每门课程都提供一种可望获得提升的政治训练。毕业于最高等级研究课程者，在内政和公安部门首脑的任命方面将获得优先权；毕业于专门课程者，可以优先任命为公安局长和分局局长；最低等警务学习课程毕业生中的优秀者，在获取警官职位时也将得到优待。^③

然而，缺乏类似的机构去训练普通行政人员。1925年7月，民政厅的首要安排就是训练公务员，以将党治国家的范围扩展到国民党根据地的全部各县。甄选和训练地方政府官员的最高机构是课吏馆。^④1925年8月5日，民政厅开始为设在光孝寺中的新机构招收学生。候选人需要接受甄别，以确保对（国民党）政权持有丝毫敌意的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通过这道门槛。只有从未对国民党的政策表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6日、19日。

② 《广东省政府公报》34（1926年2月10日）：33—35。

③ 基础警务学习课程是为小学毕业生和有一年工作经历的警官准备的；专门课程提供给有一年部队军官经历的中学毕业生，以及军事学校和低等警察学校的毕业生；研究课程提供给指定寄宿学校的高等毕业生，这些学校包括警监学校、陆军警察学校和警员讲习所。较高级课程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学时用于党规和党义。《广东省政府公报》27（1925年11月30日）：35—39，43（1926年5月10日）：13—24。

④ 一个地方讲习所已在英德开始运行。《广东省政府公报》28（1925年12月10日）：51—53。

露过异议的国民党人，才符合注册条件。接着对合格的候选人进行考试，内容为孙中山的主义和国民党的纲领。除了高级地方官员之外——他们因为党员身份和独立从事管理工作至少一年的经历而得以入选——候选人都要求具备完整的大学或专科教育程度，并通过政治、经济、财政、法律和当前行政实践等方面的入学考试。通过了这第二道障碍的人，还会因为个人过失和劣习被最终筛选掉，包括破产、精神病、吸食鸦片、沉溺于宗教等等。在师资方面，省政府为该机构提供的预算，包括17个全职行政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以及许多聘任制教师。两套课程同时进行，一在白天，一在晚上。^①

课吏馆的最初计划，是招收100名学生，在一年内每周有35个课时，学习孙中山的著作和管理科学。在拟定的课程中，孙中山的著作包括《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民权初步》（又称《议会程序》）、《建国大纲》和《建国方略》。行政管理课程包括农民、工人、商人、教育、通讯、财政和警察行政指南，以及户口登记和地方自治问题、社会政策、国际法、会计和档案保管。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对课程进行了修订，部分是为了改正其中的错误。将《民权初步》和《建国方略》放在一起显得特别尴尬——其中一种实际上是另一种的一章。在10月份最后提交省政府通过的计划中，这一疏忽得到了仓促的改正，同时，包括军事科学在内的其他一些科目，也被添加到课表中来。^②

1926年2月11日，课吏馆负责人谢瀛洲报告说，开头半个学期取得了迅速的进展。课程开始于11月。月考结果令人满意，缺勤率

① 《广东省政府公报》3（1925年7月25日）：15—17，22（1925年10月10日）：16—19，和14（1925年9月12日）：62。

② 《广东省政府公报》22（1925年10月10日）：16—19。

(5%) 非常低，而且据悉，学生对于研究革命政府的实际事务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考虑到这些成就，谢瀛洲自信地邀请汪精卫另外开设一门讲座课程，内容是关于党史和近期的政治发展。但实际上，他关于课吏馆所取得的进展的报告，乃是出于扩大招生规模的考虑，以便将这张网更广泛地撒向现任地方官员。他们繁忙的时间表，已经使第一批现任县长和职员学生减少到大约 70 人。谢瀛洲声称，如果要贯彻孙中山以党治国的目标，国民党当局就需要准备一个特别的讲习班，以满足剩下的县级官员之需。得到允许之后，课吏馆于 5 月份招收了 22 名学生，开办了另一个讲习班。^①

谢瀛洲知道，问题不仅在于繁忙的县级干部的训练时间表，他的修正计划也意在提供一次性的培训，无论他们是否准备接受再训练。在向省政府递交的设立“课吏馆县长馆外辅导课程”的计划中，民政厅长古应芬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现任地方官员拒绝接受政治训练。在提交该计划的序言中，古应芬重申了进行党义训练以实现“宪政”的重要性：

县政府的改组是政府全部改革之起点，而县级官员的遴选又是实现宪政的基础。的确，县长应当是新民之官，亲近民众。……即便是博学的人，如果他们不谙熟党义，也没有能力担当治民的职责。

古应芬重新肯定了国民政府的打算，即通过课吏馆的学习程序来淘汰抗命的官吏，同时任命那些在馆中学习并为国民党认可的学员。他解释说，由于种种“地方性”原因，直到课吏馆开始上课，许多县长都没有经过充分的筛选。于是，他提出为在职县长开设一门馆外必修课，就在原地修习。只有那些毕业于三年制政治、法律或者

^① 《广东省政府公报》45 (1926 年 5 月 30 日)；154, 35 (1926 年 2 月 20 日)；123—125。

经济学高等课程，并且成为忠实党员至少两年以上者，才可免修该门课程。符合这些条件的县长少之又少。大部分县长因而被要求接受整整一年的函授课程。只有通过了每月一次的考核，县长们才能继续保持学籍，并且，必须顺利通过一次最终考试才能毕业。

古应芬非常明白，函授形式的政治培训和考核制度容易被滥用。针对函授课程，他为课吏馆的考核制度提出了一些改良意见。除了孙中山的主义和国民党的纲领之外，其他所有课程，馆外学员都可以选择实践的而非书面的考核方式。书面考核的规则中加入了一项关于考试纪律的要求，显然，这旨在打消县长们请当地学者或亲戚代考的企图。总的来说，这些考试规则达到了制定者的目的。通过最初的和后续的考核，课吏馆对在职县长进行了筛选，同时为那些通过考试的县长提供了政治上和实践上的额外指导，以确保他们继续保持对国民党的忠诚。^①

266 课吏馆还设计了另一种涵盖面更广的制度，用于实地监督地方行政。在光孝寺馆舍学习的学员，被要求对县级行政情况作实地调查，并向课吏馆提交调查报告，作为其考核的组成部分。为此设立了一个特殊计划。每个月都派出10名学生调查员，进行为期8周的调查活动，通过60份不同的个案研究，向课吏馆具体汇报当前的地方行政运行情况。这项实践的多重目的见之于该计划的一份早期草案，其中将学生（自身的）教育列于众多“目的”中的最后一条。

地方行政调查员出于以下目的而设：明晰各县的地方行政环境，规划改革方案，宣传中国国民党的政治纲领，并为课吏馆学员提供实际工作的机会。^②

① 《广东省政府公报》34（1926年2月10日）：64—67。

② 《广东省政府公报》30（1925年12月31日）：36—38。

“各县的地方行政环境”是省级行政官员极为关心的问题，它包括交通、商务、警察和民兵、教育、卫生和地方财政。宣传的内容包括孙中山的遗嘱和关于“中山精神”的讨论。出于考核之目的，这份草案同时也规定，应该记录和汇报宣传的日期、地点、群众规模以及内容。最后，草案要求地方行政机关和“自治组织”，为从事调查的学员和宣传员在工作上提供一切必要的帮助和保护。在2月份的报告中，课吏馆主任谢瀛洲建议，学生调查员对地方行政的调查结果，应当由课吏馆职员汇编成地方行政改革的综合方案。他设立了一个地方行政咨议室，聘请课吏馆职员以及其他合格的人士，就地方行政涉及的一切问题为省政府和县长们提供建议。^①

在监督地方行政和以国民政府名义实施行政改革方面，课吏馆的影响远远超越了其院墙。在这个方面，课吏馆和国民党的群众运动机构没有什么两样，后者的影响越过了其自身的正式轨道，进入了有组织的农民、劳工、青年、妇女和商民运动的各个方面。但是，两者的差异盖过了它们的相似。课吏馆关注的是正式的国家行政机器，而不是社会运动的发展，它和中国共产党没有丝毫关系。课吏馆的管理人员、教职工和民政厅的主办者，与共产党几乎没有什么联系，这部分是因为激进派倾向于忽视政府的行政（工作），同时也因为政府的行政官员大都不理睬群众运动。即便在国民党核心圈子内，省政府工作人员的倾向，也比省党部成员更为保守。省政府内的最高层中，激进派和保守派的比例，与省党部领导层内的比例相反。范其务是激进的省党部中一个例外的保守分子，陈公博则是保守的省政府中的一名激进分子。从国民政府建立到北伐开始，

267

① 《广东省政府公报》30（1925年12月31日）：36—38，33（1926年1月31日）：62—68，35（1926年2月20日）：123—125。

省政府中的关键人物，有建设厅长孙科、民政厅长古应芬、财政厅长宋子文和教育厅长许崇清，他们都是保守派的代表。^①

课吏馆的创始人和历届主任的反共倾向，是众所周知的。在首位主任林云陔（及其继任者谢瀛洲）看来，新的党治国家应该是一个鲜明的国民党人的国家。^② 林云陔是广东人，他是一位称职的律师和经济学家，是国民党介入五四运动的先锋人物。当时，他在党刊《星期评论》和《建设》上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还准备翻译两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林云陔同时也活跃在五四运动的教育战线上。1920年代初，他为广东省教育会编辑杂志。1920年他陪同孙中山前往广州，担任军政府秘书，1923年擢升为广州市长。2月间，他应邀领导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当时由邓泽如领导）的宣传工作，3月份又接受了孙中山政府财政部的一个高级职位。随后，他又在省党部、中央党部以及政府里的一些委员会中供职，然后担任中央银行董事。在此期间，他与马克思主义保持着距离，并且更多地与国民运动中的反共势力密切结盟。课吏馆成立3个月后，他表示支持反共的西山派，该派推举他为上海中央的党务讨论委员，但他婉言谢绝，表示更愿意在国民政府中继续自己的工作。^③

林云陔的继任者谢瀛洲也是广东人。1924年，他和林云陔一

① 范其务之外，1925年省党部各部部长为激进派国民党员甘乃光（宣传），陈孚木（青年），何香凝（妇女）和共产党员杨匏安（组织），彭湃（农民），刘尔崧（劳工）。见第六章。

② 《广东省政府公报》28（1925年12月10日）：35，40。

③ 刘绍唐1977—，2：78；罗家伦、黄季陆1969，2：960，1083；《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75，2：33；《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7（1923年3月10日）：3；《中国国民党周刊》35（1924年8月24日）：3—4；李云汉1966，1：439。

道，成为孙中山临时政府的法制委员会委员。随后几年里，他在广东大学（后来的中山大学）任教，讲授孙中山的主义方面的课程，积累了宝贵的政治培训经验。在这所大学里，他和民政厅长古应芬共事，古应芬后来成为他在课吏馆的赞助人。就在林云陔成为国民运动中积极的反共分子时，谢瀛洲出现了。他于1925年12月从广东大学辞职，以抗议左派对广东大学行政的干预，1926年2月，当选为顽固反共的孙文主义学会的执行人员。^① 268

广东大学是众多转变为政治培训机构的大、中、小学之一。1925年国民政府一成立，就开始着手去实现国民运动的一项长期抱负：通过国立学校体系来推行国民党的教育政策。这是有先例的。1918年，一些同情国民运动宗旨的学校，就使用了孙中山的《民权初步》作为教材。次年，朱执信为国立学校体系设计了一套教科书，他在1920年光复广州的战役中牺牲后，这套教科书的编纂最终由戴季陶完成。与此同时，上海的国民党本部也设立了一个教育部门，目的在于通过学校来宣传国民党的主义。后来在1925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宣布，其宣传部将编写另一套教科书。同年，国民党主办的上海大学增设了一所教师学院，用来培训教师，以通过学校来宣传党义。^②

上海的系列教科书一直没有完成，上海大学也在1925年6月4

① 《广东省政府公报》28（1925年12月10日）：40；罗家伦、黄季陆1969，2：1103，王彰龄1973：328，《七十二行商报》，1925年4月24日，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3月3日。林云陔和谢瀛洲与蒋介石均无密切关系。二人主要对本省负责，而且与讲习所的许多其他职员和学生一样，在1928年国民政府北迁南京后仍然留在广东工作。刘绍唐1977，2：78，《广东民政》1941：3，《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1987，11：269—270。

② 《国父全集》5：417，陈天锡1959：29，Mast 1970：131，《宣传部公文底稿》1922—1923：19—20，《教育运动委员会会议事录》1925，广州《民国日报》，7月15日，1925年11月5日。

日被地方当局关闭，以示对它参加五卅运动的不满。不过，这种损失是可以承受的。在华中和华南的地方学区里，到处都有老师和学生在宣扬国民党的主义。从整体上看，武昌师大的老师似乎无人不是国民党员：

人们注意到，在辽阔的中国各地，官办学校的教师频繁更换，而新老师总是国民党的成员。一些教会学校无法引进国民党员担任教师，学者之间就会形成秘密委员会，来担负起这项工作。^①

然而在广东本省，教育管理权却被陈炯明交给了共产党，他任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负责省内的教育系统。随着陈炯明在1923年的倒台，国民党人又恢复了对教育系统的领导。1925年2月，他们责成中央宣传部编写一套关于历史和党义的权威教科书，用于国民党根据地内各个学校的公共课程。^②

269 新成立的国民政府最早实行的措施之一，就是在7月18日向省教育厅发出训令，要求它改革广东省的学校体系。11月间，省政府通过了教育厅长许崇清的动议，决定将三民主义纳入学校课程；同时规定，小学每周安排一小时、中学每周两小时用于党的教育。另外，还为县、市、省属学校设计了特殊目的的教材。省教育厅还实行一套严格的学校汇报和检查制度，以便监督学校的运作，并维持学校对中央党部和政府指令的服从。^③

新的学校体系于1926年导入时，国民党对省内学校的权威，已

① Chapman 1928, 13.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2月10日。

③ 《广东省政府公报》2（1925年7月18日）：18，26（1925年11月20日）：63—64，71—73。

经从国立学校扩展到了私立学校。已有的学校必须在3个月内按照新的方针注册，所有新学校只在符合方针后才能开课。公立和私立学校都要求悬挂国民运动的标志——青天白日旗，并明确禁止传授宗教。国民党针对私立学校还颁布了附加规定。地方政府机构得到授权，可以解聘任何表现不称职的老师，并强行改变那些被认为“有害教育”的课程和设施（包括书籍和徽标）。省政府还界定了在自己看来足以勒令私立学校关闭的各种违规行为，包括违犯法律、扰乱治安、“败坏风俗”（术语中通常指外来影响的毒害作用，尤其是指传播基督教）、无视相关国家机构的指令、阻碍改革，无正当理由停课超过3个月等等。为了确保这些规定得到执行，国家保留随时检查私立学校的权力，并要求学校定期向相关的国家机构汇报其管理和教学实践的各方面情况。这并不总是必要的。在某些情况下，学校学生同地方党组织紧密合作，去争取教会学校和私立大学的控制权，迫使教师和行政人员服从新的指令。^①

国民党当局把中学生视为党的后备宣传员。1926年2月，省政府在颁布新规定之后不久，又散发了上万份传单，向所有学校简要介绍了国民党对全国政治形势的立场。有时，政府还要求各级学校为一些具体的宣传活动提供大量志愿者。各级校长冒着危险对这些要求不加理睬。广州高级中学的校长，就因为其学校对宣传国民党的教义缺乏热情，而被人检举揭发。私立大学受到如下威胁：如果不合作就得关闭。

① 《广东省政府公报》30（1925年12月31日）：30，46—53。Murdo C. Mackenzie 牧师提交了一份关于汕头地区学生夺取学校的有趣报告，刊于 *North China Herald*，1925年9月25日。1926年在海南岛发生了相似的事件：《暴风雨前的轰隆声》1926：18—22，和《海南教育形势》1926：27—28。至于广州，见 Foster 1928 和 Swisher 1977。

270 到了1926年，学校校长成为当时广东省内最不稳定的职业之一。这当然不总是因为国民党人的缘故。1924年冬，文昌县水北高小校长韩其武据说同情革命运动，而被当地军阀邓本殷杀害。^①但对于一名学校校长而言，追随邓本殷的代价也不菲。邓本殷被南征军击溃后，花县党部请求省政府撤销该县国立中学校长张鹤图的职务，理由是他投靠了邓本殷。根据省里的新规定，公立和私立学校校长的提名在最终确认前，需要教育部门正式批准。张鹤图确实是在邓本殷控制该地区时获得任命的，但其校长职务首先得到了最初成立的国民党政权的认可。现在要求解除其聘任的是地方党部。他们说张鹤图暗中勾结“土豪劣绅”，阻挠国民党在学生中的活动。经过县长的调查，当地党部请愿书上签字人之一的彭彝，取代张鹤图被任命为校长。^②

国民党的教育政策，对城市高等院校的影响最强烈。1924年2月4日，国民党当局将广东高等师范、广东法科大学、广东农业专门学校合并，成立了新的国立广东大学，并于6月9日任命广受尊重的党内元老邹鲁，为新大学的首任校长。在任命邹鲁的前一天，该校就开始对全国范围内的考生进行宣传。邹鲁走马上任后，立刻着手筹集资金，解决新生住宿、膳食和学习问题。他试图申请一部分庚款专项教育基金，但未能成功。最后，两家政府企业——广州士敏土厂（按：即水泥厂）和北江石矿，被要求划拨出部分收入，用于支付新大学成立和办学的开销。教职员工的待遇不是太好（有人

① 《广东省政府公报》27（1925年11月30日）：31，37（1926年3月10日）：31—33，45（1926年5月30日）：124。Swisher 1977：14—15。

② 《广东省政府公报》30（1925年12月31日）：30，46—53，36（1926年2月28日）：105。

说，他们是全国待遇最低的大学教师)，但第一年，新大学似乎在这种安排下运行得很好。^①

次年，国民政府的成立给广东大学带来了一段危机时期。4月间，国民党决定把该校更名为中山大学，以纪念刚刚去世的领袖——在中国，人们一般称他为孙中山。但是广东大学必须首先“改组”，²⁷¹以便同新的校名相称。^②邹鲁支持更改校名，但坚决反对改组计划。1925年12月，他辞去了校长职务。该校60位教员中，有42人尾随他离开了中大，他们强烈抱怨说，该校的管理遇到了太多的政治干预，而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又投入太少。

上述理由，并不能很好地解释集体辞职的动因。无可否认，广东大学已经积累了为数可观的20万元债务，课程设置和大学管理方面的政治干预，也已经成为它的一个特色。实际上，从邹鲁的任命开始，政治干预就一直是该校的一个特色。1925年7月之后教工们被迫“党化”大学，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1924年8月13日公布的大学条例清楚地写道，它们应该“密切联系外部世界，追求最新理论和技能”。^③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广东大学与国民党联系之紧密，从一开始就远较与国际学术界的联系为甚。

邹鲁担任广东大学校长期间，同时还是国民党中央青年部长。他领导的部门在校园里积极开展活动，并通过国立和私立学校体系促进了国民党的政治教育。反过来，各级学校又为国民党输送了大批学生队伍，青年部可以动员他们去协助进行一些本部门无法独立

① 罗家伦、黄季陆 1969, 2: 1073, 1092, 1105; 上海《民国日报》，1925年6月10日；《中国国民党周刊》30（1924年7月20日）：6，矢盾925：2—3。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4月24日。

③ 《大学条例》1924：986。邹鲁的联系见于《国父全集》4：226；李云汉 1966, 1: 437—438。“戴季陶先生演讲”1926：20—21。

完成的大型群众宣传活动。此外，普通的党务活动则由附属于广东大学的一个特别支部来协调，其负责人经常替邹鲁领导的青年部办事、写作。国民党始终干预该校的管理和课程。1924年11月，邹鲁向该校全体教师传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道训令，要求所有教师都成为国民党员（该决定也适用于广州市的高级中学教师）。这道训令在邹鲁任校长期间得到了贯彻：非国民党员的学校教师面临着两种选择，要么加入国民党，要么提交辞呈。^①在高层管理者看来，这项规定只不过确认了他们在党内和大学里的双重地位。国民党负责美国党务系统的前首领黄季陆负责政治系。经济系主任周佛海同时担任中央青年部秘书。可想而知，课程的内容反映了他们的忠诚：到1925年4月，关于孙中山的主义的课程，已经成为学校学分课程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包括该校法学院的学位课程在内。^②

272 国民党在广东大学的管理、教员、课程和校风上的渗透，损害了该校作为教育机构的自治权，最终使它完全变成一所党校。1925年12月，邹鲁被陈公博取代时，校长和全体教职工都对校园的“党化”表示义愤填膺。但是，42名在抗议中辞职的教员里，有38人立即重新确定了自己与国民党的从属关系，他们一道前往上海，壮大了分离出去的西山会议派的队伍。^③如同孙中山逝世后的许多纷争一样，校园里的这场斗争，更是国民运动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而不是对国民党在学校里的角色问题的意见分歧。也就是说，在1925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4年11月11日，1925年4月22日。《七十二行商报》，1925年4月24日；陈公博1926c：63。

② 与黄季陆的访谈，台北，1979年8月27日；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5日；《七十二行商报》，1925年4月24日。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5日；矢盾1925：2—3；李云汉1966，1：434—435。

年冬的抗议中辞职的教师，其怒火并非冲着国民党的控制权，而是指向控制了该校管理和资金的左派。

孙中山刚刚逝世，包括孙文学会、司的派（the Stick Society）和共青团在内的对立学生团体之间，就爆发了争吵，每个团体都游说高一级的派系同盟和党内支持者为自己进行干预。当校园里的矛盾蔓延到党内其他领域，引发了国民运动中更大范围的派系斗争时，广东大学的管理便出现了外来干预。6月20日，该校特别支部英勇地试图将斗争限制在校内。但黄埔军校支部对广东大学支部的决议不满意，前者就广东大学里的“反革命”活动，向中央执行委员会递交了正式的诉状。^①这标志着更大范围斗争的开始，它最终导致了校长邹鲁的辞职。

黄埔军校支部对广东大学管理的干预，从技术上说仅限于党务方面；但鉴于国民党在大学里的统治地位，这并不是什么重要的束缚。由于国民党统治着一切教育领域，黄埔支部对广东大学教育政策和教学实践的干预，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广东大学爆发派系斗争时，黄埔支部正在推出一套更加严格的国立高校内的党化教育模式。它大胆指示大学师生放弃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研究，直接为工农群众服务，后者正用自己的“血汗”维持着知识分子的闲散。尽管邹鲁努力代表国民党，但他从未完全同意这一点，即广东大学仅仅是（国民）党和政府的一所干部培训学校。然而，如果“哲学、文学和科学”教育没有从学校课程中彻底删除，大学未能成为“培养革命政府官员的训练基地”，黄埔支部里反对邹鲁的人就不会罢休。^②

273

① 李云汉 1966, 2: 528—530; Mast 1970: 350;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30日。

② 胡承焯 1925;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6月30日。

本此精神，在1925年7月的第一个星期，黄埔支部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加压力，要求后者就教育政策公布一项决定性声明，它将适用于国民党控制下的所有教育机构。^①此时，甚至连遭受围攻的广东大学校长，也不得不向中央党部寻求指示。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第95次会议上，邹鲁请求后者为其学校确定“教育方向”。中央委员会的回答不能让任何人满意，更不用说邹鲁，因为它重新肯定了各派系竞相宣扬的共同点：广东大学的官方职能是“训练[国民党的]主义”。^②各派的分歧之处在于，应在多大程度上把其他指示灌输到学校的自然、人文以及党义课程中去；在这一方面，中央党部的决定倾向于黄埔模式——所有其他教学目标都变为陪衬。从此以后，广东大学将成为一所党校，培养接受了党义灌输的文职干部，如同黄埔军校是一所军校、培养忠于国民党的军人一样。而且——正如我们将在黄埔军校那里看到的一样——广东大学还承担着另一项功能，即以单独一所权威性的党校来取代现存的高校。

国民党在广东大学问题上的决策，首先标志着一派在斗争中对另一派的胜利，这场斗争在于为党治理念赋予具体形式。1925年12月，周佛海和其他教师一道离开广东大学，前往上海。抵达上海后，他立即为党刊《觉悟》撰写了一篇短文，文中对黄埔支部正在鼓吹的“打倒智识阶级”这一口号提出异议。在“启蒙知识分子”的名义下，周佛海解释了为何需要一群革命干部精英来领导国民运动。在此前发表于独立刊物《孤军》上的一篇文章中，他详细阐释了这一点，他在文中指出，需要用国民革命的“道”对知识分子进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5日。

② 同上，1925年7月28日。

行启蒙，以免工农为未启蒙的党内活动家所误导。革命领袖应该走在阶级觉醒的前面，以利于民族的觉醒。^①对周佛海和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其他批评者来说，错误主要不在于大学强调了党义教育，而在于由错误类型的人提供了错误类型的觉醒。

为了让广东人民懂得国民党党治国家下的公民资格，国民政府制定了全面的教育计划，工会、社会团体、职业社团也成为该计划的目标。民间团体必须向政府登记。具有（政府）认可的教育目标的团体，登记起来没有什么困难，但那些不合政府要求的团体，就被拒绝登记。比如说，省政府确认了广东国际问题研究会的合法性，因为它以宣传国民党的反对不平等条约为己任。在众多职业团体中，政府批准了广州市医师公会的成立，它宣称要推进公共卫生。震光公司工人俱乐部下属的一个宣传部门，获得了农工厅的批准：省政府为与自己宗旨一致的广东省教育会捐赠了12000元，用于该组织的运行成本。^②在1925年8月意外死亡之前，省长廖仲恺曾规定，地方慈善团体如果遵守具体的指导方针，就可以允许它们的存在。但是，这种宽容没有延及传播“迷信”的团体身上。1926年3月，梅棻的国民党筹备政府开始“改良地方风俗”。调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传播迷信思想”、“诱导人们走上歧路”的慈善会。这个慈善会的最轻罪名，也是干扰了梅棻的新政府。在地方政府的要求下，省政府命令该慈善会解散。^③

① 周佛海 1925b: 1—9, 《觉悟》，1925年12月16日。

② 《广东省政府公报》26（1925年11月20日）：54—56，27（1925年11月30日）：44—49，32（1926年1月11日）：17—21，36（1926年2月28日）：83。

③ 《广东省政府公报》45（1926年5月30日）：29—30。

省政府还与其他各级政府和党部合作，共同举办节日庆典和公共集会。省政府协助组织每年的五一庆祝，为香港罢工工人及其家属举行一系列大规模的公众欢迎仪式，并承担“沙面烈士”——他们在广州租界入口处被殖民地军队枪杀——的殡葬和纪念工作。省政府还参与组织了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后和1926年逝世一周年的追悼活动。无疑，省政府策划的规模最大的宣传攻势，就是为1925年夏省内人口普查而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培训和宣传活动。

让老百姓成为公民的第一步，就是将他们在市、县人口册上进行登记，从而使他们更容易为国家调查人员接近。1925年，广州市政府的一份备忘录宣称：“人口调查是城市管理的基础。”“以前本市所有的人口登记都不准确，因而以前的人口调查不足取信。”^①地方官员指责人们以前从未主动进行人口登记，并高度怀疑现行人口普查计划。经验告诉人们，人口普查总是预示着一项新的人头税，或者某种形式的劳役征发。^②在这种情况下，广州市长伍朝枢决心纠正以往人口普查的弊端，尤其热心于克服应答者伪造回答的倾向。他决定打破先例，不用城市警察作为人口普查员，而是劝说广州市民，告诉他们配合普查符合他们作为市民的利益。但是，执行这项任务的政治讲师太少了。伍市长于是求助于广州的国立和私立大学校长，请求他们给高年级学生放假1周到10天，以便对这些学生进行人口普查前的集中培训和宣传。他暗示说，对这项要求的任何拒绝，都不会被视为善意的拒绝。^③

到了7月份，市政府提交了一项具体的人口审查计划，请求省

① 《广东省政府公报》4（1925年8月1日）：9—11。

② “南路各属县长会议议决案”1926：15。

③ Swisher 1977：14—15。

政府批准。该计划构想了一项群众宣传活动，组织全市学生接受“宣传员”的培训，然后（在警方的保护下）走上街头，向户主和路人解释，为什么他们应当向革命政府登记自己的姓名和住址。按照章程，内政部将负责保管人口登记册。内政部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同省、市教育当局取得联系，与学校校长和学生代表商讨有关事宜。9月5日，在省教育厅主管人员温仲良主持下，28所国立和私立学校的48名代表召开会议，为挨家挨户的宣传活动制定了步骤。接下来两星期，2000名学生分别在广州市的5个战略点参加了紧锣密鼓的工作布置会议。学生们然后由学校编成宣传队，带着普查表格和解释此次活动目的的传单，被派遣到城市的各个地方，在表格发放前先进行为期3天的集中宣传工作。^①

然而，国家对学生们下达的其他指令，却与人口普查活动发生了冲突。9月23日是一个星期六，广州城里的学生休假一天，以便参加在沙面惨案中的53名遇难者的国葬。学生们加入了由成千上万人组成的庄严的游行队伍，他们立刻走到了灵车前面。普查宣传工作因此增补了一天，以弥补预料之外的时间损失；于是，在紧接着的星期一，学生们又恢复了普查工作。学生们的努力得到了应有的表彰。参加沙面纪念游行的学生没有得到正式的承认，但参加普查宣传活动的学生则被授予纪念章，以表彰他们对革命的贡献。^②

党务组织

276

参与纪念游行、联合抵制和群众集会中的人，可以从其参与的

① 《广东省政府公报》4（1925年8月1日）：9—11，6（1925年8月15日）：2。

② Swisher 1977：17—18。《广东省政府公报》16（1925年9月17日）：25—29。

活动中得到回报。但是，大众仪式不会自发产生。在群众运动的表象后面，国民党的群众组织进行了大量的组织、准备和训练工作。国民党一大责成一些中央部门，在其各自不同的领域训练干部，组织群众宣传。中央妇女部、青年部、劳工部、农民部以及后来的商民部都接到训令，要求它们扶助民族觉醒工程。中央各部之下，都设有一个相应的省级部门，各自负责宣传、妇女、青年、劳工、农民和商人（方面的工作），每个省级部门依次监督广东省各市、县级相应部门的工作。这些党务部门是群众演进的组织支柱。

没有哪个词语可以涵盖所有党务部门承担的教育任务的范围。为了尊重宣传部干部的敏感心态，“宣传”这一字眼，基本不会出现在其他部门职责的界定中。“教育”往往会替代前者的位置。比如，农民部肩负着“农村教育”的任务，劳工部承担“工人教育”的职责，而妇女部就负责“妇女教育”。在实践中，这种教育的说法很少意味着在读写和计算能力上的训练。学校教育是省教育系统的职责，是国民政府而非国民党管辖范围内的事情。在这一点上，为了尊重国家教育系统，当国民党中央表述青年部的职责时，它非常小心，避免使用“教育”这个字眼。取而代之的是，中央青年部被鼓励去“引导省内学校学生的政治观点”。^① 不管党内各个部门在其章程中如何定义自己的职责，它们都把教育和政治引导看做一种权利，即它们有权训练自己的政治教员、生产和传播自己的宣传内容。

至少从设置上看，中央宣传部是最重要的党内训练和宣传机构。在实践中，情况并非如此。从1924年2月迁至广州，到一年后孙中山去世，中央宣传部的贡献可谓名不符实。它既没有对国民党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5日。

的宣传形成中央集权控制，也没有主动做些什么事情。该部负责出版《国民党周刊》——这本杂志由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冬创刊，新年伊始，该部就接手了这本现成的杂志。假如该部多表现出一点积极性，也许它还能接管广州《民国日报》，一份由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23年创立的报纸。但是，该部不愿承担这份责任，直到孙中山把该报推给它为止。^①类似的，尽管该部开办了一个宣传讲习所，或称宣传员养成所，但这个讲习所只办了一期为时4周的培训班，就关闭了，远远不能满足当时对训练有素的宣传人员的需求。因此，中央其他部门，甚至连省级和县级部门，不得不主动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干部讲习所。^②

277

省级宣传部的表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的表现，部分弥补了中央宣传部早期工作中的不足。按照宣传部的章程，它有权向地方党报提供宣传资料，以自己的名义印刷和传播材料，检查和批准其下属市、县支部准备的材料。它监管许多宣传工具，推出了大量宣传材料。1925年11月，省宣传部着手管理广州市的一家重要日报，同时开始在广东省建立国民党的地方日报网络。1926年4月，该部又开始发行一份官方月刊。^③该部建立了一所培训宣传人员的学校，在假期派遣学生宣传队到省内最偏远的角落进行宣传，开办图书馆和阅览室，推动党立书店的开设，视察

① 罗家伦、黄季陆 1969, 2: 1133。1924年9月以前，广州《民国日报》一直由右派的广州市党部管理。与黄季陆的访谈，台北，1979年8月27日。孙中山将报纸移交给中央宣传部，也许是要表示对广州党部的不赞成。

② 讲习所最初倡议于1923年10月，最终开办于1924年6月29日，拥有360名学生。罗家伦、黄季陆 1969, 2: 1032, 1100。又见“中国国民党讲习所组织决议案”1924, 4, “中国国民党讲习所开学记”1924: 6。

③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5日。月刊刊名为《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

学校，敦促三民主义课程的开设，而且几乎每个月都要印发数以千记的传单、小册子和图片。即便如此，广东省宣传部的作为，只占该省党部全部活动和工作的一小部分。省级妇女、青年、商人、劳工和农民部，与它们中央级别的相应部门一样，都在各自领域肩负着宣传使命。这些部门的努力加在一起，构成了广东省党部完成的宣传工作的主体。^①

当然，宣传部是广东省党部内负责宣传工作的技术核心。该部创建了艺术宣传委员会，利用广州美术学校的专业才能，提高了张贴在省内各处城镇乡村的图片和宣传画的质量。^② 该部监督其他宣传机构反馈给省党部的信息，总结它们的经验教训，以便提高宣传工作的质量，加强宣传对广东省的影响。比如，在1925年11月，省宣传部注意到了军队政治部提交的关于第二次东征的报告。报告指出，在激发不识字的农民对此次革命目的的同情方面，图片要比文字传单更有效。据此，宣传部调整了自己的宣传活动。在为农村偏远地区准备散发材料时，该部把原先的文字与图片材料比例颠倒过来，从3:1变为1:3。^③

省宣传部的另一个主要职责，是为地方党务工作培训宣传人员。1926年3月，针对省党部和地方党部对市、县级宣传人员需求量的增加，省宣传部为宣传员讲习所制定了一些计划。需求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紫金、英德、南雄和西江县的地方党部，准备分别建立自己的宣传讲习所。在此之前，省宣传部曾经连续号召市、县

① 《宣传部工作概要》1926，1：8—11，2：9—10，3：12—14，4：5—6。

②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4（1926年6月）：5—6。

③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15。参见张启雄1926：27。

1925年11月省宣传部的总产量为7万张照片和2万份书籍、小册子。《宣传部工作概要》1926，1：9。

级党部提名候选人，去参加中央宣传部宣传员讲习所，以满足地方上对训练有素的宣传员的需求。然而，当中央的讲习所明确表示没有兴趣为地方训练宣传干部时，省宣传部警觉到了一种前景，即讲习所一旦在各县泛滥，省宣传部将失去对地方活动的控制。2月间，省宣传部下令，没有它的批准或者参与，不能随意设立宣传人员讲习所。接着，它主动建立了一家宣传讲习所，以满足地方党部的需求。^①

宣传讲习所原先计划招收大约20名学生，但在1926年3月，地方党部和其他机构却提供了800位申请人，要求参加新开设的省讲习所。鉴于申请者众多，宣传部将首期培训班的规模翻了一番，扩展到40人。成功入选者每周有30个课时，课程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和武术。18位兼职教员是从省宣传部、中央青年部以及广州市的一些大专院校抽调过来的。教员的选择，反映了讲习所创建人甘乃光——一名激进派国民党人——对进步的工农政策的信奉。^②

宣传讲习所于1926年4月3日开学，当时（广州）正处于一场政变带来的混乱之中，数周以前，蒋介石下令逮捕中山舰上的共产党人，声称他们阴谋攻击他的指挥部。3月20日凌晨，蒋介石发动了一场政变。他借口发现了共产党的阴谋——在中山舰上胁持他，

① 《各縣市黨部及籌備處工作報告》1926，23，《中國國民黨廣東省黨部黨務月報》1（1926年2月）：13，30，36—37，42。《廣東省執行委員會宣言及通告》1926，8，《宣傳部工作概要》1926，2，10。

② 《宣傳部工作概要》1926，2，10。甘乃光是國民黨左翼的一名獨立黨員，已經開始相信國民革命中階級鬥爭的功效和必然性。見 Sansom 1988：第五章。提供教師的大學包括廣東大學、嶺南大學和國民大學：《宣傳部工作概要》1926，3，12—13。

279 趁机宣布广州市戒严，并派警察和军校学生占领了政府大楼，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部。^①激进分子在此次事件中受到了威胁，一些政治教员没能够在宣传讲习所授课。

宣传讲习所的学员们没有被吓倒。他们开始自己给自己上课，组织了许多课外活动来弥补正规课程的不足。这些课外活动包括准备宣传材料，参与公共宣传活动，在相关新闻机构、报社、农工组织、教育机构和政治培训院所里接受培训。学生们还自发成立了三个社团：一个学生社、一个辩论社和一个讲座社。这些社团活动，不仅让学生们在正式学习之外有事可做，而且使更多的人得益于该讲习所，而不单是第一届培训班的40名注册学员。培训班学员担任了一个所外教育单位的老师，为五十多名没能前来讲习所受训的国民党员开设辅助课程。针对一些具体问题和事件，学员们还在省内作巡回宣传，包括1926年6月的沙面惨案周年纪念。^②

学员们在新闻机构和报社的实习，是他们所受训练中的关键一环，因为，扩大党报系统以补充或取代私人报纸，是省宣传部在地方上推广党治国家的重要举措之一。1924年，国民党在广州市的报纸上得到了充分的宣传，而在广州市外和附近各县的报刊杂志上却出现得很少。1925年秋、冬的两项重要进展，改变了这一状况。首先，蒋介石和他的指挥官们成功地在粤东和粤南发起了军事远征，几乎清除了省内的所有敌对军事力量，从而为国民党和政府的权威扩展到广州以外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其次，广东省宣传部被强烈鼓动去扩展其活动范围，得到了在毛泽东领导下重

① 蒋介石 1968：39—40；Jordan 1976：39；M. Chan 1975：31。

② 北伐军离开广东之时，毕业生尚未配置到市、县党部中去。《宣传部工作概要》1926，3：12—13；4：5—6。

新恢复了活力的中央宣传部的帮助，在人力和物力方面为此作好了准备。

到1926年初，中央宣传部接管了广州《民国日报》，并已开始发行一份反映“中央意见”的新的权威杂志——《政治周刊》。1925年11月，中央宣传部说服省宣传部接管了广州市内的另一家日报，即《国民新闻》。其用意并不是让《国民新闻》和中央宣传部的广州《民国日报》竞争，相反，省宣传部的目标在于取消这家私人报纸的发行权，因为它是中央宣传部的眼中钉。《国民新闻》令国民党很是尴尬不快，它原本由一个名叫“文华堂”的政治团体编辑。该团体坚持暗中攻击共产党和国民党中的亲共派。该报主编由甘乃光担任，在处于省宣传部直接控制之后，它就突然转变调子，并获得了中央党部的支持和经济资助。^① 280

随后，广东省宣传部将注意力转向地方报纸。依照广东省党部组织章程的第六部分，省宣传部被授权去纠正、检查和指导所有市、县级党内出版物。为了履行纠正和检查的职责，省宣传部责成所有的地方党部，在其出版物发行后应立即提交审查，从1926年初起，该部每月要检查和纠正大约30种报刊杂志。该部还肩负着拓展党内出版物网络的使命，要在省内最偏僻的角落里——往往是在荒地和乱石滩上——播撒党义的种子。在这方面，省宣传部最宏大的事业，便是促成一个官方党报《民国日报》系列，它从首都广州市起，南抵与越南北部东京相邻的地区，东至海岸线，北

① 《宣传部工作概要》1926，1：8；李云汉1966，1：384。1925年11月至1926年2月甘乃光不在时，报纸由陈孚木编辑。从1925年11月开始，政治委员会每月拨给1000元的津贴。《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14；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20日。

达与福建相邻的几个县。^①此举的意图，也是以党报取代各地已有的报纸。

1925年11月18日，省宣传部颁布了一系列《关于举办党报的规定》，为《民国日报》网络的拓展工作提供了指导方针。这些规定具体列出了一些前提条件，任何已有的或正在拟议的地方报纸，在宣称自己为国民党官方机构之前，都必须符合这些条件。实际上，这些规定赋予了省党部绝对权力，使它有权决定哪些报纸将获得授信，并有权控制那些获得授信的报纸。这些规定得到了有力的贯彻。申请获得《民国日报》报名的报纸，如果达不到规定的要求则被拒绝。比如广东南部的一家钦廉《民国日报》，主要归某个人而非某个得到认可的党务机关领导，于是没有获得授信。其他获得授信的报纸，如果不能遵守授信规定的要求，则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江门《民国日报》的编辑遭到了一次正式的训斥，因为他们没有向省党部的宣传干部们呈交样报，用以常规检查和审批。^②

281 这项活动，大部分开展于广东省内的军事征伐结束和北伐开始以前的这段时间。到1926年6月，已经有8个版本的地方《民国日报》正在寻求授信，另有3家正在为此作准备。它们相互补充，形成一种大拼盘似的报业格局，覆盖了省内军事征伐结束后国民党控制下的各县和各地区。每家《民国日报》都由当地市、县党部领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5日；《宣传部工作概要》1926，2：9—10，3：12—14。在1928年《中央日报》出现之前，《民国日报》是正式党报的统一刊名。广东省党部扩展其网络期间，《民国日报》仅有的两个版本来自上海和广州。北京版大约在1925年春孙中山抵达时出版，又在北京政府命令之下关闭。罗敦伟1963：19。

②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10—11，28；《广东各地党报消息汇止》1926：41。

导，如果该市县恰好是某个大区域的商业或行政中心，则该处党报还要满足该地区人民的需要。比如，东江《民国日报》虽然以惠州市党部为基地，却要在更大的东江地区发行。钦廉《民国日报》的编辑，建议向广西钦州和南粤深处的廉州之间的地区供应该报。两阳《民国日报》的发行区域，仅限于广东中南部的阳江和阳春，即“两阳”之间的地区。位于海口的琼崖《民国日报》，是为整个海南岛服务的。岭东《民国日报》从汕头一直发行到整个粤东北地区。中山、江门和东莞的市、县党部也力求获得授信，以建立各自的地方版《民国日报》，希望自己的报纸和其他报纸交相呼应，从而使国民党的日报，可以广泛覆盖革命军在省内军事行动后占领的所有地区。没有哪个地区会没有自己的党立日报。^①

地方《民国日报》网络从计划到实施，遭遇了两大障碍。一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地方编辑与负责监督其工作的省党部干部之间的政治分歧。在这方面，《民国日报》网络扩张所面临的困难，与邹鲁当初试图在校园里推行党化教育时困扰广东大学的问题很相似。的确，两者都激化了如下争论，即党治需要一个纪律更加严明的政体，而不是它已经习惯于维持的自由主义共和国那一套。当一个统治党派内部四分五裂时，它是不可能用一个声音说话的。第二个范围的问题，来自北伐前几个月国民党面临的严重的财政困难。一开始，这些报纸获益于蒋介石成功的省内征伐，但不久以后，就成为他那统一全国的雄心的受害者，如果必要的话这一雄心将以广东为抵押。

① 《广东各地党报消息汇止》1926：41；“阳江县党部”1926，3：49，4：32—35；《琼崖特别委员会工作报告》1926：25—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3（1926年4/5月）：77；《中山县党部宣传部工作经过情形》1926：39。

就广州来看，派系政治纠纷的问题，是一个要靠党外干涉来解决的纪律问题。这一问题使岭东、江门和琼崖的地方报纸陷入一片混乱。岭东《民国日报》编辑李春涛，受到省党部一个名叫范其务的资深干部的阻挠，后者在汕头很有权势。^①在这个案例中，编辑李春涛是通过共产党的关系任命的（作为周恩来在汕头的手下），而汕头市长范其务，则是少数几个在省党部享有一定权威的反共干部之一。范其务在这件事中占了上风。然而更多的情况是，地方编辑们被打上了“右翼”标记，国民党则代表群众出面干预、纠正地方上的偏差。江门《民国日报》和琼崖《民国日报》由于罗汉的介入，都遇到过这种问题。罗汉是一位昙花一现的国民党激进分子，哪个地方的党务看起来为激进分子所控制，他就在哪里出现。他以宣传干部的身份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在东征过程中，他对共产党进行了尖刻的攻击，因而受到周恩来和黄埔军校特别支部的批评。第二次东征时，他来到江门，并建立了江门《民国日报》。^②不久，该报的主编陈日光在一次劳工纠纷中被捕，围绕此事，地方党部争执不休。江门的劳工运动因为发动了一系列罢工而颇负盛名，卷入罢工的不仅有地方上的雇工，还有国民政府和党务机关。第二次东征时，江门总工会正为争取提高工人工资而积极备战。次年2月，南征正在进行过程中，总工会和市政府发生争执。正是在这个时候，陈日光和地方餐馆茶楼工会的一名干部打起架来，被该工会逮捕。作为报复，国民党江门市支部筹备委员会逮捕了其他一些抗议者。随后，一些区分部向省党部联合请愿，要求惩处江门市支部的行

① 李春涛由中央宣传部任命，接受毛泽东的领导。《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3（1926年4/5月）：77，84。

② 《本党部东征日记摘要》1925：13，《琼崖特别委员会工作报告》1926：25—26。

为。事情最终惊动了省工人部长、共产党人刘尔崧。陈日光和江门市支部受到了惩处。罗汉和他的江门《民国日报》就这样消失了。^①

离开江门以后，不知疲倦的罗汉追随第四军，又南下来到海南岛。在海南，他参与了创办琼崖《民国日报》的准备工作，又卷入了一场纠纷，最终，创办这份海南报纸的计划也搁浅了。筹办琼崖《民国日报》的工作由海南特别委员会正式负责，后者是省党部为改组并监督地方党务而出面成立的4个特别委员会之一。海南特别委员会为该报任命了一位经理兼编辑，并准备由当时占领海南的第四军司令部来承担该报的创办费用。但大约在1926年二三月间，罗汉来到海口，成功地说服那位经理兼编辑，拒绝接受第四军提供的资金。显然，这些钱由于同第四军的左翼政治部有关而被视为不干净。罗汉从其他渠道筹得3000元，买下了当地已有的一家报纸《海南岛日报》，想把它改造成《民国日报》网络中的一家正式党报。海南特别委员会得知原计划被人为改变，于是发出正式抗议，并阻止了这项行动。到了1926年6月，海南岛上的党报计划毫无着落。^②

283

筹备北伐耗费了广东省大量的财政收入，这是限制《民国日报》地方网络发展的第二个因素。省政府的税收基地迅速扩张；随着对南部和东部地区的占领，省政府的收入显著增加。然而，财政收入的增加无法赶上招募装备北伐所需大量兵力的开销，因此，把税收返还给省内纳税地区的希望非常渺茫，这带来了相关地区村镇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23，34—35。关于江门的劳工组织，见林翼中1926：21；关于劳工争执，见李笠农1926：18—33；又见《工人部工作报告》1926：24。江门《民国日报》未被列入1926年6月的通行出版物之中。见《广东各地党报消息汇止》1926：41。

② 《广东各地党报消息汇止》1926：41；《琼崖特别委员会工作报告》1926：25—26。

人民的强烈不满。省党部同样资金匮乏，没法继续资助南部和东部的地方党务活动。^①位于惠州的惠阳县党部，只能支撑几个月的东江《民国日报》发行；而由于东莞县党部的资金问题，东莞《民国日报》第一期的发行，就被耽搁了一段不短的时间。^②

284 这些日报一旦遇到财政困难时，无论是省党部还是中央党部都无法帮助它们。但有一例，有钱的地方人士为党报提供了援助，希望（借此）削弱共产党在报纸管理方面的影响。这就是位于汕头的岭东《民国日报》。该报的创办成本估计高达1万元左右，这笔款项，据说是通过禁烟捐、出售土匪财产和征汕革命军缴获的敌军战利品来筹措的。但军队和禁烟局没有显示履行其义务的任何意愿。甚至连国民党中央财务部每月为该报提供的最低额30元补贴，对于中央党部有限的财力来说，也被视为过于沉重。财政部通知中央执行委员会，表示它无力支撑汕头的新报纸，中央执行委员会便将此事交给广东省执行委员会。但是，省执行委员会也无力为该报提供创办和运行费用，于是把责任转移给汕头市党部。到了汕头，这种推诿终于打住了。汕头是一个大型的工商业城市，有一批富商，在他们的支持下，岭东《民国日报》最终得以印行。看来，范其务在取得地方商人和实业家的支持上发挥了作用，当特别委员会打算将该报管理权交给他的对手李春涛时，这些人的捐助似乎抵消了地方特别委员会的影响。国民党地方委员会所能提供的财力支持，无法与范其务所能支配的相比。^③

① Fitzgerald 1990a.

② 《广东各地党报消息汇止》1926：41。

③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3（1926年4/5月）：77，84，4：56。汕头的民族工业包括发电厂、榨油厂、罐头厂、酿酒厂和蒸馏厂。Chesnaux 1968：415—419.

国民党内的妇女运动家认为，妇女宣传需要迥异于其他部门的干部班子和宣传技巧。当然，妇女部的宣传内容与国民党的整体路线一致；对父权制和“封建”习俗的攻击，是在国民运动的反帝、反军阀修辞下进行的。在其早先阶段，政治革命很少对妇女问题的阐述构成限制。革命的社会目标看来与国际无产阶级大团结的呼唤相契合。维拉·伏拉德米洛夫娜·维什雅科娃—阿基莫娃（Vera Vladimirovna Vishnyakova-Akimova）是俄国代表团的翻译，曾在广州的1926年妇女节庆祝活动上参加一次小品演出，在其中扮演一位年轻的中国妇女，她回忆说：“我表现的是觉醒的中国，向苏维埃俄国伸出双手。不管这样看起来多么令人惊讶，但台下的中国人在我身上看到了他们自己，他们对我报以震耳欲聋的掌声。”^①其实用不着惊讶，因为男男女女们在觉醒中的女性这一象征中看到了他们自己，并从她这一抗争中汲取力量，来释放一个被奴役的国家那被压抑的希望。妇女解放运动对国民运动的附从，就是在这样一个具有高度象征意味的舞台上进行的。在这里，被压迫的妇女由一个表达具体性别要求的形象，最终成为一个变形了的象征，表达的是集体性的民族苦难。^②在那个时候，人们认为妇女将与中国一道觉醒。

如何唤醒她们，则是一个不同的问题。在许多妇女运动家看来，男人似乎不可能承担起解放妇女的重任，公共集会、散发小册子和杂志等正统的男性（宣传）方法，并不总是适合于“妇女大众”。^③为了弥补这些不足，妇女部推出了新的方法。该部聘请了

① Vishnyakova-Akimova 1971: 209, 引自 Gilmartin 1994: 203。Christina Gilmartin 提供了关于广东有组织妇女运动的详尽调查。

② 见本书第二章。对人民共和国时期文学中这种变形过程的出色分析，见 Meng Yue 1993: 118—136。

③ 《妇女运动决议案》1926: 70；何香凝 1926: 69；一鸿 1924。

一批宣传人员，组成独立的小组来研究合适的宣传策略。它还成立了妇女运动讲习所，让妇女运动家们认识到自己的作用。从1925年开始，该讲习所的毕业生前往工厂、医院、护士学校，以及其他一些以妇女为雇员主体的地方进行宣传。此外，该部还为职业妇女定期开办夜校，召集妇女举行公共集会，每逢庆典或纪念日，它还针对妇女问题组织宣传活动。该部发行一份《妇女之声》月刊，印发大量革命传单。该部干部还帮助附属组织开展工作，包括广州妇女会，它们共同发行《妇女旬刊》杂志。^①

中央妇女部之下是广东省妇女部，在许多市县，只要有党部的地方就有妇女部。在小一些的城市中心和乡村的政治训练和宣传工作方面，它们发挥了关键性作用。省妇女部聘请了5位全职宣传员——比省宣传部还要多——还出资成立了一个名叫大众剧社的戏剧团体，其足迹遍及省内城乡各地，表演充满“革命意义”的作品。省妇女部还专门成立一个宣传部门以鼓励妇女加入国民党，并以自身的名义编写、印刷和散发传单。与中央妇女部一样，省妇女部也派宣传员前往学校和公共场所，就妇女们关心的独特问题作讲演。^②

实际上，省妇女部成了一条有效渠道，联系着从中央到市、县的各级妇女部宣传网络。1924年，中央妇女部很少行使其协调和管辖权，因为很少有这个必要。当何香凝接管中央妇女部、邓颖超担

① 妇女部宣传员包括冯明光、王国英和李善琴。从事宣传工作的部内干部包括伍夏里、高雪如、冯景云和高恬波。《[中央]妇女部工作报告》1（1926年5月）：22—24。（注意，中央和省妇女部发表的报告标题相同，这里用[中央]或[省]加以区分。）何香凝1926：70；《中央党部妇女部民国十三年三月至十五年三月工作摘要》1926：26。1924年，在广州的国际妇女节庆典上，散发了超过1万份的小册子。《妇女日大运动经过情形》1924：5。《妇女之声》由中央妇女部和广东省妇女部共同编辑。

②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5，20；《[省]妇女部工作报告》1926，1：19，2：13—14，3：19—21。

任省妇女部秘书时，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这两位女性领导了一支出色的队伍。^①省妇女部协助中央妇女部联合编辑、发行《妇女之声》杂志，还发行广州市妇女部主办的《新妇女》。省妇女部的工作人员与中央和广州市妇女部通力合作，共同策划了1926年3月8日的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在广州市之外，省妇女部帮助在罗定县成立了另一家妇女宣传讲习所，为1926年春季在广东省内成立的4个地区特别委员会任命了妇女宣传员，随后将触角伸展到省内最南端和最东端。此时，妇女运动已经波及到150万妇女。于是，中央宣传部开始召集正式的省市宣传员会议以协调其活动，并成立了一个联合宣传委员会，以便同省妇女部进行联络。^②

国民党中央青年部卷入了另一种干部培训和群众教育。该部继承了青年激进主义的悠久传统，也因袭了由此而来的一切纷争。在该部成立的1924年之前几年，一场全国性的青年运动就已席卷而来，支持它的组织各不相同，既有基督教青年会，也有共产主义青年团。1924年，该部卷入了一场大众唤醒运动的潮头，其发动者是一群相互竞争甚至敌对的政治派系，它们在国内大多数的主要城市发行报刊、组织游行、发表街头演说、举办群众教育班。邹鲁在中央青年部成立后担任了18个月的部长，他把运动中显露出的青春活力，从一般意义上的大众唤醒引向了青年自身的启蒙。青年部的注意力，放在了各级学校和广州市及附近工厂里的青年身上。

286

① Gilmartin 1994.

② 《[省]妇女部工作报告》1926，1：14，19—20；《[中央]妇女部工作报告》1926，22。对妇女运动宣传协作的批评出现于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何香凝1926，69；《妇女部宣传会议案》1926。Gilmartin 1994，208.

我们注意到，在组织公立、私立学校系统以及广东大学——由该部领导人邹鲁控制——的党务宣传方面，青年部起到了关键作用。该部还在广州建立了自己的学校，称为“平民学校”；并提交了一份普通教育纲要，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① 学校系统对该部的回报，是为之提供大量青年人，以协助完成青年部职员觉得太大、难以单独进行的宣传运动。除了提供大量的小册子，该部还准备和出版了许多引人注目的剧本，从1926年起还出版了两种党内周刊，分别叫做《童子军》和《青年工作》。最后，与国民党其他中央部门一样，该部密切关注着那些具有自己的宣传和训练意图的附属组织，特别是全国学生总会和青年军人联合会。^②

在省一级，广东省青年部开办了一个工作人员讲习所，与国民党其他部门所办的相似；并出版了自己的月刊《广东青年》。青年运动讲习所创立于1926年4月，就在省宣传部的讲习所开班的同一个星期。其首期课程预定为3个月，到7月份为止。进入讲习所要通过入学考试，考察应试者对唯物史观概念的熟悉程度。教学大纲上的课程，包括对农民和劳工运动、社会主义历史、帝国主义实质以及世界反殖民主义斗争背景的介绍。由毛泽东讲授的地方农民运动——其思路与邻近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当时正开设的课程相似——是最冗长的课程之一。惟一能在课时上与毛泽东匹敌的，是由讲习所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5日；《广东青年》3（1926）：14；《中国国民党周刊》26（1924年6月22日）：4。

② 学生们参加了东征、南征和省港罢工及联合抵制。学生联合会出版了《中国学生》和一系列反基督教论著。《觉悟》，1925年12月22日；《全国学生总会之宣传计划》1924：5—6。青年军人协会出版了《中国军人》，由王一飞编辑，发行量为每期5000到1万份。1926年该协会从青年部管理之下移交给武装部队的政治训练部。陈公博1926c：61—63；《青年部工作报告》1926：14。

主任李越廷开设的课程，他是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的老同事，对农民运动的目标怀有同情。事实上，所有级别的教员中都有共产党人。287
在其初始计划阶段，省青年讲习所的预期教职，大约一半分配给了共产党人。但计划和实行之间插入了中山舰事件，与省宣传员讲习所的情形一样，蒋介石的插手抑制了青年讲习所内的激进影响。尽管如此，当青年讲习所于4月间最终设立时，共产党人仍构成了全体教员的大约三分之一，也占据了所开设的全部课程的三分之一弱。7月间，当北伐大军越过省界进入两湖时，首期学员按期毕业了。^①

国民党多数中央部门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24年1月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或者至少到国民党发动部门性群众运动的自我尝试；而中央商民部的出现，则源于一场灾难之后的反思——它降临到广州的商人社群，动摇了国民党领导层的满足感。政府拒绝归还在运往该市商团时被缴获的一批小型武器，并拒绝批准商团继续活动。作为回应，广州商人于1924年8月25日关闭了店铺和市场。罢工在10月10日——国庆日——的冲突中达到极点，当时商团向正在靠近商业区的示威者开火。这促使国民党人采取行动。一周之内，蒋介石率领一队黄埔学生军前往镇压“叛变”的商民，将该市

① 《广东青年》于1926年8月出版时计划按月发行，但从第二期开始变成了双周刊。列名早期计划的15名成员，包括7名共产党员：恽代英、沈雁冰、肖楚女、张太雷、邓中夏、黄平和毛泽东。恽代英、毛泽东和郭沫若一道加入了10名教员之列，担负着讲习所的实际教学工作。在总共291个学时中，毛泽东负责61学时，恽代英16，郭沫若13。《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概要》1926：1—13；《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42，4（1926年6月）：66—67。关于李越廷与彭湃的早期联系，见彭湃1924：5。

的整个商业区夷为平地。这场悲剧至少告诉国民党当局，忽视商人社群的力量，只能给自己带来危害。5天之后的10月20日，国民党设立了中央商民部。^①

288 设立这个新的部门，意在将商人组织起来，将其置于国民党的庇护之下，并围绕国民党的目标来动员他们，以防止他们进一步的抵制。与党内其他部门一样，中央商民部出版了一系列书籍、小册子和文件，发行了定期月刊《商民运动》，并通过广泛的省级和地方（商民）部网络进行宣传。^②该部成立了一个专门的商民运动讲习所以训练党务干部。它也是最早优先考虑群众组织而不是群众宣传的国民党中央部门之一，建立了一个组织网络，以将商民置于国民党的直接控制之下。它们被称为“商民协会”，与独立的商会相对立。它还为自己的群众组织配备了政治教育和出版部门。在省一级，广东商民部建立了自己的商民运动讲习所，以训练地方党务干部，并出版了《新商民》月刊。^③

商民运动在其不祥的开局之后迅速发展。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训令该部将小商人组织起来，与统治着商会的金融家、工业家和大贸易商作斗争。国民党的宣传中对“小”与“大”或者“民族”与“买办”资本家的简单划分，并没有把握中国资产阶级内在紧张的复杂性，尽管这似乎没有妨碍那些不满于已有的公共协会的

① Bergère 1989. 关于两种相互对立的姿态，见罗家伦、黄季陆 1969，2：1119—1120，1140—1141，和 L. Chen 1989。

② 《[中央]商民部工作报告》1926：19。刊物的出版因北伐开始而延期。1926年9月，第一期不是（按照最初计划）在广州而是在汉口出版。

③ 讲习所于1925年10月1日开班，持续了3个月。甘乃光 1926a：65—68。刊物于1926年1月在广州开始出版。省商民运动讲习所的报告见《[省]商民部工作报告》1926，1：23—26，3：31—36，4：17。亦见《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20—21，24，27，41，44，3（1926年5月）：89。

商人去利用商会与国民党的商民运动之间的差异。国民党人的宣传反过来利用了这些差异，他们承诺，只要加入国民党组织的商民协会，小商人就将对公共事务拥有更大的发言权。这一策略相当成功。当1927年国民党人北上抵达上海时，其商民组织使小商人和某些富有的资本家——他们对既有商会的活动感到不平——产生了同情。^①

在国民党二大上，当来自农民部的代表听到商民部人员宣称自己偏向于群众组织时，他们会心地点头同意。农民部从一开始就专门从事组织工作。农民部长彭湃在担任该职务之前，已经在广州以东的海陆丰地区积累了多年的农民组织经验，他在那里懂得了密集的群众组织的价值，^②但他并没有忽视宣传。在国民党所有中央机构中，农民部的出版记录令人印象最深刻：它包括《农民运动》周刊和《中国农民》月刊，此外还有令人难忘的系列专刊，和经常性的宣传指南。但其出版物不像其他部门的那样针对全部读者。相反，它们是供本部门的干部及其附属组织中经过挑选的人员使用的。只是由精心挑选和训练出来的特派员预先消化之后，农民部的宣传才以小剂量的口头宣传形式到达农民身上。^③

① 《商民运动决议案》1926：68—69，Fewsmith 1985。

② 1924年11月，农民部长彭湃被继任的共产党员罗绮园替代。罗家伦、黄季陆1969，2：1149—1150。彭继续担任广东省党部农民部长。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5日。对彭湃在海陆丰活动及其对中国革命之意义的不同解释，见Galbiati 1985，Marks 1984，Hofheinz 1977。

③ 《本部特派员大会之决议案》1926：2。《农民运动》先于1926年8月在广州发行，后来迁至汉口。《中国农民》首先于1926年1月在广州出版。农民部最初于1924年5月受命编辑关于农村改革的论著系列。到1926年10月，已刊行3个单独系列的31篇论著。罗绮园1926a：3，《本部工作报告》1926：3—4。后一篇报告还注意到，一份“宣传大纲”是农民部在廖仲恺遇刺一周年之际起草的。

289 在这里，农民部似乎听取了苏联顾问的意见，他们介绍了列宁的经典著作《怎么办？》（1902）中对宣传和鼓动所作的区分。与国民党通常的实践相反，列宁提出，宣传的功能是将“许多观念”介绍给“少数人”，鼓动则与之相反，应该“向群众提供一个观念”。这种区分并不武断。这是列宁关于先锋党的概念在实践上的延伸，这一概念对唤醒任何人的可能性持怀疑主义态度，除了先觉者自身，由此与列宁在俄国劳工运动中的敌人的概念区别开来。确实，这几乎就是农民部在中国国民革命早期阶段所采用的策略。^①正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农民部使自己的宣传与国民党其他机构的宣传区别开来。干部接受的是宣传，但对农民而言，则始终是鼓动。

1924 和 1925 年间，农民部在广东省使用了数百名特派员。他们的宣传只适应于群众组织。首批特派员一从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就开始着手让农民相信自我组织成农民协会的好处。^②特派员这一角色体现了宣传和群众组织的相互联系，这提供了一种对宣传功效的简单检验，其他机构很少能够与之媲美。言论和图画、演讲和会议、承诺和诅咒，如果不能将农民聚集到农民协会中去，都将被视为无效并因此被抛弃。其他部门——特别是青年、妇女和宣传部——倾向于以产品的册数，而不是读者和听众的接受程度，来衡量其成果的价值。他们在宣传员和组织员之间设立了制度性的藩篱，特派员却轻易破除了这道藩篱。在群众觉醒的政治中，其他部门还有很多东西要向列宁和彭湃学习。

在另一种意义上，农民部也是一个例外。多数情况下，省级部

① 列宁 [1902] 1988: 131—133。又见 Kenez 1985。列宁对宣传和鼓动的区分，与他对革命“意识”和群众“自发性”（“无意识”）所作的区分有关。见本书第八章。

② 陈公博 1926b: 59，罗绮园 1926a: 5。

门的工作已赶上或者超过了中央母体部门的工作。但与相应的中央部门相比，省级农民部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一开始，彭湃受命同时负责中央和省级农民部，但在1925年11月，他将中央农民部的职位让给其共产党同志罗绮园。他们一前一后工作，直到1926年1月，罗绮园也担负起广东省农民部的工作。^①除了与中央农民部分享其高级人员以外，广东省农民部还从中央借用普通干部。这也受了列宁的格言的影响，即区分宣传与鼓动。中央农民部将“许多观念”提供给那些占据省、县级下属机构职位的“少数人”。^② 290

劳工组织和农民运动对于革命进程同样重要，但无论是在人事、活动还是影响上，中央工人部都无法与农民部相比。共产党通过国民党的组织来开展农民运动的政策，强化了农民部的工作。但在劳工组织领域，共产党人坚持保留自己组织上的自主性，宁愿越过党纪的范围去渗透和建立劳工组织。这些组织包括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适时成立的省港罢工委员会。这些联合机构的组织和宣传工作，使国民党工人部几乎成为多余。它在劳工组织方面几乎没有承担什么职责，也是惟一没有以自己名义出版系列读物的群众运动部门。^③从工人部对劳工组织的有限扶助程度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1月5日；李云汉1966，1：270；罗家伦、黄季陆1969，2：1149—1150。

②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6。在市县一级分发的农民运动材料，看来不仅有农民部本身印行的，也有其附属机构制作的。例如国民党中山县党部报告，收到了中央农民部的刊物《中国农民》和来自农民协会总部的材料。《农民工作报告》1926：30—32。

③ 邹鲁1929，1：391—392；李云汉1966，1：101，362—363；Chesnaux 1968：178—180，292；张静庐1954—1956，1：19。非国民党劳工组织发行的出版物，包括北京共产党发行的《工人周刊》，劳动组合书记部出版的《中国工人》和《劳动周报》，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行的《广东工人之路》。

来看，它对宣传的兴趣甚至更小。该部1926年二三月份的工作报告中，全部19个项目都涉及了劳工组织问题，却只有一项提到了政治教育。这不是由于他们认为宣传与劳工运动进程无关，相反，广州一些最积极的宣传家，都在为省港大罢工服务。毋宁说，在国民革命中唤醒中国工人的责任，都托付给了经历过“阶级觉醒”的共产党干部。^①

军事部门

1926年春夏，当蒋介石重新集结国民党部队，准备向布置在华中和华北地区的反对派军队发起有力袭击的时候，国民党所控制的最高劳工组织的独立，是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钱是一个争论焦点。头年6月省港罢工开始后，国民政府安置和资助着好几万涌入广州的工人，据财政部长宋子文估计，每天的花费为1万元。蒋介石希望这笔资金和在省内征集的所有其他收入一样，转而用于北伐。12月间，他预计北伐第一年将花掉2800到3500万元，或者说
291 约为前一年全省财政总收入的两倍。在蒋介石期望将北伐付诸实施之前，必须削减民用支出，找到和开发新的收入来源。当北伐最终开始时，如同一位观察家所说的，北伐军看上去“像一枚榨干了的柠檬”那样离开广州城。“所有的汁液和滋味都消失了。”^②

不用多说，维持闲散的罢工者，这在蒋介石看来是一个难以忍

① 《工人部工作报告》1926：24—25。

② Abend 1944：33. Jordan 1976：184. 1925年7月，蒋介石估计军费开支为1800至2000万元；12月，他的估计为2800至3500万元，这已将其开始北伐的计划考虑在内。事实上，收入和开支都超出了他的估计。1925年全年到1926年秋，收入超过8000万元，军费开支超过5000万元。Fitzgerald 1990a：751—752.

受的负担。北伐的第一阶段恰好需要一支运输大军，以跨越韶关的铁路终点，越过南岭一带 1000 英尺的山坡，将给养运送到湖南的平原地区。^①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办法，是雇佣那些已在政府薪水册上的香港罢工工人，作为北伐军的搬运工。但是，正在协调罢工的共产党人对此办法不感兴趣。在确保广东省完全支持革命之前，共产党领导人反对发动全国性的北伐。共产党的劳工组织者则担心，工人附属于军事权力，将剥夺他们已经逐渐习惯的独立活动领域。

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都没有为共产党人的不妥协所阻止。围绕罢工和抵制问题的解决，外交部长伍朝枢开始与香港的英国官员进行秘密谈判，以免直接对抗罢工委员会。蒋介石更加直接地要求共产党人就范。3 月 20 日早晨，他在广州发布戒严令，有效平息了对北伐的反对意见。5 月 20 日，蒋介石利用他新近获得的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影响，“要求”罢工组织同意罢工工人充任北伐搬运工。7 月 5 日，首批 2000 名罢工工人登上了开往韶关的火车，另外 1500 名工人，则于下一周在北伐的进军基地集中。在雾气弥漫的 1926 年夏天，来自香港的罢工工人占了搬运工的四分之三以上，他们将沉重的武器和给养经南岭运往了湖南（前线）。^②

蒋介石在为北伐寻找搬运工时遇到的困难，揭示了国民党军事力量所面对的一个独特问题。国民革命军遇到了障碍，因为与军阀通常的武力统治不同，前者已经放弃使用武力来征募搬运工。聚集一批搬运工的最廉价方式，通常是要求地方警察草率地拘捕一批人，或者鼓励一些粗鲁的官员，扑向附近河道、码头和酒店里那些可驱使来服役的强壮男子。现在，这已经不合规矩了。新政策并不

① Jordan 1976: 190—191.

② 同上: 39, 183—193.

292 完全不利于国民党人，因为，劳役征发行为使军阀武装背上了可怕的名声，这经常给他们带来报应。劳役征发在乡村地区的反作用尤其明显，在那里，健康的村民一听到村里瞭望者发出“军队来了”的喊声，就会消失到山林中去。即使是北方的大军阀张作霖，也适时认识到了自愿招募制的战略优势，1927年3月，他废弃了强制征发搬运工的做法。但在1926年，新式的自愿招募体系仍有待于国民党人的完善。^①

他们很快发现，根本没有农民自愿者这回事。无论招募者许诺给他们什么，都很少有农民（或工人）会自愿接受军队搬运工生活中特有的辛劳和职业性危险。事实上，国民党的招募政策具有两个额外的成分。一是接近群众组织，借助它来确保自愿服从。通过强迫群众组织提供成群的自愿者，蒋介石终究在北伐开始时得到了搬运工。农民运动家沿着北伐路线将群众组织的范围扩展到湖南，从而成功地使搬运工的招募与部队的前进步伐相适应。^②第二个因素是军队本身的全面重建，以确保军官和士兵能够学会互相尊重；只有到这个时候，他们才会开始尊重自己接触到的村民和镇民。1927年张作霖完全忽略了这一点，但国民党人至少试图这样做。

国民党人的搬运工政策，只是更广泛的战略学说中的一个方面，它要求在军民之间维持亲密、友好的关系。这种学说的政治目标，是动员大众普遍支持国民运动；其战略目标是缓和平民在国民军过境时对其命令的敌意。政治干部要求军人注意，不但不准征发搬运工，而且不得强占私宅或抢夺给养而不给足够的赔偿。这三条禁令被简化为一个很容易记住的短语——“三不主义”，在宣传诗句

① Jordan 1976: 212—213.

② 同上：193 及以下。

中，它整齐地切合了三民主义的韵律。但这项政策的实施仍然遇到了挑战。与此前广东省内的征伐先例相比，三不主义在北伐过程中遭到了更加频繁的违犯。

蒋介石关于第一次东征（1925年1月31日至3月23日）的报告，就其军人对平民的行为提出了严厉谴责。军官没有安排帐篷或者学校、寺庙等公共场所给其士兵住宿，所以他们转而袭击房屋以寻找住地，并因为争夺它们而打架。他们攫取并吃掉触手可及的任何食物。因此，“自愿”招募制度结果反而比原先的强迫招募制度更难忍受。以前的做法是在战役期间征发搬运工。在新制度之下，人们认为搬运工会自愿提供短途服务，一旦募集到新的自愿者来替换，他们就可以回家。事实却不完全是这样。军人在战役沿线的普遍行为给人们带来如此的恐吓，以至于第一批短途自愿者回到其村庄时，邻近的所有强壮男子都消失到丛林中去了。这时，第一次东征军只好强迫数百名妇女和羸弱老者去为自己运送给养。第二次东征（9月28日到11月7日）中军人们的行为，也没有显示多少改善的迹象。但在北伐中，省港罢工委员会帮助征发了3千到4千名罢工工人，搬运工的问题由此得到解决。^①群众组织一旦在手，军队的行为便不再那么重要。因此，蒋介石在筹划北伐时求助于罢工工人，标志着其敌人的做法有了进步，尽管这也标志着他在与自己军官的斗争中的失败。

293

手下军官们对其士兵的待遇，也无法让蒋介石得到更多安慰。他为自己目睹的“多数军官”的腐败和残酷所激怒，试图制止更加

① 毛思诚 1965：513—514，张秋人 1926：17。第二次东征中搬运工问题的解决，在蒋介石对第一、二次东征的分析中得到了证实：第一次东征仔细研究了搬运工问题，第二次则忽略了它。毛思诚 1965：513—514 和 530—532。

残酷的行为。但他的努力大多付诸东流。1925年11月，蒋介石注意到，军官们无视自己的命令，仍在挪用准备发给士兵的薪饷，“粗鲁地辱骂士兵，残忍地鞭打他们，无情地诅咒他们。甚至更常见的是，有人发现他们毫不关心士兵是否饿坏冻僵”。^① 蒋介石相信好军官造就好士兵，因此让军官们为其士兵的行为负责。通过建立严格的纪律制度，他成功地解决了北伐中的逃跑或开小差问题。“如果一连士兵在行动中逃跑，”童霍林（Hollington Tong）写道，“连长将被立即枪决。……这是一种严厉的规定，但它被证明是有效的。”^②

294 尽管蒋介石关心军人的福利和广东人民的善意，他自己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他一贯将自己置于文官的权威之上。根据国民党当前的思维，颂读三民主义和三不主义口号几乎毫无意义，除非总司令（能够）尊重党权，军官们（能够）关照士兵的福利，各级军人（能够）尊重平民的生命、福利和财产。在这三项中蒋介石只赢得了两项。党、军或者军、民关系的改善，要求对国民革命军的内部组织，及其与国民党最高权力机关之间的关系进行制度性变革——简言之，要创造一支党军。

党军的概念以迂回方式进入了孙中山的思想。1922年秋，孙中山在与来访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讨论时了解到，俄国人成功的秘密，就是在工人和农民中进行群众鼓动。他开始适时重复马林的看法——好像这是他自己的看法一样——强烈声称要转向群众宣传，从其（强调的）程度来看，似乎他已经完全排除了武力的使用。^③ 正

① 毛思诚 1965：429，440，513—515，541—542。

② Tong 1953：63。

③ Isaacs 1971：107。1923年1月孙中山的演讲，与两个月前马林发表的文章有着惊人的相似。参见孙中山 [4] 和孙铎 1922：4—6。亦见孙中山 [9]：512。孙中山遣散了自己军队中的老、弱或没有武器者。罗家伦、黄季陆 1969，2：961。

是孙中山夺取和确保领土的才能，首先引发了俄国人对他的兴趣；然后，马林和共产党人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位置上，不得不去抑制孙中山对群众宣传和组织的热情。^①当俄国和共产国际顾问开始在下一年纷至沓来时，孙中山学会了控制自己新近产生的对群众宣传的热情，逐渐同意使用军事力量。其苏联顾问劝他建立一支党军，并为在黄埔创办一所新的军事学校提供了资助。^②

黄埔军校的军事教育与国内其他学校相似，但其政治教育，则包括国民党的主义、国民革命的原理和目标的密切灌输。这一教育方针的实施出现了问题，部分是因为这种观念太新奇，部分则要归因于军官们不肯妥协。在革命目标、孙中山主义的意义等问题上，黄埔军校也存在一些政治分歧。但是，几乎没有哪个党、政、军部门可以免于革命中的政治冲突。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其他机构的最大区别，不在于它的内部冲突，而在于其领导者有意地、系统地拒绝让省内其他一切军事机构采用党义教育。黄埔不只是一所党军的学校，而且是唯一的党军学校，它作为革命中的最高军事训练机构被载入史册，因为它成功地将所有其他训练学校从（历史）记载中抹去了。一份黄埔军校历史概要，描绘了一部更宏大的历史：试图创造独一无二的党组织，通过它去强化党治国家的“观点统一”。

下列两种方案之间也许有过不可避免的冲突：一是（创办）俄国模式的中央党军学校，一是教导现有的军队，将其置于名义上的党权之下。黄埔军校的创办，意在为一支新式军队提供基础，而不

295

① 蔡和森 1922f: 1—2, 陈独秀 1923c: 4—6, 孙铎 1922。

② Wilbur 1976: 209, 李云汉 1966, 2: 487, MacFarquhar 1953: 151. 当时在广州工作的一位共产党员干部回忆，共产党圈子里普遍相信俄国人每月为黄埔军校提供 40 万元。与胡允恭的访谈，南京，1980 年 3 月。

是对旧有军队的矫正。^① 但仍有大量的旧式军队散布在广东附近，这令人尴尬地证明了孙中山认可雇佣军叛乱的革命策略。他经常指责自己的军事将领在其控制地区实行暴政，多次否认说，这些同盟军在任何意义上都不能被视为“革命军”。^② 他注意到，军队的每一层都需要改革：在顶层，需要改革司令部的结构，以消除地方暴政；而在底层，士兵需要几个月的意识形态强化灌输，以消除他们的政治冷漠。^③ 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的倒数第二天，戴季陶提出了一个临时动议，大意是要通过国民党的宣传计划，将现有的武装部队转变为革命军队。奇怪的是，会上并没有出现一个——无论是既定的还是临时的——关于在黄埔设立一所新式专门军校的动议。看来这是大会召开前由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的一项行政决定。但在这次大会上，许多代表都感到，应该对已经占领广东的军队做些什么。^④

尽管黄埔系无疑受益于它训练出来的军官们的集中，但它只构成了省内一系列部队中的一支。由于黄埔军校的目的是创建一支新军，1925年夏天毕业的全部1052名学员，都被适时分派给了黄埔军。这支军队然后扩展为党军，并最终被命名为国民革命军第一

① 孙中山常用新军一词描述黄埔军校的武装部队。见毛思诚1965：326，334。军校有许多分校：见李云汉1966，2：481，Vishnyakova-Akimova 1971：162。

② 孙中山 [8]：571—572，[12]：605，[14]：693。

③ 孙中山 [8]：571，576，[13]：640—652。

④ 罗家伦、黄季陆，1969，2：1034—1035，1041—1042，《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9：49。一些学生声称，孙中山向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建立党立军校的动议。见MacFarquhar 1953：151，Landis 1969：22。我未能找到这一动议。尽管在代表大会召开之时孙中山肯定支持建立军校，但他也许对军校以后将走什么路线有所怀疑。在1924年11月3日向军校学生和教员所作的告别演讲中，他拒绝利用这个最佳机会向新的党军表示祝贺，而是谈论革命党成员有必要奉献和服从。见孙中山 [11]，Landis 1969：107—108，128。

军。1925年2月，黄埔军总共不过3500人。7月间发展到大约10000人，即便此时，它也只占同盟武装总数——大约65000名士兵——的一小部分。粤军有30000人，湘军有12000人，精忠滇军有10000人，第二次北伐军的残部大约3000人。^①由于增加了闽军、程潜的第六军、唐生智的湘军和李宗仁的桂军，在最后出发的北伐部队中，第一军占同盟军的比例进一步缩小了。很难指望这些部队通过来自黄埔的道德示范力量，将自己转变为典型的党军。孙中山将雇佣军转变为“革命”军的梦想，需要另外的军校来为现有的部队提供服务，并有待于全面的政治网络的发展，它将可以移植到军队司令部自身中去。

作为黄埔军校的补充而设立的另一一些军事学校，部分抵消了创造一支新军与改造旧军队这两种目标之间的冲突。黄埔军校创建时，滇军已经管理着一所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开办后的一周之内，粤军也决定建立一所军校。1925年2月，服务于桂军的第四所军校成立，并招收了一批军官学员，其数量与黄埔军校现有学生一样多。到了4月份，湘军也在广东建立了一所军事学校。^②省级军队并入国民革命军以后，湘、滇、粤军的军校开始分别服务于革命军的第二、第三和第四军。即便此时，黄埔军校仍然只为第一军提供军官。到1925年底，第五军正管理着一所附属军校，第六军则于次

296

① Vishnyakova-Akimova 1971: 161—162, 183; Landis 1964: 150; 杜从戎 1975: 31—37; 毛思诚 1965: 459。一些资料认为，蒋介石倾向于在其个人命令之下增强军队力量。见 Vishnyakova-Akimova 1971: 167。滇军和桂军叛乱部队在杨希闵和刘震寰将军手下的损失，使同盟力量在1924年划归国民军队的数目基础上大为削弱。

② 毛思诚 1965: 276, 302。广西军校中大约有1000名学生：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2月19日；《广东革命势力的团结》1926: 10; 毛思诚 1965: 449。关于湖南军校，见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7月15日；和“青年军人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录”1925: 40—44。

年建立了一所军校。事实上，到北伐开始时，甚至最小的同盟部队也建立了政治军事学校。^①

国民党中央看来并不欢迎这种发展，因为新的军校与黄埔军校展开了竞争。但在那些负责将旧军队转变为“革命”军的人眼里，似乎正是黄埔军校成了问题。它侵占了它们的领地，夺走了它们最有前途的新学员，独占了省内的资源，并得到了中央党部的优待。程潜的军校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23年，他担任孙中山大本营军政部长时就认识到，需要为名义上归自己领导的各部队训练“真正革命的”军官。10月间，他从滇、桂、粤、湘军推荐的一大批候选人中，招收了少数军官学员进入中央陆军教导团。教导团从省级财政获得了每月9000元的津贴，并分得了珠江岸边的战略要地黄埔。但到了年底，当俄国资助的另一所军校得到了在黄埔建校的优先权时，程潜遇到了“许多困难”。4月间，程潜极不情愿地宣布教导团的规模将削减为300名学员（200名原教导团的“最佳”学员，100名来自前述4支部队），更名为陆军讲武堂，并迁往他处以让位于黄埔军校。除了军事科学之外，陆军讲武堂还开设了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科学的课程，教员均由那些“完全信奉并透彻理解”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教师担任。^②

297 结果在11月间，出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训令，陆军讲武堂因违背其指挥官的意愿而解散了。在该校受训的军官们被转入黄埔军校。与首期黄埔学员一道毕业后，他们被编入蒋介石的学生军，后来又编入

① 《军事委员会军事政治月刊简章》1926：9—12；《政治工作日报》，1926年2月26日。甚至小规模攻鄂军也开设了一所军校。见张启雄1926：25。关于军队附属军校的一份报告，见Wilbur and How 1956：194—196。

② 1924年4月24日的命令见《国父全集》，4：1118—1119，1923年10月21日的另一命令，见《国父全集》，4：865。邓文仪1976：145所列的学生更少。

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从蒋介石对程潜所获成就的侵占中，黄埔军校获益良多，因为据1925年东征时和他们并肩作战的人们估计，来自陆军讲武堂的学员，要比来自黄埔军校的其他人员灵巧得多。^①

陆军讲武堂采用了与黄埔军校不同的模式——从各种不同军队中招收学员，承诺在毕业后让其归队。当然，创造一支新式军队而不是改造旧军队的好处在于，新军可能免于现有各省军队中的私人依附和地区性忠诚。对老练的雇佣兵进行政治灌输，也只能期望达到这一步。但是，就算黄埔军校的训练目标在于创造一支精神统一并效忠于国民党的军队，其管理仍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的处理，让程潜这样的党内资深指挥官感到难过，他们成了蒋介石终身的无情对手。其他同盟军队则反对黄埔军校和黄埔军所享有的福利、地位和权力。^②

1924年秋，蒋介石拒绝公平分享一大批缴获的现代武器（这批武器是运给广州商团武装的），这使他们的愤恨达到了顶点。孙中山也被激怒了。孙中山从1924年的北伐前哨韶关电告蒋介石，要求他将武器在同盟军队中公平分配。从8月后期到10月间，孙中山敦促将武器分配给自己的北伐军、滇军一部、桂军、豫军和空军，以及两个独立的军事学校——云南讲武堂和程潜的陆军讲武堂。但蒋介石拒绝了（这一要求）。到了10月底，在蒋介石的抵制下，孙中山只好提出，把蒋介石需求之外的剩余武器送到韶关。同盟军队指挥官的反应更不礼貌。他们争论道，如果黄埔部队是广东境内事实上惟一适于托付给武器的党军，那么黄埔学员就应该独立承担国民党

① 杜从戎 1975：30，57；毛思诚 1965：321；邓文仪 1976：145；Vishnyakova-Akimova 1971：161—162。

② Vishnyakova-Akimova 1971：185。

的所有战争。蒋介石的自负行为招来了嫉妒者的辱骂，黄埔学员获得了“玩偶军队”的称号，他自己则得到了“首席玩偶”的绰号。作为对这种轻侮的回应，黄埔的教官和学员们则拒绝承认或敬重同盟军队的军官。^①无可否认，非同寻常地集结、逡巡在广东周围的各支军队中的敌意，并不是一个新现象，也不完全针对黄埔军校。1924年5月，滇军、粤军和桂军间的反目，被视为他们惨败于数量上居于劣势的陈炯明军队的原因。次年9月，粤军许崇智部受到了指责，因为其他同盟军队濒临挨饿时，他们却在挥霍资源。但这些古老的不满及其导致的割裂化的忠诚，不过反映了一些小毛病，人们推测党军将会治愈它们。相反，通过一系列新的不满，黄埔军校和黄埔军激发了旧有的敌对状态。^②

一旦黄埔军校为全省所仿效，按照黄埔模式建立的独立军事学校，就给负责协调国民革命军政治工作的纪律干部带来了新问题。黄埔模式——即本军自办附属军校——在6支不同的军队中被复制以后，权力便扩散于政治课程以及各军指挥官及其下属中。不用多说，政治工作者也受制于军事等级制度本身，它总是将政治教育置于议事日程中的较低位置。黄埔军校也不例外。理查德·兰迪斯(Richard Landis)记载了1925年间黄埔军校运行中政治训练相对于军事训练而言的显著衰落。1926年2月，所有军事学校的毕业生都进行了同期考试，结果无人(包括黄埔军校学员)能够懂得国民党的目标。^③来自战场的结果也无法让人振奋。1925年九十月间，军事

① 毛思诚 1965：299—303，312，326—327，366，杜从戎 1975：44。

② 毛思诚 1965：260—261，506。

③ Landis 1969：105—113. 来自黄埔军校的干部为大量来自其他军校的军官开设了政治教育班，尽管只有很少的人来上课。毛思诚 1965：305，455，方鼎英 1927：2.6，《政治工作日报》，1926年2月16日。

学校不能提供足够经过训练的人员，第二次东征的宣传队不得不从各机构中抽调人员。黄埔军校提供了18名学员，讨鄂军的军校提供了25名学员，在249名东征宣传员中总共只有43人（来自军校）。来自军事学校的宣传员不仅数量少，而且缺乏技巧。人们发现，来自国民政府政治训练部所办的政治训练班，以及中央宣传部及其附属机构的宣传员讲习所的宣传员，使东征宣传队中的所有其他人员都相形见绌。其余的队员，包括来自黄埔军校的学员，都被认为累赘多于帮助。^①

大约在1925年12月，政治训练部长陈公博发现，任何一所军事学校提供的政治教育都远未满足国民党的期望。他将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这些方面：国民党未能集中管理不同部队开展的宣传活动，人员上缺乏挑选余地，以及学校管理者普遍忽视政治训练。虽然蒋介石个人应该对黄埔军校中政治训练的衰落负责，但总体而言，他仍然非常关心该校的军事训练标准。陈公博和蒋介石提议，放弃黄埔军校开创的军主校属体系，采用一所中央军校，以服务于国民革命军的每支部队。^② 遵循这一建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于1926年1月12日决定，解散现有的一切军事学校，然后将其改组为一个中央机构，它将位于黄埔军校原址。这所新学校被命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以承认它是一个中央机构，服务于所有的部队，对军事和政治教育给予同等的强调。黄埔军校第三期学员（也是最后一期）毕业于1926年1月，其他各军校也发出通知，一旦在读学员毕业后就关门。取代它们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于1926年3月1日成立。^③

① 张启雄 1926：25，35。

② 陈公博 1926a：1—15；毛思诚 1965：559—560。

③ 方鼎英 1927：1.60，《政治工作日报》，1926年2月26日。

值得注意的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首期学员，将作为著名的黄埔四期被载入史册。名称上的这一更动很能说明问题。尽管中央军校计划取代同盟军队的军校，但它却采用了与已解散的黄埔军校完全相同的招生程序，主要从各省派往南方的青年知识分子当中，而不是同盟军队推荐的候选人中招收学员。此后，它也未将这些学员分派到原黄埔军之外的任何军队中去。^①这样，同盟军队各军事学校合并为中央军校，重复了1924年程潜的陆军讲武堂的经历，再次使蒋介石获利。蒋介石用不着取代它们，就除去了与自己竞争的各所军校。到1926年10月5日第四期学员毕业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发动了最终的北伐，即将夺取构成了战略省会武汉的3座城市。^②新的中央军校没有为同盟军队的军官提供政治训练，这一事实随着部队向北进军、从华中抵达南京而被忽略了。一旦人们清楚地看到，黄埔军校的历史意义在于创造一支忠于指挥官蒋介石的军官队伍，在于将国民党与其新的军事领袖等同起来时，甚至连建立一支“党军”的目标也被遗忘了。

由于取消了军队中的学校，党权通过政治教育在武装部队中的扩张，便留给了目前附属于军事组织的一套外部政治机构。黄埔军校对于改造“反动武力”的主要贡献，不在于它所提供的学院式训练，而在于通过苏俄顾问的帮助，创造了一些外部的政治组织和政治教育方式，这种教育是由该校部分雄心勃勃的政治干部实施的。

① 方鼎英 1927: 1. 60, 2. 58; Landis 1969: 39—40; 陈果夫 1973— : 27—36; Wilbur and How 1956: 203—204。来自其他军校学员的应考人在入学考试中表现不好。《政治工作日报》，1926年2月16日和26日。

② 方鼎英 1927: 1. 60, 2. 58; 《黄埔建军三十年概述》1954: 15。

黄埔军校的政治干部适时创造了牢固的组织，它们进入了黄埔军校本身从未管束到的那些单位。其中有3个并存的常设政治组织，是在黄埔教官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人民委员或者党代表制度，政治部，还有党部。另一种单位是宣传队，它也建立在临时服务于特定的征伐服务这一基础之上。当北伐联军从广州出发并将国民政府带到南京时，作为这联军的特色的纪律，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种结构。

尽管3个常设组织之间存在某种功能上的重叠，它们都适时满足了军队党务活动中不同方面的需要。首先，党代表被授权监视军官们（是否）服从国民党的指示。政治部的职责是训练军队以维持纪律，指导他们正确对待平民，以及最重要的，让平民相信与革命军合作的好处。建立党部则是为了促成官兵之间的理解与合作。虽然在整个国民革命军中导入和发展每种制度都遇到了困难，这表明一些单位不能满足国民党的理想；但这些制度的发展，依然显示了国民党强迫其服从的强大决心。

1923年9月访问苏俄时，蒋介石（亲眼）目睹了红军中的人民委员制度。他从自己的观察中了解到，党代表的主要功能就是维持军官的协调一致。因此，当党代表首次进入蒋介石的黄埔教导队时，他们被授予否决同级军官发出的军事命令之权。^① 蒋介石在莫斯科还相信，只有军事组织仍然与党组织分离时才需要党代表。所以，他对引入该制度的支持是有条件的。一旦军队置于党员的命令之下——或者一旦各省军队的指挥官准备无争议、无条件地服从党权时——党代表就会被取消。除了监督功能之外，从教育基层士兵到保管花名册，许多其他职责也逐渐在不同时间和场合交给了党代

^① 毛思诚 1965：206，541，643；陈训正 1973—：7；《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1926：8。

301 表。这些职责是与武装部队中的其他政治组织分担的，它们并非实施党代表制度所必需，并且，当不再需要或者不再期望由党来控制军队时，它们也无法构成保留该制度的充分理由。^①1926年4月，在另一支军阀部队加入到不断发展的“革命”军之列的两星期后，蒋介石断定，军事指挥官已经能够对自己的指示作出足够反应，因而可以彻底废除党代表制度。事实上，蒋介石决定将共产党人从军队中的重要位置赶走。后来他重新引入了这种制度，以维护自己对卷入北伐的大批部队的私人权威；这些部队对任何事物的忠诚都开始表现得非常有限，除了收复自己本省以外。^②

政治部也是经由黄埔军校引入同盟军队的，但其结局与党代表（制度）相似。最早的政治部设于黄埔军校之内，其功能为军校的目标所规定：在军校内部训导学员，监督军事训练，监控、出版和分发阅读材料。1925年春，军校暂停自己政治部的运转，而在党军中新建了另一个政治部，此时它从军校进入了战斗单位。^③一旦从学校领域转入战场，政治部便发生了变革。虽然保留着政治指导这一普通职责，但它却从军校强加给自己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其工作范围扩展到敌对军队、军队路过地区的居民，以及同盟军队的官兵。北伐来临之时，这还包括颠覆敌军、训导被俘的敌方士兵；在获取给

① 毛思诚 1965：343—344，642—645；陈训正 1973—：6—8；《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1926：7。党代表制度在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后很快取消，但在北伐过程中又被恢复。Vishnyakova-Akimova 1971：240—241。

② 4月8日（李宗仁桂军加入国民革命军之后两周）蒋介石陈述了取消这一制度的理由。1926年3月中山舰事件之后他解除了所有团体中的党代表。Landis 1969：112；毛思诚 1965：631，642—645；Vishnyakova-Akimova 1971：240—241。

③ 钱大钧 1973—：37—38。毛思诚 1965：370；李笠农 1926：33。黄埔军校政治部是为骨干分子设立的，1925年1月4日，为了给第一次东征作准备而迁往一所分校。毛思诚 1965：363。

养、运送物品、提供财政贷款、监视、侦察和各种其他特殊任务中得到小农和商人的合作；通过建立地方党部、临时警察部队、行政委员会和组织工人、农民、商人协会，来巩固已征服的地区；以及为盟军的士兵安排休息和娱乐，照顾伤兵，提供政治和识字教育，在军队中建立党部。至少在北伐开始之前，军校政治部和战斗部队政治部之间的任何人事变动，都无法与政治部角色的这一转化相匹配。这些变化都是在周恩来的监督下发生的，他是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军事政治部主任，不久以后还是第一军政治部和整个东征军政治部的负责人。^①

随着“中山舰事件”的发生，政治部的进展比党代表还要好得多。4月3日，蒋介石要求所有党代表离职，但政治部制度却幸免于难。302 它们在军队中保留下来，从事一般政治工作，“广泛宣传三民主义”。但该制度尽管未受触动，它的许多成员还是被替换了。周恩来被解除了第一军政治部主任之职，4月11日由邓演达接任。5月，中层职务进行了新的任命：第一军第一和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分别由邓悌和周士冕取代了共产党人刘康候和蒋先云。^② 尽管如此，蒋介石给予党代表和政治部的不同待遇还是表明，他所关心的不仅仅是消除共产党对武装部队中的政治工作的控制。他还希望能用自己挑选的人员来取代共产党人担任的党代表，就像他在第一军政治部中替换共产党人那样。蒋介石选择保留政治部制度而清除党代表，这表明他还是赞成政治工作的，只要它仅仅限于政治教育的话。到1926年春，他再也不准备容忍任何政治工作者拥有与军事长

① 毛思诚 1965：508；钱大钧 1973—：42；李云汉 1966，1：390；谢次林 1926：45—57；春涛 1925：12—19。周恩来也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书记，又是一名国民党员。

② 毛思诚 1965：639，645，663。

官相当的权力了。

考虑到蒋介石对政治工作者有条件的容忍，第二次东征前后他在挑选政治工作人员上的重要质变，是很值得注意的。首先，蒋介石开始选择军官去担任原先由党内文职人员担任的政治职务。其次，他选择伤兵去担任原先由非军事人员担任的次要政治职务。后来至少有两名在第二次东征中受伤的第一军军官被任命为党代表。与此同时，政治部开始从刚出院的军人中配备战时宣传队。一旦军校中的政治指示落到军事训练的后面，在室外的战场上，即使一名无用的军人，也被认为比一个健康的文官更加有用。^①

党部构成了国民革命军中的第三层政治组织。要定义一支党军，最原始的衡量标准无疑是党员在各级部队中所占的比例。尽管加入国民党非常容易，党员身份不能说明什么，但那些急于限制国民党对自己事务的干涉的军官们，对于整个师全体入党这种可能性，仍然比较感兴趣。蒋介石本人即宣称其教导队是一支党军，因为全队人员都在党员登记册上签了名。别的指挥官们主张，自己身为国民党员，应该有资格免于接受党内政治干部的审查。^②但是，
303 国民党对自己在武装部队中的作用持有不同看法。它希望将党员们组织起来，对他们加以约束，并通过各级党部来进行宣传。

1924年6月30日，在黄埔军校成立后的两周之内，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了（黄埔军校）特别区党部的组织章程。7月3日，该党部内建立了5个分部，一个月以后每个分部又划分出小组。小组长负责监控学员的思想和行为，审查他们的阅读材料。黄埔军校特别区

① Landis 1969: 110—113，杜从戎和冷欣都在被任命为党代表之前不久受伤。杜从戎 1975: 60—61，毛思诚 1965: 447, 548, 574。

② 毛思诚 1965: 432, 644。

党部被委以军队“向外部世界进行宣传”的职责。^①该党部与教导队共同参加了第一次东征，并以与周恩来领导的政治部非常相似的方式，适应了战争中的偶发事件。也就是说，除了在东征军士兵中工作以外，它还要在东江地区的居民中开展宣传工作，帮助建立地方党部，调查地方行政实践——尤其是在教育领域。^②军队中独立党组织的独一无二的地位，适时地给予党部一些非常独特的其他功能，这些功能最终盖过了他们碰巧与政治部分担的那些职责。

军事单位中的党部，最值得注意的不是其宣传和对军校学员的监控，或者在当地人民中从事的行政工作，而是提供了一个环境，在其中所有党员名义上平等，军事等级制度暂时失去了作用。党内平等主义削减了等级制的军事权威，它也破坏了军事权威，至少在中层如此。军官们警告说，如果为所有军人建立党部，军事纪律就会受到损害。^③事实上，党部与军队中层之间的紧张，使前者变成了底层士兵反抗其直接上级的绝对权威的支持者。这适合多种意图。为了提高自己的人手所占的比例，蒋介石促成了党部在整个武装部队中的扩展，鼓励部队利用它的庇护作用来揭发那些虐待自己的军官。他时常为中层军官的腐败和暴虐而恼火。由于军官们永远不会相互告发对方，并且那些被抱怨的人必然会惩罚那些抱怨者，蒋介石因而宣称，党部应该为军人提供一个宣泄口，使他们能够“绝对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汇报自己的困苦，而不用（害怕）上级怨恨和报复”。^④第二个也是与之相关的意图，是通过党部网络在

① 《中国国民党周刊》29（1924年7月13日）：3—4；毛思诚1965：281，290—291，370。

② 《本党部东征日记摘要》1925：5—21。

③ 毛思诚1965：287—288。

④ 同上：429，440，513—515，541—542。

304 底层士兵与总司令部之间建立直接的交流渠道。通过党部系统，蒋介石设法绕过了中层军官，建立了一个更加直接、更加全面的保护和指挥体系，它从蒋介石的总司令部直接扩展到战场上的士兵身上。

扩展军队中的党部网络的第三个意图，是要争取武装部队对国民党内部事务的更大发言权。党部从第一军向革命军其他单位的扩展，最初是缓慢而曲折的。1925年7月有过一阵短暂活动，但直到10月间，除了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和豫军以外，其他部队中连最基本的党组织形态都没有具备。甚至在这4支军队中，旅级党部和更小的党小组，都很难说已经扩展到了第一军的第一和第二师以外。直到次年1月之前，第一军第三师中肯定没有哪个党部延伸到了旅一级。第三师下级党部的建立，是在1925年12月到1926年1月的党部活动蜂起期间进行的，当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定召开的前夜。结果人们在这次大会上得知，从10月起的3个月内，第四军、第五军、鄂军和讨鄂军，以及海军和警察部队中，都已经建立起了特别区党部。党部建立时机的选择，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不同军队的司令官——他们不像蒋介石那样急于制止其下属的不法行为——最终同意忍受在自己控制的部队之内设立党部。在这阵党务活动热潮中，武装部队设法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提供了大约70名代表，占据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席位。^① 随着军队被“国民党化”，国民党也被军事化了。

1925至1926年的冬天，还见证了遵循军权扩张模式在广东创建市、县党部的大潮。国民党占领的头两年半，一共建立了46个市、

^① 从1925年7月起，党部活动报告开始定期出现在广州《民国日报》上。亦见谭平山1925：5—9，和1926：42—49；王尔琢1926：15—16；吴玉章1926：22—26。

县党部；但在第二次东征和南征之间的5个月里，也就是在10月到次年2月间，又创建了总共40个党部，几乎和前期一样多。此后到5月份为止，4个月间，广东的党员数目增长了一倍多。^①这一增长步伐的加速，仅仅发生在征讨军占领的粤东和粤南地区。同一时期，广州市的党员数目或多或少处于静止状态，党员人数没有明显增长的其他地区，只有偏远的粤北和粤西，征讨军未能渗透到那些地区。^②

305 附属国民革命军的政治机构，也决定着征讨期间国民党控制地区的党员质量和党务活动风格。军队中的政治部是党的前锋。它们直接负责组织和任命地方党部。在征讨沿线已经成立党部的地方，政治部会对其进行调查和改组。在尚未建立党部的地方，他们就着手去创建它们。由于党组织向乡村的扩张沿袭着向粤东和粤南的军事扩张方向，地方的党务机构及其活动，也趋向于反映其母体政治部的政治色彩。

在占领一个地区和建立地方党部的间隙，政治部承担着对平民进行政治教育的职责。例如粤南沿线的战斗结束后，南征军发现，当地人民并不了解国民运动的目标和原则，他们于是召集公开会议，通告国民党关于下列问题的政策：重新统一全省和全国、日本在华北的威胁、省港大罢工、妇女解放；他们还详细解释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第四军政治部附带建立了一个剧团——民星剧社，并于1926年2月7日在海口市举行首次演出，出席观看的市民达四五千。节目单上的开篇剧目，是一出革命传奇剧，题为《人民之星》，由第四军政治部在苏俄顾问葛列夫（Gorev）的帮助下专门为

① 谭平山 1925：2—3。1926年1月到5月间，广东党员数目增加了60 828人（增至108 831人）。“中国国民党最近党部组织概况”1926：14—16。

② Tochigi 1978：95—116。

这次演出而创作。该剧描述了一个奇怪的集团，它由帝国主义者、地方军阀、腐败的地方官员和豪绅组成，他们密谋去侵扰和压迫普通人民，但最后为革命军的到来所挫败。根据目击者的报道，观众欣然认同剧中的受压迫角色，在国民党人开始援救的时候变得很激动，最后在首恶（为人鄙视的地方军阀邓本殷）被抓住和惩罚的时候“不停地鼓掌”。当晚的表演以一出独幕喜剧而圆满结束。第四军招募当地青年组成小队，发给他们政治部的宣传指导方针，然后派他们“从一村到另一村”散播讯息。通过这些宣传队，第四军的宣传从海口扩展到了邻近的乡村社会。^①

306 部队作为驻防军而安顿下来，这给了它们另外的机会去影响平民的政治活动。驻军经常对地方争端进行仲裁。省港罢工委员会南下到达海口后，很快就发现自己卷入了关于美属亚洲石油公司的地方争端。罢工委员会开动其宣传机器与石油公司展开一场舌战，可到头来，它也与地方商业社会形成对抗，后者倾向于同情石油公司。罢工委员会成员向第四军政治部求援，想在争端中借用其影响力。一旦得到政治部的首肯，争端很快以有利于罢工委员会的方式得到了解决。不久，罢工委员会逮捕了一名当地商人，然后商人们关闭了自己的店铺。商团武装包围并痛殴了一队国民党宣传员，后者是来劝他们停止罢市的。国民党的琼崖特别委员会召集地方驻军来保护宣传员，当宣传队在一群老练的军人陪同下，再次冒险进入商业区的时候，它带来的讯息就更容易得到理解了。商人的抵制又一次失败了。^②

① 廖象初 1926，4：16，5：4，罗扬清 1926：1—18，《政治工作日报》，1926 年 2 月 19 日和 26 日。

② 罗扬清 1926：14—15，《琼崖特别委员会工作概述》1926：37。

军队还管理着正式的战利品，可以没收土匪的财产，还可以依照军事长官的兴致和政治部的优先考虑而随意支付金钱。例如1926年4月，第一军负责签发潮梅—海陆丰党代会的宣传开支，也就可以合理地期待该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它保持忠诚。军队资金的有选择分配，影响着特定地区进行的政治活动的种类。在惠州附近，剿匪所获赃物在农民、工人和民众教育运动之间进行分配，而将国民党发起的商民运动排除在外。商民运动积极分子被迫请求广东省执行委员会予以补偿。在南部，第四军也以牺牲商民运动为代价促进了其他的民众运动。^①

事实上，商人在与驻军、政治部及任何一种党部打交道时，都很少取得好的进展。惠州的商人特别有理由这样抱怨。第二次东征期间，国民党惠州支部由这样一派人员组成，他们宣称与反共的上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联系。党部与地方政府机构和地方驻军长官串通，从事着有利可图的勒索——保护商业。惠州驻军愿意签约保护商船，使之在沿江行程中免受土匪的侵扰，每船收取50到200元的保护费。事实上土匪很少袭击商业运输（船只），而更喜欢在货物经过其领地时收取费用。由于这些费用往往低于保护费，商人通常宁愿接受土匪的威胁，而不是党部那过于出格的保护费。党部进行了一次有利于左翼人士的改组，惠州商人随即对新的党部表示支持，期待它会停止保护性勒索，并从根源上解决土匪问题。但新的党部是由共产党同情者组成的，他们同样敌视地方商人。在某些场合，地方驻军也抑制了来自工农活动家的支持，或者试图压

①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2（1926年3月）：39，3：84。第四军政治部在南征期间发起了大量农民协会和工会，但忽略了成立商民协会。缪象初1926，5：5—7。

307 制那些对国民党的工农政策作出激进解释的宣传。无论如何，国民党在市、县级的组织、政策和宣传，都受到了地方驻军的巨大影响，而无论谁掌权，商人都遭到了失败。^①

军队的政治机构对群众宣传方向的影响，其最大根源无疑是它们组织、改组和训练地方党部的权力。第一次东征期间，周恩来作为东江地区党务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受命监督国民党（在该地区）的党部事务。但第二次东征时的安排略有差异，尽管并没有不利于周恩来。东征沿线的每个主要市、县，都指定了文职的党务负责人，他们随军行动，直至到达指定目的地，然后在军队保护下在那里建立办事机构。即便那时，党务负责人仍与总政治部保持着密切关系，继续使用它的资源，如果他们的目的地刚好一致，有时还会继续驻留在政治部内。南征期间，负责地方党务的是参加南征的各军和各师政治部，而不是地区政治部。第十师政治部负责南征第一阶段的地方党务，第三军政治部负责第二阶段，第四军政治部处理南征最后阶段的党务。^②

在军队帮助下建立的地方党部，往往继承了其母体部门的意识形态特征，在母体部门停手之处继续开始教育活动。海南青县党部建立了军队式的宣传队，按照其创始者——第四军政治部的方式举行烛光游行。^③ 这个隶属于第四军的特别政治部，为海南岛的所有党部确立了政治特征，它拒绝接受自愿为国民党工作的“利己的”知名

① 《各县市党部及筹备处工作报告》1926：1—27；《惠属特别委员会工作报告》1926：26—27。

②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2月21日。惠阳及周边县份党务负责人驻在总政治部。
《各县市党部及筹备处工作报告》1926：1；《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5—7；缪象初1926，5：3—4。

③ 《各县市党部及筹备处工作报告》1926：31。

人士，拒绝承认“国民党支部”和“国民党支部筹备处”——它们是在国民党部队开进这些地区时，由地方精英主动倡议成立的。地方精英在征讨顺利进行期间的主要关注，是想获取和维持对在他们附近成立的任何国民党支部的控制权。如果没有第四军政治部那种外来干预，市、县党部的情形往往会反映原有的地方权力结构。因此无论如何，政治部的干预方式，对于确定革命本身的特征都是至关重要的。^①

在地方权力结构表现为宗族这种血缘群体形式的地区，党部有时会合并于地方家族系统中。第二次东征中，第三纵队沿线的龙川县党部就属于这种模式。龙川县党部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分部的19名职员，无一例外都姓张，县党部的正式成立仪式在张家宗祠举行，以加强对血统和党权的认同。^② 这是一个例外而不是通例。大多数情况下，在国民党人到达之前建立的党部，据说都是由“劣绅”创立的，他们没有什么特殊的家庭背景，希望影响地方政府官员，使之倾向于自己，或者为自己谋取党政职位。根据周恩来的总政治部报告，国民革命军到达之前在东江地区建立的所有党部，都是按照这种模式建立起来的。该地区各党部的建立，并未获得广州中央党部的授权，很多时候连中央党部也不知道。这样的党部因为没有遵循规定的程序，所以很容易成为被批评的对象——就像它们试图使革命口号对自己有利的拙劣尝试一样。“考虑到支部组织的糟糕状态，”总政治部报告说，“以及党员政治训练的缺乏，党的宣传当然没有取得任何值得注意的进展。”政治部扩展了它自己的政治训练机构，以纠正这种缺陷。^③

① 廖象初 1926，5：3—4，罗扬清 1926：7—8。

② 《各县市党部及筹备处工作报告》1926：18。

③ 张启雄 1926：32。

但在其他情况下，军队中的政治单位支持了地方精英成功过渡到一个新的政府组织的尝试。在雷州半岛南部，第四军第十师对地方精英的态度更加和缓。第十师由陈铭枢指挥，其政治部由国民运动中共产党同情者的主要敌人李笠农负责。因此，与由第四军政治部或者周恩来的总政治部建立的党部相比，在第十师进军沿线出现的党部，往往呈现出更加保守的色彩。李笠农因为自己在地方党组织中的“许多错误”，而在第一次东征期间遭到周恩来的非难，南征期间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又对他不满，这使他颇为痛苦。^①

309 县长的任命模式与地方党部人员的选择方式完全相同，东征、南征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一批政治同情者尾随其后担任文职干部。第二次东征期间，周恩来试图用自己更喜欢的县长，去替换那些占据着县长职位的“豪绅”。但最后没有多少人被真正地替换掉，因为任命新县长的权力完全属于总政治部，其权力范围被有效地限制在东征的南部地区。在更南边的地方，陈铭枢的第十师最初被赋予在南征时期任命县长的权力；与它对地方党部的任命相一致，它确认了对那些并不同情农工运动的地方保守人士的任命。在南征的稍后阶段，权力从陈铭枢和李笠农那里转到了甘乃光手中，此时，地方政府的人事任命，也从（倾向于）保守分子转变为（有利于）工农运动的激进支持者。但甚至甘乃光也未对南粤地方政府的特征留下什么持久印象。1926年提交的一份省政府报告注意到，省内的每个县实际上都保留着“与反革命

^① 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5月16日；《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1926年2月）：5—7。

势力共谋破坏群众运动”的政府官员。^① 总体而言，如果考虑到东征和南征期间国民党部队在雷州半岛、海南岛、惠州、海陆丰和粤东潮梅地区夺取的县份总数，那么，看来只有极少数在职官员得到了更换。只有那些众所周知与倒台军阀陈炯明、邓本殷保持着密切私人关系的县长，才被从政府中赶走了。剩下的官员得以留任，以保持最大限度的政治连续性，从而能为北伐动员地方上的各种资源。^②

群众运动自身的历史讲述着相似的故事。服务于南征、由甘乃光负责的地区性政府机构，一共有3个目标：通过改组或者解散原有绅士组织、建立县级代表会议和群众协会，将地方权力从“绅士阶级”转移到“人民”手中；将税收负担从穷人转移到富人肩上；普及教育。在海南，地方政府改组的首要目标，是清除岛上的“专制绅士”。^③ 两个地方都未显示多少成功迹象。由周恩来和第一军军长何应钦领导的一个类似的粤东政府机构，决心解散正在破坏政府权威、抵制国民党政策的民团，积极推动农民协会和工会的建立。但粤东群众运动组织遭到的羁绊，与那些妨碍着南部地区的障碍类似，包括依赖于外界的政治领袖、依赖于地方驻军长官的善意、精英分子不肯妥协，以及时间和人手的短缺。很少有绅士武装被解散，也很少有地方官吏被更换。结果，解放人民、统一国家的

① 《广东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1926：1—9，尤其是5；何赤1926：3；张启雄1926：31。陈铭枢为阳江、廉江和遂溪县任命的县长，被群众运动同情者认为不合格。甘乃光的委员会任命的8名可考县长中，两名（文昌和乐沙）被群众运动积极分子认为不合格。缪象初1926，5：12—13。南路行政委员会由甘乃光、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及第四军一名党代表张善铭组成。罗扬清1926：17。

② Fitzgerald 1990a. 相似的任命模式也呈现于北伐本身。Tochigi Toshio 1978：97—99.

③ 《政治工作日报》，1926年2月20日；《南路各属县政会议决案》1926：13—18。

310 征伐，将新的重负强加给了广东，并将该省还给了地方精英和地区性军阀——在受到国民党干扰之前，他们已经控制着这个地方。^①

地方精英试图控制其邻近地区党部和政府官员的倾向，给了革命者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不大可能在地方党务中找到自己的代表——如果没有外部的军事和党务机构一致努力，代表他们的利益去进行共同干预的话。第二个教训是，群众运动要想扩展自己对地方社会的有效的集权控制，很可能在处于从属地位的社会群体中找到同盟者，无论他们碰巧是谁，在什么地方。无论哪种情况下，在促进或阻碍国民党针对地方精英的主张方面，地方党部或政府机构都起着重要作用。第三个教训是，除非中央党部投入足够的资源去组织、改组和训练市、县级党部和衙门，党治国家根本不可能真正深入地方社会。而处于这种位置的一些较高层机构，包括国民革命军的一两个政治部，又不愿去进行这种必需的干预。但即便有这种愿望，在现有资源之下能够取得什么成就，也存在着一个限度。对曾经循此方向作过一些努力的某个县进行一番简短的审视，可以帮助我们依次揭示上述教训。

广东惠阳县引起了军队和中央党部的注意。惠阳县中心是惠州城，这是一座老城，它那坚固的城墙曾在一千多年前抵抗了四处劫掠的军队的袭击。最近它曾作为陈炯明的避难所。但惠州的城墙敌不住蒋介石东征军的俄式大炮，他们于1925年10月摧毁了防御工事，掠夺了这座城市。^②国民党的文职干部尾随其后，从瓦砾上跋涉而过。第二次东征军总政治部建立了惠州党务改组委员会，以

① 《东江各属行政会议记略》1926：17—20；Fitzgerald 1990a。

② 毛思诚1965：515—523。关于惠州事务的严厉批评，见李敖1987：214—216。

改组博罗、河源、紫金、龙川、连平、和平、新丰、惠阳 8 县党务。12 月 8 日，委员会向省党部递交了一份临时报告，详述了自己在该地区的活动。报告的编辑者反映了周恩来的影响，毫不含糊地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支持国民党的农工政策。^①

惠州委员会的经历，表明了军队干预地方党务的局限性。在惠州党务改组委员会所针对的 8 个县中，只有一个县需要进行彻底的调查和干预。其他 3 个县——和平、连平、新丰——距离惠州太远，无法施以可行的干预。委员会曾经试图与另外两个县——龙川、河源——建立联系，但过了几个星期仍无反应，它们的改组于是被无限推迟了。在河源，这是引起恐慌的原因之一，因为该地一个支部假定自己已获得委员会同意，并在未通知委员会或者请求其审查的情况下，进行了选举和正式的成立仪式。无论是委员会还是广州的中央党部，都无法渗入该支部。第六个县——紫金的情况所知不多，只知道该地支部的组设遇到了障碍，因为地方政府官员不愿为其提供运行经费。只有在第七个县党部——博罗，委员会对地方党务的进展才稍感满意，尽管这里也没有给它所希望的那种干预留下一席之地。委员会决定降低损失，集中关注包括惠州城在内的惠阳县党部的改组。

311

1925 年 7 月在惠州成立了一个县党部，吸引了许多“退役军人和游手好闲的绅士”。他们能明白，墙上的字迹是针对陈炯明和他在惠州的支持者杨坤如的。10 月中旬，惠州一落入革命军手中，那些没有事先预见到加入国民党的好处的人，立即跑来加入国民党，以免错过机会。新的驻军长官胡树森到任后，立即窃取了惠阳县党部

① 以下叙述基于《各县市党部及筹备处工作报告》1926：1—7；《惠属特别委员会工作报告》1926：26—27。

主任委员的头衔，在他的庇护下，惠阳党部膨胀到大约 2000 名党员。但党务改组委员会并不喜欢胡树森，并指责说，在他领导下县党部吸收党员中，大约 90% 来自军人和地方绅士。据说惠阳支部及其区分部通过收取昂贵的人党费，来排斥农民和工人党员，抵制农工组织的扩展。胡树森还否定一些党内小册子而推广另一些，由此为全市确立了一种政治气候。被禁止的有共产党刊物《向导》和《中国青年》、谭平山的小册子《为什么要打倒陈炯明？》、汪精卫的《广东人民今日应有之决心》，以及由激进的总政治部发行的其他小册子。然而，戴季陶的小册子《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以及孙文主义学会提供的其他材料，却得到了胡树森的推广。^① 即便在陈炯明被迫仓惶逃窜之后，惠阳党部仍被中央党部划入需要干预和改组之列。它名义上受国民党控制，却不在广州中央党部中的优势派别的控制之下。

312 1925 年 11 月中旬，惠州市党务改组委员会决心重建惠阳党部。委员会将自己任命的人安排到县党部秘书处，然后改组了 7 个区分部。它严格审查在册党员的资格证书，撤销了所有“退役军人、游荡绅士和叛逆商人”的党员资格。但委员会遭到了现党部人员的粗暴反抗，就在改组之后，因为（地方）社会的阻挠和资金不足，它推行更激进政策的尝试受到了阻碍。改组后的党部在惠州创办了一份日报——东江《民国日报》，但创办不到一个月，该报就因缺乏财政资助而倒闭。它想分发由国民党各机关提供的大量宣传材料，但当地书店拒绝存储或销售它们。该地的财政改良办公室拒绝奉命从

① 谭平山《为什么要打倒陈炯明？》和汪精卫《广东人民今日应有之决心》。《各县市党部及筹备处工作报告》1926：6。戴季陶著作的意义将在第八章讨论。普宁县孙文主义研究会在士绅控制之下。Marks 1977：65—99，尤其是 94。

战利品中提供2万元拨款，从而妨碍了农工运动的发展；它又中止每月300元的津贴，干扰了党部自身的活动。改组后的党部转向群众活动，以弥补自己在其他领域的缺陷。它为青年和妇女建立了一个俱乐部——后者最终成为一所宣传员讲习所——并组织俱乐部成员带着政治教育的使命去乡村地区旅行。教会学校的女生被灌输以帝国主义“精神侵略”有罪的思想，工人被召集到6个新的工会中，“通过革命宣传”，许多商人被劝告加入国民党发起的商民协会。

这次党部改组的严厉尝试结束之时，惠州委员会断定，全省都需要进行地方党务改组，但只有投入大量的人员、时间和资源才能奏效。^① 惠阳一县就把8县委员会折腾得够呛。惠阳的经历并不像党务改革者所期望的那样，是导向按常规程序在整个惠州地区党部进行大规模调查和改组的既定道路的第一步。相反，委员会除了绕过原有的权力结构、通过动员青年学生去“唤醒”人民之外，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最初用来唤醒民族的技巧，再一次被用于整肃实践这些技巧的政党。在国民党政权的党、政、军机构更广泛的发展中，这是普遍的现象。唤醒中国人民的冲动，最初推动了用一党制国家取代既有共和国的党派运动，却经由派系斗争；迅速转向了对党治国家内部既有机构的置换。

派系斗争决不是与唤醒中国的更宏伟计划相脱离的。国民革命中的所有政治活动家，都宣称代表那些通过新的国家结构寻求民主表达的社会力量行事，他们的斗争被认为是围绕党务机构和社会组织——也就是派系斗争和“阶级斗争”——之间关系的本质进行的。惠阳县党部的改组经历，暗示出一种日益深化的制度性关联——

^① 《惠属特别委员会工作报告》，1926：26—27；《各县市党部及筹备处工作报告》，1926：4。

边是国家机器内部的派系斗争，一边是精英对国家渗透的抵制，或者群众通过工人、农民和学生组织表达的对新国家的支持。这里列举的众多派系冲突实例——无论是在广东大学，中央、省、地方党政机构内部和相互之间，还是在军事学校和军队政治机构之间——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国民革命中谁在代表谁？

结论 代表阶级和民族

一群人经本群中每一个人个别地同意、由一个人代表时，就成了单一人格；这人格之所以成为单一，是由于代表者的统一性而不是被代表者的统一性。承当这一人格而且是惟一人格的是代表者……在一群人中，统一性除此以外没法作其他理解。

托马斯·霍布斯 (Thomas Hobbes) ①

无业阶级的人脸皮真厚，手段也真麻利，他们随时可以自行充当某部分人民代表。路易十四说“朕即国家”，他们说“我即国民”。

梁启超，1925 年国际劳动节②

在《民族与民族主义》一书中，欧内斯特·盖尔纳嘲弄了马克思主义者对本世纪民族主义的压倒性胜利的失望。“觉醒的消息是要

① Hobbes [1651] 1946: 107.

② 梁启超 1984: 85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给阶级的，”盖尔纳解释说，“但由于某种糟糕的邮递错误而被交给了民族。”^①人类进入19世纪，一切征兆都显得很祥和。在欧洲和美国的城镇，工人每天早上都被从床上叫醒，以适应工作日的节奏，这使他们的生活模式、兴趣和文化，都与其他阶级区别开来。在地球上那些半野蛮、半文明的村庄里，农夫们正在慢慢抛弃对自然的崇拜。^②随着科学对命运的征服，人类表现出接受普遍命运而不是特殊民族命运的倾向。今天，这种信念看来大多是错误的，尤其是如下信仰，即民族这一情感共同体将被一个更理性、更国际化的工人阶级共同体所取代。1848至1949年间，“觉醒的消息”显然步入了某种歧途。

316 在过去10年间，民族主义激起了一股学术研究热潮，部分是致力于解释其历史存在和最近的复兴，部分则要解释马克思主义为何显然未能预见到这一点。二者并非毫无关联。正如本·安德森（Ben Anderson）所解释的，对马克思主义而言，民族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令人不安的例外。^③可这并不是我这里关心的问题。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所处的位置，向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问题，它和民族主义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提出的问题一样难以解答。中国革命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中国，邮递员似乎把给阶级和民族的“觉醒的消息”送到了同一个地址。

20世纪初期，中国的阶级意识和民族意识都未得到高度发展，但中国革命中存在这样一些时刻，似乎“觉醒的消息”到各阶级那

① Gellner 1983: 129. 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② 马克思 [1852] 1968: 172. 亦见马克思 [1853] 1969a, [1853] 1969b。

③ B. Anderson 1991: 3. 亦见 Munck 1986, Laroui 1976, Chatterjee 1986。

里无疑要比到整个民族那里更为有效。20 世纪的中国革命，几乎就是对列宁那句断言的证明，即“每一场革命都要打碎国家机器，展现赤裸裸的阶级斗争”。^①当 19 世纪晚期的绅士让位于“劣绅”、地方官吏蜕变成“土豪”时，国家官僚机构就失去了调解社会冲突的能力，在调解机制缺席的情况下就容易发生冲突。^②随着清王朝的崩溃，财产所有权比在帝制之下更直接地转变为权力运作。1930 年代国民党统治下和随后共产党统治下国家权力的重建，意味着高度的群众动员，以使用新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式国家机器的权威来取代地方精英的权力。正是革命政权与地方既得利益之间的这种冲突，导致了中国民族革命中阶级斗争幽灵的产生。然而，分裂性的阶级斗争与统一性的国家建设的并存，混淆了将中国民族主义理论化的任何尝试。在中国，各个革命的社会阶级的联盟，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觉醒”了。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为什么民族主义要由一个“觉醒”的消息来预告。安德森和盖尔纳都将民族主义放在革命政治、社会变迁和现代大众文化出现的交叉点上，它们交替环绕在“想像共同体”或者“觉醒”民族的观念周围。本研究密切关注着觉醒的消息，而不是信封上的地址——是想像、唤醒、代表而不是正被谈论的共同体本身；在探寻唤醒主体的演进时，我曾经指出，唤醒的消息总是始于其自身，事实上却可以终止于任何地方。在对理想的道德共同体的探寻中，觉醒自身参与了青春、性别、阶级、民族、人类，甚至（康有为可能会说）火星上所有生物的觉醒（作者此处是借题发挥，以说明“觉醒”的辐射面。——译者）。当民族主义改革者和国家官

① 列宁 [1917] 1965。

② Kuhn 1970.

317 僚开始积极整肃唤醒共同体的种种梦想时，民族在中国占据了优势位置。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民族主义者通常都相信，当一个共同体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共同体时，它就出现了；当它被一个代表制国家唤起这种意识时，共同体就能合理地重组为一个民族。

但问题还在于，为什么一个觉醒的革命阶级联盟要像一个觉醒的民族那样行动呢？预示着阶级觉醒的消息，必定是民族觉醒消息的附属物吗？当然，马克思和恩格斯预见了阶级斗争起初会采取民族形式。事实上，他们令人惊讶地随口道出了“各国无产阶级”的民族特殊性：

如果不就内容而就形式来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①

就在这里存在一个例外。在《共产党宣言》靠前的一个段落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注意到了“民族相互依赖性”的增长，谈到“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②在另外一个地方，恩格斯暗示了国籍被无产阶级所破坏的过程：“所有的无产者生来就没有民族的偏见，”1845年他走出伦敦各族人民庆祝大会后说：“只有无产者才能够消灭各民族的隔离状态，只有觉醒的无产阶级才能够建立各民族的兄弟友爱。”^③当无产阶级觉悟到（或者被唤醒）它在生产关系中的真实地位，以及它在建立各民族间兄弟情谊中的命运时，马克思的“内容”和“形式”大致可以得到协调。正如珊杰·塞斯（San-

① 马克思、恩格斯 [1848] 1976：49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同上：488。

③ 恩格斯 1976：6，Munck 1986：6。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jay Seth) 所说的, 看来并不“当然”地存在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的阶级斗争。^①只有当我们和恩格斯一道承认“各国无产阶级”尚未觉醒时, 这个似是而非的“当然”才有意义。

总之, 我打算通过聚焦于代表制国家这一理念, 来弥合马克思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中形式与内容之间的鸿沟, 从而探讨大众觉醒的地位。鸿沟的一边是可以实现或者可以变成现实的东西, 另一边仅仅是具体的东西。如果一种基本内容被假定为真实, 尽管未被觉悟和认识到, 那么实际形式就仅仅表现为一种幻想, 甚至当它(“当然”)实际存在时也是如此。在前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那段话里, 民族提供了形式, 国际性的阶级斗争则提供了内容。在马克思和列宁的其他著作中, 自发的阶级与自为的阶级, 或者自发因素与它的“自觉”领导, 标志着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分野。^②我们将看到, 围绕着什么是事实上的“真实”、什么是纯粹的表象,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民族主义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区分。在每一种情形中, 人们都假定, 革命真理能够通过政治和文学上的代表/表现而变成真实。因此, 代表制政治的实践和表现式文学的形式, 各自都能告诉我们关于对方的许多信息。

318

在中国革命史上, 形式与内容的分野往往和理论与实践的区分相重合。例如, 人们情不自禁地这样去接近毛泽东的著作, 即相信他的主要贡献在于试图通过运用辩证法, 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③但在其直接的语境中, 毛泽东对理论

① Seth 1989: 4.

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区别了工人“不团结的大众”与历史上“使无产者成为一个阶级的组织”。马克思、恩格斯 [1848] 1976: 492—493。列宁对“自发因素”及其“自觉领导”提出了一种操作意义上的区分。列宁 [1902] 1988: 第二章。

③ 见 Knight 1990; 毛泽东 [10]。

与实践关系的极度关注似乎有另一个来源：文学现实主义。毛泽东渴望通过革命，让实际的形式与真实的（但却是隐蔽的）内容相结合。在现实主义小说中，主人公正是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觉悟到了束缚着自己的势力的本质，然后才会努力去摆脱它们。通过实践去发展理论，只是毛泽东的附带任务。更紧迫的是这样一种需要，即发明一些技巧以唤醒人们，使他们看到一幅确定无疑的真实景观，或者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真理加诸民族身上，因为这是由革命政权所代表的。

在这里，毛泽东对列宁的推崇超过了对马克思或恩格斯的推崇。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揭穿它所宣称的代表某个民族的谬论。民族国家终究只是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而已。^①对列宁来说，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在他的《论民族问题》和《论殖民地问题》中，国籍的消灭只在一个更有利的时刻才会发生，那时，亚洲的民族民主革命将导致欧洲城市资本主义的毁灭。1920年代的迫切任务，是唤醒亚洲各民族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与此同时，革命民族将由一个地方性的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执行委员会所代表，与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曾经宣称对民族的代表相比，这是一种远为字面意义上的代表。

列宁的判断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民族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的观点。^②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代议制国家”，不再需要成为资产阶级的执行委员会。在列宁之后，它可以服务于任何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 [1848] 1976: 486。

② 同上。这种国家观点——其中之一可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发现——由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加以发展，他声称要重建“真正的”马克思国家学说。列宁 [1917] 1965: 第一章。关于马克思国家理论更广泛的解释，见 McLellan 1983: 143—188。

个它宣称自己所代表的阶级和集团。事实上，它可以通过代表一个阶级或者民族——仿佛它们还未觉悟到自己的身份或者利益——而达到自己的目的。在中国，民族意识是隐藏在代表制政权的意识中到来的，民族借用了国家的形式和特征，后者被认为要唤醒和代表前者。

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执行委员会，都声称自己代表着不同的中国人民。这不是欺骗：唤醒的政治鼓励人们相信某种特定的国家类型，它将代表一个共同体直到后者觉醒过来。如果醒来的官员被迫去代表某种仅仅在内容上而尚未在形式上存在的事物，这并不是他（她）的过错；革命政权也不会因为只对其官员负责，而被简单地认为不具有代表性。确实，它已经达到了如此程度的代表性，以至于可以创造自己在社会上的所指。大众觉醒的政治会在一个新式大众社会的自我实现中达到高潮——当这个社会最终反映出代表它的政府的轮廓之时。至此，在革命政权自身的现实主义、代表制修辞中，内容和形式将得到调和。 319

民族觉醒与社会利益

民族的实际构成，是由社会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由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所决定的。当民族共同体的边界要围绕国家利益来划分时，某些社会成分就可能发现自己被排斥在民族之外。这就是国民党领袖在国民革命中首先向“自私的”部门利益发难时所发生的事情。考虑到国民党党治国家对民族的含蓄认同，孙中山和蒋介石很难将1924年秋的广州商团叛乱，仅仅解释为部门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

1924年8月的第一个星期，孙中山命令广州的军事长官拦截运

给该市商团的一船武器。8月末，英国驻广州总领事表示了对商团的同情。8月27日，詹姆斯·杰美逊（James Jamieson）爵士发出正式警告说，如果广州商团与国民党开战，广州港的英国海军将集结起来援助商团。对孙中山来说，商团建立独立武装的企图是完全不可饶恕的，但来自英王陛下代表的威胁，又使他们的不满带上了叛逆性质。在9月1日的答复中，孙中山发誓抵抗“帝国主义”对中国内部事务的干涉，并以支持与商团开战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决心。蒋介石将孙中山的誓言付诸实施。10月间，蒋介石率领黄埔军校学员与商团开战，摧毁了后者，破坏了该市的商业区。战火在商业区肆意蔓延了两天。^①上海和广州更激进的理论家们，只需要对孙中山和蒋介石采取的行动过程表示认可，以断言在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中，资产阶级“利益”使中国的商人阶级结成了不自愿的联盟。

尽管如此，相比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对一个承认种族性的民族理想的政党来说，民族破裂是一个更加重大的问题。在陈独秀看来，广州商团事件提供了资产阶级叛逆行为的一个明确证据。对于其他的共产主义理论家而言，它似乎象征着革命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过去的资产阶级（国民党）领导与将来的工农（共产党）领导的区别。^②当然，这还只是早期阶段。因为总是不愿将城市资产阶级成员完全排除在资产阶级民族革命之外，试图谴责他们顽固反对民族利益的想法也得到了缓和。^③

① L. Chen 1989, Bergere 1989.

② 陈独秀 1924a。Luk 1990: 91—93，这一新思想路线的出现，其根源在于彭述之、张太雷和瞿秋白的著作。

③ 周恩来 [伍豪] 1924，蔡和森 1924b。

1925年的五卅运动，对资产阶级提出了一种更具谴责性的指控。在西方人的回忆录和历史著作中，五卅运动主要是作为帝国主义对华统治之终结的开端而被记住的。当然，西方的威望再也没有从这一事件中恢复过来，外国人的言行举止变得更加谨慎，他们知道自己的安全不再有确定的保障，自己的特权再也不能确定地继续下去。^①但中国的活动家并不如此看待这一事件。对于革命的国民党人来说，正如国民革命纲领所宣称的那样，五卅运动的目标完全在于废除外国特权和影响。这场运动的可悲结果既是一种挫折，也是一种背叛。这一挫折的结果是在本已伤痕累累的国家肌体上又增加了一个国耻日。但这一背叛则是一种新的背叛。对民族的背叛责任，第一次被推到国内一个重要的社会阶层——上海资产阶级身上。

孙中山在1924年的行动，部分地削弱了自己的民族理想。随后一年里，这种理想作为一种荒谬的浪漫观念烟消云散了。他设想中的民族，是以家庭，尤其是以扩展的父权制家族群体为范本的，它囊括了每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人。但在1925年五六月间，一些民族主义者在这个家庭中发现了社会叛徒——用毛里斯·梅斯纳（Maurice Meisner）的话来说，就是“国内的外国人”——他们的血缘关系并不能为其背叛行为提供辩护。^②被组织起来的群众十分不满，于是就以同样的愤怒，既指向国内的敌人——它表现为资产阶级（最终是地主阶级）——又指向国外的帝国主义者。在一场以民族名义而发起的阶级战争中，二者都成了被攻击的对象。

陈独秀早先曾相信资产阶级将支持革命，但这一信念为广州的商团叛乱所动摇，并为五卅运动的结果所粉碎。虽然是一名共产党

321

① Rigby 1980.

② Meisner 1982: 55.

人，陈独秀却是最热忱地倡导全民革命的人之一，也是最早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立场”表示失望的人之一。^①但他的判断只是偶然的。他在其“幻想”破灭之际的失望，根本不能与戴季陶等国民党人的“幻灭”相比。在指出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之间的冲突时，陈独秀可以自由地重新解释社会阶层与革命的对抗，而不致破坏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可以在民族的名义下，自由地将视线投向资产阶级利益。戴季陶则不是这样。资产阶级的背叛当然令人失望，但一个无产阶级政党能够接受这种失望。对戴季陶来说，这是更令人痛苦的失望。

“无论如何，中国人民的意识是由当前利益所决定的，”戴季陶向他在国民党宣传部的副手倾诉道，“就像唯物史观论者所说的那样。”^②这是一个重要的让步。在1925年8月致信刘庐隐之前的一年多时间里，戴季陶不再积极参与中央宣传部的事务，但他仍然是国民党方面最活跃、当然也是最有才华的著作家之一。他在孙中山身边兢兢业业地工作了10年，努力证明中国人民的道德凝聚力，并抵制“唯物史观论者所说的那样”一种论断，即中国人总是为眼前利益所驱使。在与国民党合作初期，共产党领袖承认，眼前的社会利益应该继续服从更长远的民族利益。^③但广州事件已经加剧了这样一种怀疑：某些社会利益也许与民族利益根本不相容，正如随着革命政权的顺利扩张所明确昭示出来的那样。到次年秋天毛泽东接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时，这些怀疑已经固结为信念了。共产党人开始公开谈论民族革命中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到1925年秋天，连戴

① 陈独秀 1923d, 1925b。

② 戴季陶 [1925] 1959b: 971。戴用了一个词——良心，它一般译成“conscience”而不是“consciousness”。但在当时，它通常也用来谈论道德“意识”。戴也提到了各个群体的部门利益从属于民族利益的需要：戴季陶 [1926] 1969。

③ 陈独秀 1923b。

季陶都打算承认他们可能有一些道理。

戴季陶对革命的长期领导权和方向问题在近期发生的影响表示欣赏。从6月到8月，他对陈独秀进行了猛烈的反驳，这一努力的结果，形成了题为《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和《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的两本小册子，它们对于国民运动内部逐渐加剧的紧张并未起到丝毫作用。^①就在戴季陶致信其副手刘庐隐之前几天，这种紧张以暴力形式爆发了。这封信的直接动因，是一则刚刚为广州来电所证实的新闻：8月20日，他的老同志廖仲恺被国民党内的异端派别所暗杀。尽管他与更加激进的廖仲恺之间最近存在分歧，但他仍然为死去的同志感到无比悲痛。国民运动的内部斗争已经走向暴力形式，他也为此感到悲痛。他担心这种势头将腐蚀整个民族：“像仲恺那样宽容的人，充满人道的同情，对工作如此热心和忠诚，竟会遇到这样的结局——我们中国、我们民族再也不会有任何和平的结果。”^②他的评论有着先见之明。虽然如此，有一点非常重要：促使他对中国革命的前景作出悲观的再评价的，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死亡，而不是社会“阶级斗争”的爆发。廖仲恺的遇刺证实了一种难以估量的怀疑：唯物史观不仅是一种貌似合理的哲学立场，而且是共产党与国民党进行阶级斗争的一件潜在武器。因而，正是以一种近乎绝望的忧郁语言，戴季陶写下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意识”的失望。人民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令他失望，而让他的敌人感到快慰。他确切地感受到，中国将再也不是同一个中国了。

戴季陶在一封给副手的私人信件中流露出对中国人民的失望，这算不了什么。而他的批评者则采用公开的方式来回应他。在致信

① 戴季陶 1925a 和 1925b。

② 戴季陶 [1925] 1959b: 971。

刘庐隐之后不久，戴季陶遇到了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向他透露了自己对近期事态转变的忧虑。在这一场合，戴季陶打算承认（仍然是私下地）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认为，阶级斗争的出现要求共产党对其策略进行修正。他警告说，中共目前的政策将会加剧阶级斗争，使它超出可以控制的限度。显然是为戴季陶的论调所困惑，陈独秀立即在共产党刊物《向导》上公开发表了《给戴季陶的一封信》。陈独秀通过媒体而不是邮局送出这封信，这是因为他坚信激进的意见会支持自己。如他所说，“事实”站在自己这边。

陈独秀成功地替唯物史观进行了辩护，对“空洞的理论”和“空洞的主张”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努力批驳戴季陶的如下说法：虽然阶级斗争可能是活生生的现实，但它在民族革命中却没有什麼位置。“我们乃是唯物史观论者，”陈独秀反驳戴季陶说，“绝不是空想家。”戴季陶正是空想家。陈独秀承认，戴季陶的想法听起来非常合理，但惟一能检验其正确性的是实践。而实践已经表明，革命当中突然兴起了群众运动，已暴露出了比戴季陶所愿承认的更深层次的冲突和斗争。接着，陈独秀列举了从广州商团叛乱到五卅运动、沙面惨案的一系列重要事件，努力说明“以上这些事实已明白告诉我们：在民族争斗中实有阶级争斗之必要”。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再代表反革命阶级，而是要肩负起工农革命阶级的利益。工农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寄望于别的东西就是“空想家”。^①戴季陶已在私下里承认了陈独秀的某些论断，他也没有兴趣公开回应它们。如果事实不在他那边，那么，激进政见的声音也是如此。戴季陶再也不能满怀革命所需的信念去代表人民的事实或者利益了。

^① 陈独秀 1925a。

唤醒与代表

信念当然是重要的。一方面，唤醒人民就要教育工人、农民、商人、妇女和学生，使他们明白自己的“真正”利益何在；另一方面，它又意味着尽可能有说服力地指出，是谁在政治领域代表他们的利益。这两方面都需要大量的信念。

学习如何辨别陈独秀与戴季陶，或者说共产主义与非共产主义劳工组织者之间的差别，在工人的课程中占据了相当的内容。1925年4月，共产党人蔡和森警告说，对于那些宣扬在劳工运动中相互妥协的资产阶级说客，工人们是不会受他们欺骗的；同年稍后时间，针对在有组织的劳工运动中提倡博爱和仁慈，陈独秀和瞿秋白严厉批判了它的合理性。每个事例都是指戴季陶为工人开设的课程。后来，直到1927年4月国民党对工人运动加以清洗之后，工人们才被教导去认清这些教义的错误。也许工人们至少懂得，那些以最强大的信念和权威去教育自己，让自己明白真正利益何在的人，才是自己的政治代表。^①

对于中国民族主义政治中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的代表关系，已经有各种各样的原理来加以解释。代表通常不是一种正式的委托。^② 它也无法这样。人们认为，代表意味着代替一个沉睡的主体，而不是在一个醒来的主体的明确指示下发言。但尽管如此，这一论断仍然需要证明：一个人究竟如何能代表另一些人——他们实际上从未向他提供授权——发言和行事呢？

① 蔡和森 1925，陈独秀 1925a，瞿秋白 1925a，1925b，Luk 1990：95，Chesneaux 1968。

② 关于代表的形式，见 Birch 1971，Pitkin 1967。

324 到1920年代，持不同观点的革命家都达成了这种想法：代表意味着代替一个不自觉的或沉睡的委托者（“沉睡的大众”或“不觉悟的人民”），而不是在一个自觉的委托者的指示下发言。但考虑到对委托代表制形式的持续关注，这一论断是需要证明的。证明的形式之一可以诉诸“同情”，它通常与如下观念连在一起：革命的民族主义者通过一种同志般的道德关系，代表着不自觉的人民及其朦胧的利益。1920年，国民党元老胡汉民说，学生宣传者必然代表着尚未意识到自身阶级角色的被压迫的社会阶级的意识，因为他们“同情”后者。因此，“在无产阶级具备自我意识之前，……清末的海外留学生暂时代表了无产阶级的意识”。为了证明这一看法，胡汉民没有引用列宁的科学社会主义，而引用了马克思自己的个人情形。胡汉民辩解说，在马克思那里，知识分子对被压迫者的代表，是通过“人类的同情心”而实现的。一旦有了自我意识，无产阶级就必然会承认学生们代表自己发言的权利。与此同时，著作家和宣传家们的职责，就是确保工人和农民得到充分的被代表，并提醒他们认同那些怀着同情心去代表自己的人。^①

胡汉民的立场更接近于中国的道德传统，而不是马克思和列宁。马克思假定在底层社会阶级及其代表之间存在一种象征性、符号性的关系；列宁紧接着考茨基（Kautsky）之后，将知识阶层对无产阶级的代表的基础，归结于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合理借用——也就是一种知识形态。^②另一方面，儒家经典则假定人类具有一种同情亲戚和邻里的天然倾向，通过培养人性的美德，它反过来又构建了一种道德框架，将同情扩展到所有人身上。由于人类自身的禀赋，

① 胡汉民1920：3。

② Petrey 1988a 和 1988b；列宁 [1902] 1988：105—107。

孟子（学派）的传统强调了同情，它是规范着人类的共同纽带。我们已经看到，晚近时期的康有为复兴了同情这一古典的概念。他敏锐地意识到了身体对于自身痛苦的剧烈反应，这导致他把同情的观念建立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之上，也促使他启动了探求“大同世界”这一普遍伦理的行程。^①随后，中国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和革命民族主义者吸收了同情这一理念，把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痛苦当做自己的痛苦，并宣称自己有权在革命政治中代表他们。^②

但这并不是马克思自己的观点。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讨论资产阶级的作用时，马克思阐明了调节着社会阶级及其“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之间关系的一条普遍原则：

使他们成为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是这样一种情况：他们的思想不能超出小资产者的生活所越不出的界限，因此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也就是他们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地位在实际生活上引导他们得出的任务和作出的决定。一般说来，一个阶级的政治代表和著作方面的代表人物同他们所代表的阶级间的关系，都是这样。^③ 325

马克思在这里断言，一个阶级的代表者，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之间，存在着某种类同关系。就同情而言，利益及其代表之间既没有结构性的关联，也不存在身份上的关系。但现在不需要同情了。代表只是表明各种社会利益。在这一模式中——用山迪·皮特

① Shun 1991: 25—35. 见本书第二章。

② 沈定一在1919年为国民党《星期评论》撰写的公开前言，是对同情性代表的辩护。沈定一1919；吕芳上1989：53。

③ 马克思 [1852] 1968: 121。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瑞 (Sandy Petrey) 的话来说——观念是代表性的,“因为它们表达了物质利益的运作 (而不是由其发展而来)”。^①从根本上讲,马克思的代表模式正是这样一种模式:代表者的思想形态,与基本的社会关系模式——它碰巧将某个阶级引向某种方向——之间,存在着某种简单的一致,由此代表着 (某个阶级)。究竟是什么因素使某个阶级的代表者具备相同的立场,这并不清楚。我们只知道,文艺和政治代表者幸运地达至了这一点。如果资产阶级的代表者能够经由某种简单的一致行动去代表,那么也可以对无产阶级作出同样的假设。但在这一事例中,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与它那自命的代表者对它的表达之间——如果这个代表者刚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话——再也不存在偶然的一致。社会利益被说成是由科学社会主义规定的。

正是科学社会主义或列宁主义在中国的降临,首次挑战了同情作为激进政治中政治代表的基础这一地位。^②谈论中的某个阶级的正式授权,或者阶级自身的典型成员,都没有什么意义。相反,列宁对自发 (或不自觉) 的群众运动及其自觉的代表的区分,被翻译成一道相似的公式,即沉睡的大众及其觉醒的导师。

在其经典著作《怎么办?》(1902)一书中,列宁界定了觉悟和政治领导权之间的关系。从论争的角度看,这一问题的背景结构,是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关于如下问题的分歧,即革命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之间的恰当关系。^③但从主题上看,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方向

① Petrey 1988b, 458.

② Munro 1977, 18—19.

③ 《怎么办?》第二章适当地定题为“群众自发性与社会民主意识”。列宁攻击的目标是那些“经济学家”——他们支持知识分子在群众运动背后扮演一个相对狭隘和 (他相信是) 被动的角色。“社会民主党人”偏爱领导者的先驱模式。列宁 [1902] 1988。

和自发性，自觉和不自觉，以及“唤醒大众”的可能性。要说明列宁在唤醒和代表制政治方面的杰出贡献何在，这并不是一件貌似简单的事。正如列宁自己指出的，他那规训大众觉醒的模式，只是由竞相“唤醒”大众的革命团体提出的众多训育式政治形式之一。列宁满意地观察到，所有社会主义者都会走向相同的结果。他说，几乎还没有哪位宣传家“怀疑过：当前运动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醒”。尤其是，“‘每个人’都同意，有必要培养工人阶级的政治意识”。列宁在其小册子中提出的问题是“怎么办和从何着手”。^① 列宁对唤醒政治的杰出贡献，不在于提出了要做些什么，如同这本小册子的英文标题看起来所暗示的那样，而是为“唤醒大众”确立了一种新的原理和程序。

列宁坦率地指出了自己的训育式政治行动和领导关系的含意。他有选择地将“觉悟”一词用于先锋政党身上，从自觉的意图到效果方面，都摒弃了伦理和政治的判断标准。不自觉的因素——列宁这样称呼其对手——之所以被人们注意到，主要是由于它的行动的无意后果，而不是由于它的意图。即使是具有良好意图的革命行动，假如其后果削弱了真实的自觉因素，那它也没有什么价值：“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那些反对他的方案的人，无论是否有意，都是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对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任何轻视和任何脱离，都意味着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加强。”社会意识的政治后果而不是其物质根源，将成为衡量有效的政治代表的标准，这些后果的衡量，主要取决于它们给某个特定政治派别带来的利益。通过切断觉

^① 同 468 页注③：96，143。

悟（在普通意义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列宁把竞相“唤醒大众”的革命派别之间的冲突，简化为一句古老的谚语：不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问题只能是这样，”他写道，“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①

327 把利益交给不自觉的（或“健忘的”）人民，既是列宁主义者的策略，也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策略。^②但对列宁而言，无产阶级意识完全是一张白纸，阶级的代表者可以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导下，自由地在它上面描画物质利益。列宁在《怎么办？》一书中说，工人对其自身利益的感觉，未能反映自己阶级的客观形势，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不仅是错误的，而且绝对有害于对其真正利益的追求。他提出，像工人自己所理解的那样去谋求工人的利益，将永远超越不了“工联意识”。这种不良意识，将工人的要求有效地局限于对暂时经济利益的追求。这种缺陷需要由“自觉的”领导者通过宣传和鼓动来加以克服，这样可以弥补工人阶级在“为其自身确立……独立思想体系”上的无能为力。^③工人阶级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觉悟，可以使他们明了自身的真正利益。因而，工人阶级的“自

① 同 468 页注③，105—107。着重号为原文所有。

② 列宁将利益交给工人的习惯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后者（在对 1848 年事件的谈论中）询问为什么群众对自己利益的觉悟配不上他们的“革命兴趣”。马克思称无产阶级是“健忘的”。马克思 [1852] 1968, 155。

③ 列宁写道：“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他将“纯粹工人运动本身就能够创造出而且一定会创造出一种独立的思想体系”这样的信念，视为一个极大的错误。列宁 [1902] 1988: 98, 105, 及第二章。

发”（其意义与沉睡相似）因素受到了指责，因为它将他们的生活引向一种无知的昏迷状态，直到这个阶级以外的觉醒分子介入其间，才使他们觉悟到本阶级的真正利益之所在。托尼·波兰（Tony Polan）曾经评论说，列宁在将“觉悟”注入无产阶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并不如在论证“革命党与人民的意识作斗争”的需要方面那么显著。^①《怎么办？》一书是一种训导体系的基本文献，这种体系的设计，是为了让各种主体觉悟到那些隐蔽的知识：他们究竟是谁，他们的真正利益何在，以及究竟是什么促使他们去思想；该书也是建立一种严格的纪律制度，从而确保人民“觉醒”的基本文献。

1920年代，当列宁主义进入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之时，对某种特殊形式的意识的觉醒，取代了出于同情而去授予（某人以）代表人民的权力。现在，醒来的少数人不是通过同情沉睡的大众，而是通过为后者描画真正的物质利益来代表他们，他们自己只是模糊地意识到了这种利益。列宁式纪律制度也被引入中国。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份刊物《共产党》，将列宁的著作介绍给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从其创刊号起，就采用列宁的战术计谋以夺取革命的控制权。该刊主编警告说，其他的社会革命者如果不加入共产派，就会被划入敌人之列。无论其意图何在，革命者（倘若）不承认布尔什维克对革命的领导权，就是在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结果，他们将代表资本家阶级，应该受到本应施加给某个顽固的敌对阶级的任何惩罚。^②

① Polan 1984: 9. 列宁赞许地引用了卡尔·考茨基（Karl Kautsky）拟定的《奥地利社会民主党纲要草案》（1901）：“社会主义意识是一种从外面灌输到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去的东西，而不是一种从这个斗争中自发地产生出来的东西。……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把认清无产阶级的地位及其任务的这种意识灌输到无产阶级中去。”列宁 [1902] 1988: 106—107。

② Dirlik 1991: 209.

但在中国，列宁对自觉的少数人和不自觉的多数人的战略区分，还需要加以修正，以适应对具有同情心的代表的持久尊重。中国自觉的无产阶级出于对其不自觉的兄弟姐妹的同情，将他们唤醒到列宁从未想像过的程度。在他自己的训导法中，列宁明确区分了宣传和鼓动：革命宣传是革命党人的专利，而鼓动则指向大众。这种区分来自这样的信念，即只有革命党人需要充分认识科学社会主义的详细内容，不自觉的大众只需要被“鼓动”去认识自觉的政党所追求的目标。大众不需要具有自我意识。^① 在中国，同情这一理念不会允许如此不平等的区分。

同情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尽可能唤醒本民族的所有成员。如同人们所理解的，马克思曾说过生产关系决定社会意识。那么，一名年轻的中国革命者该做些什么来实现他那唤醒沉睡的人民、使之意识到自己被压迫地位的使命呢？1921年2月，这个问题困扰着众多觉醒过来的年轻人，包括毛泽东的亲密战友蔡和森：

马克思的革命说完全立于客观的必然论之上。革命既是必然的，然而我们无产阶级的觉悟者何以要去唤醒同阶级的觉悟呢？（一）因为我们自身既已觉得痛苦之所由来……便惨然不能终日。（二）对于同阶级的人有同病相怜的同情。^②

蔡和森只在短期内做过工厂工人，但他对“同阶级的人”的同情，使他有资格成为无产阶级的终身成员。他这种因同情而来的成员资

① 列宁 [1902] 1988：第二章。

② 蔡和森 [1921] 1969：212。我用“inevitably”代替了译者的“necessary”。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格，反过来促使他去唤醒自己那些不自觉的同志。蔡和森已经超越了胡汉民的同情式代表 (representation-by-sympathy)，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列宁的觉悟型代表 (representation-by-consciousness)，尽管还与后者有所区别。无论是同情还是觉悟，都无法单独赋予代表权力。同情让蔡和森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分子，也促使他通过唤醒别人去分享自己的无产阶级意识。但正是关于痛苦之所由来的特殊知识，给了他行动的信心。也就是说，他是一个自觉的无产者，因为他已经领悟了“痛苦之所由来”，并确信如果自己让工人们具有同样的感受，那么他们就会像他自己那样变成完全自觉的无产阶级分子。

毛泽东凭直觉掌握了列宁主义的整肃方式，却和他的师友们一样，希望有一天每个人都会觉醒过来。正是暴力与同情之间的这道奇异联系，困扰着毛泽东的批评者，也使其支持者感到迷惑：在其晚年生涯中，毛泽东式政治具有某种基督教青年会夏令营中的斯大林主义公审大会的味道。1925 和 1926 年间，当毛泽东在广州发表演讲和文章，解释革命与反革命社会阵营之间的明确区别，并极力敦促人们认识到眼前使命的急迫性之时，他第一次发展出了这种风格。未能与国民党内的革命派结盟的革命者，将没有自己的位置。然而，几乎每个人都有机会加入该联盟。“中国现在已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毛泽东在 1925 年的最后几个月中写道：

329

像这样紧迫的时局，不但无弛缓希望，而且将继续紧迫。

我们料到在不远的将来情况之下，中间派只有两条路走：或者向右跑入反革命派，或者向左跑入革命派（其左翼有此可能），万万没有第三条路。

“站在中间的绅士们！”他在另一场合发出了挑战，“你们打算怎么

办？向左？还是向右？”^①

尽管毛泽东认为除了小部分顽固的反革命分子之外所有人都有补救机会，但只有极少部分中国人能够获得这一机会。根据毛泽东的估算，99%的人事实上根本别无选择：98.75%是无法挽回的旁观者（如果尚未充分觉悟的话），0.25%是顽固的敌人，摇摆不定的资产阶级据估计占1%。^②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选择走哪条路，取决于他们那不可剥夺的阶级利益，即便他们尚未意识到其利益何在。按照简单的逻辑顺序，当具有同情心的多数人看到政治斗争的表象世界是如何与其内在的、隐性的、相互冲突的阶级利益相关联时，他们就会觉悟到自己在革命领导权中的政治代表者的身份。那无可救药的0.25%将被清除，而不是被唤醒。毛泽东对那摇摆不定的1%倾注了更深切的关注，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他就这些人提出了最有力的论点。这1%——他们是惟一获得了真正机会的群体——根本不是一个社会类别。其规模和成员资格显示出，它是一个政治类别，囊括了所有的作家、艺术家、记者，以及宣传部曾专门提出来加以攻击的各种政党、派别和小团体的活动分子。惟一被赋予了觉醒机会的这类人，基本上是一个残余类别，他们都是革命的政治敌人：一群自命的代表者，像毛泽东那样，他们必须决定自己将“代表”谁。

一旦政治合作进而成为阶级地位的表征，关于革命领导权中谁

① 毛泽东 [6]：10—12，[20]：12—13。毛第一次对摇摆不定的“中间”派提出要求，可能是在1925年10月为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大会所作的演讲中。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10月8日。

② 毛泽东 [6]：10—12。Stuart Schram 注意到毛始终把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放入革命阵营，将敌人估计为一小部分，并计算出“摇摆不定的人”只占总人口的极小部分。Schram 1989：38—39。

在代表谁的困惑就产生了。一些困惑总是存在的。承担代表职责的觉悟与被代表的“不自觉的”利益之间并没有什么结构性关联，有鉴于此，为社会成分指定政治代表者是一件难以应付的任务。共产党宣称拥有代表无产阶级和领导农民阶级的绝对权利，而将（代表）资产阶级（的任务）分派给了国民党。但其论辩未能说服国民党的工人活动家放弃自己组织劳工的权利，也未能使孙中山相信，330 当他与陈独秀一道饮茶时，资产阶级正在与工人进行对话。国民党人相信他们代表着作为一个整体的民族，而极不情愿接受别的任何说法。随着革命向前推进，迫切需要某个权威人士去编辑一份关于象征性对应关系的明确手册。

的确，国民党人、共产党人，以及其他党派运动的成员，都信奉经由正式授权的代表观念。共产主义群众运动坚持这样一条原则，即通过精英委员会和群众组织来实施授权式代表，它在为工人、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而组织的代表中得到了恰当的表述。这种正式的代表体系并不接受外部的验证，也不对科学社会主义之外它所宣称要代表的那些人负责。例如，某个工厂工人如果加入基督教青年会的妇女团体，从而挑战党对其利益的代表权的话，她就必然因自己的选择而发生背叛——或者是因为缺乏“阶级觉悟”（需要由教育来挽救），或者是因为她的反革命意图（需要由再教育来挽救）。在国民党方面，孙中山在其五权宪法和三段式宪政程序中对民主选举程序表示了应有的敬意。可是到了1920年代，他面临着一道无法克服的障碍。孙中山领导着一个渴望代表民族的政党，但他再也找不到哪个民族愿意仅仅被孙中山或者他的政党所代表。他断定，这个民族正处于沉睡之中。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孙中山将多数决定的原则运用于一项新的方案，以促使大众转而信仰国民党的主义。他不想让国民党在自由、公开的选举中承担被嘲弄的风险，而

选择了“唤醒”这个民族并确保“本党主义成为全国人民的普遍原则”，以获得在国民革命中的授权。如果国民党的意识形态最终变成普遍原则，中国人民就会承认该党有权代表他们。人民觉悟到他们已经被国民党所代表这一事实以后，正式的授权就会顺理成章地到来。^①当然，代表角色的行为和被代表事物的利益，二者之间存在着充分的协商余地，以达成某种一致。然而重要的是，双方之间应该有一种明确的关系。阐明这种关系，就是毛泽东就职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时的任务之一。由于事实上不会直接去咨询工人和民族，所以，由某个权威人士来断然决定谁代表谁，就非常重要了。

331 毛泽东用类似于阶级斗争的术语来编译政治斗争。正是在领导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期间，毛泽东尝试着进行了社会分析，今天撰写一些尖刻的文章来论述革命运动内部的政治分歧，明天又转向了对社会的阶级分析。实际上，这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毛泽东希望揭示潜在的社会分裂是如何与国民运动内部的政治破裂相重合的，从而强调需要清除革命运动中的敌对分子，通过他的研究，后者的利益似乎象征性地与他树为靶子的那些社会利益相互重叠。政治斗争被一种现实主义的简化过程所强化了，由此，政治行动者被简化为代表者，他们无意间代表着根植于社会的深层力量，社会斗争也被其政治衍生物强化到相同的程度。

为所指确定了符号之后，宣传者的下一个任务，便是让它们一一相互匹配。国民党人代表着这个沉睡的民族尚未意识到的民族利益，共产党则同时代表着下层社会阶级的利益，当时工人和农民还不得不承认，他们需要某个独特的政党来代表。在两种情形中，代

① 孙中山 [46]: 559, 563。孙中山的民主程序概念与在欧美产生和实践的程序很不相同。见 Nozawa 1971。

表性政党的宣传者都受命去改造大众，使之更贴近两种意识形态体系中分属于他们的角色，以使符号与所指相匹配。这样，群众代表就通过群众宣传和群众组织得以实现，群众宣传用来说明群众利益与代表它们的政党利益之间的密切联系，群众组织则将那些不承认其指定代表者的人排除在被代表群体之外。换句话说，宣传和组织都是代表性和规训性的程序。

国共两党都赞成自觉的先驱代表着不自觉的社会成分，这一模式是建立在群众代表——它分别出现于国共两党——基础之上的。它建立于当时的现实主义美学基础之上。这并不是要否定列宁的影响——通过共产国际——的重要性，也不是要一般地否定制度性政治的突出地位。代表、唤醒和制度性组织的要求，其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社会意识受到社会制度的制约，衡量其进步的标准，则是对政治斗争的有组织参与的增长。在反思自己对中国的“阶级意识”的初步认识时，戴季陶认为，其兴起标志是五四运动中通过“新式劳工组织”进行的群众动员，以及资本家对斗志昂扬的劳工的出现所进行的有组织反应。^①文学现实主义也起源于群众运动的兴起。著作家们试图通过文字性的表现来唤醒大众的意识，正如政治活动家试图渗透到劳资双方的组织性场所一样。这样，唤醒和代表特定社会集团的利益的斗争，就呈现为相互对抗的联盟、协会、政党、委员会，以及有组织的文学派别间的相互竞争。通过以他们的名义发起的争论，工人、农民和整个民族都在党的会议和文学刊物中得到了代表/表现；通过积极响应街头动员的号召，他们展现了与自己的代表者之间的亲密关系。这场代表大众的竞争中的获胜者，是那

332

① 引自 Dirlik 1989: 122。

些能够以最大的信念来发起争论、以最高的效率来动员群众的人。^① 1925年，正是在这里，在代表真实的竞争中，戴季陶和国民党人显露了摇摆的迹象。

代表真实

当现实主义的表现概念惬意地栖身于文学和艺术中的时候，它也在中国革命中找到了一个可靠的家。这不是共谋的结果。孙中山和陈独秀渴望唤醒大众，不是因为他们结交了上海的先锋文艺界，而是因为著作家和革命家都渴望代表/表现一个民族，它尚未意识到自己需要以艺术家和活动家所渴望的方式去被代表/表现。正如西奥多·哈特斯（Theodore Hutters）所注意到的，20世纪中国文学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与其说是一个指示另一个，毋宁说二者都认同一个关于代表/表现的权力的理想，即把想像世界变为现实”。现实主义的表现概念使它们自动地走到一起，以确保“两个领域之间一系列的永恒相遇和相互介入”。^②

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的文学背景。在起源、对政治的关注、对代表制的权力的无限信任方面，19世纪法国的现实主义运动，都预示了中国国民革命期间的文学、辩论和政治中所呈现的现实主义形式。达米安·格兰特（Damian Grant）以对这种场合非常敏感的修辞风格写道：“一群19世纪中期的法国艺术家，将（人类的）良知从浪漫主义的迷梦中激醒，使它觉悟到自己原来叫做现实主义。”通过鼓吹自己对“人民”、“真理”和“觉醒”

① 见 Taylor 1948: 33.

② Hutters 1991: 18.

的承诺，1848年的革命者宣告了现实主义黎明的到来。1855年，当画家古斯塔夫·库贝（Gustave Courbet）在其画展入口处挂出“Du Réalisme”（现实主义）这一字样时，他宣告自己是“整个革命的支持者，而且首先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也就是说，是全部真理的忠实朋友”。^①在艺术和革命中用来表达这些要求的语言，使浪漫主义的梦想和现实主义者的觉醒形成了鲜明对照，并使艺术家的忧郁与革命者的实践形成了对比。现实主义诞生于革命之中，而且拒绝被局限于艺术领域。

通过实践，现实主义者理解了与浪漫主义的孤独奋斗形成鲜明对比的群众行为。在欧洲，现实主义对浪漫主义的胜利，作为“团体对个人、群众对英雄的胜利”而受到称颂。^②通过宣扬其对自觉、真理、诚挚和行动的承诺，现实主义者从群众那里获得了自信，但在他们对普通民众的诚心抬举中，他们努力代表/表现的是一个远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的世界。他们相信，只有在艺术家的想像和革命政治中，才能获得真诚的群众真理。革命回报了这种恭维。恩格斯曾经宣称，他从巴尔扎克的小说中得到的对法国社会的了解，比从“这一时期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加起来”还要多。^③卡尔·马克思的著作中带有现实主义学派的某些典型痕迹。马克思对1848年革命的经典描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用一种修辞性的风格嘲弄了这个国家在代表一个社会主体（统治阶级）方面的失败，在狂乱的重复中，它折射了法国政治中词与物的异常脱节。在这个例子中，马克思对这个国家进行严厉控诉的目的，

① Grant 1970: 20—21.

② Émile de Vogüé (1886), 引自 Grant 1970: 32.

③ 引自 Petrey 1988b: 448—468.

不是要削弱代表的可能性（像现代主义者那样），而是要重申更为理想的政治代表形式的可能性，以反对政权作出的不正当的代表。^①

在中国，文学现实主义锻造了一种文学和政治风格，从而弥补了唯物史观的不足，这种风格恢复了文字的流动与历史运动——文学和政治上的代表/表现的衰败，似正在图谋对它进行歪曲——之间的直接关联。中国并不是它自己所梦想的那个中国。通过表现和实现这些梦想，现实主义者和唯物主义者承担了恢复这些关联的责任。现实主义文学对政治的一个重要贡献，就在于为激进的梦想提供了领地。当帝国这一古老的社会想像丧失其时，新文学带来了一个新世界的承诺，它超越了古典文学不曾想像过的那个无所不在的世界。^②

传统叙事的语言和形式传达出这样一种印象，即它们存在于这个世界，或者是它的延伸，而不是超越于它。当然，经典叙事的语言指向它自身以外的某种东西，它代表或表达着它们，但此处涉及的则是密切属于这个世界的东西，读者和文本自身即栖息于此。用安德鲁·普拉克斯（Andrew Plaks）的话来说：“中国〔传统〕寓言的每一个因子，由于孕育了它的存在主义的兴衰过程之故，都‘代表’或者‘分享’了一切存在的总和，仅仅在程度上而不是在实质上，它们是一种无形的存在。”^③相反，现实主义文学所描绘的是一

① 马克思的著作在 19 世纪中叶现实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已经为文学理论家们广泛争论。见 Mehlman 1977, Eagleton 1981, Petrey 1988a 和 1988b。我在这里的观点，也是对 Sandy Petrey 的挑战——向 Menlman 对《雾月十八日》所作解释发起的挑战——作出的结论。见 Petrey 1988b:468。

② Hutters 1991: 12.

③ Plaks 1976: 14. Theodore Hutters 让我注意到了 Plaks 关于五四现实主义讨论的观点的重要性。见 Hutters 1991。

个有待于实现的真实世界，它存在于现实世界之外。现实主义假定了一个缺席的本质，并且不愿在漫长的人生故事中叙述另一段插曲。在关于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的梦想中，它发现了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加真实的本质世界。

五四运动中涌现了许多别的创新，现实主义是其中一个适当的附属物。现实主义文学的读者，是与其书页间想像的民族一道扩张的：针对儿童的义务教育、针对成人的工地文化课程，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去阅读那些以疯狂的速度为他们准备的令人振奋的小册子。语言改良、识字教育和政治上的种种创新，共同驾驭着对代表/表现的力量的信念，使之发展为一场旨在提高大众识字率的全国性运动，和一场旨在政治启蒙的群众运动。每一项创新都以代表/表现真实性——它刚刚出现在地平线上——的名义实施，因为，这场运动是建立在否定语言与实际之间的关系这一基础上的。它断言，艺术家和革命者肩负的职责，就是代表/表现一种尚未在历史中实现的社会真实。^①哈特斯评论说：“后五四时代的中国给人最明显的印象，恰恰是新文化运动对于文学表现这类奢望的关注程度。换句话说，就是在字面上缺席的某些东西能够呈现于读者面前，并且能够通过延伸，呈现于尽可能多的读者共同体——也就是社会面前。”^②与这些奢望相伴的，是同样奢侈的期待，即唤醒人们并使之意识到这个缺席的世界，它就会变成现实——也即，这个世界一旦被唤醒，就再也不会“缺席”。

中国的现实主义者渴望将他们对表现的信念扩展到社会和政治行动领域，由此让事物与词语相一致。巴黎已经前进了，欧洲的现

① Petrey 1988a: 第二章。

② Hutters 1991: 12.

现实主义连同曾经激发它的革命热情一起倒下了。但是，当中国的作家们在1920年代发现现实主义时，他们并没有为欧洲现代主义面临的“表现的危机”而苦恼。在1920年代中期的大众革命的推动下，现实主义者的表现概念用一种强迫的力量冲击着中国政治——同样的力量在1848年唤醒了巴黎。这不是表现的危机，而是错误表现的危机。在中国，现实主义者摆脱了一切对现代主义的消极怀疑，热情地拥抱所有“现代”的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对未来的梦想，他们就能够迎接一个比自己所处的不和谐世界更加真实的世界。在同时遭遇了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后，中国的艺术家和革命者一道发现了表现性的大众艺术形式，和代表制的群众政治规则。用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的话来说，他们遇到了“共同的深层次文化假设”，它同时巩固了“代表”（representation）一词在现代欧洲的文学和政治用法。^①

335 表现/代表一词的政治和文学意义的汇合，其初期标志是政治冲突和文学论争都使用了共同的词汇。这就是说，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学论争中存在着自己的对应物。浪漫主义的姿态已经影响到了一种俯瞰民族的视角。这既是一种文学姿态，也是一种文字上的姿态：许多人听到了山顶的召唤，在那里找到了自己写作的灵感。^② 对于更加无所畏惧的浪漫主义者来说，从窗口俯视正在各行其是的过往人群或者正在课桌上酣睡的学生们，如果他们尚未觉醒的话，便写下中国将要面临的命运，这就足够了。国家的疆界受到威胁，主权被损

① Williams 1983, 269.

② 康有为最初的顿悟发生在广州附近的西樵山上，他在那里发现了自己拯救世界的召唤。1888年游览北京时，他在周围的山脉中找到了拯救自己的灵感。康有为1967, 45.

害，社会四处混乱。似乎没有人知道这些，更没有人不在乎。对于那些知道的人而言，其觉醒的意识赋予了他们权力和责任：将自己的先见之明告诉众人的权力，确保民族在他们的教导下觉醒过来的责任。

国民党的宣传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学创新，都持浪漫主义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这应该归功于国民党早先对这场运动的成功政治化。从1919年到1922年，国民党的刊物《觉悟》每天都刊载根据严肃观察家的看法撰写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评论，同时刊登诗歌和小故事。这也是孙中山的视点。到他去世的时候，孙中山感觉到，他那关于中国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的可怕知识，以及关于中国将变成什么样子的奇妙观点，都使他和国人隔离开来。他真诚地相信，中华民族注定会“梦死”，除非它能觉悟到他的观点；只有当它觉醒过来的时候，他才能与自己的民族和解。

1925年3月，孙中山在未能（与自己的民族）和解的情况下去世。一位同时代人回忆说：“从实际成就来看，孙中山在这一时期收获甚少。他的努力大多失败了。但他牢固坚持着自己那伟大的革命精神和观点。”^①他的去世提醒人们，梦想与分裂的中国这一现实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但孙中山早就以其个人榜样表明，艰难险峻的现实永远不应刺破美好的梦想。当这种浪漫主义的姿态仍在流行的时候，孙中山和戴季陶可以有理由期待，他们的权威能够博得尊敬——就算它并不总是能够得到服从。但是，它并没有流行多久。“浪漫曾经是一个很好的词语，”1928年朱自清回忆道，“现在它的意思已经简化为诽谤和诅咒了。”^②现在，孙中山的失败开始对他不利

① Kuo 1956: 18.

② 引自 L. Lee 1973: 273。

了，戴季陶也被其对手称为浪漫的梦想家，只会不断地抛出“空想”。我们注意到，陈独秀可以自由地公开谈论戴季陶只愿意私下承认的事情，因为到1925年，公众的心态更加偏爱现实主义者而不是浪漫主义者，偏爱事实胜过了梦想。^①

336 这种判断对孙中山及其政党非常不公平。孙中山当然是一个梦想家，但他是在做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时代去梦想的。只是在实现梦想的角逐中，当某些梦想显得比另一些梦想更加成功之时，“梦想家”和“浪漫”才会变成侮辱性的术语。如果我们追寻“浪漫”一词的真实内容，就会发现，它是随着历史经验的方向和政治争论的过程而变化的。对共产主义者而言，如果没有将社会斗争考虑在内，对政治行为的任何批评都容易成为浪漫主义的错觉。孙中山和戴季陶被视为浪漫主义者，因为他们不承认政治和社会斗争之间存在任何联系。在将物质利益与社会成分联系起来这一意义上，唯物主义者被认为是现实主义者。但如果他们（在其间）建立了错误的联系，即使唯物主义者也将被视为浪漫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经常相互（为对方）打上“现实主义者”或“浪漫主义者”的标签，其依据则是他们在哪个阶级支持或反对革命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1923年4月，陈独秀将所有不赞同自己的人打上了“浪漫主义者”的标签，但到了1925年，他对军阀势力的社会基础的估计，使他自己也被公开指责为一个不值得指望的浪漫主义者。^②

转折点来自1925年。在五卅运动以前，就存在着唯物史观及其对社会革命的号召的奇妙氛围。当然也有例外。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观察到，政治哲学家李大钊在1920年发现唯物史观时

① 陈独秀 1925a。

② 陈独秀 1923c。

“逐渐变得诗化”了。但直到1925年5月，唯物史观才引起诗人们的兴趣。^①“五四运动激发了青年和个人的个性觉醒”，陶希圣这样回忆他在1919年的经历。直到1925年，群众政治才最终

从幻想领域进入实际领域。劳工问题是社会和政治之间的纽带，五卅运动则是其中的关键。五卅事件……将青年和知识分子的觉醒引向了城市劳苦大众的觉醒。^②

作家们如果再也不想被视为浪漫主义者，就必须掌握表达风格，以及适合于“城市劳苦大众的觉醒”的研究、揭露和实践技巧。

在关于中国小说的基础性著作《现实主义的限度》一书中，马斯顿·安德森已经展示了大众是如何变成散漫状态的。1920年代，文学中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之争，最初是“一场代词的战斗，……是浪漫主义者的‘我/我们’和现实主义者的‘他/他们’之间的竞争”。^③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运动，也是从第一人称代词转变为文学和文字意义上的大众的过程。就像李大钊一度变得诗化一样，诗人们现在开始变得政治化了。小说家转而以“真实生活”作为自己笔下的故事的基础，评论家再次阅读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试图揭示出娜拉被囚与解放的更深层社会意义。群众政治变成了时髦的文学主题。政治革命的吸引力开始赶上了茅盾《蚀》三部曲和巴金《爱情》三部曲中性的吸引力。^④1925年的五卅运动进入了小说当中，作为一种文学工具，将男女主角们从浪漫主义的满足感中惊醒。在叶绍钧那篇为人称道的小说《倪焕之》中，主人公

337

① Dirlik 1978: 25, 39; L. Lee 1973: 247—253.

② 陶希圣 1964: 123—124。改编自 Dirlik 1978: 47。

③ M. Anderson 1990: 26.

④ 巴金 1931—1935。亦见巴金 1929。

在五卅事件之后抛弃了沉思式的生活，为政治鼓动而从事教育。即使未被直接引用，五卅运动也在不知名的大众场合被援引，到处留下了自己的痕迹，包括文学上的流血、恐怖和贫困，以及社会层面的“更深刻”矛盾的其他表面影响。

政治和文学中的代表/表现，围绕如下理念汇合到一起，即揭示出压迫的神秘根源和社会内部的社会意识。现实主义者接近了一个实际世界，它仿佛只是隐藏在表层现象之下的更深层力量的外在表现，他们适时地掀开了这些表象，以揭示出启迪人民的革命的可能性。（文学和论争中）的通行方法，与列宁推荐给政治活动家们——他们试图将“觉悟”灌输给大众——的方法没有什么两样：要教育工人“辨别每个阶级和每个阶层用来掩饰它自私的企图和真正的‘心意’的流行词句和种种诡辩，应当善于辨别哪些制度和法律反映和怎样反映哪些人的利益”。^①中国的小说家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来想像自己的责任。“现实主义分析一切社会问题，”小说家茅盾在离开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后不久评论说，“并竭尽全力去揭露其更黑暗的方面。”^②表面和深层的比喻，也适用于著作家和行动家。与列宁式的科学社会主义者一样，国民党人也很少仅仅代表他们自己发言。探究真理，全面理解那些塑造了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力量，这样的一场竞争同时也是另一种角逐，作者们在其中竞相代表那些不幸的牺牲品——他们所认同的力量的牺牲品。作者和理论家都是故事的一部分。正确认识压迫的根源，意味着对真实的觉悟，而这种觉悟则使他们有权去代表真实的东西。

觉醒过来的作者享有特权，这一姿态绝不只是关于自我与共同

① 列宁 [1902] 1988: 135。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② M. Anderson 1990: 42.

体的中国作品中所特有。这是欧洲哲学的持续特征，从苏格拉底 (Socrates) 一直延伸到海德格尔 (Heidegger)。然而在欧洲哲学中，知识产品和政治形式中的专制主义含义这一理念，早就受到了挑战。^① 几乎没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在国民革命时期的中国，对于觉醒过来的“知者”的特权姿态，也存在着类似的批评性评价。也许这仅仅预示着一种更普遍的失败，即新文化思想中未能对政治权威的本质进行批评性的反思。萧凤霞 (Helen Siu) 观察到，新文化运动中的爱国主义要素，妨碍了对“国家专制主义设想进行更深刻的考察”，后者内在于这场运动之中；她并且指出，之所以未能揭示这些专制主义设想，是因为那些“充斥人的心灵、僵化人的精神”的文化期待。^② 对于这种解释，我们也许能够添加一些东西，即文学作品中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姿态所体现的专制主义设想。两者当中，觉醒这一比喻的功能，都是将作者作为一个觉醒的、全知的、与大众疏离的观察者，凌驾于沉睡的民族之上；并迫使作者通过写作、演讲和唤醒民族等行动，去弥合这一姿态造成的裂痕。

338

现实主义与实践

区分浪漫主义者与现实主义者的界线，是由“实践”维度所决定的。实践不单意味着行动或者参与公共事务，也不应将现实主义误解为勉强接受事物的实际存在状况。实践意味着参与现实世界并

① 见 Stanley 1982。Bruehl 1982: 302—305, 322—324 注意到了 Hannah Arendt 对哲学家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批评。

② H. Siu 1990: 10.

努力去改造它，现实主义则是一门艺术，它揭示着那些支持或者反对这种改造的力量。因此，通过衡量革命理想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达到良好的效果，实践有助于区分现实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这是一种列宁主义的检验方式。现实主义者领会了社会冲突的内在机制，并通过行动去解决这一冲突。另一方面，浪漫主义者则注定会失败，因为他们未能理解那些支配着行动的规则。他们是无谓的行动家。

现实主义者的特征在于实际效果，而不是对事实的忠诚。诗人和散文家朱自清用如下观察来结束他关于浪漫主义已经变成一种“诽谤和诅咒”的评论：“‘浪漫主义’将人的热情释放到了极限，因而自我膨胀。但现在需要工作，缺乏纪律的热情，并不能产生实际效果。”^①马斯顿·安德森注意到，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现实主义从未涉及“用语言捕捉真实世界的简单愿望”。这是留给经验科学的，无论何时，只要它以文学的面貌出现，就会被猛烈斥责为“自然主义”。^②现实主义指向是实际的梦想，浪漫主义则指向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尽管都是在描绘情感，但现实主义要驯服情感并使之发挥“实际效果”。至少存在一些术语，使得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在修辞上的对抗，可以由此进入国民革命的论争中。

现实主义仍然要求唤醒人民。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比，是由早期革命思想中“空言”与“实行”之间的区别发展而来的。在这里，唤醒的主题将理论与实践连在一起，其中的假设是：如果唤醒其他人认识到理论的现实性，理论就会变成现实。早在1896年，谭嗣同就开始沿着这些思路为“空言”辩护：

① 引自 L. Lee 1973: 273。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朱自清这些话写于1928年。

② M. Anderson 1990: 37.

凡教主教徒，皆以空言垂世，而不克及身行之，且为后世诟訾戮辱而不顾也。……此其亡躯命，以先知觉后知，以先觉觉后觉。^①

从世纪之交开始，革命思想家转而反对“那些将革命视为‘空言’的诽谤者”。紧接着谭嗣同之后的第一道防线这样辩论说，只要能够导向民众的觉醒，言论的传播也是一种实际行动。吴稚晖为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和手段进行辩护，他对那些抱怨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教育哲学不切实际的人进行了有力的谴责。“无政府主义的空言越来越流行，”他写道，“恰如建立无数的学校，既培养公德心，也滋养着革命。”与此相似，李石曾也认为宣传是一种实践形式。1914年，在为无政府主义理想进行勇敢的辩护之后，刘师复重申了这一结论：“认为无政府主义是空想、不可能，这是错误的。”^② 1925年以前，无政府主义者早就希望自己被当做现实主义者，他们从如下信念中得到了慰藉，即通过唤醒中国人民认识到他们所赞成的真理，他们将能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耐心地将大众从昏迷中唤醒，是现实主义者的任务，宣传则是实行家的标记。

空言与实行之间的这种初期区别，在1920年代发生了辩证的转折。^③ 孙中山不满于终身做一个梦想家，其追随者也希望自己能够作为有效的行动家而被人们记住。^④ 然而当事与愿违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彻底灰心。对孙中山来说，表象世界只不过是一层稀薄的表

① 谭嗣同 1984：218。

② Zarrow 1990：119，121，124，214。

③ 中国人对黑格尔思想的认识及中国哲学内部的反响，尤其是关于否定和辩证法原理，见冯友兰 1966：278；Wakeman 1973：185—186，286—287。中国也引起了黑格尔的兴趣。见 Spence 1990：132—136。

④ 见汪精卫 1926a。

皮，它覆盖在一个更重要的世界之上，后者正期待着自身的觉醒和自我发现。讽刺者断言，他对“令人不快的事实”缺乏耐心，但他总是安慰自己，无论它们如何令人不快，事实仍然只是事实。^①当现实世界觉悟到他所支持的观念时，它就可以被改造。

340 换句话说，在物质的意义上，观念是重要的。在其最重要的一句哲学论断“行易知难”中，当孙中山试图将思想和行动联系起来时，他在二者之间确立了一种黑格尔式的联系。^②在这里，商代武丁时期流传下来的一句名言“知之非难，行之为难”，被他颠倒了过来。孙中山感到，只要这句名言固守其通常的意义，它就会鼓励现代民族的无知、宿命论和懒惰。他想将它根除掉。

黑格尔的辩证法起因于类似的尝试——从哲学上解决政治中呈现的一系列普遍和特殊、统一和分裂之间的矛盾。黑格尔明确希望用一种普遍的语言，把德国当时的政治分裂概念化。用赫尔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的话来说：“根据黑格尔所言，激励着哲学的普遍矛盾，具体存在于德意志各邦、各阶层之间以及它们中的一分子与帝国之间的对抗和分裂当中。”^③在中国的国家分裂当中，中国的民族主义者面对着类似的情境。他们追求统一场式的理论，它或许能解决哲学、艺术、文学、科学、人种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各个领域中的矛盾，这种企图源于在政治混乱——它类似于激励了黑格尔的德国政治混乱——中寻求历史和语义秩序的渴望。探讨中、德两国之间散漫的一致，其共同出发点暗示着一个共同的

① 参见 Bland 1932: 178, Cantlie and Jones n. d.: 前言。

② 孙中山 [36]: 457—463。翻译过来的摘要，见孙中山 [27]。Joseph Fewsmith 是首先注意到这句模糊格言的重要性的晚近历史学家之一。Fewsmith 1985: 96—97。

③ Marcuse 1960: 50. Marcuse 的历史读物受到了另一些人的挑战，他们想像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是从康德的哲学中“内在地”产生的。见 Ritter 1982: 7。

目的地：统一的意义体系将通过建立统一的国家体系而现身。无论如何，统一的哲学体系（对观念的觉悟）与统一的国家（民族的觉醒）之间的修辞性关联，承认了政治不仅在国家制度，而且在思想和艺术领域的有效统一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解决观念领域的冲突，是民族国家的社会与政治重新整合的主要部分。

孙中山声称行易于知，其意图可以从两个相关的设想中获悉。在解释其异于通常的观点时，孙中山指责了那些以太过“空幻”为借口而抛弃了辛亥革命纲领的民国政治家。他断定，如果他们表现得更加勇敢，中国就不会陷入目前的危机状态。^① 他们的鲁莽并不是孙中山想要纠正的惟一错误。其次，他还想让知识超越陈腐的事实领域，确认它与行动之间的内在关系。在这句格言的第二部分——“知难”——中，孙中山表达了对梦想家的支持，表明梦想是行动的一个完整部分。他试图将他所说的“理想家”从疑虑者和怀疑论者的蔑视中营救出来。理想家的知识不是从经验观察中获得的341 东西，而是一件稀有而珍贵的礼物，是通过对历史进程的本质的先见之明而得来的。像黑格尔一样，孙中山的矛头直指自由主义经验论的满足感，他将自己的哲学贯彻于一种非自由主义的政治当中。认识到这种挑战的所指之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以自己的方式发动了回击。“坦率地说，”胡适抱怨道，“这是梦话。”然而这是一个带齿的梦。1929年9月30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向国民政府委员会递交了一封意见书，认为胡适应该“受到适当的惩罚”，因为他对孙中山那含糊的梦想的评论显得不敬。^②

在论证其双重格言时，孙中山用两种重要而又独特的方式，将

① 孙中山 [37]: 458, 463—474。

② Grieder 1970: 124; 胡适 [1931] 1969; T'ang Leang-li [1931] 1969: vii。

思想、行动与政治领导权联系起来。首先，他复活了开明精英统治的传统原理，这些精英必须掌握科学和民主的原则，后者在共和制民主中确立着统治者的合法性。不过，智者仍然是领导，无知者只能跟随。其次，他在知与行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它只能通过时间来显现，或者用黑格尔式的术语来说，在历史中显现出来。有知的少数人——孙中山将自己归入其间——不是指有知识的人，而是那些“先知先觉”者，他们在事物真正实现之前就知道什么是真实的。理想家的梦想包含着真理，后者必须通过行动来展现自己。换句话说，先知就是将在实践中被实现的知识。

孙中山的格言，为他在国民党党治国家中将之制度化了的那种领导权提供了有力的辩护。孙中山将中国人分成三类，对此，中央宣传部秘书周佛海于1925年提供了一种简单而无可争议的解释。首先是“先觉者”或者真理的“发明者”，他们由于自己的发明而领导众人。这就是孙中山本人。“后觉者”是他手下那些“宣传者”。第三类“无觉者”则是“实行者”，他们遵命行事，即使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要那样做。^① 孙中山是先知，他领导的政党传播这些知识，沉睡的大众则据此行动，并在行动中使其知识中的真理得到实现。^② 领导者的先知中包含着的真理，终将在对其追随者的群众动员中得到辩证的体现。

孙中山关注思想与行动的关系，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毛泽东很早就关注着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但是，《实践论》的副标题，仍然遵从了孙中山曾经论述过的本土传统。这个副标题是：“论知识与实践、知

① 周佛海 1925a。

② 孙中山 [36]：460—463，Fewsmith 1985：97。

与行的关系”。在个人意义上，他们两人是从不同目标着手这个问题的。辛亥革命之后10年中，人们普遍认为孙中山是一个大嗓门的演说家，而不是实际的领袖，“孙大炮”这一绰号体现了这种流行的偏见。他反感这样的论断：“一些党员说，‘某某人是思想家！’‘某某人是行动家！’他们犯了多大的错误……我们对实行家的尊敬，超过了思想家和发明家。”^①孙中山自我安慰说，从在实践中实现其先知的程度上说，思想家也是实行家。^②另一方面，在毛泽东开始成长为思想家的同时，他也迅速获得了非理论的实用主义者的声望。他们两人以如下观点作为回应：理论和实践将融合在同一种革命方案中，因此，理论和实践都无法像批评者暗示的那样完全分割开来。

在哲学上，孙中山和毛泽东也都为相似的目的而努力。孙中山的“先知”概念，与毛泽东的知识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一主张相去不远。“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毛泽东在1937年评论道，“只有在社会实践过程中，人们达到了思想中所预期的结果时，人们的知识才被证实了。”^③孙中山和毛泽东都坚持认为，不能仅仅通过预言什么是真实来获得知识，而必须介入历史以确保它将变成真实。通过按照自己的主张来改造世界，先知者的努力确认了最初的假设。^④“你要有知识，”毛泽东坦率地说，“你就得参加变革现实的实践。”^⑤

毛泽东的实践概念，也与孙中山“行”的概念相距不远。对孙中山来说，行意味着以机械的方式将预定计划付诸实施。在描述政

① 引自胡适 [1931] 1969: 52—53。

② 孙中山 [31]。

③ 毛泽东 [10]: 295—309，尤其是300。

④ 孙中山 [36]。

⑤ 毛泽东 [10]: 296。

治实践中的知行关系时，他偏爱的比喻通常包括机械师、司机和工程师，往往提到他们通过运用专业训练和灵敏的技巧而达到特定目标。“国家是一辆大汽车，”孙中山在1924年3月解释说，“政府中的官吏就是一些大车夫。”在当年4月的一次演讲中，他将其机械模型延伸到治权问题：“何为治权？管理机器的工程师拥有治权。”因此，实现政府的治权目标（“这艘大轮船前进或后退，向左或向右转”），就依赖于“一个很好的工程师的驾驶”。^①简言之，“行”意味着在技术上实现“知”所指定的目标。

韦纳·梅斯纳（Werner Meissner）的说法有一定的合理性，即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实践”一词，也应该被翻译为“实现某个目标的方法”。^②毛泽东的实践概念，也许比这种译法所暗示的更多一些实验色彩，但它确实是与目标、计划和策略相连的。这种联系在《实践论》的某个段落中表达得最明显，这段话呼应了孙中山将
343 工程师视为实践的主人的提法。孙中山设想工程师们根据其蓝图，按照其“知识”去“行动”。毛泽东的想法略有不同。尽管他承认“工程计划的实现”是理论与实践关系的一个很好例证，但毛泽东声称，工程师在建设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改变其蓝图，以便为“实践过程中没有预见到的情形”留下余地。^③毛泽东设想的实践者，是一个具有某种灵活性的工程师，或者是一个具有某种适应性的司机，准备在工作中去学习。

承认灵活性和训练的需要，这是毛泽东和孙中山之间的关键区别。也即，毛泽东与孙中山的差别，更多的是在教学法上，而不是

① 孙中山 [31]: 314, 332, 342, 及第六章各处。

② Meissner 1990: 92.

③ 毛泽东 [10]: 305—306。

在认识论上。对孙中山而言，国民党的干部（政治实践的“工程师”）几乎不能从他们对政治社会的改造（工程计划）中学到什么。相反，对毛泽东来说，实践总是意味着某种教学法的成分。对于领袖，它意味着从经验中学习；对于中间的管理者，它意味着干部训练；而对于群众，它意味着提高觉悟或者“觉醒”。对于领袖、干部和群众来说，实践提供了一种关于有组织的阶级斗争的变革能力的基本知识，只有群众运动的直接经验能够提供这种知识。

在承认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是黑格尔主义者的前提下，可以认为他们一个是唯心主义者，另一个是唯物主义者——可以说，毛泽东站在孙中山的肩膀上。但如果用其教学法中的术语来说，毛泽东是一名孙中山所未能比拟的现实主义者，这更有意义。毛泽东相信，唤醒人民意味着剥去层层表象，揭示基本的社会真理，它们无时无刻不被某些社会部门的有意歪曲所掩盖。只有阶级斗争才能揭示这些真理。^①这种阶级斗争，在其政治和文学代表/表现的层面，也就是说，在党内以及坚持表达其观点——这些观点削弱了觉悟派去探寻真实和领导革命的主张——的记者、作家中间，总是最为紧张、最为激烈。库尔贝（Corbet）和左拉（Zola）、茅盾和郭沫若是现实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也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而这种意义使孙中山成了一个浪漫主义者。

毛泽东强调社会实践和政治效果，这使他与当时的现实主义作家之间的共同点，超过了与国民党内的“唯心主义”同志之间的共同点。到1920年代中期，对实践的信念不再像世纪之初那样，能够用来区分革命者和文人。现在，实践同样有助于区分革命家和著作

① Wakeman 1973: 68—73 注意到了“错误意识”对毛泽东式实践导向型马克思主义者的吸引力。

344 家之间的现实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写作与行动之间的界线崩溃了：当严肃小说的作者们开始炫耀其现实主义时，革命者也开始为其政治对手打上浪漫主义者的标签。历史学家也加入了这场喧闹。从1925年起，新史学开始将其关注点从个体转向群众，同时开始关注实践问题。一些年轻的历史学家以其文学界的同事为榜样，一度离开书桌走上大街。曾经长期坚持学术独立于政治的顾颉刚，最终在上海参加了1925年5月30日的群众运动，在那里，他利用自己在通俗歌谣方面的杰出知识，创作了反帝歌曲来教育民众。在选择宣传家的生活之时，顾颉刚拒绝了浪漫主义式的疏离，而倾向于与群众的真实生活相结合。^①

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者再也不能够与大众相结合，即便他们希望如此。现在，浪漫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被认为（无意中）代表着种种深层势力，它们企图使民众停留在沉睡状态。现实主义的典范具有无所不在的威力。尽管浪漫主义者试图走上街头或者组织群众抗议，他们已经不可能代表大众，因为他们像列宁所说的“不自觉”分子一样，看不见自己的局限性，因而只能作为反革命的社会势力的代表行事。事实上，他们自己就构成了反革命势力的一部分：浪漫主义政治活动家的行动过程，与科学社会主义所预言的反革命社会阶级的行为之间存在着象征性的对应关系，这使所有人都成了反革命分子——除了现实主义者之外。所以，一位现实主义批评家这样批评农民运动中的“浪漫的”革命者：

这样的人，他自命为社会运动家，其实他自己已经变成了

① Schneider 1971: 281. 前文已经讨论了这一时期历史学者从浪漫主义到现实主义的转变。相似的模式可以在1920年代后期社会学和社会理论的进化中发现。见 Dirlik 1978。

新的劣绅土豪，他决不能为贫农谋任何利益……（做民团）运动的人，必须努力刷去他自己的浪漫的英雄思想。

如果浪漫主义者可以经由象征性联系“变成新的劣绅”，现实主义革命家也能相应地变成他们正代表其利益的农民或工人。事实上，他们甚至比真正的农民更像农民，因为他们已经对支配社会生活的神秘力量“经受了真正的自我觉醒”，而农民还须通过党的教育过程才能经历这种觉醒。无论是地方显贵还是农民中的长者，都无需考虑绅士和农民到底是什么。更为重要的是确定革命者中谁是现实主义者，谁是浪漫主义者，从而以可能实现预定效果的方式，找出词与物之间的象征性对应关系。^①

这种代表制政治的一个切实有效的措施，就是群众动员。动员民众的能力适时地变成了一种广为接受的检验方式，用以区分唯物主义者与唯心主义者、现实主义者与浪漫主义者。在这一点上，共产党人远比国民党人成功。在广东和湖南，共产党的农民组织者已开始发展了初步的“群众路线”，它使党的宣传和鼓动定位于群众组织和动员之上。 345

在佃农和小土地所有者之间工作了几年之后，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罗绮园注意到：个人、家庭，以及某些情况下整个村庄，都对地方事务感到非常苦恼，但（他们）却未能将自己的苦恼与社区以外的同样苦恼联系起来。到1925年，他已经相信，这种地方性的苦恼尽管存在着局限，但它们还是为试图在农民中培养阶级觉悟的革命宣传家们提供了有用的切入点。罗绮园声称：“宣传阶段必自群众

① 郑容 [1925] 1980: 238—239。到1925年，对地方民兵的“浪漫主义”支持者进行攻击的对象，就像陈独秀一样，很可能已经变成了无政府主义的战略家。见 Dirlik 1991: 239—240。

切身的问题起始。”农运干部受命去详细调查地方形势，聚焦于地方性的苦恼，并阐明解决它们的系统方案，以使农民支持他们。“由农村的调查，亦可以知道农村的困难和农民的需要。因而我们对之宣传要如何才可以供给他们自己的需要，解决他们自己的困难，即可以和他们接近。”罗绮园的方案中最后一步，是让农运干部指出，农民问题只有通过与革命运动的领导者合作，才能得到解决。^①在实际的革命工作中，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毕业生动员农民参加农民协会，响应党的指示，从而将地方性的苦恼与革命目标很好地结合起来。^②

罗绮园的策略包含了群众路线的许多初步要素，这在稍后的革命阶段中变得重要了：决心以地方上的苦恼和被表达的愿望的形式，去研究和揭示“群众的观念”；断言农民的苦恼意识与革命意识的阶级“需要”之间有着潜在差别；确认革命干部在通过群众宣传和群众组织将地方性苦恼转化为更高级的阶级意识（化“愿望”为“需要”）方面的作用。^③在毛泽东后来的阐述中，被感知的愿望与实际需要之间的差别，被进一步削弱到这样的程度：需要和愿望都是党的思想的不同方面。“在做群众工作时，”毛泽东在1944年建议，“我们必须从他们的需要而不是我们的愿望出发。”但是有差别的，因为“他们的需要”并不容易与“我们的愿望”区别开来：

有许多时候，群众在客观上虽然有了某种改革的需要，但

① 罗绮园 1926b：21—28，尤其是 26—27。

② “农所” 1926：21，罗绮园 1926a，周其鉴 1926：1—11，陈公博 1926b：59—60，Hofheinz 1977：21，93。

③ 注意毛泽东对“群众路线”的经典阐述。毛泽东 [11]：316—317。

在他们的主观上还没有这种觉悟，群众还没有决心，还不愿实行改革，我们就要耐心地等待；直到经过我们的工作，群众的多数有了觉悟，有了决心，自愿实行改革，才去实行这种改革。

毛泽东的建议是相当明智的。党领导的运动，由其自身意愿动员起来要比不自愿更加可取，而缺乏“觉醒的”群众运动不可能是自愿的。群众觉醒是对有效行为的合理规定：“我们绝不能通过强制命令推行。除非群众觉醒和自愿，所有需要他们参与的工作都将被证明是空洞的程序，并会以失败而告终。”^①这里强调的又是实际效果。毛泽东含蓄地吸收了罗绮园和国民革命中农运活动家们的经验：罗绮园和毛泽东一样认为，停留在未开化状态的农民意识，其价值只能通过它在策略上的效用来衡量——首先是作为进入地方社会的切入点，接着是作为培养阶级觉悟的出发点，最后是确保农民服从他们自己的再教育和动员。但在如下方面，毛泽东仍然利用了国民革命的训导型政治留下的更广泛遗产：他宣称群众一旦被“唤醒”，最终将有可能热烈欢迎（党所定义的）需要和愿望。

通过深入的地方性研究，理论与实践联系起来了。研究地方形势，意味着研究“真正的”分裂——它们被认为隐藏在地方社会的表象之下——以考虑如何使它们变得有利于有组织的群众运动。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实习期间，毛泽东就开始将划分社会内部的不同阶层、识别它们之间的分裂，视为自己最迫切的任务，并开始这样设想，唤醒人民意识到其苦难的真正根源，将是中国民族革命取得胜利的关键。他想与他打算去唤醒的人民分享自己对社会潜在力量的洞察，并进而通过唤醒他们来重塑社会。^②

①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毛泽东 [7]：318。

② Schram 1984：31—32。

唤醒阶级和民族

347 现实主义者对隐藏的社会分裂的强调，通过引入阶级斗争这一概念，适时地将民族主义者的追求转变为民族主义思想本身。在这里，问题的焦点不是 20 世纪初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存在，甚至也不是阶级分析在社会革命中的突出地位。毋宁说它是阶级概念在国家导向型的民族觉醒政治中扎根的方式。世纪之交前后，阶级首先和所有现代的、世界性的东西一道进入了激进活动家的语汇。无政府主义者时常谈论社会各阶级之间的革命，他们一点也不关心国家的重新统一，只对实现民族“富强”怀有些许兴趣。^①在早期的革命思想中，需要得到最明确的阐述和最精密的证明的，是民族这一伦理共同体而非社会阶级。

世纪之交前后，人们设想社会阶级存在于事物的自然秩序中，民族则似乎是一种无理性的人工发明，它诞生于国际性的国家体系当中。它们是西方道路的奇怪的副产品，这条道路组织着这个世界。“如今，在此浩瀚之宇宙，地球实为沧海一粟，”国民党人章炳麟写道，“然而今日，吾等居于其上者，已将之划分畛域，保护己域，称之为‘民族’。然后建立制度，自分阶级，称之为‘政府’。”^②民族不过是组织民众事务的一个功能性范畴，没有别的解释。由于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原因，民族主义和列宁主义在 1920 年代汇合到一起了。许多社会主义者转而认同于阶级斗争，一些民族主义者也承认了社会斗争的不可避免性。随着阶级斗争被引入民族主

① Bernal 1976, Zarrow 1990, Chan and Dirlik 1992, Dirlik 1991.

② 引自 Zarrow 1990: 51—52。

义思想并被广泛接受，这种发展（势头）在国民革命中达到了顶点。

如果夸大马列主义在早期民族主义者中的吸引力，我们就会轻易错过国民革命的要点之所在。在民族主义思想内部，人们起初极不情愿接受阶级分裂或阶级斗争的观念。确实，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理论家，都没有什么理由去放弃统一的民族这一现代理想，或者抛弃社会和谐这一古老的儒家理想，除非这两种理想在民族主义思想内部都变得站不住脚。当接受阶级斗争的障碍消除之后，马列主义只能成为民族主义思想内部一个似乎可能的选择。

这些障碍的消除发生在革命的三个早期阶段。最初，人们认为阶级斗争与民族之间——尤其是更加富强的国家与它们想要纳入自己殖民帝国的地区之间——的斗争相似。在这个阶段，中国被想像为一个与国际资本主义作斗争的单一阶级，也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民族。但是，大约从1922年起，针对国内的“封建”军事势力的斗争，开始被视为一种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式。反封建斗争是为了加速民族生产方式的历史进化。最后，从1925年到整个内战期间，社会上某些强有力而又组织良好的群体不愿遵循革命者的指示，这使他们被挑选出来，成为以民族自身的名义发起的阶级斗争的对象。在这个阶段，鼓吹对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进行阶级斗争，还具有更深刻的作用，即摧毁任何可能对扩展中的党治国家形成有效的地方性抵抗的社会结构。 348

党治国家这一制度，对于后两个阶段的发展至关重要。共产党和国民党都认为自己代表着人民，直到他们觉悟到要实现其自己的统一为止。那些对帝国主义的影响反应冷淡，或者不关心军阀统治下的政治分裂的人，其行为中就暴露出了他们的反革命身份。阶级斗争的概念，于是不再成为民族主义思想中令人不快的选择，相

反，它成了一种合乎人意的需要。它开始显得不可避免。^① 如果人民自身在谁应该统治他们，以及他们应该如何被统治这些根本问题上发生分歧，那么，他们当中只有一些人值得纳入国民的范畴。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斗争的强调，提供了一条合理的原则，以把那些不能为国家（按照希望中的效果）所代表的阶级利益排除在民族之外。

然而，阶级斗争在革命中的出现，并不表明它违背了民族主义，也没有将革命转化为一种社会主义事业。与阶级斗争相关的论争，发生在民族主义思想内部，它检验着在民族构成问题上达成的共识的有限性，推动了民族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大决裂：是继续承认孙中山将民族视为种族的观点，还是转而将民族视为社会各阶级的集合。问题的焦点是如何提炼民族性的自我，它应该为国家所代表，并被唤醒为一个群众共同体。

国共两党在中国革命中的分裂，最好不应描述为马列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而应该是两个阶段的民族主义之间的斗争。从意识形态上说，它是关于民族成员的资格问题的冲突，当时这个民族仍处于协商之中。从制度上讲，它是高度竞争——不仅相互间展开竞争，而且与对立的政治运动和社会团体展开竞争——的两个国家建设型政党之间的斗争。它也是不同梦想之间的冲突。当孙中山、陈炯明、戴季陶和毛泽东分别质问中国面临何种未来的时候，他们都确信，自己的答案将有助于唤醒人民。事实上，正是他们在梦想和唤醒方面的努力，决定着未来是什么样子。大众唤醒的政治，决定了何种梦想终将变成现实。

^① 1920年代广州鼓吹“阶级斗争”的标语和海报所宣告的，不是阶级斗争光荣，而是“阶级斗争不可避免”。见 Swisher 1977: 32。

参 考 文 献

巴金 1929,《灭亡》,上海。

——[1931] 1980,《狗》,见《巴金选集》,二卷本,第1卷,北京。

——1931—1935,《爱情》。分批出版的三部曲:《雾》1931;《雨》1933;《电》1935。上海。

——[1935] 1970,《觉醒与行动》,见《巴金文集》,十四卷本,第10卷,香港。

包遵彭 1964,《中国博物馆史》,台北。

《北京风俗图》,1986,北京。

《本党部党务报告》,1924,《中国国民党周刊》第9期。

《(黄埔特别支部)本党部东征日记摘要》,1925,《革命军》第6/7期。

《(中央农民部)本部工作报告》,1926,《中国农民》第9期。

《(农民部)本部特派员大会之决议案》1926,《中国农民》第1期。

《本部通信》,上海。

《本志启事一》,1920,《民觉》第1卷第1期。

冰心 1982,《冰心全集》,5册,北京。

蔡和森

——1922a,《时事短评》,《向导》第7期。

——1922b,《孙吴可在一种什么基础上联合呢?》,《向导》第4期。

——1922c,《统一,借债与国民党》,《向导》第1期。

——1922d,《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向导》第2期。

——1922e,《赵恒惕与湖南省自治》,《向导》第10期。

——1922f,《中山先生的兵工政策是军阀说法的吗?》,《向导》第7期。

——1923,《北京政变与各政系》,《向导》第31、32期。

——1924a,《敬告国民党中派诸领袖》,《向导》第85期。

——1924b,《商团事件的教训》,《向导》第82期。

——1924c,《义和团与国民党》,《向导》第81期。

——1925,《今年五一之中国政治状况与工农阶级的责任》,《向导》第112期。

陈定炎 1900,《陈炯明与联省自治运动》,未刊论文。

陈东 1925,《民族革命与农工问题》,《革命》第1期。

陈独秀

——1922,《联省自治与中国政象》,《向导》第1期。

——1923a,《对等会议与孙曹携手》,《向导》第22期。

——1923b,《国民党与交通安福》,《向导》第25期。

——1923c,《怎样打倒军阀?》,《向导》第21期。

——1923d,《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锋》第2期。

——1923e,《中国之大患——职业兵与职业议员》,《向导》第19期。

- 1923f,《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向导》第22期。
- 1924a,《国民党的一个根本问题》,《向导》第85期。
- 1924b,《国民党左右派之真意义》,《向导》第62期。
- 1924c,《这是右派的行动吗?还是反革命?》,《向导》第87期。
- 1925a,《给戴季陶的一封信》,《向导》第129期。
- 1925b,《中国民族运动中之资产阶级》,《向导》第136期。
- 陈公博 1926a,《党代表条例和政治训练部的解释》,《军事政治月刊》第2期。
- 1926b,《农民运动报告》,《政治周报》第6—7期。
- 1926c,《青年运动报告》,《政治周报》第6—7期。
- 陈果夫 1973— ,《建军史之一页》,《革命文献》第10期。
- 陈敬文 1961,《中华民国国歌史》,台北。
- 陈潭秋 1924,《国民党的分析》,《中国青年》第5期。
- 陈天锡 1958,《戴季陶先生编年传记》,台北。
- 主编 1959,《戴季陶先生文存》,5册,台北。
- 主编 1967,《戴季陶先生文存续编》,台北。
- 主编 1969,《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台北。
- 主编 1971,《戴季陶先生文存三续编》,台北。
- 陈训正 1973— ,《党军之肇基》,《革命文献》第10辑。
- 陈天放 1962,《李公祠四年》,《传记文学》第1卷第7期。
- 翦伯赞、邵循正、胡华 1964,《中国历史概要》,北京。
- 春木 1923a,《国民党目前之两种责任》,《向导》第30期。
- 1923b,《羞见国民的中国国民党》,《向导》第29期。
- 春涛 1925,《东征记略》,《政治周报》第3期。
- 崔文成 1924,《中国国民革命与无产阶级》,《觉悟》4月23日。

戴季陶 1925a,《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上海。

——1925b,《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上海。

——[1925] 1959a,《致蒋介石先生书》，收入陈天锡主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3册，台北。

——[1925] 1959b,《致刘庐隐先生书》，收入陈天锡主编《戴季陶先生文存》第3册，台北。

——[1926] 1969,《全体的利益与部分的利益及党团的意义》，收入陈天锡主编《戴季陶先生文存再续编》，台北。

《戴季陶先生演讲》，1926,《国立中山大学校报》第2期。

“党部社论贴存簿”，无日期，国民党党史会，436.117，台北。

《大学条例》，1924,见《国父全集》第2卷。

邓慕韩 [1917] 1973-a,《邓慕韩报告在奥联络情形以谋再握政权上总理函》，《革命文献》第48辑。

——[1919] 1973-b,《邓慕韩陈述联络报馆及广东政情上总理函》，《革命文献》第48辑。

邓文仪 1976,《黄埔精神》，台北。

邓仲夏 [1923] 1980,《论农民运动》，《中国青年》第11期，收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

——[1924] 1980,《中国农民状况及我们运动的方针》，《中国青年》第13期，收入《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

第二次全体会议重要决议案，[1926] 1973—，《革命文献》第79辑。

第三次全体会议重要决议案，[1925] 1973—，《革命文献》第79辑。

《东江各署行政会议记略》，1926,《政治周报》第9期。

董子光 1943,《潮县方言》，上海。

杜从戎 1975,《黄埔军校之创建暨东征北伐之回忆》,台北。

《二七纪念运动》,192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第1期。

方鼎英 1927,《方教育长鼎英言论集》,广州。

方刚 1924,《国民党改组后的广东》,《新民国》第1期。

冯菊坡 1923,《国民革命与工人》,广州。

《(中央)妇女部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第1期。

《(省)妇女部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1—4期。

《(中央)妇女部宣传会议案》,1926,国民党党史会,436/302,台北。

《妇女日大运动经过情形》,1924,《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2期。

《妇女运动决议案》,1926,《政治周报》第6/7期。

《妇女之声汇刊》,1926,广州。

傅斯年 [1919] 1967,《中国狗与中国人》,《傅斯年选集》,7册,第3册,台北。

甘乃光 1926a,《商民运动之经过》,《政治周报》第6/7期。

——1926b,《绅士民团县长何以反对农会?》,《中国农民》第10期。

《革命文献》,1973— ,罗家伦主编。

《各省区党务报告决议案》,1926,《政治周报》第6/7期。

《各县市党部及筹备处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1期。

《工人部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第1期。

《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4期。

《广东第二次全省代表大会宣言》，1926，《军事政治月刊》第8期。

《广东各地党报消息汇止》，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4期。

《广东革命势力的团结》，1926，《政治周报》第10期。

《广东民政》，1941，广东省政府秘书处编，曲江。

《广东青年》，1926，广州。

《广东省党部继起》，1925，《政治周报》第2期。

《广东省政府公报》。

《广东省执行委员会宣言及通告》，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1期。

《广东支部弹劾共产党文》，1923，见《国父全集》第4卷。

《广东执行委员会章程草案》，1925，广州《民国日报》，11月5日。

广州《民国日报》。

《关于宣传决议案》，1926，《政治周报》第6/7期。

《国父全集》，1973，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6卷，台北。

《国民革命军党代表条例》，1926，《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

“国民会议事件资料剪报贴存簿”，1926，国民党党史会，472/9，台北。

郭沫若 1926，《落叶》，上海。

何赤 1926，《东征战史》，《军事政治月刊》第4期。

何香凝 1926，《妇女运动报告》，《政治周报》第6/7期。

华岗 [1931] 1982，《中国大革命史》，北京。

黄熬 1926，《南征的经过和感想》，《军事政治月刊》第4期。

黄季陆 1964a，《初生之犊不畏虎》，《传记文学》第4卷第4期。

——1964b,《近四十年历史的新页》,《传记文学》第4卷第5期。

——主编1969,《革命人物志》,台北。

《黄埔建军三十年概述》,1954,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台北。

化周1920,《评论》,《觉悟》,9月9日。

胡承焯1925,《不革命的广东大学》,《革命军》第6/7期。

胡汉民1919,《中国哲学史唯物的研究》,《建设》第1卷第3期。

——1920,《阶级与道德学说》,《建设》第1卷第6期。

——1973——,《中国国民党批评之批评》,《革命文献》第9期。

《惠署特别委员会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2期。

胡朴安[1922]1990,《中华全国风俗志》,郑州。

胡适1918,《易卜生主义》,《新青年》第4卷第6期。

——1934,《中国“格利佛”论女权》,《人民论坛》第7期。

蒋光慈1926,《少年漂泊者》,上海。

——1930,《冲出云围的月亮》,上海。

“教育运动委员会会议事录”,1925,国民党党史会,466/7,台北。

《介绍海内最有价值报纸》,1912,《民意》第1期。

记者1924,《答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导》第92期。

《军事委员会军事政治月刊简章》,1926,《军事政治月刊》第1期。

《军事政治月刊》,1926。

居正1973-a,《本党改进大凡》,《革命文献》第8辑。

——1973-b,《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革命文献》第5辑。

康有为1935,《大同书》,上海。

孔仲南1933,《广东语俗语考》,广州。

梁启超1897,《论女学》,见梁启超1928:第1卷。

- 1900,《中国积弱溯源论》,见梁启超 1928:第2卷。
- 1901,《中国史序论》,见梁启超 1927:第3卷。
- 1902,《新民说》,《新民丛报》,东京。
- [1902] 1967,《三十自述》,见《饮冰室全集》,台北。
- 1903,《论中国国民之性格》,见梁启超 1927:第5卷。
- 1927,《饮冰室合集》,21卷,上海。
- 1928,《饮冰室文集》,30卷,上海。
- 1953,《论进取冒险》,见刘延陵、胡伦清编《明清散文选》,台北。
- 1984,《无产阶级与无业阶级》,见李华兴编《梁启超选集》,上海。
- 无日期,《沈师音书序》,见梁启超 1928:第3卷。
- 李敖 1987,《李敖论孙中山》,台南。
- 《廖仲恺致楚伦电》,无日期,国民党党史会,413/5,台北。
- 李达嘉 1986,《民国初年的联省自治运动》,台北。
- 李大钊
- [1919] 1959,《青年与农村》,见《李大钊选集》,北京。
- 1923,《普遍全国的国民党》,《向导》第21期。
- [1923] 1978,《平民主义》,见《李大钊选集》,北京。
- 李汉胄 1922,《中国人为什么缺乏自治能力?》,《觉悟》1月1日。
- 李健逵 1941,《广东现代华人传》,广州。
- 李笠农 1926,《国民革命军第十师政治部南路战事政治宣传工作》,《军事政治月刊》第6期。
- 林森 1920,“祝辞四”,《民觉》第1卷第1期。
- 《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第一期宣传计划稿》,1925,国民党党史会,436/2,台北。

林翼中 1926,《南征记》,《军事政治月刊》第5期。

《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1980,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北京。

《留沪国会议员林森等祝非常国会延期改组电》,[1918] 1973— ,
《革命文献》第7辑。

刘仁静 1924,《河南卢氏县人民对军阀之反抗》,《向导》第69期。

刘绍唐主编 1977— ,《民国人物小传》,19册,台北。

李维清 [1907] 1989,《上海乡土史》,上海。

李新主编 1991,《国民革命的兴起》,上海。

李云汉 1966,《从容共到清党》,2册,台北。

吕芳上 1989,《革命之再起:中国国民党改组前对新思潮的回应
1914—1924》,台北。

罗敦伟 1963,《牢狱之灾》,《传记文学》第2卷第3期。

罗家伦 1919,《什么是文学?》,《新青年》第1卷第2期。

罗家伦、黄季陆主编 1969,《国父年谱增订本》,2册,台北。

罗绮园 1926a,《本部一年来工作报告概要》,《中国农民》第2期。

——1926b,《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之关系》,《中国农民》第1期。

罗扬清 1926,《第四军政治部南征工作经过概略》,《军事政治月刊》
第6期。

鲁迅

——[1927] 1974.《狗的扭曲》,见《野草》,北京。

马芮兰 [N. G. D. Malmquist] 1991 (5),《从〈大同书〉看中西乌托
邦的差异》,《二十一世纪》双月刊。

茅盾 1928,《从牯岭到东京》,《小说月报》第19期。

——1958a,《腐蚀》,《茅盾文集》10册,第5册,北京。

——1958b,《幻灭》,见《蚀》,《茅盾文集》10册,第1册,北京。

——1958c,《蚀》,《茅盾文集》10册,第1册,北京。

毛思诚编 1965,《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香港。

毛泽东:

[4]《革命派党员群起反对北京右派会议》(署名“子任”),1925,《政治周报》第2期。

[5]《共产章程与实非共产》(署名“润”),1925,《政治周报》第1期。

[6]《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署名“子任”),1925,《政治周报》第4期。

[10]《实践论》,[1937]1967,见毛泽东[16]:第1卷,北京。

[14]《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1967,见毛泽东[16]:第1卷,北京。

[15]《三三三一制》(署名“润”),1925,《政治周报》第1期。

[16]《毛泽东选集》,1967,4卷,北京。

[17]《上海〈民国日报〉反动的原因及国民党中央对该报的处置》(署名“子任”),1925,《政治周报》第3期。

[19]《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见毛泽东[16]:第3卷,北京。

[20]《向左还是向右?》(署名“润”),1925,《政治周报》第2期。

[21]《宣传部工作报告》,1926年5月19日,国民党党史会,台北。

[22]《政治周报发刊理由》,1925,《政治周报》第1期。

[23]《邹鲁与革命》,1925,《政治周报》第1期。

缪象初 1926,《南征政治宣传工作总报告》,《军事政治月刊》第4、5期。

“民国六至七年大元帅府简任人员职务姓名录”,[1918]1973,见

- 《国父全集》第4卷。
- 《民国人物大词典》，1991，石家庄。
- 《民国人物小传》，1979，《传记文学》第32卷第2期。
- 《民国时期广东省政府档案史料选编》，1987，广东省档案馆编，11册，广州。
- 《民国诸人》，1912，《发刊词》，《民意》第1期。
- 《民意杂志出世颂词》，1912，《民意》第1期。
- 《南路各署县长会议议决案》，1926，《政治周报》第11期。
- 《农民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4期（6月）。
- 《农民运动决议案》，1926，《政治周报》第6/7期。
- “农所”（农民运动讲习所），1926，《中国农民》第1期。
- 彭湃 1924，《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向导》第70期。
- 彭述之 1924a，《北京政变与投机无耻的公团之请求》，《向导》第89期。
- 1924b，《江苏战争与国民党》，《向导》第84期。
- 1924c，《南洋烟厂罢工中上海报界之原形》，《向导》第84期。
- 《彭素民关于党务条陈》，1923，《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第3期。
- 钱大钧 1973——，《黄埔军校开创时期之组织》，《革命文献》第10辑。
- “侨港琼崖公民维持会”，19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
- 《[中央]青年部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第1期。
- “青年军人联合会第四次代表大会会议录”，1925，《中国军人》第5期。
- 青松 1923，《到内地去》，《努力周报》第66卷第4期。

“请政府严禁华字（音）、志寰（音）等报入口案”，无日期，国民党党史会，433/182，台北。

“中国国民党九年经过党务”，1925，Kingston。

秦孝仪编 1978，《中华民国史话》，3 册，台北。

《琼崖特别委员会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 2 期（3 月）。

《琼崖特别委员会工作概述》，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 3 期（4—5 月）。

《七十二行商报》，广州。

《全国学生总会之宣传计划》，1924，《中国国民党周刊》第 13 期。

瞿秋白 1923，《中国之地方政治与封建制度》，《向导》第 23 期。

——1925a，《五卅运动中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向导》第 129 期。

——1925b，《义和团运动之意义与五卅运动之前途》，《向导》第 128 期。

《任陈东屏为阳关支部部长状》，1921，《国父全集》第 4 卷，第 399 页。

阮啸仙 1926，《惠阳县农民协会成立之经过》，《中国农民》第 3 期。

上海《民国日报》。

《上海执行部的成立及其工作报告》，1924，国民党党史会，439.2/1，台北。

《上海执行部对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作报告》，1924，国民党党史会，415/223，台北。

《上海执行部索薪会议记录》，1924—1925，国民党党史会，433/24，台北。

《〔中央〕商民部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党务月报》第1期。

《[省]商民部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1期（2月）、第3期（4—5月）、第4期（6月）。

《商民运动决议案》，1926，《政治周报》第6/7期。

《商民运动之经过》，1926，《政治周报》第6/7期。

邵元冲 1954，《Xuanpu 遗书》，2卷，台北。

——1973——，《中华革命党略史》，《革命文献》第5辑。

沈从文 [1928] 1982，《阿丽思中国游记》，见《沈从文文集》第1册，香港。

沈定一 1919，《星期评论发刊词》，《星期评论》第1期。

“社评”，1924，上海《民国日报》副刊《教育周报》，5月29日。

“十一月九日午后三时本部开会纪事”，1921，《本部通信》第60期。

曙声 1920，《对于〈星期评论〉、〈建设〉停刊的感情和希望》，《觉悟》6月7日。

矢盾 1925，《教授辞职》，《广大学生会周刊》第6期。

孙铎 [Henk Sneevliet] 1922，《国民运动、革命军和革命宣传》，《向导》第9期。

——1923a，《吴佩孚与国民党》，《向导》第24期。

——1923b，《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过去及将来》，《前锋》第1期。

孙中山：

[1]《八年十月十号》，1919，《国父全集》第2卷，第165—166页。

[2]《北上之意义及希望》，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735—738页。

[3]《成立正式政府巩固民国基础》，1921，《国父全集》第2卷，第

399—400 页。

[4]《党务进行当以宣传为重》，1923，《国父全集》第2卷，第509—511页。

[5]《党员不可存心做官》，1923，《国父全集》第2卷，第537—543页。

[6]《党员须多量介绍同志入党》，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870页。

[7]《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1921，《国父全集》第2卷，第451—455页。

[8]《打破旧思想要用三民主义》，1923，《国父全集》第2卷，第567—577页。

[9]《发挥笔墨之威权以与军阀搏战》，1923，《国父全集》第2卷，第512—514页。

[10]《复焦易堂告解决国会纠纷办法函》，1922，《国父全集》第3卷，第813页。

[11]《革命成功个人不能有自由团体要有自由》，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727—735页。

[12]《革命军必须以一当百》，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605—612页。

[13]《革命军不可想升官发财》，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640—653页。

[14]《革命军的基础在高深的学问》，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691—700页。

[15]《耕者要有其田!》，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719—723页。

[16]《关于民生主义之说明》，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

624 页。

- [17] 《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1923，《国父全集》第2卷，第593—604页。
- [18] 《过去党务失败之原因》，1923，《国父全集》第2卷，第534—537页。
- [19] 《护法之基础》，1916，《国父全集》第2卷，第359—360页。
- [20] 《中国之国际发展》，1921，《国父全集》第5卷，第127—360页。
- [21] 《建国方略》，包括《心理建设》、《物质建设》、《社会建设》，《国父全集》第1卷，第419—750页。
- [22] 《建设杂志发刊词》，1919，《建设》第1卷第1期。
- [23] 《救国救民之责任在革命军》，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633—640页。
- [24] 《军人精神教育》，1921，《国父全集》第2卷，第477—506页。
- [25] 《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条例》，1922，《国父全集》第2卷，第961—964页。
- [26] 《农民大联合》，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713—719页。
- [28] 《批北京护法议员论护法十函》，1922，《国父全集》第3卷，第863页。
- [29] 《批广东支部邓泽如等弹劾共产党文》，1923，《国父全集》第4卷，第916页。
- [30] 《批修铁路及集权分权之解释》，1912，《国父全集》第2卷，第827页。
- [32] 《三民主义》，1919，《国父全集》第2卷，第154—165页。
- [33] 《三民主义》，1924，《国父全集》第1卷，第1—284页。

- [34] 《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的工具》，1921，《国父全集》第2卷，第459—466页。
- [35] 《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1921，《国父全集》第2卷，第401—412页。
- [36] 《孙文学说》，1918，《国父全集》第1卷，第419—506页。
- [37] 《统一中国须靠宣传文化》，1920，《国父全集》第2卷，第401—402页。
- [38] 《推翻帝国主义实现中国真正民治政府》（在梧州行营对《美京邮报》访员谈话），1922，《国父全集》第2卷，第850—851页。
- [39] 《为创设英文杂志印刷机关致海外同志书》，1920，《国父全集》第3卷，第669—673页。
- [40] 《为前寄债券及吸收党员事复曾允明黄德源饶潜川函》，1918，《国父全集》第3卷，第557—558页。
- [41] 《为讨伐曹吴告军民文》，1924，《国父全集》第1卷，第907页。
- [42] 《心理建设》，1918，《国父全集》第1卷，第419—506页。
- [43] 《修改章程之说明》，1920，《国父全集》第2卷，第394—398页。
- [44] 《学生要努力宣传担当革命重任》，1923，《国父全集》第2卷，第524—534页。
- [45] 《军政之解释》，1920，《国父全集》第2卷，第398—399页。
- [46] 《要靠党员成功不专靠军队成功》，1923，《国父全集》第2卷，第558—567页。
- [47] 《言语文字的奋斗》，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701页。
- [48] 《中国工人所受不平等条约之害》，1924，《国父全集》第2卷，第679—685页。

- 《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演说》，无日期，北京，国民党党史会，046/34，台北。
- 谭旦同 1960，《中央博物院二十五年之经过》，台北。
- 谭平山 1925，《中国国民党全国党务概况》，《政治周报》第3期。
- 1926，《谭平山先生党务总报告》，《政治周报》第6/7期。
- [1926] 1986，《党务总报告》，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南京。
- 谭平山、冯菊坡 1923，《国民革命中之民团问题》，广州。
- 陶希圣 1964，《潮流与点滴》，台北。
- 《讨袁之舆论及宣传》，1973—，《革命文献》第46辑。
- 田农 1923，《到民间去！》，《努力周报》第40卷第2期。
- “通信”，1922，《觉悟》1月22日。
- 王辅世主编 1986，《中国民族服饰》，香港。
- 王尔琢 1926，《各地党部组织经过报告》，《中国国民党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特别党部第三师党部党刊》第1期。
- 王健民 1965，《中国共产党史稿》，2册，台北。
- 汪精卫 1926a，《我们革命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宣传与事实不能一致》，《政治周报》第6/7期。
- 1926b，《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政治周报》第5期。
- 无日期，《代廖仲恺同志嘱诸同志》，《廖仲恺先生哀思录》，无出版日期和出版地点。
- 王新命 1957，《新闻圈里四十年》，台北。
- 王彰龄 1973，《孙文主义学会成立之经过及其影响》，见《中国现代史专题研究报告》第3辑。
- 王忠 1957，《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重要的革命报纸与期刊》，见

- 来新夏、魏宏运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论集》，武汉。
——主编，1912—1939，《中国年鉴》，天津。
- 吴景濂、褚辅成 1920，《祝辞五》，《民党》第1卷第1期。
- 伍廷芳 1920，《祝辞一》，《民党》第1卷第1期。
- 吴玉章 1926，《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概略》，《政治周报》第5期。
- 吴稚晖 1908，《中国人之腐败病》，《新世纪》第59期。
《向导周报》，1963，5卷，东京。
- 谢次林 1926，《东征经过情形》，《军事政治月刊》第2期。
《星期评论半年来的努力》，1919，《星期评论》第26期。
《星期评论刊行终止的宣言》，1920，《星期评论》第53期。
“宣”，1919，《觉悟的第一步》，《觉悟》9月29、30日，10月1日。
“宣传部公文底稿”，1922—1923，国民党党史会，415/91，台北。
《[中央]宣传部工作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第1期。
《[省]宣传部工作概要》，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1—4期（1—6月）。
《阳江县党部》，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3期（4—5月）、第4期（6月）。
- 叶楚傖 1920，《评论》，《觉悟》2月8日。
——1922，《评论》，《觉悟》7月24日。
——1923，《国民党的民众化与民众的国民党化》，《觉悟》5月6日。
- 一鸿 1924，《值得注意的几件国民党工作》，《新民国》第1卷第5期。
- 一平 1924，《崇拜军阀底罪恶》，《向导》第68期。

郁达夫 1921,《沉沦》,上海。

恽代英 1924,《何谓国民革命?》,《中国青年》第 20 期。

于树德 1924,《重申本党纪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周刊》第 39 期。

《在本党指导下之各种民众运动报告》,192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第 1 期。

蔡东藩 1956,《历朝通史演义》,44 册,重印本,上海。

曾朴 1905,《孽海花》,上海。

郑容 [1925] 1980,《民团与革命》,《中国青年》第 68 期,收入《六大以前》。

张国焘 1922,《革命党的“否认”病》,《向导》第 15 期。

——1971,《我的回忆》,香港。

张继 1951a,《革命大事记》,见张继 1951c: 第 1 册。

——1951b,《回忆录》,见张继 1951c: 第 1 册。

——1951c,《张溥泉先生全集》,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5 册,台北。

张静庐 1954—1956,《中国现代出版史料》,5 册,上海。

——1957,《中国出版史料补编》,上海。

张秋白 1920,《自己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关系》,《民觉》第 1 卷第 1 期。

张秋人 1926,《省港罢工的过去和现在》,《政治周报》第 9 期。

张启雄 1926,《东征时期之政治工作概略》,《军事政治月刊》第 2 期。

张炽章 [1922] 1990,《序》,见胡朴安 [1922] 1990。

《政治工作日报》,1926。

“政治训练部时事宣传大纲汇编”,1926,《军事政治月刊》第

2 期。

《政治周报》，1925—1926。

《[省]执行委员会各部工作概要》，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1期（2月）。

“[省]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会议录”，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1期（2月）。

《中共党史教材参考资料》，无出版日期，2册，南京。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2，见《中共党史教材参考资料》，无出版日期，上册。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见《中共党史教材参考资料》，无出版日期，上册。

《中国国民党本部财政部通报》，1923，国民党党史会，415/25，台北。

《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1923。

“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办事处职员表”，1922，国民党党史会，415/28，台北。

“中国国民党本部现任职员一览表”，1923，《中国国民党本部公报》第14期。

《中国国民党党务讨论会纪事录》，无出版日期，广州。

《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198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2册，南京。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 1930，见李剑农《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上海。

《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关于接受孙中山遗嘱之训令决议案》，[1925] 1986，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

- “中国国民党各省职员表修正稿”，1922，国民党党史会，415/29，台北。
- 《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1926，广州。
- 《中国国民党讲习所开学记》，1924，《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8期。
- 《中国国民党讲习所组织决议案》，1924，《中国国民党周刊》第13期。
- 《中国国民党接受总理遗嘱宣言》，[1925] 1973—，《革命文献》第69辑。
- 《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1929，南京。
- 《中国国民党全美洲同志第二次肯亲大会始末记》，1921，旧金山，国民党党史会，429/1，台北。
- “中国国民党宣传部收支簿”，1923，国民党党史会，415/75，台北。
- 《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1925，《政治周报》第1期。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1926。
-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办事章程》，1924，《中国国民党周刊》第22期。
- 《中国国民党周刊》，1924。
- “中国国民党最近党部组织概况”，1926，《政治周报》第14期。
- 《中国近百年历史图集 1940—1975》，1976，香港。
-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 民国十四年》，1975，2册，台北。
- 仲九 1920，《主义的研究与宣传》，《星期评论》第40期。
- 《中山县党部宣传部工作经过情形》，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3期（4—5月）。
- 《中央党部妇女部民国十三年三月至十五年三月工作摘要》，1926，《妇女之声汇刊》1926。

“中央党部重要文件”，1926，《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务月报》第1期。

《中央致广州〈民国日报〉禁刊自杀公会小说函》，1924，国民党党史会，436/182，台北。

“中央执行委员会训令及重要通告”，1926，《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党务月报》第1期。

“中央执行委员会为颁发纪念周条例通告第216号”，1925，国民党党史会，458/25，台北。

周恩来〔伍豪〕1924，《最近二月广州政象之概观》，《向导》第92期。

——〔1926〕1980a，《国民革命及国民革命势力的团结》，收入《六大以前》。

——〔1926〕1980b，《现实政治斗争中之我们》，收入《六大以前》。

周佛海1925a，《国民革命中的几个问题》，《觉悟》12月16日。

——1925b，《国民革命中之阶级问题》，《孤军》第3卷第2期。

——1967a，《扶桑及瀛苏当年》，见周佛海、陈公博《回顾录合编》，香港。

——1967b，《我逃出了赤都武汉》，见周佛海、陈公博《回顾录合编》，香港。

周其鉴1926，《西江办事处会务报告》，《中国农民》第6/7期。

朱务善1924，《北京大学二十五周年纪念民意测验之分析》，《新民国》第1卷第5期。

朱执信1925a，《兵的改造与其心理》，见朱执信1925c：第2册。

——1925b，《国民与心理》，见朱执信1925c：第1册。

——1925c，《朱执信集》，2册，上海。

邹鲁1929，《中国国民党史稿》，4卷，上海。

——1976,《回顾录》,见《邹鲁全集》10册,第1册,台北。

Abend, Hallett. 1944. *My Years in China*. London.

Althusser, Louis. 1971. *Lenin and Philosophy*. London.

Amsden, Alice H. 1985. "The State and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de Skocpol, Peter B. Evans, and Dietrich Rueschemeyer,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Cambridge.

Anderson, Benedict.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s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Anderson, Marston. 1990. *The Limits of Realism: Chinese Fiction in the Revolutionary Period*. Berkeley, Calif.

Andolsen, Barbara. 1988. *Daughters of Jefferson*. Macon, Ga.

Arendt, Hannah, 1951.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Ayscough, Florence. 1938. *Chinese Women Yesterday and Today*. London.

Barrow, John. 1806. *Travels in China*. London.

——1839. *The Life of George Lord Anson*. London.

Bellamy, Edward. 1888. *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 Boston.

Benhabib, Seyla. 1986. *Critique, Norm and Utopia: A Study of the Foundations of Critical Theory*. New York.

Bergère, Marie-Clarie. 1989.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1911—1937*. Translated by Janet Lloyd. Cambridge.

Bernal, Martin. 1967. "The Tzu-yu Tang and Tai Chi-T'ao, 1912—1913". *Modern Asian Studies* I, no. 2.

——1976. *Chinese Socialism to 1907*. Ithaca, N. Y.

Berninghausen, John. 1977. "The Central Contradiction in Mao Dun's Earliest Fiction". In Merle S. Goldma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

- 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mbridge, Mass.
- Bhaba, Homi K. , ed. , 1990. *Nation and Narration*. London.
- Bianco, Lucien (毕仰高) 1986. "Peasant Movements" . In John K. Fairbank and Albert Feuerwerker, eds.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 vol. 13 , pt. 2. Cambridge.
- Bickers, Robert A. , and Jeffrey N. Wasserstrom. 1995. "Shanghai ' s 'Dogs and Chinese Not Admitted' Sign; Legend, History and Contemporary Symbol" . *China Quarterly* 142.
- Billingsley, Phil (贝思飞) 1988. *Bandits in Republican China*. Stanford, Calif.
- Bing, Dov. 1973. "Ma-lin ' s activities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of June till December 10 , 1921" . *Issues and Studies* 9 , no. 5.
- Birch, A. H. 1971. *Representation*. London.
- Bird, Isabella. 1899. *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 An Account of Journeys in China , Chiefly in the Province of Sze Chuan and Among the Man-Tze of the Somo Territory*. London.
- Bland, J. O. P. 1932. *China; The Pity of It*. London.
- Boorman, Howard L. , and Richard C. Howard, eds. 1967—1971.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4vols. New York.
- Bottomore, Tom, ed. 1983. *A Dictionary of Marxist Thought*. Oxford.
- Bowman, Sylvia E. , ed. 1962. *Edward Bellamy Abroad; An American Prophet ' s Influence*. New York.
- Brandt, Conrad. 1966. *Stalin ' s Failure in China , 1924—1927*. New York.
- Brandt, Conrad, Benjamin Schwartz , and John K. Fairbank. 1952.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Chinese Communism*. Cambridge, Mass.

- Brandit, Loren. 1989. *Commercializ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Central China, 1870—1937*. Cambridge.
- Brass, Paul R. 1976. "Ethnicity and Nationality Formation" . *Ethnicity* 3, no. 3.
- Brown, Carolyn T. 1993. "Woman as Trope: Gender and Power in Lu Xun's 'Soap' " . In Tani E. Barlow, ed. ,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 C.
- Brown, Peter. 1988. *The Body and Society: Men, Women and Sexual Renunciation in Early Christianity*. New York.
- Bruehl, Elisabeth Young. 1982. *Hannah Arendt: For Love of the World*. New Haven, Conn.
- Buck, Pearl (赛珍珠) 1939. "Introduction" . In Lin Yutang 1939. ———1958. *All Men Are Brothers*. London.
- 蔡和森 [1921] 1969, "Ts' ai He-sen on Proletarian Revolution in China." In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tuart R. Schram, eds. And trans. , *Marxism and Asia: 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 London.
- Cantlie, James, and C. Sheridan Jones. N. d. *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 London.
- Chan, F. Gilbert. 1979. "An Alternative to Kuomintang-Communist Collaboration: Sun Yat-sen and Hong Kong, January-June 1923" . *Modern Asia Studies* 13, no. 1.
- Chan, Ming Kou (陈明铨) 1975. "Labour and Empire: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in the Canton Delta, 1895—1927" . Ph. D. diss. , Stanford University.
- Chan, Ming Kou (陈明铨), and Arif Dirlik. 1992. *Schools into Fields and Factories: Anarchists, the Guomindang and the National Labor*

- University in Shanghai, 1927—1932*. Durham, N. C.
- Chang, Hao (张灏) 1971. *Liang Ch' i-ch' 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 Cambridge, Mass.
- 1987. *Chinese Intellectuals in Crisis: Search for Order and Meaning, 1890—1911*. Berkely, Calif.
- Chang, Sidney H. , and Leonard H. D. Gordon. 1991. *All Under Heaven: Sun Yat-sen and His Revolutionary Thought*. Stanford, Calif.
- Chapman, H. Owen. 1928.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26—1927*. London.
- Chatterjee, Partha. 1986. *Nationalist Thought and the Colonial World: A Derivative Discourse*. London.
- 1990. “Colonialism,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zed Women : The Contest in India” . *American Ethnologist* 17, no. 1.
- 1993. *The Nation and Its Fragments*. Princeton.
- Chen, Leslie H. (陈定炎) 1988. “A Collection of Historiographic Materials for a Biography of Chen Chiung-ming (1878—1933) ” . 21 vol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deposited in Columbia University Library.
- 1989. “Federalism and the Unification of China—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 Unpublished Paper.
- 1991. “Chen Jiongming (1878—1933) and the Chinese Federalist Movement” . *Republican China* 17, no. 1.
- 陈独秀 [1914] 1969, “Patriotism and Consciousness of Self” (《爱国心与自觉心》) . In Hélène Carrère d' Encausse and Stuart R. Schram, ed. and trans. , *Marxism and Asia: 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 London.
- Cheng Ching-mao. 1977. “The Impact of Japanese Literary Trends on Modern Chinese Writers” . In Merle S. Goldman, ed. , *Modern Chinese*

-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mbridge, Mass.
- Chesneaux, Jean (谢诺) 1968.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Translated by H. M. Wright. Stanford, Calif.
- Chiang Kaishek (蒋介石) [1943] 1947. *China's Destiny* (《中国之命运》). Translated by Wang Chung-hui (王宠惠). New York.
- 1968. *Soviet Russia in China: A Summing Up at Seventy*. Rev. ed. New York.
- Ch'ien, Hsiao, comp. 1944. *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 London.
- Ch'ing, Julia. 1972—1973. "Neo-Confucian Utopian Theories and Political Ethics". *Monumenta Serica: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30.
- Chow, Rey. 1991.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 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East and West*. Minneapolis, Minn.
- Chow Tse-tsung (周策纵) 1960.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 1963. *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Cambridge, Mass.
- Clendinnen, Inga. 1991. "fierce and Unnatural Cruelty: Cortés and the Conquest of Mexico". *Representations* 33.
- Clifford, Nicholas R. 1979. *Shanghai, 1925: Urban Nationalism Defense of Foreign Privilege*. Ann Arbor.
- Clubb, O. Edmund. 1978. *Twentieth-Century China*. 3d rev. Ed. New York.
- Coble, Parks M., Jr. 1980. *The Shanghai Capitalists an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1927—1937*. Cambridge, Mass.
- Cohen, Paul A. 1974.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Wang T'ao and Reform in Late Ch'ing China*. Cambridge, Mass.
- 1984.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New York.
- Connerton, Paul. 1980. *The Tragedy of Enlightenment: An Essay on the*

- Frankfurt School*. Cambridge.
- Conrad Joseph. 1980. *Heart of Darkness*. Harmondsworth.
- Cranmer-Byng, J. L. , ed. [1902] 1962. *An Embassy to China: Being the Journal Kept by Lord Macartney During His Embassy to the Emperor Ch'ien-lung, 1793—1794*. London.
- Croizier, Ralph. 1968.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Mass.
- 1988. *Art and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Lingnan (Cantonese) School of Painting, 1906—1951*. Berkeley, Calif.
- Dawson, Raymond. 1967. *The Chinese Chameleon: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Oxford.
- de Certeau, Michel. 1988. *The Writing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Tom Conley. New York.
- De Francis, John. 1950. *Nationalism and Language Reform in China*. Princeton.
- Degras, Jane, sel. and ed. 1971.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19—1943, Documents*. 3 vols. London.
- Denby, Charles. 1906. *China and Her People: Being the Observations, Reminiscences and Conclusions of an American Diplomat*. 2 vols. Boston.
- d'Encausse, Hélène Carrère, and Stuart R. Schram, ed. And trans. 1969. *Marxism and Asia: 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 London.
- Dening, Greg. 1993. "The Theatricality of History Making and the Paradoxes of Acting" . *Cultural Anthropology* 8, no. 1.
- Dennerline, Jerry. 1988. *Qian Mu and the World of Seven Mansions*. New Haven, Conn.
- de Quincey, Thomas. [1857] 1897. "The Chinese Question in 1857" .

- In Masson 1897, vol. 14.
- Desmond, Adrian, and James Moore. 1991. *Darwin*. Harmondsworth.
- Deutsch, K. W. 1966. *Nationalism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 New York.
- Dikötter, Frank. 1992.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Stanford, Calif.
- “Directive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1920 Agrarian Theses” . [1920] 1971. In Degras, 1971, vol. 1.
- Dirlik, Arif. 1975.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s of the New Life Movement: A Study in Counter-Revolution”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34, no. 4.
- 1978. *Revolution and History : Origins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1919—1937*. Berkeley, Calif.
- 1989. *The Origins of Chinese Communism*. Hong Kong.
- 1991. *Anarch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
- Dolezelova-Velingerova, Milena. 1977. “ The Origins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 In Merle S. Goldman, ed. ,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mbridge, Mass.
- ed. 1988. *A Selective Guide to Chinese Literature 1900—1949*. Vol. 1, *The Novel*. Leiden.
- Doolittle, Rev. Justus. [1865] 1966. *Social Life of the Chinese*. Taipei.
- Duara, Prasenjit. 1988. *Culture, Power and the State: Rural North China, 1900—1942*. Stanford, Calif.
- 1990. “Nationalism as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Centralism and Federalism in Early Republican China” . Washington, D. C.
- Dukes, Edwin Joshua. 1885. *Everyday Life in China*. London.
- Eade, J. C. , ed. 1983.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Europe*. Canberra.
- Eagleton, Terry. 1981. *Walter Benjamin, or, Towards a Revolutionary*

Criticism. London.

Eastman, Lloyd E. (易劳逸) 1974. *The Abortive Revolution: China Under Nationalist Rule*. Cambridge, Mass.

Eberhard, Wolfram. 1964. "Ideas about Social Reform in the Novel *Ching-hua yüan* ('Insubstantial Connections') " . In Eike Heberland, Meinhard Schuster, and Helmet Straube, eds. , *Festschrift für Ad. E. Jensen*. Munich.

"The Educational Situation in Hainan" . 1926. *Hainan Newsletter*, Fall.

Edwardes, Michael. 1971. *East-West Passage: The Travel of Idea, Arts and Inventions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ern World*. London.

Eide, Elisabeth. 1985. "Optimistic and Disillusioned Noras on the Chinese Literary Scene, 1919—1940" . In Anna Gertslacher, Ruth Keen, Wolfgang Kubin, Margit Miosga, and Jenny Schon, eds. , *Women and Literature in China*. Bochum.

———1987. *China's Ibsen: From Ibsen to Ibsenism*. London.

Ellis, Henry. 1817. *Journal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London.

Engels, Frederick. (恩格斯) 1976. "The Festival of Nations in London" .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46 vols. , vol. 6. London.

Fairbank John K. (费正清) 1953. *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 Cambridge.

———1971.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3d ed. Cambridge, Mass.

———1986. *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 1800—1985*. New York.

Fanon, Frantz. 1967.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Harmondsworth.

Fergusson, Sir James of Kilkerran. 1972. *Ballon Tytler*. London.

- Faure, David. 1989. *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Hong Kong.
- Feng Yu-lan (冯友兰) 1966. In Derk Bodde, ed., *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New York.
- Feuerwerker, Albert (费维恺) 1968. *The Chinese Economy, 1912—1949*. Ann Arbor.
- 1976. *The Foreign Establishment in China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Ann Arbor.
- Fewsmith, Joseph. 1985. *Party, State and Local Elites in Republican China: Merchant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s in Shanghai, 1890—1930*. Honolulu.
- Fincher, John. 1968. "Political Provincialism and National Revolution". In Mary C. Wright, ed.,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Conn.
- Fishman, Joshua A. 1972. *Language and Nationalism: Two Integrative Essays*. Rowley, Mass.
- FitzGerald, John. (费约翰) 1983. "Mao in Mufti: Newly Identified Works by Mao Zedong".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9.
- 1988. "Did the National Revolution Succeed or Fail: A Point of Difference in Chinese and Western Perspectives on Republican China History". *Republican China* 14.
- ed. 1989. *The Nationalists and Chinese Society, 1923—1937: A Symposium*. Melbourne.
- 1990a. "A Greater Disunity: The Politics and Finance of Guangdong Separatism, 1926—1936". *Modern Asian Studies* 24.
- 1990b. "The Misconceived Revolution: State and Society in China's

- Nationalist Revolution, 1923—1926”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9 , no. 2.
- Fogel, Joshua A. , ed. and trans. 1983. “ Naitō Kona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onception of Modernity in Chinese History” .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7.
- 1989. *Nakae Ushikichi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 Foster, John. 1928. *Chinese Realities*. London.
- Foucault, Michel.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London.
- 1984. *The Ethic of Care for the Self as a Practice of Freedom; An Interview with Michel Foucault on January 20, 1984*. Conducted by Raul Fornet Betancourt, et al. , translated by J. D. Gauthier, S. J. Paris.
- The Four Books* (《四书》) . 1973.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Taipei.
- Friedman, Edward. 1974. *Backward Toward Revolution; The Chinese Revolutionary Party*. Berkeley, Calif.
- Friedrich, J. C. 1957. *Constitutional Reason of State*. Providence, R. I.
- Fung, Edmund S. K. 1991. *The Diplomacy of Imperial Retreat; Britain's South China Policy, 1924—1931*. Hong Kong.
- Galbiati, Fernando. 1985. *P'eng P'ai and the Hai-Lu-Feng Soviet*. Stanford, Calif.
- Gasster, Michael. 1980. “The Republic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 . In D. Twitchett and J. K. Fairbank, eds. ,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 II, pt. 2. Cambridge.
- Gellner, Ernest. 1964. *Thought and Change*. London.
- 1983.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thaca, N. Y.
- Gibbs – Smith, Charles H. 1985. *Aviation; A Historical Survey from Its Or-*

- igins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London.
- Gilbert, Rodney. 1926. *What's Wrong with China?* London.
- Gilkey, Langdon. 1966. *Shantung Compound: The Story of Men and Women Under Pressure*. New York.
- Gillespie, Charles Coulston. 1983. *The Montgolfier Brothers and the Invention of Aviation, 1783—1784*. New York.
- Gillespie, Richard Eugene. 1971. "Whampoa and the Nanking Decade, 1924—1936". Ph. D. diss., American University, Washington, D. C.
- Gilmartin, Christina A. 1994. "Gender, Political Culture, and Women's Mobilization in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ristina A. Gilmartin, Gail Hershatter, Lisa Rofel, and Tyrene White, eds., *Engendering China: Women, Culture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Mass.
- Gluck, Carol. 1985. *Japan's Modern Myths: Ideology in the Late Meiji Period*. Princeton.
- Goldman, Merle S., ed. 1977.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mbridge, Mass.
- Grant, Damian. 1970. *Realism*. London.
- Gregory, Peter N. 1985. "Tsung-Mi and the Single World 'Awareness'" .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5, no. 3.
- Grieder, Jerome. 1970. *Hu Shih and the Chinese Renaissance: Liberalism in the Chinese Revolution, 1917—1937*. Cambridge, Mass.
- Guerard, Albert L. [1924] 1968. "Hero of the Will". In Harold Lubin, ed., *Heroes and Anti-Heroes: A Reader in Depth*. San Francisco.
- 顾颉刚 1931, *The Autobiography of a Chinese Historian* (《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 Translated by Arthur Hummel. Leiden.

- Habermas, Jurgen. 1989.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Public Sphere; An E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Cambridge, Mass.
- Hainan Newsletter. 1924. Haikou.
- Hazama, Naoki. 1992. "Chūgoku kokumintō daiichiji zenkoku daihyō daikai sengen'ni tsuite no kosatsu" (Research into the declarations of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 In Hazama Naoki, ed. , *Chūgoku kokumin kakumei no kenkyū* (Research into China's Nationalist Revolution) . Kyoto.
- Hazzard, Shirley. 1980. *The Transit of Venus*. London.
- Hegel Georg. 1944.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Translated by J. Sibree. New York.
- 1953. *Hegel's Philosophy of Right*. Translated by T. M. Knox. Oxford.
- Hegel, Robert E. 1988. "Heavens and Hells in Chinese Fictional Dramas" . In Carolyn T. Brown, ed. , *Psycho-Sinology: The Universe of Dreams on Chinese Culture*. Washington, D. C.
- Heimert, Alan. 1966. *Religion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the Great Awakening to the Revolution*. Cambridge, Mass.
- Heller, Agnes. 1988. *General Ethics*. London.
- Heunemann, Ralph W. 1984. *The Dragon and the Iron Horse: The Economics of Railroads in China, 1876—1937*. Cambridge, Mass.
- Hirai, Kogoro. 1903. *Hyakunenge no Shakai* (Society One Hundred Years from Now) . Tokyo.
- Hobbes, Thomas. [1651] 1946. In Michael Oakeshott, ed. ,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 and Civil*. Oxford.
- Hobson, J. A. [1902] 1965. *Imperialism: A Study*. Introduction by Philip

- Seigelman. Ann Arbor.
- Hofheinz, Roy, Jr. 1977. *The Broken Wav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easant Movement, 1922—1928*. Cambridge.
- Holm, David. 1990. *Art and Ideology in Revolutionary China*. Oxford.
- Hou Chi-ming. 1965. *Foreign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9—1937*. Cambridge, Mass.
- Hsia, Tsi-an (夏济安) 1968.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 Hsieh, Winston. 1962. "The Ideas and Ideals of a Warlord; Ch'en Chiung-ming (1878—1933)". *Papers on China* 16.
- Hsü, Immanuel C. Y. (徐中约) 1990. *The Rise of Modern China*. 4th ed. New York.
- Hsüeh Chun - tu (薛君度) 1961. *Huang Hs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Stanford, Calif.
- Hung Chang-tai. 1985. *Going to the Peopl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Folk Literature, 1918—1937*. Cambridge, Mass.
- Hunt, Lynn. 1984.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
- 胡适 [1931] 1969, "On knowledge and action" (《论知与行》). In T'ang Leang-li, ed., *China's Own Critics; A Selection of Essays*. With commentaries by Wang Ching-wei. New York.
- Hutchinson, Paul. 1924. *China's Real Revolution*. New York.
- Huters, Theodore. 1991. "Mirages of Representation; May Fourth and the Anxiety of the Real". In Theodore Huters and Xiaobing Tang, *Chinese Literature and the West; The Trauma of Realism; the Challenge of the (Post) Modern*. Durham, N. C.

- Iriye, Akira. 1965. *After Imperialism: 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 1921—1931*. Cambridge, Mass.
- Isaacs, Harold. 1961. *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d rev. ed. Stanford, Calif.
- 1971. “Notes on a Conversation with H. Sneevliet” . *China Quarterly* 34.
- Jansen, Marius B. 1975. *Japan and China: From War to Peace, 1894—1972*. Chicago.
- Johnson, David, Andrew Nathan, and Evelyn Rawski, eds. 1985. *Popular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Calif.
- Johnson, Paul. 1991. *The Birth of the Modern*. London.
- Johnson, R. Stewart. 1991. *Scholar Gardens of China: A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Spetial Design of the Chinese Private Garden*. Cambridge.
- Johnson, Samuel. 1969. “Selections from *The Adventurer*, Number 115” . In Mona Wilson, ed. , *Johnson: Prose and Poetry*. London.
- Johnstone, Reginald F. 1934. *Twilight in the Forbidden City*. New York.
- Jordan, Donald. 1976.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China's National Revolution of 1926—1928*. Honolulu.
- Josipivici, Gabriel. 1982. *Writing and the Body*. Brighton.
- 康有为 1958, *Ta T'ung Shu: The One-World Philosophy of K'ang Yu-wei*. Translated by Laurence G. Thompson, London.
- 1967, “Chronological Biography of K'ang Yu-wei” . In Jung-pang Lo, ed. , *K'ang Yu-wei: A Biography and a Symposium*. Tucson.
- Kataoka, Kazutada. 1984. “Shingai Kakumei ki no go zoku kyowa ron o megutte” (On the origins of the theory of five races in the 1911 revolution period) . In *Chūgoku kindai shi no shomondai: Tanaka Masayoshi sensei taikan kinen ronshū* (Problems of modern Chinese histo-

- ry; Festschrift in honor of the retirement of Professor Tanaka Masayoshi) . Tokyo.
- Kauffman, Walter. 1965. *Hegel: Reinterpretation, Text and Commentary*. Garden City, N. Y.
- Kenez, Peter. 1985. *The Birth of the Propaganda State: Soviet Methods of Mass Mobilization, 1917—1929*. Cambridge.
- Keyte, J. C. 1925. *The Passing of the Dragon*. 2d ed. London.
- Kinkley, Jeffrey C. 1987. *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 Calif.
- Knechtges, David. 1973. "Dream Adventure Stories in Europe and T'ang China" . *Tamkang Review* 4, no. 2.
- Knight, Nick ed. 1990. *Mao Zedong on Dialectics: Writings on Philosophy, 1937*. Armonk, N. Y.
- Kuhn, Philip A. (孔飞力) 1970. *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Mass.
- Kumar, Krishan. 1987.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Oxford.
- Kuo, Ping-chia. 1956. *China: New Age and Outlook*. London.
- Kwok, D. W. Y. 1965. *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1950*. New Haven, Conn.
- Lamley, H. J. (蓝厚理) 1977. "Hsieh-tou: The Pathology of Violence in South-eastern China" . *Ch'ing-shih went'i* 3, no. 7.
- Landis, Richard B. 1964. "The Origins of Whampoa Cadets Who Served in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 *Studies in Asia* 5.
- 1969. "Institutional Trends at the Whampoa Military School, 1924—1926" . Ph. D. diss. ,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eattle.
- 老舍 [1929] 1980, *Ma and Son* (《二马》) . Translated by Jean M.

James. San Francisco.

Laroui, Abdallah. 1976. *The Crisis of the Arab Intellectual*. Berkeley, Calif.

Lary, Diana. 1975. *Region and Nation*. Cambridge.

Lee, Frederick. 1926. *Travel Talks on China*. Washington, D. C.

Lee, Leo Ou-fan (李歐梵) 1973. *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Cambridge, Mass.

—— 1987. *Voices from the Iron House: A Study of Lu Xun*. Bloomington, Ind.

Lenin, V. I. (列寧) [1902] 1988. *What is to Be Done ?* Translated by Joe Fineberg and George Hanna. Revis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bert Service. Harmondsworth.

—— 1916. *Imperialism: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Moscow.

—— [1917] 1965.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Moscow.

Leong, S. T. 1976. *Sino-Soviet Diplomatic Relations, 1917—1926*. Canberra.

Levenson, Joseph. 1971a. *Revolution and Cosmopolitanism: The Western Stage and the Chinese Sages*. Berkeley, Calif.

—— 1971b. "The Province, the Nation and the World: The Problem of Chinese Identity". In Joseph Levenson, ed., *Modern China: An Interpretive Anthology*. New York.

Leyda, Jan. 1972. *Dianying: Electric Shadows*. Cambridge, Mass.

Leys, Simon. 1991. *The Death of Napoleon*. London.

Li, Dun J., trans. and ed. 1978. *Modern China: From Mandarin to Commissar*. New York.

梁啟超 [1902] 1979, "The Renovation of the People". In Tend and Fairbank 1979.

- [1922] 1979. "A General Survey of China's Progress over the Past Fifty Years". In S. Y. Teng and J. K. Bairbank, eds.,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2d ed. Cambridge, Mass.
- 1977. "An Autobiographical Account at Thirty". Translated by Li Yu-ning (李幼宁). *Chinese Studies in History* 10, no. 3.
- 1978. "What Is Wrong with the Chinese?" In Dun J. Li, ed., *Modern China: From Mandarin to Commissar*. New York.
- Li Chien-nung (李剑农) 1956. *The Political History of China, 1840—1928*.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Teng Ssu-yü and Jeremy Ingalls. Stanford, Calif.
- 李大钊 [1915] 1969, "Pessimism and Consciousness of Self" (《厌世心与自觉心》). In Hélène Carrère d'Encausse and Stuart R. Schram, ed. and trans., *Marxism and Asia: An Introduction with Readings*. London.
- Li Jui (李锐) [1957] 1977. *The Early Revolutionary Activities of Comrade Mao Tse-tung*. Translated by Anthony W. Sariti. Edited by James C. Hsiung. Introduction by Stuart Schram. White Plains, N. Y.
- Lin Yutang (林语堂) [1931] 1969a. "The Metropolitan Village of Nanking". In T'ang Leang-li, ed., *China's Own Critics: A Selection of Essays*. With commentaries by Wang Ching-wei. New York.
- [1931] 1969b. "The Model Bandit". In T'ang Leang-li, ed., *China's Own Critics: A Selection of Essays*. With commentaries by Wang Ching-wei. New York.
- 1939. *My Country and My People*. Rev. ed. London.
- Li Ruzhen (李汝珍) 1965. *Flowers in the Mirror* (《镜花缘》). Trans-

- lated by Lin Tai-yi (林太乙) . Berkeley, Calif.
- Liu Zhih-po to [Hong Kong Postmaster General] Ross. 1921. Foreign Office 371—6649 (44—49) .
- 吕芳上 1992,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Guomindang Radicalization in the Early 1920s” . *Chinese in History* 26. no. 1.
- Luk, Michael. 1990. *The Origins of Chinese Bolshevism: An Ideology in the Making, 1920—1928*. Hong Kong.
- Lukács, Gyorgy. 1962. *The Meaning of Contemporary Realism*. Translated by John and Necke Mander. London.
- 1971. *The Theory of Novel: A Historico-Philosophical Essay on the Forms of Great Epic Literature*. Translated by Anna Bostock. Cambridge, Mass.
- Lutz, Jessie Gregory. 1988. *Chinese Politics and Christian Missions: The Anti-Christian Movements of 1920—1928*. Notre Dame, Ind.
- 鲁迅 [1922] 1980. “Preface to *Call to Arms*” (《〈呐喊〉自序》) . In Lu Xun 1980; vol. 1.
- [1923] 1980a. “The True Story of Ah Q” (《阿 Q 正传》) . In Lu Xun 1980; vol. 1.
- [1923] 1980b. “What Happens After Nora Leaves Home? —Talk at the Beijing Normal Women’s College, 26 December 1923” (《娜拉走后怎样?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 . In Lu Xun 1980; vol. 2.
- [1925] 1980. “Regret for the Past” (《过去的遗憾》) . In Lu Xun 1980; vol. 1.
- [1927] 1980. “Anxious Thoughts on ‘Natural Breasts’ ” (《“自然胸脯”的焦虑思想》) . In Lu Xun 1980; vol. 2.

- [1931] 1980. “A Glance at Shanghai Literature: A Talk Given to the Social Science Study Group on August 12, 1931” (《上海文艺之一瞥——八月十二日在社会科学研究会讲》). In Lu Xun 1980; vol. 3.
- [1934] 1980. “Napoleon and Jenner” (《拿破仑和隋那》). In Lu Xun 1980; vol. 4.
- [1936] 1980. “For Future Reference (3)” (《立此存照 (3)》). In Lu Xun 1980; vol. 4.
- 1980. *Selected Works* (《鲁迅选集》), Translated by Yang Xianyi (杨宪益) and Gladys Yang. 3d ed. 4vols. Beijing.
- McDonald, Angus W., Jr. 1978. *The Urban Origins of Rural Revolution: Elites and the Masses in Hunan Province, China, 1911—1927*. Berkeley, Calif.
- McDougall, Bonnie S. 1977. “The Impact of Western Literary Trends”. In Merle S. Goldma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Cambridge, Mass.
- 1980. *Mao Zedong's “Talks at the Yan'an Conference on Literature and Art”: A Translation of the 1943 Text with Commentary*. Ann Arbor.
- MacFarquhar, Rodney. 1953. “The Whampoa Military Academy”. *Papers on China* 9.
- Mackerras, Colin. 1989. *Western Images of China*. Hong Kong.
- McLellan, David. 1983. “Politics”. In David McLellan, ed., *Marx: The First Hundred Years*. Oxford.
- Magruder. 1921. Letter from Major Magruder, assistant military attaché to the Peking legation, Hong Kong, to the military attaché, Peking.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3338, Enclosure 4. 27 January.

Ma King-Sheuk. 1974. "A Study of Hsin Ch'ing-nien (New Youth) Magazine, 1915—1926". Ph. D. diss., London University.

毛泽东：

- [1] "China is Poor and Blank" 《中国一穷二白》. [1958] 1969. In Schram 1969.
- [2] "For the Germans, the Painful Signing of the Treaty" (《德意志人沉痛的签约》). [1919] 1992. In Schram 1992.
- [3] "The Founding and Progress of the 'Strengthen Learning Society'" (《健学会之成立及进行》). [1919] 1992. In Schram 1992.
- [7] "Let Us Transform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People" (让我们改造群众的意识). [1958] 1969. In Schram 1969.
- [8] "Letter to Li Jinxi" 《致黎锦熙信》. [1917] 1992. In Schram 1992.
- [9]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1: *The Pre-Marxist Period, 1912—1920*. 1992. Edited by Stuart R. Schram. Armonk.
- [11] "On the Mass Line" (《论群众路线》). [1944] 1969. In Schram 1969.
- [12] "On the New Stage" (《论新阶段》). [1938] 1969. In Schram 1969.
- [13] *Report from Xunwu* (《寻乌调查》). [1930] 1990.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oger R. Thompson. Stanford, Calif.
- [18] "A Study of Physical Education" (《体育之研究》). [1917] 1969. In Schram 1969.

March, Andrew L. 1974. *The Idea of China: Myth and Theory in Geographic Thought*. Melbourne.

Marcuse, Herbert. 1960. *Reason and Revolution: Hegel and the Rise of So-*

- cial Theory*. 2d ed. New York.
- Marks, Robert B. 1977. "The World Can Change" . *Modern China* 3, no. 1.
- 1984. *Rural Revolution in South China: Peasants and the Making of History in Haifeng County, 1570—1930*. Madison, Wis.
- Marx, Karl (马克思) [1852] 1968. "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Selected Works*. Moscow.
- [1853] 1969a.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 In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 [1853] 1969b. "The Future Results of the British Rule in India" . In d'Encausse and Schram 1969.
- Marx, Karl, and Frederick Engels. [1848] 1976.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 (《共产党宣言》) . In Karl Marx and Frederick Engels, *Collected Works*, 46 vols. , vol. 6. London.
- Masson, David, ed. 1897. *The Collected Writings of Thomas De Quincey*. 14 vols. London.
- Mast, Herman, III. 1970.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Tai Chi-t'ao from 1891 to 1928" . Ph. D. diss.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 Mast, Herman, III, and William G. Saywell. 1974. "Revolution out of Tradition: The Political Ideology of Tai Chi-t'ao"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4, no. 1.
- Maugham, W. Somerset. 1955. "The Philosopher" . In W. Somerset Maugham, *The Travel Books of W. Somerset Maugham*. Melbourne.
- Mehlman, Jeffrey. 1977. *Revolution and Repetition: Marx/Hugo/Balzac*.

- Berkeley, Calif.
- Meisner, Maurice. 1974. *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 New York.
- 1982. *Marxism, Maoism and Utopianism: Eight Essays*. Madison, Wis.
- Meissner, Werner. 1990.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in China*. Stanford, Calif.
- Meng, Yue. 1993. "Female Images and National Myth" . In Tani E. Barlow, ed. , *Gender Politics in Modern China*. Durham, N. C.
- Mercier, Louis-Sebastien. 1795. *Memoirs of the Year 2500*. Translated by W. Hooper. Philadelphia.
- Min Tu-ki (闵斗基) 1989. *National Polity and Local Pow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e Imperial China*.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Philip A. Kuhn and Timothy Brook. Cambridge, Mass.
- Montrose, Louise. 1991. "The Work of Gender in the Discourse of Discovery" . *Representations* 33.
- Morse, Hosea Ballou. 1910—1918.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3 vols. London.
- Mosher, Steven W. 1990. *China Misperceived: American Illusions and Chinese Reality*. New York.
- Mosse, George L. 1973. "Mass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Liturgy of Nationalism" . In Eugene Kamenda, ed. , *Nationalism: The Nature and Evolution of an Idea*. Canberra.
- Mote, F. W. 1977. "The Transformation of Nanking, 1350—1400" . In G. William Skinner, ed. ,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Stanford, Calif.
- Mumford, Lewis. 1938. *The Culture of Cities*. New York.

- Munck, Ronaldo. 1986. *The Difficult Dialogue: Marxism and nationalism*. London.
- Munro, Donald J. 1977. *The Concept of Man in Contemporary China*. Berkeley, Calif.
- Myers. 1921. Consul Myers (Swatow) to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4079. 1 September.
- Myers, Ramon H. 1991. "How Did the Modern Chinese Economy Develop?"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no. 3.
- Najita, Tetsuo, and H. D. Harootunian. 1988. "Japanese Revolt Against the West: Political and Cultural Criticism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 In Peter Duus, ed.,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Japan*, vol. 6. Cambridge.
- Naquin, Susan (韩书瑞), and Evelyn Rawski. 1987. *Chinese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Haven, Conn.
- Narramore, Terry. 1989.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 Daily Press: The Case of *Shenbao*, 1927—1934" . In Fitzgerald 1989.
- Nathan, Andrew J. (黎安友) 1976.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New York.
- 1985. *Chinese Democracy*. New York.
- Nehru, Jawaharlal. [1945] 1956. *The Discovery of India*. Calcutta.
- Nipperday, Thomas. 1983. "In Search of Identity: Romantic Nationalism, Its Intellectual, Political and Social Background" . In J. C. Eade, ed., *Romantic Nationalism in Europe*. Canberra.
- Nozawa Yutaka. 1971. *Son Bun to Chūgoku kakumei* (Sun Yatsen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 Tokyo.
- ed. 1974. *Chūgoku kokumin kakumei shi no kenkyū* (A study of the

- hist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 Tokyo.
- Nozawa Yutaka and Tanaka Masatoshi, eds. 1978. *Kōza Chūgoku kin gen dai shi* (A series of studies in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history) . 7 vols. Tokyo.
- O'Brien, Connor Cruise. 1988. *God Land: Reflections on Religion and Nationalism*. Cambridge, Mass.
- Olenik, John Kenneth. 1973. "Left Wing Radicalism in the Kuomintang: Teng Yen-ta and the Genesis of the Third Party Movement in China, 1924—1931" . Ph. D. diss. , Cornell University.
- Ono, Kazuko. 1989. *Chinese Women in a Century of Revolution*. Translated by Joshua Fogel and others. Stanford, Calif.
- Patai, Daphne, ed. 1988. *Looking Backward, 1888—1888: Essays on Edward Bellamy*. Amherst.
- Patterson, Orlando. 1991. *Freedom*. Vol. 1; *Freedom in the Making of Western Culture*. New York.
- Peck, Graham. 1967. *Two Kinds of Time*. 2d ed. Boston.
- Peck, James. 1971. "The Roots of Rhetoric: The Professional Ideology of America's China Watchers" . In Edward Friedman and Mark Selden, eds. , *America's Asia: Dissenting Essays on Asian-American Relations*. New York.
- Petrey, Sandy. 1988a. *Realism and Revolution*. Ithaca, N. Y.
- 1988b. "The Reality of Representation" . *Critical Inquiry* 14.
- Peyrefitte, Alain. 1993. *The Collision of Two Civilizations: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 in 1792—1794*. London.
- Pitkin, Hanna Fenichel. 1967. *The Concept of Representation*. Berkeley, Calif.

- Plaks, Andrew. 1976. *Allegory and Archetype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Princeton.
- Polan, A. J. 1984. *Lenin and the End of Politics*. London.
- Polsby, Nelson W. 1959. "The Sociology of Community Power: A Reassessment" . *Social Forces* 37.
- Powell, John B. 1945. *My Twenty-Five Years in China*. New York.
- Price, Jane L. 1976. *Cadres, Commanders and Commissars: The Training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Leadership, 1920—1945*. Boulder, Colo.
- Pusey, James. 1983.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 Cambridge, Mass.
- Pye, Lucian W. 1968. *The Spirit of Chinese Politics: A Psychocultural Study of the Authority Crisis in Political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ss.
- 1972. *China: An Introduction*. Boston.
- Rankin, Mary. 1986.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Calif.
- Rawski, Evelyn S. 1991. "Research Themes in Ming-Qing Socioeconomic History—The State of the Field"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0, no. 1.
- Rawski, Thomas G. 1989. *Economic Growth in Prewar China*. Berkeley, Calif.
- Rickard, Jane. 1990. "Mao Dun's 'Disillusionment'" . Honors diss.,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 Rigby, Richard. 1980. *The May 30 Movement: Events and Themes*. Canberra.
- Ritter, Joachim. 1982. *Hegel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Dien Winfield. Cambridge, Mass.
- Ropp, Paul S. 1981. *Dissent in Early Modern China: Ju-lin wai-shi and*

Ch'ing Social Criticism. Ann Arbor.

Rorty, Richard. 1989. *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 Cambridge.

Rowe, William T. (羅威廉) 1989. *Hankow: 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 City*. Stanford, Calif.

——1990.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 *Modern China* 16, no. 3.

——1993. “The Problem of ‘Civil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Modern China* 19, no. 2.

Rule, Paul. 1988. “China: The Gilding and Tarnishing of the Image” . Unpublished paper, Asian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ia Biennial Conference. Canberra.

“Rumblings Before the Storm” . 1926. *Hainan Newsletter*, Fall.

Sadoul, Georges. 1972. *Dictionary of Films*. Translated by Peter Morris. Berkeley, Calif.

Said, Edward. 1978. *Orientalism*. New York.

Sakai, Kosen. 1904. *Hyakunengo no Shakai* (Society one hundred years from now) . Tokyo.

Sansom, Brenda. 1988. “*Minsheng* (民生) and National Liberation: Socialist Theory in the Guomindang, 1919—1931” . Ph. D. diss. ,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San Tzu Ching (《三字经》) . 1964. Translated by Herbert A. Giles. Taipei.

Schiffrin, Harold Z. (史扶邻) 1970. *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Revolution*. Berkeley, Calif.

——1980. *Sun Yat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oston.

Schneider, Laurence A. 1971.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 Berkeley, Calif.

- Schoppa, R. Keith. 1982. *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 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 Schorske, Carl E. 1980. *Fin-de-Siècle Vienna: Politics and Culture*. New York.
- Schram, Stuart R. 1967. *Mao Tse-tung*. Rev. ed. Harmondsworth.
- ed. 1969. *The Political Thought of Mao Tse-tung*. Rev. and enlarged ed. New York.
- 1984. “Classes Old and New in Mao Zedong’s Thought, 1949—1976”. In James L. Watson, 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ary China*. Cambridge.
- 1989. *The Thought of Mao Tse-tung*. Cambridge.
- ed. 1992. *Mao’s Road to Power: Revolutionary Writings, 1912—1949*. Vol. 1: *The Pre-Marxist Period, 1912—1920*. Armonk.
- Schurmann, H. Franz. 1968.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Rev. ed. Berkeley, Calif.
- Schwarcz, Vera. 1975. “Ibsen’s Nora: The Promise and the Trap”.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7, no. 1.
- Seth, Sanjay. 1989. “Marxism and the Question of Nationalism in a Colonial Context: The Case of British India”. Ph. D. diss.,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 1992. “National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History’: Nehru’s Search for India”. Unpublished paper. La Trobe University, Melbourne.
- Shimada, Kenji. 1990. *Pioneer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Zhang Binglin and Confucianism*. Translated by Joshua Fogel. Stanford, Calif.
- Shirley, James. 1965. “Control of the Kuomintang After Sun Yatsen’s

Death” .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25 , no. 1.

Shun, Kwong-loi. 1991. “The Self in Confucian Ethics” . *Journal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

Siu, Helen F. (萧凤霞) 1990. *Furrows: Peasants, Intellectuals and the State*. Stanford, Calif.

Smith, Arthur H. (明恩溥) 1894.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15th ed. New York.

Sneevliet, Henk. 见孙铎。

Spence, Jonathan D. (史景迁) 1982. *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volution, 1895—1980*. Harmondsworth.

——1988. *The Question of Hu*. New York.

——1990.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New York.

Stanley, John. 1982. *Sociology of Virtue: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ies of Georges Sorrel*. Berkeley, Calif.

Stremski, Richard. 1979. *The Shaping of British Policy During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China*. Taipei.

孙中山:

[27] “Philosophy of Sun Yatsen. Doc. 64; Sun Yat-sen’s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1919” . In Teng and Fairbank 1979.

[31] *San Min Chu I,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1924] 1943.

Translated by Frank W. Price. Edited by L. T. Chen. chungking.

Swatow. 1921. Swatow to Washington.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4211. 20 December.

Swisher, Earl. 1977. *Canton in Revolution: The Collected Papers of Earl Swisher, 1925—1928*. Edited by Kenneth W. Rea. Boulder, Colo.

T’ang Leang-li, ed. [1931] 1969. *China’s Own Critics: A Selection of*

- Essays*. With commentaries by Wang Ching-wei. New York.
- 1936, *The New Social Order in China*. Shanghai.
- 譚嗣同 1984, *An Exposition of Benevolence: The Jen-Hsiueh of Tan Ssu-t'ung*. Translated by Chan Sin-wai. Hong Kong.
- Taylor, A. J. P. 1948. *The Hapsburg Monarchy 1809—1918*. London.
- Taylor, W. C. 1835. "On the Present State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Oriental Literature, Viewed in Connexion with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Read 6th December, 1834".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2.
- Teng, Ssu-yü (邓嗣禹), and John K. Fairbank (费正清). 1979. *China's Response to the West: A Documentary Survey, 1839—1923*. 2d ed. Cambridge, Mass.
- Theroux, Paul. 1972. *V. S. Naipaul: An Introduction to His Work*. New York.
- "Theses on the Agrarian Question". 1971. In Degras 1971; vol. 1.
- "Theses on the Colonial Question". 1971. In Degras 1971; vol. 1.
- "Theses on the Eastern Question". 1971. In Degras 1971; vol. 1.
- Thompson E. P. 1963.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London.
- Thomson, James C., Jr. 1969. *While China Faced West: American Reformers in Nationalist China, 1928—1937*. Cambridge, Mass.
- Tochigi Toshio. 1974. "Kokumin kakumei ki no kanton seifu" (The Guangdong government in the period of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In Nozawa Yukata 1974.
- 1978. "Kanton kokumin seifu to mindan" (The Guangdong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rural militia). In Nozawa Yukata and Tanaka Masatoshi 1978; vol. 5.

- Todorov, Tzvetan. 1984. *The Conquest of America*. New York.
- Tong, Hollington K. 1953. *Chiang Kai-shek*. Taipei.
- Tsao, W. Y. 1947. *The Constitutional Structure of Modern China*. Melbourne.
- Tuchman, Barbara W. 1970. *Stilwell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in China, 1911—1945*. New York.
- Turner, Cheryl. 1992. *Living by the Pen: Women Writer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 Ungar, Esta. 1989. "The Nationalists and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Vietnam, 1927" . In Fitzgerald 1989.
- Vishnyakova-Akimova, Vera. 1971. *Two Years in Revolutionary China, 1925—1927*. Translated by Steven I. Levine. Cambridge.
- Vogel, Ezra. 1969. *Canton Under Communism: Programs and Politics in a Provincial Capital, 1949—1968*. New York.
- 1989.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Cambridge, Mass.
- Vorontsov, V. B. 1989. *Sudba kitaiskogo Bonaparta* (The fate of a Chinese Bonaparte) . Moscow.
- Wagar, W. Warren. 1979. "The Steel-Gray Saviour: Technocracy as Utopia and Ideology" . *Alternative Futures: The Journal of Utopian Studies* 2, no. 2.
- 1988. "Dreams of Reason: Bellamy, Wells and the Positive Utopia" . In Patai 1988.
- Wakeman, Frederic (魏斐德) . 1973. *History and Will: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ao Tse-tung's Thought*. Berkeley, Calif.
- Watson, James L. 1993. "Rites or Belief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s. ,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N. Y.
- Whitewright, Rev. J. S. 1893. “Museums” . In *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 Widmer, Ellen. 1977. “Qu Qiubai and Russian Literature” . In Goldman 1977.
- Wilbur, C. Martin (韦慕庭) . 1976. *Sun Yat-sen; F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 1983. “The Nationalist Revolution: From Canton to Nanking, 1923—1928” .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ited by John K. Fairbank, vol. 12, pt. 1. Cambridge.
- Wilbur, C. Martin, and Julie Lien-ying How, eds. 1956. *Documents on Communism, Nationalism and Soviet Advisers in China*. New York.
- Williams, Raymond. 1983. *Keywords*. London.
- Willoughby, W. W. 1920. *Foreign Rights and Interests in China*. 2 vols. Baltimore.
- Witke, Roxane. 1967. “Mao Tse-tung, Women and Suicide in the May Fourth Era ” . *China Quarterly* 31.
- Wolfe, Patrick. 1991. “On Being Woken Up: The Dreamtime in Anthropology and in Australian Settler Culture” .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3, no. 2.
- Wong, John C. Y. 1972. *Chin Sheng-t'an*. New York.
- Wood, Frances. 1985. *Chinese Illustration*. London.
- Woodhead, H. G. W. 1925. *The Truth about the Chinese Republic*. London.
- Wright, Mary C. (芮玛丽) ed. 1968. *China in Revolution: The First Phase, 1900—1913*. New Haven, Conn.

- Wright, Tim. 1989. "Coping with the World Depressio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s Relations with Industry and Commerce, 1932—1936". In Fitzgerald 1989.
- Yamada Tatsuo. 1980. *Chūgokū kokumin to saha no kenkyū* (Research into the left w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Tokyo.
- Ye Xiaqing (叶晓青) 1992. "Shanghai Before Nationalism". *Eastern Asian History* 3.
- Yip Ka-che. 1980. *Religion, Nationalism and Chinese Students: The Anti-Cristian Movement of 1922—1927*. Bellingham.
- Yu, George T. 1966. *Party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The Kuomintang, 1912—1924*. Berkeley, Calif.
- 郁达夫 1984a, "Flight". In Yu Dafu, *Nights of Spring Fever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lated by Gladys Yang et. al. Beijing.
- 1984b, *Nights of Spring Fever and Other Writings*. Translated by Gladys Yang et. al. Beijing.
- Zamyatin, Yevgeny. [1924] 1972. *We*. Translated by Bernard Guerney. Harmondsworth.
- Zarrow, Peter. 1990. *Anarchism and Chinese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 Zhang Longxi. 1988. "The Myth of the Other; China in the Eyes of the West". *Critical Inquiry* 15.

索引

作者按：1. 本索引当中，数字后面带“f.”，表示紧接着的一页中另有一个出处；2. 数字后面带“ff.”，表示紧接着的两页中另有一个出处；3. 连续两页或者更多页数讨论同一问题，用跨页来表示，如“57—59”；4. 一连串相关的但又不是连续的页码，用 Passim（拉丁文“处处”之意）来表示；5. 页码后面带 n. 再接数字，表示在第几页的第几条注释中。

译者按：1. 原索引是按英文字母顺序排列的，现改为按中文顺序排列；2. 原书注释系把各章尾注统一放在正文之后，现一律改为脚注，加上书中加上了一些“译者按”一类的脚注，打乱了原来顺序，现在将原索引中涉及到的尾注部分去除；3. 现索引用电脑自动排序，分三部分：引号部分、书名号部分、一般部分，三部分均以拼音顺序排列；4. 本书正文标有原著页码，本索引仍以原著页码为准。

“打倒帝国主义”运动，103

“打倒军阀”运动，103

“森图里昂”号，112

“天下为公”，7，352 n. 14

“文革”，15f.

“自杀公会”，216

- 《阿丽思奇遇记》(卡罗尔), 131—132
- 《阿丽思中国游记》(沈), 131—132, 138
- 《爱》, 337
- 《爱国心与自觉心》, 89
- 《北华捷报》, 142—143
- 《北京晨报》, 222
- 北京《民国日报》, 234
-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 37
- 《沉睡者醒来》, 59
- 《冲出云围的月亮》, 95
- 《冲出云围的月亮》, 95
- 《大同书》, 68—69, 73—75, 81, 156, 160f., 324
- 《当沉睡者醒来》, 见《沉睡者醒来》
- 《帝国主义研究》, 40
- 东江《民国日报》, 281, 283, 312
- 东莞《民国日报》, 281, 283
- 《独立》, 225—226
- 《二马》, 125
- 《飞》, 97
- 《妇女旬刊》, 285
- 《妇女之声》, 284—285
- 《革命》, 25, 251
- 《革命导报》, 241
- 《格列佛游记》, 130
- 《共产党宣言》, 317
- 《狗》, 123—125
- 《孤军》, 273
- 《广东青年》, 286, 293
- 《广东杂志》, 见《政治周刊》
- 《广州国民新闻》, 279—280
- 广州《民国日报》, 212, 215—217, 232, 236, 277, 279
- 《国风日报》, 201
- 《国家与革命》, 76
- 《国民党的群众化和群众的国民党化》, 174
- 《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 226
- 《国民新闻》, 陈秋霖社论专栏, 232—233
- 《海南日报》, 283
- 《黑暗之心》, 120
- 《红旗》, 19
- 《幻灭》, 96
- 《甲寅周刊》, 30
- 《建国大纲》, 200, 264
- 《建国方略》, 264
- 《建设》, 4, 194, 208f., 267
- 江门《民国日报》, 280—282
- 《接受总理遗嘱宣言》, 256—258
- 《解放日报》, 101
- 《镜花缘》, 130
- 《觉悟》, 31, 174, 194, 208—211 passim, 242, 273, 335
- 《觉醒与行动》(巴金), 92
- 《觉邨》, 31
- 《军人精神教育》, 200
- 《老残游记》, 61—62

- 《礼记》，7，60
 两阳《民国日报》，281
 岭东《民国日报》，281，283
 《鲁滨逊·克鲁索》，113—114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79—80，324f.，333
 《论冒险进取》，117
 《论女学》，134
 《马关条约》，68
 《猫城记》，130f.
 《每周评论》，142
 《民国日报》报刊网络，28，280—283
 《民觉》，31，192
 《民权初步》，264，268
 《民智报》，201
 《民族和民族主义》，315
 《墨西哥征服史》，113
 《倪焕之》，337
 《孽海花》，61—62，130
 《农民运动》，288
 《娜拉走后怎样？》，102
 《偶然、讽刺与团结》，154
 钦廉《民国日报》，280—281
 《青年周刊》，286
 琼崖《民国日报》，281—282
 《人民的信任》，375
 《人民之星》，305
 《仁学》，60
 《三字经》，18
 《伤逝》，101—102
 《商民运动》，287
 《上海快讯》，371
 《少年中国晨报》，228，241
 《申报》，208
 《时事新报》，190
 《实践论》，341—342
 《蚀》（茅盾），96
 《蚀》，337
 《水浒传》，60
 《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321
 《泰晤士报》，143
 《童子军》，286
 《玩偶之家》，99，102，337
 《万国公报》，59
 《我们为何要打倒陈炯明？》311
 《乌有乡的消息》，59
 《吾国吾民》，128，140f.
 《五权宪法》，198，264，330
 《现实主义的限度》，336
 《香江晨报》，241，244
 《向导周报》，178，249，251，311，322—323
 《向后看》，58—61
 《新潮》，209
 《新妇女》，285
 《新年梦》，61，75
 《新青年》，99，209，213
 《新商民》，288
 《新闻报》，232

- 《星期评论》，194，208—210，267
《醒农》（北京农学专门学校），31
《醒农》（平原县农民合作社），31
《醒狮》，30
《醒世周刊》，31
《印度的发现》，127
《怎么办？》，288，325—327
《札记》，58
《政治周报》，213，238，241，
250，253f.，279
《中国的国际发展》，122
《中国国民党周刊》，220，382
《中国积弱溯源论》，118ff.
《中国军人》，393
《中国农民》，288
《中国女报》，31
《中国青年》，30，311
《中国青年党》，30
《中国人的社会生活》，129
《中国人的性格》（明恩溥），
129，145f.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自治能力？》，174
《中国人怎么了？》，140—141，
144，368
《中国学生》，393
《中国作家的浪漫一代》，95
《中华全国风俗志》，129f.
《中华新报》，208
中山《民国日报》，281
《中外纪闻》，37
《自传》（顾），98
《自觉月刊》，31
《字林西报》，120，142—143
《2440》，58
《2500年的回忆》，见2440年
阿道夫·巴斯蒂安，41f.
阿里夫·德里克，336
阿美士德，114
埃德温·J·杜克斯，115
爱德华·贝拉米，58—61 *passim*，75
爱德华·卡彭特，58
爱国主义，88—92，175
安德鲁·普拉克斯，333
安徽，178，201
安托里·弗朗斯，58
奥布赖恩，46
澳大利亚，144
巴尔扎克，333
巴金，92，123—126，138，337
巴黎，中国学生在……，58
罢工，205，221—223，231，247，
282，287，291
白鲁恂，5，97
保安，共产党中央所在地，101
报纸，72，201，207—212，249，
277，279—283
抱素（茅盾《幻灭》中的角色），96
鲍罗廷，170，177—178，220，
224，251f.

- 北伐, 97, 152, 199f., 231, 287, 299—301, 309
- 北伐, 在现实主义小说中, 97
- 北江石矿, 270
- 北京, 4, 25f., 53, 56, 165, 190, 197, 200
- 北京大学, 222
- 北京方言, 158。亦见方言, 语言改革
- 北京农学专门学校, 31
- 北京孙文学会, 241
- 北京政府, 106, 182, 196—203 *passim*, 243
- 北美, ……代表, 在国民党一大, 186—187
- 贝塞尔 (遭中国官员袭击的澳大利亚人), 144
- 本·安德森, 3, 49f., 315f.
- 本部特设办事处, 广州, 198—201
- 彼得·查罗, 76, 78
- 辫子, 见发型, 56
- 标点, 157。亦见语言改革, 文字
- 波斯帝国, 111
- 博罗县, 310f.
- 博物馆, 51—55, 59
- 不列颠, 31, 41—48 *passim*, 86, 106, 109—115, 119, 131—132, 154, 170, 319, 354 n. 7。亦见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海军
- 不平等条约, 26, 106, 110
- 布尔什维克主义, 31, 39, 327。亦见共产党, 共产党人, 列宁主义, 马列主义
- 布封, 41f.
- 布莱·哈特, 115
- 布鲁斯, 143
- 部队, 81, 236, 290—313
- 财政改良办公室, 惠阳, 312
- 蔡和森, 149, 153, 161—162, 323, 328
- 蔡元培, 61, 75
- 餐馆茶楼工会, 282
- 曹锟, 总统, 142—143, 223
- 查尔斯·登拜, 133
- 查理·弗雷尔, 58
- 缠足, 36, 55, 112, 134, 193
- 长篇小说, 58—62
- 长沙, 56, 2, 01, 204—205
- 朝鲜人, 90
- 潮梅, 158—159, 306, 309
- 沉睡, 41—44, 58, 94, 323—324, 327
- 陈白虚, 204
- 陈东, 251
- 陈独秀, 89f., 152—153, 160—162, 189, 205, 218, 224, 268, 320—323, 332—336 *passim*, 362。亦见共产党, 国民党中的共产党人
- 陈孚木, 232, 236, 244

陈公博, 248, 267, 298—299

陈济棠, 15, 149, 158

陈炯明, 147—152, 158, 163, 178—182 *passim*, 198—200 *passim*, 231f., 268, 309—311, 348, 371 n. 11, 袭击孙中山, 148, 182, 202, 军事运动反对, 149, 178, 231, 310f.。亦见联省自治运动, 自由主义, 地方自治, 军阀

陈克文, 247

陈铭枢, 308f.

陈其美, 381

陈秋霖, 231—233, 241

陈日光, 282

陈上尉, 144

陈潭秋, 388 n. 116

陈延年, 238

陈扬煊, 232—233

程璧光, 181

程潜, 295—297

重组讨论会, 204, 209

传教士, 14, 36—38, 51—52, 54, 59, 115, 121, 141

崔文成, 242

村庄, 136, 139

达尔文, 41—42, 47

达米安·格兰特, 332

打嗝, 见礼节, 卫生

大夫, 士……, 109

大甲, 35

大理院, 189

大连, 49

大乘佛教, 见佛教

大同地区, 53

大同主义, 86—87, 93

大众剧社, 285

代表, 63, 172—173, 178, 的形式, 315—348, 政治的, 203—204, 335, 315—332, 324, 文学的, 335, 337

戴季陶, 19, 35, 42, 187, 218, 224—234, 236—237, 242, 258, 295, 311, 321—323, 331—336 *passim*, 372—376 *passim*, ……的生涯, 224—227 *passim*, 233, 237, 245, 263, 268, 尝试自杀, 226

丹尼尔·笛福, 113—114

党本部, 广东特设办事处, 见本部驻粤特设办事处

党本部, 上海, 见国民党本部, 上海

党部, 广东, 219—220

党代表, 军队的, 300ff.

党代表, 军事的, 300

党国, 185—188, 348

党务处, 219

党务监察委员会, 241

荡口, 71

- 盗版, 112
 德国, 4, 63, 170, 191
 德皇, 63
 邓本殷, 78, 270, 305, 309
 邓尔麟, 71
 邓家彦, 198
 邓悌, 302
 邓演达, 302
 邓颖超, 285
 邓泽如, 219—220, 223, 242, 246, 267
 狄, 121
 抵制, 民族主义者, 其他国家的, 154
 抵制, 省港, 见省港大罢工和抵制
 地方党部, 307
 地方官员, 265—266, 308—309。
 亦见地方政府, 地方自治
 地方行政官, 见地方官员
 地方行政人员养成所, 167
 地方行政长官, 见地方政府, 地方自治
 地方行政咨议室, 266。亦见地方官员
 地方政府, 151—152, 162, 166, 199, 308—310。亦见地方官员, 地方自治
 地方主义, 在广东, 15
 地方自治, 148, 150, 162—167 *passim*, 179。亦见选举, 联省自治运动, 地方政府
 地理学, ……的无知, 127
 地图, 127, 368
 地主, 37, 176, 178。亦见民团
 地主阶级, 172, 255
 帝国图书馆, 129
 帝国主义, 86, 94, 110—116 *passim*, 172, 176f., 191, 223, 242, 348; 文化 …… , 104, 110, 116, 211
 帝国主义, 反……, 见反帝
 第二次北伐军, 295
 第一次东征军, 搬运工, 293
 第一次对于时局的主张 (共产党), 172
 滇军, 236, 295—298
 电影院, 126, 131, 145—146
 定陵, 100—101
 东方, 见欧洲, 列强
 东方的时间感, 见时间感
 东方研究, 的兴起, 111
 东方主义, 107, 115
 东京, 25
 东印度公司, 110
 东征, 277—278, 282, 292f., 297, 303—307 *passim*
 董婉珍, 97
 董仲舒, 69
 董子光, 159
 动物, 作为种族绰号, 119—123, 131, 210
 独裁主义, 338, 341

- 杜利特, 129
- 段祺瑞, 总统, 30f., 182
- 对列强的战败, 48。亦见军事能力
- 俄国, 见苏联
- 俄国革命, 175
- 恩格斯, 317, 333
- 二次革命, 181
- 二战, 154
- 发现, 民族主义者, 见探索
- 发展, 相对于觉醒, 45
- 法国, 44, 59; 革命, 5, 46; 的武装力量, 40, 48, 217, 248; 的殖民者群体, 119, 141—142
- 法制委员会, 267
- 法治, 国民党逾越, 189
- 发型, 56 — 57, 108, 193, 357
n. 120
- 凡尔赛会议, 4, 93, 106
- 反帝, 103—105, 168—169; 关于孙中山, 36, 49, 169—170
- 反共, 281—282, 301, 308; 国民党内, 226, 232f., 241—250 *passim*, 267f.
- 反袁军队, 182
- 范其务, 267, 281—284 *passim*
- 方言, 158—160。亦见语言改革, 文字
- 非常国会 (1917), 198, (1922), 203
- 非常国会, 广州, 227f.
- 肺结核, 37
- 风景, 72
- 风尚, 见时尚
- 风俗, 71, 129f.
- 封建主义, 94, 137, 152—160 *passim*, 164—173 *passim*, 179, 192, 207, 347
- 冯菊坡, 218, 231
- 冯自由, 249, 253
- 奉天战争, 240
- 奉系, 201
- 佛教, 60, 69, 262
- 弗朗西斯, 155
- 弗雷德里克·李, 14
- 弗洛伊德, 5
- 服饰, 23, 138。亦见时尚
- 符号对应, 330。亦见代表
- 妇女, 22, 132—134, 193; 的解放, 99—102, 284, 369。亦见中央妇女部, 市妇女部, 省妇女部, 妇女合作社, 妇女运动
- 妇女合作社, 25
- 妇女运动, 31, 37, 101—102, 284—285, 330。亦见中央妇女部, 市妇女部, 省妇女部, 妇女合作社
- 妇女运动讲习所, 284。亦见中央妇女部, 市妇女部, 省妇女部, 妇女合作社, 妇女运动
- 复旦大学, 228
- 傅斯年, 4, 54

- 改良派, 25, 59
- 加布利埃尔·乔丝波威西, 58
- 甘乃光, 238—239, 246—248, 260, 263, 278, 280, 309
- 钢笔, 见小玩意
- 高等警官学校, 263
- 高其风, 1—2, 4, 22, 27f., 32
- 哥伦布, 119, 126ff.
- 革命党人的想像, 32
- 革命工人协会, 232
- 革命纪念会, 233, 246
- 革命者, 25, 69, 81, 145—146, 154, 371
- 革命中的热情, 95—97
- 个人主义, 100, 193
- 各党部, 300—301, 304, 308
- 各族人民庆祝大会, 317
- 庚款, 270
- 工人, 190—191, 233, 247—248, 290, 311, 315, 323。亦见阶级, 阶级斗争, 罢工, 工人阶级
- 工人部, 中央……, 231, 276, 290
- 工人阶级, 79, 235, 315, 327。亦见阶级, 阶级斗争, 工人
- 工人运动, 189, 330
- 公共卫生, 见卫生
- 公共租界, 上海, 123, 141
- 公民资格, 87—89
- 共产党, 7, 166, 199, 230, 255, 与孙中山, 16, 175, 189, 203, 与封建主义, 152—153, 160—161, 与国民党, 176, 188f., 204, 242—244, 249ff.。亦见共产国际, 共产党人, 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 旗
- 共产党二大, 204
- 共产党杭州全会 (1922), 189
- 共产党人, 19—20, 231, 235, 286f., 290, 321, 336, 345—346。亦见共产党, 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
- 共产国际, 167ff., 170—176 *passim*, 189, 203—205, 220, 250f., 255, 294, 331; ……代表, 167, 176, 205, 220, 251, 294。亦见共产党, 苏联
- 共产主义, 128。亦见共产国际, 共产党, 共产党人, 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 列宁主义
- 共和政治家, 见国会议员
- 共青团, 272, 285
- 狗, 比喻性无能, 124—125
- 狗, 中国人等于……, 119, 123—126, 367。亦见殖民主义, 人种学, 种族主义
- 辜鸿铭, 108f., 138, 145
- 古斯塔夫·库贝, 332
- 古文经学, 64, 69
- 古应芬, 265, 267
- 鼓动, 列宁主义者的观点,

- 288f., 327f.
顾颉刚, 54f., 98, 135, 344, 369
关鹏, 201
关余事件, 170
官僚阶级, 166
光孝寺, 262—263。亦见课吏馆
光绪, 皇帝, 68
广东, 本部特设办事处, 见本部驻
 粤特设办事处
广东大学, 267—268, 270—272,
 281, 312
广东法科大学, 270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159, 270
广东国际问题研究会, 274
广东农业专门学校, 270
广东商民部, 288
广东省, 2, 7, 14—16, 56, 158—163
 passim, 167, 179ff., 262, 345
广东省教育会, 267
广东省执行委员会, 308
广西, 162f., 182, 198, 200, 桂
 军, 236, 295—298
广州, 12, 162, 177, 191—197
 passim, 218, 267, 278f., 304
广州非常国会, 31, 227f.
广州妇女协会, 284f.
广州美术学校, 277
广州旗人, 见满人
广州人口普查, 274f.
广州商人罢市, 见广州商团事件
广州商团事件, 224f., 287,
 319, 322
广州士敏土厂, 270
广州市公安局, 263
广州市医师公会, 274
广州市议会, 196
广州市政调查委员会, 241
桂林, 72, 199
郭沫若, 95, 343
国歌, 国民党人, 184。亦见歌
国歌, 民国的, 184。亦见歌
国会大厦(北京), 182, 249
国会议员, 203, 205—206,
 378ff.; 国民党人, 192—194,
 197, 227; 民国的, 182, 191—
 192, 340
国际妇女节, 101, 285
国际警察, 143
国际联络委员会, 244
国家, 76—84 *passim*, 89—91,
 340, 361
国家原理, 88
国家主义运动, 354 n. 20
国立广东大学, 见广东大学
国立中央博物院, 53—54
国民, 175
国民大会, 239
国民党, 2132—2135 *passim*, 79,
 167—169, 185f., 190—195 *pas-*
 sim, 206—207, 212, 219—228

- passim, 245, 254, 255; 和语言改革, 156—157; 与共产党人, 173, 175—176, 226, 244; 与毛泽东, 186—190 passim, 227, 233, 237, 239, 250, 252—253, 257—260 passim, 285—286; ……海外成员, 195, 228; 与代表, 203—204, 330, 318; 与教育, 268—270; 与妇女, 284。亦见中央干部会议, 中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监察委员会, 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 国民革命, 省执行委员会, 孙中山
- 国民党, 共产党人在内, 见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
- 国民党本部, 上海, 200, 205
- 国民党二大, 236f., 259, 288, 304
- 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 15, 139, 188, 218, 224, 237, 243—246 passim, 283。亦见共产党, 共产党人
- 国民党一大, 169—173 passim, 185—187, 216, 222, 276, 287, 295
- 国民党章程, 195—197
-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89, 213—220 passim, 233—238 passim, 241—245 passim, 249, 256—263 passim, 271, 283, 286, 291, 296f., 303
- 国民革命, 14, 23—26, 83, 96—97, 103—104, 122, 139, 148, 163—168 passim, 184; 作为社会革命的……, 15, 167, 31; 的语言, 153—155, 159—160
- 国民革命军, 178, 262, 283, 291f., 302—304
-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 296, 304
- 国民革命军第六军, 295—296
- 国民革命军第三军, 296, 304
- 国民革命军第四军, 296, 304—306, 308
- 国民革命军第五军, 296, 304
- 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293—297 passim, 304, 306, 395 n. 104。亦见蒋介石, 黄埔军
- 国民运动, 1, 21, 37f., 44, 136, 185, 248
- 国民政府, 26, 186
-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 240, 263, 298
- 国内的外国人, 320
- 国语, 见语言改革
- 国葬, 275
- 海关, 170
- 海军: 中华民国的, 181ff.; 英国的, 40, 47, 109—114 passim, 148, 217, 248, 319
- 海口, 281—282
- 海陆丰, 288, 309

- 海南岛, 179, 281—282, 307, 309
海南特别委员会, 282, 306
海阳县党部, 283
韩其武, 270
汉弗雷·戴维, 132f.
汉人, 55—56, 121—122, 180, 183
汉—宋学, 的流派, 34
汉学, 的流派 34
杭辛斋, 201
好莱坞, 见电影
何启, 85
何香凝, 2, 285
何应钦, 309
何震, 75
和平县, 310
河南, 53, 141, 军队, 297, 304
河源县, 310—311
荷尔南多·科特斯, 112
黑格尔, 42—45, 62—63, 79—80, 340—341。亦见黑格尔体系, 英雄
黑格尔体系, 5, 44。亦见黑格尔
红卫兵, 2, 23
胡德, 51
胡汉民, 88, 169, 197, 209, 248—252 *passim*, 324, 328
胡礼垣, 85
胡朴安, 129—130, 369
胡适, 99f., 152, 341, 357 n. 112
胡树森, 311
胡毅生, 387 n. 101
湖北, 198, 军队, 304
湖南, 162, 178, 291, 345, 军队, 295—296
虎, 30
护法运动, 192, 2—1, 379
花园, 51, 110, 112
华侨通讯社, 219—220
华盛顿, 63f.
华盛顿·欧文, 58
华盛顿特区, 106, 200
怀特莱, 51—52
环境设计, 49—50
皇帝, 作为觉醒的个人, 44
皇家学会, 47
皇家亚洲学会, 北华支部, 51, 111
皇家植物园, 伦敦, 110, 112
黄季陆, 比例代表制, 186ff., 271
黄金时代, 54
黄居素, 232
黄埔军, 295, 298—299
黄埔军校, 17, 227, 261, 273, 277, 282, 294—300, 学员镇压商团, 287, 319; 的成立, 294—295, 作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299, 303
黄浦江, 123
黄仁, 249
黄兴, ……旗, 181f.
惠阳县, 310—312
惠州区党务改组委员会, 310—312

- 惠州市, 281, 306, 309—311
 婚俗, 94, 160
 伙伴式婚姻, 94
 霍布森, 40
 鸡鸣社, 354 n. 23
 基督教, 14, 37—38, 52, 54, 104, 111, 115f., 128, 269。亦见传教士, 博物馆
 基督教青年会, 285
 吉尔勃, 11, 115, 128, 133—136, 140—145 *passim*, ……论妇女, 133
 极权主义, 6
 集团政治, 18, 174
 济南, 52
 纪律, 163, 175, 212ff., 240—247 *passim*, 251, 281, 293, 298, 307
 纪律部门, 241
 加州大学, 228
 家庭, 85, 94f.
 家族体系, 397f.
 监护, 由政府, 196—197。亦见训导型政治
 建设厅, 267
 建筑, 49。亦见环境设计
 江门, 282
 江苏, ……军阀, 223
 江西省, 时尚在……, 56
 蒋百里, 149
 蒋光慈, 95
 蒋介石, 63—66 *passim*, 105, 117—122 *passim*, 227—231 *passim*, 252, 260—261, 278—279, 290—304 *passim*, 319, 353, 和军校, 231, 261, 287, 299, 319; 和广州商人, 231, 287, 319; 改革党军, 290—293, 300—301, 303—304, 310
 蒋先云, 302
 教会期刊, 358
 教师, 191, 268—269
 教育, 174, 268, 334
 教育部, 53
 教育厅, 省级, 268f.
 阶级, 79f., 87, 161—162, 165, 255f., 315, 325, 345。亦见觉醒, 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 161f., 172, 176, 230, 247, 253—258 *passim*, 313—323 *passim*, 330, 347f.; 和民族主义, 162, 313, 317f., 322f., 347。亦见阶级
 节日, 274
 解放, 94, 叙事, 98—102, 妇女……, 132—134
 界, 71—73, 81
 今日广东人民应有之决心, 311
 今文经学, 63
 金圣叹, 60

- 金文清, 130
靳云鹏, 201
京汉总工会, 243
精神抑郁症, 92, 98
九大圣山, 72
九龙, 49
九龙, 抗英, 114
旧金山, 241
剧场, 宣传, 305
觉悟的官僚, 79—80
觉醒, 3—8 *passim*, 17, 21—25 *passim*, 30 — 49 *passim*, 60 — 63, 70f., 174f., 192, 235f., 242, 284, 312—319 *passim*, 327, 341, 358f., 363 n. 15; 民族……, 5, 8, 14, 40, 102, 273, 315, 317, 330, 346; 妇女……, 31, 284; 自我——, 43, 67—70 *passim*, 75, 88, 92f., 102, 123—125, 193; 在小说中, 60 — 62, 92, 99—103, 123—125, 338—339; 群众, 79, 98, 209—210, 236, 319, 325—327, 346 — 348; 性的……, 96; 阶级的……, 236, 242, 290, 346f.。亦见醒来的国民, 觉悟的官僚, 觉醒的自我, 意识, 梦寐, 先觉者, 沉睡
觉醒的自我, 20, 73, 77, 89, 92, 98。亦见觉醒
军队, 国民革命, 见国民革命军
军阀, 147, 153—154, 158, 168, 177—178, 223, 236, 241, 255, 309—310, 348; 与孙中山结盟, 32, 195—196, 198—199; 反对的运动, 103, 160, 162, 167—179 *passim*, 242, 311, 347; …… 军队, 166, 291—292, 301
军事能力, 107—109, 112, 116
军事征服, 196, 199, 279, 292f., 300—304
军事组织, 29—313
军校, 294, 296, 298—300
军政部, 296
军政府, 广州……, …… 的解散, 194
卡尔, 170
卡罗尔·格拉克, 21
凯特, 135—136
坎贝尔, 143
康德黎, 127, 147ff.
康广仁, 69
康拉德, 120
康有为, 34—35, 59, 63, 67—76 *passim*, 81—88 *passim*, 127, 155—156, 210, 316; …… 的神经崩溃, 67—68, 73
考茨基, 324
科学, 52, 58
克伦威尔, 64
客家, 148

- 课吏馆, 262, 264—267
 空军, 297
 孔德, 75
 会计讲习所, 263
 莱布尼兹, 109
 赖世璜, 149
 蓝色快车, 见临城劫车案
 郎醒石, 230
 浪漫之爱, 94—96
 浪漫主义, 335—339, 343—344
 劳动大学(上海), 76
 劳工组织, 广东, 235
 老舍, 112, 125—126, 130f., 138
 雷蒙德·威廉斯, 334
 礼节, 9—12, 104f., 364。亦见
 卫生
 礼貌, 见礼节, 卫生
 李, 士兵, 143
 李春涛, 281
 李大钊, 89f., 136, 160—161,
 175—176, 204—205, 336, 362
 李公慈, 244
 李汉胄, 174
 李济, 357 n. 112
 李笠农, 308f.
 李汝珍, 130
 李石曾, 339
 李提摩太, 59
 李维清, 123, 125
 李越廷, 286
 李子荣, 186
 李宗仁, 295
 理查德·兰迪斯, 298
 理查德·罗狄, 154
 理性, 见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 68, 75ff., 97, 111
 历史, 传记的, 98
 历史上的人, 86。亦见族性, 民族
 学, 种族, 种族主义
 历史学家, 33, 54, 98, 343—344
 立宪运动(清末), 78
 连平县, 310
 联邦主义, 见联省自治运动
 联合委员会, 238f.
 联省自治运动, 150—153, 160—
 167, 179。亦见选举, 地方政
 府, 地方自治
 廉州, 《民国日报》的流通, 281
 梁启超, 34, 37, 48f., 63—65,
 78—88 *passim*, 105—108 *pas-*
 sim, 117—123 *passim*, 134,
 156; 论中国人, 64, 81, 117—
 119, 138
 辽东半岛, 68
 廖仲恺, 88, 186, 231, 248,
 251—253, 274; 遇刺, 231,
 248, 321—322
 列奥·李, 95
 列宁, 65, 76, 171, 175, 317—
 318, 324—326。亦见列宁主义

列宁主义, 40, 137, 154, 171f.,
216, 288—289, 327, 338。亦见

列宁

列宁主义者, 76f.

列强, 106, 154, 170

林肯, 119

林乐知, 59

林森, 192f.

林语堂, 119, 128, 140—141, 208

林云陔, 218, 267

临城劫车案, 120, 141—146,
371。亦见土匪

临时参议院, 182, 189

临时政治宣传委员会, 225—226,
233—239 *passim*, 249

刘鹗, 61, 65

刘尔崧, 282

刘康侯, 302

刘庐隐, 188, 227—231, 241—
242, 321

刘师复(师复), 339

刘师培, 75

龙, 22, 62

龙川县, 307, 310—311

露西·阿德里希, 141f.

卢梭, 116

卢永祥, 223

鲁迅, 57, 65—66, 101—103,
145—146

陆皓东, 181

陆军讲武堂, 296—297

陆荣廷, 督军, 162—162, 199

路透社, 关于孙中山逝世的错误报
道, 26

路易—塞巴斯蒂安·莫赛尔, 58

路易斯·卡罗尔, 131—132

绿林叙事, 142

吕彦直, 1—2, 12, 27

乱, 70, 247—248

伦敦, 中国学生在……, 58

伦理, 7, 66—68 *passim*, 103,
105, 140

伦理冲突, 在广东, 158

罗宾汉传说, 142

罗汉, 281

罗马帝国, 111

罗绮园, 139, 289, 345—346, 393
n. 81

罗威廉, 206

马超俊, 218

马丁·路德, 119

马尔库塞, 340

马戛尔尼, 10—12, 40, 46—47,
51, 114, 133, 356

马格鲁德, 147, 149

马克思, 44, 79f., 90, 317, 324,
355。亦见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 5, 171, 229—230,
315—316, 325, 332, 341, 348。

亦见马克思, 马列主义

- 马克思主义者, 171, 315, 341
- 马列主义, 早期民族主义者的, 318, 347
- 马林, 167, 176, 189, 206, 294
- 马斯顿·安德森, 97, 336, 338
- 买办, 166f., 176, 255
- 满(族), 121
- 满人, 2, 180, 183—184
- 满洲里, 122
- 漫画, 29f.
- 毛里斯·梅斯纳, 320
- 毛式上衣, 23, 25。亦见中山装
- 毛泽东, 21, 23, 56, 63f., 136, 139, 186, 189—190, 229—241 passim, 245—249 passim, 255f., 321, 328—329, 337, 348, 宣传部首脑, 7, 95, 213—214, 227, 233, 236—241, 252, 256, 285—286; 促进阶级斗争, 16, 254; 与农民运动, 19, 137, 250, 286; 论觉醒, 93; 打击反对派, 188, 212, 250, 252—254, 257—258; 论群众路线, 215, 345—346; 理论著作, 318, 330—331, 341—343。亦见国民党内的共产党人, 宗派主义, 宣传部, 中央的
- 茅盾, 95—96, 238, 337, 343
- 茅祖权, 204
- 梅赓市, 274
- 美国, 89, 154, 170, 195, 228—229; 与
- 蒙特祖玛二世, 112
- 蒙古, 122, 162
- 蒙古人, 180
- 孟学, 18, 324。亦见儒学, 孟子
- 孟子, 18, 35, 69。亦见儒学, 孟学
- 梦寐, 64—65, 147, 192, 333, 340—341; 作为比喻, 41, 60—61
- 米歇尔·德·塞尔多, 42
- 民国, 见中华民国
- 民国国歌, 64
- 民间团体, ……被迫向政府登记, 273—274
- 民团, 178—179, 236, 287, 306, 309, 319
- 民星剧社, 305
- 民政厅, 263, 266, 275
- 民智书局, 195, 378
- 民主党人, 自由……, 见列宁主义
- 民族, 95, 315, 347
- 民族学, 110—114 passim, 122, 129—132, 136, 140; 原型, 105—109, 118—119, 123—125
- 民族主义, 20, 25, 39, 86, 95, 109, 127f., 140, 211, 315ff., 340; 和小说, 131—132; 和觉醒, 315。亦见觉醒
- 闵斗基, 165
- 闽(族), 121
- 闽军, 295
- 明朝, ……地方志, 129

- 明恩溥,129,145—146
墨索,141f.
墨学,69f.
穆斯林,180
拿破仑,5,40,62—64,352 n. 10
拿破仑式的英雄,见英雄
南京,12,26,56
南岭,291
南通,53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罢工,223
南征,270,282,304—310 *passim*
内陆开发,126—130 *passim*,135
内藤湖南,206f.
内战,347
尼采式军国主义,140
尼赫鲁,127—128
纽约,中国学生在……,58
农场主,315
农工厅,274
农会,289
农民,73,135—139 *passim*,172,256,
292,311
农民部,省级的,289
农民部,中央……,228,231,276,
289,394
农民运动,136—137,177,231—232,
239,330,344—346,374; 的组织,
238—239,261,286,289
农业革命,173。亦见农民运动;农民
娜拉,99—101,337,363 n. 117
女权运动,132—133
欧内斯特·盖尔纳,32,39,211,
315—316
欧蕖甲,373
欧洲,国家的,187
欧洲文化,在科学中的支配地
位,52
帕奇,52
帕沙·查特吉,103,133
帕特里克·伍尔芙,41
帕提亚帝国,111
叛乱,滇军和桂军的,236
彭湃,57,178,227—232 *passim*,289
彭素民,227—228,230
彭彝,270
澎湖列岛,68
平民学校,286
平原县农民合作社,31
浦东特区,360
普莱斯科特,113
普鲁士,44
普通话,158。亦见方言,语言改革
期刊,传教士的,37
期刊,见杂志
旗,6,27,181—183,189—190,376;
国民党(青天白日),5,180—181,
185,189,269,377; 民国的(五色
旗),180,182—185
旗帜,党的,见旗
旗帜,满洲,见满人

- 启蒙,欧洲的,5,40—46 *passim*,70,
109,114—116
- 气球,见热气球
- 钱穆,71
- 钱士英,97
- 羌(族),121
- 乔治·安森,112—116,144,365 n. 27
- 钦州,《民国日报》在……,281
- 青年军人协会,286
- 青年运动,88,207,285—287,330。亦
见中央青年部,省青年部
- 青年运动讲习所,286
- 青天白日,见旗
- 青县党部,307
- 青州教会博物馆,51—52,59
- 清朝,45,61,63,78,84,129,183,
206—207,316,324;种族对立,
120—122,183;维新运动,59,
164—167,206。亦见满人
- 清廷,见满人,清朝
- 请愿,反共,243
- 秋瑾,31。亦见妇女,妇女运动
- 囚禁,107,139—145。亦见土匪
- 屈原,99
- 瞿秋白,160,191—192,323
- 全国报界联合会,208
- 权威,政治的,338
- 群力,175
- 群众动员,的代表,344—346
- 群众运动,309
- 群众战争,36—37
- 群众政治,77,174—175
- 群众组织,287—289
- 热气球,46,51,356
- 热情,在国民革命中,96—97
- 人口普查,广州,274—275
- 仁,69。亦见同情
- 日本,48,59,68,123,154,190f.,200,
305。亦见日本皇军,日本帝国海军
- 日本帝国海军,40,204—205
- 日本皇军,5,371
- 日记,见自传
- 荣乡,71
- 容克,172
- 儒学,18f.,34f.,38—39,59—64 *pas-*
sim,69f.,78,99,119,153—155,
324;……的瓦解,35,54,70,119,
121—122,153—154
- 瑞普·凡·温克尔,58
- 润,毛泽东的笔名,253
- 萨兰普尔植物园,110
- 萨马科特植物园,110
- 塞缪尔·约翰逊,132
- 赛珍珠,128,137,145
- 三不主义,292—293
- 三民主义,8,164,184,225—229 *pas-*
sim,254—259,262,264,269,380;
孙中山的谈话,36,91,104—105,
216,254;作为宣传,198ff.,292—
293,296,302

- 桑莫塞·毛罕,108
沙面岛,外国租界,217,247。亦见省
港罢工和抵制,沙面惨案
沙面惨案,274—275,248,279,322
山迪·皮特瑞,325
山东,4,141,191,201
珊杰·塞斯,317
陕西省,178
汕头,56,151,281
单铭寇 232
商民部,中央……,276,287
商民协会,165,287
商人,177,283—284,305—307,
319,320
商人武装,287,306,319
商人运动,……的组织,287—288
商人运动讲习所,261
商团叛乱,广州,见广州商团事件
商团危机(1924),249
商业,……和学问,111
上海,19,27,52,56,194—197 *pas-*
sim,218—223 *passim*,249;华人等
于狗的标记,119—120,123
上海报界俱乐部,208
上海大学,268
上海党部,职员罢工,383
上海《民国日报》,129,174,194,
201,208—211,220—224 *passim*,
242,255
上海执行部,219
上海中央干部会议,221
韶关,291
邵力子,211
邵元冲,174,225—226,233—234
社会冲突,319
社会的敌人,76
社会主义革命,176
社会主义青年团,242
社区,70,73—74,80,82;伦理的,68,
70,79,81,83—84;妇女的,100
绅士阶级,165,167,178,309,316。亦
见民团
深圳县党部,241
沈从文,131—132,138
沈定一,209—210,233—236,263
沈雁冰,见茅盾
审查制度,215
省妇女部,285
省港罢工委员会,278,290,293,305f.
省港大罢工和抵制,231,247—249,
274,305。亦见省港罢工委员会,广
州商团事件,沙面惨案
省青年部,286
省青年讲习所,287
省宪法(1912),185
省宣传部,239,246—247,260,277—
278,280
省议会(广东),151
省执行委员会,306
圣西门,5,75

诗歌,72,184,337。亦见文学
 施特雷特,42
 狮子,2—3,28,30—32;觉醒的……,
 2—3,20,22,28,32f.,70;沉睡,
 29,41
 狮子,英国的……,31
 十月革命,175
 时间感,49—50
 时尚,23—25,55—57,64。亦见发型
 识字运动,13,155,158,334
 实践,338—339,341—343
 史景迁,101
 士大夫,108—109。亦见官僚阶级
 世界语,76
 市场,作为革命思想的代理,56—57。
 亦见时尚
 市妇女部,285
 手电筒,见小玩意
 疏离,68,92,94
 曙风,212
 水北高小,270
 司的派,272
 斯图尔特·施拉姆,250
 斯威夫特,130
 四邑方言,158
 宋朝,72,159
 宋学,34,69
 宋子文,267,290
 苏联,168,170,203,211,243,284,
 300,305

苏联红军,300
 隋那,65
 孙传芳,201—202
 孙铎,见马林
 孙镜亚,216
 孙科,248—249,267
 孙美瑶,142
 孙文,见孙中山
 孙文学会,见孙文主义学会
 孙文主义学会,268,272,311
 孙逸仙,见孙中山
 孙中山,13,18,20,29—41 *passim*,
 46,63,72,86,93,157,175—182
 passim,190,199,252,330;……之
 死,1,16—17,26—28,212,217,
 231,238—240,266,274,335;与觉
 醒,2,17,45,49,242;与三民主义,
 8—9,200,235;与礼节,9—12,87,
 104—105;害怕亡国,13,90,139;
 与阶级斗争,15,242;与共产党人,
 16,39,204,243;反对自由主义,
 16—17,150,164,185—190 *pas-*
 sim,200,341;……的崇拜,22;反
 帝,6,49,169—170;……的领导风
 格,63,194—197,207,216,241;与
 作为种族的中国人,87,105—106,
 121—122,175,348;与中国人的缺
 陷,91—92,117,120,163,173—
 174,与党军,152,294—297,395;
 与旗,180—183;宣誓,184,378;偏

- 爱党治体制, 185—189, 206; 改组国民党, 194—197, 205, 224; 成立民智书局, 195; 被毛泽东侵害, 257—260; 的梦, 336, 339—340; 论“行”, 340, 342—343。亦见觉醒, 陈炯明, 列宁主义, 毛泽东, 民族主义, 国民党
- 台湾, 2, 68
- 太平洋通讯社, 244
- 谭平山, 218, 225, 233, 236, 238, 244, 263, 311
- 谭嗣同, 59—60, 339
- 覃振, 201, 243—244
- 唐朝, 72, 184
- 唐继尧, 194, 236, 241
- 唐绍仪, 194
- 唐生智, 295
- 陶希圣, 336
- 讨鄂军的军校, 298, 304
- 特别区党部, 304
- 天津妇女爱国同志会, 31
- 天津总商会, 142
- 天民, 88
- 田桐, 199—200
- 条约口岸, 50, 103—104, 119
- 铁道部, 72
- 铁路, 141
- 同济医学专门学校, 31
- 同盟会, 148, 196, 244
- 同情, 69, 84, 324—325, 327—328
- 同治中兴, 48
- 童霍林, 293
- 投票, 见选举, 联省自治运动, 地方政府, 地方自治
- 土匪, 140—146, 306
- 吐痰, 见礼节, 卫生
- 团体自由, 215
- 托马斯·德·昆塞, 114, 132—133
- 托马斯·拉弗耳斯, 110
- 托马斯·尼普迪, 67
- 托尼·波兰, 327
- 外交部远东处, 170
- 王宏图, 198
- 汪精卫, 217, 227, 231—237 *passim*, 248, 251—252, 260—264。亦见宣传, 中央宣传部
- 亡国, 90—91
- 王乐平, 201
- 王一飞, 393
- 威尔斯, 59, 75
- 威海卫, 49
- 威廉·米怜, 37
- 威廉·莫里斯, 58f.
- 韦纳·梅斯纳, 342
- 唯物史观, 333, 336
- 维尔登, 141
- 维拉·伏拉德米洛夫娜·维什雅科娃, 284
- 维新运动(1898), 59
- 维新运动(清季), 164f., 167

- 卫生,36,104—105。亦见礼节
- 卫生改革,36。亦见卫生,传教士
- 温斯顿·谢,152
- 文昌县,270
- 文华堂,279f.
- 文化,71,108,134—135
- 文化宣传,194。亦见宣传
- 文盲,14。亦见识字运动
- 文人,68,133,135。亦见知识分子,作家
- 文学,57—62 *passim*, 68, 72, 93f., 150, 145, 333; 现实主义……, 332—333, 338; 浪漫……, 94, 338—339; 传统的, 57f., 60, 145, 333。亦见觉醒,小说,表现
- 文学革命,92,98
- 温仲良,275
- 文字,155,157—158。亦见语言改革
- 乌托邦,理性的……,75。亦见理性主义
- 无产阶级,161—162,326
- 无锡县,71
- 无政府主义,76ff., 81, 241, 339
- 吴佩孚,201,203,205
- 吴稚晖,10,78,118,121
- 五卅运动,96,144,211,268,320—322,336—337,344
- 五色旗,见旗,民国的
- 五四运动,13,31,48,87,92—94,153—154,191—196,207—215 *passim*, 267, 331, 336;……的出版物,96,193,195,208—211
- 伍朝枢,275
- 伍特海特,11,128
- 伍廷芳,192,194
- 武昌起义,53,181
- 武昌高等师范学校,268
- 武丁,340
- 武汉,……的陷落,299
- 武装力量,40,166,172,178,181ff., 200—202,231,290—295 *passim*, 300—310 *passim*。亦见部队,民兵,国民革命军,海军
- 西奥多·盖利,42
- 西奥多·哈特斯,332
- 西湖,72
- 西泊尔植物园,110
- 西樵山,68
- 西山派,218,231,267,272
- 西藏,122,162
- 希腊帝国,111
- 厦门,时尚,56
- 先锋党,79,326。亦见共产党
- 先觉者,6,35,341
- 县长,见地方官员
- 现实主义,95,331—334,337—339,346。亦见浪漫主义
- 宪政,207
- 香港,50,56,154,244。亦见省港罢工和抵制

萧楚女, 354 n. 20

萧凤霞, 338

小说, 58—61 *passim*, 72—73, 92—102, 114, 123—125, 130—132; ……中的觉醒, 60—61, 99—103, 123—125。亦见文学, 作家

小玩意, 23, 57

肖像陈列室, 50

协会, 地区性的……, 165, 287, 289

谢持, 242

谢英伯, 219

谢瀛洲, 264, 266—268

新国民, 22, 85

新加坡, 110

新疆, 122, 162

新民, 77, 103, 105

新生活运动, 105, 119

新时代的人, 138

新文化运动, 40, 70—71, 78, 87, 94, 136—138, 194, 207

新文学, 34, 123

新闻业, 93, 140, 201, 207ff., 244

信丰县, 310

兴中会, 254f.

醒来的国民, 55

性别, ……的社会, 87

性激情, 96—97

修辞, 154ff.。亦见语言

徐家汇, 51

徐世昌, 202

许崇清, 267, 269

许崇智, 298

徐天放, 244

宣传, 77f., 121, 194, 198, 222—275 *passim*, 285, 288, 327—339; 共产党人, 31, 236, 237, 242; 群众, 36, 38, 77, 81, 174, 199, 206; 妇女运动, 37, 284—285; 反对军阀, 178; 关于三民主义, 199—200; 与宗派主义, 225—226; 关于阶级斗争, 234, 345; 军事……, 236, 240, 300, 302, 305, 307; ……大纲, 240, 260; 农民运动, 289; 工人运动, 290。亦见中央宣传员讲习所, 毛泽东, 中央宣传部, 省宣传部

宣传人员: 军事……, 29

宣传员讲习所, 277—279

宣中华, 188—189, 229—230

选举, 地方……, 150—152, 166。亦见联省自治运动, 地方自治, 地方政府

学生, 165, 170, 222, 272, 324; 作为时尚制造者, 56—58, 129, 159; ……行动主义, 68, 126—127, 182, 190—191, 269, 293; 作为宣传者, 275, 279, 286, 312

学生装, 25, 56—57。亦见时尚, 毛式上衣, 中山装

学校, 268—269, 286, 312

学校校长, 270

- 寻乌县, 23, 56—57
 训导型政治, 20, 79, 206, 323, 326—327, 343, 346
 鸦片, 126
 鸦片战争, 47f., 114
 亚美利哥·维斯普奇, 42, 126—127
 亚细亚生产方式, 44
 亚洲石油公司, 305—306
 延安, 101
 言论自由, 106
 阳春, 281
 阳江, 281
 杨坤如, 311
 杨永泰, 230
 要塞, 305—307, 309
 叶楚伦, 28—29, 41, 174, 208—212, 222—225
 叶举, 202
 叶绍钧, 337
 一张白纸, 比喻民族觉醒, 42
 伊丽莎白·斯坦顿, 132—133
 伊莎贝拉·伯德, 115
 医学院, 香港, 147
 颐和园, 53
 义和团运动, 121, 141
 艺术, 作为宣传, 277, 332—333
 艺术陈列室, 50
 艺术家们, 20ff., 30—33 *passim*, 70, 94, 104, 107, 277, 334
 艺术宣传委员会, 277
 议会政治, 孙中山反对, 195—196
 议员, 见国会议员
 异议, 89
 异域, 小说中, 130
 易卜生, 99—102。亦见《玩偶之家》
 意大利, 141—142
 意识, 79—80, 326f., 345f.; 种族的, 82, 367 n. 67
 意志, 在创造国家中的作用, 91
 因戈·克兰丁, 112
 殷代, 340
 印度, 42—44, 111, 127—128
 印度尼西亚, 5
 英帝国, 110—111。亦见不列颠, 殖民主义, 帝国主义, 海军
 英格兰, 见不列颠
 英国东印度公司, 110
 英雄, 64—65, 119
 永安公司, 223
 永丰舰, 148
 永丰县, 228
 游民, 255
 于树德, 233—234, 249
 舆论, 206—207
 语言改革, 13—14, 153—159, 334
 语音系统, 见语言改革, 文字
 郁达夫, 95—97
 园艺, 见环境设计
 袁世凯, 30, 71, 148, 169, 181—182, 185, 195

- 约翰·D·洛克菲勒,141
约翰·巴罗,47,113f.,133
约翰·芬克,165
约翰牛,114f.,131。亦见不列颠,殖民主义,民族学,中国佬,种族主义
约瑟夫·冯·施坦伯格,145—146
粤军,296
粤学,69
越南人,90
云南讲武堂,296—297
恽代英,177
杂志,30—31,59,194,208f.,277,286ff.,311;国民党的……,209;妇女运动……,284—285
赞美诗,184。亦见国歌
藏人,180
曾朴,61,65,130
詹姆斯·杰美逊,319
战国时代,184
战争,48,82—83,108。亦见武力,军队,帝国主义,军事的……
张炽章,129—130
张德惠,243
张国焘,205,233—234
张灏,35,69
张鹤图,270
张继,199—200,203—204,379
张謇,53
张秋白,193
张廷飞,156
张作霖,292
章炳麟,13,82—83,121—122,149,347
漳州,151
赵恒惕,162—163,205
赵士北,189
赵石龙,244
哲学,67,128
哲学家们,67,70,74,77
浙江,223
震旦博物馆,51
震光公司,工人俱乐部,274
征募,军队劳力的……,291—293
正式演说,158。亦见方言,语言改革
政学系,208
政治部,300,军事……,301f.,304—305
政治会议,243f.,249
支那,117;作为野兽之土,131
知识,帝国主义者的征服,111—112。亦见帝国主义
知识分子,20,22,33,98,111—112,128,152
直系,202
殖民者,119—120,124—125,140—143。亦见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东方主义,种族主义
殖民者团体,119f.
殖民主义,103—104,106,108。亦见殖民者团体,殖民者,帝国主义,东方主义

- 制度,261—313
- 中共四大,235,251
- 中国共产党,见共产党
-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290
- 中国佬,9,103—109 *passim*,114—119 *passim*,128—134 *passim*。亦见殖民主义,民族学,帝国主义,东方主义,种族,种族主义
- 中国人,98,106—126 *passim*,132—140 *passim*,146f.,174—175;真正的……,106,108—109,135—136,145—146;……的缺陷,113—114,117—119,132,134,138,140,174;一片散沙,163,174。亦见中国佬,人种学,种族,种族主义
- 中国协会,142
- 中华革命党,191,228,255
- 中华民国,21,70,133,193
- 中华民国的旗帜,见旗
- 中华全国总工会,290
- 中日战争,48
- 中山大学,见广东大学
- 中山纪念堂(广州),1—3,7—8,12—15 *passim*,22,28
- 中山舰事件,278,301—302
- 中山陵,1,12
- 中山装,23—25
- 中央法制委员会,241—242
- 中央妇女部,276,284—285
- 中央干部会议,上海,221
- 中央集权运动,164—167
- 中央监察委员会,241—243,386
-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见黄埔军校
- 中央陆军教导团,见陆军讲武堂
- 中央青年部,271,276,278,285—286
- 中央宣传部,95,200,204,212—218 *passim*,225—321 *passim*; 的成立,200,215; 在毛泽东领导下,214,227,233,237,240,250,252; 在戴季陶领导下,226—227,237,245,321。亦见宣传,省宣传部
- 中央宣传员养成所,232。亦见宣传; 宣传部,中央的; 宣传部,省级的
- 中央银行,267
- 中央组织部,227
- 种族,9,83—90 *passim*,107,120—122,182,365,366。亦见中国人,族性,民族学,种族主义
- 种族主义,107,108,113—114,121,123; 殖民者,104—105,109,115,118—119,128,140; 中国的,122,183; 作为动物绰号,125。亦见中国人,族性,民族学,种族
- 周恩来,31,227—232 *passim*,240,271,273,281—282,301—302,307—310
- 周佛海,230—232,241,271,273
- 周瑞,124
- 周士冕,302
- 周文王,356

- 朱尔斯·凡尔纳,58
朱次琦,34,69
朱家骅,357 n. 112
朱利安·威斯特,59
朱执信,268
朱自清,335,338
珠江,261
主权,孙中山论,342
资产阶级,176—177, 318, 320f., 326,329
子任,毛泽东的笔名,253
紫金县,310—311
字母,语音,见语言改革;文字
自传,92—93
自觉,193
自然主义,文学的……,338。亦见现实主义
自杀,寡妇的……,160
自我,……的革命,193
自我,集体,100
自我启蒙,192。亦见自由主义
自由恋爱,94
自由民主党人,见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154—155, 187—193 *passim*, 198—199, 206, 229—230; 与孙中山,185—186, 189—190, 195, 203,214
自由主义政治,206。亦见自由主义
自治,192。亦见自由主义
自治人员养成所,167,374
自主,192f.。亦见自由主义
宗教,在学校被禁,269
宗派主义,16, 224f., 281f., 312—313,322;国民党内,168,212,218, 226,246,251—256 *passim*
总政治部,240,309f.
邹德高,243
邹鲁,248—253 *passim*, 270 —273, 281,286
租界,4,191
族性,86—87, 124—125。亦见民族学,历史上的人,种族,种族主义
组织部,中央的,244
左拉,343
作家,13, 21, 33, 58—61, 92, 138, 331, 336—337; 与浪漫主义,95, 335;女性……,132;与现实主义, 336—337

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